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十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的中共陕西省委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中共陕西省委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本辑编辑组：

主 编：李鸿义 高中哲

副主编：刘守琦 王少民

编 辑：姚文琦 刘玉平

张培林 贾 波

本辑审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

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李鸿义 熊美杰 孙启蒙

贾自新 高中哲 王克荣

王少民 卢胜利

责任编辑：姚文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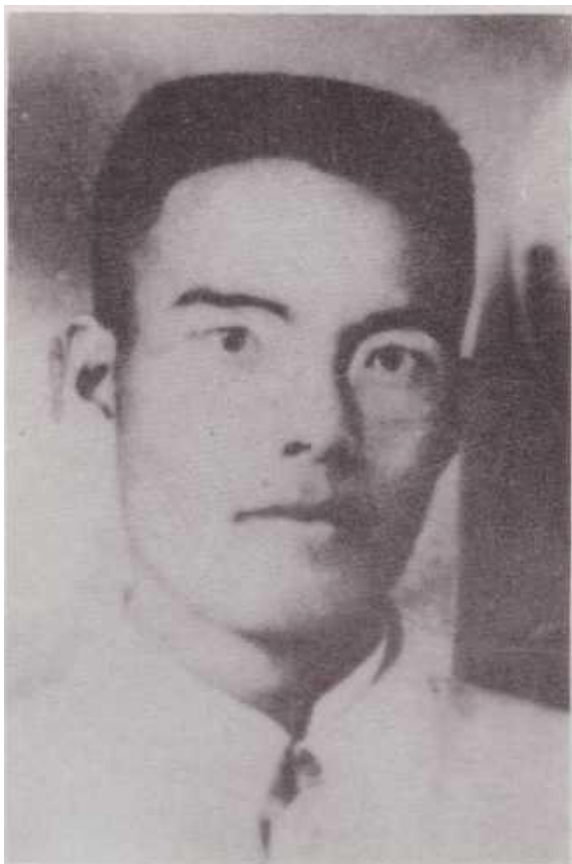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姚新合



潘自力，一九二八年一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书记。



李子洲，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狱中病逝。



吉国桢，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常委会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在狱中就义。



孟坚，一九三二年八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魏光波，一九三四年四月任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书记。



高克林，一九三五年五月任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贾拓夫，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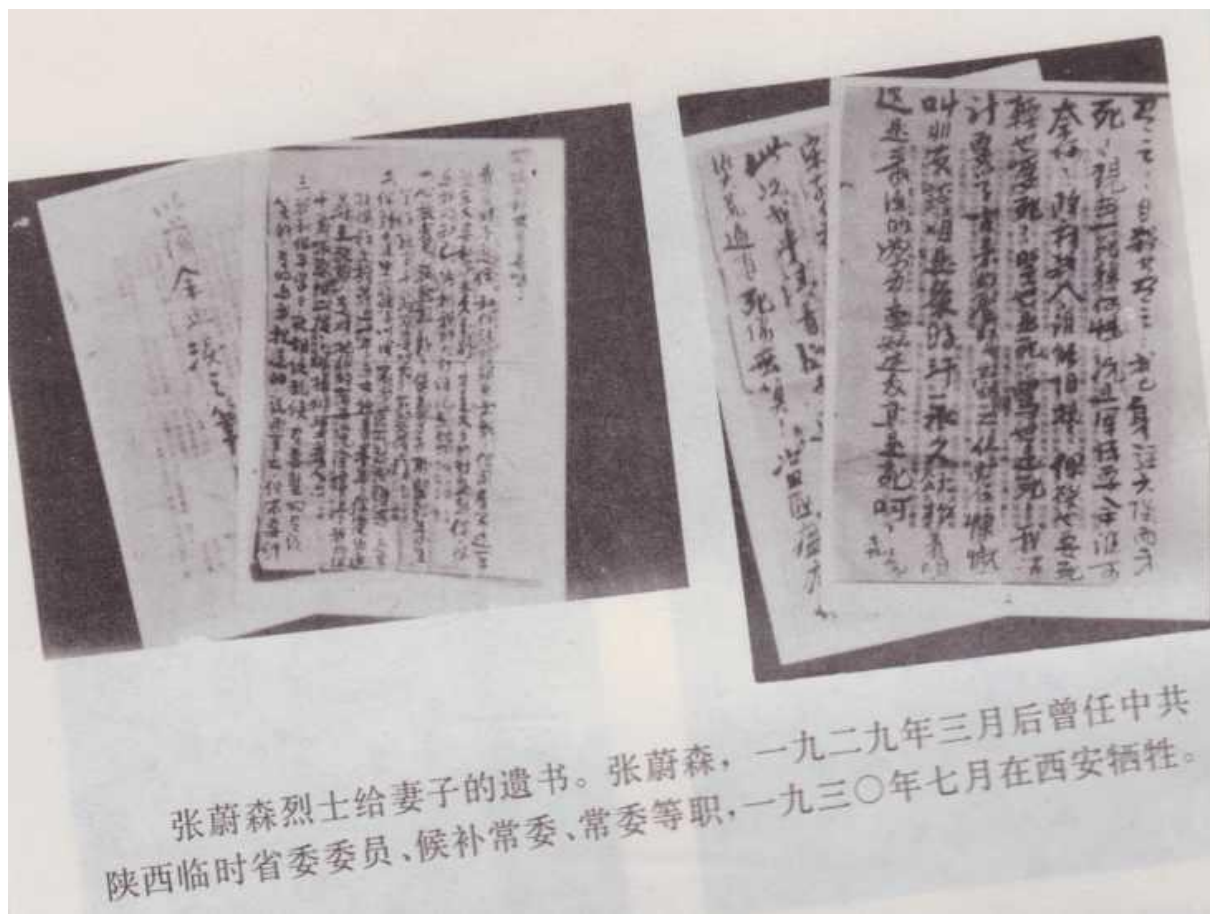
焦维炽，一九三〇年七月任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一九三二年
八月在蒲城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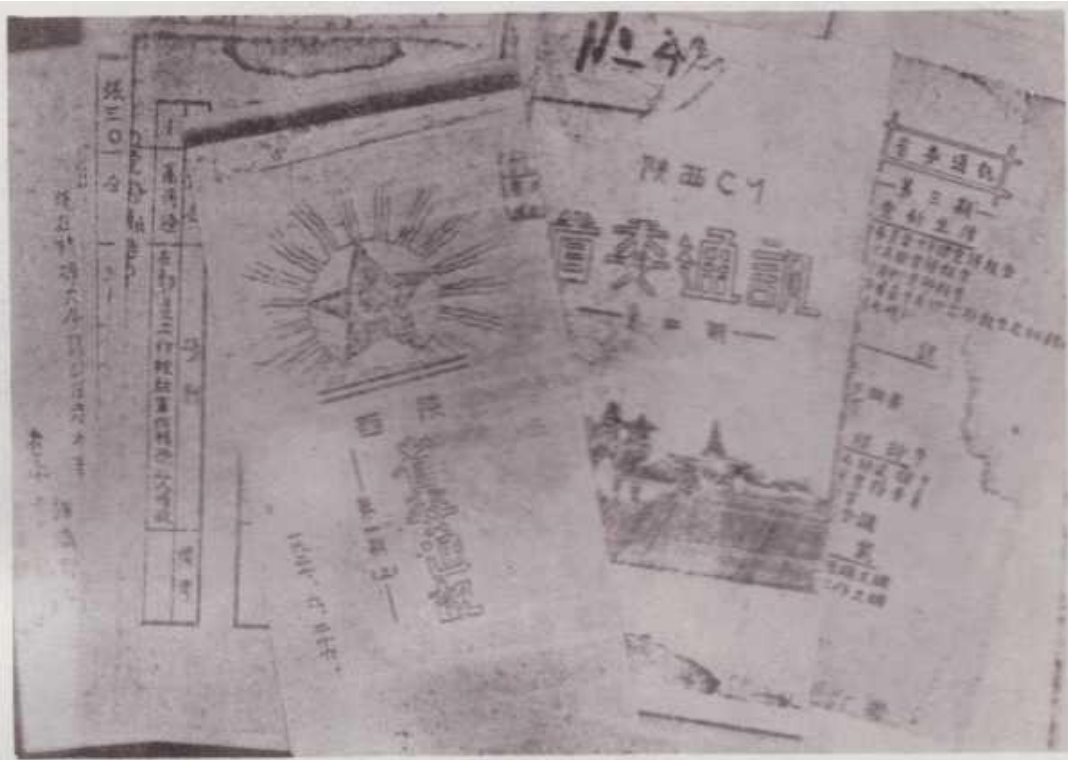


李艮，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任中共陕西省常委，一九三三年四月在西乡县牺牲。



杜润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四月在西乡县牺牲。





中共陕西省委刊物《陕西省委通讯》。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在西安柏树林住址。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编辑凡例

一、为了立好、立准确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资料，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编辑出版《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二、本《丛书》系“内部发行”的资料。丛书的序列编号，以文稿的发排时间先后为序。

三、收入本《丛书》的历史资料，原文中之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简化字、通用字；竖排之标点符号，均洙为横排标点符号；阿拉伯文之数词词组，均改为汉文数词词组；当时不便于明书以“○”、“×”、“A”等符号代替之隐文，统以“○”代替；多余之字句，加“〈 〉”保留；辨认不清和因纸张破损漏缺之文字，均以“□”代替；明显之遗漏、错别字句，在“〔 〕”内补漏、正误。

本辑编辑说明

(一) 本辑丛书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资料专辑。共收录历史文献、回忆录等各类资料一百四十三篇，比较翔实、系统地反映了中共陕西省委从一九二七年成立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的十年艰苦战斗历程。

(二) 本辑丛书自一九八二年开始征编，迄今已近十年。

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五年中，在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分专题征集了同中共陕西省委这一段历史有关的重要会议，重大问题和重点人物的资料；并在《陕西党史资料通讯》、《内部研究》上发表，征询意见，订正史实。其后，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的三年中，按照公开出版《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的要求，扩大范围，继续征集、整理、核订资料。一九九〇年三月以后，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对征集到的资料进行核校、补充和精编，并撰写了综述、大事记，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完成了全书的总纂工作。

(三) 在本辑丛书的征编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同志及有关部门和地方党的关心和支持。汪锋、高克林、赵伯平、王曙、常黎夫、吕剑人、孙作宾、刘庚、魏光波、陈云樵、张文华、李连璧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并审阅了部分重要文稿。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档案室等部门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给予了大力的协助。渭南、榆林、铜川、宝鸡、安康等地（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渭南、华县、三原、蓝田、韩城、澄城县（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了资料和订正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的十年，历经曲折，史实纷繁，国内外和

党内的矛盾错综复杂。限于编者水平，本辑丛书的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老同志和广大党史工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辑组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

目 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综述·····	(1)
大事记·····	(25)

历史文献

中共中央对陕西省委领导成员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五月）·····	(82)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政治经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83)
耿炳光关于陕西政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	(88)
李子洲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	(90)
中央负责人与陕西代表子洲谈话（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92)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文献（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97)
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	(98)
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	(109)
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	(117)
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118)
组织工作决议案·····	(124)
宣传问题决议案·····	(129)
农民斗争决议案·····	(133)
军事运动决议案·····	(137)
K. M. T 问题决议案·····	(139)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141）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第一号）（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	（144）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南工作大纲（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146）
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149）
中央致陕西省委公函——陕字第七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154）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156）
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政治报告（第二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157）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及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160）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及决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173）
附：共青团陕西省委关于 C. P. 省委第一、二次全体会志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183）
中央致陕西省委信——中央陕字第九号公函（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187）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194）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二十九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199）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复耿〇〇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201）
附：耿炳光给省委常委会的信（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205）

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216）
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218）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224）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226）
潘自力关于陕西党组织情况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232）
陕西工作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	（240）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	（255）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	（256）
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257）
陕西职工运动概况（一九二八年九月）	（258）
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260）
中共陕西临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	（263）
中央给陕西临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268）
陕西代表团报告（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	（274）
陕西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283）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297）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305）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军支函（省字 41 号，军字 2 号）（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312）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通告（第九号）（一九三〇	

年四月七日).....	(314)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陕北特委函(一九三〇年 四月十五日).....	(316)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第六号)附 表(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	(321)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〇年七 月二十五日).....	(323)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〇年八月 十日).....	(328)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报告(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日).....	(330)
中共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一九三〇 年九月十四日).....	(342)
北方局对于陕西当前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九三 〇年十月十七日).....	(363)
中央致北方局转陕西省委的信(一九三〇年十 月二十九日).....	(369)
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一 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	(373)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二月 十三日).....	(384)
中共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一九三 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389)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三月 二十九日).....	(396)
吉国桢向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	(402)
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 日).....	(427)
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及中 心工作决议案(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	(431)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十二	

月五日).....	(442)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 作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444)
中共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二年二月十 五日).....	(449)
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	(453)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信(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 一日).....	(455)
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 苏区的决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459)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二年 月二十七日).....	(465)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四·二六惨案经过情形中 央的报告(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467)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	(470)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一三 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477)
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三二年八一 日).....	(479)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 军决议案(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485)
中共陕西省委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决 议(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	(505)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三二年十 月一日).....	(518)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二年二 月一日).....	(519)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新进攻中反 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522)
关于陕西省委在政治领导和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检讨与改组	
省委的请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526)
天花同志叙述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528)
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一九三三年	
(二月三日).....	(530)
中共陕西省委给汉南特委的指示信(一九三三	
年二月五日).....	(533)
中共陕西省委给汉南特委信(一九三三年三月	
四日).....	(587)
中共陕西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一九三	
三年三月十五日).....	(541)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改造省委今红二十六军军政干部问题的报告与请示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544)
中共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一九三三年四	
月十五日).....	(546)
拓夫关于陕西党破坏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十一	
月十三日).....	(550)
陕西恢复工作委员会恢复陕西工作报告(一九三四年	
二月十六日).....	(563)
陕西来人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575)
贾拓夫关于陕西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一九三	
七年二月十二日).....	(578)
中共陕西省委给孟和同志转耀县工委指示(一	
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	(582)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领导区域划分的报告(一	
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584)
中共陕西省委给渭华诸同志信(一九三七年三	
月二十五日).....	(587)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三月份工作计划（一九三七年三月）	（590）
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	（593）
关锋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结论（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	（608）
贾拓夫关于陕西省代表会议、党的组织及工作情形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	（617）

回忆录·访问记

我在陕西省委的工作	耿炳光（620）
陕西省委早期的工作	潘自力（624）
回忆陕西省委和渭华起义	刘继曾（631）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陕西省委的活动	王林（638）
成立陕西省委片断	李子健（644）
在陕西渭华的一段工作	李大章（645）
陕西省委早期活动	曹趾麟（647）
一九二八年陕西党、团省委机关和遭破坏情况	任青云（649）
一九二八年陕西省委被破坏经过	王爱玉（652）
一九二九年陕西省委工作	徐振化（654）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陕西省委的工作	张资平（656）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陕西党、团省委的活动	薛永寿（658）
一九三〇年陕西党、团省委的破坏	王曙（662）
我在陕西党、团省委的六年	刘映胜（665）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地下斗争回忆	梁益堂（682）
回忆一九三〇年陕西省委秘书处和张蔚森烈士	闵继騫（687）

- 从宣化事件到陕西省委四次全会.....张文华 (696)
- 陕西省委五次扩大会议前后.....赵伯平 (702)
-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陕北党的工作.....冯文江 (719)
-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陕北特委一些情况.....常黎夫 (722)
- 回忆蓝桥农民武装暴动.....林之屏 (724)
-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的曲折斗争
.....贾拓夫 (727)
- 我在陕西省委的一段工作.....孟用潜 (732)
- 一九三二年西安四·二六事件.....苏执中 (734)
- 我在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的工作.....汪锋 (738)
- 一九三二年陕南之行.....刘明达 (745)
- 一九三三年川陕之行.....刘瑞龙 (751)
- 陕南特委和安康起义.....刘巧多 (756)
- 两当、蒿店兵变和西路临时特委.....李特生 (759)
- 创业维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在陕西
地下斗争的经历.....陈云樵 (762)
- 艰苦的地下斗争——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
的陕西省地下斗争.....陈子敬 (778)
- 两年艰苦斗争的回忆.....陈子敬 (783)
- 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被破坏情况.....薛和昉 (788)
- 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破坏后简况.....宁耀峰 (790)
- 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点滴.....樊德音 (791)
- 一九三三年陕西临时省委片断.....雷振东 (792)
- 陕西地下党组织的斗争没有中断——一九三三
年到一九三六年陕西临时省委的回顾.....孙作宾 (793)
- 一九三三年陕西临时省委点滴.....余海丰 (806)
- 王泰吉起义和陕西临时省委.....王云藻 (808)
- 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和西安中心市委
.....魏光波 (813)
- 一九三三年西安市团委恢复和破坏.....胡明伦 (819)

一九三五年前后陕西地下工作·····	高克林 (823)
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陕西临时省委一些情 况·····	王 均 (825)
陕西临时省委和兵运工作·····	胡振家 (828)
陕西临时省委和乾县武装斗争·····	吕剑人 (831)
陕西临时省委和乾县铁佛寺起义·····	严克修 (836)
临潼地下斗争和乾县铁佛寺起义·····	刘 庚 (842)
陕西临时省委特工队·····	杨嘉瑞 (847)
王泰吉起义、渭北工委和两次向中央汇报·····	谈国帆 (852)
一九三六年陕西省委的组织·····	张德生 (859)
一九三七年陕西省委片断·····	王 文 (861)
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学校党组织和学生运动·····	董学源 (862)
回忆西北特支和陕西省委·····	徐彬如 (867)
从西北特支到陕西省委·····	谢 华 (877)

附 录

杜衡的“自白书”·····	(880)
---------------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 综 述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中共陕西省委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原中共陕甘区委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西安成立的。其领导和管辖的党组织的区域包括陕西全境和甘肃、宁夏部分地区。

陕西省委是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中成长起来的。在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中，省委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历经艰险曲折，多次力挽危局，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一方面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摧残，一方面不断克服党内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逐步从挫折和失败走向胜利。在广大农村开发了渭北、陕甘、陕北和陕南游击战争，创造了渭北、陕甘、陕北和陕南革命根据地，锻炼出坚强的工农红军，涌现出一大批革命骨干，终于在西北辽阔的土地上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后把革命大本营转移到西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势力的中心。当年六月，冯玉祥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在豫陕甘等省进行“清党”反共。在省委成立前后，七月初，冯玉祥发表了“清党”反共三条办法，并调集军队向西安进逼。七月十八日，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冯的参谋长兼留守司令石敬亭代于右任为主席，宣布解散一切革命组织，在冯部和西安的共产党员被驱除，党在各地的组织被取缔，著名共产党员、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被害，《陕西国

民日报》负责人刘天章等被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全省党员由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减少到一千六百八十一人。

在严重的形势下党的代表大会无法召开。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即由中央决定的省委书记耿炳光、委员李子洲、黄平万以及魏野畴、张金印（张慕陶）等人开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并针对当时形势讨论制定了一些重要对策。七月十一日省委向中央报告：由于冯玉祥与共产国际关系尚未断绝，党在陕西的力量还很薄弱，在未得到中央对冯的政策前，省委决定暂不作反冯运动，对其右倾也不袒护；对陕西地方军阀持中立态度，党内暂时退守，保存实力，充实群众组织，加强内部训练，注重农村基层工作，并将全省分为六路，派出特派员指导各地工作。

七月中旬，省委派李子洲到武汉向中央汇报陕西工作。八月十二日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李子洲汇报后，向李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决定，认为陕西“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中央分析冯在河南难以立足，将以陕西作为其根据，要求陕西党组织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从根本上推翻冯的统治，要提出代表民众利益的口号如“抗捐抗税、反对土劣贪污”，“耕者有其田”等。用各种方法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民运动集中的几个县可开始暴动。在军事上可利用与冯玉祥有矛盾的原国民军二、三军与我们合作反冯。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中要组织改良待遇的斗争，在商人中提出不交苛捐杂税。党的各级组织要按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进行改组，洗刷消极分子，吸收勇敢分子入党和参加领导机关。

李子洲回陕后，向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和中央指示精神，省委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央对陕西的指示。耿炳光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冯玉祥已经成为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新军阀，但中国革命决不会在新旧军阀的反动统治下消沉，而是更要深入群众，开展反对新旧军阀的斗争。报告提出在西北坚决反冯，并检讨了省委对冯政策动摇不定的错误。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以反冯为中心的《政治形势与我们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相应的组织、宣传、农运、军事等九个决议案。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军事上

要发动群众，破坏冯的军事设施及交通，指示由党掌握的许权中旅参加渭北国民军二军发动的反冯战争；在政治上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封建地主，准备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推翻冯的统治；对党的组织要进行整顿，迅即转为秘密状态，省、市、县要派出巡视员指导各地工作，尽力将党的基础建立到农村中去。会议强调指出：“在西北上的革命者不注意农运，就无所谓革命；农村若没有革命的变化，革命也永远不会有彻底的成功。对农民的态度，是一切政治行动的测验。”会议鲜明地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和“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会议正式改选了省委，常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李子健、宣传）。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首先在清涧爆发。

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在陕北井岳秀部的石谦旅建立了党的军支，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阎揆要、杨重远、阎红彦等党员就在该部工作。在党的影响下，石谦本人倾向进步，支持党在该部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八月，省委派唐澍、白乐亭到石谦旅开展兵运。九月十日中秋节石谦在榆林被陕北军阀井岳秀暗杀，同时企图肢解该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即组成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十月十二日率领所属营在清涧宣布起义。起义部队一路南下，经延川、攻延长、直下宜川，石谦旅一千多人全部为党掌握。连同沿途参加起义部队的共产党员和群众，总计一千七百多人，三千多支枪。占领宜川后，井岳秀调军队围攻起义部队，由于起义领导人之间在部队整编和行动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唐澍即回西安向省委请示。起义部队在株守宜川期间，遭井部高双成师重兵围攻，损失很大，被迫转移韩城。唐澍等赶到韩城，传达了省委的《陕北军事行动决议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率余部一百多人北上，预定经临镇到清涧、安定一带打游击。途中打宜川受挫。月底部队到达陕甘边的豹子川时又遭敌人追击，终于失败。清涧起义是八七会议后陕西省委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打击了敌人，锻炼了干部，教育了人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独立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全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反对退却，主张继续进攻，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不久，即接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党的总方针是准备并组织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的武装暴动；同时省委派赴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的刘志丹又带回中央通过的号召全国普遍发动起义的文件。为了讨论贯彻中央文件和检查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执行情况，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中央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目前无论是全国与陕西均不能实行，只有先实行宣传的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民众及党的力量”，继续组织民众开展抗税抗捐斗争，打破冯的农村封建基础。用各种方式恢复农协，全力宣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议还通过了《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青团省委收到团中央来函，尖锐批评团省委根据党省委常委七月十一日报告确定的工作方针。团省委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出《对于目前治形势及党策略决议案》。十二月四日，省委常委会在听取团省委决议的陈述后，于十二月七日召开第二次省委全会。经过争论，修改了第一次全会《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二八年一月，省委先后接到中央许多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函件。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省委于一月四日和五日召开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会。会议认为，省委书记耿炳光“没有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指导”，“对组织农民暴动持消极态度”，决定撤销其省委书记职务，由潘自力代理省委书记，常委潘自力、徐梦周（组织）、刘继曾（秘书主任）、张金印（共青团书记）、王松年，第四次全会后增加李子洲为常委。

根据中央关于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指示，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省委发出

第二十六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准备由部分暴动过渡到陕总暴动。为此，在组织上将全省划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区域，关中又分为省东、渭北、省西、中区、东府五个区，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指挥各区游击战争。

接着，中央《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等文件到陕。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到十四日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会，通过《陕西 C. P. ^①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决议认定“陕西客观上亦到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目前陕西 C. P. 工作之总方向是发动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尽快开始高涨，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二月十八日到十九日，省委又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审查批准省委第五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决定“自上而下地彻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在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改善党的成份尽量吸收工农积极分子”。根据中央通知，会议选举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三人为陕西出席党的六大代表。

陕西代表到上海后，六大延期召开，根据陕西代表书面和口头报告，中央作出了《陕西工作决议案》。认为冯军入陕后财政破产，已经到了绝境，冯军势力仅及于关中二十二个县，其中在陕西的嫡系兵力仅六千，各地农民自发斗争很多，反动统治已在崩溃的过程中，“陕西的革命环境是再好没有的了”。批评陕西的党组织一直到现在还陷在很深的机会主义当中。决议规定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城市和矿山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发展到政治斗争，造成农村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在农村领导自发的斗争转变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造成乡村的割据；进行反革命军队的士兵工作，从军队中反抗长官和日常的经济斗争，做到兵变与农民暴动联合。同时要求撤换各级领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从中不断地改造党。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工人、农民的斗争和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

在此期间，省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使全省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二七年七月省委成立时，全省有市、县委七个，区委两个，省辖支部二十

个（包括军队支部四个，兰州、平凉、宁夏、导河支部各一个），共有党员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全省市、县委增加到十一个，党员总数由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一千六百八十一人发展到近三千人。仅渭南华县、固市党员数即发展到近一千四百人。一九二七年十月省委还派刘甲等去汉中，建立陕南特委、一九二八年三月遭敌人搜捕后，特委组织瘫痪。一九二八年四月在绥德成立陕北特委，书记杜衡（杜振庭、厉君）。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渭南发生了由党、团县委领导的数百农民和学生反抗反动豪绅率领暴徒强占宣化高小的斗争。十三日，省委发出三十九号通告，决定由陕东的部分暴动引起全陕的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省委于三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将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固市划为陕东暴动区，成立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派省委常委刘继曾为书记，指示归属陕军李虎臣部的许权中旅参加陕东暴动。四月下旬潘自力到临潼、渭南和蒲城等地传达中央决议，指导陕东暴动。五月一日到四日，渭南、华县几个集镇分别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处决豪绅恶差，分配土豪财物等。五月十日许权中旅开赴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景桂（刘志丹），参谋长王泰吉，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的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继清涧起义之后，这是由省委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渭南起义。但不久，起义军民就遭到冯玉祥三个师兵力的围攻。起义军英勇抗击，两次打退敌人进攻，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唐澍等一些领导人壮烈牺牲。

为策应渭南起义，形成全陕总暴动的局面，根据省委指示，三原、泾阳、礼泉、旬邑、淳化、咸阳、永寿、澄城等地党组织或党员先后发动了以“交农”^②围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起义。旬邑、淳化的起义农民还攻进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麟游国民党甄寿珊师一个中队举行了起义。这些斗争除三原“交农”围城和澄城农民问政团取得暂时胜利外，余均失败。

渭南等地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震撼了军阀豪绅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工农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英勇战斗精神，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于后来在西北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影响。但其

失败也明显暴露了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陕西党组织，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不少弱点和错误。

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肯定了当前形势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十月八日中央给陕西省委信指出：“过去的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指示省委以六大决议为准绳，克服只是幻想暴动、一味盲动的错误，根据陕西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实施计划。

二、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地下斗争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迭遭破坏。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长安县委被敌破坏。二十八日省委书记潘自力去参加长安县委会议时，同与会者一起被捕，省委书记由李子洲代理。一九二九年一月底，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县美原小学召开，根据六大精神，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盲动错误，改选了省委，曹趾仁任书记。会后团省委书记马云藩等在西安被捕，供出了党、团省委机关。二月六日党、团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大部被捕。到一九二九年春，陕西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六个县委外，关中地区只剩下渭南、韩城、乾县、蒲城、富平等县委。全省党员从近三千名锐减到一千三百多名，其中关中地区只剩下二百多名党员。

在这种形势下，幸免被捕的省委委员张国藩（张质平）、王林（王芾南）、薛永寿三人，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在渭南的龙背乡白家庄召开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地党、团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成立了临时省委，书记王林。不久，原省委常委杜衡由陕北回到关中，去中央送临时省委报告的马子敬也从上海返陕。马带回中央要陕西党、团组织派代表去上海汇报和解决问题的口头指示。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临时省委在渭南召开全会，决定杜衡任

临时省委书记，徐振化、章子文为常委，由杜衡、王林和团省委书记薛永寿为代表去中央。四月十日陕西代表到上海，五月四日向中央写出《政治、党务、农村经济概况》报告，检讨了陕西在前一段工作中的盲动错误。四月十六日和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分别给临时省委来信和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对陕西党在遭到大破坏之后，很快成立临时省委表示满意。指出蒋冯冲突日益加剧，冯军集中陕西，陕西所受战争、灾荒的痛苦比别的省更甚，已有五百万灾民饥饿流离，群众斗争有普遍发生的可能，尤其全国革命斗争开始复兴，可以推动陕西群众斗争的发展。陕西党目前的总路线，是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农民的游击战争，以至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

陕西代表返回后，临时省委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在渭南辛市召开全会，传达中央指示和决议，再次调整成员：书记杜衡，王林（组织）、张蔚森（宣传）为常委。八月二十三日临时省委常委会增加薛永寿为常委、补选吉国桢为委员，派任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任团特委书记。派陈征（陈范）组建陕南党的组织。陕北党、团组织因为没有受到省委被破坏的影响，在六大决议指引下工作进展较好，尤以军事工作为突出。此后数月，全省党的组织逐步恢复。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中央红军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区域党的工作恢复壮大等形势下，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提出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首先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新的带有“左”倾冒险主义色彩的路线。临时省委接到中央通告后即通报各地党组织、军支和陕北特委执行。五月间临时省委召开渭北工作讨论会议。派陈云樵（陈冠英）和黄子文到三原、富平一带组织灾民自救队，以三原北区为中心迅速将斗争扩大到邻近县区，同时联络三原、富平三支地方武装，在三原、富平一带杀豪绅恶差，分粮食分财物，捣毁敌区公所，一时颇有声势。由于内部不纯，活动二十多天便被混入的土匪缴了枪支而失败。

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到八日，临时省委在蓝田巩村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央七十号通告拟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提纲关于党的总的策略路线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具体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创造并扩大红军，党内则要“纠正不动主义的右倾危机，防止盲动主

义残余的发展”的精神。通过政治形势、职运、农运、兵运、组织、宣传及 C. Y. 问题等七个决议案。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书记杜衡、常委王林、吉国桢。会后，派吉国桢兼任西安市委书记，王林去渭北巡视工作，赵伯平继吉国桢任陕北特委书记，杨子才（梁益堂）去陕南恢复特委。省委还特别讨论了陕北工作，认为陕北已有发动游击战争的可能，即决定以绥德、米脂为中心，发动游击战争。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在上海，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八月一日文件到陕，九月十四日省委推翻五次扩大会议决议案，起草新的决议案。决议案中布置陕北、西安、渭华、蓝田、陕南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取得和全国革命的胜利。结果省、市委领导的西安广仁医院的罢工、西安市“九七”^③大示威、蓝田南区反军阀驻军的起义以及陕北特委的国民党驻神木、榆林一些部队的起义无一成功。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党、团陕西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党、团省委负责人吉国桢、贾拓夫等三十多人被捕。这时冯玉祥在中原战争中失败，退出陕西，十一月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率部入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党、团省委被捕的同志趁机越狱，恢复了党、团省委和西安市委。

此时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并调整了一些省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决定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均直属北方局，省委只管关中和陕南。十月十七日北方局指名杜衡、王林、陈云樵（后由杨珊去）十一月十日参加北方局扩大会议。陕西代表到达天津时，北方局扩大会议已经结束。由北方局代表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解决陕西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〇年底，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会，表示接受和拥护三中全会决议和补充决议，通过年关斗争计划，并派巡视员去各地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对省委成员分工作了调整，书记杜衡，常委兼军委书记高维翰（李杰夫），常委兼组织吉国桢。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又统治

了全党。在这次全会前后，中央出现了罗章龙分裂主义集团，反对四中全会及其中央，建议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紧急会议另成立中央，同时派人四处活动，散发文件。在究竟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还是倾向罗章龙观点之间，陕西省委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三月间，曾经几次反复。三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会，通过了《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案》，决定拥护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批判了杜衡在立三路线时期所犯的错误。另选高维翰任省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派巡视员刘少文到陕西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带来五月二十四日给陕西省委指示信，指出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陕西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八月初杜衡复任省委书记，高维翰任常委兼军委书记，刘万海任常委兼巡视员。

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给陕西省委信中又发出加紧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论了中央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三原、富平、蒲城、西路农民武装斗争和陕西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党要集中力量领导这个地区的农民运动，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区。

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地区，大革命时期就是农民运动的高涨地区。在共产党员乔国桢的领导下，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党的支部，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大革命失败后，武字区群众的革命运动时起时伏。一九三一年五月武字区党组织在灾民自救队失败后又恢复了武装斗争。根据渭北群众斗争的情况，省

委首先确定在渭北地区开发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省委还派郑群英到武字区调查农民武装情况。接着派焦维炽为渭北巡视员，到武字区开办训练班，培训干部。一九三二年三月以后，省委先后派贾拓夫、李艮（愚痴）、程建文（陈建中）、高维翰到武字区指导工作。四月二十七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曾提到：建立以旬邑、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是陕西党组织中心任斧的第一项。为了保护群众开展没收和分配豪绅粮食的斗争，在赤卫队的基础成立武字区游击队。八月成立渭北游击队。九月二十二日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即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十月六日省委发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同时成立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在特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武字区南原还开始了分配土地的工作。正当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进一步开展时，敌人大举进攻，武字区根据地被敌人占领，群众大受摧残。此后，省委又派贾拓夫为特派员到渭北，恢复整顿渭北根据地工作，经过改组特委，成立三原中心县委，健全革委会，特别是注重建立革命武装，使渭北游击队得到恢复和扩大，同时向城区和心字区扩展。

一九三三年三月，省委决定扩大渭北游击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七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南山受挫，省委决定把渭北游击队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八月，敌人再次“围剿”武字区，红四团经过艰苦战斗，退出武字区到了照金，武字区再次被敌人占领。红四团成为恢复红二十六军和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之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由陕北武装斗争骨干和山西一些工人组成的晋西游击队四十多人，由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和支持下，转战清涧、安定、三边一带，与井岳秀部队战斗十多次。十月间转移到甘肃南梁等地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汇合。省委非常重视这支部队，先后派去荣子卿、谢子长、高维翰等人到部队加强领导。当时省委认为保安等地人口稀少，给养难筹，行动困难，指示他们向关中移动。但这时部队已被甘肃军阀陈珪璋收编。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省委进一步指示他们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因部队当时成分复杂，军纪较差，不便打出红军游击队的旗帜，省委将部队改编为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维翰，

参谋长杨重远。游击区域向关中旬邑、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地发展，和这些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共同配合扩大苏维埃运动。部队经过改造整顿后，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有三个大队，四百多人。在初战取得两次胜利，部队迅速扩大的情况下，三月二十日省委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并向中央写信申请番号，同时要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配合三千武装农民和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夺取三原，建立苏维埃政权，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同时组织凤翔一带革命兵变，推动西路灾民与渭北各县的斗争，开辟以三原为中心的大片苏维埃区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成立正式红军，给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的番号，同时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流域交通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在正宁、旬邑、耀县等地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再向泾、渭、旬邑之间发展，创立较大根据地，在积极开展各地游击战争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区。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提出北方党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新苏区”。八月二十五日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讨论后，通过《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决议。根据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在陕甘边区域建立红二十六军，由杜衡任政委，中央派来陕西的孟坚（曹长青、孟用潜）接任省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由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甘游击队正式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第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兼），参谋长郑毅，共约二百多人。根据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即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二十六军。

在杜衡四面出击，不顾党的统战关系的指挥下，一九三三年一月，红二十六军冒险进攻耀县庙湾夏老么民团，致使骑兵连长曹世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

受伤，损失战马二十多匹。庙湾失利，使省委认识到弱小的红军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应当采取游击战术。二月三日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不应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编制，而是应当编成许多小游击队，更好地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杜衡认为这个指示违背了北方会议的路线，以部队代表身份回到省委，“提议”省委作了改组：停止了省委常委孟坚、贾拓夫、刘映胜（杨声）等三人的工作，由团省委书记袁岳栋任省委书记，杜衡、孟坚任常委。杜衡暂留省委，派王烈（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职务。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管辖旬邑、耀县两个县委及一些地方党组织，同时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四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以照金为中心，边区军民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农会等，建立基层政权，分配土地，形成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山区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敌人调集四个团和旬邑、淳化两个民团“围剿”照金根据地。杜衡对坚守照金根据地丧失信心，违背省委意见，决定红二十六军南下建立渭华蓝洛根据地。六月二十四日红二团渡过渭河，进入蓝田、商洛山区，遭到敌人重兵堵截“围剿”，红二团很快被打散，杜衡在南下途中跑回省委。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省委领导了耀县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给遭到重大挫折的陕甘军民和国统区人民很大鼓舞。但由于起义部队行军方向等错误，在三原辘辘把被敌人打散。余部和红四团退到照金。八月十四日在陈家坡陕甘边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会议制定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积极活动的方针。会后不久，红军转到外线作战，打开旬邑县城张洪镇，红军影响迅即扩大。十月初，红二团主要领导刘志丹、王世泰等人自南山脱险回到照金。敌人纠集四个团和几个县民团的兵力向照金大肆“围剿”。红军主力转而北上陇东打击敌人。十月十五日照金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薛家寨被敌人占领。此后在刘志丹领导下，红军和游击队驰骋陕甘边广大地区，开始了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并与红二十七军共同创造西北根据地的新时期。

在创建渭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的同时，省委根据中央有关

指示，积极开创陕南游击战争，创建红二十九军。

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省委先后派孟芳洲、杨珊、李良、杜润滋、张明远、杨维三等领导干部到陕南，加强特委和发展武装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陕南特委发出《扩大西乡城固边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同时在进入汉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人力和武器的大力支持下，二月十三日红二十九军在西乡私渡河正式成立，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良。红二十九军主要是以当地神团为基础改编的，组织严重不纯。省委曾经一再指示陕南特委，必须对神团加以改造。当陕南特委还未及着手这一工作时，四月一日原神团头子张正万即率部叛变。在西乡马儿岩开会的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四十多名领导干部除一、二人外，先后遭残杀。

马儿岩事变后，被红四方面军任命为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的刘瑞龙，在返回马儿岩途中得知消息后，收容了红二十九军的部分战士，并在马儿岩地区坚持战斗两个多月，后刘瑞龙被调回川陕省委工作，战士被编为红四方面军陕南游击队。为恢复红二十九军，陕南特委曾派大批干部加强红二十九军第三、第十游击大队，坚持游击战争一年多，终因敌强我弱而败。

这一时期，省委还于一九三二年春到年底在甘肃天水成立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李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兰州成立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工作的甘宁青特委，书记吴鸿宾。在省委领导下先后在陕西、甘肃进行了麟游、两当、靖远、西华池、蒿店、晋王、永丰、安康等地的起义，尽管这些斗争大多数都遭到失败，但是革命的火种深植西北人民心中，蕴育出巨大的力量。同时从一九三〇年杨虎城部入陕后，省委进一步加强了党在该部的军运工作，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四、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省委发出《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要求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等纪念日，组织标语队、粉笔队、毛笔队，写标语、撒传单，制造小红旗，遍插西安全城。这一行动暴露了党的组织。红五月

后，省委即遭到两次破坏：第一次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被捕；第二次交通处与妇委机关四人被捕。经过两次破坏，省委未及时警觉，又组织纪念“八一”起义的示威游行。七月二十八日，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北口福盛楼饭店。袁岳栋（小章）、杜衡、贾拓夫、高岗开会研究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的发展问题，敌人侦探随即跟踪而至，贾拓夫、高岗二人破门而出，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囚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头子宋志先家中。当晚袁岳栋就带领敌人把省委的一切文件材料搜去。第二天袁又在大街上盯梢捕人，不久，袁岳栋、杜衡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还带领敌人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地区捕去数百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叛徒们又组织“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去“肃反”负责人和专员，以致西安、三原、富平、高陵、韩城、大荔、合阳、渭南、华阴、南郑、城固、洋县、西乡以及甘肃等地党组织，都受到严重摧残，陕西党的组织受到空前未有的大破坏。

省委遭到大破坏后，贾拓夫、刘宗沛（团省委书记）等立即作了应急布置，发出通报通知红二十六军四团政委刘映胜就近负责陕甘边和三原的工作，按省委原先的决定派高岗去王泰吉部工作，派黄子文到韩城争取梁占魁起义。八月上旬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决定由澄城县委书记张新发、省委组织部干事和市委负责人三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建立与各地的联系。贾拓夫鉴于自己已暴露，无法在陕西立足，在安排善后事宜后，即于八月十五日同刘宗沛去上海找中央，汇报解决陕西工作问题。八月底，由刘映胜和张新发、樊德音、雷振东、李冲霄等人组成临时省委，书记刘映胜。临时省委派高维翰到陕东、汪锋到陕南工作。还派人去蒲城、韩城、蓝田整顿。不料九月中旬临时省委开会时，被驻机关的内奸出卖，临时省委成员全被逮捕。

临时省委被破坏后，九月间原省委干部咎玉祥、交通陈子敬联络西安党、团员胡明伦、杨文谟、王好勤、姚选科等人准备再次建立党、团临时机构时，又因叛徒告发，除陈子敬、咎玉祥外，其余尽落敌手。陈子敬即同中央交通李自靖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在此情况下，咎玉祥及原甘宁青特委军委负责人孙作宾、原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从陕甘边到西安的崔廷儒、在杨虎城部搞军运的胡振家等于十月再次成立了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临时省委成员多在杨虎城

部和民团作军运工作，决定首先在军队中进行扎实细致的工作。为了打击叛徒特务，保护党的组织，临时省委还成立了以赵成璧为队长的特工队，出没于西安城郊、临潼、周至、兴平、礼泉、乾县一带。十一月余海丰被捕，临时省委组织随之破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团中央派韩学亚回陕到西安帮助恢复党、团组织。韩找到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魏光波，经魏联系又找到西安市的党员郑福平、临潼县委书记刘庚、来省委接头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和高维翰等人，十一月十八、十九日在渭南开会，韩学亚报告了目前形势和他来陕的任务，成立了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书记韩学亚。并派人分别去联系红二十六军、陕南特委，恢复西安、临潼、蓝田等地的党组织，派魏光波去上海向中央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韩学亚接到中央来信，决定二月初在渭南召开扩大会议，准备成立正式省委。不久因敌人追捕，韩离陕回上海。后又被中央派来陕西。着其与孙作宾、刘顺元等联系。韩回陕后，慑于白色恐怖，不敢出面活动，工委遂停止活动。四月间，魏光波回陕，与孙作宾取得联系，成立西安中心市委，书记魏光波。后孙作宾转移陕南工作，魏光波被捕，西安中心市委解体。同年冬，孙作宾、崔廷儒先后由汉中回到西安。一九三五年夏孙作宾、崔廷儒、高克林又组成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及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十一月九日临时省委即派谈国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陕西国统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带回党中央给陕西地下党的指示和瓦窑堡会议文件。一九三六年四月负责学生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临时省委有被破坏的危险，孙作宾、高克林到陕北向中央汇报，留崔廷儒坚持工作。崔先后派谈国帆、严克伦到西路开展兵运工作，派吕剑人、刘庚、张涛到乾县领导了铁佛寺保安团起义。

在高克林、孙作宾到陕北之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上海来到西安开展西北军抗日统战工作的谢华的报告，指示他重建陕西地下党组织，着重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四五月间谢华在杨虎城宪兵营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北特支，由书记谢华和徐彬如、李木庵三人组成领导核心，以发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主，兼管陕甘国民党军中的党组织和苏北、

鲁南的地下党。

西北特支从西安高中、西安师范入手，在二中、女师、女中、一中、私立中学等校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同时把西安以外的三原三中、女中和汉中、兰州的一些学校也组织起来。为统一领导各地行动，六月一日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北特支的负责人都担任了“西救”的领导工作，七八月间又在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西北文化日报社组织了工人救国会以及回民和近郊农民的救国会等。八月西北特支还领导陕南游击纵队在镇安紫荆乡（今属安康）起义，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何振亚，军委主席沈敏，活跃在陕南镇安、柞水以西广大地区，配合了红七十四师的斗争。

由于中央从上层对张学良、杨虎城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对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加干涉，还在暗中给以支持和保护。西安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西北特支领导下，以西安学联、民先队为骨干，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学生运动空前高涨。一九三六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由西北特支发动和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宋黎、李连璧等具体领导的西安上万名大中学生的规模示威游行和抗日救国的请愿活动。这一活动充分显示了党领导下的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的决心，是直接推动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

西安事变后，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新时期的需要，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直接指导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陕西省委正式恢复成立，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张德生，宣传部长李一氓，军事部长欧阳钦，秘书长彭加伦。

省委成立后，积极贯彻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争取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目标。积极参加领导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寒假期间省委、西安学委和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在西安各中等以上学校组织了农村工作团（队）一百二十三个，深入农村，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救亡工作，加强了党对救亡运动的领导，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呼声。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省委立即派出多路巡视员传达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纠正组织发展工作中的关门主

义倾向，整顿与健全各地党的组织，到一九三七年三月，蓝田、渭南、华县、临潼、扶风、乾县、韩城等二十五六个县恢复了党的组织与活动，党员人数达到五六百人。到五月底，除省委领导的关中特委和军队中的党员以外，仅国统区即有市委一个，县（工）委十二个，党员八百九十六人。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在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会议，并作了讲话。贾拓夫作了《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指出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方针和目标就是动员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领导千百万群众进行保卫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党的政策和工作方式要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转移到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要停止武装暴动与没收地主土地，改苏区的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要以和平、合法、民主的工作方式代替过去暴烈的和武装的斗争方式。因此必须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目前迫切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加紧党员政治教育，为和平民主与抗战、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西省委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更加坚强，为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高中哲、刘守琦执笔）

注：①C.P. 为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②交农原是农民群众为反抗统治阶级苛捐暴敛，自发地聚集起来，向反动政府交出农具以示抗议的一种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时期，陕西党组织多利用此种形式发动农民反抗国民党统治当局。

③“九七”是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国耻日。

大事记

一九二七年

七月

上旬 根据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建立陕西省委，任命耿炳光为书记。二十日又任黄平万为省委宣传部长，李子洲为组织部长的决定。耿炳光、黄平万、李子洲及魏野畴、张金印（张慕陶）等在西安红埠街开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省委由常委三人正式委员十三人、候补委员五人组成。常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崔物齐（宣传），正式委员魏野畴（军事）、亢维恪（农运）、张金印（共青团）、张秉仁、李秉乾、杜振庭（杜衡）、蒲克敏、何挺杰、张国藩（张质平）、陈嘉惠。此时全省有党员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市、县委七个，直属区委、支部二十二个。

原陕甘区委所辖之西安地委改组为西安市委，渭南、绥德、延安、三原、榆林、五一^①地委改为县委。

6日 《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和编辑、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逮捕押往郑州。

7日 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书记张金印。

8日 留守西安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按照冯玉祥的指令进行“清党”，重新登记国民党员。十日，在西安新城^②举行国民党党员宣誓活动，借机清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时改组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陕西省各级党部，停止农协活动，查封青年社。中旬，西安警备司令部接连发出禁令，共产党员不准跨党。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

11日 省委向中央报告，冯玉祥“清党”反共，陕西白色恐怖严重。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省委决定暂不反冯，对其右倾也不袒护；对原国民军联军之

二军、冯系的省政府均采取中立政策；党的组织暂时退守，保存实力。

13日 冯玉祥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合编为一个旅，由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共产党员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前线。为保存这支武装力量，省委指示部队北上独立发展。二十九日，史可轩被军阀田生春杀害于富平美原镇。部队旋由许权中率领辗转至临潼、蓝田、洛南一带，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总司令李虎臣收编为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以下简称许旅）。

18日 以石敬亭为主席的冯系陕西省政府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结束。

19日 省委书记耿炳光就陕西政治、经济形势和省委对冯玉祥的态度向中央作了报告，请示对冯的对策，并派李子洲到武汉向中央汇报。

月底 为了便于指导各地工作，省委决定实行特派员制度。全省分为六路，每路各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向省委负责。东路（省东）特派员何挺杰，后为潘自力；西路（省西）特派员耿炳光；北路（省北）特派员李子洲（一说李秉乾）；南路（长安、蓝田、周至、户县）特派员陈嘉惠；东北路（五一、蒲城、澄城、合阳、朝邑）特派员蒲克敏；陕北路（陕北）特派员魏野畴。

△^③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军委成员唐澍、白明善（白乐亭）等巡视陕北。因白色恐怖严重，魏野畴无法立足，八月初由陕北转赴安徽杨虎城部开展工作。唐澍、白明善留陕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路第六旅李象九营工作（旅长石谦，以下简称石谦旅）。

八 月

4日 军阀井岳秀派军队将党在陕北的活动据点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封闭。

6日 李子洲在武汉写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八日至十二日，中央先后两次听取了李子洲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央认为：陕西“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要求在组织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推翻其反动统治，在农运集中的几个

县即可开始暴动。在军事上可以利用原国民军二、三军合作反冯，但主要是要形成自己的力量。

14日 中央致函陕西省委，要求依靠工农和一般穷苦民众，团结红枪会^④等力量，对冯玉祥实行进攻政策。

19日 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共产党员刘含初被井岳秀派人杀害于中部（今黄陵）。

中旬 省委农运负责人亢维恪、党员吕佑乾、王学习、曹瑄等在华阴组织农民抗粮时被捕。

九 月

月初 李子洲回到西安。向省委常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

26日 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委员、各路特派员及各县委、共青团代表十五人出席。李子洲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并代表省委作党务工作报告。耿炳光作政治报告，检讨了省委对冯玉祥政策摇摆不定的错误。会议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组织、军事、国民党问题等九个决议案。

决议提出坚决反冯，发动群众破坏冯的军事设施，抢枪夺械；陕西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党到农村去，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创造农协政权，推翻冯的统治。加紧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党到军队中去，许旅北上与陕北李象九旅配合开展工作。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党的活动方式由半公开转为秘密。

会议正式改选了省委，常委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宣传），委员亢维恪（农运）、张金印（共青团）、刘继曾（秘书长），候补委员张含辉、潘自力。

此时，省委辖县、市委八个，区委十个、特支三十二个、支部一百五十三一个，党员一千六百八十一人。

是月 省委刊物《陕西省委通讯》创刊，出四期后停刊。

十 月

1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陕西省委划归长江局领导。十一月初，长江局撤销，陕西省委仍直属中央领导。

2日 团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及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选举张金印为书记。

8日 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向各级党组织通报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要求在其精神指导下开展工作。

12日 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率领为党掌握的石谦旅在清涧起义。起义部队一千余人转战延川、延长、宜川。在宜川遭到井岳秀部“围剿”，转移到韩城，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后在北上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中，不断遭敌袭击，在陕甘边豹子川失败。

13日 省委就陕西的政治、军事、组织及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17日 省委发出第五号通告，指出党在陕西的任务不仅是做反冯的宣传鼓动，而且要积极地做倒冯的组织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恢复农协，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税斗争，进而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使一切权力归农协。

19日 省委决定成立陕南特委，书记刘甲三。刘甲三等人去汉中后，先在城固、宁强等地建立党小组和支部。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秘书处遭到破坏，汉中党组织受到威胁，刘甲三等离开汉中。

24日 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军事第一号），决定设立军事部管辖军支工作。要求各地调强壮、勇敢的同志到军队中去，学习军事，充实力量，培训武装暴动的领导人才。

26日 根据中央要使中国有一个能反抗右派反革命的真正的左派国民党的指示，省委发出第九号通告，要求各地在国民党重新登记时，尽可能去登记，

不准自行退出，在国民党的各级大会或代表大会中，组织三至五人的党团委员会，从中灵活运用党的政策。

十一月

1日 党、团省委联合发出《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健全机构，发展壮大组织，改变党员成份，使工农占到十分之七，党员总数增加三倍。并安排整顿关中、陕南、陕北、甘肃等地工作。为指导工作方便，计划在陕南、陕北两地各设特委。

4日 省委刊物《政治通讯》创刊，主要反映陕西政治、军事、农运情况，刊登中央及省委有关文件等。

6日 中央给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口号下，引导农民暴动；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一切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立即改组各级党部，提拔贫农参加党和群众的领导工作。指出许权中旅的出路是在党的农民暴动政策之下，帮助发展土地革命，成为农民暴动的副力。

9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全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反对退却，主张继续进攻，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

16日 根据陕西反冯斗争暂时失败的情况，省委发出《政治报告》（第二次），认为西北交通和文化落后，要求党员深入民众，继续努力反冯；到军队中去，武装起来，准备总暴动。

17日 省委军委就掌握的许权中旅、李象九旅及其它军队中党组织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

26日 团省委收到团中央来信，批评团省委根据党省委七月十一日报告所确定的工作方针。强调团与党目前工作是与机会主义作斗争。团省委要破除只管青年，甚至只管学生运动和文化工作的机会主义观念，应当自动地奋勇地向

前干去。

28日 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团中央八月发出的本团目前任务决议案及《告全团同志书》、《中央复陕西省委公函》、党省委提交一次全会审议的《政治报告》（第二次），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对党省委《政治报告》中认为西北农民非常落后的观点及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看法等提出尖锐批评，决定由张金印在党的会议上陈述。

30日 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学习中央八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会议认为决议案中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及革命的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指出两个月来，省委机会主义错误减少，但因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对八七会议及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没有完全了解和传达到党员群众，使决议未能完全实行。会议重申农民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党要积极恢复农协，在农协领导下，发动农民抗捐、抗粮、抗税，作部分暴动，准备总暴动；坚持反冯斗争，打破冯玉祥在农村的封建基础，推翻其统治。

会议增选刘继曾、张金印为省委常委。并建立组织、宣传、军事、农民运动委员会，分别由李子洲、李子健、苏士杰、潘自力负责。

是月 省委派往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的刘志丹回陕，带来中央通过的号召全国普遍发动起义的文件。

十二月

4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张金印陈述了团中央对省委七月十一日报告和团省委对省委十一月十六日政治报告的意见，认为省委提出的西北农民非常落后和发动起义要经过一个准备过程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耿炳光与其进行了激烈争论。常委会表示接受团省委意见，修改政治报告和重新起草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决定召开第二次全会解决这些问题。

7日 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修改的《两月工作的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和重新起草的《K. M. T. 问题决议案》。^⑤第一个决议案承认省委“在最近的政治报告上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犹豫与动摇”，将准备

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强调和机会主义继续作斗争，努力反冯。在国民党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国民党已变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工具，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的目标。

31日 中央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命令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

一月

2日 中央向省委发出第九号公函，对陕西工作提出几项重大政策原则：1. 绝对放弃利用任何军阀的心理，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造成一个割据的局面；2. 迅速改正创造革命的国民党的观念；3. 宣传苏维埃政权，改乡村政权归农协为归农民代表会议，4. 工农运动要变和平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直接行动——抗租、抗税，杀豪绅，没收其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以达到暴动的局面；5. 党领导的军队驻地，应是农运有基础的地方，应选择得力同志投入反动军队发展士兵支部；6. 彻底改造党组织，提拔勇敢的工农分子加入指导机关。

4日 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依据中央的文件精神，认为省委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指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耿炳光省委常委、书记职务，递补潘自力、苏士杰为正式委员。

5日 省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推选潘自力为代理书记，徐梦周（组织）、刘继曾（秘书主任）、张金印（共青团）、王松年为常委。会后增加李子洲为常委。

12日 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下，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为了便于领导，将全省划分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区。关中道划为省东、渭北、省西、中区、东府等五个重要区域，每区设一暴动委

员会，指挥游击战争。二月二日，省委又发出通告，取消暴动委员会，由各级党部直接领导。

28日 省委发布第三十号通告，指出由于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党在军队中的工作需进一步加强，决定在渭南、华县、长安、三原四县设立军事部，各直辖区委有必要时亦可设立军事部。

二 月

12日 耿炳光致书省委常委会，对省委第二十九号通告及党在陕西的机会主义错误，党、团关系和西北农民落后与否，特别是对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申述了自己的观点。批评省委对暴动操之过急，认为暴动必须有相应的环境、时机和准备。现在应集中党的力量于农运中心，实现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

13日 省委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传达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文件和中央第九号公函精神，制定了《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认为“陕西客观上亦到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陕西党目前工作的总方向是，发动群众开展从经济到政治的斗争，使工农群众自发的暴动尽快高涨，由局部暴动汇合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局面，以至建立全省的苏维埃政权。必须自下而上地改组各级指导机关，提拔勇敢工农分子。宣传工作要打破灰色面孔，在群众中露出党的政治面貌。

会议同时讨论了耿炳光致省委常委的信，认为其意见大部分是对的。决定派耿炳光为陕南特委书记，耿认为难以完成年关组织暴动的任务而未就职，从此脱离党的关系。

18日 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在组织上自下而上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吸收工农积极分子，洗刷腐化投机分子。在政策上，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和侧重利用原国民军联军一、二军反冯的错误观念。审查批准了第五次全会通过的《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补选张振海为常委，选举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为陕西出席党的六大代表。

20日 省委发出三十五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陕西党目前工作

方针，并于四月十五日前完成各市、县、区委机关的改选，改选后工农成分应占二分之一，至少要达三分之一。

29日 在渭南县委领导下，数百农民和学生将闯入渭南宣化小学的反动分子刘铭初、薛明璋打死。事发后，渭南许多学校被查封，党、团员及群众遭逮捕。三月十三日，省委发出三十九号通告，要求各级党部扩大宣化事件，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开发农民游击战争，由陕西各县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西民众的大暴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

2月下旬 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前往上海出席党的六大会议。因会议延期，张金印留团中央工作。

是月 东府特委在澄城建立，书记张国藩。七月，澄城起义后，特委自行消失。

三 月

16日 潘自力等向中央作《陕西党、团组织情况的报告》。称省委下辖一个市委，一个特委，十一个县委，近三千名党员。并向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作了汇报。

18日 中央作出《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的反动统治已在崩溃之中，因此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要求省委一方面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使之成为真正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党。决议案由潘自力、王松年带回。

△ 岐山县委召开纪念巴黎公社大会，动员群众三千多人参加，并举行游行示威，散发“打倒新旧军阀”等传单，遭敌镇压，县委被破坏，农运组织解散。

20日 中央致函许权中，指出许旅寄生在李虎臣下面不是出路，要随时准备脱离。目前主要工作是肃清内部，发展壮大组织，扩充军队；加紧党的训练，明确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21日 省委秘书处、交通处遭敌破坏，不少文件落于敌手，驻机关的方鉴

昭、徐九龄、李嘉谟、任醴、校明济、李维俊以及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德安等被捕。六月十七日，方鉴昭等被杀害。

22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为陕东暴动区，成立陕东特派员委员会指导工作，准备暴动。

四 月

1日 陕东特委在华县成书记刘继曾。

中旬 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苗家坪（今属子洲县）召开，成立陕北特委，书记杜衡。

30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发布第四十四号通告，号召各级党组织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年底，省委收到通告，开始纠正“左”倾盲动主义。

是月 根据省委指示，共产党员王泰吉率国民党第十七军第三师甄守珊部教导团一营五六十人在麟游举行起义，后在民团围攻下失败。

五 月

1日 在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华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举行暴动，相继建立了区、村苏维埃政权和陕东赤卫队。十日，许权中旅一部由潼关开赴华县瓜坡宣布起义，参加农民暴动。十六日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景桂（刘志丹），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起义军民杀豪绅、斗地主，很快形成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六月下旬，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失败。唐澍等英勇牺牲。

渭华起义前后，省委指示关中各地相继发动农民起义。三原县委在四月二十四日发动近万名群众手持权把、扫帚，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并焚烧农具进行示威，

迫使国民党县政府答应免去全年粮款。五月三日，三原县委又发动农民武

装围城，由于敌人防守严密，起义队伍内部叛乱，围城失败。四月二十六日，泾阳区委发动农民“交农”围城，要求豁免粮、款。五月一日，党、团礼泉县委动员三万多农民包围县城，高呼“免粮免款度春荒”、“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连续围城两天。

6日 旬邑县党组织领导起义农民以抗粮交农为口号，攻克县城，杀了国民党县政府县长。十二日，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主席许才升。三十一日，敌人围攻县城，内奸乘机叛乱，起义领导人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等人被杀害，起义失败。

9日 共产党员赵新三等领导淳化农民举行起义，占领了县城。六月十九日，建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赵新三。六月三十日，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失败，赵新三、田望秀等领导人牺牲。

16日 李艮等人在咸阳马家寨举行暴动，杀死豪绅地主，烧了契约、帐簿。

18日 在党的武装暴动政策影响下，永寿农民自发地组织五千多人进行抗粮围城斗争。

26日 在东府特委领导下，发动了以澄城为主，并有大荔、朝邑、蒲城等县农民参加的驱逐韦庄军阀赵桂堂的斗争。经过持续月余的武装围攻，终将赵桂堂赶走。

六 月

13日 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全陕总暴动决议案》，要求各地继续组织暴动。会议改组了省委，常委潘自力（书记）、李子洲（组织）、蒲克敏（宣传）、杜衡（职工委员会）、曹趾仁（共青团）。

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是月 团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举曹趾仁为书记。

八月

是月 为适应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省委决定合并渭南、五一两县委为渭南县委^⑥，书记王芾南（王林）。

8日 中央给省委发来指示信，指出“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纠正。”指示省委以六大决议为准绳，克服只是幻想暴动，一味盲目的错误。收到中央指示后，省委即派蒲克敏去中央汇报工作，领取六大文件。

13日 省委刊物《西北红旗》创刊。

十一月

28日 在长安县委开会的潘自力及县委负责人张新发（张鼎安）、李艮（愚痴）、杜松寿等被捕。潘自力被捕后，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

十二月

月底 蒲克敏返陕，带回中央六大会议文件。

一九二二年

一月

24日 省委交通处遭破坏，十名工作人员被捕。

下旬 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美原小学召开。根据六大精神，会议总结了“左”倾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的失误。改选了省委，书记曹趾仁，委员李子洲（组织）、蒲克敏（宣传）、徐梦周（秘书长）、王芾南、张国藩、薛永寿、马云藩。

会后，团省委在蒲城荆姚小学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选举马云藩为书记。

二 月

2至6日 马云藩、曹趾仁、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徐梦周、李大章、程士诚、刘映胜（杨声）、王又章等党、团省委负责人等十三人被捕。这次大破坏后，关中地区党员锐减到二百多人。

三 月

1日 党、团省委成员张国藩、王芾南、薛永寿以“现存之省委”名义在渭南固市召开蒲城、渭南、华县、富平、长安等地党、团组织负责人紧急联席会议，组成临时省委，负责人王芾南，委员张国藩、薛永寿、张蔚森、徐振化、李凌云等。临时团省委书记薛永寿。

3日 临时省委就省委遭破坏和成立临时省委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称目前唯一工作是加紧职工运动，积极培训干部。并请中央派干部来陕，成立正式省委。

23日 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渭南召开，对省委成员重新调整，常委杜衡（书记）、徐振化、章子文，候补常委王芾南、张蔚森。并确定杜衡、王芾南、薛永寿三人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杜衡等离陕期间，由徐振化在西安组织临时省委机关，联系各地的组织和散失的党员。

四 月

月初 临时省委派陈云樵（陈冠英）为西路巡视员，恢复整顿组织，开展灾民武装斗争。同时，陈云樵建立了中共周至特支，并任书记。

16日 中央复函临时省委，对在省委遭破坏后，很快建立临时省委表示满意。来函指示临时省委加强反军阀斗争，以恢复发展陕西工作。要求：1. 加强干部的政治训练；2. 加紧支部工作；3. 开展日常斗争，不要提过高的口号；4. 尽量做到党员职业化；5. 发展新的知识分子，整顿恢复原有组织。

五 月

4日 杜衡等三人在上海向中央作出书面报告，承认省委在二次扩大会议后犯了“左”倾盲动和军事冒险的错误，并就省委本身工作及各地组织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六月二十二日，根据杜衡等人的报告，中央作出《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总路线是：尽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

六 月

18日 李子洲在狱中凛然不屈，折磨致死。

七 月

中旬 杜衡等回陕后，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会在渭南辛市召开。根据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今后工作主要是恢复组织，抓紧士兵和救济难民工作。调整了省委成员，常委杜衡（书记）、王芾南（组织）、张蔚森（宣传），候补常委徐振化、刘志丹。会后，临时省委派人分赴陕北、陕南、渭南等地整顿、恢复党组织。十九日，临时省委就第三次全会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八 月

23日 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调整省委成员，增加薛永寿为常委；吉国桢为正式委员，担任陕北特委书记；张蔚森改任候补常委，负责西安市工作；刘志丹去陕北开展兵运工作，不再任候补常委。会议还决定派从中央回来的陈征到汉中工作。陈到汉中后与杨杏生、田中瑞于十月成立了陕南党小组。

九 月

20日 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陕西灾荒严重，冯玉祥部队到处搜刮民财，

群众斗争有所发展，但党的力量薄弱，悲观情绪浓厚，同时也存在盲动情绪。八月以来，党的工作主要是恢复、整顿组织。

十 月

2日 中央给临时省委发来指示信，指出反军阀战争是陕西目前在政治上最主要的任务，要坚决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

十一月

是月 周至、户县一带灾民在农民周七的领导下，攻克周至县城，接着攻打户县县城。省委闻讯，急派西路巡视员陈云樵和李特生前往领导。陈、李奔赴途中，灾民暴动已被镇压。陈、李又联络周至、户县、兴平等地农民约二千人，二百多支枪，再次攻打周至未克，在转移眉县途中遭敌追击而失败。

一九三〇年

二 月

26日 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指出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各地党组织要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向着中心城市发展，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三 月

月初 临时省委决定撤销渭南县委，成立四个特支，直辖省委以加强领导。二十五日，临时省委指示各特支立即改正过去狭隘的秘密工作路线，吸收大量的贫、雇农和手工业者入党，建立党的中心支部和中心工作。

四 月

月初 临时省委机关由渭南迁到西安。

4日至15日 临时省委向西路、陕北、各军支等党组织传达中央七十号通告精神。要求各级组织按照七十号通告精神部署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路特支，指导西路各特支、军支工作。

16日 临时省委发布第十号通告，要求各地通过五月的各种纪念活动，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提高群众斗争的觉悟和勇气。

30日 临时省委向中央汇报陕西的灾情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指出临时省委和各级组织比较健全，能正常工作，各支部能按时开会、学习，讨论党的策略。大部分能执行巡视条例，注意宣传党的政纲，土地政纲，并根据党的总政治口号，结合实际提出相应口号。

五 月

中旬 蒋、冯、阎大战爆发，冯玉祥军队大部分开出潼关，对陕西的统治相对削弱。

25日 临时省委指示陕北特委，要求深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发展与巩固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

下旬 根据中央七十号通告精神，临时省委召开渭北工作讨论会，决定以三原北区为中心，恢复农民协会，组织灾民自救队，以广大农民、灾民为基础，开展游击战争。

六 月

9—11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面前，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是目前的战略总方针。

上旬 临时省委西路巡视员陈云樵、三原特支书记黄子文等在三原、富平

分别召开渭北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联络地方武装于六月中旬在武字区成立灾民自救队。因内部成分不纯，灾民自救队仅活动二十余天，便遭失败。后省委派陈云樵到上海中央，黄子文到北方局汇报工作。

是月 临时省委制定《组织工作三个月计划》，强调吸收工农群众入党和进入党的领导机关，促进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

△ 临时省委候补常委张蔚森、秘书闵继骞被敌逮捕入狱。张蔚森英勇无畏于七月六日被敌杀害。

七 月

1日 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讨论通过了政治、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运、组织、宣传及共青团等七项决议等。提出陕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总的策略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创造并扩大红军。以西安、榆林、三原为中心，延安、绥德、潼关为次，建立全省的中心工作。

会议决定改临时省委为正式省委，常委杜衡（书记）、王芾南、吉国桢。稍后，团临时省委在蓝田草坪学校召开扩大会议，改临时团省委为正式省委，书记薛永寿。

9日 省委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和布置了各地工作，决定由吉国桢、张国藩组成西安市委；梁益堂为陕南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恢复陕南组织；会议着重讨论了陕北工作，通过了《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派赵伯平为陕北特委书记。

25日 省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陕西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比全国成熟，党的任务是在全党政治路线和任务之下，努力地加强主观力量，准备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的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目前陕西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和取消观念。反右倾的政治斗争与加强政治指导和中心工作的建立，是省委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针。

八 月

1日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等文件，由中央交通黄平带到陕西。黄平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布置汉南、渭华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的口头指示。

5日 省委召开第三次常委会。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会议认为省委五次扩大会议对政治形势估量仍然不足，犯有右倾错误，因此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应予推翻，决定由杜衡另行起草新的决议；同时发一告同志书，指出五次扩大会议的严重错误。

23日 中央发布《九七纪念大示威通告》，指出九七大示威是在武装暴动前夜，动员千百万群众与统治者进行阶级决战的预演，全党应以全力来组织领导这一运动。

下旬 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在秋收斗争路线之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混战。组织各地政治示威，直到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士兵暴动等。每个支部和党、团员都要行动起来，由大小的政治、经济斗争做起，一直汇合到九七政治示威。

根据省委通告精神，西安市委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了西安监狱小职员的闹薪斗争，广仁医院罢工等斗争，后因广仁医院罢工失败，九七政治示威未实现。

九 月

14日 省委通过杜衡起草的《陕省委政治任务决议草案》并报中央。决议认为“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党的战略总方针是坚决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创建与发展红军，汇合各种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在陕北、西安、渭南、华县、蓝田、陕南组织武装暴动以配合武汉的夺取，特别要以陕北为首先胜利之区，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

24日 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

案，犯了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提出党目前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组织革命战争，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28日 根据省委决定，蓝田特支发动蓝田南区农民和红枪会举行暴动，消灭了驻军刘汉三。

十 月

月初 陕北特委在绥德召开扩大会议，北方局派高维翰（李杰夫）传达六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会议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书记赵伯平，军委书记孔祥祯，决定书写标语、传单，发动神木高志清部兵变。为在中心城市指挥暴动，行动委员会迁到榆林。会议一结束，刘澜涛、张德生即遭逮捕（经营救获释）。冬季，高志清部手枪连也因匆忙起义而失败。

8日 团省委书记薛永寿被捕。十日，党、团省委主要领导人吉国桢、贾拓夫、王作宾（王曙）、马志敬等二十余人被捕，西安市和各地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17日 北方局来函通知，省委归北方局领导。并指出，陕西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政治与经济斗争；领导农民开展反捐税、抗租、抗债斗争，开辟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兵变，领导群众为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而斗争，指示陕西党积极吸收工人中勇敢分子入党。通知杜衡、王芾南、陈云樵（后由杨珊去）到北方局参加扩大会议。

18日 根据中央决定北方局通知陕北特委归其领导，特委与陕西省委发生横的关系。

29日 中央给省委发出指示信，对九月十四日《陕省委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提出严厉批评，要求根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纠正认识上的“左”倾错误。陕西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城市和乡村中自发的群众斗争，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

十一月

19日 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利用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组织集会游行示威，扩大纪念广州暴动与反军阀运动周的宣传鼓动。

是月 杜衡、王芾南、杨珊前往天津，出席北方局扩大会议。在杜衡等离陕期间，由吉国桢、张文华、张国藩组成省委临时常委会负责工作。

△ 中共陕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南郑召开，重建陕南特委，书记梁益堂。

△ 蒋、冯、阎大战在十月结束后冯玉祥军队退出陕西，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率部入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先后被捕在狱的党、团省委负责人潘自力、刘继曾、蒲克敏、徐梦周、吉国桢、贾拓夫等三十余人在混乱中越狱。

十二月

21日 河北省委发出通告，宣布北方局改为河北省委，辖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组织，陕西省委改为陕西特委。陕北特委划归河北省委及中央驻北方代表共同领导。

下旬 北方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北方局派高维翰同杜衡回陕西工作。高、杜回陕后立即召开省委第三次全会，传达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及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吉国桢汇报了临时常委会一月来的工作。会议通过年关斗争计划，并调整了省委成员分工：常委杜衡（书记兼党报编辑）、高维翰（军委书记）、吉国桢（组织）。

一九三一年

一 月

月初 团省委恢复，书记刘映胜。

7日 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王明在中央取得领导地位，指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

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主义还“左”的错误观点。

17日 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等召集会议，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要求撤换国际代表。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责全总党团会议领导人罗章龙等企图改变国际路线，分裂中央、分裂党，号召全党加以坚决反对。三十一日，在罗章龙等操纵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全总党团、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等到处散发文件，四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下旬 杨珊由天津回到陕西，带回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紧急通知》（即中央九十六号通告）、《反立三路线讨论大纲》、《告全体同志书》。

29日 省委在渭南辛市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前，“非常委员会”派人到陕西游说，省委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决议案；陕西工作决议案；建议国际远东局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新中央的决议案，选举高维翰为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的代表。

在讨论上述决议案中，特别是对陕西革命形势的认识时发生争论。杜衡、高维翰认为陕西的革命形势是高涨的。张文华、李艮认为是低落的或者是活跃的。同时反对省委参加河北省委筹备处，因张文华坚持己见，被取消委员职务，由黄平递补。派吉国桢到中央汇报，调张国藩代理常委。

二 月

13日 省委向中央报告四次全会情况，同时要求中央直接领导陕西。

15日 省委在十二日收到中央机关刊物《实话》五、六、七期后，始看到其中刊载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遂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认为“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产生的新中央政治局是正确的”，省委四次全会建议远东局产生新中央的决议是错误的，决定做出补充决议，接受四中全会决议。

常委会的补充决议尚未发出，罗章龙等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与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又送来文件且派人游说。省委看到这些文件后，又决定反对四

中全会，同意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

三 月

6日 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陕西革命形势时，再次发生争论，赞成李良意见的居多数，杜衡认为李良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给以打击。

为解决省委在中央和罗章龙领导的“非常委员会”之间的依从问题，会议决定派代表同双方接触以后再作决定。并准备两月内召开全省代表大会，解决政治、组织上的问题，在问题未解决前，省委四次全会决议仍然有效。

中旬 互济会代表刘公亭来陕，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全部文件。省委遂又认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召开的，成立的中央是正确的，决定召开省委第六次全会。

25日 李良、张国藩、刘映胜写了《目前陕西工作决议案》，坚决反对继续立三路线的省委四次全会产生的《陕西工作决议案》。

26日 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召开，认为四中全会及产生的政治局领导是正确的，领导全党反对立三路线，同时打击了分裂党的右派。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非法组织之间摇摆，犯了严重的错误。号召全省党员行动起来，深入反立三路线和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经过激烈争论，修改通过了省委四次全会起草的《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决议案》，严厉斥责李良等人的右倾观点。

会议撤销了杜衡的书记职务和张国藩代理常委职务。高维翰任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杜衡任常委兼组织、职运、党报编辑。焦维炽任秘书长负责西安市委工作。

四 月

20日 省委常委吉国桢到中央汇报工作，写了《陕西的政治经济情况与群众斗争形势，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

五 月

9日 河北省委报告中央，同意陕西省委归中央领导，陕北特委仍由河北省委领导。

13日 省委重新审查了机关报《西北真理》、《真理周报》的内容，决定加强党报委员会的工作，建立通讯、发行网络。

30日 省委发出《五卅纪念告工友书》，号召工友为争取自身利益举行罢工。

七 月

暑期 党、团中央派陈浅伦来陕西，担任团西安市委书记，不久省委决定改团省委为团西安市委，代行团省委职权。

是月 中央巡视员刘少文来陕，带来中央五月二十四日给省委指示信。中央来信对省委在四中全会和罗章龙右派组织之间犹豫动摇进行了批评，否定了省委四次全会决议。并指出张国藩、李良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这种思想的斗争是陕西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党的工作重心不是空谈革命高涨的程度，而是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党的基础。

八 月

上旬 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五月二十四日信和刘少文的报告，作出《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与中心工作》决议案，指出陕西革命运动发展形势是高涨的，但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薄弱，目前中心工作是，必须抓住日益严重的灾荒，组织农民斗争迅速发展，开发游击战争。重申同李良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会议改组了省委，书记兼组织杜衡，常委、军委书记高维翰，常委兼巡视员刘万海。

九 月

1日 省委发出《秋收斗争决议案》，要求渭北和西路灾荒严重区域的党组

织，积极领导农民、灾民开展以减租、减息、抗债为主要内容的秋收斗争。

18日 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几个月内，日军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

20日 省委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

22日 中央作出《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冲破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向陕西等八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

25日 省委发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反帝运动的组织，举行罢工、罢课、罢操、示威游行，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27日 按照省委二十日决议，西安六七万人召开反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并举行了示威游行。二十九日潼关三万余人召开仇日救国运动大会，通过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惩办外交当局、组织救国铁血团等议案。

十 月

7日 陕西学生反日救国会派代表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给学生配发武器，进行军事训练，以便对日作战。

10日 省委发出《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谴责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17日 西安教育界两万多人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当局，不得干涉民众运动。并散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周刊、《群众》周报、《告同学书》、《告民众书》等宣传品。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22日 陕西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召开联席会议，将反日救国会改为抗日救国会，并选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会议。

30日 省委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州告陕西民众书》，再次号召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

31日 省委发出《关于蒲城盐车工人斗争决议》，要求蒲城、富平党组织继续在工人中进行斗争的宣传鼓动，在盐车工人（运盐工人）中组织斗争委员会，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工会组织。加强盐滩工人的工作，使盐滩工人和盐车工人的斗争相配合。

是月 谢子长到南梁向九月初到陕北的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的指示。成立由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组成的新的队委。

十一月

4日 省委对蒲城、富平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继续领导以减轻盐税为主要目标的盐车工人斗争，同时发动农民的抗捐、抗税和反豪绅斗争。

15日 省委作出《关于反日救国会工作大纲》，检讨在九一八事变后，省委对群众高涨的抗日怒潮估计不足，对抗日救国会没有积极领导，企图用反帝大同盟号召群众，指出抗日救国会反帝运动中各阶层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组织，要在其中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争取、教育群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

20日 中央来信指示省委，抓紧目前群众斗争高涨的情绪，把群众的经济斗争与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加紧农民运动，使之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轨道。

是月 因常委刘万海是农民难于胜任工作，仍回富平，调李良任常委兼巡视员。

十二月

2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根据九月二十二日中央决议精神所拟定的省委决议草案，认为三原、富平、蒲城、西路几个区域农民武装斗争和陕西士兵

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讨论中发生分歧，高维翰认为这种估计是夸大的立三路线，应该是正在酝酿成熟，杜衡则坚持决议草案的估计。四日，决议草案仍按原来对形势的估计通过，但高维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写了书面报告。五日，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常委会的分歧，请求派人来陕巡视，解决分歧。

7日 省委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加紧扩大苏维埃运动，领导反帝尤其是反日运动。集中力量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西路等地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派得力干部到陕甘边境游击队中去。游击队要向三水（今旬邑）、淳化发展，和渭北农民斗争汇合，使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同时加强革命兵变工作，使之与西路的农民和灾民斗争配合。

10日 西安各校学生五千余人集会，声援北大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政府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反动军警，切实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十八日至二十三日，西安各校学生两次集会，捣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公开呼喊“打倒卖国政府”等口号。

19日 省委发出捣毁国民党省党部及非基运动^⑦宣言，号召群众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捣毁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封闭教会学校，驱逐教士出境，没收教会财产。

一九三二年

一月

8日 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和阎红彦、杨重远领导的晋西游击队，以及师储杰、杨琪等领导的商贩武装在甘肃正宁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

20日 省委给陕甘边境游击队发出指示信，要求部队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区域以三水（今旬邑）、淳化、富平、三原、长武为主要方向，和这一带的农民斗争相结合。发动群众，扩大苏维埃影响。加强自身教育，健全党组织，改变游击队成分，树立铁的纪律。

不久，省委派荣子卿到陕甘边境游击队，传达省委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同盟军遂在新堡、三嘉原整顿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

二 月

12日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队、骑兵队各一个，共四百多人，同时建立了党的队委会，书记高维翰。

15日 省委向中央报告陕甘游击队的情况、游击队活动地区——三水、淳化、正宁一带的群众条件、政治影响、地理环境和党的领导情况，认为该地区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28日 省委发出《为拥护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告工农及一切劳苦民众书》。

是月 团西安市委改为团省委，书记刘映胜。

△ 省委任命陈浅伦为陕南特委书记。

三 月

月初 省委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驻地巡视。根据杜衡的报告，省委于六日、七日分别作出《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要求游击队加紧两条路线斗争，执行省委指示，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游击，积极开发游击区域，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苏区。

8日 省委发布《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规定游击战争的任务是，扩大红军和苏维埃的影响，摧毁豪绅在乡村的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部分苏维埃政权。

20日 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并指示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以配合武装农民和城市中的革命，夺取陕西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建立政权，然后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截断渭河交通。同时组织凤翔

一带革命兵变，使西路灾民与渭北各县的斗争相呼应，开辟以三原为中心的大片苏维埃区域。二十一日，省委将上述决定报告中央，并申请红军番号。

下旬 杜衡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改编为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队长。五月十日，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六月底，陕甘游击队在宁县梁掌召开会议，推选阎红彦任总指挥。

四 月

2日 在省军委成员刘林圃领导下，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杰等发动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三个连在甘肃两当起义。在北上途中部队被敌打散。吕剑人、许天杰到西安找省委联系时被捕。

20日 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由省委一名常委任军政委。要求在开展各地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及陕甘边苏区。并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将游击队活动的正宁、旬邑、耀县等地发展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泾、渭扩大。

25日 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召开扩大纪念周会，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委员戴季陶向西安市各中学学生讲演，在省、市委安排下，学生要求戴季陶解释中央政府对日不抵抗等政策，遭到拒绝。义愤的学生向主席台投石子，轰走戴季陶，烧了戴的汽车。会后学生抗日总会决定次日游行。二十六日晨，军警包围了各中学校门，在学生冲出校门时，遭到军警弹压，数十人受伤，五十多人被捕。省委即向各级党组织、学生、士兵发出通报，号召声援西安学生。

27日 省委向中央报告工作，提出目前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及部分革命兵变，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以旬邑、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苏维埃临时根据地。

五 月

5日 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发动警备第三旅起义。因敌人已有准备，起义联络失误而失败。月底，谢子长与该旅地下党负责人张东皎集合起义失散士兵二百多人在靖远水泉堡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七月，游击队与“围剿”之敌多次激战，终因力量悬殊而分散隐蔽。

是月 安康特委成立，书记李茂堂。十二月上旬李茂堂被捕。翌年一月，省委撤销安康特委，党组织归陕南特委领导。

六 月

1日 根据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10日 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六省会议，杜衡代表陕西参加。二十六日，会议作出《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提出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新苏区”。

18日 省委召开常委会议，通过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决议草案。决议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急剧高涨，省委领导跟不上形势，工作中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陕西全党，改造省委。并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工作。

七 月

9日 共产党员杨林、高鹏飞等在甘肃西华池领导警备第三旅特务营一百七十多人举行起义。起义部队胜利转移到盘克原，加入陕甘游击队。

23日 省委派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不顾敌人的“围剿”和阎红彦等同志的反对，限定部队在二十天内完成在甘肃正宁寺村原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任务。当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时，李艮又命令死守寺村原，导致三嘉原、王浪坡、五顷原三战皆败。省委调回李艮免去常委职务，八月三十日复

派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八 月

1日 中央给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执行中央北方会议决议，创造陕甘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成立红军一团，并派孟坚（曹长青、孟用潜）任省委书记，常委李艮、王松年，杜衡负责陕甘游击队，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同时指示省委重视甘肃党的工作，负责建立甘肃省委。组织领导兵变，配合农民斗争，建立陕甘边苏区。

6日 省委巡视员焦维炽（赵仪三）发动蒲城晋王、永丰两地区民团举行起义，因没有群众斗争配合而失败，焦维炽英勇牺牲。

16日 省委作出决议，批评高维翰在陕甘游击队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上山逃避主义，决定撤销其工作。

25日 孟坚到陕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八一指示，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议要求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富农路线，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编成红军一个团。

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领导党的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26日 省委作出《关于九一八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组织抓住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东三省的事实，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日运动，扩大各界反日救国会，成立反帝大同盟。

九 月

5日 省委刊物《斗争与学习》创刊。

8日 省委发出《九一八周年宣言》，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回答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

12日 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击毙富平、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

耀县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四百余人。

13日 省委向蒲城、澄城县委发出指示信，批评两县委以少数党员弄枪代替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指示抓紧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开展分粮、抗捐、抗债斗争，开发游击战争，进行苏维埃运动，为创建蒲城、澄城新苏区而斗争。

17日 省委向中央报告陕甘边反“围剿”计划。

22日 渭北革命委员会（即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在三原武字区成立。

十 月

4日 省委给三原县委发出指示，批评三原县委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示改组县委，创建原、富、耀新苏区，武装农民，扩大游击运动。

6日 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创建渭北新苏区是渭北党组织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决定建立渭北特委。不日特委成立，书记高维翰。

7日 省委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运动的决议》，要求在陕甘边和原、富、耀游击区域动员群众于十一月七日举行示威游行。十一月六、七、八日，渭北苏区举行了纪念活动和示威游行，暴露了群众力量，九日遭敌人大规模清剿，武字区被占领。

△ 中央给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征收党员活动。从十一月一日起到广州起义纪念日止，大规模地征收工人、雇农、贫农入党，三倍地扩大党组织。

25日 省委作出《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要求把兵变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建新苏区。为统一指挥陇东、陇南国民党部队内的党组织，决定成立陇东军特委，书记刘杰三。

下旬 在陇东军特委领导下，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干部补习队在接运蒋介石给邓宝珊的一批枪支时，在甘肃蒿店举行兵变，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队长李华锋，政委李艮，因计划不周遭到民团袭击而失败。

十一月

8日 红四方面军挺进陕西，二十七日，进占长安子午镇，直逼西安。

21日 省委发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宣言，号召全省工厂、学校、兵营全体动员，以实际行动迎接红四方面军。

下旬 省委特派员贾拓夫巡视渭北，整顿遭敌清剿后的渭北党组织，撤销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职务。不久，省委任命金理科为特委书记。十二月中旬，省委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刘林生。

是月 省委派吴鸿宾、王建三到兰州，向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等传达省委决定建立甘宁青特委的指示。十二月初，甘宁青特委成立，书记吴鸿宾。任务是在甘、宁、青三省建立和发展组织，进一步开展兵运，建立革命武装。

△ 因常委王松年回家，省委常委调整为：孟坚（书，记）、贾拓夫（宣传）、刘映胜（组织）。

十二月

1日 省委向中央报告，在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进攻下，计划在西安组织总同盟罢工，在农村加强对抗捐、抗税的领导，开展游击运动。要求三原欢迎红二十六军回渭北，积极扩大红军，立即编成一个团，一月内扩大为一师。派高维翰去东路巡视，开展潼关、华阴工作，任命孟芳洲为特派员（后任陕南特委书记）和杨珊去陕南，领导陕南党的工作。

18日 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耀县衣食村。二十二日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传达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二团的决定。二十四日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授旗仪式，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

20日 省委发出《陕西省委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新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拥护红军、反对“围剿”，创造西北新苏区的紧急任务。对本月红四方面军入陕后的形势估计和工作布置不当作了自我批评。二十三日，省委又向中央写信作了检讨。

26日 红二十六军攻打宜君焦家坪（今属铜川郊区）获胜，歼、俘敌民团六十余人。

是月 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帮助下，改编了几股民团和“神团”，在西乡成立了川陕边区游击队。

一九三三年

一 月

月初 陕南特委发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

3日 省委向三原中心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健全革委会组织，实行土地革命，发展武装组织，肃清反动势力残余，扩大游击运动，为开创渭北新苏区而斗争。

4日 省委指示杜衡扩大红军，巩固红二十六军，于一月十日起开展一个征调群众到红二十六军的十日运动周；积极吸收大批战士到党内来，建立支部，巩固团委领导；开展边区群众运动，特别是加强渭北、西路、陇东的工作。

△ 省委向华阴县委和高维翰发出指示信，批评高在华阴兵工厂工作中没有坚定地组织工人罢工，开展不给国民党造一枪一弹的政治鼓动，没有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在农村没有领导开展日常的抗粮、抗款斗争和开发游击战争。

15日 红二十六军进攻庙湾夏老么（夏玉山）民团受挫，骑兵连长曹世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负伤。

中旬 中共陕南特委将川陕边区游击队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游击大队。

二 月

3日 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红二十六军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应采取游击战术。在保存红二十六军番号的情况下，将部队编成几个小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

杜衡召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表示反对省委来信。认为这是取消

红二十六军，违背北方会议路线。会后杜衡以部队代表身份回到省委，提出反对意见，“提议”改组省委。三月省委承认二月三日信犯了取消主义错误，改组为书记袁岳栋，组织杜衡，宣传孟坚，由王烈（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

5日 省委向陕南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特委将党所有的力量用到发展红二十九军的工作上。红二十九军本身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改造吸收的“神团”成分，克服农民的一切落后意识和群众中的封建迷信观念。

13日 根据省委和红四方面军的指示，陕南特委在西乡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游击大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良。

三 月

1日 省委向陕南特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党只有在领导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游击运动，才能创建新苏区，同时决定撤销孟芳洲特委书记职务，由杨接任。

7日 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要求成立统一指挥部，领导边区和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并强调二月三日省委指示是正确的。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妙斋，政治委员习仲勋（后由张秀山接任），参谋长史进财。

8日 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特委管辖旬邑、耀县两个县委及一些地方党组织。六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接任书记。

15日 省委向红二十六军发出指示信，指出其中心任务是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扩大红军。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平（后为黄子祥）。

四 月

1日 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领导干部四十余人在西乡马儿岩开会，突遭率部叛变的原神团头子张正万的包围，陈浅伦、李良、孟芳洲、程子文、杜润滋

等人被惨杀。

4日 省委指示三原中心县委，开展反日斗争与民族革命战争，拥护红军、苏维埃，领导群众抗粮、抗税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

5日 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耀县照金召开，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

15日 省委改组后，地方党组织对杜衡留省委有意见，同时孟坚一再要求离开陕西，省委成员再次调整为：常委袁岳栋（书记）、李世英（军委书记）。杜衡回红二十六军工作。

17日 省委发出《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工农红军，完成红二十六军编制一师人的任务。各级组织要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等纪念日，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制造小红旗，插遍西安城。

下旬 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四个团及旬邑、淳化等县民团进攻照金根据地。边区党、政、军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避实就虚，迂回敌后，粉碎敌人“围剿”。

五 月

是月 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被捕叛变。不久省委交通处与妇委机关四人被捕，其中晓岚叛变。

六 月

中旬 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召开联席会议，杜衡否定了刘志丹等人以乔山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坚持二团南下创建渭华蓝洛（即渭南、华县、蓝田、锋南）根据地。二十一日，二团南下，省委获悉后，即派人到三原阻拦未及。二十九日，红二团渡过渭河，进入蓝田、商洛山区，在敌人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杜衡在南下途中跑回省委。

七 月

上旬 西路临时特委在千阳县城内建立，书记李特生。下旬，省委遭破坏

后，特委停止活动。

21日 在省委领导下，驻耀县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刘映胜。

22日 省委派张仲良组建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副队长张仲良，政治指导员张邦英。

24日 根据省委决定，渭北游击一大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

28日 袁岳栋、贾拓夫、高岗、杜衡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时被敌盯梢，贾拓夫、高岗脱险，杜衡、袁岳栋被捕后叛变。袁、杜二人带领敌人到处捕人，关中、陕南、甘肃等地党组织多遭破坏。

△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三原心字区辘轳把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战斗失利，在红四团接应下撤到照金根据地。

八 月

月初 甘宁青特委负责人梁干丞被捕，张德生、常黎夫等转移，特委活动停止。十月十九日，梁干丞在兰州被敌杀害。

上旬 贾拓夫在西安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要求做好应付敌特破坏的准备。决定贾拓夫、刘宗沛到中央汇报；高岗到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六军工作；三原等县工作由刘映胜代表省委就近领导；并由张新发、省委组织部干事和西安市委负责人三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处理一些重大问题。十五日，贾拓夫、刘宗沛去中央汇报工作。

14日 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成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会议制定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活动的方针。并决定刘映胜回西安整顿省委组织。

省委遭破坏后，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重任。

一九三四年春，陕甘边特委由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

下旬 刘映胜回到西安，与张新发、樊德音、李冲霄等成立了临时省委，书记刘映胜，组织李冲霄，宣传张新发，青年团雷振东，秘书樊德音。由杨文谟组织西安市委。

是月 三原中心县委遭敌破坏，书记赵伯平被捕入狱。

△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肃反委员会，向渭北、陕南、临潼等地派了委员，利用叛徒破坏中共组织。

九 月

上旬 临时省委派王烈到陕南，指导汉中地下党工作。后任陕南特委书记；高维翰到陕东；王均到韩城；陈子敬到蒲城工作。

中旬 临时省委在西安开会时，被内奸王治国夫妇出卖，刘映胜、李冲霄、樊德音、雷振东等被捕（张新发在此之前已被捕）。下旬，原省委交通陈子敬和干部咎玉祥、党员胡明伦等酝酿成立党、团机关，活动约半月，被叛徒出卖，胡明伦等三人被捕。陈子敬和中央交通李自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月底 参与原省委军委工作的孙作宾联络原省委发行部长余海丰和从红二十六军回西安的崔廷儒（崔景岳）及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的胡振家等建立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组织孙作宾，宣传咎玉祥，军事胡振家，秘书长崔廷儒。为了保护党的组织，打击叛徒特务，临时省委组建了由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负责的特工队，活动于西安、临潼、周至、兴平等地区。

△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及强世清领导的陕北游击队，智取张洪镇（旬邑县治所），镇压了旬邑县民团团总。十月八日，又攻克甘肃合水县城，歼敌二百多人。

十 月

4日 红二团主要领导人刘志丹、王世泰等人自南山脱险回到照金。

下旬 团中央派韩学亚到陕西。韩到陕西后与魏光波、高维翰、王好勤、秦武山、刘庚等接上关系，积极进行恢复组织活动。

十一月

上旬 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先建立四十二师。七日，在葫芦河地区的莲花寺成立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此后红四十二师开辟了以庆阳南梁和安塞洛河川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3日 贾拓夫在上海向中央写了《关于陕西党破坏的报告》。

18日 韩学亚、魏光波、秦武山等在渭南三张背坡村开会，建立了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书记韩学亚、组织魏光波、武装秦武山。会议决定各县工作仍由原县委负责。在此期间，临时省委与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并存。

党、团共同恢复委员会成立后，派魏光波去上海同中央联系。

是月 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被捕。

十二月

月底 上海中央局特派员刘顺元到陕西工作，因在西安难以立足，即去汉中任陕南特委书记，直属上海中央局领导。

一九三四年

一 月

5日 韩学亚、孙作宾、高维翰等在西安开会，商量建立陕西党的统一组织。二十五日，韩学亚得悉特务追捕，即离开陕西前往上海，统一组织工作搁浅。

月初 王泰吉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去豫陕边搞兵运工作，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捕，后在西安遇害，刘志丹继任红四十二师师长。

二 月

16日 韩学亚到上海后，同魏光波向中央写了陕西党组织情况报告。不久，

中央又派韩学亚来陕，着其与孙作宾、刘顺元等联系。韩回陕后，慑于白色恐怖，没有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亦停止活动。

22日 在安康军特支领导下，安康区绥靖军士兵六十多人举行起义，成立红三十军第一纵队，纵队长袁作舟，政委王辛德，游击指挥王泰诚。不久，起义部队遭敌堵截而失败，王泰诚、王辛德等牺牲。

四 月

上旬 魏光波由上海回到陕西，与孙作宾建立了联系，决定成立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书记魏光波，组织严克伦，军事崔廷儒，成员有孙作宾、苗建平等人。

17日 西安中心市委发出《关于红五月工作决议》，号召全省党员抓紧有利形势进行斗争。

五 月

月底 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张德生和赵定泰在南（南郑）褒（褒城）西南区杜家湾一带组织武装袭击民团。赵定泰被捕，后被枪杀。

八 月

是月 上海中央局通知陕南特委派人到上海汇报工作，特委先后派刘季平、吴鸿宾、张德生、刘顺元、汪峰等去汇报。

十 月

是月 魏光波、严克伦先后被捕，西安中心市委遭到破坏。

一九三五年

五 月

是月 孙作宾、崔廷儒、高克林等在西安重建临时省委^⑧，书记高克林，负责西安和东路工作；组织孙作宾，负责杨虎城部队及地方民团中党的工作；秘书长崔廷儒，负责西路工作，

△ 中共渭北工委在临潼建立，书记兼组织周芝轩。工委先后领导三原、泾阳、蒲城、高陵、临潼、富平等县的十多个支部。

十 月

19日 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

十一月

9日 临时省委派谈国帆赴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十二月初，谈向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作了汇报，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十二月

7日至11日 杨虎城部警二旅四团四连、九连在进步青年何振亚、王武林等领导下，先后在柞水县营盘和长安引驾回举行起义，不久宣布成立陕南游击纵队，指挥何振亚。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部队被安康专署收编。八月十三日，按照中共西北特支指示，部队在镇安紫荆乡（今属安康）再次起义，建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何振亚。一九三七年三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编为红军十五军团警卫团。

24日 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游行的消息传到陕西，西安各校师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北平一二·九被捕学生。二十五日，各校学生又整队前往省教育厅、省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救国，保全领土完整。

是月 临时省委派崔廷儒赴陕北，向中央汇报杨虎城愿与红军互不侵犯及要求同党中央联系的意向。途中中央代表团鲁贲、贾拓夫、张德生听取报告后，崔返回西安。

一九三六年

一 月

7日 谈国帆回到西安，带来中央瓦窑堡会议的有关文件。

二 月

是月 在临时省委和渭北工委的具体安排下，中央派赴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由陕北安全抵达临潼，乘火车转赴华北。

三 月

18日 陕南特委负责人杨永昶在西安与临时省委取得联系，从此陕南特委在临时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四 月

5日 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临时省委负责人有暴露的危险。高克林、孙作宾即将工作交崔廷儒负责，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后中央决定高克林留陕北工作，孙作宾担任中央交通。

夏在杨虎城部宪兵营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华、徐彬如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归中央直接领导。西北特支成立后，除继续作兵运工作外，还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领导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兼管鲁南、苏北地下党组织。

六 月

1日 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在西安成立，主要领导人谢华、徐彬如，李木庵。九、十月间，杨明轩到西安，担任西救负责人。

八 月

是月 临时省委崔廷儒先后派吕剑人、刘庚、张涛、李特生、谈国帆等到乾县地方民团中开展工作，准备建立武装。

十 月

1日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⑨西安临时队部成立。队长胡景和，以后刘金声、樊一鸣、李连璧、于志远、朱怀琳（朱平）先后接任队长。

4日 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在西安成立，主要负责人是东北流亡陕西人士刘澜波、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

7日 张庚良、刘庚等在乾县发动铁佛寺保安中队起义，攻进永寿县城，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八日，部队转战麟游山区，成立了陕甘边抗日联军，总指挥张庚良，政委兼参谋长刘庚。后部队在与强敌战斗中不支，分散隐蔽。

十一月

7日 西安广大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阻拦，在革命公园举行悼念鲁迅大会。

15日 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中共党团书记刘南生。下旬西安师范临时党支部成立，书记董学源。

十二月

4日 蒋介石飞抵西安，在陕甘部署了三十个师的兵力，妄图在一个月内消灭红军。七日张学良、杨虎城苦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9日 在西北特支领导下，西安各界青年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当游行队伍向蒋介石住地临潼进发请愿时，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赶到十里铺向游行学生声言“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用事实答复。”游行队伍遂返回西安。

12日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举行兵谏，在临潼捕捉了蒋介石。

16日 应张、杨两将军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从延安飞抵西安，协同解决西安事变。二十五日在张、杨两将军和中共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承诺了抗日六项条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8日 赵伯平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获释出狱，不久同党组织接上关系。

25日 秦邦宪在西安二府街谢华家中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

变通电的内容和白区工作指示，同时宣布撤销西北特支，恢复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张德生，宣传部长李一氓，秘书长彭加伦，东北军工委书记朱理治，西北军工委书记欧阳钦，民运委员会书记赵伯平等，

31日 省委发出《致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封信》，号召西北各党派一致联合，停止内战，结成全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收复失地，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

一九三七年

一月

上旬 省委刊物《统一战线》创刊，刊载中央与省委的重要文件和决议，以及党的工作经验等。从第五期开始改为《党的生活》。

6日 西救会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其所承诺的六项条件发动抗战。九日，西救、市学联等抗日救国团体在革命公园举行全市农、工、商、兵示威游行，反对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反对内战，要求抗日。

11日 陕西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总务李连璧。

下旬 省委机关迁往泾阳县云阳镇，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掩护下，领导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省委机关一部分仍留在西安坚持工作。

△ 西安市委成立，书记惠子俊。三月二十五日，省委对领导的区域重新作了划分，将西安市委改为市工委。

三月

8日 省委确定各县委中心工作是：在大力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党的力量。

17日 省委向耀县工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用各界救国会的名义，统一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口号不能太左、太高，行动不能过激。在乡村、学校、机关建立党的支部，要注意秘密工作。

25日 省委给渭、华两县同志发出指示，号召扩大统一战线，建立各种救

国会组织。

△ 省委将所辖区划分为西安、渭南、蒲白、韩合、三原、北路、关中、平泾、乾县、扶风等十一个区。

31日 贾拓夫向博古汇报：省委已建立和发展了蓝田、渭南、扶风、岐山、乾县、永寿、麟游、礼泉、韩城、富平等县地方党组织。有党工作的县达二十六个，党员人数达六百人以上。省委已派巡视员去各地传达党的新政策，纠正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

△ 省委向韩城中心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将过去偏重于“开发游击”、“创造苏区”的主导思想转变到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广泛开展救亡运动，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组织抗日救国组织。

是月 渭北工委撤销。四月，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书记周芝轩。

春 省委民众指导委员会成立，主任赵伯平。

四 月

2日 省委制定学生运动提纲，规定学生运动的方针是实行青年的民主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运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团结、争取中间和后进青年，建立健全各种青年团体中党的组织。

4日 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委，将陕甘省委所辖洛川以南非苏区和关中特委划归陕西省委领导。

10日 省委作出《关于五月节工作的决议》，要求各级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向各阶层进行抗日宣传；并提出大力发展组织，增加一倍党员。

五 月

2日 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贾拓夫、赵伯平、周芝轩、胡达明、董学源代表陕西党组织参加会议。

22日—27日 省委在云阳召开陕西党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

杨尚昆等出席大会并作讲话。贾拓夫作《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提出陕西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和抗战而斗争，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工作方法上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方式，替代过去对立的、暴烈的武装斗争。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加紧党员政治教育。

六 月

是月 全省党员已达九百人以上，加上省委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员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

七 月

7日 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驻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0日 省委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独立而奋斗到底。十二日，省委发出《关于日本进攻平津与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抗战的宣传鼓动，广泛掀起抗日运动，实行全民族抗战。

（刘守琦、姚文琦、刘玉平执笔）

注：①五一县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设的县治，辖渭南渭河以北地区，治所设在固市镇，故习惯称固市县。

②于右任主陕期间仿苏联莫斯科的红场，改西安城内的旧皇城为红城，作为军民集会的中心。

③凡同一日或同一月发生的数次事件，在首次标明月日之后，其余事件之前皆用“△”表示。

④红枪会是起源于山东，渐流行于河南、陕西等地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因以红缨枪为武器故名。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政策是启发和帮助他们，使之成为革命力量，免遭军阀、土豪利用。

⑤K. M. T. 为中国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⑥一说将渭南、华县、五一三县委合并为渭南中心县委。

⑦非基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对我进行文化、经济等侵略的群众斗争。

⑧高克林回忆当时建立的是陕西党的工作委员会，他为负责人。

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

一九三六年二月所组织的青年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西安民先是它的同一系统组织。

中共中央对陕西省委 领导成员的决定*

(一九二七年五月)

陕西省委——五月十四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耿炳光任陕西省委书记；二十日又补充决定：黄平万任省委宣传部长；李子洲任组织部长；李秉乾由莫斯科回来后加入省委。

*标题为编者所加。内文（一）节录自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常委会议记录；（二）节录自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常委会议记录。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政治经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陕西报告——给中央的报告）

1. 因新右倾的徐、顾^①等累次为冯^②来电的结果，当其在潼关时，已渐渐表现右倾了！又因会师中原得到军事胜利，不免有些武力万能的观念，迄郑徐^③会议，完全以军阀见地为自己一系谋利益，而假革命的真形暴露！

2. 留在西北的冯部军队，多无战斗力，纪律不好，官长官佐为清一色的封建思想，参谋长兼留守司令石敬亭、骑兵第五师长赵守征、驻陕西总部参谋长李兴中，这些人更加反动！他们极力奉行冯底反动政策，更增加许多陷害 C. P. ^④与左派的阴谋，反动的二军目前为反对于右任底势力计，也与冯一致！

3. 冯近数日电令：（1）凡军政机关的 C. P. 须声明并退出工作。作为顾问，愿继续做国民革〔命〕者，须宣誓退出 C. P. 否则查明枪决。（2）作反三民主义宣传者枪决。（3）开秘密会议者枪决。（4）捕拿省党部执委解郑。（5）捕拿国民日报社两编辑刘天章、白超然解郑。（6）限三日内驱除西安 C. P. 全数出境。（7）捕拿教育厅长（省政府委员）杨明轩同志，与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同志解郑。冯又恐操之急过激，惹起事变，所以又令（8）史可轩部政治保卫队（于^⑤的势力）开至潼关，听候命令。（9）于所设的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校长，学生五百人）交冯部张某师长带至郑州。（10）后又来电令史可轩自带，恐史有变。以上（1）（2）（3）各条曾分令二军将领执行。

4. 在西安因邓宝珊力主缓和，不愿屠杀 C. P. 或清党，所以石、李等未能完（全）执行，但冯累〔屡〕电促其照办，所以无形中空气非常紧张。压迫 C. P. 与左派，不过是时间问题。各学校各民众团体均被检查，国民日报两编辑已被

捕解郑了！七月八日石令省党部开始清党工作，从新登记。史可轩已准备交代，没有别的出路，个人只有偷跑！中山学院军事政治班已令移往郑州去，近更向西安集中军队，节节进逼，或者不免一场涂（屠）杀！

5. 西安各地反动的二军与集中于岳部的反动知识分子，已开始清党了！冯电翻印许多反动标语已贴遍九（全）城了！三原田玉洁已封闭县党部，捕拘左派张耀云（斗）与我们的同志庞诚斋，岳维峻派人占三原渭北中学，驱逐左派教职员与学生，组织一清党运动大同盟。

6. 冯因为要消灭于右任势力，造成清一色的西北，所以利用二军为反于的刽子手，二军也因反于的冲动，对冯很表同情，更因共进与进化两派之积怨（进化接近岳，共进接近于，共进多 C.P. 分子），进化此时大事（肆）反共（实非赤），对冯告密陷害，反动的空气更加浓厚了！

7. 我们观察：因为冯要造成自己一系的私天下，所以他不但限制 C.P. 而且压迫左派（于已不能回陕）。即非冯系的右派，在陕西已不能长久立足，□于之势力消灭后，二三军必然要与冯发生冲突（军事上、财政上、民政上），那时我们还有更好的机会。不过冯若反奉，向北发展，后防空虚，那时或无力压制二军，陕西的统治者，或者还是二军，他们与蒋必然一致，恐要发生一个较长期的反动局面也未可知。

8. 冯电石敬亭代理于为省政府主席，换王、茹、李、惠[®]（于系）四委员为李虎臣、杨虎臣（城）、岳维峻，后又收回成命，省政府尚组织，不久史可轩、杨明轩离开西安，冯的准备妥当时，冯的系政府就要成立了。

9. 军队：A. 冯系：由潼关经西安到长武、渭南（河）沿岸十余县约二万人，为第二路刘汝明与第十三路张（维）玺所部，潼关左近之大荔尚未攻克。B. 于系：史可轩政治保卫队约八百人，中山军事学校约五百人，甄寿珊（属邓宝珊）部三千人，驻临潼河北各镇，史将消灭，甄不可保，杨虎城开赴河南兰封，杨虎城心欲骗冯，冯之诡计多端，未必受骗，请中央对杨部注意，他在豫还是一个有作用的军队。C. 岳系：岳的嫡系约七、八千人，驻蓝田经商县至荆紫关。此外为驻兴平一带的卫定一约一万人，驻三原等地之田玉洁约三千人，驻富平等地之冯子明约二三千人，均与岳貌合神离。李虎臣虽与岳合作，而大部军队

并未离开周至、户县。其他为陕北之井，陕南之吴均系反动，但与冯岳不见得一致，实际也无多大实力。

10. 财政：A. 实际收入，一月至六月共收入四十五万余元。B. 支出共一千一百一十五万余元，收入相差之数即以钞票补充之。C. 钞票：加子票一百五十万元，流通券九百万元，西北银行票（也不兑现）约百五十万元，军粮券四十九万元，共约一千一百万^⑦。D. 商业，近日因票价低落，市商家无形停业，尤以小商贫民感觉特殊痛苦，麦每石价洋三十元左右，盐每斤三角，煤油每斤三角，如此昂贵之价，往往还购买不出来。其生活程度增高可知矣！其原因是商家在外购货非现洋不可，而此地卖不到现洋，加之货价有限制，不得任意涨价，再加之西安周围各县票子不能通行，货物来源缺乏，即或来都到能卖现洋的地方去了！致西安人民日需品大感困难！

11. 就各方面说，陕西的紊乱到极点了！近因于不能来，人心尤为恐慌，钞票（一落再落，无法收拾，由此可证明于在民众方面的信仰）现跌至每〈人〉一元八毛，有些地方已成废纸了，只苦了小商人与贫农了！奸商大发其财，在民众方面，反动势力绝不能阻止我们发展！

12. 我们的政策：

（1）对冯在未得中央政策前，我们决定不能作反冯宣传与反冯运动，因为冯与第三国际尚未完全断绝关系，他过去与我们无大恶感，目前还不可破面；而且我们的羽毛尚未丰满，反冯也非时机；但不宣传一军好，对冯右倾也不袒护。

（2）对二军不反对，不说好，渐渐造出陕人结合自卫的口号，便〔使〕与冯冲突，对于系军队设法保存其实力！

（3）对省政府不说好，不反对，因为在西北这样的社会背景，还不能发生一个革命政府；即有也难站足，此时我们不故意惹其反感，免他们妨害我们底下层工作。

（4）对于：在民众党部方面，造成请于回陕的舆论，打电请于回陕。

（5）以暂时的退守保存实力为工作原则，停止一切斗争，充实群众的组织，并加深内部训练。

- (6) 放弃机关（外县学校机关仍不放弃）注意农村下层工作。
- (7) 红的同志退出民校机关，灰的同志仍继续保存工作岗位。
- (8) 注意秘密工作。
- (9) 党内各机〔级〕关系须密切。
- (10) 继续发展组织，但须比较以先紧严。

曾克文^⑧〔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附：

①七月十日冯令（1）陕西各级党部改组，（2）农协停止工作听候考察，（3）封查青年社。

②甘肃已组织清党委员会，省党部负〔责〕同志四人已由冯调郑州。

曾克文 七月十一日

注：①指徐谦、顾孟余。

②指冯玉祥。

③即冯玉祥与汪精卫六月十日开的郑州会议；冯玉祥与蒋介石六月十九日开的徐州会议。

④即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⑥指于右任。

⑧指王授金、茹卓亭、李子彝、惠又光。

⑦数字有误。

⑧省委代号。

耿炳光关于陕西政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

陕西省政府，已于七月十六日^①成立了。此政府根本无什么作用；在政治上日常所表现的，就是冯^②之密电；打倒 C. P. 排斥于系。今天冯来电又将于^③之第六方面军取消而让给石敬亭了！冯的代理人石敬亭每日所干的不过是为 C. P. 造谣，借反 C. P. 之名义，排斥于派而已，至于财政与军事问题，概无办法，纸币已等于废纸了，我们知道，冯之右倾很少转还的余地了！

目前，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准备对冯的破坏。可分三层：

A. 农民运动，注意打入红枪会，联络土匪与组织民团，准备作反冯的政治斗争；B. 军事工作，结合反冯的武力；C. 破坏财政，在二军所在地欢迎现洋，反对纸币，在一军所在地不反对纸币。将来时机成熟，必给冯一严重的打击，A、C 两项已着手工作，B 项可有把握。

中央对冯的政策究竟如何？请即示知，我们意见究竟对不对，也请速指正。总之，我们认为冯已大踏步地向右走了，反冯的工作应即准备，南（西）北上反冯的势力邓^④最有力，邓虽无实力，但名誉尚好，为一般人所推崇；我们应与之发生好的关系。

注：①应为七月十八日。

②即冯玉祥，下同。

③即于右任，下同。

④即邓宝珊。

*耿炳光（1899—1972）陕西澄县人，曾用鉴伯、坚白等笔名，1924年入党，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员，中共陕甘区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1928年脱党。解放后任北京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宁夏师院副院长，宁夏大学副校长等职。

李子洲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 向中央的请示*（节录）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

中原^①兄：

陕西省委此次派我来后，有下列几件事要请兄方解决。前两次带去的通信，皆未显出，且已失了时效；这次务清决定之后，详细告我！

1. 陕西省委成立于严重的局面中，对于今后的工作方针，未能开会详细的讨论，规定具体的计划。仅由常务拟定了几条简单的临时计划，已由平京^②带来。兹请兄方将陕西今后工作的大方针决定示知，以便省委本此方针，拟定详细计划。七八两月，即使不遇改变，工作亦在停顿期，这是受自然的限制，无可如何的。一到九月即〔进〕入了开始发展的时期，此时能将计划订出尚不为晚。

2. 冯反动后，因未得到兄方的指示，只得暂取退让，究竟今后对冯应采取如何态度，要兄方详为决定。

3. 陕西二三军各部对冯早即〔就〕不满，以岳为中心，密谋倒冯。惟畏其兵威，现尚未揭明。新近冯对于压迫过甚，于被迫走后，凡与于有关的人，几皆不能立足，视陕西为一己私有的宿意显然毕露，于是邓宝珊即暗中活动，结合甘肃四马及陕西与于接近的各部，进行反冯。邓在此次政变中，态度尚好，各方工作同志得从容退出，未遭意外者，邓实于有力焉。他于决定反冯态度的过程中，两次派人征求我们的意见，并要求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即〔及〕国际方面为他说话，予以实力的帮助。当时武汉方面的情形，陕西尚一概不知，省委

已含糊应允了，今后对邓究应取如何态度？请具体的决定。可否为之派人？可否正式为之写一信去？亦请决定。

注：①中央代号。

②待查。

*陕西省委成立后，即面临着冯玉祥反共“清党”的革命低潮，为了及时采取对冯的新政策，七月初省委派常委李子洲到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有关方针政策。这是李子洲在武汉写给中央的请示报告。

李子洲（1892—1929），陕西绥德人。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共，历任中共陕甘区委委员、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等。一九二九年一月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持与敌斗争，六月十日病逝狱中。

中央负责人与陕西代表子洲谈话*（节录）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I 子洲报告

（1）政治——已有书面报告。

（2）组织——（a）现在省委委员共十三人：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崔物齐（宣传）、魏野畴（军事）、亢维恪（农运）、张镜英（C. Y.）^①、张秉仁、李秉乾、杜振庭、蒲克敏、何挺杰、张国藩、陈嘉○^②。（b）现时人数共有二千一百七十九人，自我走后，尚有增加，约二千四百人。（c）我们为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约占百分之二十之谱，工人可说无有（仅几人）。（d）工作之进步，在未改组成陕甘区以前，人数仅有三二八^③，组织散漫，陕北属于北方区；西安一带属于豫陕区，当时实无训练和发展组织可言。耿炳光回陕后方正式改组为陕甘区，三月九日以前实无工作可言，改组后会议在三月十八（日）方完结。完结后即开始工作，事实上要（到）六月（第一期）有三月的计划，只有两个月的工作，当时书记为炳光，组织为子洲，宣传为野畴。但在这两月的工作中，实较从前为进步，人数增加了，工作也比较紧张了。2. 过去纪律不好，成立区委后即大加整顿，于是纪律已比从前好的多了，党员也不致完全自由动作了，纳费也比较好。3. 过去技术工作不好，各地报告不好无法统计，同志能力亦不够，上级机关亦不知谁无（能）担负何种工作，同志在各地以为可以夺取政权了，误解了夺取政权，于是工作都解体了，只与县知事等接触。区委成立后才改变过来，才慢慢认识了同志的能力来分配其工作，所以现在能担任作的有百分之八九十，不能的仅百分之一二。但因工作调动非常之快，所以工作受点影响！（c）（a）成立省委并未开代表大会，省委成立

后亦未开委员会，仅开了两次常务会（由书记、组织、宣传、农民、C.Y.五人组织）决定重建全省委组织及秘密工作，并决定人到各路（共分五路^④）为特派员指导工作，因为过去有些同志过红，到了秘密的时候工作非常困难，（b）第一期三，月工作计划，到六月即止，七月至九月无法订工作计划，因处在一混乱时期变化太快。

（3）农民运动（略）

（4）对政治上的政策因未接到中央的训令，不盲从〔目〕的决定，后各地同志要求太急，于是勉勉强强决定十三口号，主要的是暂不反冯，也不说冯好处，甚至有时也可向群众宣传冯的坏处，并提“陕人结合起来”的口号，因以〔此〕对二三军亦暂不反对，对内组织要严密，不滥发展，农民运动要特别留意，并要注意军队工作，对省政府退出，国民党中不能立足的退出，能立足的仍留在内，陕西国民党约有一万多党员，我们同志都加入，农民有些未加入。

II 对此报告的意见

（1）陕西的政策与河南有同样的错误，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此政策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完全怪地方，中央也要负责任。冯在河南将不能立足，将抓陕西来作为其根据。我们要计划根本推翻冯的统治，现在他的统治并未稳定，我们要使他不会稳定，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有一错误，即仅是利用此打彼。这种仅仅上层的工作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把戏。我们党的一切都应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在民众的基础上形成反冯势力，在民众中我们要提出代表民众真正利益的口号。如抗捐、抗税、不用流通券，在兵士中鼓动要求发洋，在商人中提出不交苛捐，如此我们可以拿到民众，在军事上利用二、三军反冯可以，但二、三军得势仍是不好，甚而更坏，所以我们要拿自己的力量来与他们合作反冯，并且在民众一点〔致〕利益的条件之下来与他们合作。我们可利用他们，但利用不是我们根本政策，同时我们要注意破坏军阀军队的工作。陕西唯一的民众基础是农民，我们要建筑在贫农身上，我们不要以为要看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行动，行动得到了一胜利即停止争斗，这是书生的想

法，实际上是一发不可收拾，农民力量要在争斗中才能巩固的。我们要抗捐抗税，取消苛捐杂税，上了三分债务不偿还，如此可以得到群众；陕南陕北则要提出没收大地主的口号，并且马上要减租；全省的整个的口号可以提出“耕者有其田”来。我们更广大的发展农民的争斗，陕西农民无多武器，能有许多枪固好，没有我们亦可有方法武装农民，如农民有组织的进军队中去便是一好方法，红枪会的群众确是农民，我们的工作要打入这些群众中去，抓住群众，不要单单做首领的运动，土匪亦多半是穷苦农民，他是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我们不要视土匪为敌人，也不可取利用方式。我们对他们取弟兄的态度，则他们一定能为我们的力量，这是过去广东湖南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土匪的劫富济贫的口号，是带有土地革命性质的，地痞流氓是很勇敢的农民，我们可以吸收到农协中来，因他们作破坏工作很好，不然他可被人家利用。

(2) 在组织方面要：(A) 根据此次紧急会议决议回去改组，将告同志书交到下级党部去讨论，取消反对新政策的分子，在渭河农民同志多的地方应加入至少二农民同志到领导机关；(B) 我们的力量不必一定要扩大到全省，务必要集中到几个重要的区域；(C) 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分，即要增加农民的数量；(D) 消极的分子要洗刷出去，吸收在争斗中勇敢的分子入党，或加入领导机关；(E) 以后的统计注意将同志能作何种工作、能力如何等的数字列出，重要的同志还要写出姓名。

(3) 城市手工业工人也要作改良待遇等工作；

(4) 农运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反对土劣贪污，抗租、抗捐、抗税；

(5) 国民党工作要做，但不要只注意上级机关，更要留意的抓住群众，并要包办国民党，并抓住下级党部的群众，使他们也加入农民暴动的争斗；

(6) 要注意红枪会和土匪的工作，尤其要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地去拿，失败可以上山。

(7) 可以利用二、三军反冯，但要注意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政策，主要的是要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

(8) 河南省委可以介绍去接洽交通事宜。

注：①共青团之英文缩写。

②即陈嘉惠。

③据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陕甘区委成立时，党员有三百八十八人。

④据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文件，分全省为六路，即东路、西路、南路、北路、东北路、陕北路。

*据杜衡《陕西共党沿革》称，中央负责人张太雷与李作了谈话。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文献（节录）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

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

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

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组织工作决议案

宣传问题决议案

农民斗争决议案

军事运动决议案 K. M. T. 问题决议案

省委通告第一号

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

一

我们今天的政治报告，偏重于西北。至于国际以及全国的政治形势，在冯玉祥这种“蔽塞主义”——检查新闻——之下，消息阻隔，材料缺乏，只能有很简单的几点报告。

目前国际上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间的斗争，帝国主义者似乎稍占优势。英国对俄断绝外交上及商业上的关系，虽然因为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英国工人阶级之左倾与苏联地位之巩固，英国反赤的企图不能成功；但终不能不算是英帝国主义者对全世界革命领袖无产阶级苏俄的一个空前的剧烈的威胁！中国革命已成世界问题的焦点，大资产阶级〔，〕一部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三大政策，出卖革命，并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阴〕谋消灭革命，虽然在这新旧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之下，必要引起革命民众对其剥削者之反抗；但革命已经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此种反动的局面之下，帝国主义者的经济的稳定，不免要有相当的延长，中国要更甚的受帝国主义者财政资本之统治！不过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永远的与日俱长的埋藏与爆发，现在在中国他们的冲突又要开始了！我们只要有更坚决地奋斗，胜利终是我们的。

二

中国革命，自从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联盟，受一挫折；当初我们党对大资产阶级莫有正确的认识，莫有适当的革命策略，是这个失败的重要因子。三月间左派之恢复党权运动，汪精卫复职，从新建立了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挽救了那个危急〔机〕。但这一联盟始终未曾巩固，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不住的摇动，我们党不能运用积极的革命策略，只是消极地缓和阶级斗争，以谋巩固这个联盟，到底又归于失败了。现在中国的革命失败了！

自从湖南事件发生后，政局急转直下的变化，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反动了，唐生智反动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必须有帝国主义者的外援；新军阀与旧（军）阀同样的不能自存，必须有帝国主义者的外援；帝国主义者的炮舰政策现在已有相当的成功，所以这些新旧军阀必然的要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成一割据纷争的局面，国民党变成他们的工具，也是无疑的！所谓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武汗〔汉〕政府迁移南京，冯玉祥调停宁汗〔汉〕，继续北伐，这些欺骗民众，纵横捭阖的把戏，并莫有什么深微奥妙的意义。

自七月十三日我党的对政局宣言发表，我们的政策已别转了一个方向，向反动势力斗争。我们退出国民政府，并非退出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定于八月十五日（现改为九月十五日）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国共的分合问题，但现在已完全是破坏合作政策的行动，何待将来决定！所谓统一该党政策案三条已经宣布了，最近武汉出于汪之命令而屠杀的 C. P. 竟至数十！这样的行动与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五月十五日整理党务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以后的蒋介石屠杀清党，六月十五日以后的冯玉祥反动（，）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屠杀如出一辙；这样反动的右倾的国民党失了与我们同盟的条件，还何待他们宣布分裂！我们自然已与他们站在敌对的地位。我们以后要极力宣传汪精卫等之破坏三大政策与背叛革命行动，但我们并非退出国民党。

自然，经过这次事变后，左倾的分子，已认清了武汗〔汉〕与南京两派之殊途同归，他们仍然拥护三大政策，更加左倾，现在左派国民党与我们党共同南向广东发展，作新的奋斗〔。〕宋庆龄曾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中央，于右任、贺龙等仍保持其左倾态度，不过于受汪精卫等之包围，未能南去。

七月二十九日叶挺贺龙二部占据南昌，张发奎受汪精卫影响逃去武汉，朱培德部三团被缴械，成立革命委员会列名者为同志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璋（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及左派于右任、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曾发表宣言，口号是反对武汉南京反动中央及政府，农民革命，实行国民革命等。

因南昌非可久守，我们的目的，在取得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故即向广东发展，现已进至汕头，上海二十九日国社电：“沪潮汕帮商接汕电，嘱即停止装货赴潮，闻因叶挺贺龙军窜到大浦，该处距潮雷船水程仅一夜”。由此也可反

证。再由汕进攻东江，海丰等地已早被农军占领，李济势极穷蹙。由南昌南下时计共兵力二十一团，以后又继续武装工农，声势甚大，广东不难一鼓而下。

今后正是我们艰苦奋斗的时期，中国革命不过是短时间的失败，决不会在此种反动而加重的剥削与压迫之下消沉下去，更要深入群众。

三

自从冯玉祥到西北以后，西北上的政治便以冯为中心而发生变化，到现在冯虽出关，西北上还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对西北上的政治分析是以冯玉祥的政治行动为中心，而且多含有地方性质的。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西安解围后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混沌时期

（二）由革命军事会议到冯出关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革命高涨时期

（三）郑州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反动时期

（四）目前的政治形势

（一）自从国民军入陕，西安围解，此时国民一二三军^①尚未统一，冯（、）于的关系尚未确定；反动方面还时有反冯反于的企图；政治未入轨道，全是混乱的状态；我们党中央对西北的政治策略也未达到；西北上我们党的力量本甚微弱，也未定出统一的政策，不过那时有以于制冯的倾向，就是恐冯成蒋介石第二，而不愿再在西北上造出唯一的军事领袖。这也可以说是这一个小阶段中党的策略，只是时间很短莫有影响到政治与社会上去。

不过那个策略的出发点，还是着重于军事方面：与冯竞争，而未注意到社会的群众的基础工作，这一策略就是实现了，也不见得就有良好的结果，因为冯于在军事上的力量太相悬殊，大部分反动的二军^②，只是利用于为防冯的镰客，也不会作于的革命力量。

（二）到了二月终冯玉祥到陕即召集军事会议，首先统一国民军，冯于关系也经确定——于被冯拿在手下，社会上的秩序渐次恢复，国际代表及冯方工作同志均一致反对党已定的策略，而要拥护冯玉祥统一国民军成西北上唯一的

军事领袖，使于为陕西政治的及党的领袖，编练省防军二万，避免与冯冲突。在此种策略之下，我们以全力助冯，反对二军，解救冯之经济恐慌；于则一筹莫展！

因为国民党任冯为西北总党代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归冯，于以国民党的老资格处处受冯掣肘，态度消极，在三月十二日前后冯于冲突甚烈，于表示不干，而我们还是留于，使于对冯迁就。

后来我们也渐渐看见冯之不诚意革命，错误甚多：如对于取压迫手段；对军事会议中之决议，一方冯措施不当，一方二军全不执行，冯也不理；对民众全不接近；对国民党时存左右心理，即以军治党；对农运口头赞助，实际防碍，总是站在豪绅的利益上；对较好的二三军与反动的一体待遇，不与接济；西北政治委员会在冯视为无物，大的问题均私意解决；其部下大部分军官官佐之反动右倾，反对 C.P.，反对政治工作，时有表现，而冯听而不闻；对反蒋始终暧昧；对反动的二军不加裁掣（制），反以岳为南路总司令，加紧了反于的力量，一切反动的分子（进化社……）也有了凭藉，他们的口号是拥冯倒于，联蒋反赤。但我们对此只是在口头上说纠正，到底不能有实际的影响！

在二三军方面我们曾注意到一小部分工作，如史可轩、甄寿珊，以及中山军事学校，我们均以全力去工作使之左倾拥于；此外在陕北还有一部分；杨虎臣（城）、邓宝珊他们军队的纪律虽坏，但他们二人则比较思想左些，我们也曾注意与之接近，不过都没有深切的去注意工作，到底没有好的成绩！在于的方面，固然在冯的压力之下，与我们的政策之下，不能有为；但于本人也的确是莫有政治头脑，莫有计划，所谓麻麻糊糊的得过且过，对冯时有顾忌。我们只使于接近民众，但于在行动上到底是与群众隔离，不能积极的站在民众方面（自然于比冯要进步的多了）。

在社会上一般的情形，因为政治环境顺利，革命的潮流暴涨，成了一个红色的西北；但是虚浮而不切实际，未能深入民众！

经济的情形则十分恐慌（详情见政治通〔告〕二三四号），陕西经过连年的战争，农村经济完全破产，西北数十万军队的正式供应，已不可支，并且还要出关作战的准备与二三军的不法征收，人民的痛苦达于极点！而在冯之欺骗

政策之下，还有更甚的剥削，凡军阀所有的横征暴敛，冯均以革命利益的口头禅而实行，如无价值的加字票出了二百五十万，流通券一千六百万，西北银行票一百五十万，粮株券三十万；征收用户捐，营业捐；增加厘金至数倍；经济紊乱达于极点，我们都以全力为冯宣传，使之利于行使，冯渡过了难关！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政策之错误，由国际，中央以至陕甘区委，都是对冯的估量太过，“无条件”的对冯帮助！我们不是领导政治，而变成冯的宣传机关；在冯方工作的同志对冯不能影响，而只是做了冯的秘书主任，还说是取得冯的信仰了！对于的策略，完全是不顾事实的幻想；对二军只注意了一小部分的宣传工作，而忽略了全体的分化工作！

对民众不许反苛捐杂税，不许与冯冲突，要民众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利益，就是要冯玉祥与我们的联合而牺牲一切民众的利益！

（三）武汗〔汉〕派在四五月间已有一部分动摇，五月十四〔、〕十七徐顾^③连为冯来电，表示对蒋妥协与武汗〔汉〕方面 C.P. 之过激行动，冯在潼关即表现右倾，反对西北人民的言论，反对长安农协捕杀豪绅，二十五日石敬亭在西安便公开掣〔制〕止反蒋宣传，次日于右任到潼关开西北政治委员会时，冯励〔厉〕色不主反蒋〔，〕于争执结果，决定军队中停止反蒋，党与民众应听其自由，不能干涉。至郑州克复，东征胜利，冯右倾的变化，急转直下，不惟反对 C.P.，掣制一切民众运动，即国民党也不在他的眼中了！

郑州会议七月十四日开幕^④，冯在政治上正式表示反对武汗〔汉〕，要与蒋妥协，郑州会议除决定了豫陕甘三省政府组织外，无结果而散。从此冯即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而活动了，东向与蒋妥协〔，〕徐州会议二人共同发表宣言；西向消灭左派（于右任）的势力，而以反对 C.P. 为其政争的口号，陕西的反动势力遂气焰万丈！冯之代理人——陕西省政府也于八月十八日^⑤成立了！此时以前我们曾在民众方面鼓动请于回陕的空气，通电全被冯扣留。

冯之反共联蒋，一方面自然有其阶级的背影〔景〕，另一方面则为其纵横捭阖的策略，因为冯志在北京，蒋唐各据要津，各有一政府的凭借，冯岂能长处中州危境？但他的出路在他看来也只有反奉，他便定出不革命的策略——联蒋反赤，想借助于蒋以反奉〔，〕因为蒋阎勾结，联蒋可以减少他北进的阻碍。

但不料引起唐生智的反感，武汗〔汉〕政府也完全取消对冯的物质援助；阎仍反对其北进；而蒋则志在联冯打倒武汗〔汉〕然后北伐，与冯的目的相反，各有作用，因此冯蒋破裂，冯之政策失败，至徐州失守，奉军南逼，冯陷于四面楚歌！

在反冯的军事运动中，我们准备造出一部分左倾的武力，因为二军反冯后还是反动；这个左倾的领袖，我们心目中是在邓宝珊，并结合甄寿山〔珊〕史可轩韩黄^⑥各部，邓此时在西安态度很左，对我们表示好感，也露反冯之意。我们特为此派李同志^⑦赴汗〔汉〕与中央商酌办法。不过邓终是莫有反冯决心，事实上也是莫有什么实力，不敢轻动。史可轩同志因为不听党的指示，受了反动的兴平派的包围，内部发生纠纷，政策错误，终以丧命，不过实力还莫受大的损失。接上武汗〔汉〕变化，我们对邓也不〔无〕能为力了。

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党的政策动摇不定，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因为不明白全国以及武汗〔汉〕方面的真相，又得不到中央的指示，我们又过于重视冯在政治上的作用，不能定出积极反冯的策略，即派同志赴中央请示，过了一月得到中央的指示，只是说秘密工作，请于归陕，对冯还莫有意见；不久又有张同志^⑧由中央回来带着中央的意见，只是说让同志勿参加省政府，对冯不得中央决定，不得反对。所以我们只决定了消极的策略：对冯对二军皆不反对，莫有提出反冯的总口号；在农运方面也是停止斗争，只是联络土匪，打入红会组织民团！这样便无意对冯帮助，如中央的批评！

（四）目前的政治形势：在现在这个新旧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之下，冯还是四面楚歌，莫有出路：一、武汗〔汉〕（唐生智）南京（蒋介石）两方面对冯均不信任。二、奉天军阀节节南逼，日本帝国主义者山东出兵，实行助奉，徐州失守时，冯损失甚大，归德失守，闻开封亦不保，津浦路上不能前进。三、晋阎仍在京汉线方面阻其北进。四、豫陕甘三省冯的统治尚未巩固，反冯的军队包围了冯的四面八方，由甘到豫一个长蛇线的阵势，极易动摇。五、冯部已渐起分化，鹿钟麟等站在冯的左方，石敬亭等站在冯的右方。六、既失了C.P.的总〔配〕合（冯曾为我们中央去电请求帮助，并承认他的错误，中央未理），又失国际的帮助（俄顾问均走，冯曾派张允荣赴俄向国际求助），因地理上的

阻隔，又不容易与帝国主义者联络，若他退回西北，更无异沽〔枯〕海之鱼。

七、要解决经济的恐慌，必要加重的剥削民众，现三省民众反冯的空气非常普遍；归德失守时，红枪会杀吉鸿昌师至一营之多，吉枪杀农民二千余；陕西河南流通券的取消，很显然的是一种剥削政策，现在又“以革命的手段”横征，长安与西安市派洋三十三万之多，外县不计，民众痛恨切齿！这次同州克复，闻百姓因一军抢劫而死伤者至数千之多！冯之假面具完全破露！

河南非冯系的军队的出路，也在反冯，冯对他们也极力排斥，靳云鹗已开始反冯动作，闻与唐生智、阎西〔锡〕山均有相当的联络，不过实在的情形我们现在不大明白，只听说冯甚危急。

在陕西岳西峰部，李虎臣部大军出关，猜不着他们的反冯计划怎样？

陕北之井^①，无甚作用。韩黄闻有八九千之众，原为援麻^②入陕，现在富平一带约二千人与胡景铨联络，不过莫有战斗力。自大荔破麻后，阻断了二军与晋阎的联络，冯占据河北一个重镇，河北二军反冯计划失败，现在一军借追击韩黄进驻三原，意在监视河北二军行动，二军更是手忙脚乱。一盘散沙还不知羞耻地互相攻击，既无物质援助，又无一个团结的领袖，反冯终是有心无力！

若冯稍有力量，便可以各个击破！不过冯在陕空虚，不及二万人〔，〕河南正在危急，也不敢与二军开端。

在此种形势之下，冯之危险可以明白，所以冯又表示左倾，利用 C.P.，利用国际，利用民众！说他在原则上不反对 C.P.，又愿受国际指导！

这是目前的政治形势。现在我们要考察：

冯玉祥所代表的这个武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对冯的错误在那里？

怎样应付目前的政治形势？

扩大会议应该讨论出一个恰当的策略，使全党的同志本着一致的努力工作！

省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注：①1924年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成立国民军。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②国民军第二军的前身是胡景翼领导的陕西靖国军第四路。一九二五年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失败后残

部入陕。胡死后国民二军领导人岳维峻（即岳西峰）政治上反动，大革命失败后变为军阀势力，

③即徐谦、顾孟余。

④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郑州会议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召开。

⑤应为七月十八日。

⑥指邓宝珊旧部韩有禄、黄德贵。

⑦即李子洲。

⑧即张慕陶。

⑨即盘踞陕北的地方军阀井岳秀。

⑩即由靖国军归附刘镇华镇嵩军的麻振武部。

*根据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和中央对陕西的指示，陕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简称九·二五或九·二六会议），耿炳光、李子洲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党务报告，提出以反冯为中心的组织、宣传、农运、事等工作任务。本文即为耿炳光之报告。

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节录）

四

在第四阶段中已是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冯在政治上的反动面孔具体的表现出来；反动的省政府成立，清查户口，解散一切的革命组织；二三军与一般反动的知识分子豪绅都加力的进攻起来了！就是由灰色而白色，急转直下！

这个时候，赴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回陕，省委成立；因政治环境之不许，未能召集代表大会，只由中央指定的省委与区委共同决定，正式省委十三人，候补五人，监察委员会未成立。

因为西安比较严重，加以反动派之告密与陷害，党的机关一时又未能建立完密，许多工作同志不能立足；各地组织向来松懈，又不注〔意〕秘密的技术工作，邮局检查特严，省委直接对各地很难指导，所以当时党的工作原则是建立秘密工作，健全各地组织，减少下级与省委的直接关系。

在这个原则之下，便决定了特派员制度，分全省为六路，每路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对省委负责，指导该路工作。路的划分如下：

- （一）东路——省东各级党部属之，特派员为何○○^①，后改为潘○○^②；
- （二）西路——省西各级党部属之，特派员为耿○○^③；

省委系统表

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县委 (六) —

—市委—西安

—支部 (二十) —

—区委 (二) —

潼关、华阴、临潼、蓝田、高陵、蒲城、富平、咸阳、礼泉、乾县、兴平、岐山、宁夏、平凉、兰州、导河、军队支部——清涧、安定、宜川、雨金。

—华县、泾阳。

—区委——榆林。

米脂、佳、官〔乌〕镇、定边、清涧、义合、周家、签〔硷〕、桃花峁、米家沟、杨家沟、石咀驷。

绥德 { 直辖支部 }

肤施(延安) — 直辖支部

延川、延长、宜川、安定、盘〔蟠〕龙镇、秋峪沟。

长安

渭南

三原

五一

(三) 北路——省北各级党部属之，特派员为李〇〇^④；

(四) 南路——长、蓝、周、户属之，特派员为陈○○^⑤；

(五) 东北路——五一、蒲城、澄合、朝属之，特派员为蒲○○^⑥；

(六) 陕北路——陕北全部属之，特派员为魏○○^⑦。

自省委成立到现在，只是消极的保守策略，党不仅是莫有丝毫的发展与斗争，反而退后了，如许多县委与支部无形消灭，党员日见减少，所〔以〕这个阶段是党务低落期间，也可以说是“亡党期间！”

省委常委委员会本为三人，后因派李○○同志^⑧赴中央，崔○○同志^⑨又证明系在粤区开除者，不能令其参加组织，事实上只余一人，后来调李○○同志^⑩来，而工作又不许他离开，这种不健全是事实问题。

各路工作，除东路外均无甚起色。特派员也只是消极的“看管主义”，并未以全力设法发展工作！各地党部都得不到充分的指导，由涣散而消沉下去！咸阳、潼关、同州各支部均无形取消，乾县、岐山改为区委。宁夏、兰州不知下落。

西安市起初因为军校放假，政府机关的同志退出，省党部、中山学院、中山军校等无形消灭，同志与支部均大大减少，工作范围缩小，虽指导稍忽，尚不显然，后来因学校渐渐开学，学生群众集中，同志回校，散住的同志也多，各种工作均待发动，而指导无人，初组织一训练委员会，由何、崔、杜三同志负责，结果何病了，崔放弃责任，第二次由杜、张、何三同志负责，不久又因环境关系，张、何均不便活动，无形停顿了！前后我们感觉到西安空气太得沉寂，便于一中发动学潮，曾发表两宣言（用学生会名义），一时兴奋起来了，但因指导缺乏，不久又消沉下去了。

陕北事变 八月四日第四师范被井岳秀解散，四中继之，特派员因色彩浓厚而不能立足，其他负责同志对党的组织全未理会，一未〔味〕的爱惜了个人的性命，一流〔溜〕烟都转回家园了！因此陕北除军支有人负责，绥德有潘○○同志^⑪数人外全成一盘散沙！最近榆林中学又开〔除〕了不少的同志！各县均次第动摇，听受摧残！

可轩事变 冯调可轩同志部及中山军校出关，一〔以〕便为消灭左派〔于〕

势力。那时我们决定了两条出路：（A）出关受冯节制，可轩下野，军队由许全忠统率，因全忠与各方感情甚好，或可保全一部实力；（B）抗冯，这个又决定了两个方法：（1）逃窜北山，独立发展；〔（2）〕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结果决定的B项第（1）出路。但可轩同志第一，受了兴平派的包围，决定一切行动均不取许及党所派的杨○○同志^⑫的同意，杨同志不能站，许受兴平派排斥走了；第二，不认识敌人，不想打着向北走，希望和平，希望田生春为自己筹备支应，田已将张蔚生的卫队扣了，可轩还亲往交涉！结果于七月二十九日被田贼害了！此次事变中，军队尚未受大的损失，只是那边同志错用党的决定把中山军校一百多同志解散了，实为可惜！

华阴事变 华阴农民暴动，派同志数人前去指挥，同志事先没有审查主观的力量与农民的情绪，指挥又不统一，结果失败，最后被押了同志四人——亢、曹、王、吕^⑬。

含初事变 含初同志过去色彩浓厚，人都注意，又因他的行动浪漫，多招人骂。他到中部^⑭还是大会其客，交游不息，把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忘记了！于是引起老井的恐怖，以为C.P.的领袖北来，必不利于他了，便于八月十九日差杨袞派一排长枪杀于其家中。

扩大会议 党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省委急欲招〔召〕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一切工作；因候赴中央代表回来，一迟再迟，迟至八月十号以后才正式召集，决定在九月二十五日开会，召集代表十八人^⑮。这一阶段至此结束。

这个阶段的错误与困难：

（一）因为党的政策动摇不定，所以工作方针也是这样。

（二）省委常务委员会组织不健全，甚至只留一人，这是种种事实逼着如此，有些幼稚的同志，不知道应该怎样向党提议，或向党执〔质〕问，使党健全，反在党外任意批评，这是破坏党的行动！

（三）各路特派员未能积极地去发展工作，只是“看守主义”！看守的结果，还是损失了不少！

(四) 西安工作无〔人〕负责。

组织统计表

地名	党部				区数	支部数	党员总数	农民党员数	备 考
	市委	县委	区委	支部					
西安	市				0	10	110	0	
长安		县			4	33	180	130	
渭南		县			3	20	213	115	
三原		县			?	6	101	40	
五一		县			2	9	132	93	
绥德		县			1	17	243	?	属外县支部 11 处
肤施		县			?	10	120	7	属外县支部 7 处
华县		县			3	25	184	90	
泾阳			区		1	3	15	?	不确
乾县			区		1	3	34	17	
岐山			区		1	3	15	1	
高陵				支部		1	15	2	未见表
旬邑				支部		1	13	0	未见表
淳化				支部		1	3	0	未见表
礼泉				支部		1	18	0	
武功				支部		1	3	1	不确
兴平				支部		1	13	1	
蓝田				支部		1	35	15	
临潼				支部		1	12	3	
华阴				支部		1	10	2	
蒲城				支部		1	15	1	未见表
富平				支部		1	11	0	未见表
雨金				支部		1	36	0	不确, 未见表
关山				支部		1	56	0	不确, 未见表
平凉				支部		1	4	0	
总计	1	7	3	14	16	153	1591	518	

除上表的组织而外, 还有许多散住的同志, 未正式成立组织, 列表如下:

地 名	合阳	朝邑	韩城	澄城	白水	户县	周至	扶风	永寿	凤翔	陕南	咸阳	总计
同志数目	十一 (?)	五	一	九 (?)	一	二十 (?)	二	一	二	二	三十 (?)	六 (?)	九十 (?)
有无音信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少数有	无	

同志总数——由以上两表总计同志总数为——1681〔人〕

四个阶段的组织比较表

项别 阶段	最高指 导机关	委员	地委	市委	县委	区委	特支	支部	党员	农民党员
第一阶段	党团联 席会议	7	2	0	0	0	9	11	388	0
第二阶段	陕 甘 区 委	5	7	0	0	0	41	?	2177	654
第三阶段	陕 西 省 委	13	0	1	6	?	38	?	2177	654
第四阶段	陕 西 省 委	13	0	1	7	16	32	153	1681	518

五 结 论

在这四个阶段中，对每一阶段的工作，我们都有很严格的〈去〉批评，似乎缺点和错误很多；但若整个儿的观察起来，并非全无进步，它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与力量。

我们的批评，第一，须顾及当时当地的事实，就是不要信口批评；第二，须正确，就是不要过火；第三，不可忽视了主观的力量，就是不要以为过去的党等于没有，狗屁不值。然后由此种批评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错误之后；由正确的错误才能得到新教训新经验，才能定出恰当的新策略！这是要大家注意的！

现在请扩大会议的同志批评！

组织部

省委书记

宣传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注：①何挺杰。
②潘自力。
③耿炳光。
④李子健。
⑤陈嘉惠。
⑥蒲克敏。
⑦魏野畴。

- ⑧李子洲。
- ⑨崔孟博。
- ⑩待查。
- ⑪杨晓初。
- ⑫亢维恪、曹瑄、王学习、吕佑乾。
- ⑬今黄陵。
- ⑭第一次扩大会议之经过说到到会代表共十五人，这儿说召集代表十八人，确数待查。

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 及其指示之决议案

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后，认为满意，完全接受！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代表无产阶级农民的利益，取得领导地位，党的政策与指导，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责任重大！所以过去党的中央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又破坏国际纪律，不仅要危害我们的党，而且已危害了中国革命；国际的指示非常正确！中央对自己的错误能不迟疑的，勇敢的，公开的陈述分析，使全党作一空前的批评，更证明了中央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精神！我们愿保存此种精神，更愿继续与党内一切不正倾向奋斗的精神！

陕西省委对冯政策之动摇不定，也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扩大会议中已严格的加以纠正；中央的指示非常正确。

今后我们必须〔使〕省委以下的各级党部同志切实明了并执行中央的决议及指示，完全服从中央，努力奋斗！

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一

中国革命遭了巨大的失败，在这种转变中，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现在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的营垒：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中国革命的责任已完全在工农运动的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在与资产阶级军阀的斗争中，才可以达中国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成功。就客观的形势分析，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而革命在最近要重新高涨又是必然的；所以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领导之下，还要有更大更深入的发展！

二

冯玉祥已很明显的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他的兵士虽是大半出身于贫农，但仍不失其雇佣的性质，其他军阀的军队无异；再加以宗教的麻醉，天然地成了一种绝对服从的“冯家军”。他的将领及官佐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充满了封建思想。冯的思想便是这一组织的“思想结晶”；冯的政治主张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自然有其阶级的背影〔景〕，而不是一时的或偶然的政策作用。

三

当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们为发展革命而与之联合，根据列宁的理论是正确的。但过去我们之所谓联合，只是无条件的做冯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任务：对冯只是过分的估量，忽略了深入下层兵士，培植革命的基础，这如何能保证他不背叛革命呢？为维持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农民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对冯

的剥削忍受，不许反对一切苛捐杂税，不许反对预征钱粮，拥护数千万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这是共产党取得农民而保证革命胜利的策略吗？

为维持冯对国民军军权之统一，忽视于右任，对二军不设法起分化作用，一味地反对，以为冯才是真能革命的！结果还是冯利用二军限制左派的发展！

既认定二军是反动，但同样的还是限制农民对他们的反抗，维持他们的横敛，似乎二军与冯一样是革命的，矛盾一至于此！冯不忠于革命的行动，早已表现，如对于压迫，对较好的二三军不与〔予〕接济，对坏的二军反去扶持；剥削农民，保护豪绅，保护宗教，反对农运；以军治党；不主反蒋，不接近民众……。我们对旧的政策心实不满，而还是应用，不敢丝毫的主张向中央提议修改，盲从的心理如此之深！

冯既反动之后，党对冯的政策还是动摇不定，以为冯的反动是一时的政策，还有转还的余地，以为冯是中国革命的支柱，不敢轻反，须得到中央的指示！冯的反动在政治上已完全表现出来了，才进一步决定准备反冯，还不敢提出坚决的政策！这是如中央所指示的待冯的统治巩固而大屠杀的时候，才开始反冯！

对二军也决定不反对，为的是要利用他去反冯，这又是单纯的军事的利用政策，而忽略了民众的利益，这样即便是二军将冯打倒，对我们的利益何在？

对冯的代理人——陕西省政府也莫有一声一字的反对，似乎那是不够我们反对的！

在这种不斗争，无条件退守的策略之下，党的一切工作都消沉下去，现出“亡党”的现象！我们实犯了很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

我们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势，这种错误不能再延长下去！

西北上广大的穷苦农民群众，必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成一种无敌的革命力量！过去的小的部分的斗争，已吓得反动势力不敢轻虚！

在这新旧军阀割据的斗争的局面之下，冯玉祥处于十分困难危险的地位：农村经济破坏不堪，冯的经济恐慌无法消灭；冯对工农及一般商民必要有更积

极的剥削，其假面具不能消沉民众的革命情绪；因兵不发饷，生活穷苦，兵士对冯减少信仰；因其将领之互相冲突，他的队伍已与他军阀同样的由分化而日趋于崩坏之途；反冯的空气笼罩了西北，冯的统治不容易立刻巩固，冯对 C.P.，主张宽大，并非对无产阶级的仁爱，而是表现出他的统治力量动摇！

二军处于冯之压迫之下，无力反冯，冯对他们已由不理而监视，由监视而进攻，二军若全部瓦解，冯在陕西的统治必得到大部的稳定，可是冯在陕的势力空虚，在河南又甚危急，对付二军的力量也是有限！

但二军无能力反冯不甚可靠；陕西又是冯唯一的退守巢穴，也是冯目前维持自己的唯一根据地，冯必要时必作殊死争，我们不可忽视！

五

我们唯有在我们正确的指导与策略之下，坚决的有计划地斗争，注意“部分的深入”，渐取得广大的民众，巩固我们的组织，使革命得到重新的进展。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的任务是：

（一）在军事政治方面：

对全国我们在党的总政治口号之下，勇猛地继续反帝国主义反新旧军阀的斗争，以期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促进中国革命！

在西北坚决的反冯；使冯的统治不能稳定以至于崩坏；组织秘密的斗争机关，对敌人施行秘密的破坏（如破坏交通，军事机关，枪〔抢〕夺军械……），在其他各方面，均本此原则，施行对冯的进攻。并提出“兵饷发现”等口号。

对二军，他们若能在我们的条件（对民众利益之拥护）之下来反冯，我们还可以部分的利用，否则在民众方面宣传他们的罪恶，还是不因其反冯而让步。对岳维峻及以岳为中心的二军更要积极地破坏反对；因为岳之反冯是以蒋介石或唐生智为凭借，依付〔附〕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更充满了反动的思想，反冯以后这势力仍是西北上的祸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宣传，并要用种种方法，加紧他们内部的冲突，使之由分化而崩坏。就客观上看来，这是十分可能的。

我们自己的武力，也要在斗争中积极培植，使之生长发展。

（二）在农民运动方面：

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抗捐”，“抗税”，“抗粮”，“取消高利贷”，“武装农民”，“打入红枪会”，“组织土匪”^①，及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的农协政权。

（三）在城市手工业工人及商民方面：

要组织手工业工人，并领导其做改良待遇加薪等运动，少数的半产业工人自然也不能忽略。

对一般商人要领导他们“抗捐”……对中小商人及学徒要组织并领导其向大商斗争。

（四）对国民党工作：

要设法打入其下层党部，引导之参加工农斗争，如此才能取得广大的左派群众，使在我们的政纲之下，成为革命的工具；而不可以只联络几个似是而非的所谓左派领袖，反而使国民党成为这些伪左派的工具。对右派要断然的排斥出党。我们要极力造成革命的国民党。

（五）对学生运动：

要公开的或秘密的保存在我们影响之下的学生组织，以为斗争的工具；但不必存一定要统一全国或全省学生运动的观念。结合左派学生，推动学生群众的分化，使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用种种方式参加反对右派学生组织与一切革命斗争。至少也要使一部分学生中立，削弱右派学生组织的力量。派少数灰色而有能力的同志，加入右派学生的组织，侦探敌情，施行破坏。

同时对左派或中立的教职员也须做联合工作，提出“薪水发现”等口号。

（六）妇女运动：

要注意深入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妇女群众，并吸收革命分子，改正过去那样单调的女学生运动〔。〕

对知识分子，宜利用研究社等种种形式的组织，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作革命的斗争。

对反动的妇女组织，必须派同志加入侦探。

（七）在党务方面：

在秘密工作中，更要建〔健〕全并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宣传，尤其要在农村中健〔建〕立党的基础。

C. Y. 是无产阶级青年的先锋，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有特殊的作用，C. Y. 应努力深入劳苦的青年群众，尤应改正过去对农村工作的那样忽视、宣传，党当给 C. Y. 以切实的指导与帮助！

本以上的工作策略，我们要努力工作，使党的影响在斗争中扩大并巩固起来！

注：①指改造土匪。

组织工作决议案

组织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党在陕西过去的组织工作因主观力量的欠缺及党的政策的错误，暴露出许多重大的缺点；严格一点说简直等于没有组织工作，因为第一是很少注意组织工作的政治意义，第二是忘掉了党的组织的秘密性质。现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军阀结合旧军阀地主豪绅等封建势力，成一反动营垒，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采用法西斯蒂的毒辣手段，我们要战胜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所以严密党的组织，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使一切同志都经过秘密的状态，培养成秘密斗争中的健全战斗员，是现是（时）党的组织工作上的主要任务。此次扩大会议，认为整顿组织工作是陕西党目前第一重要工作，并应按照以下的原则努力整饬：

（1）由省委以至支部皆应从速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应选择党的最积极而最有能力的分子分配到各级委员会及干事会，并须尽最大的可能吸收有能力的工农同志到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来，改变委员的成分；惟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正确指导。

（2）在秘密状态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制；但不是在这个集权的原则之下，忽略了民权主义的作用。各级委员以减少数量增加质量为原则，省委由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二人组织之，县市委以正式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二人组织之，区委以正式三人候补委员二人组织之。支部干事会以三人组织之。省市县区委都设常务委员会，以三人组织之。执行各该党部之一切职权。各级委员会之书记都由其上级党部指定，常务委员须呈报上级党部批准。

（3）扩大会议审查党的人才及环境，认为监察委员会在目前无设立的必要与可能，故决定暂不设立。

（4）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下级党部建立秘密的密切关系。省市县委除勤为各级通告通讯指导而外并须不断的按期派巡视员考查各地的工作状况，

帮助各地组织的联络，指导各地的工作。各地应对上级按期（每月一次）报告党务并应常常报告各该地的政治情况斗争情况，反革命线索与消息。

（5）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应极力使每个支部在其所在的机关或乡村中很灵活地活动起来，领导一切革命的急进分子，组织各种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团体，围绕在党政策之下活动。每个支部都应按照三人组的原则，严格的分成若干三人至五人的小组。每组指定一人为组长一人为候补组长，如人数过多的支部，可按照生产部门或班次，或住居地域分为两个以上的支分部，支分部亦可成立干事会。如有支分部的支部，小组组长与支分部书记或干事会发生直接关系，支分部书记或干事会与支部干事会发生直接关系，小组成员只与组长发生直接关系。小组每周必须开会一次，并须作到“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

（6）各级党部应立即进行秘密工作，不仅内部的组织与工作须严格的履行绝对秘密的原则，并应在一切运动中灵活的进行秘密的宣传煽动组织与探查等工作。尽力增进同志的秘密常识，严格执行秘密纪律，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亦应与〔予〕以严厉的处分（由警告至开除）。

（7）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精神。在此秘密状态中，严格的执行纪律，尤为党的必要任务，任何同志如有对党部机关之调遣决议决定等不服从而破坏党纪者，都应与〔予〕以严格的处分（由留党查〔察〕看至开除）。由支部到省委依次于委员会外组织三人至五人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各该党部所属的同志，有无动摇与投机不可靠的分子，将审查结果呈报上级。如有确切不可靠的投机分子应不客气秘密的去掉他，但须由省委执行，且须注意党在开始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应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的利益。

（8）反动潮流愈高涨，一般青年以及富有革命性的工农的革命情绪，亦必随其愤满〔懣〕不平的心理而愈益高涨，这正是发展组织的最好时机。各支部应坚决的运用党的新政策，积极的领导青年学生和农民不断地与反革命势力斗争，于各种斗争中积极的发展我们的组织，不过于发展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严格”，介绍的手续须特别严密，以防敌人的混入。

（9）现在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一同志。在此一千六百八十一同志中农民仅占

三分之一，余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所以改变成分为目前组织工作中一件最重要而迫切的事，今后应尽力的将党的基础树立到农村中去，并尽力在斗争中吸收大量急进的贫农到党中来。

(10) 过去我们太胆小了，太疏忽了，不敢而亦不注意在军队中发展组织。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建〔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置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有了大量的建〔健〕全而充实的军支部，然后才能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党的作用。

(11) 在一切非党的组织中，组织三人至五人的党团，受党的严密指导，灵活的运用党的政策，以尽领导分化或破坏的责任。

(12) 在此主观力量甚感不足的情况之下，仍应采取工作集中与人才集中的原则，集中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渭河两岸的农运学运与军运。至于南北两山当然也应有相当的注意。

(13) 技术工作是组织工作的一重要部分，估量党与非党的力量，全靠技术工作的精良，特别在秘密工作状态下。过去各地太不注意此点：报告表格凌乱不堪，不正确，延期，甚至莫有。所以今后不仅是不可忽视，还应力求组织工作科学的技术化。

(14) 团是输送党的政策到青年群众中去的一条运河，所以党团须有极亲密的关系。过去陕西党团的关系发生了很不好的现象，各级党部对于团的工作丝毫不加注意，少指导，少督促，更少帮助，而团则不注意分化工作，为党供给新人才，于乡村斗争中有不与党一致行动的表现。且有一个时期，团的一部分负责同志竟倡“团要独立了”。团的组织原是独立的，可是政策上绝对的应与党一致，党的政策如有错误，团尽可提出意见。这都是很错误的观念，今后须严格纠正，改善党团关系。各级党部须严格的实行互派代表的原则，团代表有表决权。须派积极有能力的同志负团的工作责任。须切实指导并督促团的工作。须尽可能的尽力与〔予〕团以各种的帮助。并须改正“团不应过问政治”的错误观念，引团员参加政治问题及党的政策之讨论。

(15) 对一般群众组织应注意：

A. 在斗争中扩大并巩固群众的组织，分化并破坏。

- B. 尽力公开地秘密地保存民众原有的革命组织。
- C. 分化并破坏反动派的民众组织。
- D. 建立民众秘密战斗机关。

(16) 口号

- A. 党到农村中去!
- B. 党到军队中去!
- C. 一切同志归支部!
- D. 一切工作归支部!

宣传问题决议案

宣传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种，党要经过宣传煽动工作，使群众认识党的政治面目，使群众站在党的领导之下，听党的调动；党要经过宣传教育工作使全体党员了解党的策略，使全体党员在党的决议之下，忠实地勇敢地奋斗。所以党要真正成为阶级的先锋队，群众的领导者，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必须很注意宣传工作。但是过去党在陕西对于宣传工作很少注意，尤其在冯玉祥反叛后陕西陷入反动局面，敌方的反动宣传勃起，我们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对外的，完全停止，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承认。

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现时的反动局面必然来到，不可避免的。现在自封建势力至反叛的资产阶级已结成一反动的联合战线向民众进攻，民众的革命运动在事实上因被敌人的猛烈进攻而低落了。我们应努力的向民众解析中国革命的发展，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并不断地鼓动民众的革命感情，使之在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地斗争。同时，党在过去发展很快，党员的质量非常欠缺，而目前不是我们严格地整顿队伍，准备作激烈斗争的时期。所以对于宣传工作当十分注意，扩大会议根据以上原因，对于宣传问题有以下的决议：

(A) 对内的

(一) 提高同志的政治兴趣并兴奋其革命精神。最近党内有一种倾向，就是一般同志的政治兴趣很低，尤其是作对外非政治性工作的同志，及内部做技术工作的同志，这种倾向是很不好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是一个政治家，不注意政治问题，就不能有政治行动，这种坏的倾向当极力纠正；同时在目前反动局面下，有一部分同志在不自觉中，精神很不振刷〔发〕，这亦须即速改正，因为我们的精神不振怎能鼓励群众，领导群众斗争？

(二) 注意党的知识训练，培养党的干部人才。关于党的知识的训练，过去做得很少，一般同志对党的知识的水平线很低，对党的观念不清楚，党的干

部人才的缺乏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多加注意党的知识，培养干部人才，以期党的工作之健全。

（三）实行系统的教育，造成集体的思想。过去党的教育工作做得很少，尤其缺乏系统，因此同志们得着的教育尽是一些零碎知识，自然不能成为集体的思想，今后须实行系统的教育，务企同志的思想集体化。

（四）与党内一切不正的倾向奋斗。实现列宁的党的一致，所以许多不争的倾向容易反映到党内来，在中国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党内的成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过多，我们应当用党的意见去与这些不正的倾向奋斗，“列宁党”的特点，就是“党的一致”。过去我们党内亦有一种不正的倾向——机会主义的倾向，陕西党内更有狭隘的小团体（如共进社进化社等）的倾向，我们应与这一切不正的倾向奋斗，实现列宁党的一致。

（五）实行军事训练。共产党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军事的知识与训练，每个党员都应具有的，但过去党对于此很少注意，而有部分同志甚或鄙视！此后我们要极力纠正（，）使每个同志都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学习相当的军事知识，作武装民众暴动指挥者。

（六）促进同志自觉地训练。在党的严格训练之下，极易养成同志专依赖党的训练的心理，同时又易陷于极机械的境地，要纠正这个缺点，只有推动同志实行在工作中自觉地训练。一个同志随时随地不忘自觉地训练，才能成为铁一般的共产党员。

（B）对外的

（一）扩大并深入党的政治宣传。在目前反动局面之下，反动言论非常扩张，倘使我们不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就是向敌人投降，并有使民众为反动势力利用的危险，倘使不深入党的政治宣传，民众就不能真实的认识党，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扩大并深入党的政治宣传，是目前我们对外宣传的急切任务。

（二）鼓动民众的革命情绪。在资产阶级反叛了革命之后，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与资产阶级已结合成一反动的联盟，来向革命的民众进攻，这种猛烈的进攻，必然要激起民众更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在事实上因民众组织力量的薄弱，受此激烈打击之后却有部分的消沉，在陕西完全表现了这个事实。我们当继续

不断地鼓动民众，只有鼓动狂热的民众革命运动，才是扑灭白色恐怖的惟一战术。

（三）注意地方问题的宣传。宣传民众，不应过于提空，最使民众容易认识的是现实的当地的问题，且与民众有实际关系，所以我们当在党的总政治目标之下，多注意地方问题，不应开口便是“国际”“中国”。我们更应领导民众参加地方问题的斗争，在斗争中去宣传民众。

（四）实行个别的秘密的宣传。在目前状况之下，极少给我们以广大民众集合的公开的宣传机会，因此我们当实行个别的秘密的宣传，是更切实的宣传方法。

（五）农村宣传须通俗化。过去在农村中的宣传，有很大的缺点，即错误——深晦艰涩，使农民不易了解。这虽是技术的缺点，但影响于（于）收效者颇大，此后在农村中的宣传须极求通俗化。

农民斗争决议案

一

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经过陈树藩、刘镇华、吴心田等军阀的连年战争，农村经济在继续不断地破坏中。最近在井岳秀（陕北）吴心田（陕南）反动的二军（渭河北）与冯玉祥（西安东西）的割据局面之下，全陕没有一片干净土。尤其是冯玉祥“木刀杀人”的剥削利害，如流通券（已不用），粮秣券，加字票与西北票等数千万无价值的军用票，强迫行使，致金融紊乱，物价不断地高涨，农民生活更为痛苦。现在又预征钱粮，为各市县拟派现款，严行要索，还要发行什么公债票，层出不穷！冯还不知耻地说“为革命应以革命的手段筹款”！

其他井吴二军之横征屠杀更不消说。自农协解散后，豪绅之进攻更为猛烈。加以秋收不丰，天雨缺少，农村恐慌，更是满目疮痍！

因为有这样的压迫，所以红枪会〔、〕硬肚，神团等农民自动的武装组织很多，过去曾有过相当的斗争，不过因为莫有领导者，组织松懈，未能形成很大的力量。至于土匪更是遍地皆是。

二

在革命潮流高涨中我们党对农运完全取了书生的态度；不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待有了力量再去斗争，有时斗争开始发展，我们还向后拉。更因为对冯政策的错误而牺牲了农民的一切利益；不使农民反对一切横征，甚至对豪绅也因冯而避免斗争。对土匪，红枪会等均未深切注意。党的农运指导机关始终莫有健全，致农运工作与党隔离：党对农运莫有切实计划，只是临时应付；对农村中扩大党的组织，虽党一再鼓励，同志仍然是不信任“无智〔知〕识不懂

政治的农民”还能入党！工作只是铺张，忽略了集中的原则。青年团忽略了青农工作与小学教师的工作，党不惟不督促他，有些农村支部还取了轻视的态度；对农村的确实调查几乎莫有，农协只是做了些走政治机关与为农民打官司的事情。——这都是过去的错误，结果在农村中很少基础，广大的农民群众也很少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

三

今后我们要勇敢地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取得新经验。我们确信农民在此种加重的剥削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必于最近暴（爆）发起来，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改（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我们确信“在斗争中组织农民”，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为农运要着；我们不要怕人说或跟着人家说：“幼稚”“过火”！

农运要以贫农为中心。

对红枪会要注意抓住他们的群众，不可只去联络领袖。对土匪，不要害怕他们，而要积极地去联络他们。对于地痞土棍也要结合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免为豪绅军阀利用而破坏我们。红枪会，土匪，流氓都是贫农出身，都要把他们看作农民的兄弟，一般的拉在同一战线上去。

对于农民武装必要时应以“保卫团”“秘密训练”“上山”或“整个地投入我们的军队内”等方法存在。

以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会员有组织地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党在农村中须积极发展组织，督促并帮助 C. Y. 注意小学教师并打入劳动青年群众。至于党的独立宣传，应分别环境而执行。

在全陕农民中要提出下列的口号：

- （一）恢复农民协会
- （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
- （三）耕者有其田

- (四) 取消高利贷
- (五) 抗捐，抗税，抗粮，抗租（陕南陕北提出）
- (六) 武装农民
- (七) 铲除贪官污吏劣绅土豪
- (八) 没收高利盘剥者的财产，发给贫民
- (九) 没收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发给穷民及兵士
- (十) 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在陕南陕北提出）
- (十一) 没收公产庙宇等的土地，发给无地的农民及兵士
- (十二) 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捐抗税抗粮之自由
- (十三) 反对冯玉祥用粮抹券欺骗农民
- (十四) 打倒新旧军阀
- (十五) 打倒反革命的冯玉祥
- (十六) 打倒冯玉祥御用的省政府
- (十七) 打倒土匪式的军队

四

在以上的原则与口号之下，农民部要注意下列的任务之执行：

- (一) 建〔健〕全各级党部的农民部与农委
- (二) 调查并统计农民红会，土匪等组织，武装与豪绅势力
- (三) 按对象分别工作地带，为最要次要，分配工作人员，实现工作集中，人才集中的原则。
- (四) 计划培养农运领导人才的具体方法
- (五) 督促各地定出多含“地方性”的口号
- (六) 各地巡视计划
- (七) 农村秘密斗争机关之组织计划（交通队，侦探队，暗杀团，军事破坏……）
- (八) 恢复农协具体方法（农协中应有青农部）

- (九) 武装的具体计划
- (十) 有组织地加入军队的计划（分加入我们的军队及反动的军队中）
- (十一) 打入红枪会土匪的具体计划
- (十二) 武装暴动及暴动中夺取政权的方法
- (十三) 最近制定陕南陕北的工作计划

军事运动决议案

过去的军运只注意军事首领的接洽，忘掉了下层群众的获得。没有武装党员与党员军事训练的系统的具体计划，更说不到党的军事领袖的培植。至于武装工农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忽视与懦弱。这是我们党的整个的错误，陕西自然也不在例外。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作殊死战，以争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候，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但就目前国际与国内形势观察，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即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第一次扩大会议审查〔查〕了过去的错误，并根据中央的新政策与指示，对于今后的军事运动有下列的决议：

（1）在反冯的大前提之下，我们对于一切反冯的势力都应有相当的注意与联络。但是陕甘所有反冯的军队，除一两小部分外，不仅是与冯同样的仇视我们，压迫民众，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反冯之外，别无希望，如能打入他们的任何部分，故应对其领袖作相当的应付，获得他的下层群众，实行分化作用。如有发展组织的可能，即尽可能的发展之，以树立党的基础。并运用我们所能影响的农民有组织地加入改变其成分，实行夺取其武装与破坏的工作。至于冯的嫡系部队，虽为他的严密〔密〕的系统组织所限，不易打入，但是我们也应努力的做军事破坏工作。

（2）西北虽莫有大生产工业工人，可是广大的农民受了新军阀土匪军队的扰害与剥削，农村经济已破坏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所以革命的情绪异常浓厚。我们一方应积极的培养我们的军队，一方更应积极地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并予以简单适用的军事训练，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才能巩固革命的基础。并须采用各种安〔妥〕善的方法，保存农民的武装，除利用红会、硬团、民团、保卫团……等旧名义外，于必要时亦可上山，只要能保存得着武装。

(3) 土匪原来多是破产的农民，被乡村封建阶级不断的经济压迫，不得已而才上山的。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确实是贫农的好朋友，是农村阶级斗争中别动的生力军。应择其可以引上革命途径的诚恳地与之联络。打进去后即积极的改变他们的心理，使之于劫富济贫的口号之下，积极的帮助贫农，扫除乡村中的封建阶级的势力。特别应注意的是获得群众，至于首领的联络，只是打入的途径，他们多是升官发财〔财〕的观念很深，不易搬转来的。

(4) 对于自己的军事势力的培养，当然应特别注意。于适当的环境中培养军事的领袖，以作军运的中心。我们现在要喊出“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了，这个口号在这一方的意义，就是要同志勇〔踊〕跃地到我们的军队中去受军事训练，一方面可以充实我们的军队，他一方面是为培养军运的各种干部人才。至于军队中的组织，不仅要力事发展，更当力谋健全。而一般的同志，亦应尽可能地使之获得军事的知识，以备革命爆发时实际行动的领导人才。

(5) 在我们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当然应特别加紧；至于其他部队〔，〕则只择其左倾者得机亦可派人去作〔，〕余则实际上即不容我们工作，可是的确亦无注意的必要。

K. M. T. ①问题决议案

一、自三月二十（日）事变至蒋介石反叛一直到武汉政府的右倾，国民党的几个小资产阶级领袖之投降而反叛革命，可以看出我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一天一天在那里恶化，由限制共产党而至于清党。这种两党关系的恶化，不是两党关系上的问题，其背景在于，资产阶级的脱离中国革命走入了反革命一途，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因犹疑而终被资产阶级利用反叛革命。因此两党关系的恶化是由革命高涨所必然发生之阶级分化的驱使。

二、民族革命的中途，资产阶级迟早必然背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脱离亦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不能委曲求全的顾忌两党的和善关系，只能为革命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反对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脱离。我们为民族革命的深入，主张阶级斗争；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巩固无产阶级与农民及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政策是民族革命中的唯一政策。现在不是联合战线的失败而是成功，因为反革命的，犹疑不定的分子都已离开此革命的联合战线。所以我们对联合战线的策略不能放弃，也不能退出国民党。

三、国民党现在已为资产阶级新旧军阀利用，占据在陕西的国民党，因为过去的基础就不稳固，所以被冯玉祥一道反动的命令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在资产阶级新旧军阀整个的利用国民党的潮流中，冯玉祥绝不肯抛弃国民党而不利用——何况他已因利用而得到了相当利益！现在冯玉祥已发动反动的假国民党员筹备陕西各级党部。我们应当秘密参加进去，第一步当注意下层群众，过去我们有一种只注意几个领袖或机关，忽略了下层群众的倾向，今后我们要取得左派群众，使这种左派党部，在我们的政纲之下，成为革命的斗争工具。因此要引导他们参加工农斗争，当使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农民加入并使国民党民主化，让革命的民众团体整个加入。如此，国民党才能成为真正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对右派分子应决然的排斥出党。

注：①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一号）*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各级党部！

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已于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开过了，经过的精神很好。自政变后，党的组织经过不少的打击，日在混乱的状态中，对一切工作莫有统一的与正确的策略，几乎是“亡党”的现象！早就决定召集扩大会议，因事实上的困难，直延到九月终才能实现。同时有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文件达到，更增加了这次会议的内容。这次大会后，党的策略党的组织，转入一个新的时期。所以这次会议含了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大会的文件可分为三类：

A. 八七会议文件：

- （一）国际决议案
- （二）告党员书
- （三）农民斗争决议案
- （四）职工运动决议案
- （五）组织问题决议案
- （六）中央公函

B. 大会报告：

- （一）政治报告
- （二）党务报告

C. 大会决议案

- （一）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
- （二）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 （三）组织问题决议案

- (四) 宣传问题决议案
- (五) 农民斗争决议案
- (六) 军事运动决议案
- (七) K. M. T. 工作决议案
- (八) 青年团工作决议案
- (九) 共进社进化社问题决议案

三、各市委县委区委均应即时按当地的政治环境，召集各式的会议，执行下列的任务：

- (一) 顺序讨论大会的重要文件
- (二) 改选执委，尽可能地参加农民分子
- (三) 制定当地工作计划（须具体）
- (四) 一切结果，即将经过详细报告省委

四、我们党的中央过去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中国革命于失败的地位，这诚然是我们党史上的一大污点；可是党这次能在国际的指示之下，举行空前的严格的批评，这是我们的特别精神，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这又不能不说是我们党史上光荣的一页，我们要永远继续这种与党内一切不良倾向奋斗的精神；所以各地对中央文件应择要讨论，尤其是告党员书，应在支部中详细分析，使每个党员明了这个重大的意义！

五、省委过去也犯了很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次会试中已严格纠正，各地对省委文件也应详细讨论，过去的报告及现在决议均不可忽略过去。

六、我们的批评，尽管严格，但不是对上级不信任，此后省委还是绝对服从中央的指导，各地还是绝对服从省委的指导。

七、凡是与中央及省委不同意见的（就这次决议案而言）同志，若是他负工作责任，便使之离开工作，若是一般同志，便使之离开党，绝勿顾忌！

省委常务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原标题为：省委通告第一号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

（第一号）（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

一、政治军事情形：（略）

二、我们的军队：（1）史可轩同志死后，由许模〔权〕中同志统率原有军队。可轩因过于大意以致丧命。许同志与该部也有历史关系，名望较史虽小但对党更为忠实。可轩死后，军队未受大损失，现在有兵约千人，好枪约八百余支，迫击炮四尊，战斗力与纪律均好于其他二军，现归冯子明，驻于临潼县河北之关山镇，与甄寿珊接近，内有同志约五十余人，近成立一党团，以杨晓初同志为书记，指导一切，我们给以积极的策略，使之在河北二军中做抗冯之活动。（2）陕北井部石旅之一营又二连^①约五百余人，枪支足数，同志约四五十人，营连长全为同志，派唐澍同志（黄埔学生，党的观念向好）在那边做指导工作。最近石旅长被井暗杀，井对我们那几部分久已处心积虑首谋解决。现在我们也给以积极的策略，使之抗井，先由陕北清涧退至宜川，再不得已即退至关中道之合阳等地投降高凤五（高与营长同志李象九及石旅长有同乡关系），再谋与许权中同志联合。（3）此外有任警南同志在李虎臣部第三师刘文伯处作参谋，有编一团长的希望。（4）魏野畴同志派往杨虎臣〔城〕处，已介绍河南省委。（5）甄寿珊处同志三十六人，有一营长，余多为下级军官□□□四五人，甄与我也有相当来往。

三、党务方面：（1）九月二十六日在西安秘密的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到会十五人，除对中央八七决议及对陕工作指示讨论而完全接受外，并按□□□□与原则纠正过去的错误，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成立决议案九个，现正依此新精神进行一切工作。（2）省委减少为九人（正七、补二），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亢维恪、刘继曾（秘书主任）、张金印（C.Y.书记），军事

缺，以上正式；张含辉、潘志励^②（西安市委书记），以上候补。常委三人，为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宣传）。农民部亢维恪同志入狱以来使农运甚受影响暂由张含辉代理，军事部无相当人才，暂由李子洲同志兼。因省委常委数同志多不能在西安市活动，所以成立西安市委，宣传由省委宣传兼。监委因无人事实上也无大必要在目前所以暂缺。陕北因井岳秀的压迫四师、四中二校被解散。陕北党的组织几全动摇，到处捉拿同志。（3）党员总数为一千六百八十一）。

四、C.Y. 工作——C.Y. 也于最近开一次扩大会议，团员一千九百余人，过去全未注意农村与城市的劳（动）青年，今后必须竭力使之纠正这个错误。

由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同志中之黄平同志，省委〔提议〕留陕工作，特附报告请批准。

注：①即石谦旅的李象九营、谢子长连。

②即潘自力。

*原标题为：给中央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 陕南工作大纲*（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二）陕南因交通关系，省委指导很不方便，所以暂时将陕南划为一个区域，设一特别委员会，在省委的督促之下，负组织陕南自县以下的各级党部与指导工作责任。

（三）特委以正式委员三人至五人，候补委员二人组织之。由省委决定刘○○^①同志为书记，易○○^②同志为组织，陈○○^③同志为宣传，三人成立主席团，平时执行并决定一切工作；全体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主席团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其委员由主席团自行决定（能有农民同志参加更好），呈报省委。特委所在地须力求适中。

（四）特委之下必要时可设农民运动委员会，调查讨论并计划农运工作交特委决定执行。农委书记以特委一人任之。特委须为省委报告关于农村调查，如大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武装土匪、红枪会、租税苛捐等情形，须十分详细。

（五）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须尽可能地参加农民同志。一切同志均须在党的决定之下工作。其有不努力工作，不执行决议或破坏秘密者，与〔予〕以极严格的处分（由察看到开除）；各级党部开除同志须报告特委批准，特委有决定开除同志之权，但须呈报省委。

（六）工作分城市与农村两方面；城市先以汉中安康等比较大的城市为中心取得教育机关领导学生群众在我们影响之下，参加革命斗争，注意文化运动，并组织手工业工人作经济斗争。农村先选择几处重要而便于开始斗争的区域，集中工作渐次扩大。但城市与农村两方面的工作要互相策应，不可各自为战。

（七）应本中央八七决议案及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的精神与原则工

作，要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特别在三个月内，要发展到三百同志，农民占三分之二。要注意农村之宣传与发展。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领导农民暴动，注意部分的深入，以及严厉的非常手段，铲除农村封建势力，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作军事破坏，煽惑军队夺取武装，抗捐抗税抗租，在此种斗争中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遇失败则上山抵抗。目前在陕南应特别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于无地的贫农”，“耕者有其田”，“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倒吴新田”，“抗捐抗税抗租”，“发展教育”等口号。

（八）对同志须注意秘密工作之训练与对党的初步认识，对于“怎样宣传”“怎样鼓动”“怎样做支书”“怎样做组长”“怎样作侦探”“怎样作交通员”“怎样开会”“怎样报告”“怎样介绍同志”等实际问题均须在工作中给以相当训练。

（九）要积极征收党费与特别捐，统由特委分配使用，但须呈报省委（预算与决算）。

（十）对 C. Y. 工作要特别督促帮助其在农村劳苦青年群众中发展，党团要有极密切的关系。

（十一）要打破汉南民众或同志的地域观念。

（十二）特委尽可能地与省委关系密切。

省委常委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注：①指刘甲三。

②指易厚庵。

③指陈宇霆。

*原标题为，陕南工作大纲。

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除（1）九·二五扩大会议组织决议案中已有具体规定者；（2）只须在决议案中提出原则，不须或不能有具体计划者；（3）日常工作不须特为计划者外，兹将三个月中特别应加注意，而且应另定详细的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的工作，计划如下：

1. 健全各级党部

A. 方法：

（一）帮助并督促各级党部，建设秘密机关。

（二）调查并考察同志能力，次第派有领导工作能力的同志补充或更换各级委员。

（三）于十二月底继续办高级党校两班，训练干部人才二十人，各赴各地，补充或更换各级委员。

（四）帮助并督促各市、县委，于适当时间，各办积极分子训练班两次以上，训练大量的下级干部人才，派负支书、干事、组长责任。

（五）尽量吸收有能力的工农同志，到各级党部负责，至三个月期满时，务使各级党部委员至少各有工农同志一人以上。

（六）在三个月内，除省委外，各级党部，皆分部改组一次，时间临时斟定。

B. 步骤：

（一）关中道各市、县委。

（二）陕北各县委及关中道各直辖区委与支部。

（三）陕南各地。

（四）甘肃各地。

2. 积极发展组织

现在陕甘两省，共有党员一千六百八十一人，兹规定在三个月中，发展至三倍以上，两省共计五千四百三十人。现在党员的成分，知识分子均占十分之七，农工仅占十分之三，在此三个月中要改变党的成分，使农工变为十分之七。各地发展数量表已见第十一通告，不另列。在十一月内，各须发展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十二月中，各须发展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如三个月期满后，各地发展成数有相差过远者，则该地负责同志应受严格处分。

3. 扩大关中道的组织范围

现在关中道有许多重要县分，尚无党的组织，甚至有些县分，尚有同志数人，可以发生〔展〕组织，而因种种问题，竟然亦无组织。兹预定在十一月中，恢复户县组织，发生〔展〕周至、朝邑、永寿、澄县四县的组织。在十二月中，恢复咸阳组织，并在同州、同官、长武、合阳发生〔展〕组织。明年一月中，恢复潼关组织，并在彬县、眉县、耀县、白水、麟游五县发生〔展〕组织。户县、咸阳由长安县委负责；眉县由岐山县委负责；永寿、彬县由乾县县委负责，同官、耀县由三原县委负责；白水由蒲城区委负责；同州由固市县委负责；潼关由华县县委负责；朝邑、澄县、合阳由省委直接负责。长武由三原督促旬邑区委负责。

4. 变更关中道各县组织

十二月中，将蓝田区委改为县委，明年一月中将周至支部改为区委，蒲城区委改为县委，白水、澄县、合阳皆划归蒲城管辖，在旬邑、长武、彬县、淳化中成立一县委，指导四县工作。

5. 整顿陕南、陕北、甘肃三地工作

为指导灵敏、工作便利计，在陕南、陕北两地各设特委，由三人至五人组织之。在陕南现已有三十余人尚无任何组织，故于十一月内，先成立陕南特委，由特委负责，在陕南各地发生〔展〕组织，至明年一月底须成立县委两处。陕北过去有县委两处，同志三百六十余人。自陕北事变发生后，延安县委无形解散，至今年无人负责。绥德县委的组织虽尚存在，而工作过于消沉。在十一月内先恢复延安县委，健全绥德县委，十二月中派得力同志一二人赴陕北，组织

陕北特委，指导该区域内工作。在明年一月，须改榆林为县委。在甘肃现只平凉组织尚〔未〕消灭，但与省委亦无信息来往，兰州虽有同志数人，因负责同志离甘时，无妥善的安顿，过陕时又无详细的报告，等于解散。宁夏的同志已全离甘。现在规定甘肃以平凉、宁夏、兰州三处作中心，于十一月内派一积极同志，先整顿平凉工作，然后由平凉赴宁夏，即负宁夏工作责任。于十二月内，在宁夏发生〔展〕组织，明年一月内改宁夏为区委。在十二月内派得力同志一人，先考察平凉工作，然后由平凉赴兰州，整顿兰州工作。至明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尽可能地改平凉、兰州为县委，以备于第六次大会时，将甘肃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成立正式省委。

6. 定期派巡视员考察各地工作

在关中道，省委每月派得力同志考察各市、县委及直辖区支工作一次，巡视员并须负指导及帮助各地工作责任。巡视员每到一地，须住三日，但不得住过五日。至少须召集该地全体委员会一次，除报告党务及政治状况外，并须具体的详志〔细〕的指导该地实际工作。尽可能地召集该地扩大委员会、负责同志会，并出席各种委员会及支部小组会议。各地党部须为巡视员作书面报告，巡视员除将各地的报告汇交省委外，并须为省委每地作一书面报告，报告考察的经过及该地各种情形。最应注意的，须将自己所观察到该地工作的优劣特点，如何纠正，须特详为报告。各市、县委亦须定期派人考察所属各级党部的工作，每月至少一次。至于陕南、陕北及甘肃，则斟酌情形，尽可能地派同志考察一次。

7. 建设交通机关

除省委总交通处已成立外，在十一月内成立东路交通局，十二月内成立西路、河北及陕北三交通局，办理各该区域内各市、县委、直辖区委及支部与省委的一切交通。其他不属于各局的地方及各军支的交通由总交通处负责。陕南及甘肃两地暂不设交通局亦由省委总交通处负责，设法输送一切文件。关中道各市、县委一律限十一月内各派定专负责同志，计划并办理各市县的交通事宜。陕北各县委及省委直辖区支，限于十二月内派定专负责同志，计划并办各党部的交通事宜。陕南及甘肃各地限于明年一月内须有专人负责办理交通事务。各

市、县委须各尽可能的建设秘密交通机关名为该县交通处，设主任一人，交通员数人。区委设交通员一人，再设交通干事数人。支部则设交通干事一人或三人。支分部亦须设交通一人，在此三个月中，尽力使陕甘两省所有党的组织以及党员皆须连缀在一个灵活的党的交通网内。并为各县绘发略图，令将该县有组织的地方以及相距的里数详细填绘，以备汇齐后，制一详细的交通地图。省委交通系总图已见第十二号通告，不另赘。

8. 注意秘密工作

A. 各市、县委皆须建立机关，除常〔务〕委员外，其他同志一概不能让到机关中来。机关中尽可能地要有女同志，或负责同志的女人居住，使之家庭化，以免敌人之怀疑。或租赁独院住宅，或借用灰色同志之住宅，由各市、县委斟酌该地情形自定之。文件应另寄藏在别的妥善地方，不准存放机关中。

B. 一切来往信札一律用秘写，或用口传。

C. 一切文件的保存与输送皆须绝对的秘密。

D. 各级负责同志应确实研究秘密工作常识，并择较普通而为一般同志所应知者，设法为正式同志作有计划有系统的报告，使同志都有相当的秘密工作常识。省委应常供给各级负责同志以秘密工作的具体方法，除不时地发零碎的通告外，并须编为有系统的小册子，以补前半年所发的小册子之未详尽处。

E. 严格执行秘密纪律，凡犯泄露秘密的纪律，不论是有意无意，有关重要与否，最低限须予以严厉的警告，情形较重者的开除。

田友明^①

李竹梅^②

注：①系中共陕西省委代号。

②系共青团陕西省委代号。

*本件为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制定的文件。

中央致陕西省委公函——陕字第七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陕西省委：

久未得你们的报告，不知你们的工作情形如何，挂念实深。近陈家珍同志来，作了一书面报告，然内容奄无，只能说是一点很零碎的消息，惟从这些零碎的消息中，中央亦可提出数点希望你们注意：

一、陕西民众素来非常痛苦，加以最近冯玉祥在陕大派其捐，更增加了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痛苦，农民之要求从地主封建军阀豪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无可疑义的。可惜过去因为党的机会主义没有去发动和领导农民斗争，所以过去农村中的阶级冲突尚不十分明显而剧烈，目前你们应马上注意到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从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口号之下，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大杀豪绅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一切乡村政权交农民协会，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拿到政权。对重要城市的手工业工人，亦应注意领导其斗争。

二、过去我们的党从中央一直到支部整个的机会主义化，实在不能担负中国目前的重大任务，因此改造各级（即支部也应改组）党部是全国党部的重要工作，陕西省委应特别注意此工作，立即开始实行改组各级党部。对于工作不积极观点不正确的人，要坚决地取消其领导地位，甚至清洗出党，提拔在斗争中表现得积极的分子——特别是贫农分子来参加党和群众中的领导工作。党的基础应该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党成为斗争的党，才能担负目前土地革命的任务，同时省委应采取巡视的方法，派专人到下级党部去巡视，实地指导工作。

三、陕西同志多对于右任存有多个幻想，这自然还是过去机会主义的遗毒，实则于右任早已离开革命的阵线，早已为土地革命的高潮惊退，现在甚至在那

里咒骂土地革命。我们对于这种分子，还有何幻想之可能！我们坚决地认为：谁能站在土地革命的浪涛中，谁便是革命的同志。陕西省委不但本身，而且要向一般同志纠正对于的幻想，指出我们的出路不是在于右任身上找，而是在领导工农贫民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中去找。

四、可轩的队伍留在冯子明的部下是没有好的结果的，无论冯子明的态度如何其结果必被冯玉祥或刘〔冯〕子明所解决。目前这部分队伍的出路是要在党的农民暴动政策之下，来帮助发动发展土地革命成为农民暴动的付力，如果这部分力量仅仅以很灰色的态度存在宁冯子明部下，与普通军队丝毫没有差别，则又有何用处。望你们善用这部分力量。

五、中央特训令陕西省委于接此信后，马上作一各种工作的详细的报告和工作计划交来中央讨论以便指示，如再延不交报告，中央则停止发给经费。请勿忽视！

*原标题为：公函——陕字第七号。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2）陕北的倒戈运动：陕北井岳秀刺杀石谦（旅长）。石部一营三连同志于十月十五日^①在清涧起义，退至宜川，号召反井，□□□^②同志任旅长，其他新至三人任营长，共约千人。在此积极政策之下（省委决定的），神木府谷之高自〔志〕清（井部健将旅长）起而反井，与□^③互通声气。井旅之康营^④抵抗○^⑤军，亦被缴械。延安高双成（师长）向宜川进攻，初败，后来又增加兵力，李乃追〔退〕至韩城，与杨虎城部之王保民联合，徐图发展，此亦为预备之计划。在最近陕北之倒井运动，还可进行，必要时我们决定在陕北即组织革命委员会，运用更积极的政策，若能打倒大地主，铲除豪绅，深入民众，虽失败也不要紧。

注：①清涧起义的时间，考定应为十月十二日。

②③⑤指李象九。

④康子祥营原为石谦旅第一营。

*原标题为：陕西省委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 政治报告*（第二次）（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我们总括起来说：现在全国已陷入于整个的反动局面之下；南京派（蒋介石与西山会议派）可代表极反动的亲日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受帝国主义者培植，勾结封建阶级，使中国在普鲁士式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展之可能，此种势力我们不可忽视，中国新的革命之重新发展，必要在反对此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军阀斗争中才有成功的可能。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汪精卫等根本与南京派走的同一道路，不过因为利害的冲突，不能一致，这也是他们的天性使然。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帝国主义者协制与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下，也不是很容易建立巩固起来。同时我们在湘鄂等地农民暴动的计划虽然莫有完全成功；因广东的军事失败，虽然恢复 K. M. T. 左派的政策无望，而全国的革命环境与革命主观力量并未消失，我们的革命运动也不是完全建筑在一种军事行动上。今后是否就用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方式，现在还莫有得到中央的决定；但我们总还是要在打倒一切新旧军阀的工作中努力则是无疑必要的。

在陕西反冯的军事虽是暂时的失败，但我们的反冯工作，在军事方面利用陕军，只是政策的一部分，并不完全是靠这种军事行动，此后，还是继续地努力反冯，否则便是未洗去忽视民众利用军阀的因袭的错误！

西北上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但西北上农民非常落后，要在短时间内就能组织起农民，引导之以积极的政治斗争，也是一种幻想；而且党在这种环境中也是同样的落后，短时间的发展也决不能成强有力的斗争的党，同志们应下长期斗争的决心，决不存任何幻想，幻想容易使我们堕落灰心！但我们也不可尽讳之于环境，不可存那种宿命论的心理，我们要在斗争中增加我们主观的力量，我们要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事件中努力工作，促进民众之觉悟与党的发展。这

次反冯运动中，各地方并未按“九二九”^①与“八七”会议的精神工作，机会主义的倾向，仍未洗除，这是十分危险的错误！如三原在云阳的工作中，仍是主张先养自己的力量，再后铲除豪绅，结果豪绅复活，摧残我们，民众认我们多无所为！对反动分子不能予以打击，致失时机。西安市的支部几乎没有行动，党费也收不起来！渭南对反冯宣言，多日不敢张贴。东路冯的驻军非常稀少，而渭华县委未做一点军事的破坏工作。故〔固〕市一带的农民曾有反刘汝明的酝酿，故〔固〕市县委竟然不知。长安居一个政治的中心，县委除过报告每年农村中照例有的算帐斗争外，别无工作！军队中的同志竟然见战争而逃了很多！“八七”与“九二五”的精神并未达到支部党员群众，只是干部同志空喊，这样怎能得到反冯的胜利！今后我们要使党员群众活动起来深入民众，除去一切虚浮的旧习，“准备”总暴动！

最后我们要提起同志们对军事训练的注意！我们党在此时的革命工作中，急需武装；在军事行动中，在农民暴动中，都显出我们党缺乏军事指导的人才与经验，是给予我们以很严重的教训！我们要高喊：

共产党武装起来！

共产党员到军队中去！

省委常务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注意：此报告要各支部讨论，各市县委讨论后，要为省委来报告，说明讨论经过及其意见。）

注：①应为九·二五或九·二六。

*这是陕西省委常委会提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次全会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经过及决议案*（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一）日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到会人数：五人，缺席者三人，张英侠^①因赴蓝田工作，未及召集，亢^②入狱，张雄甫^③不知因何故未到。因过半数即开会。

（三）主席：省委书记。

（四）记录：省委秘书长。

（五）会议时间：十一小时——由三十日晚七时半至次早六时半。

（六）议事日程：

I、常委会向省委报告；

II、批评；

III、讨论：

（1）政治问题；

（2）农民运动；

（3）军事运动；

（4）学生运动；

（5）健全省委；

（6）常委工作；

（7）各地工作；

（8）C. Y. 工作；

（9）寒假工作。

IV、临时动议；

V、闭会。

(七) 常委会报告 (江代表报告^④) :

今天的报告分为两部分: (A) 政治报告; (B) 党务报告。

政治报告分为两点:

(A) 全国以及西北目前的趋势;

(B) 两个月来经过的几种政治运动及党应付的策略。中国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 在现在看来,

资产阶级虽未完全胜利, 而无产阶级确是处于暂时的失败地位! 自蒋介石背叛革命后, 组织了南京政府, 资产阶级即得到了一步胜利; 后来武汉做恢复党权运动, 汪^⑤又回国, 以创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新的政权形式, 促进中国革命, 反对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又渐挽回了过去的失败; 又因我们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对小资产阶级没有正确的政策去影响, 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们叛变了, 投降南京政府, 资产阶级又得到了一步胜利; 那时在我们党的新政策之下, 有叶贺之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之建立, 以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与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新的政权形式, 实行土地革命, 反对南京及武汉的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军阀, 但现在广东军事失败了, 革命委员会解体了, 我们在湘、邵、粤、赣四省的大暴动至多只是部分的胜利, 没有总的成功, 被残杀的革命分子及工农不下十数万, 这岂非资产阶级又得到一步的胜利吗? 现在我们要考察分析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两方面的力量, 决定斗争的形势, 就是要认识中国革命的前途到目前有什么变化? 现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怎样? 无产阶级的政党 (我们) 应该取什么政策? 是我们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陕西自从冯玉祥取得大荔径原, 打破二军的反冯运动, 即就是他的剥削领域——政治的及军事的——扩大, 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今后我们怎样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反冯运动? 九·二五扩大会议的反冯决议未曾努力执行, 今后应怎样纠正? 又是我们应讨论的问题之一。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新的政治形势, 确定党的策略, 巩固同志的观念, 努力工作。

当泾原战事开始之前后, 省委即本九·二五决议案的精神及原则, 利用二军之反冯动作, 推进我们的反冯运动。除省委发表宣言三四种外, 如固市、三原均曾单独作文字宣传; 我们能指挥或能影响的军队则令积极主动或参加反冯的

军事行动；在民众中只三原方面曾做民团等工作，至于抢夺枪械破坏军事交通，恢复农协，部分暴动，各地均未实行。在二军失败后，同志们甚至认〔为〕反冯工作已无望，仍不脱忽视民众与重视利用军阀互斗的因袭的错误，似乎反冯就全靠二军！陕北之李部^⑥自石谦被刺后，我们即运用积极政策使之反井^⑦，在神、府一带之高自卿〔志清〕也曾受此影响而表示反井。不过我们自己的力量薄弱，不能独树一帜。在积极的政策之下仍不能取退守的行动，现在此部已退至韩城。对于〇旅^⑧今后的行动，因为一则本身力量薄弱，二则全国我们的军事已受一挫折，陕西这一小部分不能够单独积极行动，须与全国相适应；所以在斗争的政策之下，一方面又须注意安全的退路。本此原则，今后的出路北去较妥（秘密）。

党务报告分为三点：

- （A）两月来之总现象；
- （B）组织概况；
- （C）各项工作。

两月来之总现象，在好的方面很少，只是秘密斗争机关较前组织巩固（机关组织情形略），省委对各地工作的书面指导较多。不好的方面很多：（1）“八七”及“九二五”的精神莫有达于下层党员群众，所以只是干部同志空喊，党员群众并未行动起来，即干部同志也可以说未完全了解八七精神。这一类的例子很多，如反冯运动各地除三原几乎完全莫有行动，而三原的行动还是本着机会主义的精神去做！C. Y. 省委工作者尽是党的同志，在九二五以后仍未能应用八七精神工作，党也未与〔予〕以充分的指导，直待 C. Y. 中央文件到来，十一月二十八日 C. Y. 省委第二次会议始严重的更正机会主义的错误！（2）党非行动的党，有些党部及党员，误解九二五的精神及民权集中制，不在政策上讨论，只是有意地抗命，致陷省委于死坑里，不能行动，耽误了许多工作；还有许多工作同志，都是作了教书匠或小绅士、小政客，以党的工〔作〕为副业，不是革命的职业家，如固市、岐山、长安、临潼、富平等地颇多此种现象，因此党的工作以外部工作及个人地位升降为转移，党还不是等于一个死党？（3）党能

影响的群众组织莫有统计，各地报告不注意此点，可见党在群众中的力量简直等于零，还说什么群众的党，不过是些共产主义者的集团罢了！（4）党员数量之发展很少，两月来只发展百余人。（5）党的基础仍建立在知识分子上边，成分一点没有改变！（6）各地工作不切实，报告虚浮，不是说我们怎有力量，便是空口喊暴动，与实际性不和，简直是对党欺骗，事实甚多；对省委文件很少讨论，省委的通告不见什么反应；对文件不了解，即不执行！（7）省委组织仍不健全，省委短一人，一人入狱，未出军事部及农民部无专人负责。（8）常委工作紊乱，又未实际考察各地工作。（9）C. Y. 仍不注意秘密纪律，过去对党的政策不切实讨论，有些地方在发展上儿童化，对军队中工作未做，总之工作还未深入。

党的困难：（1）得不到中央的丝毫指导，我们说对中央的政策可以讨论，不可盲从，但不是完全不要中央的指导，便可以单独行动，因此省委在指导工作中常感困难。（2）政治的消息及材料说不上少，简直没有，我们要决定大的政策，既无中央指示，又得不到国际及国内的政治消息及材料，如何能行？（3）干部人才缺乏，陕北及许多工作如巡视等因无人而搁置。（4）各地的正确报告很少，省委不能作决定政策的根据。（5）经济困难，不能量出为入；不能因工作之扩大而增加经费，只是因经济而缩小工作，对农运简直莫有经费！

组织概况：

类别 \ 程度		九月以前	现在	增加	减少	备考
党员数量		1681	1820	139 ^③	○	
党员成分	工人	82	○	○	82	
	农人	518	544	145 ^④	○	十月份统计
	军人	112	187	75	○	
	知识	1051	1089	38	○	内有 138 人不明
	其他	185	○	○	185	

类别		程度	九月以前	现在	增加	减少	备考
性别	女		58	28	○	30	
	男		1623	1792	169	○	
党	市委		1	1	○	○	
	县委		7	8	1	○	
	区委		16	18	2	○	
部	支	军支	○	4	4	○	
	部	其他	153	161	8	○	
有组织的 地方	市		1	1	○	○	
	县		33	41	8	○	
群众的组织			○	○	○	○	
委员会			?	(1) 陕南特别委员会 (2) 特别委员会 (3) 学委			

说到各部的工作：农民部、宣传部，无工作！组织部多文字的工作！军事部无一般的军事工作。整个的工作仍是常委三人负责，往往是不能具体的有准备的讨论政策指导工作，而只是临时的零碎的应付问题，这如何能使工作起劲？

报告已完，请省委全体会议批评！

(八) 批评：按下列三点批评：

(A) 审查机会主义的倾向是否还存在？

(B) 省委运用政策有无错误？

(C) 常委工作成绩。

综合之有下列几点结论：

(A) 在九二五扩大会议时，只知道党的指导机关（省委）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严加纠正；在新的工作原则下，经过两月的工作，证明了省委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减少，而下级党部，以及下层党员群众，则保存了浓厚的机会主义的倾向，非常普遍！

(B) 政策能本八七及九二五的精神，无错误；但无系统的计划与详细的讨论，以实现党的全部决议，只是临时应付，因此政策常不甚确定！

(C) 常委工作无成绩，机会主义只是表面减少，因为：

(1) 文字的指导较多，而不能实际去考察各地工作；

(2) 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的方向虽是纠正，但未下决心与之奋斗；只是笼统的应付的文字的纠正，不能在各个斗争中去纠正，不能按各地客观事实去纠正，就是不能按症下药！

(3) 党的秘密机关又〔已〕建立，但不能成为斗争的秘密机关；

(4) 常委指导工作不灵活、不敏捷，就是未尽最大限度去努力工作！

(5) 常委对工作事先不能准备，临事不详加讨论，事后又不回顾，只是应付目前，就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不撞不响，这便是不行动；

(6) 常委召集省委全体会议太少。

对常委的批评，常委完全接受，并愿努力纠正！

(九) 讨论：

(A) 政治问题：在扩大会议以后不久，省委即接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及其策略决议案》，已印发各地讨论；但省委还未定出实行方法，现在要将政治报告中的两个问题与此决议案，合并讨论。讨论时按下列几点：

(1) 我们过去失败的经验及原因？

(2) 党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建立工农兵独裁制一政策是否可还适用？中国革命的前途有无变化？

(3) 怎样建立或宣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4) 今后应怎样做反冯运动及陕西一般的政治工作？讨论的结论：

(a) 在党的新政策实行之后，充分地证明了过去机会主义为害之深，广东军事的失败及农民暴动中均证明了我们党军事的经验与指导能力之缺乏；陕西省委未曾下决心与机会主义去奋斗，以致数月来工作还莫有成绩。

(b) 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任务及其策略决议案中对中国革命之分析，我们认为正确；但因广东军事之失败，湘鄂等省农民暴动之未成功，无产阶级遭了暂时的失败，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已成疑问，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在目前无论

是全国与陕西均不能实行，只有先实行宣传的准备工作。但国际的形势并未变化，资产阶级军阀的内部仍有新的冲突，工农的革命情绪也并未消失，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还在很剧烈的各争取其革命的前途，根本上无甚变化。不过无产阶级若放弃了斗争，则普鲁士式资本主义前途便要胜利！

(c) 苏维埃在中国革命的现状下尚莫有需要，而党的主观方面又未做准备功夫，不但马上实行组织苏维埃不可能，即宣传也非马上便可收效，一方面要作文字的解释与宣传使同志及民众明了苏维埃的意义；一方面更在实际上运用最民权主义制度于各种革命的民众组织中，实现苏维埃的精神。

(d) 关于陕西的工作，我们要按下列几点讨论：

(1) 估量陕西民众及党的实在力量使同志有正确的认识；

(2) 定出实际斗争的计划，下长期斗争的决心。

当中央决定党的政策时，估量客观的形势常常是把陕西的农民放在重要的地位，中央以为陕西广大的农民群众，富于斗争的革命的情绪，易于组织革命的暴动，即在陕西工作的同志也常听见有此种说话。我们经过一年的工作，党和团有同志三四千人，尤其是九二五扩大会议以后经过两个月的工作，我们考察了工作成绩之恶劣，使我们对民众及党的力量便不能不重新估量，确定同志的认识；不然，工作便会日见虚夸！西北上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事实，农民受军阀的剥削不减于其他省份也是事实，但西北上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济落后，所以农民也是比较落后（说十分落后是错误的），大部分缺乏反抗性，以陕北西路为最甚，民间常有一句话说是只要能安居乐业，重捐重税都是愿意的！或是迷信神团、红枪会，更减少其战斗力；过去户县曾有数万神团的组织，被何经纬一枪，打得落花流水！华阴的暴动竟会被一个小小知事用手腕镇压下去！自扩大会议以后，不用说总暴动而部分的暴动在秋收期间，甚至在有党的组织的地方，除过几处算帐反对乡约的小斗争外，简直看不见！大荔经过麻允文与刘汝明之极端压迫，莫有反抗。陕西农民的力量并不如中央所估量的与同志口头上说的那么利〔厉〕害，这种过分的估量，必定要影响到党的政策不能正确，同志的工作不能切实。我们不能〔否〕认陕西农民群众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绝对否认不经过党的领导与斗争，广大的农民群众会成革命的主力军，我

们要积极地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准备总暴动，暴动是空口说不得的，也不是一说便可成功的！党的力量更是微弱，在冯背叛革命后，党员减少了五六百人，扩大会议以后，在反冯反井运动中，军队中同志见战争即跑；东西大路上不见有一点破坏军事交通等动作；党至今还是建立在知识分子与教育界；农民中一点基础莫有，有些农民自动的斗争，党一点作用莫有；陕南陕北多大地主，陕北组织受井压迫后几乎消灭，陕南还莫有组织；现在只是些散立的支部，所谓支部不过是些共产主义者的集合体，并非是在群众中战斗的核心，西安市学潮中各支部不能行动，三原一有事变，同志便哗然而散，回家避难！自指导机关至下层党员群众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仍未洗掉！我们今后不要只在党员的数量上估量党的力量，而要注意在斗争中培植党的力量。特别是党的机会主义过去损害了民众及党的斗争力量，使民众及党不惟无发展，而且几乎危及生命，这也是党的幼稚，以后我们要发展民众及党的力量，最要注意的是与机会主义斗争！

我们认识了民众及我们自己的真正力量，便自然能够切实的决定出具体的斗争计划，下长期斗争的决心，洗掉一切虚浮的毛病与幻想！

反冯并不因二军失败而中止，也不因二军失败而变更策略，仍是继续在民众方面，做抗捐抗税抗粮……等工作，打破冯的农村封建基础，才是根本办法。

对农协用各种方式恢复，使成农村政治及斗争中心；对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始以全力宣传，并运用最民权的方式于各种民众组织，以为实行苏维埃之初步。

决议：

(a) 成立一《两月来之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

(b) 出专册宣传苏维埃。

(B) 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学生运动决议：(a) “九二五”扩大会议之原则并未变更，应努力实现；(b) 党团两省〔委〕合出一刊物，以作青年思想斗争的工具，推进学生群众之阶级分化。

(C) 健全省委：数月来工作之不起劲，省委不健全为重大原因，扩大会议

时，决定九个常委^⑩，内中一个入狱未出，一个因无相当人可以补充，事实上只有七人，工作不敷分配，农民部莫有，军事部由组织部兼，也不健全，决议：

(a) 扩充省委人数（由九人至十一人，增加候补二人，补充一人），即报告中央请求批准；

(b) 增加之二人中至少要有一农民同志（决定增加苏○○^⑪，其他二人未定）；

(c) 军事部须有专人负责（决定苏○○）^⑬

(d) 建立农民部（决定潘○○）^⑭；

(e) 各部建立时，即组织各部委员会（宣委李蒲刘，组委李杜徐，军委苏潘李，农委潘苏〈农〉）^⑮，各委员会须在常委开会之前一二日分别开会讨论各部问题，以具体的方案提出常委会；

(f) 省委全体会每月至少一次；

(g) 常委设一技术书记（决定徐○○）

(h) 以蒲○○^⑰为西〔安〕市委书记。

(D) 常委工作，决议：(a) 常委也须健全，原为三人，现增为五人，并报告中央请求批准；(b) 常委以后须注意讨论政策与实际斗争问题，零碎问题可由各部委员会讨论，以具体的方案提出常委审查通过，不必多费时间；(c) 每周开会两次，一次解决普通问题，只召集过半数常委即可开会。

(E) 各地工作，决议：（略）

各级党部注意！

此报告及决议案到后，由支部至县委必须详细讨论，至多七日内讨论完结；由县委作一结论，十日内报告省委。若这样的讨论，并能提出具体的意见，省委方能收集体指导之效，这才是党内真正的民权精神！

还有以前所发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及其策略决议案》也须将讨论结果即时寄来。

关于此种文件之讨论，非常重要，不是专要同志把文章研究一遍，而是要

讨论出具体的办法，如“怎样宣传苏维埃”？“怎样组织暴动”？“怎样恢复农协”？“怎样镇压反革命”？“怎样反冯”？“怎样使党发展”？等……。

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注：①即张含辉。

②即亢维恪。

③即张金印。

④江指何人待考。

⑤即汪精卫。

⑥指由共产党员李象九掌握的一支武装，属石谦部。

⑦即井岳秀。

⑧即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许旅”。

⑨应为“139”。

⑩应为“26”。

⑪应为九名省委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⑫⑬即苏士杰。

⑭即潘自力。

⑮“宣委”为：李子健、蒲克敏、刘继曾；“组委”为：李子洲、杜振庭，徐梦周；“军委”为：苏士杰、潘自力，李子洲；“农委”为：潘自力、苏士杰等。

⑯即徐梦周。

⑰即蒲克敏。

*九·二六会议后，省委即接到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为了贯彻这一文件并检查九·二六会议的执行情况，省委召开了这次全会。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及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时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七时至九时

二，到会人数：六人三，议程：

- (一) 对《两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之讨论审查；
- (二) K. M. T. 问题讨论；
- (三) 增加省委问题；
- (四) 其他。

四，对于《两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之讨论及修改的结论：

- (A) 常委在两月来之工作有相当努力与成绩，有些地方党部如华县、渭南，也有相当进步，不可一概抹杀；
- (B) 对于不好处应指出事实，不可作过火的笼统地批评，最近常委在政治的观点上有不正确的几点，应指出；
- (C) 对广东失败说的分量太轻；
- (D) 说中国革命并未失败也说得太重，可以说暂时失败或部分失败！
- (E) 接受中央政治决议案太笼统，有些已不适用，即应改变，不能还来接受，如 K. M. T.、暴动等问题；
- (F) 对农民落后，党落后，狂热的革命三点应改为积极的；
- (G) 政治决议案的分析，应比较的有些长久性，对第三段内许多临时零碎的政治消息可以删去。

五，K. M. T. 问题：

- (A) 先讨论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九日会疼《关于左派 K. M. T. 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为：

(B) 在陕西左派 K. M. T. 之不能复兴，与中央所分析者同，决定成立一《最近 K. M. T. 问题决议案》，按中央所定原则，并须切合陕西的实际情形；

(C) 关于苏维埃口号问题，认为在陕西还是“仅是宣传时期”，而不能马上建立，这与中央的决议并不冲突。

六，省委人数：上次决定增加候补二人，一知识分子，一农民，均未定人。结果决定此二人全增加为农民，不增加知识分子。即通知各县委报告农民同志中之堪任省委者，以备提拔。

七，K. M. T. 省代表大会应付策略，结果决定：

(A) 同志代表中成立党团；

(B) 使其大会决议案中须含最大限度之反动成分（除过反 C. P. ），如对工农学生等之压迫剥削，使之成为冯总司令而牺牲其利益，拥护省政府的剥削政策，拥护冯司令之拔壮丁，拥护基督教、佛教、军粮券等；

(C) 使陕西 K. M. T. 成为冯玉祥的国民党，不可多提及 K. M. T. 中央，处处勿忘“我冯总司令”等字样在决议案中；

(D) 使其将来新执行委员必须官僚化；使各派均参加，互相冲突；我们至少参加二人至三人，但对张○○、张○○^①则绝对不选举。

注：①即张文穆、张锋伯，另一张不详。

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

——第二次省委全体会议决议

(一)

“九二五”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中，采纳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严格的纠正了过去省委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定出具体的积极的工作方针。现在我们回顾这两个月以来的实际工作，觉得由省委以至各级党部，对“八七”精神未能完全了解，对“九二五”扩大会议决议案，特别是农民斗争决议案，未能积极的执行；因此，不维（唯）省委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是表面的文字

的纠正，未能以十分的决心在斗争中与此恶倾向作殊死的奋斗，而大部分党部与多数党员群众更保存着意外浓厚的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是不敢斗争，就是在斗争中表示懦弱。但省委与各级党部的工作自然比较的也有些进步，我们要分别的指出，因为我们批评的目的为求进步，党的进步永远是莫有止境，莫有满足的一天，当然不能笼统的抹煞一切！

两个月来党员数量之发展不及百分之八；党所能影响的群众组织能统计者很少；这样，党怎能群众化？还非一群共产主义者的集团吗？农民同志仅占百分之三十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的〔分〕子还占很大的成分，党还是建筑在动摇的基础上。有些党部不能本着党内真正民权主义的精神，讨论党的政策，使党收集体指导之效；还有些教书匠、绅士化的工作同志，使党的工作随着外部工作和个人地位的变迁而转移；这样，党便很难行动了！大多数党部仍未提拔农民同志做内部工作；有些党部仍建立在学校中，未能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基础！无怪乎在斗争中有些支部不能行动，有些党员表现动摇与懦弱，不是临阵脱逃，便是叛党而向敌求荣，甚至有些作校长教员的同志恐吓同志、压迫学生，向敌人表示他们非赤非共！失遗文件的事实层出不穷，可证明对秘密纪律之不注意！秘密机关缺少斗争作用！大部分党员对于党费不能按章按时的缴纳，对党的责任心的薄弱于此可见！有些党部及同志只是在文字上讲话中空喊暴动，以示积极，而不在实际行动中组织部分的暴动，这又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的表现！

常务委员会对工作的指导上确是努力，但莫有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各机关组织比较健全，工作也比较上了轨道。在政策的运用上也很正确；但在最近的政治报告上又表现出机会主义的犹豫〔豫〕与动摇！农民部，宣传部少工作；军事部、组织部因一人兼做而不免堆积。……总之，全部工作均有无系统与临时应付的表现！但是这个也有些客观原因，就是省委不健全，人少而工作不敷分配。

各地工作中：岐山县委的工作比较沉寂，平时少报告，农运根本莫用。乾、礼两区委同志尚能努力，不过缺少工作方法，无报告故省委也小指导。三原县委平时报告多，是特好的现象，不过在云阳工作中机会主义的表现太浓厚。各县支部工作也不起劲，五一县委工作很不切实，平时简直无报告，农运未深入

贫农中去，工作同志以全力应付了学校工作，对省委决议漠视！因此与省委关系很不密切。华县同志较努力，发展组织，农运及土匪运动^①均稍有成绩；不过，县委不很健全，平时报告也少！对同志的政治训练不好，竟有拥护宁汉合作的同志，更有以中央及省委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对自己错误宽宥的同志。渭南县委的十月份报告在十二月份还不能交来，平时报告也很少，而且说的简单，省委对其工作很不明了；不过在对 K. M. T. 及对付反动派的策略上看来，县委应付的方法与能力还很好，在发展上听得别方面的报告知道也不坏。长安县委的工作各方面都不好，不过经过省委批评后，还能积极的改正，在工作中表示接受，表现较好了。蓝田区委一字的报告未见！陕北绥延两县委很少报告，省委也未去注意，实际情形不明。军校中以高支较好，组织也较健全。统观各地工作其努力的程度之次序为——华县、渭南、三原、长安、岐山、五一。

机会主义过去致中国革命于失败，几乎危害了党的生命，我们若不能以全力去与之奋斗，任其仍旧这样的延长下去，则中国革命不会成功，党的基础不会巩固，必然还要发生更厉害的危急〔机〕，我们此后要在工作中积极与之奋斗！

(二)

自革命委员会在广东失败，湘鄂赣三省农民大暴动的计划受一打击，不能实现，无产阶级确是处于暂时的失败地位，中国革命也确是暂时的受一挫折。蒋介石由日回国，带回日本的礼物，以图死灰复燃；汪精卫等终于降蒋，最近由粤到沪协商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问题，唐生智失败，蒋介石少了一个敌人；李宗仁等小军阀得了武汉地盘，南京军阀内部的冲突也可以暂时的稍微和缓下去，冯玉祥为图个人之发展也必然地要暂时的惟蒋之马首是瞻；——所以蒋介石在目前很想把各方面放在他个人的卵翼之下成立其军阀专政，努力其普鲁士式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前途。但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国革命的两个前途是否有变，是目前我们要分析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以为资产阶级军阀在目前确是处于胜利的地位；但是此种胜利是极不巩固的，暂时的。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并非已根本的镇压下去，在最近的将

来仍要高涨起来；所以我们很坚决地认为中国革命的两个前途，仍是并存，并无若何根本的变化，而且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这一阶段中的正确策略的斗争中，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终是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正是这两个前途斗争的更剧烈更严重的关键！因为广东的失败，只是部分的失败，而革命军事的力量并未完全消灭；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的势力因新旧军阀及反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不断的压迫与剥削使他们的革命情绪还是日益高涨，革命的行动日益积极。在反动势力方面，表面上只得到一点很不稳定的暂时胜利；因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根本上互相冲突，而不能有久长的妥协。奉张鲁张^②之与南京、武汉、冯阎，各方不能有任何较久的合作形式发生，自不待说，即同在腐化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的冯阎冲突，冯蒋冲突，蒋唐冲突，蒋与西山会派的冲突，不会有一日的息止与调解。现在唐虽失败，而唐之势力还有些存在，唐虽将武汉放弃了，但紧接着就是武汉地盘之争夺问题。方振武、李宗仁、程潜及蒋冯各系势力，以及四川的吴佩孚、杨森等那一方面不想占据此筹款制械的天府、军事重镇？张发奎在广东又将素与蒋有关的李济琛势力解决，取而自代。这样的一波紧接一波的冲突，也是不能有较久的息止与调解的。至于国际帝国主义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的工作既已完成，而他们的联合战线必然的马上分裂，日英冲突，日美冲突，英美冲突，不唯没有改变，而且是永远不会停止的，直到他们崩毁的时候。所以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地革命斗争之下，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是永远不会有任何稳定，一直到他们消灭的时候。反革命势力根本不会有胜利，除非革命的实力完全瓦解了。据此分析，我们认定目前革命势力不过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而反革命势力只不过是表面的不稳定的暂时胜利。并算不得什么胜利，中国革命的性质一点没有变更，因为中国革命在过去尚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应解决的任何一条，资产阶级军阀将来亦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任何一条；惟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能够完成彻底的中国民权革命。

（三）

陕西省委对中国共产党的“八七”决议案及九月十九日各种决议案，除过

已须变更者外，按陕西的实际情形，必坚决的在斗争中实行！

我们的反冯政策，并不因二军之失败而中止而软化，应更加紧地在农村中破坏封建资产阶级军阀的基础！但我们应仍认二军为反冯的力量之一，在反冯的观点上仍可利用他们；我们要继续公开的或秘密地恢复农协，以作农村政治斗争的中心；并要实行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推翻冯之统治；以具体的方法宣传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并以种种方式运用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于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中，实际上宣传苏维埃—这是我们目前在西北的唯一任务！

(四)

西北上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事实；他们受极残酷的剥削，并不减于别省的农民，也是事实；但西北上农民之比较落后（第二号政治报告中说十分落后是错误）的事实，也不可忽视，所以西北上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我们不能否认，而我们则绝对否认不经过我们领导与部分的积极的斗争，农民便会起来！今后我们要注意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基础；极力地吸收农民到党内来，改变党的成分，极力提拔农民同志做党的工作，以巩固我们党的基础！

一个斗争的共产党，不是由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共产党的正确策略不是由办公室内可以制定的，而是要在实际斗争中决定的，党在陕西还很幼稚，惟其幼稚才要努力于一切斗争，在一切斗争中增加党的力量尽我们历史的使命！现在是我们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要开始一切斗争。决不避免敌人诬蔑我们的什么过激，什么幼稚，以大无畏的精神，存长期斗争的决心，然后我们才能由斗争中扩大并巩固党的力量，彻底纠正我们的机会主义，努力履行我们的政治任务！

注：①指改造土匪武装。

②即东北的张作霖，山东的张宗昌，皆奉系军阀。

K. M. T. 问题决议案

——第二次省委全体会议决议

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九日会议关于左派 K. M. T. 问题之决议案，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认为对 K. M. T. 问题当重新决定，取消我们以前对于该问题的一切决议。

以全国说，所有现在 K. M. T. 存在的地方无不为资产阶级反动军阀所完全占领，K. M. T. 已全盘的变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工具；资产阶级军阀甚至封建余孽都在 K. M. T. 的旗帜之下施行屠杀流血，恐怖压迫；现在 K. M. T. 的反动程度，因中国资产阶级之落后与野蛮并不减于或更甚于有长期反动历史与经验的西欧资产阶级一切政党，至于其以前在民众中的革命信仰已完全失掉。国民党的蓝色旗与意大利棒喝团的黑色旗，同样的可引起革命民众的恶感。因为如此，

我们党在最近几个月复兴国民党左派计划不能实现，更说不上在其旗帜之下组织暴动。

就陕西论，我们恢复左派的计划，亦不能实现，以前国民党在陕西革命民众中的信仰，就很薄弱，现在已由跌落而至于无。一般平民除看见占领党部的人物逢迎军阀，招待官府，借国民党招牌谋自饭碗外，并看不见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是革命的，那一点代表民众利益。原来在陕西所谓左派就是绝无仅有，自然更说不上左派的复兴。至于创造左派自当以农民为基础，那就不如努力恢复农协，努力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运动，因为完全失掉革命意义的 K. M. T.，民众已视之已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因此，我们今后对于 K. M. T. 的策略有以下的决定：

（一）对于现在各派的 K. M. T. 领袖、机关及其政府积极反对破坏，定出明显推翻他们的目标；即于右任我们也不可对之存任何希望。

（二）对于零散的 K. M. T. 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帮助我们及革命平民的革命运动。

（三）我们党应积极地做“一切政权归于农民协会”的运动，用秘密的或公开的农协名义领导民众，与反动 K. M. T. 斗争。

（四）在民众中努力揭穿现在 K. M. T. 之反动，宣传整个 K. M. T. 已成为反动政党；同时于可能范围内，我们亦可促使其反动成分加重，民众信仰丧失净尽，使其内部各派互相冲突；使其党部官僚化腐化；特别使之成为冯玉祥式的 K. M. T.，拥护冯之剥削政策，拥护基教、军粮券等，使民众认识。

（五）不能完全包办的则派一二同志参加作第三项工作；能完全包办的党部，则完全包办，包办后则尽量使之成为死的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六）参加破坏 K. M. T. 工作的同志，只可暗中起促进反动的作用，绝不许参加反动的行动，以免民众因反对 K. M. T. 而失了我们同志在民众中的信仰及作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会，根据团中央来函批评党省委政治路线犹豫、动摇，党省委遂召开

这次会议，对一次全会通过的《两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作了修改，并在某些方面对团省委

的指责作了反批评。

附：

共青团陕西省委关于 C. P. 省委第一、二次全体会志略（节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此次党省委第一、二次全体会经过是很繁复。

党和团关于政治策略之斗争，是这两次会的中心。本来党预定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开第一次全体会可（后）改到三十日晚，出席者只有五人，团代表张○○同志^①未出席，因党代表耿同志^②二十八日晚在团省委会通知张同志说党全体会二十九日晚不开，未说究改到那一天，后来三十日晚开会了，十二月一号团代表才接到通知。

三十日晚会议结果，主要的成立了一个两月来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其次省委增加了两个委员（一个农民），军事部、农民部改由专人负责，常委会由原来三人（耿○○、李○○、李○○）^③改为五人（增加张○○、刘○○）^④，指定宣传、组织、军事……委员会名单。

省委第二次全体会^⑤开会时，在政治形势上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如革命委员会之失败，陕西反冯战争之流产……），在党的指导机关一党省委常务委员会的政治观点上，表现犹豫，动摇于错误（具体见党省委政治报告第二次）。

全体会^⑥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时至二十九日上午十二时开过。

党代表耿○○^⑦于二十九日早起不告而去，全体会讨论认为：因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策略，对于党省委最近政治路线之动摆（摇）、犹豫、错误，严重指出，耿同志未了解这种意义，是站在党的观点上应该如此，负气不告而走，实属错误之至，决议由团出席党委之代表^⑧，向党提出并要求党经常要派代表出席团会。

十二月初四日晚党开常务委员会，团代表出席，首先将党省委第一次全体会之决议案宣读，其次将团全体会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策略决议案宣读。其

中有几个主要的不同意见：一、党决议政治完全没变，团决议有变，不过终结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两个前途并存；二、党决议在陕仍旧做□□与左派国民党工作，团决议则否，在农村以农协为中心，在城市以工会为中心，团结一切革命分子，由 C.P. 经过工会农协直接指导工农斗争，结果采团意见；三、党决议党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议决案》完全适用，团决议案有部分变更，□□□□苏维埃……等问题结果采团意见。党常（委）并对团《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策略决议案》中指出党的错误，除关于党本身问题，认为语气太重外，均接受。最后：（一）按讨论结论修改政治问题决议案；（二）关于 K. M. T. 问题，另起草一决议案；（三）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案，既有大的变更，遂决定初六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到了初六晚，天雨人未到齐，改开常务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复改到初七晚，至期开会，出席者六人，较上次只增加 C. Y. 代表^⑨。（一）《K. M. T. 问题决议案》草案，少有修改通过，无大变更。（二）《两月来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草案，不同意见很多，此草案与上次常委会讨论结论要点，也有不合处，择出应修改之要点如下：1、“回顾”一〈中〉段中，关于缺点，说得太笼统其词，其实也有进步地方，应择其成为主要现象者分别指出，不能一笔抹杀；2、省党省委常委最近的政治观点有几点不正确的错误，应明显地指出来，有些同志在文字上口头上空喊暴动，表示积极，而不实际准备暴动，这又是机会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一段，认为此种情形不成一个稍著的现象，不必要〔甚〕至没有，□接受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及策略决议”太笼统，也有些地方不尽适用；3、最后一段中三小段，怎样党落后，农民落后，不要狂热的革命……凡带有拥护政治报告第二号错误之处应改为积极，即应怎么样，4、政治决议案是指明政治趋势，有许多零碎政治消息不必要。（三）增加出席委员二人，上次决议，农民一，应全改为农民，通知各地报告农民活动分子，择好者报告中央，请求批准。（四）本 K. M. T. 问题决议案原则对现正筹开之所谓 K. M. T. 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1）使其官僚化，成为冯玉祥的工具，设法成立拥护冯玉祥剥削民众之政策决议案，使在民众中完全失却信仰，（2）选举标准官僚及同志；……（3）参加同志速组织党团。

我们看了这次党省委第一、二次全体会经过有两点要特别注意的：（一）

这次党的错误我们能坚决地反对，由不一致而一致，这是党的一大进步，决〔绝〕不是什么不光荣的纠纷，（二）这次因争辩激烈，所以对许多根本问题都拿来讨论，并且进一步地指出党错误之历史来源，但这种错误由来已久，所谓口疾我们要下最大的继续不断的努力，才把它能改掉，若稍玩忽，难免第三次再有此种错误，那我们真是无产阶级的罪人。

同志们，批评出来的错误是不怕的，惟怕我们不受批评与不改错误！同志们，加紧斗争，酝酿部分的暴动，在这斗争暴动的火焰中才能热死机会主义的病菌！

注：①⑧⑨即张金印。

②⑦即耿炳光。

③即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

④即张金印、刘鞞

⑤⑥指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

*原载共青团陕西省委《政治通讯》第二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央致陕西省委信*

——中央陕字第九号公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陕西省委：

你们的报告和各项文件已阅悉。因为交通的不便，许多应该纠正的指示恐多已失了时效。最近两月中央的一切通告宣言以及十一月七日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不知河南省委已转到否？如转到，自然有许多新政策的指示，你们已遵照执行或已改正了从前的不妥的规定，如未，则此次给你们补去的各项文件，你们亟须详慎看过从省委到支部引起党中的讨论并计议实行。此外，中央须指示你们的还有下列几项：

(一) 你们对新军阀的估量犹侧重在冯一点，所以在决议案中你们说：“对二军，他们若能在我们的条件（对民众利益之拥护）之下来反冯，我们还可以全部的利用”^①，在实行起来你们便做是援助二军的工作，并顾不到二军是否在我们条件之下反冯。这种观念与当初只管拥冯具有同样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你们现时亟须纠正的便是对于新旧军阀应取同样的失败主义，即是对于现时任何统治阶级的军队都要弄得他一个失败。因此，我们须绝对抛弃利用任何军阀的心理。在新军阀的混战中我们只能利用这种时机执行下述几种任务：

1、军队中我们的力量应借此机会尽量地扩大，动摇所有的军心，收编别人的队伍（切记有收编的主要条件，必须在收编时改换上级中级以至下级的军官，在必要时班长亦须更换，兵士须重新编制）。时机成熟了便须拉出队伍投入农运中去，队伍大而整齐的便变成工农革命军，保存军队式的组织，小部的便直接的散入农军中与他们混在一起组织。

2、所谓时机成熟的条件：第一，我们军队驻扎的地方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第二，我们党在那个地方要有指导的权能；第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第四，军队的本身在动作时要较有胜利把握不至开始便被敌人镇压下去，假使条件不成熟，我们可迟缓一点动作，但在没动作前须竭力使这些条件中的主观成份达到成熟境地。万一环境十分不相宜（即是工农运动不易发展而敌人大军又正在重集的地方），亦可采取移动的方式到农运发达的地方去参加暴动。不过这种移动，决不是你们将○旅^②移到三原帮助三军反冯的用意，而是以宜于农暴割据为归依的。

3、有些军队我们军事同志不容易拉出队伍的，便应改变方法用捣毁破坏的手段造成兵变的局面。兵变成功了，我们不仅可拉出去我们所领导的队伍，且可吸收散兵到农村中去。

4、省委应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反对新军阀战争，以工农暴动消灭军阀战争。工农组织亦应有同样宣言发表，工作上并可举行反军阀战争宣传周，不但要深入工农群众，且须影响到兵士中去。

5、党应切实指导工农群众在军阀混战期中不为伙役，本送粮草，不当侦探，不借民房，并且在两方的决战中要扰乱两方的后方交通，要截留两方的谍报，饷银，粮草，抢夺两方的枪械，收容两方的溃兵，以彻底的消灭两方兵力。

6、在宣传的口号中要切实指明在地主军阀的统治下任何军人的恩惠都是假的，不管是冯玉祥岳维峻，还是李虎臣甄寿珊都要一样的反对，除非他们部队诚心接受工农政权的领导变成工农革命军我们才能不拿他们当做军阀的队伍看待。但这种军队必须由雇佣兵改变为志愿兵，才能始终不变的担任工农革命的任务，旧的军人领袖不经过革命期中的艰难斗争，不经过工农政权下的长期试验，我们也绝不能冒然置信。

（二）国民党的问题，你们必须依中央最近决议案及通告迅速地改正“造革命的国民党”的观念，国民党已经自己宣告了对于革命的死刑，最近几月所谓左派军队在广东的屠杀，尤其是广东暴动后的屠杀和所谓左派领袖在上海所

做的反革命的无耻的把戏，便是没有中央通告也该觉悟到国民党这块反革命的招牌是不能在工农前见面了。国民党我们除掉打毁它外再不要丝毫存有利用它以发展工农运动的机会主义心理。陕西国民党内如有革命分子，我们可以将他吸收到我们党来，但他必须要了解土地革命，诚意地拥护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不仅在口头上且须在工作上能刻苦的去到工农群众中去。便是我们党员停留在国民党内如经过省委对于退出国民党政策的解释后而仍不退出，省委必须予以开除。

（三）政权问题，你们须以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工农群众中利用广东两湖继续不断的暴动事实和陕西省内统治军阀的暴横剥削作广大和经常地宣传，务使工农群众坚强的组织和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苏维埃政权的决心在群众中经常地发展起来。依陕西现时主客观上的情形说自然还没到一个总暴动时期，但乡村中斗争已经开始，而且许多地方又有我们军队驻扎，果使农民群众已实际地参加日常斗争，农民群众有了坚强的组织，城市工人亦有相当工作，党的领导亦相当健全，则工农暴动割据的局面，至少农暴的割据局面必可在陕西出现。因此，政权的宣传和工农群众对于实现苏维埃政权的决心更须在经常的斗争中培养出来。乡村政权归农协的口号应改为乡村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

（四）目前陕西的工农运动，除掉中部各县有些自发的农民斗争外，多半还存在极幼稚的状态中。在政治上既还是依靠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势力来官办工会农会，那么工农本身的斗争力量便不能培养得好。所以目前陕西工农运动首先要努力的便是依靠政治势力的观念的打破，做工农运动的人固然要立刻改变过去的依赖观念和不发动群众的习惯，便是工农群众本身也要经过反国民党及统治军阀的广大宣传和不断的日常生活斗争的领导，然后才能使他们逐渐明了政治势力之无从依赖和群众本身力量之伟大。这种工作，自是需要极其刻苦艰难而且耐心的去做，在陕西城市工人运动还没有一点开展，省委应督促同志从发动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中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反国民党的秘密工会直

做到工人群众广大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以团结工人阶级的整个力量。在农民运动中情形虽较工运好点，但陕中的农民斗争还多带有和平的原始的形式，为要使农运发展，必须先使农民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肃清，然后再发动农民变和平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直接行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债，在农民每一个激烈行动中，他的性质必定是武装而非和平的。在陕西农民已有了些武装，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能领导群众，许多地方的军阀武装会在他们混战期间移转到农民手中。所以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行动。这个直接行动正是土地革命之开始，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契约债券，分配富户财产给贫民，更都要农民自（己）动手来干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局面。陕西的工农运动能在上述的布置中迅速地发展起来，则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才能在陕西生长。否则，工农群众没有深切的政治观念，则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心便无从产生。工农群众没有坚强的斗争组织，没有深入斗争生活造成广大的斗争局面，则工农群众的直接行动也便无从产生。没有政治上的决心，没有群众的直接行动，陕西的暴动割据局面便无从谈到。全省的总暴动更永世不能造出。

（5）陕西的军事运动是较别的省为有基础，因为你们不仅有军官运动并且还建立了士兵支部，不过军事运动的方针，省委必须根据信中第一项所述破坏军阀军队的原则速予改正。过去你们因为没有军运原则，所以将○^③旅调来调去，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为好，依数目说在陕西我们已有整个儿两旅和一些零星队伍，较之广东仅有两千多人的军队便能造出广东海陆丰的暴动局面的已多了一倍。但广东较之陕西却多了许多完成暴动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军阀军队的动摇，我们队伍向敌人倒戈，工农军的广大组织，多数同志的武装化，都成为军运之新的重要方针。陕西省委根据这些方针，应首先改变对于我们自己队伍的指导。这些队伍的驻扎地点，应依农运的发展区域和军队易起分化的所在来决定。假使有可能时自然以能多聚些力量于邻近几县以便造成一个割据局面为最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强，宜分散这些队伍打入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农民斗

争。且这些队伍无论是聚是散必须把他看成工农斗争的副力，切不可反副为主，忘了发动群众，造成工农运动中军事投机的危险。兵士支部应不仅在我们队伍中有多量的发展，并且应在反动军官的队伍中设法建立。陕西省委曾经命令各地介绍同志或工农群众入伍当兵，今后更应计划选择得力的同志特地投入反动的军队中去发展兵士支部，在这些军队中应从要求发欠饷，要求财公开，改良待遇，反对肉刑及无理处罚等逐渐鼓动起直做到兵士哗变，拆散军队引导士兵投入农村中去。这些工作固不可急于求成，他有时正在军队因欠饷太久或是调往战场军心动摇当中，入伍煽动的工作亦十分易做。

在反动军队中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普通以连为单位，成立支部组织。支部下有五人以上的党员便分组两小组，组设组长一副组长一，支部设书记一副书记一，组与组彼此之间不通往来。书记只与组长接洽。组在三个以上时，组长会议便须分两部开，营团设特派员。因为指导系统之单位，直接受驻在地党部指挥。党部与军中特派员或支部书记发生关系时只能由一人担任。有反动军队工作的重要地方不拘省委县委均须于其下设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讨论工作计议执行。我们自己军队中党的组织在未拉出军阀队伍以前其组织亦如反动军队，及拉出变为我们独立队伍时，便应依照党的组织以团为单位设支部，下设支分部，再细分小组。团以上旅师军均设委员会。

工农军的组织重在训练。工军指挥系统属之工会，在现时且须保持秘密，故组织形式不能十分整齐，唯军事技术上的学习必须做到，人数必须选择勇敢的在业工人尽量扩充。农军在乡村较易为形式上的组织，但在斗争前亦只能多注意于秘密训练。工农军中党的组织与工厂农村中的组织相同。

（六）党的组织须依照中央最近两次通告彻底的自下而上重新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须十分注意于支部的改造，其方案首须使支部有党的生活，党员都能注意于党的政策决议的讨论，新的激进的分子能广大的吸收，支部能领导群众斗争，在这些条件具备后，支部实行改造才能选拔出新的勇敢地指导人才代替旧的机会主义的指导。支部能够做到彻底的改造，然后上级党部的改造才有希

望。从省委起各级党部机关均须提拔勇敢的工农同志加入指导机关。省委至少要须加入工人同志二，农民同志一，常委可扩大至五人，至少需有工人同志一。省代表会议可于各级改组完毕后召开，最好在二月底，届时并要选举赴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省委须兼市委。监察委员会在章程未改前仍须选出执行他可能的任务。

（六）其他一切重要问题，你们可依照中央决议通告所指示的原则讨论执行。

中央

1928、1、2

各地党部及一般同志对此中央给省委的指示信均切不可忽视！

〔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

注：①按省委九·二六会议《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此处原文是“我们还可以部分的利用”不是“全部的利用”。

②③指许权中旅。

*这是中央对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案等文件的批作指示。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 (第二十六号)* (节录)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

(一)

陕西的党过去太少注意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武装暴动，甚至有在客观上阻止农民暴动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与行为，使陕西的农民有自然暴动而立刻消灭的事实！目前陕西农民因关外冯奉与关内大小军阀的混战，而更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主观上有急于摆脱自身痛苦找求一出路之迫切要求。现在我们须坚决打破党的力量薄弱，陕西农民落后的观念。必须完全信仰惟有抓住群众要求，极力鼓动群众，以发动群众的自身斗争，从这实际斗争的方法中，才能发扬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扩大并坚固工农群众的阶级组织，创造工农阶级的政党——C. P. 的新生命。在我党目前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陕西各级党部，应如何的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战争，杀尽所有的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

(二)

依据天然的地理、政治、经济诸条件，将陕西划分为：关中、汉南、陕北三区。汉南、陕北两区，在省委指导之下，各设有一特别委员会，根据党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代表省委执行职权，指导汉南、陕北党内党外一切工作。

又将关中道划分为五个重要区域：（1）省东区：临、渭、二华、潼、蓝……等县，以华县、渭南作中心；（2）渭北区：泾、原、高、富、淳、旬……等县，以泾、原作中心；（3）省西区：乾、礼、永寿、长武、兴平、岐山、扶风、武功……等县，以乾、礼作中心；（4）中区：长、咸、周、户……等县，以长安作中心；（5）东府区：蒲、固、同、朝、韩、合……等县，以蒲、固作中心。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以便沟通各县动作，很灵活地去指挥各区游击战争。

（三）

（1）游击战争的基础

游击战争应完全建筑在广大的穷苦农民的群众斗争上面，其发动以经过秘密的酝酿，杀死几个豪绅为斗争的开始。一经发动，即须继续号召广大的群众，坚决的一致行动。同时，应扩大斗争的宣传与农民协会、农民革命军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游击战争，进为广大农民群众的部分暴动。

（2）扩大政治宣传

我们要吸引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游击战争，故目前应赶速作政治上的大准备，即对于冯玉祥的东征北伐，资产阶级叛变后，内部冲突之日益剧烈，到现在势将爆发的陕西境内冯军与非冯军大小军阀之混战，要竭力指出其直接或间接宰割陕西民众的意义，号召民众起来一致反抗。指出民众的出路，唯有依靠自身团结的力量，反对新旧军阀的一切战争，夺取武装，推翻新旧军阀的统治，铲除一切封建势力，建立工农兵革命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彻底解放〔除〕工农兵士自身的痛苦，完成中国的革命。

（3）开发游击战争，应注意的几个重要时期

在我党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之下，应该每天的注意爆发和游击战争；但我们为能得到更大的效果和与〔予〕敌人以巨创，我们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袭击敌人。为达到我们袭击敌人的目的，各地应特别注意以下所指出的几个时期，事前充分的准备，到期爆发我们的游击战争。

a、阴历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五、十五等日，一般豪绅、官吏、驻军都

注意到过新年的事上，我们可乘机杀豪绅官吏，劫夺军队的武装。

b、二、三月正是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多年挨饥挨饿，我们在此时可鼓动乡村贫民抢劫富户、豪绅等的囤粮，大杀豪绅，并准备夺取城池要塞，杀官吏，夺取驻军武装，酿成全陕西的大骚动。

(4) 夺取武装组织农民革命军

在军阀互战及军队开拔当中，必须尽可能地夺取武装。须知唯有夺取武装，才能夺取政权；在群众中极力提高夺取武装的精神，将农民编成三人至五人的小组，准备此种工作。现在应立即开始集中武装于发动区域，组织农民革命军，武装农民中的忠勇分子，训练同志武装的使用，以及破坏作战的各项军事常识，准备随时动作，开发游击战争，举行部分的暴动。

(5)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在我们领导和影响之下的军队，我们要他们不犹疑的实行我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变军阀战争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帮助农民武装暴动，开发游击战争；在兵士中扩大政治宣传，使各个兵士尽量地参加政治活动。对于反革命派领导的军队，我们可发很通俗简单的传单，派同志进去当兵，用各种技巧或形式宣传一般兵士，给他们指示出他们正确的出路，惟有反叛长官，自动地停止军阀战争，帮助农民暴动，与农民一致实行革命。没收军阀、贪官污吏、豪绅的财产，发清欠饷，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和兵士，进行破坏统治阶级军队的工作。

(四)

我们在开发并扩大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应该有能够深入和抓住群众心理与扩大我党政治宣传的口号，我们的口号应该是：

- 1、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
- 2、耕者有其田！
- 3、抗粮、抗税、抗租、抗捐、抗债！
- 4、解除反动派的武装！

- 5、农民武装起来，组织农民革命军！
- 6、杀尽豪绅、地主、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
- 7、反对军阀战争！
- 8、变军阀战争为工农兵联合反军阀的战争！
- 9、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
- 10、打倒屠杀工农的冯玉祥！
- 11、打倒反革命的陕西省政府！
- 12、打倒一切新旧大小军阀！
- 13、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
- 14、没收地主、豪绅、官僚、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工农与兵士。

*这是省委根据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以后收到的中央文件，发出的关于开发游击战争，进行暴动的第一个文件。本文原标题为：省委通告第二十六号。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二十九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各级党部：

（一）从前省委印发的《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之经过》^①系由全体会议指定秘书处起草，中经过耿同志^②擅改，且未经过常委会议而急促付印以致常委改组的原因省略不明——兹特增补修正通告各地。

（二）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改组常务委员会之主要原因是：自扩大会后常务委员会对政治主张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如不信任陕西农民的力量——（政治报告第二号）。

（三）对耿同志开除省委是因他的观点不正确带有浓厚的一贯的机会主义。

（四）对张○○同志^③的批评中有两点不合事实须加更正：

（1）批评中的（b）条说“误用英雄斗争的意义…影响党团关系”，在事实上，过去团对党的政治主张之斗争使党和团的关系日益亲密；

（2）批评中的（c）条说“不注意使其他 C. Y. 省委同志多发表意见——在工作中，C. Y. 省书记有一人包办的形式”，“使”字应改为“启发”二字，“包办”也不是事实。

（五）自省委改组新省委即于一月五日开全体会议，除农民同志三人^④尚未到省及胡同志^⑤因故未到会外，到会者共七人，推定常务委员会建立各部各委员会。

（1）常务委员会由全体会议推定潘○○、徐○○、刘○○、张○○（C. Y. 省委代表）、王○○（农民同志）五人组成^⑥。之后由 C. Y. 省委提议增加常委一人，在新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决定李一○^⑦加入；

(2) 省委分工如下：书记（代理）潘〇〇、组织徐〇〇、宣传李宾〇、农部亢〇〇、军部李一〇、工部胡〇〇、秘书刘〇〇、C. Y. 张〇〇^⑧。

常务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注：①《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之经过》，迄今未见。

②即耿炳光。

③指张金印。

④指王松年、张振海、郭世英。

⑤即胡宪之。

⑥即潘自力、徐梦周、刘继曾、张金印、王松年。

⑦即李子洲。

⑧即潘自力、徐梦周、李子健、亢维恪，李子洲、胡宪之、刘继曾、张金印。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复耿○○函*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耿○○同志：

二月十二日信收到，并提出十三日全体会议讨论，兹逐条答复如下：

一、对省委第二十九号通告的意见，

a、通告第二十九号是为改正第三次全体会议之经过及新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形而发的，并非专为耿同志“擅改”而发。

b、通告中（1）条是说明第三次全体会议之经过的错误原因；耿○○同志“搜改”不过原因之一；且因“擅改”而致错误的不过几点，并非全部。

c、秘书主任的错误如来信所示者已在会中批评，他已完全接受。

d、无论耿同志存心如何，“擅改”总是事实。

e、通告上所说的（8）条是与原文意义不同的，原文对改组常委原因仅有主席报告开会写为一段，且说得不具体，这不算是全体会议的意见，据秘书主任说：“原稿开端有一段，说明改组常委的原因，后经耿○○同志删去”；耿同志若认为这一段与主席报告重复，则可以删去主席报告一段，或两段并存，因为这一段是代表全体意见的，所以说因同志“擅改”而致常委改组原因省略不明（理由之一）。

f、通告上所说的（3）条是原文所无的，这是秘书主任的疏忽，他已承认错误。

g、四之（1）是秘书处原文错误，当然不由你负责。张同志^①的英雄色彩是个人错误，他接受过了，但党团关系在事实日有进步。

h、四之（2）“包办”不是事实，不过事实上，过去有一阶段，C, Y. 常委不健全。

i、发的通告是因 C. Y. 常委两次提出意见，后经常委详细讨论，何得谓之“儿

戏”？

j、省委处决问题是向党内群众承认自己错误，正所以建立党的威信，——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出发点，并无一点成见与偏见（小资产阶级的心理）。

k、省委为你“擅改”曾派李同志^②与你谈话，认为你的“擅改”是事实，但存心无他，故无处分的必要，何得谓之忽视纪律？省委决定要你仍赴汉南工作，且须赶速起程。

二、对过去机会主义的意见：

a、过去党的机会主义自然不是要你一人负责。不过大部分要由你负责任。

b、告党员书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不作，理由是：（1）最近接到中央公函，把陕西党的机会主义已历历指出。（2）《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第四次全体会议^③决议案——中已把过去党的机会主义改正。

C、对你所说的机会主义的来源认为是对的。

三、对省委纠正机会主义过右过左的意见：

a、自第三次全体会议后，省委对纠正机会主义和对同志执行政治纪律，极力免去操切毛病而以慎重处之。

b、对你提议五项办法省委完全采纳。

四、对党团关系的意见：

a、照来函说“……这根本不是党团在工作上的关系不好，而是 C. P. 省委书记与 C. Y. 书记两个‘个人’的冲突的错误所致”，可见陕西党团关系比以前是好的，C. P. 书记与 C. Y. 书记“个人”冲突是无大关系的。

五、对党在陕西落后问题与对西北农民落后问题：

a、在陕西的党是比较落后的，不过我们不可说党的力量薄弱而不斗争，正要斗争，才能增厚党的力量。

b、最近省委并未发过暴动的通告，只发过一次开展游击战争的通告，这是省委对陕西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加以精确估量而定策略的。

七、对目前应尽可能地改造各级党部，并即召集大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采纳了你的意见，决定召集扩大会议，并且已决定通告各地，由下而上的尽快地改造党部。

八、对出席第六次全党大会代表在扩大会决定。

总之，你的意见大部分是对的，不过字里行间有表现你与张同志“个人”意见冲突，因而牵涉到党，这是你对党观念不大正确，特为指出，你应自觉地去改正。

注：①指张金印。

②指李子洲。

③系第五次省委全体会议之误。

*耿炳光被开除出省委后，致信省委常委会，进一步陈述自己对省委发生的机会主义、农民暴动等问题的意见。对耿的来信省常委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五次全会上讨论后，作出这个答复，后附耿炳光的信。原文“四”只有a，无“六”。

附：

耿炳光给省委常委会的信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省委常务委员会：

我有下述的几点意见，诚恳地请以冷静的态度审之，与（予）以书面的答复，并刊登党内刊物。

（一）对省委通告第二十九号的意见——通告上说：“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的经过……中经过耿同志擅改……以致常委改组的原因省略不明……。”对此我分开两点解释：第一，是“擅改”；第二，是由擅改而致常委改组的原（因）不明。关于第一点，我不接受；因为第三次全体会议时我还是书记，我对这次会议的文件，因恐秘书处有遗漏而加以审查，是由于我的责任心过重，别无成见；而且在审查前曾给秘书处有正式书面通告要求修改的原因，秘书主任是省委常委之一员，并非（未）拒绝，事后他也未交常委而即行付印。可见他不惟默认我可以审查，而且认我所修改的与记录无误。然则何得谓之擅改？关于第二点我更不接受，就通告上所说的（二）（三）两条，与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原文的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即有不同，是否因擅改而然的？否，决不是！那么又有什么重述的必要？（四）之（1）原文是秘书处所写的，我不负责，（事实上我还同意秘书处的原文，因为在开会时，对张○○同志^①的英雄色彩的批评是一致的，特别在文字上有所表现，虽 C. Y. 省委中也有此意见，华县县委也有，张同志也曾承认自己说话有过火毛病；影响党团关系便是上述前提的自然结论。党团关系本来好，因张同志的态度影响得不好了。其实党团关系在扩大会以后，即已改正，非最近之事待后日再说。）当然也不是因擅改而……（四）之（2）说：“包办”二字是我增加的，这是我不久以前曾在 C. Y. 省委常委会议时批评过，他曾接受；第三次省委开会时，我又提出批评，事实上不注意启发其他 C. Y. 省委同志多数发表意见，……不是工作落于书记包办是什么？ C. Y. 省委常委开

会时除张同志外很少发表意见者（在那时以前），其他 C. Y. 省委也有同样的感觉。事实自是事实，不能因这一名词不好听避讳。这也不是因什么擅改而……。

（五）以后各条是那次会议以后的事实。就以上事实观察，既不是因我擅改而致，……这个通告上牵涉到我擅改便是无意识！若省委的观察十分正确，在客观上我有这种擅改的错误，至多只能给以严重的处分，还没有在一个省委通告上那样点缀一笔的必要。这样的表现，一方面是省委解决问题不正确，以革命工作为儿戏，是以减杀省委的威信；一方面是“无端的”减杀一个同志的信用，也是于工作上不利！这是一。假若省委对我那样的观察十分正确，我不惟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极不忠实于党于同志的分子，而省委不惟不与（予）以严重的处分——一个口头警告也没有，反付与以陕南特委的重任（事实上是一第二省委）是否矛盾？因此陕南特委书记的责任我不能负，须重新决定，这是二。就上述观察，省委至少有下列错误之一：（A）处决问题的方法不审慎，客观上是以革命工作为儿戏；（B）处决问题时有小资产阶级心理之存在（或者是不自觉的）——成见与偏见；（C）忽视纪律。

上述省委的错误，若是不错，不是什么耻辱，而是在陕西党的现况下——初期发展中，党员成分不好，特别是各级指导机关中很少无产阶级的中坚分子（同质分子），仍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中心，而省委中大部分是包含着机会主义的分子（由第三次省委会议批评可以证明）——自然发生的现象，我们应时时自加警惕，注意对党的改造。目前省委内包含着大部分机会主义的分子是不得已的，这一点值得大家注意。所以解决问题时须十分周详，尽可能地多讨论，应用民主精神。我非有意攻击。

（二）对过去机会主义的意见——党在陕西机会主义的错误，非常严重，我个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我完全承认。但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我所能完全代表，我们对此错误应加以分析，使党员群众明了，才对工作有利益。第三次省委会议时，曾决定发一告全陕同志书，专为纠正机会主义的，至今未见，不知何故？

党在陕西机会主义的错误，在陕甘区成立以后至省委成立这个期间，大部分是中央指导机关给予的，中央及北方区的指示的文件重要者至今尚存，历历

可考，如对冯^②对于^③的政策完全不合实际；如使区委重视国际代表，而乌斯马诺夫机会主义的错误比我们恐还要大十倍，有许多可笑的事实；刘伯坚负重要工作而不受区委指导，自然区委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自然不能掩饰的；但因那时全国党特别是中央整个儿陷入极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下级党部（区委）不自觉地走了（入）错误去，然那时还非完全不自觉，如对冯之不忠于革命及于之糊涂，区委曾累次对中央报告，不过未坚持主张改变政策，那是受了机械的纪律的遗毒，以为中央总是对的，不敢反抗。此外区委成立后，开始注意发展农村支部及纠正同志走入政府机关的错误，都是好的地方，不能说那时的工作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不过，大部分工作的方向，“在现在回忆起来，”即（的）确是不正确的。

省委初成立到扩大会议以前，因为政治环境改变了，党员缺少训练，许多党部坍台（如陕北）许多同志动摇；而省委大部分均出西安，这时候几乎是亡党的现象，所有的工作全是机会主义的，如对冯不反对，对于拥护、保存党的实力等。这些错误大部分是发于我的（省委书记），但原则之决定则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旧区委一人（魏○○^④），中央指定的省委三人（耿、李、黄）^⑤及C.Y.代表张^⑥共五人共同决定的；开会时非常急促，省委十八人名单及各路特派员，统都是那时决定的，那时都是一致的主张不斗争，保存实力，特别魏同志有此表现，同时乌斯马诺夫也由潼关来的意见，说党的领导机关应移出西安，以免损失；第二，是中央累次文件虽未完全洗出，有一份完全烤出，但对冯的政策是未有决定，对于是主张拥护，以后C.Y.省委常委会中曾对党不主张反冯提出过反对意见，但经C.P.书记解释后也就中止了，事实上还是跟着党走，后来李○○同志^⑦派中央，因为要秘密，我与李一致的主张不使任何同志知道，恐有危险；崔物齐又有不好的行动，也不便叫他参加工作，所以省委常务委员会也莫有了，只有一个书记与杜同志^⑧二人包办一切，所以不自觉地错误一天一天地加多了。

在得到八七会议文件及新中央的指示后，我们始发现错误，便即召集九二五扩大会议^⑨，对以前的错误，（决议）案中及省委书记口头上均完全接受了大会的批评，按中央指示及八七精神从新决定了工作方针。大会□□□开会□，

耿同志即提出更换书记并提出具体名单，中经李同志及张同志的反对而中止，仍以我为书记。大会也没有否决。扩大会议以后数月工作很少在积极方面发（展），以后又发生新的机会主义，对 C. Y. 省委的反对意见曾以通告接受过。以后我们继续接得中央文件，知道我们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本并未扫除（自然不是一刀可以割去的），因此省委为书记耿同志觉得自己的错误甚深，自动（提出）执行（政）治纪律（更换书记，开除其省委名额）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中初则一致主张不开（除）其省委名额，□□□□□□□□解释始照原议通过，后来又□带的改组了常委（由上述）的事实说，耿同志个人并无掩饰错误的□□，□□□□省委批评我掩饰错误不知何所根据？

在近来省委的错误中，一半原因是得不到中央的指导也不可忽视，特别在陕西党本身幼稚（后也另有解释），况非常常得到中央指导不可，过去我们的错误多半是在得到中央指示及文件以后发现的，可以证（明）中央指导之重要，自然我们应力求错误之减少，努力做党的改造工作，但错误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掩饰错误才可耻，我们要分析每次的错误，从那里取得经验与教训，定出新的工作方向，不是如张○○同志^⑩所说因省委书记的错误，可以把他碎尸万段一句狠话可以了事的，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正确态度！

（三）对省委纠正机会主义过右过左的意见——共产主义者之纠正错误，□按照客观的事实加恰当的纠正，失之右或失之左，同样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观点。纠正错误要详加分析，是操切不得的。过去省委常委中张○○同志^⑩的态度失之左，张同志说我们纠正错误要“矫枉过正”即可证明，其余事实不必说：其他失之右。省委发现错误时，很少讨论，往往不考事实而操切的纠正，惟恐改之不及，因此纠正只是片段（断）的，非根本的，纠正一个随后又发生同性质的错误。此种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对执行纪律，常是观察一方面，不从各方面调查，也是失之操切。如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后，省委已发生甚大的变化，急应发一通告，申明其意义，使之影响达于下部，过了很久始发出一内容不见得正确的存有偏见的通告；如对李象九等的处分，如对何挺杰、耿觉二人不待耿来而加以考察再定处分，如对张含辉不考察此同志的实情而设法挽救即行开除。这些都是应处分而方法不好，关于

此等事实，含了一种不自觉的仇敌〔视〕知识分子的心理，也是过左了。知识分子固然极不可靠，大部分党的成分要改变，能达到无产阶级的同质分子的成分固然更好，但不是这样操切便可以办到的；这种操切完全是不认识党的发展是有其历史的阶段的，中国 C. P. 在初期的发展中不能抛开知识分子的，他们在那时还有其相当的作用，到了另一阶段（现在）自然便需要改变成分了，这种改变是自然的。党在陕西还没有完全脱离初期发展的一阶段，对知识分子还不容概抹杀。以后应用下列的方法，①省委须尽可能的妥善的分配同志的工作，②对消极分子要用积极分子去推动，③对事实宜多讨论多考察，④对党员的意见或对或否均有重视的必要与以正确的处断，从这些事实中训练同志，⑤执行纪律固不可松懈，但不宜单纯的运用开除等方法，以免同志机械化。

（四）对党团关系的意见一自九二五扩大后会以后，党团关系即完全改善。自八七以后党团两中央极力改善关〔系〕的方法与精神都很正确。但陕西党团关系在事实上何以总觉不好而常发生问题？我们要详细考察这根本不是党团在工作上的关系不好，而是 C. P. 省委书记与 C. Y. 省委书记两个“个人”的冲突的错误所致。这也是党在现况之下自然发生的一种现象，不是什么耻辱，我们应不避讳，力求改正之法。过去我个人的最大错误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太重，我对张〇〇同志^⑩的态度，非常讨厌（或者还不止我一人如此），有时甚至不愿同他谈话，这种事实很多，我认为张同志有掩饰错误或攻击个人的心理（并非因批评党），所以更为讨厌，语言上常有冲突，有时因对他讨厌而可以影响到工作问题，这些都可举出事实来，在我个人方面说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是十分错误。有时对张同志还存了“忍”与“息事宁人”的心理，不与辩难，这也不正确；我们对同志只要看见他有错误便可以批讲，或者由此批评以反映出自己的错误，不应由不言而怀恨，由怀恨而不言。张同志个人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与错误，张同志自应考察。事实上张同志也曾经承认他的个性太强，无法抑制、据他说他自做工作以来，与许多人都有过冲突，在省委常委会议中与李〇〇、李〇〇、刘〇〇、耿^⑪无人不冲突，与耿的最多；在九二五扩大会议中对他有过“英雄色彩”太浓厚的批评，他也接受；特别在最近接到 C. Y. 中央许多文件后，张同志“先锋团”的倾向很明显，在文字上常有此表现，在第三次

省委全体会议中，张同志曾经承认他说话太过火。这些都是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表现。因他的态度而影响到他的说话，更因为他是 C. Y. 代表，所以也影响到 C. Y. 的意见，关于我的错误我愿自首于一切同志之前。

五、对党在陕西落后的问题——关于此点，我现在认为是对的，而且应该这样的说：我们的短处与错误，虽显示于敌人之前也不怕，又何必在党内隐讳呢？我们自己的不是，是要求得我们的进步，使同志们知所努力，并不是悲观，诺（若）说是因说自己的不是而引起同志的悲观，共产党内不会有此现象。况且说党落后并不是党的什么错误，而客观事实是如此的。然则说党落后又有什么必要呢？我们要使同志知道党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缺点在哪儿？党在陕西落后，有下列的事实：就机会主义说，落后的党，不必尽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发生机会主义的必然是落后。陕西党的省委以及许多下级党部有浓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当然是落后，这是一。我们可以说中国 C. P. 比俄国 C. P. 落后，而朝鲜 C. P. 比中国更落后，然则我们说党在陕西比东南各地特别是□□等地产业工人区的党落后，又有何不可，岐山党比华县落后又有何不可？这是二。就指导机关说，从县委至省委是否健全？□，□不健全，特别是省委指导机关的错误层出不穷，各县委如岐山、渭北、长安、延安、绥德等县委与零相差多少？陕南特委直然就等于零。指导机关没有正确的指导，对有些地方如雨金、固市、渭南等地的农民自然的原始的暴动，党不是不理便是阻止，而在党有力量的地方或是环境重要的地方如华县、长安、西安市等地党的斗争力量怎么样？各级党部大多数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很少提拔农民同志，党在陕西对政治上有过什么作用？反动势力如冯如二军自政变以来，并莫有施行严重的白色恐怖，死的同志不过五人，莫有一个是因在党的指导之下去斗争而死的，被押的同志，旋押旋放，实在被押的也不过十人，这是什么原因？因没红色恐怖敌人不觉得陕西还有有组织的共产党，至多不过说是有某人在那里捣乱。总之，党的指导机关不能说是不幼稚，因此我们便应注意于指导机关之改造。这是三。就党员群众说，他们并没有超过于指导的机关之指导，而是随着“亦步亦趋”地跑。过去党员群众对党的指导机关，下级党部对上级指导机关很少发表意见者。党员虽有两千多而没有大的斗争，军队有两旅，至少也有两千人，而没有作用。

这些不能全说是“困难”，不便，而是证明党太落后。总之，党在陕西缺乏理论，缺乏训练，缺乏经验，统统是因为没有斗争，没有斗争便是落后，不能讳言。因此我们应努力于领导民众发展斗争，若对党的现况还是讳言，便不能定出一正确策略，党是不会进步的，一天发一次暴动的通告，也不算是“非机会主义”，而且要长久地陷入错误中。现在应就事实定出正确的策略，脚踏实地的工作，对东南及西南各地党的暴动工作，只可取法而努力，不可眼热。

（六）对西北农民落后论的意见——第二次政治报告中一概地笼统地说农民落后是错误的，若说完全不落后也不见得正确。就革命的情形与力量说，我们可以说农民必〔比〕较产业工人是落后的，但农民的革命情形之高低，也有其客观的条件之决定——即农村的经济关系及军阀等剥削政策等，可使农村中阶级的分划有分别，即各地不同。陕北农民即〔的〕确是落后的，民国十四年我在陕北考察工作，对北方区曾有一详细报告，见省委存件中的《北方区通讯》中，李〇〇同志^⑭知道的更详细。汉南的农村详情我们简直不知道，也不能说落后不落后。就关中道说是不落后的，农民自动的原始的暴动常发生；土匪遍地；红枪会遍地（这个虽然是落后组织，散漫而无统一的确定的政治目标，但若经过工作，可以引上革命的道路），尤其是大小军阀割〔据〕骚扰，自耕农多已濒于破产，乡间东西无人买，经济完全陷入死况，贫农更是不堪。但过去党对此很少正确的指导，虽有也是文字的。现在应集中党的力量于农运中心地带，努力发动（暴）动，渐渐扩大，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不可以着急。要知一个暴动不是任何党任何个人〔能〕够随时随地创造出来的，必须可能的条件——环境、时机与准备。虽十月革命时暴动，也非列宁创造出来的。去省委对暴动的操切的指导，甚至有提出今年正月十五日某地举行暴动者都是不正确的，结果一切效力没有。

（七）对目前应急尽可能的改造各级党部并即召集代表会或扩大会议之意见——以前我曾向省委提出过召集扩大会议的意见，至今未见答复。现在重新提出请实行中央公函第九号中第六条的指示，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改造各级党部，开代表会议。在工作上急需如此，在经济上目前已不成问题；在环境上也无大困难，陕西的白色恐怖比东南各地何如？可以说差得多，中央能召集全国大会，

我们就不能召集一小的省委代表会？在时间上若来不及，无防〔妨〕变通的开扩大会议，此会议中对陕西党的整个工作，对农民问题的党纲草案，对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选与人数均须在此会议中用很民主的方法决定之。

（八）对赴第六次大会代表的意见——必须在前述大会中决定人数与人选，我绝对反对省委自身决定选派代表，因为第一，开大会或扩大会是有可能的；第二，代表不一定就是省委委员，应尽可能地民主，第三，省委走得太多，须经过至少一月半的时间，对省委工作有妨害；第四，今年的代表赴会不是简单的充数而已，一方面要能将陕西的一切重要而待〔解〕决的问题到中央报告解决了，一方面须能真正代表全陕党的意见去说话，而又能把大会的精神带回陕西来。这几点都不是现在省委本身能够解决得很好的。比如第五次大会派黄○○^⑥去有什么作用？我这一意见是严重的坚决的提出的。至于省委常委已非正式的决定派潘王及 C. Y. 一人^⑦，对此我更有不同的意见，派潘同志不如派李○○同志^⑧，因为第一，李同志对过去陕西党的工作及政治等问题比较熟悉；第二，两人观念没有差别，能力李还要胜于潘；第三，留李在省不能行为〔动〕，不如留潘于工作有利。C. Y. 派一人应该是张○○同志^⑨以外的任何人，因为第一，张同志超令〔龄〕已久，以后应调党工作，现在应为 C. Y. 省委培养新的接替人才，第二，参加这种大会也是训练同志的一个好机会，应派另一人去，以前张○○^⑩曾经参加过第五次大会，自然我们参加大会不能存轮流观念，应以人才及工作为前提。现在○○^⑪不去比较对 C. Y. 省委工作有利，○○^⑫以外，并非无人可派。自然这个问题之决定是 C. Y. 省委的权限，但一个同志有此意见，无妨说出，也可以被参考的。

谨致革命的敬礼

耿炳光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二日夜

注：①⑥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即张金印。

②即冯玉祥。

③即于右任。

④即魏野畴。

⑤即耿炳光、李子洲、黄平万。

⑦⑭⑰即李子洲。

⑧即杜振庭（杜衡）。

⑨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下同。

⑬即李子洲、李子健、刘继曾、耿炳光。

⑮即黄平万。

⑯即潘自力、王松年、张金印。

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第五次省委全体会议已于二月十四日早闭幕了。到会共七人，除李○○同志^①入狱，农民同志王○○^②、张○○^③、郭○○^④未到会外，全场精神颇好，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

(一) 对中央文件，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央致陕西省委公函第九号，均加以详细讨论，认为中央的分析和指示是非常正确、非常具体的，切实计议执行。

(二) 讨论《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对全国对陕西目前革命形势均有正确分析，特别是对陕西党过去的机会主义指示得非常明显。此外对农民运动、军事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均有详细讨论，最后成立决议案。

(三) 讨论耿○○同志^⑤给常委公函，认为他的意见有些地方是对的，分别采纳；但是他来函中字里行间有表现他与张同志个人意见冲突而牵涉到党，这是他对党观念上不甚正确，决定给他复信，并公布他的来函和省委复函在党内刊物上。

(四) 第三次省委全体会议决定编印的《告全陕同志书》，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不作，因为：(1) 最近接到中央公函第九号已把陕西党的机会主义指示得非常明确了；(2) 在《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中，对陕西党的机会主义亦有具体的指示。

(五) 全体会认为在目前武装暴动局面之下，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非常严重，决定各地斟酌情形必要，成立“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至于以前通告各地组织的“兵士宣传委员会”则一律取消。

(六) 根据中央指示，应由下而上的选举代表，召集全省代表大会，选举出席第六次全党大会代表；但因第六次大会是在三月中开会，出席代表须赶于

三五日起程，时间迫促，不能召集代表大会，决定于十八日召集扩大会，但路远县委亦不能通知参加。

此外对纪律问题亦有讨论，唐东园同志^⑥负李^⑦旅指导工作，于十二月中攻取宜川，犯了单纯军事投机，致损失枪械二百余支，死伤忠勇同志十余人，决定予以书面警告，并取消许^⑧旅旅委员会候补委员职任。

注：①即李子健。

②即王松年。

③即张振海。

④即郭世英。

⑤即耿炳光。

⑥即唐澍。

⑦指李象九。

⑧指许权中。

*省委根据收到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召开了这次会议，制定了《陕西 C.P.目前工作方针》。

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

——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一)

中国目前一般的政治状况，依然一方是国民党新旧军阀连环纷争与混战；一方是工农斗争暴动之前仆后继〔继〕，可见豪绅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办法来巩固其反动的统治。工农民众的革命怒潮，必不可遏止地愤发，分明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到了长期的非间断的直接革命形势，当前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广州暴动给了苏维埃革命一个具体事实的说明，今后苏维埃革命已成了这一时期的事实上的总口号。

(二)

陕西的革命趋势与全国革命趋势并无二致。虽然自泾原战后，陕西的一部分杂色军队，被一军强迫出关，澄合战争亦暂时停止，表面上新军阀在陕西的统治目前似有一个稳定，其实陕西的政局随全国尤其随北方大局而转变。冯奉、奉阎……等军阀之混战，蒋冯等军阀之冲突，早牵陕西于战区，在这混战之区，说不上什么反革命统治之稳定，即陕西内部，也说不上是某一个一系军阀青〔清〕一色的统治。汉南、陕北久为吴、井两军阀所割据，冯大军阀势力最大之关中，亦四分五裂。一军借泾原战胜之余威，想尽驱关中杂色军队于关外，逼起一触即发之西府战事。所谓冯系之马鸿宾亦酝酿着倒冯！吴新田阴与吴佩孚来往，井岳秀对奉军暗送秋波，阎西〔锡〕山和陕西大部分杂色军队亦息息有关，凡此一切并〔无〕非是说明陕西内部各派、各系大小军阀混战互斗之无时或已。

在许多县份中，反动阶级也有许多纷争，甚至混战。

陕西工农及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不堪混战中之纷扰，苛捐杂税之勒索，拔壮丁、拉差、拉夫、……之〔光临〕，农村经济及工商业因战争日益破坏，革命情绪与行动日益积极。近数月来，全省各地民众反抗斗争之屡屡，东府、汉南、渭北、省西等地农民自发暴动之前仆后继〔继〕，处处证明陕西工农群众革命潮流之高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分化，日益显著，陕西客观上亦到了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

（三）

唯陕西 C. P. 还很幼稚，少经验，过去很少发动群众的正确策略。冯玉祥背叛前，有依赖政治势力之观念；冯玉祥背叛后，曾犯不斗争取消派之机会主义。扩大会后有一时期侧重反冯复蹈军事投机的错误。陕西民众革命怒潮过去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因而缺乏组织性与取得政权之明确认识，所以许多斗争与暴动，很少持久与结果。这种缺憾是省委第五次全体会所深刻的认识。

（四）

因此，陕西 C. P. 目前工作之总方向，必须本中央的新政策，过去的实际经验，彻底的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念，刻苦耐心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从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去使工农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自〔己〕动手的夺取政权，没收土地之必要。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历久潜伏的积愤尽〔快〕的开发高涨，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造成陕西割据的局面，以〔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

（五）

对于新旧军阀，打破侧重反冯利用杂色军队之观念，不管什么一军、二军，新旧大小的军阀，李虎臣……要一律反对，即是要打倒一切军阀，在他们混战中采取双方失败主义，鼓动民众破坏双方军事，破坏双方经济，……利用这个

时机，尽量发展工农兵武装暴动，即是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联合反军阀战争，这种反军阀战争，在陕西要格外的、广泛的、积极的、经常的宣传与行动。最近应举行一反对军阀战争宣传周，省委及各地党部均应有宣言发表。

(六)

对陕西农民，要根本打破落后，不能积极斗争……错误观念。变和平的、机械地恢复农协，甚至于企图利用反革命的国民党发展农运之幻想，为激烈的、开始即是斗争的、武装的反国民党的直接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的行动。在斗争中组织农民中以贫农为中心的农民〔于〕协会之内，在农运每次斗争中，均要提出“土地农有”、“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打倒当地〔统〕治者阶级，打倒豪绅地主”等口号。

农村中游击战争，应加紧开发。要认清游击战争是发动群众而至大暴动的一种战术。须纠正防止认游击战争为专门杀人的游击队之军事投机。

红会在陕，几无县无之，要积极本一般农运之原则进行，格外注意两点：A、由发动自红会群众本身实际生活要求之斗争，暴露反动领袖利用之罪恶，分化群众脱离其老师之愚弄；B、以农协来领导斗争，使红会群众加入和组织农协，渐次消灭其迷信组织。

在农民群众的斗争中，去建立农民革命军。开时〔始〕无武装时亦可编置半武装的与徒手的、施以暴动技术之训练。要经常抢夺、袭取豪绅地主的民团、保安队、溃兵、零星部队的武装，武装农民。

党应注意集中人力、财力于己竟〔经〕划定暴动之中心区域及重要城市四郊工作。

要做到农运党能深入以组织来领导，要努力在斗争中发展农村支部。

(七)

军事工作最重要的便是对于反革命军队之破坏；同志及工农群众之武装训练，全省各地所有的各种武装组织，不管是民团、军队、土匪、警察、保安队，

均一律要有计划地打进去。发展兵士支部，从兵士本身要求引起斗争，提出“土地归农民与兵士”、“兵士参加苏维埃”等口号，造成“兵变”赞助民众暴动之局面。在党领导下的军队应实际上变为工农革命军。初建立之小部分农民革命军，应注意加紧训练与暂保持秘密状态。目下亦难有全省统一的组织系统。务使要在农协指导之下，充实党的领导作用。

(八)

党应即刻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之不良倾向。对手工业工人，即城市贫民工作，即在各地普遍地进行。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领导他们从事经济的而到政治的斗争，组织秘密革命工会。要认清非产业区域的陕西，手工业、苦力劳动者、城市贫民即一种革命的主要群众，乃是党的主要工作〔对象〕之一。今后在各种运动中，党应注意到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的要求。若某县某市党部再说该县市无工人而不积极注意此项工作，那简直就是对革命怠工！

(九)

对于国民党政策之根本改变，省委本中央决议，早有决定，并在公开的宣传中屡次号召群众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但各地近来仍有利用国民党、甚至于利用国民党发展农运者（如渭南……）这种错误。应按照中央决议，省委最近关于国民党通告，绝对执行。并注意在各种群众运动中，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拿出我党政治面貌。

(十)

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是政治上机会主义的策源，机会主义的组织不彻底改造，新的反机会主义的政策无法实施。省委第五次会后，各地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前，必须自下而上的在斗争中改组各级指导机关，特别是提拔勇敢的工农分子，淘汰腐化、消极、怠工的旧分子；工农支部一律应由工农同志负责，

知识分子帮助作技术工作；区委以上各级委员会，工农贫民尽可能地做到

占全数的二分之一，至少须占约三分之一，常委中至少要有工农一人。各级组织系统，按照新的组织法改变，集中指导于各级委员会及其常委中。党的组织基础支部工作要马上切实建立，务须做到一切工作归支部之口号，以纳费到会，计算党员的数目。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前须发展至五千人，工农兵贫民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内部训练：（1）注意使一般党员群众讨论党内重要文件，了解党的新策略。（2）注意斗争中的实际训练。

（十一）

妇女运动在陕西可说是没有，今后仍注意劳动妇女运动。

（十二）

宣传工作要打破什么灰色面孔，在群众中露出我党的政治面貌，在斗争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格外注意反军阀战争，苏维埃革命，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国革命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尤其（与）苏联联合之必要。反帝国主义宣传应亦加紧，要与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之事实相连贯。要了解群众不知道党的政策怎能接受党的领导！

（十三）

对于 C. Y. 工作按照中央关于党团关系之通告执行。各级要经常予 C. Y. 以政治上之指导与物质上之帮助。

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自“九二五”扩大会议，几五越月，才召集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大会召集的原因有二：（1）最近接到中央许多重要文件和指示，陕西省委有重新审查过去政策的必要，并拟以决定新的工作方针；（2）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于三月中开会，陕西党应派代表参加，虽因环境不能召集全陕代表大会，但不能不可能的召集扩大会议，产生出席代表。一则可以把陕西党的精神带到全党大会去，二则可以把第六次大会的精神带回陕西党来。

扩大会于二月十八日晚开幕，十九日早闭会。到会者共十三人：省委委员除李○○^①入狱、郭○○^②有问题不能参加外，余九人全到会；长安县代表一人；西安市代表一人；蓝田区委书记一人；三原县代表一人；此外省委特许参加人耿○○^③因误记日期，未到会。其他县委因道远时口，均未能召集。

扩大会议事日程如下：

（一）讨论中央文件：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央公函第九号；

（二）报告：政治报告，党务报告；

（三）审查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

（四）对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提案；

（五）选举出席第六次全党大会代表；

（六）补充省委常委；

（七）其他。

扩大会选出出席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三人：潘○○、张○○、王○○（农民）^④。并补充省委一人李○○（农民）^⑤，补常委一人张○○（农民）^⑥。

这次扩大会精神在反机会主义、洗除机会主义遗毒：

（一）组织方面决定由下而上的彻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在斗争中发展党

的组织，改善党的成分，尽量吸收工农积极分子，洗刷腐化投机分子。

（二）在政策上，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和侧重反冯的错误观念。

此外对各项工作，在《陕西 C.P. 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中均有具体的指示，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应切实讨论，努力执行。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注：①即李子健。

②即郭世英。

③即耿炳光。

④即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

⑤即李茂森。

⑥即张振海。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各级党部：

渭南恶绅景行之、李兰轩及教育界反动分子刘明初、田宝丰、王武轩与薛明彰等，于二月二十八日带领流氓走狗多人，闯进宣化学校，将宣化学校之教员学生全行赶走，便将宣化观以武力夺据去了。于是激起了渭南全县学生与犹西里全里民众的公愤，于二十九日黎明时，即在宣化观外集合五、六百农民，二三百学生，齐喊“打倒恶绅”的口号，哄进宣化观中，将刘明初、薛明彰二人用杠棒、石块当场击毙，将田宝丰打了个半死，把王武轩倒栽葱的投入井中，田、王二人现亦死了。只可惜景行之与李兰轩二人于先一日晚因要过瘾而回家，竟然免脱了。

数百民众一霎时打死了四个大恶绅，这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当然立即会引起全县人民的注意，轰动了全县。一般民众自然是无不称快，只有驻军、官厅以及豪绅们则于悚怖惊慌之下，一定要作最后的挣扎，用白色恐怖手段来镇压报服〔复〕。因而军警衙役四出捕人，凡教职员、学生、犹西里的农民与一般学生的父兄皆在被搜捕之列。军警衙役等借此勒索凶殴，无所不为，闹得日夜不安，鸡犬不宁，学校都无形解散了，教职〔员〕及学生也都四散了，渭南全县整个的入于白色恐怖的骚乱状态中了。民众于此更深刻地认识了豪绅的残酷，军警、官厅只是豪绅的保镖者，而斗争的情绪更为高涨，斗争的决心更为坚定了。所以宣化斗争有日渐扩大深入，一直发展到渭南全县大暴动的趋势与可能。

渭南县委在此次斗争中的确是站在民众的前边领导民众向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他们在斗争发动之前，能注意到民众的力量，领导学生及农民群众来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在斗争开始之后，能有继续发动群众努力，使它延长扩大的计

划，这都是领导斗争的正确策略。陕西各地过去简直没有发动斗争，即有亦不是不彻底的算帐，就是纯党员的暗杀，甚至有以命令党员群众将恶绅痛骂一场为称快（长安县委）；有民众起来要用他们的力量在成万的群众大会中打死恶绅，而当地负责同志反以身家性命担保，替恶绅说话，阻止民众（华县县委）等怪表现。能领〔导〕群众采〔取〕彻底的手段做杀尽豪绅的斗争，简直可以说没有过。有，就是渭南宣化斗争。宣化斗争在陕西党的工作上，的确是一新纪元呵！

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的勇敢地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并不断的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纷〔动〕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这固然不是一天两天急切所能做到的事，可是这是由此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形成的，决没有什么阶段可分，亦决不容许徘徊观望而有所等待的。我们看最近月余农民自发的原始式的暴动，在河北、西府、东府等地，此起彼伏的不断地爆发，可以证明了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我们再看大小新旧军阀与省、县政府以及一般豪绅对于农民的剥削压迫，仍在那里一套一套的翻新花样，想尽方法的来使之加重，即可以估定农民的革命情绪只有继续高涨，农民反抗一切剥削压迫的斗争亦必是日益加剧。只要我们的党能站在民众的前边，积极地领导民众不断地与一切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并能领导这种无组织的原始暴动，使之成为有组织有弹性的斗争，继续延长而扩大之，与各地有组织的民众斗争，在斗争中不断的联合会集而形成一县或数县的民众大暴动，则全陕的总暴动决不是空谈妄想，也不是几年几月后而才有希望实现的事。而的确是由现在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即可以实现的。

各地对于宣化斗争，不仅应翻印渭〔南〕县委办的“渭南农民、学生为什么要打死恶绅刘明初及败类薛明彰呢？”〔之〕宣言，代发传单，努力向民众

宣传，并领导民众团体起而声援，而要更进一步的切实执行下列的指示：

(1) 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城市中则应立即动员，打入手工业工人及劳苦群众中去，发动一尽可能（以尽发动）（广泛的）经济斗争，渐次扩大为城市大骚动，对于小商人亦应努力领导他们起来作反抗捐派的斗争，在学生中则应努力发动学生争本身利益及反抗反动教职员的斗争，延长扩大而为条尽皮动的教职员及学生的大风潮，这不仅是以斗争来响应宣化的斗争，这即（的）确是我们的党在陕西目前所极应进行的唯一工作。

(2) 在各种斗争中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杀尽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派，使斗争由投入扩大而一直转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

(3) 在各种斗争中，即可建立农民苏维埃——乡村农民代表会议，指挥斗争。不惟不要呆板的去恢复农协或组织农协，而且要尽可能地建立指挥斗争的乡村苏维埃，若是其他农民对于农协怀有信仰，则当然以农协来指挥斗争为顺利；可是切记的是要在斗争中来恢复他（参看通告三十六号）。

(4) 在斗争中武装同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斗，袭击摧毁并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的武力——军队、警察、民团等，并夺取其武装，以武装同志，武装工农。

各地对于游击战争的意义，现在犹多不了解，总是派几个或几十个同志凭空的组织几队游击队，在深夜旷野中偷偷地暗杀上两个恶绅，就叫做开展游击战争。完全失掉了群众，只能叫做特务工作，决不是游击战争。所谓游击战争，是要在群众斗争中，将勇敢急进的分子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杀豪绅、杀官吏、杀地主、杀一切反动派，夺取武装，破坏反革命的交通，如拆毁桥梁、电线、车道等，破坏反革命的征收机关□□□□或焚毁厘局、税卡、粮秣局、仓库等，破坏反革命的统治机关，如捣毁衙署、团局等。所采（取）的战术是游击战术，忽起忽没，忽聚忽散，避实就虚，避大击小，或者散伏农村，或者隐聚山中。

（详参看游击战争与游击战术，不久即可发来）游击战争的开展，要有群众，而游击战争的主要目的，尤在发动群众，这样的游击战争，才能扩大为大的民

众暴动。

各地应立即改正过去的错误，在斗争中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尽他——游击战争所应尽的任务。

(5) 各地不仅应立即发动群众斗争，并应不断的发动民众的各种斗争，在每一斗争中，都应努力使之继续延长扩大。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而军阀们的剥削压迫又日益加甚，农村的经济恐慌已达极点，一般贫苦农民的脑海中都充满了痛苦与愤激，这正是发动斗争的好时机。革命的爆发须要抓住时机，这一个爆发斗争的好时机，决不要轻于放过，否则就是出卖革命。

(6) 各地于斗争开始后，应即全体动员，除努力的继续延长扩大已发动的斗争外，并应普遍（遍）的陆续发动种种民众的斗争，以斗争来响应斗争，一直的汇成该地的民众大暴动。

(7) 各地过去对于城市工作太得忽略，党在陕西现在可以说在城市中没有一点根基。要知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陕西虽非工业区，没有大量的生产工人，但是若不将城市的手工业工人及劳动群众抓住，则城市中连响应作用也失却了，所谓大暴动与总暴动是不容易取得胜利的。各地现在应立即用最大的努力，打入手工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市民中去，发动并领导经济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树立党的基础。于不断的斗争中，造成城市的大骚动。这一工作尤其是西安市委与三原县委、榆林区委应特别注意的。

(8) 各地过去统通的犯一错误，即是但有一点事故发生（也可以（说）就是斗争罢），不唯忘了他的主要工作——发展组织，而甚至连各种会议都不是忙的不能开，就是怕的不敢开了。这真是陕西党的特异现象。各地现应努力改正此一错误，于斗争中要加紧各级的各种会议，唯有多举行会议，才能推动这一斗争中的一切工作。于每一斗争发动时，即应有发展组织的要求计划，于斗争中时加督促，务使能依照原定计划而实现之。

(9) 各军队的武装同志应尽可能地尽量在斗争中尽他们应尽的责任——帮助农民斗争，民众斗争发展到相当程度，则应采用各种方式（兵变、携枪潜逃等）实行破坏反革命的武力，领导革命的兵士群众，携带武装，散布到农村，

帮助农民作游击战争，有组织农民革命军可能的，即应与武装农民共同组织农民革命军，以作农民大暴动的前锋。

〔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这是省委针对渭南发生的宣化事件，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新政策”即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制定的要求由宣化事件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的文件。

潘自力关于陕西党组织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陕西全省组织情形大概如下表：

县委：1. 长安	人数 325	
2. 渭南	约 500	
3. 华县	约 500	
4. 古市	约 340	
5. 三原	约 350	
6. 蓝田	86	
7. 礼泉	约 90	
8. 榆林	人数不详	} 此三县属陕北特委 以前共有 360 人
9. 绥德	人数不详	
10. 延安	人数不详	
11. 临潼	人数约 80	

陕南特委下共有人数约 30

市委：西安 人数 136

全省党员总数量约三千人上下，其职业成分：农民占百分之四十强，知识分子百分之四十，手工业、兵士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省委负责同志成份，正式执行委员九人，有二农民同志，其余均为知识分子；候补委员二人均农民。常委五人，内有一农民（C.Y. 代表一人参加，有表决权）。各县委负责同志农民约占五分之一弱。各农村支部干事会农民占三分之二强。

陕西没有产业工业，故无产业工人组织之可言。

团的近况：团员总数量约三千人，团会成分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党团关系过去（在区委时代）很不好，党有无形取消团的倾向，使团在组织上都〔无〕

有相当的独立性。党可以自由改组团的省委。取消团中负重要工作的同志，而不经团的干部或 C. Y. 中央的同意。在省委成立后，才日渐改善。但因党对西北农民及党的力量的估量问题，团不同意，曾向党提出书面意见。而党的省委书记因〔此〕平常与 C. Y. 书记个人有许多争执。后经党省委容纳 C. Y. 省委意见，在省委第三次全体会^①改组常委后，党与团的见解与政策日趋一致，党团关系自此改善得多了。

党员入党手续：知识分子入党须正式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候补期一个月；工农入党只需一正式党员介绍，无候补期。

组织的发展情形：在冯玉祥反动后，陕西党员数量由二千余减少到一千四百余，最近则又发展到三千人了。最近入党党员成分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征收党员运动，没有举行过。

最近新党员入党的动机，自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一般工农日益感觉自身受剥削压迫的痛苦，自己常自发地斗争。结果因无组织和党的领导，多归失败。我们此时向他们宣传，他们很容易接收〔受〕，他们来加入我党是为欲解除自身的痛苦。过去有些地方的农民同志看到自己指导机关——区县委的动摇、怯懦不敢坚决地领导农民斗争，农民而声言：“假使你们不愿意干，那我们就要退出党了”。很可证明他们入党的动机。最近士兵及知识分子入党，也是同样的动机。因为不革命的，此时不敢加入。

最近吸收新党员的计划：到四月底党员数量要增到六千，成分工农兵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群众实际斗争中，介绍积极、勇敢、忠实的分子入党。

新的组织工作计划为彻底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决定各级党部在斗争中由下而上的彻底地改造党的组织。同时注意改变党员的社会成分，多吸收雇农、贫民及城市贫民、手工业工人入党。在全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各县区委指导机关，尽可能地做到工农占二分之一，至少须绝对口到工农占三分之一。农村支部必须做到由农民同志担任书记或干事。在必要时可由知识分子帮助其做技术工作。规定到四月底各地党部发展组织的对象及其数量。各级党部绝对口要有集体的指导，从斗争中改造组织，改选组织，以适用〔应〕斗争。绝对不许各地借口组织未改造得好，而暂时停止或缓和斗争的错误观念存留在脑中。

必须：1. 在实际斗争中训练同志。2. 使同志尽量地讨论党的政策及一切重要文件。

收党费的方法：多由支部负责，在每月初旬支部或小组会议中催收。由经常收入每月在十元以下的每月交纳党费二角，无经常收入的知识分子每月收大洋一角，农民每月至少交铜元五枚。

省委的组织现如下表：

<p>省委全体执委 五委皆米周。委时九五委皆次（胡 仲璠，委时仲璠（十台所缺）兼舍兼常取扶，人二组学党会 常务委员会 系具英世聘，新组兼而，人二仲璠 ，煤人能替②志同群 康李因，会大飞委皆次二景日八十月二 。林 潘 胡 森 苏 李 志 同 另 党 组 取 扶， 仲 璠 志 同 新 组 兼 仲 璠 以 党 先 党 职 组 宣，②大 秘 工 兼 交 义 特 仲 全 委 皆， 内 凡 四 五 景 行 工 委 常 组 文 苏 书 央 中 新 组 务 二 景。 跟 同 参 党 因 团， 新 组 兼 组 运 井 照 组 中 心 科 太 四 景 科 代 委 常 兼 次 三 景。 新 组 兼 仲 党 动 公 织 传 通 中（暂 缺） 案 草 照 同 献 土， 案 党 次 苏 丑 一 会 开 同 同 会 局 委 各 行 举 照 例， 党 会 次 两 同 群 委 常 皆 ， 非 工 司 具 志 同 另 党 一 首 亦 照 组。 非 工</p>	
<p>会 科 科 股 科</p>	<p>会 文 通 计 书 中（暂 缺）</p>
<p>潘自力 徐梦周 李子洲 刘纪曾② 王松年 农民 张金印 C.Y. 代表(知)</p>	<p>李子洲 徐梦周 刘纪曾 张振海 农民 曹子仁③C.Y.代表(知)</p>

职工运动委员会三人，主席胡宪之（知），余二人由新常委指定。

组织科主任 徐梦周（知）；秘书科主任 刘纪曾；

宣传科主任 亢维恪④（知）；交通科主任 景云。

现在省委系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陕西省第一次扩大会议中选举出来

的，委员没有中央派定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取消耿炳光同志的书记，开除常委后，以候补委员潘自力同志递补为省委正式委员，并增加胡宪之（担任职工运动的）、苏士杰（担任军事部）、王松年（农民）为省委正式执委。原来省委正式执委七人缺一，三次全体会决议增加二人，并取消张含辉（知识分子）的候补执委，递补候补二人，而张振海、郭世英具系农民同志。

二月十八日第二次省委扩大会，因李秉乾同志^⑤被捕入狱，决定以候补张振海同志递补，并增加农民同志李茂森做候补。

最近四月内，省委全体会议召集了四次^⑥，第一次讨论党务政治、国民党等问题。第二次讨论中央文件及改组常委，执行政治纪律。第三次新常委分工。第四次讨论中国的现状及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草案、中央致陕西省委第九次公函，决定陕西 C. P. 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

省常委每周两次会议，能照常举行。各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尚多不能照常举行，省委曾派出巡视员巡视各县区工作，但因其方法不善，结果不很好。在过去省委与各县区，因交通不灵便及本身的不健全，对各县区工作指导，多有不周到的地方。

省委委员除知识分子到省委工作外，农民同志均未到省委工作。但现在有一农民同志在省委经常工作，余均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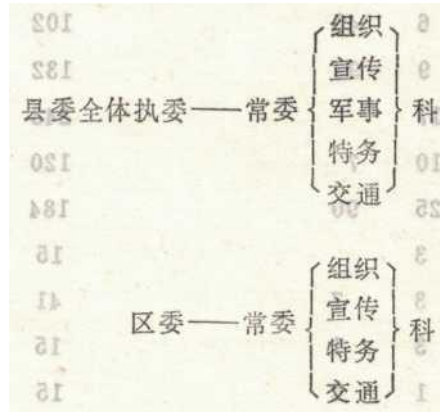
省委委员有二县委候补兼农村支部书记，但过去未到过省委会一次。

过去省委曾提出许多重要文件（中央及省委的），如中央公函及省委的政治报告，发到下级党部讨论，但很〔少〕有讨论的结论送交省委。省委过去太不信任群众了，所以有西北农民落后、党落后的理论出现。但群众的革命情绪是很高涨，且错误倾向尚少。省委没有同支部直接发生过关系，只隶省委的党团现在亦没有。省委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坏，很少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宣传工作，没有出过单行本的小册子。但在省委的《通讯》上，曾有一种《怎样干》，多系内部教育性质的。最近出有单行本的《怎样干》，内容多系翻印《布尔什维克》上的材料，用省委名义发的。宣言有《为广州十二月暴行告陕西工农兵士贫民书》，数量约三千。散发宣传品在乡村多用张贴方法，在城〔市〕则张贴

与散发兼用。但在城市中公开阅看的人很少。

过去训练一般党员的方法：多是机械式的会议，很少在实际斗争中去训练他们。对新党员训练的方法，除开会、纳费、使其参加工作外，则用个别谈话的方法。

县区委组织的系统如下：



改组后之长安县委，改组后之三原、华县、固市县委，新成立之礼泉、临潼县委均由代表大会选举的。区县委每月内向省委作报告一次，但有多半不能按期报告。报告内容约分：1. 政治与党务概况。2. 组织工作。3. 宣传工作。4. 农村工作及党的策略。5. 团的工作概况。过去县区委日常工作，多注意机关的争斗，即是太重视议会式的争斗，总是忙碌于应付环境，寻思纵横捭阖的策略，很少注意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各地小的日常斗争，划归区县委指导，县区委每周派人到各部报告政治与党务，但县区委很少能尽其本身的责任。

支部：支部的组织，多是按照生产小组的原则组织之。

支部——支部干							九月		
地名	组织	支数	农	工	店	其它	总数	男	女
西安	市	10					110		
长安	县	33	130				180		
渭南	县	20	115				213		
三原	县	6	40				102		
五一	县	9	93				132		
绥德	县	17	93				243		
延安	县	10	7				120		
华县	县	25	90				184		
泾阳	区	3					15		
□县	区	3	7				41		
岐山	区	3	4				15		
高陵	支	1	2				15		
旬邑	支	1					13		
淳化	支	1							
礼泉	支	1							
武功	支	1							
兴平	支	1							
蓝田	支	1							
临潼	支	1							
华阴	支	1	2				10		
蒲城	支	1	1				15		
富平	支	1					11		
雨金	支	1					36		
关山	支	1					56		
平凉							4		
共计：市委 1 县委 7 区（特） 3 特支 14									
普区 16 普支 153									
同志总数 1591 内农民 518人									
无组织的地方									
合阳	11	朝邑	5	韩城	1	澄城	9	白水	1
户县	20	□□	2	扶风	1	永寿	2	凤翔	2
咸阳	6	陕南	30						

C. Y. 同志有一千九百余人，过去全未注意劳动青年。

注：①应为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下同。
 ②即刘继曾。下同。
 ③即曹趾仁（曹志麟）。

④即亢心裁。

⑤即李子健。

⑥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二月四个月内共召开了五次全体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的第一次全会，十二月七日的第二次全会，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的第三次全会，一月五日的第四次全会，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的第五次全会。潘自力将三、四次全会算作一次会议，因此说省委在此期间召开了四次全体会议。

*根据中央通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选举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为陕西出席党的六大代表。后六大延期召开，潘在上海向中央写了这个报告。

陕西工作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陕西代表团出席，中央会议决定)

从表面上看，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应当比那些军阀混战剧烈的省份要稳定些。实际不然。不仅不能较为稳定，反而是变为不稳定，更为动摇而趋于崩溃。在陕西这样的地方，交通闭塞，工商业没有发达，工商业资产阶级还极幼稚，因此冯玉祥这一军阀，他在陕西自然只是一部最反动最落后的豪绅地主的代表。换言之，他的统治是建筑在对于工人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般贫苦民众的剥削上面。在陕西这样穷苦的地方，加以连年战争四围受战争的封锁，豪绅地主是没有能力可以养得起巨大数目的雇佣军队的。自然的结果便是金融恐慌，财政破产，冯玉祥的出路只有更加与较大的豪绅地主勾结，对于工人手工业者贫农自耕农小商人甚而至于小地主，实行更残酷的剥削，对于军队扣饷不发，因而愈加激动了工农兵及一般穷苦民众对于反〔动〕统治高度的怨恨和反抗的斗争。同时各小军阀之间也就争军饷源争防地而互相冲突各不相下。现在陕西的事实是：第一，财政破产已到了绝境，自冯军入陕后在陕发行金融流通券，西北银行钞票，富秦银行钞票，共计二千多万元，现在低落到一钱不值，在今春阴历年关，所谓制钱票，每元可买八十余串。冯玉祥到了这样地步，他的挽救方法便是一方面继续滥发纸币：如恢复西北银行，强迫流通，富秦银行，改发角票；另一方面，则巧立名目加重对于人民的剥削，如最近发行不兑不流的有奖公债六百万元，只西安一处加抽房捐三十万，举行粮秣捐，每亩抽二斗或抽四十斤米四十斤柴，如举行指烟款每亩抽五成（六元半）。至于苛捐杂税，在陕西，已是无数可举。

这样的办法继续下去，很显然的只有使财政破产至于零，同时也就激成

了第二农村的反抗，从去年以来，关中一道大大小小临潼、华县、渭南、富平、三原、泾阳、长安、敌（固）市等十五六县，每县起来的斗争，不只一次，比如澄城则先后十几次。在汉中道榆林道，同样的有许多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起来，虽然这些斗争大部分被压下去了，但农村反抗的形势是更加严重和普遍。第二，因为财政的破产，军饷的浩大，所有陕西军队从来没有正式关过饷，阴历年节冯军发二块钱，杂色军队还只发一块钱。因此兵士不愿当兵，逃亡的事实一天天增多。第三，便是军阀统治内部的冲突，冯玉祥在陕西的势力实际只有关中道二十二县，陕北为井岳秀所盘踞，汉中则多半在吴新田手中，冯玉祥税收范围和政治军事的号令都仅及二十二县，而且这二十二县嫡系兵力仅有六千，还有近万的非嫡系兵力杂口，而不能成为完璧。陕西的反动统治到了这样地步，实在不仅不定，简直已在崩溃的过程中。冯玉祥是否在挽救这个危机呢？没有，绝对没有，他在继续作战，一切都是加紧促进这种危机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陕西的革命环境是再好没有的了：不仅反动统治特别削弱，而且有普遍的反抗反动统治的自发斗争和继续不断逃脱军阀战争的兵士革命化。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陕西现在仅只有了这座自然形成的客观的革命条件；还没有经过无产阶级的政党 C. P. 的领导，把这些条件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深入的革命局面。现在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很显然的还是比较原始的幼稚的，工人运动在陕西党部差不多未列入过议事日程，无论大小城市，工人零碎的自发斗争与我党毫没有关系，工人群众既没有工会的组织又没有我们的领导，所有斗争都是零星的起来，零星的被消灭下去，不能形成。

在关于〔中〕十余县数百次斗争中，反对豪绅的运动只有华县一次，反对民团（地主的武装）也只有长安、临潼一二次。所谓反抗捐税的运动，实际是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而与雇农佃农无直接的关系，因此这种运动，是中小地主与贫富农民混合战线的运动，而其领导权则在豪绅手里，其利益也归于豪绅，红枪会和大刀会的斗争，便是很好的实例。因此这种运动在〔再〕如何普遍，不能算是直接的土地革命的局面。而且这种运动既然多是进行于豪绅地主与农民的混合战线之下，也无进到土地革命局面之可能，此其二。至

于兵士运动，虽然有极好的环境，但没有有计划地开始工作。旧有的一部分军事基础因为没有工农群众的斗争与之联合一块，结果也只能有单纯的军事行动，李象九的失败，只是失败于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已，没有激烈的工农阶级战争，自然工农武装训练也没有开始，此其三。总之，现时陕西工农兵士的斗争，还只是一种无组织无计划的自发斗争，没有进到深入的土地革命的斗争。要使这些自发的斗争阶级混合分不清的斗争，变成阶级的土地革命的斗争，主要的等待我们党能够彻底的在新的策略之下有组织有计划去领导他们。

陕西党部一直到现在还陷在很深的机会主义的当中。陕西工农群众的斗争所以只能有这样的敷衍[肤]浅的程度，主要的是由于我们陕西党部历史上以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冯玉祥初入陕西而来明显反动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是离开群众（本来没有深入群众），只作了一些从上层帮助冯玉祥的工作，没有能和北伐期中两湖一样能抓住那个时机发动一个工农革命的高潮，以此在冯玉祥未反动的时候，我们在陕西就只有些招牌、工农会和学生运动、国民党部，没有群众的基础。冯玉祥正式反动一来，陕西省委的策略在“我们羽毛尚未丰满，反冯尚非时机”的理论之下，客观上接受冯玉祥的意旨通告停止民众运动，毫无计划的退守到最后的地步，停止一切工作。“八七”会议后，中央命令陕西省委反冯，并指示不要幻想二军三军可以反冯而要依靠在群众的基础，发动群众的斗争，形成群众的反冯势力，可是省委并未真实执行这一命令，仍不信任群众力量，以自己一部分军事基础与二军三军及其他杂色军队勾结反冯的军事投机的把戏，依旧没有去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后来这杂色军队反冯战争失败，我们党随着没有办法了。这样的现象一直延到今年一月省委改组，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新的精神才开始被陕西党部接受，但是中央新的种种策略和土地革命进行的方法还没有得到陕西省委的正确的了解和运用。所以陕西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个新的布置，党的组织从下而上的改造依旧未曾进行，因此对于陕西革命的前途和工作的布置有重新估量和规定的必要。

长期的国内军阀混战虽然已经促进了各个军阀的削弱和崩溃，客观上造成了许多革命的环境，然而任何一军阀都没有办法消弭自己对混战局面的继续，加以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宁浙帮与广帮显然的对峙），帝国主义

的勾结利用（日之于蒋，英之于桂系），使所谓北伐成了各大军阀蒋冯阎桂互相推诿牵制的局势，在北伐的幌子之下，酝酿了日益严重的蒋桂系最近将来的大战。而且因为雇佣军队的无限制的扩充，豪绅军阀的冲突，各种小军阀的互斗随时随地不断的爆发，这种种大小军阀的明争暗斗，很显然的是继续对于劳苦民众加重剥削榨取上面，一方面促进了工农兵革命的高潮，一方面加重了军阀自身的崩溃削弱。陕西现在已经是军阀统治最脆弱而内部冲突最复杂的地方，虽然我们党主观上的机会主义放弃了对于工农的领导，错过了许多客观的机会，然而工农自发的斗争一点也没有停止过，兵士也一天天的革命化，革命局面的自然发展，毫无疑问的前进不已。谁说陕西工农落后？那只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自饰之词。

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城市和矿山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发展到政治斗争，造成农村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在农村领导自发的斗争转变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造成乡村的割据。进行反革命军队的兵士工作，从军队中反抗长官以及经济的日常斗争做到兵变与农民暴动联合，缴除反动民团的武装，实行工农武装训练。在另一方面彻底的肃清党内机会主义，使每个党员参加斗争，从斗争中不断的坚决改造党，使之成为真能领导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如此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陕西的党必须为此艰苦有计划有步骤的从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的革命基础，然后才能达到革命的前途，而不致于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又从新作出不要群众的军事投机或小资产阶级拚命的盲动主义的错误。

在此总的任务之下，陕西党的工作更可按照下列的方针具体的执行：

关于职工运动

（一）陕西还没有新兴的工业，仅在西安有一个制造局有二百多铁工，北同官、澄城有几千土法开采的煤矿工人，蒲城盐滩有四千余盐工，因此在陕西职工运动的对象应当是制造局工人，煤矿工人，盐矿工人，各城市的市政工人

（电灯工人，打扫工人……）、邮务工人、手工业工人、车夫码头夫等苦力工人、印刷工人、店员等。

（二）城市工人运动的下手方法，是利用种种的关系（如戚族朋友等个人关系都可利用）与各业工人群众接近，城市上每一个同志可限定去找几个工人谈话，由渐而进的接近许多工人，找出他们的切身痛苦，把他们的痛苦变成几种要求和口号向一般工人群众宣传，告诉他们团结起来，向厂主店东提出，由此发动各业各厂的经济斗争和职工运动。

（三）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组织，不必限于工会的名义，任何名义都可以用（如饭堂、学校、俱乐部、体育会、拳术会……只要工人群众愿在这种名义之下团结起来），因为每一个斗争，如果工人群众自己没有一个组织是必然失败的，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尽力帮助工人组织起来，而不必拘泥于形式和名义，不过我们应随时随地宣传工会的意义，使群众懂得要有自己的工会，而改变过来。

在陕西，没有我们的工会，也没有反动工会。因此我们要注意使各业工人组织成为整个的统一的工会之下面，如果群众是散漫的不集中的可以适用十人团的组织，在矿山工厂工人群众是集中的，则下面可组织各处的工厂委员会。

（四）工会执行委员会须由工人代表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中须多有□□同志的工人负责。

（五）工会须有较公开的机关与群众接近，虽然这种机关表面上可以用种种灰色的名义。

（六）□□和重要的工人区域，须派专人负责，同时须命令城市同志全体动员做工人运动。

（七）职工运动经费须○□，不移作别用。

（八）每一城市，和每业工人须有一切实的工人运动计划，每两周规定一次。

（九）各县工作，无论农村斗争如何紧张，须不忘记城市的工人运却。现在的县委如果在乡下的须移至城。

（十）在每个斗争中，斗争前后多开工人代表会议（种种形式的代表会议，

如罢工工人代表会议，一个业的工人代表会议，一个区域的工人代表会议，失业工人代表会议等），由代表会议议决一切，因为这就是城市苏维埃的先步。

（十一）在工人中找出勇敢的分子，编成志愿的工农革命军，实行武装训练，射击、巷战等实用的训练。

（十二）经常的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工农武装暴动，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等政治口号。

关于农村斗争

（一）现在是春耕的时候，也正是农民春荒的时候，我们找着这个时候发动农村中广大的斗争，主要的口号是：抗捐、抗税、抗债、抗粮秣捐指烟借款，开豪绅地主的仓，把粮食拿来分给饿饭的民众吃，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来救济民食，杀豪绅地主等。

（二）领导自发的抗捐抗税的运动，我们要提出进一步的口号，不缴一个铜子的税给政府，杀政府的收税吏，烧毁政府的一切征收机关，杀死阻挠抗捐抗税的豪绅地主，杀死一切抗捐抗税不彻底、中途与政府妥协的豪绅地主。同时应向穷苦民众宣传豪绅地主只是利用农民群众去向城市政府示威，等到他们得到少许利益便马上与政府妥协，而出卖群众，继续合作的剥削群众，因为他们本来是与政府勾结榨取穷苦农民群众为生活的，我们要不饿饭，不挨冻，只有起来杀死这些坐吃农民的豪绅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回田地分给大家耕种，在乡村建立自己的政权，由农民自己管理支配一切。如此，有步骤的勇敢的领导农民群众，从简单的反对苛杂的运动转变成为彻底的抗捐抗税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的运动。

（三）在没有自发斗争的地方，采用游击队作战的办法，三五个或十几个人一个队，携带武器，杀豪绅地主，焚烧房屋，没收其财产、粮食，分给一般穷苦农民，焚烧一切债券契约，以发动群众的斗争，如果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农民对农协有信仰时则可以农协名义，经过同志或会员的活动召集起群众，宣布土地革命杀豪绅地主的主张鼓动群众立时干起来，这样一开始便是群众的斗争，比游击队的办法还要好。

（四）无论何地，一有群众斗争起来，即须选举苏维埃成立乡村政权，实

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即是暴动的指挥机关，使农暴得到公开的指导而继续扩大。苏维埃一经成立，即宣布取消农民协会和其他指挥农暴的机关。

(5) 一个地方的斗争一经起来，即须迅速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用群众包围突袭的办法解决附近民团及一切反动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扩大农暴。须〔知〕农暴是武装的斗争，取得武装便是取得胜利的条件，所以应时时刻刻注意武装的夺取和训练。

(六) 一个乡村的暴动一经起来，须尽力肃清本地的一切反革命派和一切封建关系，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完成乡村的割据局面，同时需以群众的力量向外扩大暴动的局面，如果只是保守苟安，暴动的胜利，是不能保持而必然失败的。但进取必须是群众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不然也是会失败的。暴动发展的方面应当趋向政治中心（市镇或县城），一乡的暴动如此，一县几县的暴动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一县之内，如果没有几个重要的乡村割据局面之完成和城市运动的相当的发展，不可以单靠一部军事的力量去占领县城（如果是有计划的去夺取县城武装，当然与占领不同，是应该做的），因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决没有胜利的把握，失败了足以使群众的情绪遭受挫折，而影响全局。

(七) 群众一经起来，把豪绅地主杀了即须立刻宣布分配土地（照中央通告），分配土地与建立苏维埃同样的重要。如果不重新分配土地则封建的基础根本没有变动，一切行动都属滑稽，与土地革命无关。如果杀了地主烧了房子而没有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那么我们的行动与流寇没有什么差别了。

(八) 对红枪会大刀会土匪应取根本消灭的政策，不幻想他们的组织可以参加土地革命。所谓消灭，当然不是机械的用大炮打消他们，而是要打入他们的群众宣传群众，脱离反动的领袖，个人的群众的跑到农民暴动方面来，主要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爆发广大群众的农民斗争，用群众的势力和暴动的榜样公开的威吓其首领而吸收其群众参加。红枪会和股匪的组织不使之根本消灭，而想联络其首领，希望他带领群众来参加土地革命甚至视他做一种主要力量，那不仅是幻想而且是极坏的军事投机。

关于军事工作

(一) 无论是冯玉祥的军队或其他杂色军队，□从来没有正式发过一□饷，

而所有的军队又大部分是土著，并且冯玉祥（招）募的军队还是强迫抽丁来的，因此军队中的兵士的逃亡日益发达，这是证明士兵的革命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士兵工作是很容易做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经过同志工会会员农会会员去与兵士接近向他们宣传，进一步进行士兵委员会名义上的号召：（实际有党的支部原不必要组织士兵委员会）和党的支部的组织，宣传主要口号：（增）加月饷，按月关饷，关饷一律大洋，反对克扣军饷的长官，军口公开，反对打骂兵士，革命兵士不打工人农民，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和农民一块分配土地……等。

同时应组织同志和农民分配到各军队中去当兵，根据上面的方法进行工作，每一排兵如果有二三个得力的兵士便可发动全排兵士。

（二）对于现在拿在同志手中的几部分军队，省委应派人去召集负责同志和兵士支部会议，宣布和讨论党的策略。选拔积极的工农或□□的知识分子的同志去当代表集中力量发展兵士工作。组织上仍保持秘密状态。

（三）反革命军队士兵的叛变和我们的部队的暴动，须与工农暴动聚合一块，就是说必须是响应参加工农群众的暴动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暴动。象李象九的部队，虽然暴动缴了一些反动军队的枪支并且占领了县城，但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是单独军事暴动的原故。因此省委要有计划的去发动各地工农暴动，同时进行士兵工作使之与工农暴动联合起来（无论暴动时是工农民众先发难或者（是）士兵先发难，但整个的动作应当是联合一致的）。

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而要来解决我们时，我们当然应当毫不游疑（犹豫）的暴动杀反动长官缴枪枝，跑向农民群众中帮助或发动暴动。

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应绝对纠正工农暴动中等待军事力量的观念，这种观念实际是不相信群众的军事投机的观念。

（四）依照中央颁布的组织法在城市工会组织起来时即组织工军，在农村组织农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暴动起来之后，军队中党的组织完全公开，乡村游击队可称赤卫队。

工农军的作战，要与广大的群众在一块进攻，即是以群众为主力军队为辅助群众的付力。要把军队随着群众分作几部分向敌人四面八方包围袭击，而不

可以工农军单独与敌军正面作战。这是南方工农暴动的经验，我们应当拿来应用。

（五）对于警察民团和一切杂色武装，一方运用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办法，一方以工农暴动随时解除其武装。

（六）省委及各县委须组织士兵运动委员会，计划并指挥破反工作。

关于党的组织

（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有其组织上的来源”，在陕西充分证实了这个公式。陕西党员的数目将三千，其成份则是农民占百分之四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四十，兵士占百分之六弱，其他百分之十，工人仅仅百分之四强，其中农民的成份又不是贫农占多数。各级指导机关大部被知识分子包办，执行了很长期的机会主义政策。省为〔委〕原为长期的机会主义指导机关，一直到今年一月才有部分的改变。因此种种，中央“八七”会议以后的新策略和中央几次对于省委的书面的指示，均没有能够达到群众中去，其效力几乎等于零。现在如果要改正陕西党部工作的路线，而能把中央的指示具体的在群众中实现，很显然的要从党的组织上加以彻底的改造，否则，中央的一切指示，将如过去一样等于具文。

（二）因此，省委应当将“八七”会议以来中央对于机会主义的各方面的纠正和新策略和中央这次对陕西的决议案提出全体省委会议激烈的讨论，谁反对中央的指示或谁表示游疑〔犹豫〕不肯真实执行中央的指示，即应退出省委的指导，同时并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制成各方面具体的工作计划，督促各级党部执行，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省委须将中央八七会议以来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和新的策略制成讨论纲要连同中央这次对陕西工作的决议案发给各级党部，从县委以至支部小组，经过党内激烈的讨论，洗刷同志中机会主义的遗毒，撤换各级指导机关对于新政策怀疑或表面接受而实际不忠实执行的机会主义分子，同时选举新的指导机关，无论在县委区委支部小组，在这种讨论中同时须做一个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和该党部的工作计划。

对于重要的党部省委须派出省委委员亲去指导从县委一直到重要的支部小

组。县委必须出席各区委和支部的讨论，区委必须出席支部和小组的讨论。下列的党部省委至少须派人指导：长安、周鱼、户县、澄城、合阳、临潼、华县、故（固）市、蒲城、渭南、富乎、三原、泾阳、蓝田、礼泉，及其他重要县份。

（三）省委要很坚决的命令每一个同志参加工作，每个农民同志应去发动农民暴动，每个工人同志应去发动工人斗争，千二百人的知识分子，须调一百至二百到乡村去发动农暴，留在城市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除开党的特许外每个人须参加职工运动。凡是游移不前和怠工的，省委须不迟疑洗刷出去，当然命令他们去工作时，同时须使之了解新的政策和工作方法。

必须经过这样的党内发动，工农群众的工作才能做起来，党内的机会主义的遗习才能改变过来。

（四）各级党部须于斗争中充分吸收工农兵士入党，农民同志成份须使贫农占多数，特别是工人的成份须尽力的增多。

同时党的改造决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须于不断的斗争中不断的改进。

（五）各级指导机关须遵照中央通告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参加。

（六）上面的改造办法须于省委决定后一个半月到五十天间相当的完成，同时召集各县代表会议改组各县党部并选举全省代表会议代表，于两个月后（自省委决定起）召集全省代表会议，改组省委。

关于全省工作的布置

（一）全省工作的中心区域当然是关中道。省委应按斗争发展的情形和工作的需要把全道分成几个中心区域，如长安、渭南、华县、三原、澄城、周至、蒲城等可为中心而成一区域。

省委须集中力量去发展这一道的工作，派出巡视员亲去改造党部布置工作。

（二）汉中道榆林道地主数量多于关中道，汉中道更有许多自发的斗争，省委应当将汉中陕北两个特委取消，各县直接□于省委，于最近派人去巡视一次。

（三）省委常务委员五人须经常的轮流有二人到各县巡视，每一次巡视频须预定一个巡视计划和巡视日期巡视区域，巡视之后回到省委作详细的讨论。

（四）省委须兼西安市委直接指挥西安城内的工作。

（五）省委应时刻从群众斗争的经验中找出适合群众的新的工作方法指导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的指〔导〕，除开原则的指示，必须给以比较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方法，这是万分必要的。

（六）省委与各县□□与下级党部之交通须建设好，须经常的发生密切关系：下级报告，上级指导。

关于反国民党

陕西党部过去完全寄在国民党内生活，因一切都给国民党了，完全没有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生活和群众基础。一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党员留恋于国民党内不愿脱离，这种可耻的机会主义的遗迹，省委应遵照中央的决定毅然决然纠正过来。

（一）命令留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立刻退出并实际的脱离关系否则开除出党。

（二）文字的口头的利用种种事实向工农兵及一般穷苦群众宣传国民党及冯玉祥反动的罪恶，在群众中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三）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禁止国民党的存在，对其领袖处以死刑。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 (第一号)* (节录)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

根据省常委三月二十二日会议决定，划临、渭、二华、固^①为陕东暴动区，并组织特委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并准备暴动，特委三人即于四月一日开第一次会议，成立组织，开始工作。

特委直辖于省委，专指导陕东区各地斗争与暴动。

陕东特委会

注：①为临渭南、华县、华阴、固市。固市大革命时改为五一县，后取消其县的建制。

*原标题为：通告第一号。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 工作计划大纲*（节录）

（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

根据省委目前行动纲领，特制定工作计划大纲；但应注意四点：

- （1）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工作计划；
- （2）这个计划是要在最短期间完全实现的；
- （3）这个计划是要按照陕东客观情形决定的；

（4）这个计划是为造成主观条件，使许旅出山，帮助农民暴动，但不是等待主义。

陕东特派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

*刘继曾回忆，省委当时作有《关于渭华暴动的决议案》，迄未见到。本大纲中提到“根据省委目前行动纲领”，亦未见到，故录此件以了解当时省委对渭华起义的大致部署。

中央通告第六十一号*（节录）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中央三个月来，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事实上断绝了关系外，对各省都不断的有个别的指导。

中央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即基本结束。本文说明在此之后的三个月中央与陕西断绝了关系，因此陕西对盲动主义未能及时纠正。本文摘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366页）。

陕西职工运动概况*（节录）

（一九二八年九月）

（1）陕西没有产业工人，因此陕西的党忽视了党的基本工作——如口后的陕西就没有工人运动可言，同时亦没有认清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如只要农运作起来，革命就可以成功，在这个错误观念之下，使陕西的职运根本停顿，始终没有积极地去打破种种难关，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原文如此）当国民党军阀尚未背叛中国革命，全国政治尚未急转变时，我们的职运，算在西安、绥德、榆林成立了整个的空招牌的工会，并没有团结广大的劳苦工人在我们旗帜之下，更说不到领导工人群众作日常的生活斗争。这种未经斗争的薄弱组织，当然要随国民党军阀的白色恐怖而摧残殆尽。从此有名无实的空招牌的职运，在全陕也整个的宣告死刑了。

第二次扩大会后（今年二月十八日）省委虽然注意了此类工作，只是仅督促西安可口方面也^①，对整个的职运工作，并没有精确的计划，积极的督促，因此全陕除西安市外，其他各地党部并未接到省委对职运的任何指示，就是西安的半年职运，结果亦等于零，并没有取得广大的劳苦工人群众，仅在洋车夫中打入同志一二人，取得很少数的几个口车夫同志，而将近千余人的西安市洋车夫的没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工会），除此种流氓式的苦力工人只有党的组织外，其他工人群众完全没有打入，没有我们的工作。所以陕西省委对于西安市的工人数量及生活情形，都是完全不甚明了，不能有详密的统计报告出来，更说不到全陕。总之陕西的党在第三次扩大会议前（六月十三日）可以说完全没有工运。

注：①原文如此。

*此文反映了陕西党早期在职工运动方面的情况。同时确证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开会日期为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过去有六月八日说）。原标题为：职工运动概况。

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节录）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陕西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就中央的观察与推测，是很有利于革命斗争发展的局面。第一，陕西是极贫乏的省份，而冯系军阀，为争夺地盘起见，养军仍是很多；苛捐杂税，必然是非常的繁重。城乡贫苦群众，必然更趋于破产。据说陕西有些自耕农愿意放弃土地去做佃农。这就是很明显的例证。第二，陕西是十足的封建政治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必然有加无已。并且货币经济的发展，已深入农村，必更促成高利贷资本的活跃。农民受这样重重的压迫，自然是更加穷困不能生活。第三，军阀内部并未完全统一，岳维峻军阀仍有很多潜伏的势力，一旦关外战争爆发，关内要必然开始混战，而使反动的政权走上动摇的道路。第四，一般工农贫苦群众因生活的痛苦没有出路，革命的要求自然是很利害。上面这些客观的情形都证明是很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却是十二分的薄弱。第一，群众的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有些地方的农民虽有些神秘性的组织，领导权完全在豪绅富农的手里。第二，我们的政治影响，并未在群众中发展甚至可说除少数农民中有些不正确的宣传外几乎全无影响，这样当然无法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第三，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在群众中毫无基础，不能领导群众。因为革命主观上的这些弱点所以客观上虽极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而广大的群众斗争仍是不能起来。因此陕西目前的工作总的路线就是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的革命的情绪，建立群众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来加强革命的主观的力量。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因为不单是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并且可以损害革命的力量。

所以目前的工作方针，第一，须从很小的范围起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最好找很难（能）艰苦工作的同志去做工，去做雇农，去当兵，到这些群众中去，

发展他们的日常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的斗争，使他们渐渐组织起来，必须如此才能真正发展群众的组织。第二，建立党的强固的基础。党必须在群众中有强固的基础，然后才能真正领导群众。所以“党员职业化”成为目前迫切的口号。必须〔使〕每个党员都找到社会上的职业，然后才能深入社会深入群众，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斗争，从斗争中吸收明白勇敢的分子，来建立党的组织基础，发展党的组织。第三，必须找到群众的具体的迫切的要求，做成各种煽动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的斗争，从继续不断的小斗争，来发展成为大的斗争，必须每一个小的机会，小的运动都不放松，都领导群众向斗争的路上走，然后群众的斗争的情绪才能高涨起来。第四，在斗争中去发展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的宣传下——推翻豪绅军阀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等。必须〔使〕党的总的政治的口号普遍〔普遍〕的深入群众，然后才能坚决群众革命的意识，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团结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上面几点是陕西目前团聚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来加强革命主观力量的切实的工作方针。必须艰苦地执行这些工作，然后才能使陕西工作建立基础，渐次地发展起来，假如不去这样做，只是幻想武装，幻想暴动，一味盲动，结果必致使党的工作无法建立起来，这是要省委切实注意的。

此外还有几项重要的问题，要你们切实注意和执行的。

一、六次大会决议案，是目前党的一切工作的准绳，省委必须加以详细的讨论，并根据决议案的精神和陕西实际的状况做成详细的工作计划，切实执行，同时必须把决议案印发下去，使下级干部的同志，都能深切了解。

二、你们的工作计划，首先当然要注意工人运动，然陕西产业工人极少，但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仍是要比其他的群众进步些，仍是党的主要基础，革命的主要的力量，同时对农民运动、兵士运动，也必须有详细的计划。（具体的工作方法，与煽动和宣传的主要的口号都必须规定）以及健全党的组织，和教育宣传工作等。省委决定这一详细计划以后，必须马上送一份都（到）中央来，以便详细指导。

三、省委接到此信，必须马上加以讨论，并即做一详细报告来。详述陕西

政治经济状况，群众生活与斗争情形，党的组织和工作等，以便中央根据这些报告来指导陕西详细的工作方法与策略。

*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六大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六大把工作中心从组织暴动转移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把“左”倾作为重要危险来反对。中央这个指示信即体现了六大精神。

中共陕西临委报告（第一号）*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

（一）旧省委被破坏之经过：甲、一月二十四号省委交通、秘书两科被破坏捕去同志十人，各主任科员均无遗。乙、二月六号，大中两省委^①完全被破坏，计机关五处，捕去曹仁趾^②、刘纪曾^③、蒲克^④、李子周^⑤、马步云^⑥、李昌英^⑦、程士程、王友章、刘映盛^⑧等十人并女同志三人，刚由中央领到之津贴千余元均丧失。秘书主任徐梦周无下落。丙、破坏原因——（1）省委本身技术差，从来能社会化。（2）白色恐怖严重。（3）叛党告密的同志所致成一部分。

（二）临时省委的产生：二六事变后，省委工作全停，各地尚不之知，幸而省委之职委和经委书记逃脱，通知各地，讨论办法乃以现存之省委（张国藩^⑨、薛永寿、王林）名义，召集渭南、华县、蒲城、富平、长安等同志于三月一号晚举行大中各县委紧急联席会议，计到各县代表七人，省委三人，对旧省委工作作深刻的批评，并决定新的工作大纲，并选出省委七人（张国藩等），团省委五人，因为人才各种关系，组织临时省委，推进工作。

（三）陕局现状及党务概况：1、军事上陕南奠定，陕北亦渐就绪，杂色队伍消亡殆尽，全省除井岳秀马鸿宾两师外（约共五六千人），完全成了青（清）一色的冯家军。2、K党^⑩现状：省指委内汪陈派（于振赢、延国符）与政府派（黄统、安汉）冲突日甚，日前在会场竟因争论而动起手枪，结果于延被军警捕去。各县的指委大都成立（关中道）但没有什么作用，民众因各县长大向各里区派党费已经把党部当成衙门了。3、灾荒日甚，全陕除沿渭河两岸有很少数的麦苗外，各地都是赤地千里。米价五元（约二十七斤），麦价四元（约二十五斤），乞丐遍野，饿殍时见，尤以渭北为甚，故抢粮劫麦之事，时有所闻。4、改良政策之影响——平糶局之米，由县长分给里绅，由里绅分散贫民，价与市上一样，且多为豪绅吞扣，故民众常说：“只有穿皮袄（富绅）的能吃平糶米”。强迫

民众修路，天天不休，但一日只发一碗（三合）米（每人），民众说：“这就是以工代赈”。大路由三丈六改为七丈二，强占民田，不发一文，怨声载道。民众说：“这就是训政时的建设”。5、剥削情形，赈款、团捐、保安公费急如星火，营业捐、路灯捐、马路捐…有加无已，地丁已征到二十一年，现在一笔勾销，又从十八年开始。烟款已派出，每亩十元（但烟苗还没出土）。一个禁烟局（每县）近又添许多禁烟善后分卡，加紧罚款，还说是实行禁烟。党费近又派出（各县党部），一县有由一万至二万者。送赈米运机器，均取拉差主义，差役鸡鸣下乡，以急公务。总之说一句：陕局是很利于革命的，只是我们主观力量太得难说就是了。6、一般同志日行消沉完全失掉自动和勇敢精神（上级不召下级不来），干部分子二分之一动摇犹豫。……7、没有支部工作，各地能按期开会、交费的支部至多不过两三个。至于形成核心是不能谈到的。8、教育工作太差，有同志讲演，说“苏维埃”是一个人，称县委书记他舅曰县委他舅其教育与文化之水平线可见一斑。9、政治意识太差，白色恐怖严重，认为没有出路。最近在中山日报上之登报自首者，日必有人。10、职工运动才开始，农村群众的组织没有，兵士运动徒有其名。11、各地组织不甚清楚，大概是汉南未成立，陕北工作尚可，有同志八百余人，但斗争很少。关中道除渭南、蒲城、富平尚有同志五百余人推动工作外，余均在风雨飘摇中。12、陕西工作不好的原因：一、政治上没有大的变化，白色恐怖严重，吓退同志不少。……二、过去盲动主义太利害，以致反宣传日甚，影响到群众和同志纷纷脱离怨恨党。三、经费特别困难。……四、同志的政治认识和文化程度都太差，以时局沉闷，多怀疑革命没有出路而改面目，另作他图，以至于叛党告密。

（四）目前工作大纲：1、重新布置一切工作，布置中心地，布置中心地的中心工作，创造工作的新局面。2、取消过去整顿组织，恢复工作的口号，洗刷动摇的分子，一切都重新做起。3、加紧（唯一的）职工运动，建立党的阶级基础。4、加紧干部同志的训练，提高同志知识的水平线，扩大政治宣传。

（五）我们对中央的要求：

1、经费问题。甲，目前经费的没有，……同志职业化（旱荒日甚，百业凋零）一刻做不到。且因过去盲动遗毒，在业的同志以及干部（红的）同志，多

半不能立足，反来要党为他帮忙。乙，目前需用浩大，因饥荒关系，生活增高一倍（每月每人至少十元），工作开始布置，来往奔走（每日路费至少一元），安插同志，调动人才，建立机关用费特浩大。丙，请在过去津贴的经常费（五百元）（基础上）增加二分之一（二百五十元）外，从二月份起再增加十六元，以便津贴渭华长原四县^①（因为该县经费太没办法，而工作范围又大，不能在家站，和不能马上职业化，因为太红的干部又多）。丁，此次事变损失特大，请津贴临时特别费（八百元，建立五个机关买东西，还债，调人及布置工作的路费等），以便工作之马上推动。戊，一、二、三等月份的津贴并此次的临时特别费，请即弄来，以免我们眼花腿酸。

2、派人问题。现在的临时省委虽说有七人，实地目前能工作者只有三人（余均在各地担任要工无法离开），而且能力和经验都很差，请在最近无论如何速派一二得力同志来陕，成立正式省委，推进一切，以免再有大的损失。

3、济难问题。济难工作想必重要，但在陕西并未听见（各地），这并不是陕西远处西陲，无难可济。实际自渭华暴动失败后，各地逃亡流离泾原词朝^②西府等处的工农兵群众和同志统计千五六百人，无衣无食，无业可作，始而逃难，继而讨饭，流为乞丐者约在三四百人，各县委无力招待，省委亦未想过办法。几次入狱的同志，不下百余人，党内并没设法营救过（因为没钱），生不能馈以食，死不能掩其尸。据最近各地调查，流落各地的渭华及工农革命军中的干部同志约五六十人，我们计划将这些人网罗调动收拾安置，使他们成为陕西工作新出路的有力助力，但需用经费至少须在一千元左右。目前是没有这个力量，此事与济难工作有密切关系，请中央速指示出路和办法。

（六）我们对中央的批评：陕西在西北说来，也算是很重要，但中央始终不注意。如：一、几月来除通告外，没见过专函的指示。二、几年来未见过中央派人来视察。三、陕西最近工作这样糟糕，未见中央指示一点办法和纠正。四、中央的刊物如《布报》《红旗》等（内外的），陕西的同志上自省委下至支部（来上海者除外），是只能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的，但中央也不设法。五、东南各省过去和最近斗争的情形方法和经验，中央也不设法供给输送到落后的陕西来。

(七) 中央的通讯处(邮寄)、接洽处(来人)和代名请即通知我们。

陕西临委

附：(一) 此报告因时间仓促，间有不完足处，如有另问可同来人详谈。

(二) 此报告请即答复。(三) 不久即另做一详的报告送来。

注：①指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

②应为曹趾仁(曹志麟)。

③即刘继曾。

④即蒲克敏(蒲子政)。

⑤即李子洲。

⑥即马云藩(马子静)。

⑦即李畅英(李大章)。

⑧即刘映胜(杨声)。

⑨即张资平(张子平、张子屏)。

⑩指国民党。

⑪指渭南、华县、长安、三原四县。

⑫指泾阳、三原、同州(今大荔)、朝邑县。

*本文向中央反映了省委在遭到大破坏和执行盲动主义后所处的困境。

中央给陕西临委的指示信（节录）

——关于陕西党被破坏后的各项工作指示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陕西临委：

三月三日你们第一号报告收到，前党团省委完全破坏，捕去重要同志十余人，此不独是陕西党的巨大损失，亦是陕西工农阶级巨大的牺牲。惟来信未提及能否营救及已否设法营救，如各同志尚未被害，仍望在可能范围内尽力设法营救为要。

你们在大的破坏之后，白色恐怖严重压迫之下，犹能召集各县联席会议产生临委，中央对你们这种努力表示满意。

你们此次的报告甚简略，最后你们虽说不久即另做一详细报告送来，但现为时已久，尚未接到。现在只得就此报告重要几点，指示如下：

一、目前全国政治分析及在反军阀战争中的工作方针，中央已有通告三十三号及三十四号详细说明，此地不多说，惟自蒋桂战争爆发后，蒋很迅速地占领武汉，蒋此时在军事上虽已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同时即形成一个不利的前途，现在桂系既未完全打倒，而各大小军阀对桂的目标有转移以对蒋的趋势。老冯满拟在此次战争中乘机坐收渔利取得武汉。现在冯之此项计划既归失败，冯蒋间的冲突便日益加紧起来。而其他一切不满于蒋之势力，又均欲乘此机会起来倒蒋，所以此时冯与桂与改组派以及一切不满于蒋之势力有联合起来以倒蒋的可能。蒋在此局面之下，固然要更加紧他的军事准备，更加紧对民众的剥削。冯为应付此时局，亦必然要动员豫陕甘之大军，必然要加紧对豫陕甘民众的剥削和压迫。陕西为冯根据地之一，民众的痛苦必因此加重，必然要起来反冯，这在客观条件上将予你们以发展工作的便利。你们应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中央历次的通告，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切实努力执行，以恢复并发展陕西的工作。

二、虽然有些好的客观条件，但冯此次拟拥汪以抬高政治地位，而汪派素来企图代表资产阶级，散布改良主义的迷药以欺骗民众而和缓革命的。冯此次欲驱使陕西民众为冯家争天下，亦必提出些改良欺骗的口号以麻醉他们，而陕西人对冯对汪或许还有些幻想，所以将来改良主义的口号很有侵入陕西的可能，陕西过去尚未经过很激烈的斗争，群众更容易受他们的欺骗，你们应加倍的提防，特别是在每次斗争中，应揭破他们的假面具，以指示群众，使群众不致为他们口号所欺骗而走向我们政治口号的周围。

三、灾荒问题。陕西的灾荒既如此之重，生活昂贵，抢粮劫麦之事时有所闻，而政府反而增加苛捐杂税，强迫民众修路等等，我们应积极地去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尤其是要在每件事中，提出切实的斗争口号及斗争的策略。比如强迫民众修路问题，我们必须提出修路必须要工资，并须必须增加工资，要有休息日和减少工作时间，反对强占民田，拆民房必须出代价等等。其他对平糶局问题，反对苛捐杂税问题，禁烟问题等等，都须斟酌实际情形，定出切实的口号及策略。

四、党内问题。据你们的报告陕西同志日益消沉，干部同志二分之一动摇犹豫，没有支部工作……，这种种不好的现象在革命大的失败之后，是难免的，现在补救的方法：（一）加紧干部同志的政治训练，提高一般同志政治的水平，至少要使一般干部同志能得到政治上的修养，提起他们对党对主义的信仰心；（二）加紧支部工作，使同志间的关系密切，使党员群众容易得到党的训练及同志间相互的训练；（三）加紧日常小小的斗争，使他们在领导每次斗争中不要提出〈过于〉超过了革命情形的斗争口号（但宣传口号不能降低），每次以能取得小小胜利为原则，引起他们斗争的勇气，使他〔们〕在实际斗争的了解上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宣传口号之上；（四）尽量地做到党员职业化，使一般同志都能到群众中发展群众工作，同时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五）应用教育方法纠正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的出路。无论这种旧基础有多少分〔子〕可以挽救，党必须注意发展新的积极分子，发展新的基础，特别是在没有旧基础的地方，更要努力创造新的基础。

五、过去党内盲动的倾向，固然还有残余的情绪，时时应预防其再发，应

设法纠正，但今后党的危机已有由盲动而转向右倾的趋势。所谓右倾者，是不懂得由日常群众的艰苦的斗争的工作可以引起群众斗争到广大的发展，或误认统治阶级有些小的稳定，我们应趋向和平发展及合法运动。这是根本错误的观念，我们要特别预防其发生。我们现在是要艰苦的忍耐的到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作夺取群众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要有长期的工作精神，应该一步一步做下去，自然可以慢慢收到效果。

六、陕西今后工作，应切实到群众中去建立工作基础，而不是在形式上建立些机关，增加些机关工作。

七、此次陕西机关破坏，据你们的报告虽然有些客观的原因，但不注意秘密工作亦是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统治阶级尤其是冯系军人对我们侦探工作，一天天的厉害，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秘密，才能应付他们。你们今后机关的建立，应特别注意群众化和其关系的严密。同志无论何人非在工作上确有需要时不能知道别一机关的地址，一个同志决不能知道三个以上的机关的地址，同志间不要作无必要的往来，即下层支部工作，亦不能发生许多横的关系。一切交通机关及接头处等，都须严格的保存秘密，同志的一切饮食起居，都要合于秘密地工作的条件，避免引人注意的行动。

八、你们来信，说重新布置一切工作，布置中心区域的工作。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旧有的工作能整顿能恢复的亦应去整顿去恢复。在目前的严重白色恐怖压迫之下，我们的组织要能很有规则进行，常常是困难的。所以目前我们主要的是要每个同志无论能否得到上级的指导都要能自动地去为党工作，自动地去发展组织，领导斗争，自然在原则上不能超乎党的政策和组织之外。必然如此，党才能在反动局面下不断地生存和发展。

九、职工运动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这次你们的报告对于过去陕西职工运动没有写〔一〕点，大概是以前很少注意这部分工作；果如此，这是莫大的错误。你们应该选择几个中心城市区域在主要的工人中，如汽车路的交通工人，大城市的市政交通工人及矿区内的矿工，在这些群众中去发展我们工作，建立我们职工运动的中心基础。并应根据六次大会职工运动的决议，根据陕西职工群众的实际情形，定出更具体的计划切实执行。

十、农民问题。陕西因灾荒问题，农民饥饿遍地，又加以苛捐杂税的剥削，农民过非人的生活，痛苦已到万分，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必然容易入手。但是我们领导农民起来斗争，主要的是要提高他们阶级斗争的意识，由日常斗争进而引起他们土地的要求走向土地革命的道路。我们在各种实际斗争中应根据具体的事实，定出各种切合实际的煽动口号及工作的方针，引起斗争，但同时必要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等宣传口号联系起来。

十一、士兵运动。冯系下的士兵是长期的不发饷，仅用些骗人的小惠及强迫的方法以维持他们，假使我们能接近他们，切实地向他们宣传，他们必然容易接受的。你们应根据六次大会的军事决议案，中央从前发出之士兵运动工作计划的草案及最近中央为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以及各项军事问题致各省的公函，定出具体的计划切实执行为要。

十二、反帝工作。陕西僻处西陲，与帝国主义势力似隔离较远，很容易忽略反帝运动。但是我们要知道反帝运动是我们目前革命阶段主要任务之一，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无论何项问题，没有不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何项斗争中，帝国主义都是我们主要敌人之一。我们一切斗争都应能与反帝工作有联系，并且要利用反帝运动以提高一般群众革命的空气。尤其是冯蒋共同出卖山东于日本，蒋之联美，冯之倾向日本，都可与反军阀战争、民主自由等运动联系起来。

十三、关于经费问题。中央现在因为经费的困难，几项经费合起来只能给一千元，但须等你们的交通来后才能取去，或你们寄有收款地址时亦可汇去。派人问题，中央如有相当人时，当可派来，但主要的路线还是要你们自己从工作中从斗争中训练出干部分子才更为得用。临委常委中央批准三人，但不是都要在省委工作，要有一二人经常的到中心县分去巡视。

十四、关于你们批评中央的问题，中央以后虽在交通困难的陕西，应尽可能地指导一切，刊物宣传品有可能时尽可能地送来，但同时你们亦应有经常的报告，应有经常的交通来中央以建立密切关系。

中央

陕西代表团报告*（节录）

——政治、党务、农村经济概况

（一九二九年五月四日）

一、叙言

陕西自去年五月渭华斗争失败后，各地工作相继坍台，工作同志，由县委以至支部，大部分离开组织（如渭华、三原、乾岐等县）。经过很久的时期——由二月至十二月——省委始终没有将各地工作整顿起来，即直辖的西安市更是难说，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党的周围没有一个劳苦群众，只有省委机关及省委工作同志数十人。在这样白色恐怖高涨之时，绝不能保障省委之安全。而机关形式，大都是绅士官僚式的公馆，且无职业，在这种非“群众”、“社会化”原则之下，自然是要引起敌人的注意，且加以敌人利诱了许多叛党同志作他们的眼线，侦探布满全市（约有三百），所以在过去十二月中，破坏了下级机关几处（交通、秘科，长安县等），捕去同志十余人，但省委尚安全。惟敌人的气焰突然增高，直至省委第四次扩大会后，大中新旧省委^①都回省交卸〔接〕工作（因是在外县开的）。

C. Y. 变节同志将 C. Y. 省常委处于二月二日破坏，捕去的同志又连续招供，遂将两校^②在西安之新旧省委完全捕去。漏网者只有不在西安的三四同志。此时各地尚不之知，乃由未捕去的大中省委与渭南、富平、蒲城、华县等党部召集紧急会议，成立了临时省委。（已于第一号报告说过）但临委对全陕工作感受各种（人力财力等）困难，又未接到中央指示，因此两省委决定代表团来中央，负责解决一切问题，并详细报告一切概况，供中央以实际材料，具体决定今后新的工作。报告内容因省委文件完全损失，无法参考，只能指出过去之重要现象及目前的组织概况。

四、党过去的策略及目前民众革命情绪

甲、党过去的策略与批评

陕西党在中国党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中，机会主义的遗毒特别浓厚。自第一次扩大〔会〕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接受“八七”会议的精神，但只是文字上、口头上的接受，在实际工作中并未表现出来。当时 C. Y. 和党在政治策略上起了很剧烈的斗争，但 C. Y. 在这时已有了盲动主义和先锋主义的趋向，如不顾客观主观条件命令暴动，沉溺于个人恐怖主义等。陕西省委要急于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即不自觉地走入了 C. Y. 的策略路线中。接受了 C. Y. 的盲动策略，不估量一切条件，命令暴动，开发不要群众的游击战争。直至第二次扩大会后（一九二八年二月）各地在省委命令暴动中，即使暴徒分子勾结流氓土匪，暗杀几个土豪劣绅，就是执行党的武装暴动的策略。这是各地普遍现象。真是“无动不暴”。省委每一个通告及对各地指示中，没有“暴动”二字，觉得就是机会主义。冯在关外，军事吃紧，陕西军队大部出关，防务空虚，陕西军乘机扰乱之际，各地竞部以为时机到了，即暴动起来。三原、泾阳、礼泉、旬邑等地，没有一次日常斗争，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组织，主观力量丝毫没有，但要乘机促成暴动，所以一面勾结土匪，一面用非常手段，以鸡毛传贴〔帖〕，征〔争〕取群众，甚至用大刀强迫群众（如泾阳）。在各种非正确策略之下，领导了数千农民围攻县城，甚至旬邑将县长杀掉，成立了县苏维埃。

但不数日，全体执行委员被豪绅用计屠杀。各地斗争不是从日常斗争中生长出来，当然经不了统治阶级的摧残，不久即完全失败，牺牲了不少英勇的干部分子；党的组织亦〔不〕在这种盲动主义之下整个溃〔散〕，无法整顿。各地失败后，党布群众中的信仰低落，怨声载道，说、“共产党是瞎闹”。省委对各地的盲动，当然不能给以正确的指示，使各地的盲动能够尽量发展下去。

各地失败后，接着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在陕西革命运动上是重要的关键，具有历史的意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自动的杀豪绅，没收土地，焚毁债券田契，分配食粮，杀戮征收机关人员，组织五十余县苏维埃，的确是陕西农民群众的力量第一次伟大表现，使统治阶级在群众面前发抖。但我们估计到当时

各种条件，渭华暴动确是犯了盲动主义与军事冒险的错误，正是陕西盲动主义的总结束。当时的客观与主观条件如下：

（一）冯在政治上已渡过了军事的危机，西安城围已解，陕军节节溃退，关外军事顺利，冯可调大部兵，集中力量扑灭我们的军事力量。

（二）党的周围没有围绕着广大的群众，没有一个群众组织。

（三）群众的日常斗争始终没有领导，从不是从日常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四）城市工作没有基础。

（五）农村中那时正是农忙时期。农民说：“好是好，等麦收后再来”，就可以知道当时农民的态度了。

（六）只信任军事力量，有时民众成了军队的副力，如军队被敌人包围时，发动民众掩护撤退。

（七）党不是斗争中的领导者，有时军队命令党部，甚至省委指示都不能接受。

（八）反革命的军队中的工作一点没有。

（九）党没有充分的准备，只是忙碌应付（如当时苏维埃不知怎样组织）没有整个的策略。

在以上各种条件之下，可以知道渭华暴动不是在党的正确策略之下发动领导，完全是盲动主义军事冒险。少数英勇党员和小部分军队造的。

渭华将要失败时（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第二（三）次扩大会议成立了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决定党目前的任务是布置全陕的总暴动，但事实上盲动主义失败后，党的工作日渐坍台（如三原、礼泉、旬邑等）组织溃散，不知道拿什么布置这个总暴动的局面呢？陕西的盲动主义即此可见一般〔斑〕。

在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中，党与团均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大部分英勇的干部分子被敌人惨酷的屠杀，有些在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加深，流连〔离〕失所，离党的生活，饥寒交迫，党又不能设法救济，使他们对党起了很大的反感，使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更是一落千丈了。

乙、民众的革命情绪

陕西革命失败后，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恶劣，阻碍了党的工作的进展。群众

的革命情绪，在白色恐怖镇压之下，形成一时期的低落。但因统治阶级尽量的剥削屠杀，使民众更认识了他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加以旱灾奇重，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日亦〔益〕加重，农村经济、城市小商业日呈破产现象，使成千累万的民众生活日益恐慌无法维持，民众革命情绪是有新的高涨！如各地农民自发的原始的斗争，只要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深入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夺取广大的劳苦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加深各种主要工作，士兵运动，职工运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改进党的组织，加深内部训练，充实党的主观力量，才能推动这个新的浪潮走上新的阶段。

五、党务概况

甲、过去工作的总回顾

5. 组织工作——自去年第二次扩大会后，省委秘书处被破坏，各地在盲动主义之下，努力进行整个组织工作，遂糟糕到极点。其重要：

（一）没有群众的组织——我们的党必须有群众的组织来掩护，然后才可叫做行动的党，事实上才可行动，但过去自群众斗争开始后，组织就溃散了。只有以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的组织，斗争失败后，党的组织又没法去代替群众的组织，结果只有党的光杆组织，而没法行动。

（二）经常的基本的组织工作太差——渭华斗争失败，组织工作更是没法推动，各地县能按期开会交费做报告的党部不到 1/2；有些党部竟是名存实亡（如临潼、东府、蓝田），支部不能起核心作用，党员有许多是“营混子”，不能经常工作，只是将就敷衍，一切统计只好搁置，弄得省委不知道全陕有多少同志。

（三）不注意培养干部——经过革命失败后，大批的同志被难，奔逃动摇犹豫，干部分子到了山穷水尽而且是急待需要的关头，唯一的方法只有设法培养，但以前则少注意。某干部同志表现错误，不设法教育，或说服以纠正，只知命令主义去威迫，结果错误日深，甚至脱离组织。某新进分子，表现尚好，

但能力、方法、经验认识都较差。不加紧训练以坚定其工作过程，只是采取“破格用人”的条例，临了“才不称职”，工作“糟糕坍台”，同志灰心丧气。

四、成分和质量之不好——过去对党的成分，虽经几次的改造，但农民仍占百分之七十，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工人只占百分之三四（虽没有详细统计但大概都不差）。成分如此，而质量又因缺乏训练和斗争之故，亦是非常之差，政治的水平线尤甚于党的基（本）知识！

（五）党团关系之不好——第二次扩大会后，团的先锋主义日益浓厚，进而变成第二党。从此党团做的工作，团不做分化工作。党不能加紧政治指导，有时做到对立的形势。在这种总前提错误之下，各种关系当然没法弄好。物质帮助，人才供给相互发展组织都是不能谈及，惟各级的互派代表尚能做到。

乙、目前工作和组织概况

（一）目前工作现象——上面的工作总回顾，是把陕西的一切情形说到省委破坏为止（二月二日）但自省委破坏以至临时省委成立（二月二日——三月一日）中间一个月之久，整个工作在自由前进的状态中，及临时省委成立，以至第二次全体会议（三月二十三日），同时这次会议对省委委员有新的决定：杜衡（书记）、徐振化^③、章子文^④（常委）、王林、张玉森^⑤（候补常委）、张国藩、薛永寿（以上均执委）、刘树模^⑥、李惠民^⑦（候补执委）。在这两旬之间，省委本身只做了些通知各地建立机关，召集当选委员，调动人等技术工作（因当时经费无着，人才没有，一举一动，都非省委亲身去做不可，而当时到职工作的省委只有二人）。自全体会后以至代表团来沪（四月十号），其间十余天之久，省委本身虽说有与人，但一人有病，一人不能经常活动，实际上只有一人，机关一刻不能建立就绪，人才不能立刻调动，经费成为目前唯一难关。而各地又袭省委破坏的影响，及白色恐怖（蒲、富）日趋颓衰现象，一切工作没有新的开展，仍旧的是停顿着，而与省委破坏前一样。

组织现状——目前组织情形与省委破坏前是不同的，因为有些地方，受省委破坏影响而坍台或失掉联络的很多（如高陵、乾县、岐山等）。兹将目前概状，分述如下：

A、关中道

（一）渭南县委——县委比较健全，现有区委二、直辖支三（过去都是区委，经洗刷而缩成直支），约共有支部十一个，党员一百二十人，且因经过去年的红色斗争，工作尚有相当基础，惟目前的白色恐怖严重，工作和组织，未能有大的发展。

（二）富平县委——在去冬工作尚有起色，但未深入，今春白色恐怖降临后，把我们管理的几个高小学校被人夺去，且强迫几个负责同志自首，所以县委负责的同志，吃住马上成了问题，一般同志，非常动摇，工作影响很大，现有区委四，支部十二，同志五十余。

（三）蒲城县委——过去工作没有基础，今春白色恐怖以来，县委书记自由离去。工作骤然停顿，现虽有人负责，但不切实努力，现有同志三十余人，两个直辖支，一个区委，约共五个支部。

（四）华县特支——过去工作，尚有相当基础，惟自去年斗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经常的比各地利害，同志的死亡亦多，故经过很长的时间，工作不能恢复起来，最近已找到负责同志，成立一个特支，现有同志十余人，乡村中的阶级分化，和群众对于豪绅的认识，都比各地明显（因为豪绅太野蛮了）而潜伏的同志亦很多（暂时归渭南管辖）。

（五）同州特支——同州地域在军事上和手工业上，都很重要，过去因人数太少，归澄县县委管辖，后以澄县县委坍台而溃散，现在派有得力同志负责，收拾五六人，成立一个特支。

B、陕北特委——陕北因距省城较远，交通不便，省委指导不易，且以该地工作较有基础而又重要，故过去曾设特委以指导（以绥德米脂为中心），现有四个县委（绥德、米脂、清涧、神木）、四个区委（榆林、延安、延长、横山），区域占有榆林道二十三县中的十七县，共有同志一千零五十人，支部九十一个，一切工作，尚能相当推动，惟没有经过艰苦的日常斗争，特委亦不健全，工作不能抓住这个时期（白色恐怖不严重）而有大进展。

C、马部军支——马鸿宾部纯系回民，过去没有组织，后因该部在富平设立教导团，我们同志进去几人，现在成立一个支部，有同志十余人，该部兵士生活，非常痛苦，反冯空气亦非常浓厚。

D、此外西安市有同志十余人，长安、临潼、高陵、乾县、岐山、凤翔、澄县、合阳、韩城等地，省委据确实所知，都有同志数人，或十数人不等，惟目前因人力财力关系，尚不能马上组织起来，但以后仍是有希望而要努力去做的。

根据以上的组织情形，现在概括的统计是：

(一) 人数——一千三百余人

(二) 县委——七个

(三) 区委、特支——七个

(四) 支部——一百二十四个

(五) 地域——二十三县

至于在我们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在陕北现有六个中等学生会，几处农协，和几处联庄会。

注：①指党、团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和四次扩大会议上当选的党、团陕西省委委员。

②指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

③即徐子民（徐子明）。

④即章一悟。

⑤即张雨生（张蔚森、张生才）。

⑥即刘铁三。

⑦即李凌云。

*根据中央指示，陕西临时省委和团省委派杜衡、王林和薛永寿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本文是他们在上海向中央写的报告。

陕西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通过)

一、目前政治形势之估量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解除，军阀制度不能推翻，封建势力不能肃清，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日益延长扩大，中国永无和平统一之能。国民党代表着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革命，以白色恐怖答复工农民众一切革命的要求，同时又企图用民族的民主的改良主义（如关税自主，二五减租，裁厘，裁兵等）的口号，提高群众对于合法运动的幻想，以求延缓新的革命高潮。但中国的工农民众受帝国主义军阀的长期践踏蹂躏，久已是贫困破产，非革命没有出路；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暂时表面的“和平统一”，与济案后的反日运动，并不能使民族工业有若何发展。而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商品的输入，反比以前有大量的加增，一般工农贫民的生活更趋恶劣，西北五千万灾民流为饿殍，丝毫不能有方法加以救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还有互争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他们都在利用一部分国民党军阀明争暗斗，且对外勾结利害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于是帝国主义便成为中国统治阶级间一切冲突的主动力量。平时在“和平统一”的虚伪口号之下，加紧剥削工农民众以准备战争，接着蒋桂、蒋冯的战争便不断地爆发起来。军阀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卖国的罪状更加显明，帝国主义者亦利用机会更加重压迫中国的工农民众，战争的痛苦，饥荒的蔓延，苛捐杂税的繁重，与干涉压迫民众的自由，更加使民众对于革命有更迫切的要求。民众的斗争现在显然是呈复兴的趋势，尤其在军阀战争爆发后，上海、天津、满洲、青岛工人阶级都表现活跃起来。上海工人斗争在“五一”以后，尤其在“五卅”前后，有非常大的发展，北方开滦五矿铁路及市政工人的工潮，如风起云涌的起来。湖南江西广东的游击战争，最著名的如朱毛红军之活动，国民党无法镇压扑灭，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均保留一部分苏维埃的组织，福建江

苏安徽浙江等处农民亦时有武装斗争的发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日渐消灭，从思想与行动上都表现得日益左倾。虽然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是在革命屡次失败之后，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党内与群众中一部分革命失败的情绪还未能肃清，群众本身的斗争组织还没有宽广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过分估量目前革命斗争的复兴将一直的发展上去。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事实总足以证明新的革命高潮之必然不可避免的到来与革命高潮微弱的象征，已经可以看见。

陕西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所受战争、灾荒、苛捐杂税的痛苦，比别省更加厉害，陕西虽然曾经被冯玉祥在名义上统一，但陕北井岳秀的势力始终是与冯对峙着。杨虎城等的残部退处山中，亦仍然是伺隙活动，冯自己部下亦表现得有许多冲突矛盾。陕西五百万灾民流离饥饿，卖妻鬻子，今年雨量稀少，战祸加重，灾荒更加扩大，国民党军阀不但无积极赈济办法，他们反加重各种苛捐杂税（如西安一市即有杂捐十余种之多），囤集食粮来供军需，使民众更加痛苦饥饿而无生路，现在在褚冯冲突中，一方面蒋介石用金钱收买或其他方法，以加剧陕西内部军阀分化的过程，而制造未来的无穷战争及纷扰；另一方面冯玉祥为团结保全自己的势力，更集大军于关中，与蒋介石成为相持之局。这样便会使关外食粮不能运入陕西，而陕西食粮的需要反比以前增加几倍，灾民更加只有死路一条。冯玉祥现在又正在加派两千万护党救国捐款，并且要预征十九年^①田粮，摊派每里八石军粮，此外还有拉夫、拉马、封车、按户抽丁等虐政。帝国主义在陕西虽然表现不出许多直接的影响，但农村经济的破产，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尤其军阀战争的蔓延，显然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其操纵和利用中国军阀的结果。同样蒋冯冲突破裂后在陕西亦更明显地反映出统治阶级中的阶级矛盾及其政治影响，于是双方骗取群众策略也同在陕西加紧运用。然而事实上呢？现在陕西不但是大多数贫苦的农民只有吃树皮草根以为生，而且还不免于成千（成万）的饿死；便是城市工人贫民亦因为粮食缺乏，价格比以前腾贵过十倍，感觉得无法生活下去；小商人则一方苛捐杂税之繁重，一方又饱尝生意萧条的痛苦，学生的失学与失业，亦成为最普遍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兵士不但要在军阀战争中当炮灰，并且成年没有饷发，军队中的生活待遇亦异常恶劣，

甘肃回民与边界的蒙民，更加上民族的地位不平等，生命与权利丝毫没有保障。冯玉祥在甘肃曾经大规模屠杀回民，陕西工农群众□□的情形之下，已经发生过很多大的小的零碎的斗争，并且各处都有灾民或蒙回民族与土匪联合反□军阀地主豪绅的事情。只是因为陕西党的组织薄弱，西安等地又是在大破坏之后，所以党还不能领导这些农民自发地斗争使成为群众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以汇合成为陕西的革命高潮。陕西的群众斗争客观上有普遍发展的可能，尤其是全国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可以推动陕西群众斗争的发展。所以陕西党必须在正确的政策之下，艰苦的耐心地去领导一切群众的斗争，而且要在斗争中间打破群众残留的对国民党一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幻想。只有这样，陕西党的工作方能在六大正确路线之下发展起来，才能夺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以与全国革命斗争开展的形势相适应，以走向陕西革命斗争的高潮。

二、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

根据以上政治形势的估量，陕西党目前的总路线，是在于尽力扩大在群众中的工作与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到农民的游击战争，以至于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国民党的一切斗争。因为陕西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力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亦还很薄弱，所以右倾的和平发展的观念与急性病的盲动倾向都应当切戒的。但这不是说陕西党现在应当离开群众的日常斗争而专门幻想大的斗争的来到，或是和平发展与静的宣传组织工作，陕西在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之时，固然不能保证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但目前客观的形势，很显明的需要党能领导一切零碎的工农群众的斗争，使成为公开的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很显明的有成为大的斗争与农村游击战争的前途。在广大群众起来的地方，便是做到建立部分的苏维埃政权，亦不是不可。

为要执行上述的总路线，陕西党必须实施下述的各项任务：

（一）扩大反军阀战争，反苛捐杂税的宣传，并决心领导群众为这种口号

斗争，利用这些斗争去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以确立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在这些工作中，自然必须从各种实际问题上无情地揭破冯玉祥的反动行为；同时必须指出这是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写真，尤其要在群众中指出蒋介石以至改组派反动的事实，打破一般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而走向反国民党的道路。

（二）领导灾民的斗争，而且要使灾民斗争与农村日常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陕西党应当利用各种方式，发动灾民的群众示威行动，例如吃大户、自动分配粮食等，有时甚至于可利用群众要求赈济的机会，将成千成万的饥民团结起来，向统治阶级豪绅地主示威，而且逐渐领导他们走入有组织的农村斗争的路上。农村日常斗争如反苛捐杂税，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应当与灾民斗争有很好的联系，以形成广大有力的农村斗争，这样便更容易领导灾民走向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

（3）加强反帝国主义的宣传，指出目前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特别要指出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帝国与英日帝国主义同样是中国军阀战争的拉线人，（打）破一般民众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于这次军阀战争中蒋介石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通讯社报纸造作冯与苏俄联合的谣言，并利用这一谣言向苏俄进攻。例如最近的哈尔滨事件，便是这一进攻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的扩大行动。党必须很正确地站在群众面前，指〔出〕苏俄绝不参加中国的军阀战争，苏俄帮助中国革命，必然要反对冯玉祥乃至国民党任何军阀反动的行为。国民党最近进攻苏俄的阴谋，不过是秉承着帝国主义者的意旨，企图打击苏俄，隔断苏俄与中国革命民众的关系。党应当坚决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拥护苏俄的口号。

（四）加紧城市职工运动与下层小资产阶级中的工作，并从中扩大党的影响，特别是要注意去发展公开的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以影响周围乡村的工农群众，确立城市的领导地位。陕西虽没有很多产业工人，然而为要能迅速反映全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影响领导全陕西各地工农群众起来，党必须特别注意西安、三原、同州、南郑、延安、绥德、榆林等处中心城市的职工运动。同时亦要注意到灾荒、战争、苛捐杂税等加于一般工人店员小商人至学生群众的影响，

在一般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积极的发展党的工作，党要特别注意建立这些地方工作，并不只是要秘密建立我们党的组织，而是要利用一切适合群众要求的政治经济口号，发展领导各种公开的群众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才能使城市工作影响周围的农民群众起来。

（五）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士兵运动不当限于已有线索的一部分，更不应倚靠下级军官干部去做士兵运动，要指导各级党部注意这一工作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

（六）积极参加一切贫农组成的土匪队伍与其他原始武装组织，并且注意在斗争中组织农民的武装，在他们中间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确立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在农民群众斗争起来而且剧烈化的时候，党应当有计划地领导武装农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以夺取武装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七）在工作中整顿并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城市工人中建立健全（党）的支部，使活动的核心。党必须就现有的基础，立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以实际斗争的活气与工作的成绩兴奋党的组织，并扩大党的影响于周围群众中，以获得党的更大的发展。

（八）在工作中加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使同志均能正确了解应用党的政策，不致有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党必须首先与和平发展及取消主义奋斗，反对先组织或先教育然后再讲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观念，只有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与教育工作，方能使党成为健全的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同时党亦必须与盲动主义的残余倾向奋斗，必须从日常斗争中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方能以群众的力量争得武装暴动的最后胜利。

（九）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利用各种实际问题使党的政治口号为群众所认识所拥护，以成为广大群众革命斗争主要的目标。陕西民众痛苦没有出路，党以前又不能很正确的宣传我们的革命政纲，号召群众起来为实现这些政纲而奋斗，所以一般贫苦工农总不容易走到有组织的革命路上，现在必须在各种问

题上很正确的宣传驱除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的意义，使一切革命的民众都能很坚决地站在政治口号之下奋斗。

（十）加强回族蒙族中的工作，对于回族与陕北蒙族须扩大民族自决、联合奋斗的宣传，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回族蒙族的反动行为，反对民族间一切歧异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亦要领导回蒙民众反对他们的酋长王公的各种专制特权。在以回族士兵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中，与在陕北蒙族的石里喇嘛土匪部队中，要特别加紧工作。

三、工作方针

甲、组织方面：

一、建立中心区域的工作，创造城市的组织。陕西党□□根据客观条件和党在历史上的发展应该以西安、三原、渭南、同州、凤翔、榆林、绥德、延安、汉中为全省中心区域，党必须相当集中人力财力和指导工作之发展全省党的组织，应该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创造城市党的组织。

二、深入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店员及雇农群众中去，注重党的质量的发展。陕西党主要的对象是少数的产业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店员及农村雇农佃农，党应该深入到这些群众中去建立党的基础。在西安应打入电话电报电灯邮政工人中创造党的支部。党在目前应该注重于质量的发展，使每一个同志都成为积极的战斗员，洗刷党内动摇畏缩的分子，健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

三、建立支部生活加强党在群众斗争中的领导。支部应该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工作中建立支部生活，经常的开会，在支部中讨论党的策略和群众的斗争，运用支部的组织散发党的宣传品，在支部中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加深同志的教育训练，从支部中斗争中培养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干部，发展自我的批评，经常注意选择发展的对象，吸收群众中积极勇敢的分子入党，农村支部特别要注意中坚分子的培养，多召集活动分子会，举行个别的谈话训练，征收党费，带教育性地建立党的铁的纪律。

四、整理地方党部，集中党员的努力到几个革命斗争的主要问题。首先要集中干部人才整理并健全西安、三原、渭南、同州、延安、绥德几个中心的县市委，省委要加紧对于几个中心县市委的指导和帮助。地方党部主要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党员的努力到几个革命斗争的主要问题（如目前反军阀战争反苛捐杂税领导贫民的斗争）上面，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与党的一般的政治任务联系，建立城市工作，使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有配合的发展，征调党员打入无组织的作坊与乡村，创造党的支部，经常的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积极的帮助支部建立支部生活，培养干部分子，发展正确的党内民主化，肃清命令主义、惩办制度、英雄主义等等不正确的工作方法，在工作过程中自动地研究新的工作方法，将一切工作经验教育同志。

五、缩小省委机关，建立经常的巡视工作。陕西省委常委只须要三人，省委兼西安市委的工作，在省委本身应该有适当的分工，举行经常的工作会议和每日的接头，重要的问题应该经过常委的通过，运用集体的指导。省委除常委外目前还不需要什么的工作人员，机关应尽可能的缩小，最近将来应该将党的机关建立一部分在同志家中，多引进在业同志负担党内的的工作。省委应该经常有人到陕北和陕中各县进行巡视工作，切实帮助外县地方党部建立工作，考查各地党内外的实际情形，正确的传达党的策略到下级党部，省委在每次巡视员回来时应该召集会议，切实的讨论各地的工作。

六、发展群众组织，建立党在灾民群众中的领导，组织灾民围绕在农村斗争的周围。建立和扩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各厂各业的工会与乡农民协会中即以支部代替党团，从中起党团作用。在县的农民协会和市县的工会中应该组织党团，党团在不违反群众组织的章程范围之内，执行党的策略，争取广大的群众围绕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领导斗争，肃清党代替群众组织的倾向。在全省各级党部应该选派党员打入到灾民群众中，组织灾民围绕在农村斗争的周围，与农村斗争及一般劳苦群众的斗争发生密切的联系，在劳苦群众中亦应该发展济难会、反帝团体。

七、建立经常的秘密工作，打破狭溢的秘密工作的方式。在党内日常生活中应一刻不停的建立经常的秘密工作，保护党的组织的秘密的存在，肃清同志

间一切浪漫的行动，严密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放到群众中去取得群众的掩护，同时要抓住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运用群众组织推动群众斗争，以群众斗争的力量去争取公开活动，打破回避斗争的狭隘秘密工作方式。

八、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倾向。利用一切群众斗争的教训，教育同志，有计划的开办短期或流动的训练班，培养干部人才，多召集活动分子会及支部会，发展党的策略的讨论，引导同志对于党的策略的正确认识与了解，出版党内教育刊物，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号召全省同志坚决的与和平发展、消极、怀疑、怠工、合法运动等等的右倾观念以及极端民主化，不相信组织，盲动的急性病，雇佣劳动化等等不正确的倾向奋斗。

九、加强指导团的工作，与团建立工作上的关系，党要在政治上领导团，在精神上物质上帮助团的发展，各级党团要互派代表参加会议，互作工作报告。在没有团组织的地方，党应该向青年工农群众中发展，介绍给上级团部，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上级党部亦应该责成团部创建党的组织。党应该认清团是党的一个主要助力。

乙、宣传方面：

一、党必须加强反军阀战争，反苛捐杂税及贫苦灾民自动干解决救济问题的宣传鼓动工作，从这些问题联系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党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任何一派，并且在斗争中反对一切妥协改良的论调。

二、须特别注意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力求应用群众化的工作方式，使每个同志都能公开的利用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并且将这些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联系起来。壁报或工人小报的办法要尽量推行，并且吸引许多非同志参加工作。上级党部须特别注意指导支部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使其务能应用新的工作方式，但应绝对纠正在宣传工作上回避党的政治口号或降低政治口号或只敢用秘密的个人谈话式的宣传方法，这都使党的政治宣传不能深入群众，使党不能领导群众在革命的政纲之下奋斗。

三、教育工作必须要尽可能地利用实际工作与斗争的经验。从工作中斗争中使同志了解党的政策与组织的原则。所以教育工作必须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

纠正以前离开实际工作的学院式的教育方法。

丙、职工运动：

一、陕西职运的对象。以西安的修械局、兵工厂、邮政局、电报、电话、印刷、汽车等产业工人为中心，邮局电报更特别重要。除少数产业工人外，还有西安的手工业工人（成衣、五金等工人），苦力工人（黄包车夫、挑水夫），同州作坊工人，绥德、蒲城、澄县、米脂、安定的矿工（土法开采的〔盐〕滩与炭井），榆林的手工业工人，亦当加公注意。

二、在产业工人中要以成立赤色工会为工人群众组织的中心任务。当建立赤色工会组织基础时，要利用一切机会的名义尤其是斗争的机会，去发展代表他们经济利益的组织，或直接用工会名义成立之自发互助等会社的名义，在斗争中可直接组织代表团、崇薪团以至罢工委员会（即工厂委员会），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基础。产业工人如有其他原始的组织，亦应当参加进去，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使转发生赤色工会作用或吸收其进步分子加入工会。

三、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在陕西仍旧是非常普遍存在，这种组织性质上是劳资混合的组织，资本家并且每利用地方派别等见解分裂工人阶级，引起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党应当在手工业工人中极力打破地方派别等见解，宣传工人阶级一致奋斗，并且要力求与资本家分化，夺取行会的领导到工人的手上，以建立群众斗争的组织。

四、手工业中师傅与学徒的斗争。党应当站在学徒的一方面，并且要帮助团在斗争中加紧学徒的组织，但同时更应当在整个工人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学徒的利益以减少师徒本身的冲突而加紧对雇主的斗争。自然，手工业中的包工头完全是靠剥（削）工人群众生活的，应当将他们看做工人阶级的敌人。

五、农村雇农工作必须加紧，发展雇农的日常经济斗争，加强雇农的阶级意识，以确立乡村中无产阶级的基础，在雇农数多的地方可组织雇农工会（包括农村手工业工人），数量较少的在农会中设雇农部。

丁、灾荒问题及农村工作：

一、党要深入灾民群众中去。在“吃大户、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的中心口号之下发动斗争，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向统治阶级示威，同时党要配合这个广大

的斗争，加紧城市工作、士兵工作、农村工作，使这个斗争扩大到反军阀战争以至摧毁乡村反豪绅地主的统治、走到土地革命的道路上去。

二、发动领导农村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扩大群众组织，同时要使农村斗争与灾民斗争联系起来。党在斗争中批评农民的烧杀主义、平分主义的不正确倾向。

三、农村斗争要与土地政纲及准备暴动的宣传口号联系起来，使党的主张深入群众中去，以争取广大群众。

四、农村组织仍以农协为中心口号。农协中要加强贫农雇农的领导地位，在斗争中加强和发展其组织，农村旧有的组织（如联庄会、自卫团等）而且是有群众的，党要加入争取群众并加强其农协作用或吸收其分子加入农协。农村组织中要严格纠正委派制度和包办农协的错误，确立党与农协的组织关系。

五、注意农民的武装组织。如在有武装的区域内，农协可组织农军或赤卫队以准备武装斗争，同时可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土匪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

六、发动游击战争。在农村斗争及灾民斗争剧烈的地方，而且有相当武装时，应即发动游击战争。游击战争要注意下列各点：1. 发动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发动游击战争。2. 游击战争一定是消灭农村反动势力，扩大农民组织的武装斗争。3. 游击战争的基本队伍必须是农民群众的组织，特别是贫农。4. 在游击战争中要用各种方法鼓动敌人的士兵倒戈，以削弱敌人的力量。5. 扩大农民群众的武装，以加强战斗的力量。6. 经常注意用各种机会夺取敌人的武装。7. 游击战争必须是广大群众的行动，要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游击队本身也就是宣传队。8. 游击队的给养，主要的是没收反动分子的财产，此外由群众自动供给，不能强迫缴纳。9. 游击战争一定是在党的指挥之下。10. 游击战争是进攻的，不是防守的。只有使游击区域扩大，发动广大的群众才能得到胜利，所以游击战争发动后，绝不能躲避在山上，以削弱其战斗力量。11. 在必须时因战略上的关系可以烧毁豪绅的房屋，但这是偶然的，绝不能以烧杀为目的。12. 没收豪绅的财产必须由群众自动地去没收分配。

戊、士兵工作：

一、加紧军队中旧有组织的工作，领导士兵日常斗争，发展士兵组织，扩大党的宣传。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士兵参加农民斗争，破坏反革命军队。

二、注意冯玉祥中心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

三、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入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

四、士兵运动中注意日常斗争。如发欠饷，反对体罚等切身利益，在斗争发展士兵组织，同时注意下级长官中的□□□。

注：①即预征 1930 年田粮。

*这是临时省委代表团在上海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讨论，由中央作出的关于陕西问题的决议案。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报告（第一号）

——陕西政治现状及党务报告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中央：

陕西代表已回陕，对陕西工作，已根据中央的指示，有计划的去布置。现将陕西政治现状与党务概况，报告于下，但对于党务方面，材料很少，因为各地未给临委报告，临委尚未巡视各地工作，现只能将目前情形略为叙述：

一、陕西政治现状

（1）全国军阀战争爆发后，蒋冯战争已成为箭在弦上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自韩、石倒戈，冯之大部兵力退回陕西，以孙良诚、庞炳勋等嫡系部队固守（潼）关，同时以陕州为第一道防线，孙本人驻守。主要部队均（向）回陕西，大军云集，潼关一城即驻三万余人，各商号均为军队占据，渭南、华县农村中，军队亦普遍驻扎。目前冯已抵太原，与晋阎在利害关系上作暂时的合作，但双方的军事准备仍不稍懈。黄河沿岸均有重兵驻守，便衣侦探互相遣使，同时晋现时食粮完全禁止出境，冯之军粮恐慌，仍是不能解决。这些事实都是说明冯阎冲突不能避免，战争或不致立即爆发，但只不过时间问题耳。陕北井岳秀与冯之冲突，亦日趋剧烈，冯陆续抽调部队开往陕北，近（进）逼井岳秀，井亦作军事准备，将军队集中延安、绥德，准备作战，同时已发反冯宣言。陕军残部潜伏各地与土匪混合作反冯的军事行动。冯内部的分化亦日渐显明，孙良（诚）退回陕西后，侵占宋哲元之地盘，宋、孙暗斗甚力。这些事实证明陕西在全国政治影响之下，军阀战争将日益扩大延长，统治阶级日趋于分崩离析的途径，决不能有和平稳定之一日。

（2）西北灾荒继续扩大，夏田种子都未收回，根本无望，现在犹未落雨，秋苗亦已枯槁，收获大概亦无望了。农村以草根树皮充饥，百分之九十食粮告

罄，流为饥民，在耀县、同官^①、三原一带，灾情尤重，每天饿死人很多，甚至农村中人烟绝迹。省城内居民由〔中〕逃来荒民多。在街巷中饿毙死尸，几无日不有。甘肃灾荒较陕西尤重，死人更多。西北上成千万的饥民，嗷嗷待哺，在政治上已成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而统治阶级的摊派剥削，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预征钱粮摊派粮食，一万两万石，甚至派人到农村中查粮，将所有食粮完全交去，有两石者即写三四石，完了少交一斗都不成。此外还摊派现款，官丁催索，急如星火。各城市中的负担更是加重，如西安商号营业账目都要交出审查，在营业项下每千元官厅抽若干元，房楼要缴验契，按契约抽收，如果不能缴收，即将房产定价拍卖，各城市商业有不少的都停止营业，除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外，在军阀战争期内拉差拉夫，占据民房，有时军队即将居民逐去，将民家什物任意破坏，所有东西都被军队拿去，陕西民众痛苦，已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对冯（玉祥）真是怨声载道，恨之入骨，民众对统治阶级之厌恶愤懑已达极点，客观上陕西民众的革命情绪，将异常高涨，走向革命的道路。

（6）陕西民众在这种水深火热中，自发地斗争已日渐勃兴，汉南石泉、〔城〕固等县佃农自动地抗租，得到最后的胜利，三水^②与灾民混合攻入县城，杀戮县长，各机关人员全被掳去，三原、泾阳等地农民自动地吃大户，最近土匪遍地，农村贫民异口同声，不作土匪有什么办法呢？！官厅对土匪已束手无策，在渭北一带几乎每夜都有掳掠事实，不过这些都是原始式的零零碎碎的斗争，还不能形成大的斗争。但是这些零乱的自发斗争，就是说明陕西革命高潮将要不可避免的来临，党绝不能忽视这些事实，党要加强主观力量，深入群众中去，领导一切群众的斗争，促起革命的高潮。

（4）一般小资产阶级，经过长期的沉静犹豫后，对国民党的幻想完全消灭，有重新走入革命途径的趋势。城市的学生更因家庭经济的破产，无法求学，同时教育经费都挪着军用，中学教员每月只发二成薪，有时完全不发，教育完全破产，而学生〔校〕当局剥夺了学生的一切自由，一般青年已不能忍受这种反动的压迫，在反动势力最大的西安，学生群众敢〔鼓〕起他们的革命勇气，在严重的情势之下，中山大学发动对学校的斗争，驱逐反动的教职员，结果得到

完全的胜利。一般中小学教职员为他们自己利害，进行索薪运动，酝酿罢教。至于城市的小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在重重剥削之下日渐失业，城市小资产阶级将日趋革命化。

(5) 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派在陕西甚为活动，他们拿着“新党”名义欺骗青年群众，蒙蔽阶级意识，而标榜着不反对 C.P. 的旗帜来拉拢青年，尤其乘党的工作大破坏之后，工作尚无头绪，而党的知识分子的干部，在革命失败后，表现思绪动摇，工作找不到出路，因此拉去了不少的知识分子作他们的干部，他们活动的中心是国良党各县党部及各学校。除西安各学校有相当的群众，其他各地都是一二县指委，在群众中目前（虽）无多大影响。党在整个策略之下，在斗争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欺骗宣传，使群众对他们不能发生仍（任）何的幻想，同时在有群众的地方，党可指定一二忠实同志进去有计划地分化破坏他们的组织。

二、党务概况

陕西党的工作，各地盲动失败后，又加以省委的大破坏，所以党的工作一时陷入停顿状态，革命失败的情绪反映到党内，一般干部分子因工作没有出路表现动摇、消极、怠工。关中道除渭南县委外，其他各地组织溃散，经过数月后，目前党的工作已有转变，许多以前离开的同志，又自动与党发生关系，萎靡（靡）消沉的情绪又渐振作起来，党又得中央的指示后，工作已得到正确的出路，一般党员群众将得到新的兴奋，同时在这客观条件之下，党的工作定有新的进展，各项工作分述如下：

1. 组织状况

A、陕北数月内没有得到详细的报告，自省委机关破坏后，事实上已没有关系，陕北工作最近情形，临委不能详知，据陕北来临委同志报告，陕北工作没有多大进展，特委又不健全，对各地工作多有不能帮助给切实指示，组织亦无进步，各地工作，米脂、延安、榆林、清涧等地工作最好，尚有相当进展，最近临委已决定派同志巡视陕北工作，同时改组特委，特委缩小，常委三人，兼

绥德县委工作。

B、渭南县委：同志七十余人，工作尚紧张，但县委不健全，一般工作都集中在县常委一人身上。临委决定常委张同志^⑤担任渭南县委工作，同时县委王同志亦驻渭北，经常〔帮〕助指导渭南工作，将华县划归渭南县委，临潼组织亦由渭南设法去恢复。

C、同州直辖干〔特〕支：同州过去管辖澄县、〔韩〕城、旬〔朝〕邑三县，但目前只同州有同志七人，三县工作因负责同志表现不好，组织坍台，临委已派新出狱的樊同志回韩整理工作，其他二县由同支负责收拾，最短期内可以恢复工作，三县组织仍由同州管辖。

D、旬邑直辖特支：旬邑组织溃散后，直到最近由流落的同志自动组织与临委发生关系，邠州、淳化亦恢复组织，由旬邑管辖，同时接连旬邑之甘肃正宁，亦发生组织，甘肃工作今后亦可开始发展。

E、泾阳特支：泾阳最近找到过去负责同志，已派往泾阳接泾阳工作，现已成立支部，同志三人，直辖临委。

F、西府各地：周至组织亦已恢复，直辖临〔委〕管理，兴平、礼泉、户县三县工作，同志十余人；岐山、扶风、宝鸡、凤翔、武功、眉县组织亦已有新的线索，最近成立岐山支部管辖各地工作，同志十余人。西府各地同志都是各地溃散同志，斗争失败后与党脱离关系，因生活问题入国民党党部，自动发生党的组织，西府同志大半是过去遗落很好的干部，所以工作很有希望。

G、西安市：西安市现已找到新的线索，由临委管西市工作，在最近期间，即可恢复党的组织。

H、除以上各地外，蒲城、富平两县委因负责同志的消极，离开工作，两县委组织坍台，临委派同志到两县收拾工作，表现尚好的同志，编成直辖支部归省委指导。三原县委溃散已久，没有党的工作，但三原是陕西中心工作区域，临委可积极找到线索，恢复组织，最近曾派在该县担任工作之同志去收拾。

2. 临委工作

代表回陕后，即召集全体省委会，讨论今后工作，同时改选临委，会议共开二日，除前临委三同志因特种关系未到，共出席六人，结果选出杜衡、王林、

张生才、徐子民^④、李惠民、刘景桂^⑤、C.Y. 省委书记七人为执委，李、刘二同志为候补执委，常委杜、王、张三同志为正式，刘、徐二同志为候补，杜为书记，请中央审查批准，省委分工为组织、宣传、秘书三科，除秘书科外，均由常委兼。常委三个同志经常住省一人，住渭北一人，指导渭北及东府各地工作，住西安一人，指导西市工作及西路工作。常委因分住各地，每半月才能开一次常（委）会，解决一切问题，省委会议后，常委三人分配〔别〕巡视各地工作，指导帮助各地工作的进展。

3. 士兵工作

士兵工作在陕西有很好发展的机会，因冯派部队回陕西以后，大〔肆〕扩充，招募新兵，党可乘此机会尽量派同志打入，士兵工作可以普遍发展。军队中旧有的组织，马鸿宾部有同志十余人，但有些同志被人发觉，现将这些同志调入别的部队中去，其余同志组织军支，直〔辖〕临委指导。冯之嫡系庞炳勋部亦派同志打入，目前尚无正式组织。陕西土匪遍地，常出没于农村中，尤其是渭北临潼一带，土匪很多，党可设法使前在军队中失败后的同志进行工作。南北三山中大半〔股〕土匪，北山有四百多人在同志影响之下，不过这些同志表现不好，临委最近另派同志进去工作，陕甘接连之旬邑山中有数百人，枪枝很多，已派二十余同志打入活动，最近未接报告，详细的情形尚不得知，临委将派同志去巡视该地工作。

4. 济难会工作

济难会工作，因目前党的工作在开始发展，济难会还不能形成总的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只能先在中心区域作起，我们用各种灰色名义发起公开的组织，有几个区域内作起后，组织省总指导全省工作。

三、其 他

1. 汉南工作：C.Y. 已派一同志前去收拾，同时发展党的工作，前中央派回陕之陈范^⑥因省委机关破坏，无从接头，他现在国民党部，最近可调他回汉南工作。

2. 由俄回来之吉国桢已抵家中，党已派人去与他接洽，分配工作。

3. 前被捕省委同志都在狱中，未释一人，待遇尚可，前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于六月十八日病死于狱中，李同志在狱中精神很好，给在狱中同志很大影响，死后在一般非党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无论何人莫不怜悼。

陕西临时省委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

附注：（1）临委给中央报告从此报告为第一号。

（2）因交通迫要去时间短促，所以明寄。

注：①即今铜川。

②即今旬邑县。

③指张生才（张蔚森、张雨生）。

④即徐振化。

⑤即刘志丹。

⑥即陈征。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节录）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发展到目前准备中的蒋阎直接开火，已牵动了中国全部的生活。从两广到顺直，从四川到江浙，没有一省不受着军阀战争之直接祸害的。过去一年多的战祸，已使民族工业日趋衰败，交通机关日益破坏，农业危机与灾荒现象更日加深入与扩大，虽富庶之区如江浙都不能免，因之群众生活的痛苦更日益走向绝地：饿死的，战死的，被屠杀的几遍布在全中国的城乡，失业工人，破产农民，以及灾民伤兵更成千累万的不绝于途。这些，都是造成革命新浪潮更加成熟的客观基础。自然现在这一形势的开展，一方面决定于统治阶级之日趋崩溃，另一方面则决定于广大群众斗争之日益高涨与革命的主观力量之日益加强。在统治阶级营垒中，中国军阀的火并，主要的是反映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冲突的加紧。伦敦海军会议之露骨的冲突，是更加证明世界大战将无法避免，而且要更快地来到。因此，中国国民党军阀统治处在这帝国主义列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激烈的争夺之下，将永无可能挽救其必然崩溃的命运。在群众斗争方面，自最近上海电泡厂，同兴鸿章纱厂，电气厂的工人罢工示威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屠杀和资本家的欺骗压迫，唐山路工的罢工示威，包围路局，并打死黄色领袖，青岛工人武汉纱工之不断地向统治阶级示威，益发证明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不断地进攻苏联，便为其压迫革命挽救危机之唯一的冒险尝试，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

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党的总任务与中心策略

三、因此目前党的总任务毫无疑问的是更加重了党之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全国危机的加深，“反帝国主义”，“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军阀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反抗资本进攻”成为目前最迫切的中心任务，而“争自由”“要土地”“要饭吃”成为动员群众最中心的口号。配合这一切斗争的领导，汇合这一斗争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总的政治路线。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只有坚决地执行这些中心策略，坚决地在这一集中进攻的总路线下加强党的主观力量，革命才能争取到全国的胜利，首先争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

中央六十号通告指示现在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但中心策略的指示还不十分明显，如在工人运动策略上以组织同一产业职业的同盟罢工为中心而未将组织政治罢工为中心，在农民运动上没将组织地方暴动提作中心策略。在各地党部更有许多错误观念，如以为目前组织同盟罢工，只是经济罢工的，甚至顺直省委中人还有以唐山路工罢工纯是经济斗争的；许多农村斗争已发展到地方暴动形势而迟疑不敢领导，甚至江苏外县党部还有怀疑和放弃游击战争；对兵士运动更有忽视兵变甚至放弃兵变领导的根本取消倾向。红军的集中进攻在有些地方确已收有效果（如鄂东，鄂东北，赣西南）。但在这主要的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尤其是反帝运动尚未为全国党部所重视，而成为造成全国革命高潮最有力的条件；反改组派的运动与组织城市贫民斗争，也还未成为各地党部的中心策略。

中心策略的解释

四、在实施目前的中心策略，中央更有下列的解释和指示：

第一、在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的总策略下，自然要以发动一厂一业的工人斗争，尤其是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为主要的战略。现在的局势，不但同一产业职业的同盟罢工在其组织赤色工会与准备罢工的过程中离不开政治斗争的关系，即一厂一业的斗争也一样要关联到政治斗争，先其是失业工人的斗争一发展便是向政治斗争。因此在目前反动统治极端的压迫下，我们要抓住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每一压迫工人屠杀工人的事件来发动组织政治罢工，扩大一厂一业的政治罢工到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同时更要推动一厂一业乃至同一产业的经济罢工发展到政治罢工，要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成为组织政治罢工的生力军。在组织上，要加紧建立产业的阶级工会，加紧发展一工厂一作坊的赤色工会分会或支部以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尤其是党的每一生产支部，必须立即在其所在的工厂作坊中建立赤色工会分会或支部，同样要加紧失业工人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在每一斗争中必须运用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吸收全厂全业的工人群众，而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更成为团结全厂工人群众推翻黄色组织接受赤色工会领导之最迫切的要求。实行这些组织，首先要肃清工会运动中之委派制度命令主义的残余。必如此，政治罢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且才能成为有力地扩大。必如此，一切政治动员的示威才能在这样基础上有广大的发动，才能以集体的力量冲破敌人的一切压迫和武力摧残。必如此，才能使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

第二、在组织地方暴动的总策略下，首先要深入农民的土地斗争与发展游击战争。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尤其重要的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是深入土地革命的先决问题。同时，打破游击战争中之上山倾向保守观念分散政策等等农民意识和土匪倾向，是组织地方暴动的必要前提。在目前形势下，许多游击战争尚未发生的省区（如江苏，如北方各省）更必须坚决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并配合成地方暴动，务使这

一武装斗争不再长期停留在的游击方式，要与城市的工人罢工兵士兵变相配合以适应目前政治形势的发展，而更便利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组织上，在农会中，苏维埃的政权机关中，游击队中，必须树立雇农贫农坚强的领导，必须坚决的以斗争的方式肃清富农分子，而抓紧对于中农的联合。尤其重要的是雇农工会的建立，必须成为党的每一农村支部之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一切对于兵变策略的动摇与忽视兵变潮流的倾向都不容许。进行组织兵变，要能经过士兵群众的日常斗争，要更有士兵委员会形式的公开斗争组织，在实现兵变的条件上，当然要计及当时的客观环境与工农群众斗争的情形以决定兵变的配合与其发展方向，但这决不是取消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兵变总策略，更不是限制了兵变策略的实施，且全国兵变潮流愈能得到党之有计划地有组织的领导，全国工农斗争浪潮才愈能得到有力的配合而准备发动全国的暴动。

第四、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之整个基础上的。红军的生长是由于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游击战争的发展，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红军的作用必须在集中进攻的原则下，才能更加显露其对于全国革命的政治影响与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直接动力，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下，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只有在这一原则下，才能更有利于准备全国暴动的配合。一切分散红军，逃避敌人进剿，向偏僻地区发展的观念在现时局势下，便成为极端错误的取消观念。因此，红军扩大的计划必须首先从扩大与集中农民武装的组织，坚决的肃清反动的武装，广大的宣传工农群众投身红军，有计划地进行组织敌人军队的兵变做起；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以摧毁敌人的要害，以联系地方暴动到城市工人斗争的领导之下，才能更推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

第五、在上述的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系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尤其是反帝斗争必须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发动群众起来，形成广大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高潮，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尤其是重要城市的反帝组织与其全国的联合更成为一般的必要。城市贫民运动及其组织在

目前是辅助城市革命斗争发展的主要同盟军，党及工会必须吸收城市广大贫民群众于一切斗争的周围，尤其是争自由运动。在目前形势下，改组派的一切活动将更要障碍革命浪潮的开展，将更要吸引落后的群众走入妥协改良的幻想，因此，坚决地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揭破改组派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以至第三党反工人阶级的活动是目前决定革命胜负的必要前提。

五、为保证目前党的中心策略之有力的执行，党必须更加紧于主观力量之加强与工作之适合的布置，向产业工人发展，坚决地引进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努力地从斗争中改造党的旧基础，督促支部做群众工作，有计划地建立各中心城市的产业的赤色工会和农村中的雇农工会扩大党纲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是目前最主要的组织任务。在工作布置上，中央要更加加强对各地的政治指导，要使中央党报更能成为指导全国政策和组织群众的中心力量，要更特别加强对于全国重工业工运的指导，尤其是海员铁路兵工厂矿山的工运。关于中心省区的工作，中央及省委都要以更大的努力纠正过去的一切缺点，尤其是注意各种主要工作的配合与联系。

党内反一切右倾的斗，及与取消派在党内党外的斗争成为目前保障党的路线坚决执行之主要的条件。各级党部必须认清陈独秀取消派和反对派在工人群众中的一切活动已走上破坏革命的工贼道路，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中，取消派必然要诋毁党的政治路线是盲动主义。因此，党必须坚决地将取消派从群众中驱逐出去，尤其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肃清取消主义的路线。因此，党更须从根本上肃清党内一切右倾的政治思想与组织观念，尤其是调和倾向。以彻底消灭取消派在党内的客观基础以保障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央

*根据中央这个文件，临时省委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和七月分别召开了渭北工作讨论会和第五次扩大会议。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军支函（省字 41号，军字2号）*（节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军支：

目前因为政治局势的紧急转变——就是世界大战的迫切，军阀战争的延长扩大，工农群众斗争的剧烈——推进了我党任务的加重，所以工作的策略和路线，急更应进一步地改变，现在我们已经明确的规定，工作的主要路线，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详见中通七十号，此处从略）

推进这一直接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迅速走到革命胜利的途径，你们在那里的的工作，虽无多大基础，不是马上就要兵变□□但在目前陕西的政治局势看来，我们要呼应全国的革命的潮流，与推进陕西工作的发展，即日开始组织兵变，实为你们目前工作主要的路线，亦即你们工作的唯一出路。现在一切工作的布置和推动，都要集中力量于这一工作的开始准备，尤其在西北军阀拼命地出关进行抢夺地盘战争期间，这一工作正是开始最好时机。士兵的生活日益恶化，还不时要开到前线充当炮灰，你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开盖要开差费，增加一文两文的菜钱，每日的伙食增一两半两的米面等迫切的口号，发动士兵的全体斗争。全体要□官长的示威，扩大我们的政治宣传，揭穿官长的黑幕，鼓动士兵的革命情绪，使由小的斗争，一连一排的斗争变成大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应注重于中间分子的宣传，准备吸收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并开始兵变委员会与其他各种各式的兵士组织（注）这些工作的日益扩大，或到了你们直接参加军阀战争镇压工农斗争等条件之下，立可实现组织兵变成功的执行。

省 委

原文注：兵士各种各式的组织如兄弟团、结交、拳术会等组织。

*原标题为：《给军支函》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通告（第九号）*

（节 录）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和策略

（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陕西党除努力地坚决地执行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外，应特别集中力量于陕西目前几个中心工作的努力！

1. 领导广大的农民斗争，联系到农村中豪绅反捐税的斗争，扩大到剧烈的武装斗争，走向深入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的道路。

2. 加紧职工运动，抓住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组织一厂或一业的同盟罢工，以至组织政治罢工，并要在这斗争中，开展赤色工会的建立及武装训练的学习。

3. 城市贫民的反抗苛捐杂税，争取自由，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党须坚决的领导，使之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周围。

4. 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

5. 在组织上应坚决地在斗争中改造党的组织，吸收工农分子，引进新的干部，创造支部生活，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右倾危险，建立中心区域的工作，尤其是西路、三原、南郑的工货，发展群众的组织，扩大政纲共产主义的宣传。

6. 反对机会主义与反对派的斗争，必须加紧，并要根本肃清一般同志对改组派及新党的幻想。

在执行这些中心任务与策略的过程中，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站在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总路线之下，打破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的一切错的路

线。

这一通告，是根据陕西客观主义的实际情形，并接口中央七十号通告专为陕西目前工作路线和策略的转变而发的，省委根据此通告已完成一月的工作具体计划，各地接到后，应联系到中通七十号与当地实际情形，定出当地具体的工作计划，实现此任务。

省 委

（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

*原标题为：省委通告第九号。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致陕北特委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来函收到，知巡视员已至陕北，中央通告六十号、六十八号、七十号，省委通知第九号，均已先后寄给你们了。在这些通报、通告中，对于目前全国、全陕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策略和工作路线，都有详细的分析，你们可根据这些通告，针对着陕北实际情形，协同巡视员，切实讨论，决定出陕北目前工作具体的办法！同时省委〔对〕你们讨论和执行这些通告时，还有下列的解释和指示：

一、政治形势——省委认为陕北的政治形势是与全国全省一样，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群众斗争的日益高涨，在陕北更为显明，尤其在此牵动全国政治生活的蒋阎冯战争期间，井系内部的矛盾，与非井系的外部冲突日甚（主要的还是对冯），一切剥削压榨的加剧，荒灾又到了青黄不接的关头。你们可从陕北各种事实来证明这一政治分析的正确，以作你们布置一切〔一切〕工作的方针。

二、工作路线——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固然是针对着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来决定的，但同时也是推动客观形势，加强主观力量的唯一办法。你们不要存“陕北客观形势是很好，只是主观力量大〔太〕薄，没法执行集中进攻的路线”的观念。而想在静的，保守的，分散的，和〔合〕乎主观力量的路线上，加强主观力量，再事集中进攻。我们相信在目前这样的形势局面下，一全国革命危机急剧加深——只有努力执行集中进攻的路线，打破分散保守（主观上当然不是保守，而是想生聚教训，再事进攻，其实际上是走到保守的道路）的观念！勇敢地推动一切工作，才能在一切工作因集中进攻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加强党的力量。推进革命形势，走向更高的阶段。你们对这一路线，必须有深刻的认识（主客观形势等）然后才能实际的灵活的运〔用〕到一切工作上，使

工作走上正确的道路，不然便在这一路线的执行上，走到两个极端的错误！取消主义与盲动主义，前者是留恋旧的工作方式，说集中进攻是不顾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而不去努力执行！后者是不注意灵活运用，而只是盲目进攻，结果走到了不要群众的盲动主义。

三、中心策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的问题。

A、组织政治罢工——你们不要一见这个问题便吓跑了，说陕北职运尚未开始，焉能谈到政治罢工，其实正因陕北职运尚未建立，才应十分努力于组织政治罢工的组织工夫，你们应根据中通七十号所解释的政治罢工问题与上次省委指示你们关于职工运动的□□□□□□坚决的建立职运工作，同时在建立职工的过程中，即开始政治罢工的宣传与引进，在每次会议中斗争中（由小的斗争一厂一业的同盟罢工，进到总的政治罢工）都要注意这一中心策略的布置和准备到政治罢工的组织工夫，能在日益加深，则这一中心策略，便可随之实现。

B、组织地方暴动——这一中心策略在陕北的政治形势上，是很有可能——最近期间，而不是多么长远的。陕北在井系军阀割据之下，统治力量非常薄弱（主要是内部冲突日甚，战斗力量软弱），在军阀战争的日益延长扩大的局面下，邻近的大军阀（冯、阎）均无来干涉陕北的力量与可能，加以交通不便，外来的力量很难达到，而群众斗争与土匪风起云涌，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的良（好）基础，陕北党应立即加紧党的主观力量，加强领导，建立几个城市（三边、神府、榆林、绥米、延安等）工作，开展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斗争，但在土匪中的工作，要注意到走游击战争的道路），加紧重要城市的兵变运动，准备兵变工作，开始工人手工业者的斗争，努力重要城市附郊的农民斗争，灾民斗争，开始武装的训练和组织，并要时刻注意农民武装的集中。布置这一次斗争，农民灾民斗争，游击战争，兵士运动，与城市工作，迅速地努力地配合成的地方暴动的条件。应用过去的一切经验。则这一中心策略，将可由努力的结果很快地实现。

C、组织兵变——应首先打破过去太得重视军官运动的倾向（并不是不注意军官而是要特别注意兵士），在有军支组织的军队中，积极的策动兵士的日常斗

争，扩大党的政纲（兵士要土地）建立苏维埃与兵变的宣传，开始兵士委员会的组织（秘密或公开），加深兵士与军官的对立，在没有军支组织的中心部队应开始派遣同志进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在将受编的土匪中，应尽量地影响使其不受改编，加强其下层的群众的工作（对首领当然要拉拢，但时刻准备在行动中消灭他的决心），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伍，形成变相的兵变。当（对）兵变的条件（见五十六号通告）我们要时刻注意，（但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兵变，与组织地方暴动的前面。）兵变，更应由主观力量去组织，去造成，不要因客观压迫而才进行兵变。这一策略在陕北主客观上，都是最有可能，你们应毫不犹豫地努力推动这一工作。

D、扩大红军——省委已把这一策略，改为组织红军，扩大红军了。（因陕西目前尚莫有红军当然不能谈到扩大）组织红军的主要路线，一方面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战争，夺取敌人武装，集中农民武装，而来武装红军，一方面还要加紧兵士运动，进行兵变，由兵变而组织的红军最有意义，最为重要，不特战斗力强，而且影响到敌人军队中最为□□（最近鄂东的红军，便可证明）。

在目前陕北的形势，发动游击战争，组织进行兵变，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是容易而可能的。所以你们对这一工作，应立即开始计划和执行。

四、要实现以上的中心策略。应开始以下的几个中心工作的布置，则以上的中心策略，才可很快的实现。

A、发动一切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党的宣传，建立群众的组织，但开始需集中力量于几个中心区域与中心群众斗争，特别是榆林的工人斗争，绥米的农民斗争，灾荒特重区域的灾民斗争，各城市的贫民学生争取自由反捐税的斗争。由这几个中心斗争，再领导其他的斗争，斗争的方式必须集中进行，由小的斗争进到较大的斗争，以至武装斗争。

B、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党员的政治水平低微，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微弱，是党领导群众的主要危险，目前应加紧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群众革命的情绪和政治水平。主要的办法，首应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和每次会议上加紧党员政治的讨论与宣传，而目前各级及特委开办训练班，加强政治指示，亦为开始办法之一。

C、党的组织路线，应坚决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劳苦群众入党，引进新的干部，改建旧的组织，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斗争，党才能适应当前的伟大任务。

D、特委及地方党部，特别要注意到中心区域与中心工作的指导和加紧，使一切非中心工作，能得到中心工作的领导而普遍地发展起来。

*省委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一（三十）日给中央的报告很长，本书只节录了其中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临时省委在一年的恢复整顿工作之后，地方党组织的概况。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第六号) 附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一〔三十〕日)

3. 各级党部的组织及负责人的出身和成分：

地方别	组织别	管辖地	委员数	常委数	后补数	分科	每周会数	委员成份、失业、在业、指选、性别									
								成份				在业与失业		选抑派		性别	
								工	农	兵	知	失业	在业	选	派	男	女
陕北	特委	陕北	5	3	2	秘四科宣组	1		2		5	2	5	6	1	7	
西安	省委	西市	5	3	2	秘四科宣组	1			7	5	2	4	3	7		
汉南	特区	陕南	3	3		二科宣组	1			3	3	2	1	3			
渭南	四个特支	渭华	4	4	4	二科宣组	1			8	2	6	7	1	8		

地方别	组织别	管辖地	委员数	常委数	后补数	分科	每周会数	委员成份、失业、在业、指选、性别									
								成份				在业与失业		选抑派		性别	
								工	农	兵	知	失业	在业	选	派	男	女
蒲城	特支	蒲城	3	3		二科宣组	1			5		5	4	1	5		
三原	特支	泾、原、三淳	3	3			1	2	1	3		2	1	3			
西路	特区	西路五县	3	3		三科宣组	1	1	1	3				3			
蓝田	特支	蓝田	3	3		二科宣组	1	1	3	1	2	3	3	3			
富平	特支	富平	3	3			1	1	2	3		2	1	3			
临潼	特支	临潼	1	1			1	1	1		1		1	1			
军支一	军支	冯部	3	3			1	1	3		3	2	3	3			
军支二	军支	耀县	1	1			1		1		1		1	1			
军支三	军支	柳部	1	1			1	1	1		1		1	1			

*省委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一（三十）日给中央的报告很长，本书只节录了其中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临时省委在一年的恢复整顿工作之后，地方党组织的概况。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一号）*

——第五次扩大会议的总结与精神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们：

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已于日前开过了！这次会议他开在临时省委成立一年之后，红色五月工作刚才总结的时候，当着全国的革命斗争日益接近直接形势，全陕的群众斗争亦在继续发展，新的革命高潮日益逼近的期间，他负着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解决了陕西许多目前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关于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到会的人数除全体临委外，各地中心区域党部（西安、陕北、汉南）都有重〔要〕代表参加。会期八天，在中央正确的指导之下，在全陕党员一年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经验中，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重大任务，而且研究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以来，一切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考核了整个三年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总结，通过了政治任务、职运、农运、兵运、组织、宣传等决议，主要的成功还是对于政治形势和群众斗争分析估量的正确，各种工作策略路线和方法的获得，以及对过去临委工作的批评和纠正，的确是陕西党的工作上一个新纪元。现在特将其扼要的总结和精神报告如下：

（一）大会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激，军阀战争的蔓延与扩大，社会经济的急剧破产，促进了统治阶级的动摇与崩溃，加深了广大群众的痛苦，增加了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另一方面，城市罢工浪潮的继续发展，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的普遍各省，兵士群众的自觉哗变增多，红军势力的日益壮大，这四支革命巨流日益走上配合的道路，都是证明直接的革命形势是在猛烈地向前奔流，伟大的革命高潮，已将逼到我们面前。以革命的阶级斗争，消灭军阀战争，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争取全国武装暴动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客观条件是日益成熟，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形成全国

的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陕西）革命的客观斗争也是高涨的趋势……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比全国为成熟。因此陕西的党的任务，只有在全党整个任务和政治路线之下，努力地加强主观力量，准备全省的总的革命斗争，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建立局部以至全省的苏维埃政权。不过陕西党过去因为主观力量的薄弱，使许多广大的群众斗争，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以致革命势力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陕西党在斗争中的主观力量，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的微弱，使〔便〕取消了伟大的政治任务，那便是在政治上走入无耻的不可救药取消主义的泥坑了。

（二）这次大会对于策略方面的讨论极注意，是超过党过去一切大会的记录，而且指出了过去不注意策略的错误和事实。而在职工运动的策略上，组织政治罢工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根本上要明了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每一大小斗争都要受到政治上的压迫，而无疑的要走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去，所以在领导和发动工人大小斗争中，都要紧靠着政治斗争和组织政治罢工的策略，才能冲破敌人的压迫，争得最后的胜利。在农民斗争上，组织地方暴动，是目前客观形势上唯一的策略，一切大小斗争都要围绕这一策略而积极向这一目标推进，才能争取得农民斗争更广大更继续的胜利，同时对于反对富农路线，建立雇农工会，肃清土匪红会等的不正确幻想等的斗争，也是执行这一策略上最主要的先决问题。至于兵运，不特认定组织兵变是目前总方略，而且要使兵变走上最高的形式——兵士暴动上去，根本消灭军阀制度的基础，创造出红军的发展。对于这些策略上更特别的回顾到目前群众斗争的激剧发展，绝不能等待式的停留在“只是组织”的工夫上去，而要使这些策略迅速地更进一步成为直接行动的策略，以汇合这些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发展的群众斗争，准备建立局部以至于全省苏维埃，配合全国争取一省或数省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以至全国武装暴动的胜利。

（三）大会指出，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是右倾的机会主义，以及富农路线和取消观念。这些主要来源，当然是由于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过于薄弱，一般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太得低微，工作经验的一般缺乏，因此表现出来的，便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的不足，对党的正确策略路线发生动摇，陷落在取消

倾向与富农路线的泥坑，以至对党的工作及党内斗争不能坚决的深入支部中去，障碍群众的斗争的发展与领导，因此反右倾的斗争，成为目前最严重的迫切的问题。主要的方法应当是：坚决的与这些倾向在解决问题上、工作上、组织上及一切群众斗争中都要作坚决的斗争而不能稍示退让，走到和平主义与调和主义的途径，而且要讨（耐）心的艰苦的在一切实际工作和问题上本教育的说服的精神，去封正一般同志的右倾倾向，不能单纯的（应）从组织上去解说，应根本明了在党内斗争与克服右倾上，政治路线的斗争与组织上纪律的运用，是同时并进的，而绝对不能分开的。至于斗争的方式，要相信只有经过支部的斗争，才能根本的彻底的肃清右倾的基础，单是上层的干部的斗争是不够的。

（四）在组织上大会特别提出，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右倾的危险，支部工作缺乏，中心工作没有建立，是目前最严重的缺点，是一切工作不能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党要向产业工人开门，大胆的勇敢的吸收工人分子入党、并发展产业支部，农村中努力雇贫农的发展，创造和发展赤色工会与雇农的组织，肃清富农分子与富农路线，以宽广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斩断右倾的根株，以建立起党的中心工作。而特别重要的，还是要建立支部生活，使党的一切策略和路线都能经过支部的详细讨论，而传达到每个同志以至广大群众中去，每一工作和斗争，都要在支部的热烈讨论之下去执行，使支部确实成为作战的基本战斗队，一切群众斗争的核心，这样才能更快的促进党的组织进步，而适应推动目前革命形势的高潮。

（五）大会对省委工作，指出过去一年来，在工作的指导与推动上，主要的缺点：还是政治上犯了右倾的错误，对政治形势估量的机械和不足，红色五月第一周工作的忽视，与具体表现的右倾事实，把右倾危机与盲动主义平列的观念，对国民党的留恋与不坚决，分析新党的模糊阶级观点与缺乏剧烈的斗争以及对土匪策略的错误和时存幻想，灾民斗争与职工运动未能积极注意和布置，中心工作的未能艰苦的建立，这都是省委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右倾错误，因此反右倾的政治斗争与加强政治指导和中心工作的逢立，成为省委今后工作的主要方针。同时大会对最近省委工作的进步，也是明确地指出，“五卅”工作的着重与努力，中心工作和职运开始推动，反

右倾与反富农路线的坚决斗争，这当然是今后工作进步的主要现象和基点，而绝对不能忽视。

全体同志们，以上便是五次扩大会议的主要总结与精神（一切详细当然在决议案上说出）。省委根据扩大会议口的决议指出：号召全陕同志动员起来，一致的艰苦的努力，执行这次大会的一切决议，洗去过去一切消极右倾的错误，坚决的在，这一大会的指示和精神之下去奋斗，而且要明了的认识，这次扩大会议，他在陕西党的工作阶段上以及目前革命形势上，都有他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全体同志必须要使他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与争取全陕武装暴动胜利的信号和武器，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

省 委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注意 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们：五次扩大会的各种决议即通告发下，各级党部接到后，势该召集会议讨论，做成决议，会议的方法，各地党部必须召集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各区委必须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最主要的还是要做到每个支部的详细讨论，使扩大会议的策略路线，经过支部的讨论而深入到每个同志中去。讨论的内容必须要与当地的实际情形群众生活工作经验斗争形势联系起来做成决议案。不要注重在原则上大略上而忽视了当地的实际意义，且各的（地）决议不必太长，亦不必分成几个，主要的是在帮助下级党部更有头绪更切实的讨论和了解，以表现在每个同志的工作上。

*根据中央七十号通告，一九三〇年七月在蓝田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提出陕西党的任务是在全国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任务之下，争取全省总暴动的胜利。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

省委第五次扩大会已于七月九号开过了，经过时间共九天，出席人数共十人（省委委员、C. Y. 代表、各地代表特许参加者），各中心区域除渭南外都有代表列席。大会详细讨论过中通七〇号，及陕西工作，结果成立决议案七：政治、职运、农运、军事、组织、宣传、对 C. Y. 决议。大会讨论系根据中通七〇号的路线及策略决定的，因此接到中央来件后深觉大会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及讨论与决议不足之处很多，故于省委第三次常委会重新决定，根据中六月十（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充实陕西各种工作的决议。

扩大会并决定派负责同志到中央，约于本月终即可起程，此行的任务：1. 报告陕西工作及扩大会经过；2. 决定豫直^①等省与陕西的工作配合问题；3. 接受中央指示并正确的规定陕西今后工作。中央意见如何？请速示知省委。

扩大会决定省委以正七人副二人组织之，以杜衡^②、王林、吉国桢、焦中敏^③、陈征^④、张文华、陈冠英^⑤为执委，杜、王、吉三人为常委，赵伯屏^⑥〔、〕黄子文为候补执委，杜衡为书记，中央接到后，请详细审查，速行批准为要！

注：①指河南、河北两省。

②即杜衡，杜振庭、厉君、励君。

③即焦维炽，焦维志。

④即陈范。

⑤即陈伯英，陈文秀。

⑥即赵伯平。

*原标题为：《陕西来件》。

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报告*（节录）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三日）

渭北游击战争的经过：

（一）游击前的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

渭北在全省灾荒中最为严重，秋、夏无收，赤地千里，政治经济都起了高度的恐慌，商业凋零，三原要算关中最富之区，过去商业繁盛，现因灾荒关系，歇业者在十分之五以上，各市镇都是非常肃（萧）条，商店不是泥门就是拆房，至于手工业生产完全破产，手工业工人都离开城市谋生去了。农村经济更是高度破碎，三原土地每亩价洋一元，房屋拆毁者百分之八九十，甚至一村完全拆完，木料当柴卖了（一块洋可称三百斤）富平农村经济虽比三原好些，但豪绅地主富农的剥削更是特别苛刻，每亩地虽还可卖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但地主富农高利贷的剥削特别苛刻，一石粮价本来七、八元，预先支付，夏收后即该还三十元左右，这些利贷都以土地作押，逾期不交，土地即归债主，因此土地集中更是迅速，大部分中农以下的农民，同样急剧破产。政治上整个渭北都为土匪所割据，政府只保守一个城市，但豪绅统治特别强大，富平豪绅武装组织更为严密，因土匪到处混乱，各地豪绅地主富农利用破产农民编制民团，常与土匪作战，同时即镇压农民斗争。富平有一个区域新式枪枝即在三千左右，渭北豪绅地主都集中在此，有如租界。豪绅统治既是这样严密，对于农民的压榨剥削更是特别野蛮，因灾荒及各种剥削，农民急剧破产后即被豪绅逐出这个区域，农村阶级对抗非常尖锐。至于统治阶级的摊派敲诈，苛刻备至，捐税空前未有的加重，经常税、地方税、斗捐、纸烟借款、柴炭捐、军用借款、军衣捐、国库捐、灯油捐、临时借款、军用大借款……名目繁杂。三原军用大借款约只有八十元的资本商号即派四十元，因此激起三原全城罢市反抗。农村捐税更是急如星火，差吏到乡，只要家里有价值一元的的东西即拿去了，逼迫得农民跳井投崖自杀者遍地皆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状况之下，群众生活已到极端的赤贫化，

广大的农民菜根稀糠都不能到口。因此各地灾民斗争风起云涌，三原北原一带，抢夺豪绅富农麦子，三原在南乡一带自动分配豪绅食粮，且当时已是收麦期将近，夏荒非常严重，每亩麦只有二三斗收成，而且这些麦子都是豪绅地主富农所种，三分之二的农民都一点没有，但各种摊派剥削，苛捐杂税，借口夏收，更是刻不容缓的强迫恶勒，群众斗争情绪此时非常高涨，自发的斗争亦普遍。渭北党过去在三原北区一带很有历史，而且影响亦很大，所以群众对同志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敢，我们就到土匪里边混去。”这时客观形势已经是这样，斗争一起，即是与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如果不能领导这个斗争，广大群众只好让土匪领袖夺去，所以省委即根据了这个客观形势，坚决的指示三原特支坚决开发游击战争。

（二）游击战争的准备：

省委在五卅前数日即与省委清北巡视员黄成章同志（过去三原负工作），西路巡视员陈冠英同志（过去西路负责斗争失败后因无法回去）共同开渭北工作讨论会，详细的估量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即具体的马上决定准备开发游击战争，迅速的走向地方暴动的道路。当时省委指示的具体策略和路线是：

①党要提出“分配地主豪绅食粮”，“反抗捐款”为中心口号，在群众中尽量宣传鼓动，以联系到“分配豪绅地主土地”“反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中心政治口号，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

②以三原北区为中心的斗争发动后，即〔迅〕速的扩大到邻近各区各县，同时富平党亦必须立即发动群众斗争与三原配合，主要的是发动三原城市附近各区的斗争，以汇合夺取三原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

③立即开始恢复农民协会，因农协在过去在三原有很大的影响，能够号召群众，但过去是在机会主义的路线中，与正牌绅士联合，为富农所把持，必须立即改变过去〔来〕，以广大的贫民（？）作基础，驱逐富农，使〔农〕协成为贫农中农的组织，灾民群众的组织更是特别重要，以灾民自救会为中心，团结灾民，领导灾民斗争。这些群众组织必须猛烈的扩大，成为广大群众的组织，打破过去的狭隘范围。

④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应该特别加紧。在农协和灾民自救会的组4只之下，都要有武装组织，以游击队、灾民队、少年先锋队为武装组织的中心，尽量搜集武装，夺取豪绅民团土匪军队的枪枝。准备每人都要有原始式的武装（刀矛等），集中群众中散布的零星武装，经常地举行武装组织的大会，以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加强群众的武装力量（过去三原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武装，在群众中已成习惯）。

⑤准备游击战争最中心的问题，是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的问题。所以利用各种方式召集群众大会，作有强力的煽动性的宣传鼓动，以提高群众的斗争勇气与决心，党可经过群众组织散发各种浅显的文字宣传品，如传单、标语、画报等。

⑥坚决地发动反富农的斗争。三原党在历史上堕入富农路线中联合富农，事实上富农在三原北区一带最为厉害，因豪绅地主都被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富农在内）杀死赶走，高利贷摊派剥削都集中在富农手中，因此反富农斗争是开发游击战争的先决问题。因此，省委特别坚决指示，领导雇农斗争，组织雇农工会，反抗高利贷的口号最为重要，以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⑦渭北土匪遍地，过去陕西任何一个地方党部与党员群众都是想利用土匪发动群众斗争，说土匪是革命的，因此即尽量与土匪上层领袖勾结。省委特别严重的提出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是断送群众斗争的正确（错误）办法，对土匪的正确策略必须深入下层群众中去，尽量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下层群众与领袖的斗争，领导群众参加农民斗争，加强政治教育，以改变其流氓意识，如有一部分整个投入农村斗争中来时，必须立即改编，鼓动群众解决其领袖，以扫除领袖在群众中的影响。

⑧加强党的主观力量，普遍的建立农村支部，尽量吸收斗争中坚决勇敢的分子入党，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支部工作，每个斗争的发动与党的策略必须经过支部深刻讨论，在支部中训练新的积极勇敢的分子（雇农、贫农），撤换富农分子，党内要坚决地与富农化的路线斗争，打击一切富农意识。

⑨建立城市及士兵中的工作，应立即派得力同志及在党影响下的群众到城市和军队中去，建立党的士兵支部，鼓动兵士哗变，以与农村斗争配合，城市

中应建立贫民和店员中的工作，领导店员贫民斗争，建立贫民和店员的组织，使城市斗争与乡村斗争配合起来，汇合成为地方暴动。

省委根据这几个策略路线，详细讨论后，即派黄陈二同志去河北，以三原、富平为中心，开发渭北游击战争。

（三）游击战争的经过情形：

黄陈二同志到渭北后，即将省委的决议提出三原、富平两地党部讨论，积极发动游击战争，但黄陈二同志并未按照省委决定路线去执行，还是在勾结土匪和富农路线的危机之下，发动了省委所指示的游击战争，因此经过二十余日后，即被游击队所联合的土匪全数收枪，牺牲同志数人，完全失败了。在经过情形时陈同志向省委所作的简单报告择一段附下，即可知其情形。

（以下是陈同志的报告）。

……△游击战争的经过情形：

游击的时日虽不过长，我们就他性质变化分为四个时期苟述出来：

第一时期是党员党（光）杆的斗争时期。本来决定阴历五月十三号发动，因当天下雨，未能如愿集合群众，以武字区做〔作〕中心，地点在长坳集合，到了十五日晚上，王德修（土匪首领）才带了三十多人，二十一支枪，拂晓到了长坳，我们将豪绅早已给他（王）说明，并说明驻扎地点，可是因王部的成分复杂，乱七八糟，兼之王本人系书生出身，没有军事经验和常识，反信任那些兵士，只是抢洋投奔拉票子，乱喊驱逐在长坳（小村落）东土城后边赶狼，他以为民团起来了，马上集合群众，就向南原下跳〔跑〕去了，但武区这时才集合了十一个人，长短枪共九支，到了长坳，王德修已经〔到〕南面，时百姓质问，我们立即转变面孔，说是别人报告前来剿匪，这时不敢入城，也不能掩饰下去，只好行动起来，又觉力量太弱，所以找了一个独立庄窑户，半公开的住下，适有耀县一个贩烟的徒劳〔步〕经过，就将其烟（约三百两）做办公费了，到了晚间就将武字后区〔火〕烧庙（村落）张某（是个区长，家道很富，高利贷特凶，行事霸道，无人不恨）抓住，但该绅未曾在家，就将该绅之父（村人都称之为财神爷）与其四弟拉走，当未入村之前，即派定一人在村街中呐喊，“我们不是土匪，是专打倒那些豪绅放光光债的，望无相惊扰，各安生业，我

们还要给你们穷人分配粮食的……”群众不但不管，出入照常，且说些“平时连桶也不给借，别管他。”有的说：“那天我借他的车子，你看他不给。走，耕咱的地去。”我们因力量过小，群众又不起来，故不敢再留时日，于是由（火）烧庙跑到沟里（村落），半公开的过了两天生活。后一天晚间，子文听到王怀（同志）在大寨铁庄召集了些群众，于是我们计划到该地将群众结合起来，去破坏灵乾（陵前）镇的区公所，但到大寨子，只能结合三十余人，连同志共计四十余人，当日值大寨马某到县里去了，就自然地走灵乾（陵前）镇，将区公所包围，将门踏开，进去捉住个恶差，将公所的文件信件一概焚毁，房子放火烧了，里边的东西，尽被群众分了，但群众（即大寨集合的）分了东西一哄而散了。据其原因是嫌款项太重，恶差役的勒吓激起的反抗，一旦打死了差人，倒毁了公所，就心满意足了。剩下的十余人恐慌恐惧，尤其是未曾参加过斗争的同志特别害怕，于是急促到了侯家（村子），将该村巨绅侯廷宾拿住，我们的饭尽由该劣绅发待，饭后遂召集群众讲说，痛述群众的痛苦和灾难的来源，并指定今后的办法，群众呢？不仅是赞成，且争先恐后地说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恶劣与统治阶级豪绅的残酷剥削，语言慷慨，愤恨异常，但叫他们马上拿起口袋分配豪绅食粮，而从者寥寥，都是相觑，而不敢举动，最后硬集合了八人拿起口袋直到岳海州（亦系劣绅）家乱分了一阵粮食，但附近贫民听说给人分粮，于是不上十分钟工夫，来人近一百人，最后直增至二百余人，因为无计划地分配，秩序较乱，分配后集合一地，给群众又讲了许多话，可是没有组织他们，群众都很欢迎我们，给我们报告消息，说我们是救命军。斗争发动已经几天了，始终连一个群众也没参加，武装也是依然如故，只做了些替群众斗争的工作。又听三原将派队伍剿匪，同志都恐慌异常，议论纷纷，随召集几个重要同志讨论，结果认定，这一次的路线很错误，只成了党员的光杆斗争，当时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我们应与土匪石老五联合驻扎一定地点，集合群众（当作机关）派同志各处活动。第二种，我们的力量过小，恐被土匪解决，可暗匿各地，出没无常，然后集中力量做群众工作，以准备斗争的配合，结果赞成第一种意见，遂决定移驻马牛镇，但须 A、将好枪收藏起来；B、同土匪驻扎分开；C、只与土匪联络，而不受其编制，决定后即将劣绅岳海州当晚枪决，分配同志到各

处活动，这可说第一时期已告一段落。这一时期所收的教训是：A、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斗争一定要失败，起码要走到不正确的途径上去；B、游击战争不是由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定要失败；C、我们的行动完全代替了群众斗争，结果使群众认识不清自己的力量；D、行动期间党未开过一次会，故行动散慢（漫），不能够讨论正确的游击策略，一致错误到底；E、没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故群众对我们很怀疑，不能积极拥护；F、经费的支配更是糟糕，平分不一，受危险的同志反不能多分。……下略。

以上是斗争失败后，陈同志向省委作的一部分报告，这只限于斗争的初期，以后的稿子找不到了。斗争开发的情形再为补述：

斗争发动五六日后，人数还是那几个光杆，枪枝也未增加，这时一方面又拜请王部（土匪，系同志）来参加斗争，当王即令其部下一个同志带了七八枝枪，加入游击队，同时又有一个土匪王某，因过去与黄同志是同学，用朋友关系，将其部下十余人，枪十余支，都交予黄同志，本人离开，一方面有县长路过武字区，将其扣留缴枪十余支，此时人数已过一百余，枪五六十支，名称定为灾民自救队，共编三大队，每大队下编三分队，队长即为陈同志，一时声势浩大，渭北各股土匪，尤其是马牛镇（在武字前区附近）土匪毕部集中力量要收游击队枪枝，这时党不能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坚决进攻，扩大附近各区与富平群众斗争，只是在武字前区一带，因逃避式的游击队战术，当时指挥斗争的陈同志说这是“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同时也就是当时三原地方党部〔对〕游击战争的解释，这样东奔西走的逃避了二十余日，并没有与任何敌人作战，指挥战争的同志与一般群众的勇气，都是非常低落，不敢正式作战，有一晚被红枪会四五人，即将队伍完全击散，损失枪七八支，人数仅结合到三十余人，这时游击队中的王部两股土匪，行动都不听指挥，每至一地即任意抢劫，队长无法制止，因为黄同志要讲面子，不能坚决将王部解决，反与〔予〕优待。被红枪会击溃后，各股土匪更是积极谋收枪，其他主要同志数人亦几遭危险，渭北游击战争即在这短促的二十余日内完全失败无余了。

斗争发动后，省委尚未接到三原特支及黄陈二同志任何一个字的报告，省委只听了交通员口头的报告后即给一书面指示，这时正是召集第五次扩大会议

的时候，省委亦无法派人去巡视，扩大会后的第二日，省委即派常委王林同志到三原巡视，并亲加指导，王同志追了三四日见陈同志后，没一点钟工夫即被土匪包围解决净尽了。

（四）失败后的严重教训与党内危机

看了游击战争的经过，检查出三原地方党部对省委指示的策略和路线，完全没有执行，这已经断定渭北游击战争的命运了。在这次失败的过程中已经证明了党的策略路线是绝对的正确了。目前陕西的斗争只要能正确地运用党的策略和路线，必然是可以迅速地开展，只有以组织地方暴动为中心，坚决地领导广大群众的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坚决反对富农，才能使陕西的武装斗争能够走到最高形式。这次失败后给我们严重的教训：（1）党内右倾阻止了正确策略执行，省委当时对渭北游击战争策略和路线的指示，并且详细地指出了过去华渭（渭华）暴动中的教训，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才有胜利的可能，但结果地方党部及负责同志，不能执行这路线，勾结土匪首领，秘密的狭隘的光杆党员与土匪共同行动，土匪跑后党是没有办法了，只得拼命干下去，这时还不能发动群众斗争，动员群众，还是光杆党员行动，结果受土匪改编，最后因力量薄弱还是要清土匪共同合作，始终〔终于〕被土匪把枪收了，这真是陕西可耻的一贯的右倾路线、机会主义的残余中断送了群众斗争的领导。这一路线阻止了党的一切策略的执行，竟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没有深入扩大，政治口号群众还没有听到，因此群众认识不过是另一种土匪形式罢了，政治上的右倾已经注定了失败命运。在西路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和这次渭北游击战争，都是拜请土匪作群众斗争的中心力量的路线之下，完全失败了。党的一致的右倾观念及思想的斗争，才能领导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围绕在党的政治口号周围。（2）富农路线的严重。省委对渭北指出，首先特别注意到富农路线的问题，坚决地发动雇农斗争，反高利贷的斗争，坚决与富农斗争才能深入土地革命。但陈黄二同志到三原后，召集支部会议讨论问题，当时正在收麦二时期，灾民自发斗争很多，贫民被高利贷的勒索更是非常紧迫，群众斗争情绪高涨，而黄同志与支部一致的决定在麦收时期，不能发动斗争，恐扰乱社会秩序，妨碍收割，无疑的这是农民所极欢迎的。斗争发（动）后又不能提出反抗高利贷的斗争，更没说到没

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口号在群众中就没有成为中心口号的宣传），就是只做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富农粮食是禁止没收与分配的。事实上在斗争的区域，富农的剥削最是严重，不分配富农粮食，无疑地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这真是十足的富农党的策略了（三原同志大部分是农民或富裕的农民）。不能执行反富农斗争的路线，是游击战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而指挥斗争同志还说省委这样的指示，富农问题和富农路线和富农基础，在陕西党已成严重问题。（3）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富农意识，党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是农民斗争中严重的问题，三原富平党的基础上贫农都很少，更说不到雇农了，因此在斗争中就忘掉了雇农斗争，吸收雇农入党以改造富农基础，加以无产阶级教育又很薄弱，所以在斗争中尽量表现了农民意识，烧杀主义，私有观念，经费纠纷，党员腐化，右倾的特严重。一般党员及负责同志都是私用经费，发生了许多经费问题，上面陈同志报告在最后的几句话就可以代表了当时一般同志的农民意识和私有观念的浓厚了。因为这样，所以当时就成了刮钱主义，买枪主义，对党的策略和路线任何同志都不提一字了，所以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与农民意识的弥漫是陕西群众斗争中同样成了严重问题。（4）党组织问题严重，渭北斗争中最严重的还有党的组织问题，由准备发动斗争的过程中，看不见党的组织，工作都是党员个人的活动，斗争发动后，农村支部即取消了，所有的同志都编入游击队中，农民群众的核心完全失掉了，游击队成立一军支，地方党部负责同志及省委所派的陈黄二同志都参加，黄同志作军支书记，斗争中的一切行动〈运〉与策略都没有经过军支讨论，更说不到党员群众的讨论了，结果是黄同志一人支配一切，形成梁山伯的英雄好汉式的集团。因此开始至失败，群众都说是黄同志的人马，没有黄同志，一切都无法指挥了。这样完全形成一群共产党员的集团了。因此自始至终没有党的策略的一点意味，没有支部工作，没有党的生活，没有党的讨论，完全取消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这是陕西历次斗争的充分表现，而此次渭北游击战争更是最近的结晶了，所以斗争中给我们的教训加强党的主观力量，党的组织建立支部工作是陕西党不容一刻忽视的。

以上是游击战争中给我们几个严重教训。党右倾富农路线，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的组织问题，不仅是目前党的错误与缺点了，而是陕西党目前革命形

势极剧烈转变中的严重危机，党必须用最大努力和这些敌人斗争，才能推动了陕西群众斗争的开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失败后的工作布置

失败后不久，省委即同由渭北来的陈同志讨论了这次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并决定新的工作布置，坚决指示三原富平地方党部继续执行省委前次决议，坚决发动领导群众斗争，〔因〕为目前客观形势不但是没减轻，而且更是严重了，秋荒已成，群众情绪沸腾，只有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围绕〔团结〕起来，但自失败后党内右倾更是严重，“没办法”的呼声充满了一般同志的口吻，因此拼命与右倾斗争，是执行一切任务的先决条件，陈同志根据这个指示，又巡视富平并建立三原的工作，但陈同志到渭北后，三原工作无法建立，同志都被土匪搞得无法立足，都投入有关系的民团中去了。富平在这次斗争还完全没有动起来，受了这次失败的反映，更是不动，助长了党内右倾发展。陈同志巡视富平的指示又是在富农路线之下，坚决决定目前斗争的中心口号是“反对土匪扫地平”（这是富农欢迎的），因此富平工作经过陈同志巡视后，不但不能紧张，而且更是阻止了工作的进展，目前省委乃极调黄同志来省委决定渭北工作的详细布置，但黄同志因斗争中有许多严重错误，失败后又表示消极，经数次催促，两月之冬还不来省委。但组织上已成问题。目前对渭北工作只有以富平作中心布置起来，不久省委将又派人去巡视，以改变党的工作路线与一切具体工作的详细决定。

*这是一九三〇年七月省委五次扩大会后省委关于陕西工作给中央报告的一部分。原标题为《陕西工作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

在中国新的革命高潮逼近的形势中，省委开过了第五次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中，估量了全国及陕西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决定了各种中心工作的建立和方法，成〔为〕陕西党领导陕西群众斗争武器。但接到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革命高潮与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案后，省委针对陕西的客观形势详细讨论，检查出扩大会对政治形势（估量）的不足，右倾错误，党的任务在这右倾的估量中，的确是要成了群众斗争的尾巴倾向。因此省委根据了中央政治决议与五次扩大会议的内容，针对着陕西成熟的客观条件，成立了这个政治任务决议，的确要成为全国〔省〕党的武器，以促进陕西革命高潮迅速到来，与全国革命高潮配合，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中央政治决议的确是全党唯一斗争武器

1. 中央政治决议案中明显地指出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了世界革命的高潮，指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指出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与革命政权的建立，成为党的直接行动，尤其指出中国革命的转变必须在党的正确策略与坚〔艰〕苦的斗争中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痛斥了阶段论的严重错误，更明确指出了改组派取消派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危害，尤其是取消派要自走上法西斯蒂的道路，针对着这一密切客观形势更明显指出党要积极在组织上在技术上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因军阀战争的前途，统治阶级必然是要削弱崩溃，因此反军阀战争为中心，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政治路线中，坚决地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猛烈扩大红军，是党策略总路线，最后更严重指出党内右倾的严重危险，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严重危机。目前一切事变的发展都在证实，或已证实这一决议对于政治局势估量的正确，这一决议的确是全党的斗争武器，只有坚决地拿着这个武器才能争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

胜利，才能在中国革命的高潮中，争取得全陕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贫民会议政权的胜利。

（二）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

2. 在已经成熟了的中国政治经济与革命危机都是在加速转变的过程，军阀战争高度的发展，造成的更大混乱与经济破碎中，陕西的政治经济与革命危机，在军阀战争加工制造空前未有的灾荒中，更是有高度破碎与成熟，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对这个严重危机不能丝毫的解决，在连棉〔绵〕不断的中国军阀战争中，没有一次陕西不是直接卷入这个旋涡中，加以六料未收的浩大灾荒，更促进了商业凋零，市面萧条，金融紊乱，百物昂贵，使劳苦群众的生活日益苦痛，工业衰败，一蹶不振，尤其是手工业的生产更是破坏不堪，使失业工人的数量日益增加。农村经济更是空前破产，赤地千里，土地荒芜，五百万灾民嗷嗷待哺，陷于饥饿冻馁与死亡的境地。在这样奇重的灾荒中，统治阶级的压榨剥削更是敲骨吸髓，强迫恶勒，无所不至其极，豪绅地主富农及商业资本阶级更乘机抬高粮价，加重高利贷，使中农破产，贫农无法维持，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豪绅地主富农商业资本的手中，成千累万的农民无地耕种，不断失业，农村经济这样激〔急〕剧的变化，使阶级的对抗非常尖锐，统治阶级无论如何不能挽救了强度破产的农村经济，同时加以国内外各种危〔机〕的加深，只有更赤贫化，成千累万的劳苦群众，已经到了不能生存的境地。而军阀战争，还是继续不已，而且日益剧烈混乱，更要加深了各种危机，不仅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显明剧烈（尤其是冯系军阀与陕北的井岳秀，及普遍各地骚乱为〔以〕土匪为中心的陕军各部队）使其统治力量只有削弱崩溃，而且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受了军阀战争中的蹂躏与剥削，加以浩大的数年灾荒，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无疑地更要高涨起来，更加速统治阶级死亡的命运，争取在全省革命的完全胜利。

3. 在这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之中，陕西群众斗争因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而走入不正确的道路，使日益剧烈的群众斗争不能有形成猛烈的开展，但群众斗争高潮的客观条件，不仅丝毫都没有减轻，而且日益严重了。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西安、榆林）已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镇压之下，继续不

断地爆发，而且是在剧烈的全国军阀战争中，直接发动了与厂方的剧烈斗争（如西安电报局工人，因为与局长索薪，痛打了会计主任）。西安榆林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群众大部分在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如西安印刷局、制革厂、军人实习工厂等），兵工厂工人完全是〔在〕军事化的管理与监督之下，在这军阀战争日益扩大的形势中，更是拚命地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日夜加工，政治上更剥夺了一切自由（言语出入都要受厂方监督，兵工厂工人更是每〔周〕星期〔天〕结队出厂，平时完全不能出厂），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到了高度的恶劣，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反对厂主，反对工头，反对统治阶级了。很显然的陕西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含有了严重的政治意义，阶级斗争仍是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农村革命的普泛高潮的条件更是早已成熟了，农村广大的贫农雇农与豪绅地主富农阶级对抗，在这浩大的灾荒中，因土地关系迅速地变更，更是显明与尖锐（如富平豪绅将破产的贫农都驱逐出豪绅的境地范围以外），数百万的破产贫农，都是流离死亡，造成了遍地骚动的土匪局面，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是变本加厉，不能有丝毫的减轻，使高度的农村经济破产更是继续猛烈的发展，广大的农民群众已经实际的感觉到任何统治〔阶级〕都不能解除了自己的痛苦（西路广大群众已经普遍呼〔喊〕出冯玉祥郑〔甄〕寿山〔珊〕都不是好东西），有些地方群众已经呼〔喊〕出共产党为什么还不来？西路广大群众说，共产党不如土匪，只说不做，三原游击战争仅游击二十余日即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这即是说明农村斗争的高涨形势。目前农民群众的斗争已经开始即〔急〕需武装，开始就是剧烈的摧毁豪绅统治，反抗统治阶级的武装斗争了。士兵暴动的客观形势同样尖锐，在这政治经济的生活陷于剧烈的恐慌状态中，而军阀战争还是继续扩大延长，士兵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空前残酷的境地，一方面生活的苦痛到极点（如冯部虽在前方作战，还是粗米淡饭，饷银更是完全不能发给，陕北井岳秀部队更三顿不饱，更谈不到饷项的发给，士兵的待遇更是极其野蛮），一方面还要到前线拼命。因此，士兵自发哗变在全陕范围内是成了普遍的事实，就是冯的中心部队中心部门（如手枪旅、特务团）过去都有继续不断的哗变。在中心城市内的兵变同样发生，并且直接屠杀了他们的官长。这些事实已经有二十余次了！（如三原城内兵变，将全连七个官长都杀死

了），至于零星与自发斗争，更是司空见惯了（如陕北兵士的自发地斗争，全营兵士都停止了上操，一连兵士死亡余三四十人），这一形势同样说明了兵（士）暴动已经成熟了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坚决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使群众斗争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红军的创造与发展，更是有猛烈的发展与扩大的可能。这一点的形势都是表明陕西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是完全成熟了，正是证明了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所指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的差别”，完全正确了。

4. 省委五次扩大会议，不能认识这一日益成熟的客观形势，因此对全国及陕西的革命形势都是估计不足，成了严重的右倾危险。第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只是走上平衡发展的道路，有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新的革命高潮还不是逼在眼前的问题，因此，党的任务与策略还不是“武装暴动，已经不是宣传口号，而变成行动口号了”，中央所指出“注意武装暴动，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扩大会议是没有提到一字。第二，陕西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是已经成熟了，但因为主观的力量薄弱，形成陕西是成了“例外的观念”，因此大会一致的认为，如果现在要积极布置全陕暴动，即是严重的盲动倾向，可（所）以和缓了陕西革命高潮的来临，因此党的策略上即（就）忽略了武装暴（动）组织上与技术上的准备了。第三，革命形势的估量必须根据客观形势与党的主观力量估计，因此党的策略的决定亦必须顾及党的主观力量。这是不了解党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作用，因此党的策略的决定即成了革命斗争的尾巴主义倾向了。扩大会议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在这几个主要的认识之下，的确是铸下了陕西党的严重的右倾危机，客观上是延迟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陕西新的革命高潮——暴动形势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新的革命高潮同样的逼近到了我们的面前，党必须要与政治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危险坚决斗争，以促进陕西的革命高潮。

（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争取陕西革命的胜利

5. 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是逼到我们的面前了，“革命可以在一省和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政治任务决议案）。最近中国革命更有显著的猛进，工人罢工浪潮的高涨，农村普泛的革命高潮，兵士暴动与自发的兵变，普遍了全

国范围。红军在集中进攻的策略之下，已经占据了长沙、南昌、岳州、大冶等中心城市，已有了更猛力地发展，最近中国群众斗争的发展，已经夺取了长沙政权，开始建立了湘鄂赣三省苏维埃政权，积极夺取武汉政权，爆发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几省革命高潮的首先胜利。“革命刊以在一省和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已经〔是〕摆在面前的事实问题了。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要促进中国革命的高潮——暴动形势，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转变。国际帝国主义已直接镇压中国革命了（长沙攻下后，英日美法意等用军舰与中国红军直接作战，并且各帝国主义海陆军舰来华，由上海至长江上游外舰五十二艘，武汉、九江等重要区域完全由帝国主义军舰警备），中国各省军阀先后通电，一致联合起来向武汉附近省区的革命势力进攻，这即证明了“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必然马上会遇到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一切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政治决议案）。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的大事变将要到来。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胜利的开始，因此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尤其是武汉附近）必然是成为促进陕西革命高潮主要动力之一。陕西群众斗争在这形势中必然更要增加了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在全国革命的高潮中争取陕西革命的胜利。

6. 陕西因经济政治的特殊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是不能有首先爆发一个革命高潮的可能，但经济政治的危机，群众斗争的尖锐，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全国是同样的剧烈与加深，没有丝毫的“例外”，陕西的革命高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的高潮中，是同样的日益逼近了，在全国革命的胜利中是同样的可以争取革命胜利。因此党目前必须在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政治路线之下，坚决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积极建立与猛烈地发展红军，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武装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争取陕西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猛力地进展，武汉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已经实现，中心城市的任何一个工人斗争都有爆发中国革命高潮的可能，中国革命已将进到更剧烈斗争，已将进到全世界阶级的最后决战，形势是非常严重了，只有“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政治决议案），才能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所以准备争取陕西的武

装暴动的革命胜利，成了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重要动工〔力〕之一。

7. 陕西是内地产业最落后的区域，没有支配全省经济的一个中心城市，因此在历年的政治变化与继续不断的军阀战争中，常是四分五裂，而造成各地军阀的割据局面，任何一派都不能形成比较统一的局势，甚至一区域与一个城市都在两个军阀的割据中（如三原北城南城、渭南的故〔回〕市），目前陕西的统治仍然是在各个军阀（井岳秀、冯玉祥、甄寿山〔珊〕等）的割据形势，在这政治经济陷于严重恐慌的状态的现在，统治阶级的削弱崩溃，都是毫无二致，但动摇崩溃的程度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革命是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地方首先胜利（以榆林为中心二十三县条件更是成熟），争取全省武装暴动的胜利，同时陕西必须配合全国的高潮，才能争得完全胜利。因此党必须在武汉各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形势之下，积极布置武汉附近区域内的革命斗争，以与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形成适当的配合，以促进陕西的革命高潮，所以准备几个中心区域的首先胜利，建全全省政权同样成为党目前战略总方针。

8. 争取陕西武装暴动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政治罢工，在各种斗争爆发起以“农村包围城市”，单靠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政治决议）。陕西是产业落后的区域，产业工人数量的确是比不上全国产业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因此陕西党在历史上即忽视陕西的职工运动，不能在中心城市与重要产业工人中（如西安、榆林的市政工人，兵工厂工人，交通工人中）树立强固的基础，党内一致的呼〔喊〕出“陕西没有工人”、“农民是陕西最主要的动力”、“乡村比城市重要”，因此即“想以乡村包围城市”。这些观念是武装暴动夺取全省政权的莫大危害，必然地要阻碍群众斗争的进展。“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政决）绝不能争取得陕西革命的胜利，就是几个中心区域（如陕北、渭华）首先胜利后，也不能促进陕西革命高潮得更快到来，争得全省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准备全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时候，加倍努力城市工作，特别注意工人运动的工作，加强赤色工会的组织，坚决的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树立党在工人阶级中强固基础，是党目前严重的任务，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9. 在产业落后的陕西，经济基础还是建筑在农业生产上，农民在革命中的

作用在陕西“更有严重的意义”，没有农民暴动，士兵暴动，红军有力进攻，“单只靠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政决），绝对不能争得革命胜利。陕西农民暴动、士兵暴动、红军建立的客观条件早已成熟了，但党内严重的右倾，断送各种革命努力的领导，延缓了陕西的革命高潮，因此党目前必须特别加强工人斗争的领导，同时坚决领导农民暴动，使农民暴动有剧烈的发展，领导士兵暴动，使士兵暴动有普遍的爆发，在农民及兵士的暴动中，建立红军，使红军能够有猛烈的扩大，必须配合这四种革命势力的发展才能争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四）陕西革命高潮逼近严重问题

10. 陕西群众高潮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群众斗争是已日益剧烈与尖锐化（工人斗争、农民暴动、兵士哗变，都是自发状态中），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领导，确是非常单薄，无论工人农人兵士许多自发的斗争与暴动，党不但不能坚决地去领导，而且群众斗争剧烈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不知道（如周至农民的原始暴动攻下县城，直发展至户县，县城亦被陷落。绥德一万余农民群众，闯入县城，包围豪绅，驱逐县长，这些伟大的斗争，已将酝酿发动，当地党部还不知道），这真是连群众的尾巴都谈不上，因此西路群众说：“共产党不如土匪”，这即是说不能领导群众“要饭吃”的斗争，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低落，党的政治口号，广大劳苦群众还没有开始听到，在政治上给工农劳苦群众指示出正确的出路，因此群众斗争都走入不正确的道路，渐次失败，不能得到猛烈的发展。陕西虽在空前未有的灾荒中，五百万灾民流离失所，客观上的确是促进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农民暴动必然要得到猛力（烈）的发展，以走上口苏维埃政权的道路，然而群众斗争还始终没有掀动陕西革命形势的高涨，与全国革命形成平衡的发展，这都是无产阶级政党断送了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造成革命斗争中莫大罪恶，所以目前必须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以深入党的政治口号到广大劳苦群众中去，是党在准备全省武装暴动的唯一先决问题。

11. 因为党在政治领导上的薄弱，因此，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成千累万的灾民，都被土匪领导走入失败的道路。成千累万的破产农民都被军阀征募，成为军阀牺牲的工具。继续不断的兵变，都投入土匪中去，一切群众（斗争）都

走上失败的道路，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被土匪领袖领导了去，这即是陕西政治经济的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出的土匪割据与遍地骚乱的形势。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再不能坚决地领导群众斗争与暴动，尤其是广大的灾民，以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围绕在党的口号周围，则广大群众的斗争，仍然要走上失败的道路，使陕西革命要受到严重的失败甚至流产。

12. 党内右倾观念的弥漫，取消思想的深入潜伏是目前陕西革命斗争与党的政治生命的唯一严重危机，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策略上成了群众斗争尾巴主义，不能坚决地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与暴动，怀疑党的正确策略，而动摇犹豫（如五一工作的布置，退出国民党等），党内富农化路线的一贯严重，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全陕工人党员找不到十人，各级指导机关大都操纵在豪绅地主富农（子弟）手中，尤其是陕北），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弥漫（勾结土匪上层领袖），对国民党的留恋，政治清淡更是弥漫在党内，党的工作路线与工作方式还是沉溺在机会主义时代的泥坑中，同时取消了党的组织，取消了党的进步，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等，这些都是严重的右倾，与取消思想的具体写真，阻止了群众斗争进展，断送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成了危殆革命斗争的唯一的死敌，所以党的右倾观念与取消思想的潜伏，是革命高潮前面严重问题，因此，克服右倾危机，加强党的主观力量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最严重的任务。

（五）改组派，取消派

13. 陕西在政治经济恐慌破碎加深过程中，群众斗争只有尖锐起来，这样改良主义在广大群众面前事实上必要（然）很快的暴露他的一切欺骗面孔，而日益破产（如各地赈灾会收容所平糶放账（赈）以工代赈等都更塞满了官僚腰包，广大群众不能得到丝毫救济，群众已有进一步的认识（者），认为是欺骗），他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起很大的作用，但因党的政治领导力量的薄弱，在广大群众中政治影响的缩小，给了改良主义的活动机会，使改组派在产业落后的群众认识中还有相当的幻想的可能，目前反对改组派揭破改组派的欺骗与反革命性；是促进陕西革命高潮前面主要前提之一。

14. 取消派已成了阶级的敌人，将来到革命高潮的时候，必然地要变成完全法西斯蒂，陕西虽没有取消派有组织的活动，但绝不是党内过去说“陕西没有

取消派”因此即忽略了对取消派的斗争，这是革命形势日益严重中的莫大损失，陕西目前虽没有取消派的活动，然而党内右倾观念的严重，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一致的向党进攻，党政治理论水平低落，不自觉地取消派已经开始与党斗争了，这样取消派的活动必然地要很迅速的反映到陕西来，政治意识低微的陕西党内，取消派更有他活动的客观条件，所以党必须加紧对党内思想上的斗争，同时特别加紧在群众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作用，消灭他们在群众斗争中的影响。

15. 中国革命形势的准备几省革命首先胜利，改组派汪精卫已成帝国主义最宠幸的工具了，最近长沙攻下后，改组派已如疯如狂的勾结各省区军阀、各个帝国主义向长沙的苏维埃政府进攻（北方各军阀的通电，汪最近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事实的证明，改组派已成了屠杀工农进攻革命势力的唯一残酷敌人，取消派陈独秀等已□□□统治阶级的稳定，诅咒中国革命的发展，无论在政纲上行动上都已经与改组派没有丝毫的差别，所以在促进陕西的革命高潮准备全省革命胜利的主要任务之下，必须即刻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坚决地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是促进陕西革命高潮的重要前提之

（六）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

16. 中国革命形势已极（急）剧的转变，陕西革命高潮已经迫到目前，但陕西党的政治领导力量，还是极其薄弱的，现在无疑地在党的整个任务和策略之下，陕西党更加重了夺取广大群众组织群众斗争，加强党的主观力量，促进革命高潮的迅速来临，特别要注意到积极布置全陕总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政决），注意促进全陕革命的高潮与全国革命高潮的配合，“注意武装暴动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在“布置以武汉为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汉南工作，同时要加紧布置陕北的革命斗争首先争取得革命胜利，以配合全陕的革命形势，是目前党策略总路线。陕西党在这个任务和策略路线之下，必须特别注意在整个革命形势的立场，坚决地〔执〕行党的策略，绝对要坚决打破扩大会议中“例外观念”，绝对坚决地与党内严重右倾危机拼命斗争，才能保证党这一正确路线正确执行。

17. “在反军阀战〔争〕的口号之下，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单只提出一

些部分的经济的要求，反使群众感觉党无出路，不能积极起来斗争”（政决案）。陕西在连年无收的灾荒中，军阀战争又是继续扩大，更推进陕西广大群众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统治阶级的崩溃削弱更是加速，一切危机都不能有丝毫的补救，国民党军阀与任何一个统治势力，都在群众面前完全绝望了，广大的群众已经唯一的是要求政治上正确出路，唯一是要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军阀豪绅的统治（如蓝田群众自动地解除武装驻军一营，并积极准备解决豪绅团），这即充分的表现了群众反军阀战争的高涨与坚决。因此为要〔争〕取广大群众，广大的组织群〔众〕斗争，只有在反军阀战争中心口号之下，指出转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胜利的前途，才能使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更能高涨，更能扩大与剧烈，汇合成总的斗争形势，过去党根本忽略了反军阀战争的任务，不能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的政治口号号召成千累万的群众勇敢地起来作坚决的革命斗争，因此群众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始终不能在党的领导之下，积极地斗争起来，这真是党在政治上的莫大损失。“现在党必须坚决提出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别是〔反〕军阀战争的口号，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政决），积极建立红军，在进攻策略之下，“以实践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路线”（政决）。陕西党执行这一路线，必然要顾及到整个中国的立场，目前中国革命猛烈的发展，帝国主义已直接镇压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工农群众、红军作残酷的战争，帝国主义已经在镇压中国革命，积极进攻苏联，进攻苏联的危机更是日益迫切了（日帝国主义已公开宣布，红军占领长沙是苏联的帮助，中俄会议直到现在还是遥遥无期），因此“武装保护苏联要成为革命的中心口号之一”（政决），这一口号，党要用尽一切力量深入广大劳苦群众中去，过去这一口号陕西党在群众斗争中是极忽略的，这是完全忘记了陕西在整个、中国革命立场上的位置，这真是莫大的错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更是尖锐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已经笼罩了全球，日益紧张，一融〔触〕即发，因此在各种斗争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作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鼓动，加紧发动极广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与援助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同样是非常迫切的任务”（政决）。“在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中必须加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议为苏维埃而斗争的运动”

（政决），陕西广大劳苦群众正陷入饥饿死亡无路可走的地位，反军阀战争的自发斗争已经成了普遍的事实与要求，因此党更要加紧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使广大群众认识，只有消灭军阀统治，建立陕西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才能根本救了灾荒与痛苦，使广大劳苦群众都有为苏维埃而战争的决心，使这个运动必须深入到工厂、学校、兵营、农村及城市中贫民中去，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之下，更能调动成千百万群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的形势。

18. “这一路线最中心的问题是组织罢工”（政决）。陕西工人斗争形势已经非常尖锐化了，只有在反厂主、反工头的口号之下，才能动员群众，如果只是很小的单纯经济利益的要求，工人群众斗争已经不能广泛地发动了。就是斗争能够发动起来，不提出政治斗争的口号作坚决的政治斗争，是绝对难取得经济的胜利，因为工人群众虽一钱的要求，都要受到严重的政治压迫，因此只有坚决的政治口号才能广泛地扩大汇合斗争，才能打破工人群众恐惶心理与合法观念，更能提高工人群众的斗争勇气与决心。过去工人斗争口号束缚在经济口号的狭隘范围内（如西安印刷工人斗争），阻止工人斗争不能得到剧烈的开展，这是〔使〕党严重的右倾错〔误〕。因此党必须要注意到每个经济利益的斗争中与罢工中都要加强党的政治宣传，每个经济斗争都要转变到政治斗争上去，尤其是要坚决地提出反军阀战争为中心的政治口号（如反对连环保，反对检信件，要求组织工会、罢工自由，反对军事化管理，反对管押拘捕等），“组织广泛政治罢工”（政决）。

19. 在工人斗争中，最严重的倾向问题是没有工人群众的坚固组织，使工人斗争力量非常薄弱，不能发展起来形成革命的中心领导力量。党过去在每个工人斗争的领导与自发的斗争中，都忽略了建立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以加强工人斗争力量，是莫大错误，就是已经开始的工人群众组织还是在极其狭隘秘密范围内，不能抓着政治口号为中心以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目前党必须用最大的势〔努〕力在每个工人群众斗争中与生活中，尽量扩大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宣传鼓动，建立并加强赤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组织，根据过去经验与目前工人斗争形势，“一定要注意到只有坚决的政治斗争的口号之下，这一

势〔努〕力才能收到更大的成功”（政决）。

20. 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赤色先锋队与纠察队），在陕西工人群众斗争中，更是有迫切的需要。在落后的内地产业区域，工人群众更是过去只有非人的生活，痛苦到极点，尤其是政治上的压迫，使工人斗争情绪非常高涨，而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镇压亦特别严重，因此工人斗争稍有开展，必然是剧烈的武装冲突，没有强有力的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绝不能争得斗争的彻底胜利。同时工人群众武装组织必然是武装暴动的中心队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工人群众武装，绝不能争取全陕暴动的革命胜利。所以“建立并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加紧军事训练”（政决），成为陕西党目前迫切的任务了。但工人群众武装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必须要以政治口号为中心，以号召广大群众，在每个工人斗争中都要尽量加紧扩大武装组织的宣传鼓动，使广大的工人群众都深刻地认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武装纠察队与赤色工会先锋队建立的意义与必要，最主要的是要以武装暴动的口号鼓动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武装的组织，使工人群众的斗争决心〔及〕能加强，纠察队与赤色先锋队才能广泛地从工人群众中迅速的发展与扩大起来，使真（正）成为武装暴动的中心队伍。

21. 陕西地方暴动的客观条件普遍成熟，坚决组织地方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执行总路线的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党要在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任务之下，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尤其是灾民斗争，提出“自动没收和分配豪绅地主食粮”、“向政府要饭吃”、“没收赈款”的口号，公开的尽量鼓动广大的灾民群众起来直接与统治阶级作剧烈的武装斗争。农民群众与灾民的武装斗争，配合成为广大群众的游击战争，同时加紧城市工作的布置，加强城市斗争的领导，使其与农民游击战争汇合起来，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以配合成为地方暴动。目前党应毫不迟疑地以地方暴动的口号，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实现这一任务！但必须打破过去割据乡村山头，不向城市进攻，只是围攻县城，而不能夺取并建立城市政权，只是逃避式的游击，而不能进攻敌人要害的错误观念，才能充分地实现这一任务。目前革命形势猛烈的转变，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更是日益成熟，因此现在组织地方暴动，必须与整个革命配合衔接着中心城市武装暴动，所以特别加紧组织中心城市附近（如西安、榆林附近等）

与沿交通路主要城市（如渭南、华县、渣关）的地方暴动。

22. 陕西全省士兵哗变与斗争已成普遍事实，军阀战争更加延长扩大，哗变与逃跑必然是要成为兵士群众的一般心理，因此，组织反军阀战争士兵暴动是党在士兵运动的中心任务。党要在这一任务之下，必须动员全体党员团员与工农群众深入士兵群众中去，提出士兵斗争纲领，尽量地宣传鼓动，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党要有组织有计划地与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形成实行消灭军阀的暴动。士兵暴动后，必须“坚决采取进攻的战略——瓦解军阀军队”（政决）。现在陕西政治经济的特殊条件之下，士兵暴动必然与农民暴动是很容易汇合起来，因此，士兵暴动必然要坚决地集中力量争取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起来完成全省暴动的胜利。

23. 在农业生产占重要位置的陕西，在土地革命中建立红军更是有特别严重的意义，争取全陕暴动的胜利，红军有力的进攻更是形成不可缺乏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党必须要用最大的努力，在地方暴动、在士兵暴动中，马上建立强大的红军，集中力量积极进攻中心城市，进攻敌人要害，以汇合广大群众斗争。红军的战略必然在党的整个的政治路线之下，猛烈扩大与发展，打破过去“割据山头”“游击战术”的军事观点，红军的进攻必须与广大群众斗争配合起来，绝不能形成红军单独军事行动，失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必须有很深刻的认识。

24. 陕西灾荒奇重，物价昂贵（面七斤一元，且日益涨价），加以工业落后，农村灾民大批的到城市来找饭吃（如西安仅农村中破产农民男女老幼充满了大街小巷），因此陕西各大小城市都充满了广大贫民（这些贫民包括不剥削别人劳动力的工匠、小贩、失业的知识分子，寻找工作破产的农民，广大的灾民等等），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这些贫民的数量必然更是日益增加，他将要形成骚动城市打击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所以党必须迅速建立城市贫民运动，坚决领导城市贫民要饭吃、争自由的斗争，以动员广大贫民群众与城市工人斗争汇合而成城市斗争的高潮。党要提出“要饭吃”、“要工做”、“要自由”、“反抗苛捐杂税”、“反对警察打人管押”等中心斗争口号，深入贫民群众中去尽量宣传鼓动，以联系到“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

争与宣传，在贫民群众斗争中必须建立贫民协会为中心的群众组织和训练，成为贫民斗争以至骚动力量，城市贫民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党必须使贫民与工人的政治罢工及斗争有适当的配合与联系，以准备在城市的武装暴动中建立贫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25. 要执行党的总路线，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亦成为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陕西群众自发地斗争与暴动已经普遍各地，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早已成熟了，但党的政治影响不能深入群众中去，使党的政治领导力量非常薄弱，致群众斗争都还零乱的无组织的原始状态中，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摧毁军阀统治。所以目前党必须运用各种方式与机会，尽量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鼓动，使党的政治口号能够深入广大群众中去，能够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动员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才能争取陕西的革命胜利。

党必须坚决地与不敢公开党的政治主张恐引起白色恐怖的可耻的右倾观念斗争（如今年五一，党不发表宣言，因恐引起敌人的注意，同时一年来党对宣传〔群〕众几等于零），因为这是消灭党的政治生命的唯一正确办法，要知道党的政治影响能够有一刻钟的扩大，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就有一刻的增加，尤其是武装暴动来时，广大的群众就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作坚决拼死斗争。

26. 青年与妇女在落后的陕西生产地位〔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作用。青年与妇女在目前政治经济高度恐慌中痛苦更是加重，因此他们的斗争勇气与决心也特别坚强，党必须打破过去轻视妇女的观念，以为陕西没有女工，所以妇女运动是在陕西不重要，这完全是没有了解妇女在生产上的地位，现在即应唤起全党的注意，坚决的开始领导妇女特殊利益斗争，领导妇女参加农民暴动、城市斗争，吸收大批的妇女参加农协、农委，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加强妇女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同时要吸收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帮助青年团在群众中建立广大的基础，积极多方面帮助团的转变，改正第二党化的工作路线与方式，反对团的夸大与清谈倾向。

（七）党的组织问题

27. 组织问题是目前陕西党最严重的问题，党的组织还是在极端散漫的状态

中，因此每个群众斗争，党都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每个群众斗争都表露出组织的严重弱点，事实已经成了陕西革命斗争中严重问题了，谁如果因党的组织上的弱点而根本动摇了党的策略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但如果忽略了在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同样是严重错误，使党的策略路线不〔能〕正确的运用，以延缓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所以强固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要从散漫中救出来，成了“执行目前总路〔线〕的〔总〕任务”（政决）。

28. 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一）不只是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全党的工人成分，不能比例，几等于零），而且这些基础还是停留在旧的基础上，因此党内弥漫了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使党的策略路线常是沉溺在右倾危机中，不能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二）支部生活不健全，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是目前党在组织上的根本问题，因为支部工作的不能建立，使党的正确策略不能传达到群众中去。（三）新的干部分子的缺乏，最危险的是全党停留在旧的干部上，这些干部都是民族运动高潮中生长出来，很少经过斗争的锻炼，而且还大部分是豪绅地主富农子弟，充满了支部及各级指导机关中，尤其是地方党部中，使地方党部不能健全，不能形成地方中心的指导机关。（四）党内政治理论水平的低落，无产阶级教育薄弱，党的策略路线一般党员群众自来是不过问的。（五）省委组织的不健全，政治指导力的特别薄弱。（六）党的工作是沉溺在旧的机会主义时代方式中，不适合于群众斗争的新形势，这些组织上的严重现象，无疑使党的正确策略不能传达到群众中去，群众的落后意识，不时地反映到党内来，使对党的策略不能正确坚决地执行，阻止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开展。这些现象，最主要的原因，的确是中央所指出“支部执行反右倾斗争异常不够”，“许多动摇的右倾分子尚占着支部中的领导地位”。反右倾斗争，过去在省委指导机关中（地方党部还没看到），是用了极大的力量克服（如扩大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反右倾与机会主义），但支部中还很少讨论到这个问题，结果右倾在党的组织上潜伏了深厚的基础，而省委的政治指导还是〔在〕右倾的危机中徘徊（如五次扩大会议），因此，在支部中坚决地执行反右倾斗争是执行党组织任务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反右倾的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基础，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支部生活，加紧支部

教育，培养支部中新的工人化的干部分子，建立地方党部，加强省委的政治领导，改变全党的工作方式，才能将党的组织从散漫的状态中挽救出来，才能使党的策略路线能够实际的正确地执行，这些组织上严重问题，省委特别要唤起各级党部予以严重的注意、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到陕，在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任务决议案之后又进一步制定了这个决议案。

北方局对于陕西当前几个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七日)

陕西省委：

根据三中全会的指示与伯英^①同志关于陕西工作的报告，经过北方局的讨论，对于陕西当前几个中心的问题，北方局有下列的指示。至于陕西全部工作，更具体的指示待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到北方局之后，根据你们的详细报告再行讨论。

1. 陕西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陕西是小军阀割据混乱的局面，在全国军阀混战中，陕西连年不断地遭受军阀混战的灾祸，外国商品的侵入，接踵而至的灾荒，造成陕西工商业的衰败，农村经济空前的破产，广大的有增无己的失业的灾民，陷入极惨痛的地位。在这一危机的推动下，更造成代表各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互相倾轧、排挤、以至火并，在帝国主义的实际控制下，为帝国主义抢夺势力范围，夺取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权”，继续扩大延长的军阀战争，造成了目前陕西政治经济的总危机。尤其是冯阎败退，一部分军队退集陕西，更要从工农劳苦群众的身上加紧残酷的剥削，以补偿军阀在战争中所受的损失，陕西的经济必然要更加破产，政治上必然更加黑暗。

在这一基础上，广大的劳苦群众，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陕西农民自发的骚动，士兵不断的哗变，灾民吃大户分粮的斗争，工人的〔反〕抗运动，都是在尖锐的斗争形势下，日益剧烈与发展，群众直接的行动，一天天加多，虽然这些斗争还没有汇合起来，还没有充分伟大的力量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但部分的说来，有些地方统治阶级已经无力统治，群众可以不交捐税、不纳粮，革命运动的高涨，是毫无疑义的事实。但是在陕西一般的群众斗争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党还不便深入群众树立自己的领导，工人斗争，还未脱离散

漫的形式，农村斗争，多半落在富农甚至豪绅地主的领导下，多半停留在反捐税的基础上，未深入土地革命，士兵的哗变，多半是无领导的逃散、上山，这是极严重的问题。

陕西党当前主要的任务，便是发动工人政治经济的斗争，领导农民反捐税、抗租、抗债的斗争，开辟群众的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组织革命兵变，组织农民要饭吃的斗争，进到土地革命，将这些群众斗争联系到全国苏维埃准备运动，领导群众为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及第三党的斗争，将争取群众与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密切地联系起来。

2. 陕西党前而（当前）的几个中心问题

第一，陕西党在职工运动中，必须抓紧目前工人与资〔本〕家、店员与雇主、学徒工匠与老板间的一切斗争，发动这些斗争，使工人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联系起来，绝不能将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对立或割裂开来。在目前工人群众最迫切要求的斗争基础上，组织工人的政治罢工，扩大这些斗争——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发动工人部分的斗争，以至各业同盟罢工。为着这一任务必须深入到各工厂作坊的群众中去活动建立赤色工会，发展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建立工人纠察队、童子团，特别要争取黄色工会欺骗下的工人群众，消灭黄色工会。这些工作都必须运用群众的路线，争取公开活动，冲破黄色工会的倾向和狭隘的秘密的路线，切实纠正上层的机关活动，才能获得伟大的成绩。陕西的职工运动，应当以西安、蒲城为中心，在西安特别要打入修械、汽车、电灯、电报、邮政、印刷、洋车夫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与工会的基础，发动工人群众当前的一切斗争，以组织政治罢工为中心策略，去切实准备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

第二，在农民运动中，当前陕西党的中心策略应当是发动农民反捐税抗租抗债的斗争，开辟群众的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在这一基础上，组织地方暴动，创造苏维埃区域。在农民运动中，需要陕西党切实努力于农民委员会（不

必拘泥于名称)雇工工会(或称长工工会亦可),发动农民群众大小斗争,组织赤卫队与游击队,肃清富农路线,将富农的欺骗之下的群众夺取到党的领导下来,坚决排斥富农分子到农民战线之外,切实从政治上组织上去争取农民群众,因此抗租抗债,深入土地革命是极重的任务。必须坚决反对:(一)富农路线(不深入土地革命);(二)忽视群众工作与群众组织;(三)少数人的军事行动,脱离群众;(四)避免武装斗争;(五)勾结土匪领袖;(六)忽视党的组织领导,单纯的英雄好汉式的个人活动,并且要防止大部分以至所有的同志都投入游击队,取消了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这些现象,过去在南方农村斗争的初期,曾经过不断的艰苦奋斗,在陕西必须一开始便严格的注意,以免在陕西重演。为着执行这一任务,应当将农民斗争与灾民斗争联系在一起,绝对不能分割开来。并且需要陕西党立刻计划着冲破旧有的省界与县界,以政治经济中心和群众工作的基〔础〕作标准,划定游击区域,首先就需要从关中道开始,特别加强党的领导,切实布置这一工作。

第三,在士兵运动上,当前陕西党的中心策略,应当是组织革命兵变,开辟游击战争。为着这一任务,陕西党必须切实加紧陈毓耀、刘郁芬、马鸿宾、张维玺、甄寿山〔珊〕、唐昆几个军阀部队中的工作,特别需要派大批同志,经过党的训练,有组织的派去当兵,加紧在士兵群众中的活动,肃清军官路线。在组织革命兵变当中,特别要首先建立起健强的营内领导,在各连排平衡的发展,尤其要建立中心部队与中心连的工作(如刘郁芬的手枪团应当成为中心基础),动员党、团同志与革命群众加紧对士兵群众的宣传鼓动,发动士兵群众要欠饷,要冬衣,要休息,军需公开,官长由士兵选举,官长与士兵平等待遇,反对肉刑等等斗争,建立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名称不必拘泥)。目前冯部一部分退陕,士兵运动必须更加百倍的努力。

第四,军事工作。陕西党应当努力于党员军事化与赤色先锋队的工作,必须有计划地切实开始建立。

第五,城市贫民运动,应当在西安、蒲城、渭南等城市加紧切实的建立,

发动贫民分粮要饭吃的斗争，组织贫民协会。

第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陕西党应该立刻开始在工厂、作坊、农村、兵营、学校中去动员群众，以群众当前的斗争为基础，联系到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准备运动，以这一运动去使群众了解夺取政权的必要，提高群众斗争，领导极广大的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一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以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贫民协会、革命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为下层组织。

3. 陕西党的组织问题

第一，陕西党必须切实执行向工人开门的〔口〕号，吸收群众中勇敢积极分子入党，扩大陕西党的基础。需要公开的宣传，什么是共产党，需要在群众斗争中公开征求党员，特别需要推动支部经常讨论与执行发展新党员，同时加强党内的教育，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线，在这一基础上去肃清党内暗藏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富农（代表富农路线的在内）与跨党的分子，坚决改造党的组织，这一工作必须在耐心艰苦的党内斗争中去执行，绝不能机械地开除了事。

第二，支部生活的建立。必须在加强地方党部对支部的帮助，到领导支部自动工作，加强对支部的教育，特别要从实际工作中，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到支部中去（反右倾与反左倾），培养支部中心干部，建立模范支部，这是目前陕西党在组织上最基本的任务。

第三，省委现在的组织过于庞大，这种组织形式，必然形成机关主义，整天忙于事务与技术。省委必须在立刻产紧组织与少而精的原则下缩小机关，扩大工作，省委工作的同志，必须分配大部分到游击区域去加强领导，省委所在地，经常有三人负责（包括市委书记）即够。

第四，省军委必须立刻建立起来，有计划地开始工作。

第五，反取消派的斗争，在陕西党内党外必须同时加紧。特别要揭破取消主义的欺骗，在群众中加紧这一宣传，同时在党内加紧反取消主义的教育，尤其要限制留在国民党内的分子，立刻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从积极斗争中退出

国民党，否则执行组织的裁制。

第六，加紧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党内自我批评无情的反对脱离群众、对群众关门、不领导群众当前迫切的斗争的“右〔左〕倾”危险，尤其要肃清党内右倾富农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组织上保守观念，军官运动等。

第七，北方局决定：现在陕北直属北方局，省委只管关中道与汉中道，并陕西杜、王两同志与伯英同志^②于十一月十日前来北方局。

注：①即陈云樵。

②即杜衡，王林，陈云樵（后由杨珊去）。

*一九三〇年九月下旬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六月十一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结束了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这个指示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对陕西工作作了初步调整。一九三〇年十月后，陕西省委即属北方局领导，陕北亦直属该局领导，但除陕北外，北方局对陕西省委的领导关系实际没有建立起来，一九三一年五月后省委仍属中央直接领导。

中央致北方局转陕西省委的信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陕西省委诸同志：

三中全会主要的决议案及国际之中国问题议决案等已经送上，接到否？

你们九月十四日寄来的省委政治决议草案已经收到，中央对于你们的决议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一) 中央为要巩固党的斗争和领导力量，特别注意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严格地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是要站在党的路线上来实行的。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前曾经对于某些问题上犯有错误，一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在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已详细指出，并纠正过来，此地可不必再说。但是你们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来〔未〕纠正陕西省委政治认识上的错误，根据着三中全会以前中央解说上的个别错误而发生的错误，例如在你们的决议中说：“中心城市的任何一个工人斗争都有爆发中国革命高潮的可能”，其他如对不平衡问题、对于直接革命的形势问题的不正确估量等等，当然在你们的决议中所犯的错误比中央以前的错误更严重更多些。这种错误□□陕西党部必须坚决的迅速地纠正，并且要以自我批评来检查实际工作，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并且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二) 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反对“左”倾及右倾的斗争）之中，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陕西党内严重危险就是对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如周至农民的暴动攻下县城、绥德万余农民闯入县城包围豪绅驱逐县长，而党不但不能领导而且不知道，对于土匪，对于富农，对于国民党还保留着幻想与留恋，不去坚决夺取群众自我斗争的领导，在省五次扩大会的决议上对于准备武装暴动一字不提，认为党主观力量薄弱，陕西成了“例外”的糊涂观念，党的指导机关

有许多操纵在富农分子的手中。党内的悲观消极，在每次群众的自发斗争中，都表现出来，以致革命的农民群众兵士群众因无党的正确领导被土匪领袖军阀等所利用。这一右倾取消主义已成了有系统的路线，党不可容缓地要与之坚决的斗争。省委虽然是注意到这一斗争，但还没有在布置实际工作中强有力的纠正过来，同时省委已经给〔在〕政治决议案草案之中，又走到另一极端，有许多犯了不正确的解说。

第一，譬如你们说：“陕西全陕暴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武汉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已经实现，中心城市的任何一个工人斗争，都有爆发中国革命高潮（□□客观革命形势）的可能”，……。

第二，认为陕西客观条件的成熟与全国范围是同样的剧烈与加深没有丝毫的例外，因此说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这样的解释是不妥的。你们已经将不妥的解释应用到实际工作上去了，就是省委说到党的任务方面，就忽略了争取群众的任务，没有抓住目前群众自发斗争的领导，在这方面仅仅说到布置全陕暴动夺取政权，而没有说到要抓住目前群众自发斗争的领导，这种脱离群众替群众去做暴动的计划，对党对无产阶级只有危害而没有利益的。陕西现在无疑的主要的方针是要领导群众现在的斗争到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方面去。

（三）陕西的政治经济的危机当然是全国政治经济总危机的一部分，陕西省决不是例外的，但是同志们亦必定要了解革命的不平衡问题。第一，陕西因经济条件的关系无产阶级的基础薄弱。第二，陕西共产党的历史较浅。第三，群众缺少革命的经验。因此党必须根据这三种原因去灵活地运用党的策略，不能够机械地解说陕西与全国现象没有丝毫的不同或者是说陕西是例外的。目前陕西党要赶紧努力去用党的政治口号，用独立领导工农群众斗争的策略去争取群众，去加强扩大并巩固党在革命之中在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四）我们要注意到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可以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相互斗争，还没有使他们完全削弱走到政治上的完全破产。但是中国革命的新高涨是从部分的进攻反动统治进到总的革命

进攻的过渡时机了。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成了中国革命新高涨的前提与基础，但是主观力量比客观革命落后正是一种主要危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主观力量的悲观论，同时也要反对忽视加强主观力量与只要客观形势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的自然论。

（五）现在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红军的集中，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各地自发的和领导的斗争和罢工不断的相继起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恐慌到极点而有计划地进攻红军和革命势力，陕西党最主要的任务要抓住目前城市和乡村的自发的群众斗争的领导，鼓动与争取公开的群众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拥护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权。

（六）在省委政治决议中关于发展赤色工会争取赤色工会公开路线建立工会生活，在农村中雇农组织与运动，反富农斗争，对于土匪群众的工作与策略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在党的任务方面非常重要的。陕西党部应根据三中全会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夺取广大群众到党的周围，这样是加紧反对黄色工会，反对富农领导、土匪领袖等的斗争。陕西党部的指导机关和党内成分必须积极改善，要积极发展新的群众，尤其工人与雇农的成分必须增加。总之你们应当根据三中全会决议最好是能够召集一个全省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切实地讨论出一个具体的计划来执行，目前主要的任务，在计划中必须要抓住几个中心区域和几个中心问题来切实开始转变。这个计划主要的说来，要具体的规定：

（1）全省职工运动中心区域新的工作；（2）发展和领导农民群众斗争计划——在什么区域可以怎样发展抗租抗税的斗争到游击战争，在广大群众斗争之中建立并且扩大游击队，完成北方暴动，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3）兵士工作怎样的开始，怎样和工农运动联系，尤其重要的是怎样实际上削弱军阀军队而加强游击队的武装力量等。

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 作方针决议案*（节录）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省委第六次全会议修正）

一、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是在飞速地向前发展，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壮健与扩大，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正在这一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使中国革命的进展受到了暂时的严重打击，红军与苏维埃部分的受到了暂时的失利和挫折，党的领导力量比以前削弱了，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的严重历史时机，造下了无限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的精神之下，已经脱离了立三路线的领导，回到共产国际路线之下，是能够保障中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以走到新的伟大胜利。

（二）目前的形势正是帝国主义指使着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围剿红军进攻苏维埃区域，企图消灭红军与苏维埃。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直接指使之下，又积极进攻苏联，否认伯力协定，破坏中苏会议，他们共同摧残中国苏维埃运动，这就是进攻苏联的第一步，所以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与苏维埃，成了目前革命运动最主要的危机。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定期五月间召集国民会议，用许

多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欺骗广大劳苦群众，如“裁厘政策”，“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判）权运动”“大赦”等等。在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大屠杀中，更要加紧改良主义的欺骗，以和缓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正是目前对于革命的最大危险。

（三）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冲突，国民党军阀间的相互矛盾仍然存在，

新的军阀混战是有可能，各派军阀间战争，已经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开始准备了。这些更加要使全国政治经济的危机日益深刻，工农劳动群众的苦痛更要加深，国民党的一切欺骗都将无望。恰如国际所指出“这样使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除了斗争没有出路，只有日益革命化，以加强全国的危机，这些情形，使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接近”（国际对中国问题决议案）。

（四）在这样条件之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国际所指出“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每一个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暴动的第一步，每一个罢工都是对于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帮助”（国际十一月来信）是非常正确，无疑的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主要的现实任务。

二、陕西政治状况与革命形势的估计

（五）陕西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入：陕西在全国政治经济的危机中，更加以连年灾荒与军阀混战的推动使政治经济的危机日益深入，目前陕西灾荒的形势固然比过去减轻了，但城市金〔经〕济的凋蔽，商业的衰落，农业的危机，社会经济的空前破产是绝对不能有根本的挽救。因为：

第一，帝国主义在灾荒中用救济的名义积极侵略，开办水利（吊兜咀）收买土地（华洋义赈会教会）要操纵陕西的经济命脉。

第二，灾荒中农村土地关系已有急剧的变化和剧烈的集中（地主豪绅富农慈善机关和商业资本家大量收买土地）使大部分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豪绅寺院慈善机关商业资本家的手中，中农贫农大部分破产，甚至生产工具多失掉了。

第三，灾荒中，高利贷的剥削特别厉害（大加一，支麦支秋，吃家〔加〕麦）使中农贫农的破产及土地集中更为迅速。

第四，目前灾荒的减轻只是部分的区域（渭南，华县，蓝田等地），过去灾荒较重的区域（如西路：周至，兴平，武功等地；渭北：三原，泾阳等地）仍是严重，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苦痛还是没有得到解除。

第五，今年春荒又将到来，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地主豪绅富农的剥削比过去还要加重；同时破产后的农民在春种期无种子无耕牛，使其生活苦痛更要

加深。

第六，去年秋禾虽已有相当的收获，今年麦已种下，全国军阀混战在暂时的休息状态中，交通亦已恢复，关外食粮与货物可以进来，粮价较灾荒最重时低落数倍（但比未灾荒前还高三倍多）。但陕西的工农劳苦群众，在这数年的灾荒中，经过高度的破产，购买力绝对无法恢复灾荒前的状态，生活还是无法维持。因此，这些情形只是要使国民党政府豪绅地主富农各种方式的剥削更要加紧。

冯系军阀退出陕西后，蒋系军阀杨虎城入关，虽然企图用改良欺骗的手段，以蒙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但这些改良欺骗是要很迅速地揭破在劳苦群众的面前，因为大灾荒后的陕西，财政混乱，南京政府又不能积极的接济，这样，使杨虎城不能不加紧压榨剥削——厘金取消，特种消费税成立，比以前加重数倍；二十年田赋，捐粮借款，都作为暂借民款，二十年田赋又开始征收，各种款项下乡催交，不能缓和（如蓝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无论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这些改良欺骗还没有完全揭破，在落后的群众意识中，还有它相当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严重地注意到目前国民党军阀正在进行进攻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大屠杀，一方面加紧改良欺骗，以和缓革命斗争的发展。陕西的国民党军阀在这一形势下必然的更加紧他的改良欺骗，以和缓群众斗争情绪（如西安印刷局已经是这样）以维持其统治，在落后的陕西群众意识中还能有不少的作用。所以加紧反改良主义的斗争，在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真面目。

陕西还是在各小军阀的割据状态中，蒋系军阀占据东路各县（华县，潼关等地）陕北井岳秀，西路苏雨生等部，汉南冯系旧部及川军等部。这些各部队与杨虎城相互间都有根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使战争仍是继续爆发，西路停止，汉南又起，而且全国新的军阀战争又正在积极准备中。这样，各个小军阀对劳苦群众的摊派剥削，只有日益加重。

一切事实证明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任何一派，都不能解除了一切根本矛盾，走前去只有更加深陕西政治经济的危机，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尤其是灾荒较重的区域的生活是要更加恶化，日益走上革命化的道路，所有这些情形，就造成了陕西革命运动高涨的唯一客观前提。

（六）群众斗争形势的估计：陕西群众斗争在灾荒较轻和杨系军阀改良欺骗的条件之下，群众斗争情绪与农民兵士的斗争形势，虽然没有灾荒严重时尤其是冯系军阀退走时高涨，但因政治经济危机的推动，群众生活告痛的没有解除，使群众斗争仍然表现了高涨形势。工人斗争呈出活跃现象（阳历年关前后，西市工人斗争即有七八次）；农民斗争的规模与形势，虽然没有自发暴动与武装斗争，但各地反抗剥削的斗争还是继续发生（如西路的灾民斗争，蓝田反豪绅斗争，汉南反捐税斗争，蒲城的反村长斗争等等）士兵自发斗争与零星哗变逃亡，依然没有停止（如西安军医院伤兵斗争，淳化西路的兵士哗变）但这些革命斗争还是以经济斗争口号为主要内容，斗争中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甚至完全没有领导。因此，群众斗争还是在初期状态中，还是零乱无组织的，斗争中表现出严重弱点。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还是非常薄弱，合法观念、帮口与部门的分化极其严重。工人群众的组织还是异常薄弱（如印刷工人）最大多数的工作群众还不能组织起来。农民斗争大部分还是在豪绅富农领导之下，党所领导的农民斗争还是非常稀少，农民群众的斗争组织完全没有，因此斗争都是零乱散漫，还陷入自生自灭的状态中。兵士哗变还是得不到正确领导投入土匪中去，群众斗争在这些情形之下，还是不能很迅速地发展，甚至走入失败的道路。但陕西农民运动如果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不可避免地要很迅速地发展起来。

（七）陕西革命运动的高涨形势与全国革命的高涨形势是不平衡的：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殊形势之下，因为陕西经济政治的发展落后（新式产业非常之少）大革命时代影响的薄弱，群众的斗争经验特别缺乏，政治意识与阶级觉悟非常低落，工农斗争的不能配合。所以陕西革命运动的高涨形势与组织力量，和几个中心省区尤其是湘鄂赣，绝不能相互比拟。

（八）党的政治领导力量的考核：陕西党在长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更加以立三路线的统治，使党的政治领导不能深入广大的劳苦群众中去，党的领导成了群众斗争的尾巴，许多群众斗争党还不知道，根本放弃了领导。这样使党的领导力量削弱了，使群众斗争不能很迅速地发展和扩大。党的政治领导力量不能适应革命运动客观上的发展，是目前陕西革命运动高潮形势中最严重

的问题。

三、肃清立三路线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九）立三路线在陕西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危害：

1. 对陕西革命形势的估量已到了武装暴动的前夜，完全否认了陕西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及一切特点，即定出布置全陕武装暴动的总任务。

2. 在职工运动中：不发动日常要求的斗争，不组织工人群众，不建立赤色工会工作，只是空喊政治罢工，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成了组织工人斗争的中心口号，认为陕西每个工人斗争都必要发展到政治斗争，即否认了工人的严重弱点。

3. 在农民运动中：不领导农民日常要求的斗争——反捐税、反豪绅、反高利贷、抗租等；不领导广大灾民的斗争——要饭吃；不组织农民群众，不加强红枪会土匪中的工作，夺取下层群众，只是空喊地方暴动，认为陕西农民一开始就是武装斗争。

4. 在兵士运动中，不普遍建立和加强反动军队里的工作（只有马部），不能领导兵士日常要求的斗争——发饷、改良伙食、反对官长打骂等斗争，不建立和加强兵士的组织，不使兵士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只是空喊兵变和兵暴，使蒲城兵变失败了，整个军队中的组织瓦解了。

5. 不组织群众经济政治斗争，只是企图号召群众政治示威。（八一、九七等）

6. 在党的组织中，不建立支部工作，不加强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发展党内民主化的讨论与自我批评——由下而上的检查工作。因此指导机关离开党员群众，是空心机关，命令主义，家长和惩办制度的方式下去进行。党报只是空喊，完全没有内容，形成指导机关中一二人的包办。这样使党现在主观力量削弱了（党员二百余人减至一百余人），政治领导脱离群众了，党内富农与右倾的基础不能改造了。对于青年团的立三路线与工作没有指明出来，尤其“九七”总行委的组织。

7. 三中全会与北方局扩大会后，陕西具体工作的执行上还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如年关斗争计划党报等）。

(十) 立三路线在陕西党的基础——右倾机会主义。

1. 党的基础建筑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富农身上，无产阶级成分几等于零，指导机关完全在知识分子手中，因此立三路线更形成指导机关的空喊。

2. 陕西党自一九二八年的盲动失败后，完全停顿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群众的实际工作没有建立，党的政治领导力量完全没有，这样情形，立三路线是绝对欢迎的左倾帽子。

3. 党的政治理论水平的低落，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能与实际工作联系。

(十一) 肃清立三路线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 立三路线更稳定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使党更不能领导群众经济政治斗争。

2. 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最严重的危机。

3. 为了肃清立三路线必须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4. 加强无产阶级基础，向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开门，肃清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分子，加强无产阶级教育，是肃清立三路线的根本办法。

5. 培养工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提拔并吸收反立三路线的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彻底的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目前的主要工作。

6. 发展自我批评，实行由下而上的检查，运用民主化的讨论，建立铁的纪律是主要方式。

四、陕西党的当前任务与主要工作方针

(十二) 党当前的中心任务

陕西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并领导群众日常要求的经济政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组织群众树立党的独立领导，加紧下层统一战线，巩固党的主观力量，争取广大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扩大苏维埃运动，反对围剿红军，在群众斗争与日常宣传鼓动工作中，要联系到反对围剿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苏联，反帝反国民党。党必须在完成这些现实任务中真正地去准备武装暴动。

(十三) 职工运动的任务和方针

发动和领导工人的日常要求的经济政治斗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成立工会，八小时工作制，罢工自由，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从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尽量发展经济斗争，领导罢工运动，从这些斗争与罢工的基础上联系经济政治斗争，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加强工人组织力量，加强建立赤色工会工作，加强下层统一战线，夺取帮口行会以及各部门的工人群众，建立工厂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建立工人的武装组织，在这个总方针下：

1. 加强中心区域中心工人中的工作（西安、华阴、同州作坊，蒲城盐滩，潼关渭河码头工人）树立党的领导基础。
2. 提出工人斗争的纲领，加紧宣传鼓动。
3. 建立工厂小报，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与组织力量。
4. 领导青工学徒店员特殊利益的斗争。
5. 加强农村工人斗争，建立巩固雇农工会是领导农民运动的中心领导力量。
6. 建立巩固的赤色工会，加紧训练工人干部。

（十四）开展农民运动

发动并领导农民基本群众的反对各种形式剥削的斗争——反捐税、反豪绅、抗租抗债等斗争。这些斗争要利用农民群众的组织方式去进行——建立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斗争委员会，争取豪绅地主富农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领导权，树立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开发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围绕中心城市，号召农民斗争，解除豪绅地主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在这个总方针之下：

1. 加强几个农运区域的工作（西安四郊——长、蓝、三原、渭南、兴平）。
2. 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建立灾荒区域的领导。
3. 加强雇农苦力斗争的领导，建立雇农苦力工会。
4. 加强红枪会、土匪、民团中的工作，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夺取其下层群众。

（十五）加强灾民斗争的领导。发动灾民斗争——要饭吃、要工作，清算赈务会的帐目，分配豪绅地主食粮，发义仓等。同时应当在广大的灾民群众中，

建立灾民自救会、灾民团的组织，树立灾民群众中的中心领导力量，以与农民反抗各种剥削方式的斗争联系起来。

（十六）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反对离开工农群众斗争军事投机的冒险兵变和兵暴。

1. 建立中心部队中的工作。
2. 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
3. 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

（十七）独立领导与下层统一战线。在群众斗争中树立党的独立领导，加紧反一切派别的斗争——托派、取消派、新党、社会民主党，灵活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夺取各派与富农、行会帮口红枪会等蒙蔽下的群众，加强党的宣传鼓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十八）领导城市贫民的反捐税要饭吃要事做的斗争，建立贫民委员会。

（十九）加强回民中的工作，省委建立回民工作委员会。

（二十）发展和领导反帝斗争，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群众组织。

（二十一）建立青年和妇女工作，领导特殊利益的斗争，发动青年妇女运动，积极帮助青年团的转变，加强其政治指导与实际工作的指示。

（二十二）建立互济会工作，执行实际的转变，使互济会工作离开立三路线之下的第二党化，使成为广大群众同情工农斗争的群众组织。

（二十三）党的组织问题。党在组织上的任务是：考查和巩固各级委员会的工作，积极征收新党员——向工人开门；巩固和扩大党的积极干部，团结到各级委员会的周围——培养新的工人干部，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考验党的各部门的工作。

五、加紧两个战线斗争，发展自我批评

（二十四）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党要执行当前任务，保障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深入反立三路线，必须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陕西党在目前最重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合法主义，抛弃群众斗争的领导。党在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只有坚决肃清调和主义的倾向，才能无情地克服这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国际路（线）之下，彻底执行党的当前任务。

（二十五）自我批评和两条战线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党必须实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根据国际七月决议案及十一月来信，把这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由省委直到支部都要站到国际路线上，审查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执行纠正，使全党能实际的转变。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三日)

中央：

陕西省委自去年十^①月代表团由北方局回来，北方局和改组后的河北省委直到现在都没有工作上的关系了，因此陕西的工作的确是最高指导机关失掉了关系，因此我们觉得站在工作利益上将陕西省委会（全）体会议经过与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有与中央报告的必要，请中央迅速答复。

一、全会经过情形及主要决议

陕西代表团于去年十一月到北方局解决陕西工作问题，十二月十日代表由北方（局）起程的时候，北方局负责同志才将国际来信及中央补充决议交代表，并作一深刻谈话，当时我们已经知道北方局找到（代表）一星期后才给代表看了。当时陕西代表尊重指导机关的决定，并觉得顾及到目前工作，同意中央决议与北方局王同志的谈话。因此，回陕西后召集省委会体会议，根据（国际来信）与三中全会决议案，定出陕西年关斗争计划开始执行一切工作，巡视各地，领导西市印刷工人斗争，转变《西北》各种内容，加强地方党部工作，首先派同志健全渭南县委。工作执行两周后，C. Y. 同志^②于一月初又由北方局回来，带来各种文件，中央紧急通告亦收到。常委会（接）到了这些文件后，即认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非常严重的工作，这时又接到中央及北方局新的决议，但陕西工作不能因此而受影响，并且要在国际路线之下，重新估计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与对党的危害，检查三中全会的各种决议中继续立三路线的实质，陕西之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一切错误。在这些估计与检阅中，根据国际七月的指示与十月来信，决定陕西新的工作决议，定出反（立）三路线之具体工作与方针。在这样严重的意义之下，必须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具体地解决这些严重的任务，因此常委会即积极准备于一月三十一日开过了。出席人数，除省委五人外，地方

党部代表二人，C. Y. 代表二人，全会主要决议〔内容〕是讨论国际来信，立三路线的实质与危害，三中全会与中央补充决议。全会热烈的讨论了这些文件后，即产生三个决议案：（1）接受国际来信与〔反对〕立三路线及继续〔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决议案；（2）陕西工作决议案；（3）为执行国际路线，彻底反立三路线的具体决议，选举出席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的代表，转达陕西反立三路线的精神与决议并解决陕西各种政治和工作的问题。全会的主要精神是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因此全会即指出国际路线的正确，立三路线的实质与危害；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策略上的各种错误实质，中央两个补充决议还是调和的立场，不能够领导全党的斗争；估计了全国和陕西的政治形势，立三路线在陕西党的具体运用危害及基础，指出反立三路线的具体工作；指出陕西党的目前任务与主要工作方针；最后即指出中央与北方局、河北省委对立三路线的调和，直到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还有许多缺点，不宣布立三主义的破产，不能提出对中央领导机关与拥护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等组织上的具体办法，至于北方局补充决议和河北省委就没一点表示了。这样省委认为中央领导完全破产，因此建议远东局停止中央职权，召集全国紧急会议，这些就是全会的大概情形。全会后省委即根据这种精神与决议规定陕西的工作计划，开始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省委今天（二月十二）接到《实话》第五、六、七期，即召集会议讨论四中全会的决议，认为在国际指示之下召集四中全会产生新的中央政治局是非常正确，省委一致的拥护四中全会的伟大成功。根据四中全会决议，检查〔省委四次〕全体会议的各种估计与主要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与四中全会是一致的，不过在组织上宣布指导机关政治领导的破产，并由国际远东局召集紧急会议产生新的中央，这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已认识了 this 错误，决议产生补充决议，指出全会的这些错误，并接受四中全会的决议，使陕西党更能在新中央的领导之下，正确地执行国际路线与省委全会的决议。以上是全会经过的概括叙述，至于各种文件与反立三路线的实际工作和工作状况详细报告，因时间短促不能写出，省委已决定派人送到河北省委，将来总可转来。

二、对河北省委的意见

河北省委成立后，直到现在和陕西一切工作断绝了，省委的好几个信都未答复，文件更没有寄来，经费一文不能接济，这样的指导我们是不能完全满意的。去年代表团到北方局解决陕西工作时，即指出北方局指导工作的不实际，领导力量的薄弱，工作方法的不好，今后和陕西关系的各种具体建议，北方局负责同志口头上是接受了，实际工作上一切都没有采纳，直到现在河北对陕西的指导工作在事实上是放弃了，这样我们站在工作上是要无情地揭露河北省委对陕工作指导上的弱点，因此我们建议中央，河北这样，我们站在工作能力上，必须缩小范围，恢复顺直省委的原来范围，各省可直属于中央工作上最为便利。

三、要求中央要解决的问题

陕西去年九月间由交通带来详细的工作报告，并提出几个严重问题要求中央解决，但中央当时即委之于北方局，最近代表团到北方局更严重的提出来，北方局仍是口头上诚恳的答复了，实际上还是一句空话。本来省委全会已派代表出席北方局紧急会议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今天〔接〕到四中全会决议后，代表没有去的必要，决定另派一同志到河北省委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没有经费现在不能起程。因此我们觉得这些问题有向中央提出的必要，希望中央给以具体的答复。

(1) 陕西工作是在长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加以立三路线的危害，使党的力量削弱了，省委离开党员群众，威信丧失了。我们在反立三路线的精神之下检查了我们的一切工作，的确是陷入最严重的状态中，必须要有实际的转变才能挽救目前的危机。但这一转变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省委现在负责同志经验的缺乏，理论水平的低落，无产阶级意识的薄弱，尤其是省委书记^③最为严重，这样的指导机关无疑的不能有迅速转变，我们要求中央能派两三个得力同志到陕西工作，成为中心领导，帮助陕西党的实际转变，这在工作的利益上是有严重的意义，请中央不能忽视以影响陕西工作了。

(2) 陕西属河北省委，无论如何没有〔中央〕指导机关便利，我们为工作利益，坚决要求直属中央。因为：a. 陕西和天津交通非常困难，但与上海却比较便利了，这样可以密切工作上的关系。b. 河北省委指导能力薄弱，在工作上不能有实际的帮助。

(3) 中央可告知通讯处，将省委全体会议决议案（报上）请审查指示。

陕西省委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三日

注：①应为十二月。

②指杨荫川，又名杨珊。

③指杜衡。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提出比李立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这前后，党内出现罗章龙等分裂党的活动。省委在一月到三月间在拥护六届四中全会还是倾向罗章龙观点上出现反复。

中共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案*

——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节录）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省委接到了四中全会决议案及中央政治局各种工作指令与一切材料后，站在国际路线之下，召集省委六次全会，正确地深刻地检讨省委四次全会的精神与决议，坚决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特成立下列的决议：

接受四中全会决议

一、四中全会在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之下，已经完成了它的伟大任务一开始建立起反立三路线的广大基础，坚决执行国际路线，深入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这一精神之下，改造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机关，引进了反立三路线的积极干部，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因此，四中全会在中国党布尔什维克的转变过程中，是有极严重的政治意义，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都应在四中全会精神之下，艰苦耐心的在实际工作中与立三路线作无情的斗争，全党同志必须在国际路线之下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以争取中国革命新的伟大胜利。讨论了中央政治局一切指令后，认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是站在正确的国际路线之下，是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全党深入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同时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打击了正在分裂党的右派，徒这些叛徒，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改造后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的精神之下，开始执行国际路线时，已经证明了他是能领导全党工作，彻底执行国际路线，引导全党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敌视共产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中，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只有敌视真正进攻的国际路线的右派叛徒们，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放弃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走上反党反国际路线的道路上去。

省委过去对四中全会动摇犹豫的严重错误

二、六次全会指出省委四次全会直到最后，对这一问题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实际上被右派叛徒们利用作为他们反党反国际的工具。立三路线的统治，使中国革命运动和党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样严重的关头，三中全会站到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更给立三路线以保障和承认，国际十一月来信后，中央还在调和主义的精神之下接受，一再错误，直至九十六号通告还表现了许多缺点。省委四次全会根据这些理由，加以全总党团决议，河北第二党（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通知更助长了这个倾向，虽然有少数同志（痴愚同志^①）反对，但被大多数同志否决了，因此全会即通过了建议国际远东局的决议，宣布中央及河北省政治领导的破产，要求远东局停止中央及河北省委职权，由远东局主持召集紧急会议，产生新的指导机关，并否认了河北省委对陕西改组的通知。四次全会后不久接到中央党报，揭载四中全会决议案及一切反立三路线的文字，省委二月十五日讨论后即成立一决议一接受四中全会决议，并认为四中全会在国际领导之下是正确完成了它的任务，宣布取消省委四次全会对国际远东局的建议为无效。这一决议尚未公布，右派叛徒罗章龙、王克全、张金刃^②等领导的第二党（非常委员会）和河北第二党（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几种文件，山西特委用兄弟党的关系，寄来了特委和市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并派代表来报告。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代表报告后，省委即开始动摇犹豫了，由常委会又成立一次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只是站到力争紧急会议的精神之下，参加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但在政治上已经指出筹备处是曲解国际路线，是造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另外一条路线，如果他们不能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陕西省委亦不参加，必须与各兄弟党交换意见，在力争紧急会议中与立三路线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六次全会必须要指出，省委在这一过程中的怀疑犹豫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只有痴愚同志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始终正确），这个错误责任要由常委会来负责。六次全会更明显地指出这些错误很显然是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是立三路线统治全党时代的组织观念，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

省委深刻地认识了这些错误后，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暴露这些错误

于全党，号召全党同志与这些不正确倾向斗争，尤其是要与曲解国际路线分裂党的右派叛徒们作无情的斗争。并宣布四次全会的具体决议为无效。

反对右派叛徒分裂党的行动

三、根据右派所领导下的非常委员会中央和河北省筹备处的各种文件，尤其是他们的代表报告和谈话后，无疑的他们是曲解国际路线，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已经拿着他们的右倾政纲，公然与国际的进攻路线相对抗。省委六次全会认为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驱逐这些不可救药的右派叛徒出党，是巩固布尔什维克党，使党走上健全化的道路的必要前提，省委号召陕西全党同志起来深入反立三路线斗争，同时和这些右派叛徒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这条政治路线与国际路线是相对立的。右派将国际所指出最主要的现实任务：“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是党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去发展政治罢工”，“党应当发展抗税抗捐的运动，应当号召游击战争，号召赞助苏维埃区域”，却成为遥远的前途了。右派是拿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假帽子，实行反国际路线，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这样他们必然的是要坐在陈独秀取消派的怀抱里，走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右派知道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能号召布尔什维克党员，因此只有乘着全党对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前中央调和隐蔽的愤恨，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材料未公布之前，尽量拿着派别纠纷攻击个人造谣诬蔑，引起党内的纠纷分裂。右派叛徒这种分裂党的行动，在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严重关头，只有便利于蒋介石国民党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势力，比陈独秀取消派的罪恶都要加一倍，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必须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与这些右派叛徒作拼死斗争。根据这些理由，省委六次全会认为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驱逐这些不可救药的右派叛徒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张金刃等出党，是巩固布尔什维克党使党走上健全化的道路的必要前提，省委号召陕西全党同志起来深入反立三路线斗争，同时和这些右派叛徒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

在四中全会精神之下，检查省委第四次 全体会议的一切决议

四、在未接到四中全会决议之前，省委在七月国际对中国问题决议和十一月来信的精神之下，在中央调和主义的过程中，召集扩大的四次全会，成立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各种决议案。省委六次全会根据四中全会与中央政治局各种工作决议，检查四全会的决议，认为扩大的四次全会，除对远东局建议的决议案外，其他一切决议原则上都是正确的，是在国际的正确路线之下完成的，但因陕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陶冶的薄弱，群众斗争经验的缺乏，因此在全会决议案中表现了部分的缺点和错误。最后在决议案的文字中是有些过分的估计（如说农民斗争的普遍），这个责任要由常委同志负的。在四次全会的整个精神与决议中的错误与缺点，可以指出如下：

第一，忽视了青年团的工作，在全会的整个精神中，对青年团的转变不能有切实的规定，这是说明立三路线的遗毒还不能肃清，实际上是取消了青年团的工作。立三路线的估计中，亦没有提出取消团的严重现象。虽然陕西没有取消党和团的组织，但在九七纪念中，西安市已实行了。青年团省委全体会议指出这点，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在各种工作方针中不能运用陕西工作经验和特殊情形，更详尽地规定出具体工作和方法来。

第三，在政治形势的估计中，忽视了帝国主义在陕西的侵略作用。商业的衰落，高利贷的剥削，统治阶级的改良欺骗影响。

第四，对目前党的总任务，放弃了反对围剿红军，同时在整个决议中对扩大苏维埃运动没有具体的规定。

第五，全国政治形势的估计模糊不清，只是简录了国际决议案。

第六，互济会工作根本没有提到。

第七，两条战线斗争与反立三路线斗争混淆。立三路线不能包括了“左倾”危险。

四次全会的精神与决议中，是表现了这些个别的错误和缺点，绝不是如四

次全会中直到现在一部分同志估计四次全会对陕西工作的决议是一贯的立三路线，拿着另一条右倾路线来对抗四次全会所指出的正确路线。这部分同志的路线是，否认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在陕西的伟大意义，因为曲解国际路线，曲解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忽视现在政治经济的危机与群众斗争形势，否认陕西革命运动高涨的初期形势，因此对党的中心任务的规定是束缚在群众的落后意识与合法观念的范围内，党形成群众斗争中的尾巴，降低了党的任务。对党的主观力量的估计就是“天宫临凡时期”（痴愚同志的意见书）的观念。对目前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有意放弃，这些观念的出发点是因为群众的落后意识合法观念，是因为党的主观力量薄弱，因而要降低党的总任务，以目前具体的工作方法来代替他。很显然的这条战线是离开国际路线的，是退却路线，恰如国际所指出：“一切企图了解或者解释国际执委的路线是退却的。就算说是暂时退却的路线，自然都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些同志在这条退却路线之下，已经同意了右派叛徒们所提出的改治〔良〕路线。（铁军同志在筹备处代表报告后之发言）。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机会主义，现在“左倾”帽子去后，右倾机会主义必然是要暴露出来。因此加紧两条战线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更使〔是〕陕西党不容有丝毫的忽视，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非常薄弱，党的工作是在长期的右倾机会主义泥坑中，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又加深了右倾的危机。目前右派叛徒正在反竞反国际路线，积极分裂党的一致，因此六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反对右派叛徒，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动摇党的总路线，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巩固党的一致，使陕西党走到健全化的道路。

六次全会委托新的常委，根据这一决将四次全会决议重新修正，继续有效，坚决执行。同时常委应根据这些工作方针，规定具体详细的指令与决议。

注：①即愚痴、李艮。

②即张金印、张慕陶。

*在这个决议案上，省委检查了对四中全会的动摇犹豫，确定接受六届四中全会决议。

中共陕西省委绘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陕字 159 号中字 16 号）：

互济会代表回来，关于陕西工作只简单的说到几点，陕西派赴河北省委代表已来中央否？如来时，对陕西工作当有详细报告，中央可根据以作陕西工作的指示。现在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已开过了，省委特派黄同志^①来，请你们与黄同志详谈，并可与前代表吉同志^②共同开讨论会，对于陕西工作能有详细具体的讨论和指示，使陕西工作的转变能有实际的帮助。现在将四次全会以后党内斗争与工作情形做以下的简单报告，详细情形，由黄同志口头报告，关于四次全会决议及以前工作，吉同志负责报告。

I. 四次全会后的工作状况

省委第四次全体执委会，于一月二十九日^③开过，根据国际对中国问题决议案及最后来信，据三中全会及中央调和主义的错误，成立接受国际指示决议，成立陕西工作决议，建议国际远东局决议，时间经过两日，出席人数，除全体省委外，还有地方党部代表三人^④，C. Y. 代表两人。全会闭会后，即据这次决议布置各地工作。但这时省委经费绝对无法维持，河北省委永远无关系，对陕西完全置之不理，中央各种文件丝毫不能传达到陕西来（只有《实话》几期是由上海寄来，偶然收到），政治指导又是丝毫得不到。因为经费无法筹划，省委和西安市工作同志两三人每天都忙于混吃的，早晨不知晚上吃什么，巡视员不（能）出发，巡视工作停顿了，交通工作建立不起，各级党部与省委关系几全隔绝。《西北红旗》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不能按期出版，印刷经费没有着落。省委机关的建立完全没有办法，只得与秘书处合并，共同建立一个，因为经常印刷文件，当然不能多来同志，所以常委会就不能集体开会处理日常事务讨论一切工作，常委同志互相间三四日不能接头，更谈不到经常办公了。在这

些情形下，一切工作计划无法实现，实际上工作是没有切实建立，更说不到实际的转变。

省委工作这样虚浮，又加以两个中央的问题（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与非常委员会中央）不能解决，一部分省委及地方党工作同志提出别一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与四次全会决议对抗，因此于三月六日开第五次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全会决定派代表到上海，与两方面接头，根据两方面材料作最后决定，同时即解决陕西一切工作问题与对陕西工作上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斗争问题，对常委工作有详细检查，指出全会后常委必须立即巡视各地，切实建立各地工作。在工作中准备全陕代表大会，解决政治和组织上的问题，期限在两月内，代表大会未开前，四次全会决议仍是继续有效。

但五次全会后，经费仍是没有办法，比以前还更困难，巡视员不能出发，代表团不能起程，党内斗争更加严重。常委张子平同志^⑤因为政治上不同意，消极怠工，所担任的西市工作等于停顿，渭南县委书记李良同志分配工作不接受，青年团省委书记刘映胜同志在政治上和这些同志完全不（相）同。以这几个同志为中心，在支部中单个同志中仍是更加紧鼓动，反对四次全会，指导机关成立了政治俱乐部，工作仍是无法推动，直至省委六次全会以前，事实上由四次全会以后，经过两月之久，工作是没有实际建立，在省委指导机关中大部分时间争论了这些问题，这证明立三路线还是统治了陕西的实际工作。

II. 陕西党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两条战线斗争

（1）对右派领导的第二党问题。

陕西去年十二月代表团由北方局回来后，北方局即与陕西完全断绝关系，一切消息隔绝，文件不能传来，北方局在这一过程中的确证明了真正立三路线的工作方式，放弃指导责任，对代表团同志一切决定和说话，客观上都（是）外交式的应付，自代表同志离开天津的那天后，即无任何关系了。陕西给北方局许多信件和工作报告，没有半字的答复，改组后的河北省委依然如故，这个责任北方局及河北省委是不能辞脱的，中央必须与（予）以切实的检查和必要的批评，正因为这样，陕西党就更容易被右派利用了。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建议远东局决议，就在这一原因之下成立了，省委对这个问题经过几次的动摇，

经过山西代表报告和筹备处代表报告后，已经要成立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因为根据非常委员会的告同志书内，指出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名单，大部分同志都是我们知道的，如沈泽民、王稼祥、陈绍玉^⑥等都不是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出来，尤其是陈绍玉过去历史我们更不满意，在国内参加实际工作历史很短，党内的确是没有威信的，马上充任政治局重要责任，我们坚决反对，如改造后的中央，在这些同志领导之下，我们认为不能保障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再经过山西代表的报告，详述四中全会后中央巡视员在山西的情形，并且说陈绍玉是中央政治局书记，山西和边特保属代表交换意见的结果，河北新省委的负责人及工作情形（听说过去在天津负过工作的都是河北省委员，如果是实，那我们还是坚决反对，因为这同志的工作能力、意识、历史、政治理论水平，我们是清楚的，绝不能担任这样的责任，代表团在天津已与北方局负责的王同志说过），给我们这材料后，即决定在力争紧急会议精神之下参加筹备处。不久筹备处又派代表黄志文同志^⑦回来，做过详细报告后，我们更认识筹备处的右倾政纲，如果不接受，陕西亦不参加。正在这时，互济会代表回来，带来中央政治局各种材料后，我们才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决定最后态度，成立了第六次全体会决议，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

（2）对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陕西工作决议》的意见。

根据四中全会后中央一切指令和决议，省委四次全体会议对陕西工作的决议是表现了部分的错误和缺点，绝对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关于这个问题，陕西党内是起了很剧烈的斗争。在四次全会中，渭南县委负责同志张文华、李艮（书记）对陕西革命运动的估计是低落的，但其他同志根据陕西政治经济与群众斗争形势，一致认为陕西革命运动是高涨的形势，党必须在这高涨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指示，决定一切工作方针。经过剧烈的争论后，一致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大纲。（否决了）两同志即领导渭南县委正式成立了决议反对四次全会决议，要求召集扩大会议解决陕西工作问题，说明四次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并且他们两个人都有政治意见书，提出别一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与四次全会对抗。当时常委会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指出他们的路线是退却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必须领导全党同志与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斗争。省委只有五个执委，

常委吉同志到河北省委去了，常委只有高〇〇、杜〇〇两同志^⑧，同时执委黄同志也提出政治意见书，反对四次全会决议，执委张子平同志政治态度非常暧昧，调和两个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常委会要其写政治意见书，最后他完全同意了李良同志的政治意见，青年团省委书记^⑨也同意了他们意见，只有常委两个人坚持反对他们的右倾政纲。张子平同志听到筹备处代表报告后，他完全同意了右派对北方的政治形势估计与策略的决定。这时即召集五次全会，在全会中常委高、杜两同志^⑩，省委秘书焦同志^⑪是一方面，李良、张子平、刘映胜（青年团书记）、黄平是一方面。五次全会后，常委更加紧对这条右倾路线作坚决斗争，首先在青年团全体会议中给这条右倾路线以严重打击，指出这些同志是悲观失望消极，成立了拥护四次全会的决议，指出四次全会的错误和缺点，最后说黄平同志承认过去的错误，回到四次全会精神之下。中央各种材料到来后，常委这一问题并须立即解决，如果迟延是会影响工作的。因此，即指示六次全会，在四中全会精神之下，检查四次全会的决议，以得到组织上的解决。常委即向六次全会提出决议草案，同时由张子平、李良、刘映胜起草一决议案，在全会中讨论两个原则上不同的决议案，最后六次会议绝对多数通过了常委提出的决议案，严重地斥责这些同志的右倾路线。并指出陕西党必须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拼死斗争，这个问题在六次全会上得到了最后的解决。

III. 省委六次全会的经过

省委六次全会是在四中全会精神之下召集的，出席人除省委同志五人外，地方党部一人，青年团二人。全会主要内容是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古派分裂党，检查四次全会决议，最后通过常委杜同志^⑫提出的决议草案（决议案附上），否决了张子平、李良、刘映胜提出的草案（草案附上），指出这些同志是曲解了国际路线的〔为〕退却路线，是拿着另一条原则上不同的右倾路线反对四次全会，根据国际路线定出的正确路线，全党必须与这条右倾路线作坚决斗争。在这一精神之下，改组常委，张子平同志不但在政治上犯有错误，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消极怠工，撤销代理常委责任（常委吉同志走后他代理），省委书记杜衡同志负责此责任历史太长（二年多），立三路线统治全党时，他是陕西的执行〔者〕，同时因为工作经验的缺乏，政治领导的薄弱，党内没有威信，所以将

书记职务撤销，省委书记另选高维翰同志担任，常委工作暂由高、杜二同志^⑬处理，要求中央审查批准，决议案亦交来，请审查。

注：①即黄平。

②即吉国桢。

③省委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说，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日开过”。

④省委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三日、四月二十日给中央的报告均说，出席省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地方党部代表为二名，即蒲城县委书记黄平，渭南县委书记李艮。

⑤即张质平、张资平、张国藩。下同。

⑥即陈绍禹、王明。下同。

⑦即黄子文。

⑧⑩⑬即高维翰、李杰夫、杜衡、杜振庭。

⑨即刘映胜（杨声）。

⑪即焦维炽、焦维志、焦仲敏、焦仲明。

⑫即杜衡。

*原标题为：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陕字 159 号，中字 16 号）。

吉国祯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

为便于说明陕西党过（去）工作的经过，我应分以下几个阶段来报告。（1）自陕西五次扩大会到接到新潮^①后（七月至八月）为一阶段；（2）自接到新潮与三中全会的决定传到陕西后，即立三主义在陕西的运用等（八月至十一月）为一阶段；（3）自三中全会到现在即陕西党接到国际的决议^②与十一月的来信^③后与工作上的转变为一阶段（自十二月到今年二月）然后再说到目前的现象。现在我分别报告于下：

（一）过去工作的考核：

1. 自五次扩大会到接到新潮后（七月至八月）

第五次扩大会前后陕西主要的客观形势与党的主观力量。在五次扩大会前后，陕西主要的客观形势在我第 I 大项“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报告的事实中，已经可以看见一般，我此处只应说明者此刻正是阎冯反蒋全国军阀混战方悍（酣）的时候，老冯在陕的部队大部出关应战，灾荒仍是继续，麦已歉收，秋苗又将被蝗虫吃尽，苛捐杂税拉差拉夫又不断的来临，致使广大的劳苦群众工农士兵贫民生活极端恶化。在极残酷的白色恐（怖）压迫之下，自发的群众政治经济斗争不断地爆发。一般知识分子处在这样形势之下，与全国革命高潮的影响日益左倾。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陕西主要的客观形势因为军阀混（战）加工制造的浩大灾荒，致使政治经济的危机与群斗的形势都是日益加深与开展，有了高涨的趋势。

但是，当时党的主观力量如何？领导群众斗争与群众组织怎样呢？

（1）西安工人同学三四人，其他知识分子四五人，与省委本身在西安者四五人，共十有余人，兵警及其他分子没有一个。（2）渭华十余人多知识分子，贫苦农民只三几个。（3）泾原（富平在内）以三原为中心，以后有士兵同学四

五人，知识分子与农民（只三几个）十人有奇，合共泾原富平三县不到二十人。

（4）同〔大荔〕潮〔朝邑〕（蒲城在内）三县亦不过二十余人。（5）蓝田四五人。（6）西路七八人。（7）汉南七八人。这些都多知识分子，农民没有几个。以上是关中、汉中两道（陕西分三道，除此两道外，还有陕北道）。合共不过百余人。党员如此，至于团员的数量，成分也不过如此甚或不如党。

在陕北榆林约一二十人，米脂约四五十人，绥德约近百人，清涧、安定约百人左右，延长、延安约二三十人，神府约四五十人，三边、横山约二三十人，共约三四百人，其成分亦多知识分子，都系十六年^④那个时候加入的（汉南关中两道的同学一样也多是十六年加入的），且有许多豪绅地主富农的分子，中小贫苦农民也是少数（但比关中道多点）。工人也不过几个，见〔简〕直不能成为比例。中学同学的数量比较能多一点，但其成分且多知识分子的学生。只士兵中的同学，在榆林有八九十人，延安有二三十人（皆井的中心部队中）。神府高志清的部队中有二三十人，甘陕交界苏一（雨）生的土匪部队有五六百人，其成份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下级长官职员外，概多农民。这算一部较好的力量。

党的指导机关，自省委以至各级党部完全是知识分子，且有许多地主豪绅富农的成分，党的生活除政治清谈外，自省委以至各级党部□说别□，经常会后〔议〕多不能按期实行，支部生活可以说见〔简〕直没有，各级指导机关□说不能深入群众，而党员群众的呼声多不知道。各级党部的关系，自与中央以至省委直到支部始终都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关系。

这样的党怎能在陕西当时客观形势之下，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其组织呢？有之也只是陷于经济斗争（当时陕西的党是以经济斗争为中心，联系到政治）或者群众反捐税反豪绅要饭吃……斗争起来了，自己才来讨论决定办法，但是自己决定以后，群众斗争的情绪已经变了，或者跟下〔上〕群众的尾把〔巴〕跑，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敢在群众中公开，甚至尾巴都赶不上，或者万一有我们发动的群众斗争，如府谷四五百人捣毁盐厘两局，事前没有充分的宣传鼓动与组织，以〔一〕开始便是乌合之众的骚动，结果反动的当局十三零星拘禁其所谓祸首，群众乃恐怖不前了。至于工作方法乃更是陈独秀时代机会主义工作方式的残余。

至于中学多是跟上党跑，与党一样，多完全是党的工作方法，没有抓住青年群众特殊利益的要求，很少发动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的单独斗争与党取得适当的配合。团的生活支部现象比党并没有多少差强人意。

以上的这些是第五次扩大会前后陕西主要的客观形势与党的主观力量，第五次大会就在这个当日（儿）开会了。

五次扩大会的成功与缺点：大会是根据中央的六十号通告与七十号或七十四号（通告）（现在我记不清楚），来分析当时陕西的政治形势与工作任务的决定的。大会上：

（1）在临时省委以及各地工作报告的讨论与批评上首先指出了过去一切错误与弱点，如临时省委政（治）领导太的薄弱赶不上政治环境的变迁，如对中东路事件、反混战，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如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不深入群众的政治清谈，只陷于经济斗争不敢发动游击，不懂得运用策略，留恋旧部……原因归结到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太的薄弱（这完全是正确的），这一大会可以说完全是在这种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精神之下成功的！

（2）在政治任务问题的讨论上：（a）估计了全国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陕西在连接不断的全国军阀混战加工制造的浩大灾荒之下，政治经济危机较之其他任何一省都是由（有）过之无不及，群众斗争的形势不但是经济的且已到了政治斗争，但以为较之东南各省是“例外的”（这个例外的话当然不对），因为党的领导薄弱，群众斗争多是原始式的无组织的或被豪绅富农土匪所利用。

（b）决定了党的中心政治任务是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资本进攻（在陕西可说反对封建式的剥削），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武装拥护苏联。党的总任务与总路线是征（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当时的认识是在斗争上、组织上去准备），以建立西北的苏维埃。（c）党的工作路线是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多集中人力财力于陕西中心区域与中心工作中去。（d）要实现这些任务，只有组织工人的政治罢工，农民的地方暴动，兵士的哗变与建立红军，当时特别着重于怎样组织与建立上。

（3）在工农兵等中心工作的讨论上，除了一般的外，也特别着重于以上（下）几个策略的讨论：

(a) 如怎样组织工人的政治罢工？（一）必须首先制出工人斗争的纲领在群众中经常的宣传鼓动；（二）必须〔根〕据工人日常的迫切要求提出斗争的口号加紧宣传鼓动，借以发动其斗争；（三）在斗争中必须加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四）在斗争中建立和加强工人的组织，如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等，并在斗争中要利用各种方式，如工人代表会、群众大会等，以提高工斗的情绪与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加强扩大其组织尤其是武装组织如工纠队等。同时也讨论到工厂委员会的运用与性质；（五）必须首先由一厂一业为中心做起，直到各厂各业的同盟罢工；（六）在斗争中必须要与城市贫民以及工农斗争取得适当的配合。

(b) 如怎样组织地方暴动？（一）必须制出农民尤其是灾民群众的斗争纲领，经常的宣传鼓动；（二）必须根据农民当前迫切的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鼓动其斗争；（三）在斗争中加紧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尤其是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四）在斗争中建立加强农民的组织，如农协、农委、灾民团等，尤其是农民的武装组织，如少年先锋队、赤卫队、游击队、灾民队，借以发动其游击直至暴动；（五）农协、农委中必以雇农贫农为中心，中农是我们坚固的同盟者，在政治上组织上反对富农，建立雇农独立的组织并加入农协、农委，提出雇农特殊利益的要求并使之与工会发生直接密切的关系，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六）在斗争中必须与城市工人兵士等取得适当的配合。

(c) 如怎样组织兵变？（一）制〔定〕出兵士的斗争纲领，经常宣传鼓动；（二）根据兵士迫切的要求以发动其斗争；（三）用由士兵群众的“骚动”与“鼓噪”方式，以提高其情绪与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其斗争；（四）士兵中的组织经常要以党的组织为基础（运用拜把子弟兄会）以征〔争〕取其群众，在斗争中宣传和组织士兵委员会并争得公开的存在，兵变时应以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领导（武暴时是以工农兵等组织的代表所产生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领导）；（五）在斗争中加紧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鼓动，尤其是红军的生活与土地革命；（六）同时并讨论了兵变的条件，并指出有计划地兵变，不一定要机械的工农斗争的配合，可以以单独的兵变用以尽量发动游击以促进工农斗争的高涨。

(d) 如怎样建立红军？（一）必须在斗争中，在游击中、地暴兵变中去建红军，（二）必须征（争）取游击队中兵士中贫苦的英勇的工农分子为红军基础与中心力量……在全会讨论这些问题时，占的时间最多，当时认为这是大会的最大成功。

（4）在组织问题的讨论上，指出要实现以上这些一切，只有在实际工作与斗争中改造旧的组织，创造新的组织，向产业工人雇农贫农开门，以根本改造党的基础，健全地方党部，建立支部生活，配〔培〕养新的工农干部等。

（5）在宣传工作的讨论上，指出过去的虚浮与日常斗争的不能联系，特别是扩大政治宣传与日常斗争的联系，除必须组织口头的宣传队每一个同学都是组织者宣传者外，必须要办党报、工厂小报、农村小报、学校墙报，以及一切浅近的宣传品等。

（6）在对团的工作指示讨论上，特别指出过去的第〔二〕党化与政治清谈，指出必须在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之下征〔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实行转变，要特别注意青年群众特殊利益的要求与发动其独立的斗争，与党取得适当的配合，并在工作方法上必须要群众化青年化。

〔会议〕并选出了正式省委，通过了告同志书、全会的决议与精神。

全会共开了七日七夜，到会者十一人，概皆精神奋发毫不倦怠，可算大会的成功。其最大弱点也是当时大会所指出的，没有制〔定〕出工农兵等群众斗争的纲领。同时我^⑥个人当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对于以上策略路线问题的讨论上觉得不免有些离开现实的具体事实，多系假设的书生式的欲求了解的推敲，尤其是当时全会的讨论上有个一贯的认识，无论在政治形势上、策略路线上，都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认为只有以政治的号召才能征〔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以为这些已是立三路线在陕西五次扩大会上就有了他的主要成分。虽然它有这些缺点，但却〔确〕实是陕西党由右倾机会主义转到“较〔矫〕枉过正”的一个转变的关键，直到现在我个人以及省委还是认为当时的一切决定还是一般的正确的。这个是否对的，还要求中央有所指示，因为这在陕西党的认识上，今后工作上，还有很大的关系呢。所以我不怕中央的讨厌把这些一切主要的都写出来了。

最后，对于各地工作的讨论与布置问题，因为当时环境的不允许，交诸新省委去执行，在大会闭幕的后一天，即决（定）西（安）市由我兼负，并组织市委，汉南派杨子才^⑥去（现在开除）。特别讨论了陕北的工作，因为陕北当时客观形势与党的主观力量，都有发动游击的可能，即决定以绥、米为中心在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之下，配合横、佳的灾民，并与延安、榆林的军事工作取得配合以发动陕北的游击，拟派张文华（省执委）、赵伯平（省委候补）前去。同时三原的游击战争正发动起来了，并决定常委（王林）前去巡视，但巡视员到三原之时，即系游击失败之时，巡视员几乎吃了弹丸之苦（这经过与教训省委以前已有详细报（告）此刻不赘）。至于其他的决议与各地派人问题因为人力财力的关系，还都没有草就印出，派往陕北、汉南的人也还没有出发（此时距大会有两、三个礼拜），而六月十二号的政治任务决议回来了，看了之后上边的一切都完全推翻扯了。这是自陕西党五次扩大会到接到“新潮”的一个重要阶段（七月至八月），不能不报告。以下是：

2. 立三主义在陕西的实际运用与危害（八月到十一月）

政治任务的决定：看到了“新潮”之后（“新潮”是陕西派来中央的交通黄平带回来的），并经过与黄同学的谈话（中央当时给黄同学说，要陕西布置汉南渭华的工作，以配合武汉的取得），省委一般同学的呼声：糟糕，五次全会是反右倾反机会主义之下完成的，结果还是右倾，陕西的党真个落后，总是陷于机会主义之泥坑中不能自拔。现在怎么办呢？人力财力环境都不可能再开大会，即由现在的省委决定执行，认为五次大会对于政治形势估计的不足，策略路线当然也不免右倾，完全推翻了五次大会的一切决定，重新根据“新潮”起草陕西的政治任务决议，以代替五次会的一切决议，并发一告同志书，指斥五次大会的右倾。这一陕西政治任务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认为五次大会对于全国革（命）形势估计得不足，以为现在夺取武汉，建立一省或数省革命政权的胜利即在目前，武汉以（一）夺得即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陕西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之下，更加以直接不断的全国军阀大混战加工制造的浩大灾荒，革命形势与全国一样的即在目前，（这时距五次大会只两三礼拜，陕西主要的客观形势与党的主观力量并没有什么变更）

尤其是指斥五次大会的所谓“例外”同时以为要保障武汉一省或数省革命政权的胜利，必须陕西也要与武汉取得适当的配合。

（二）因此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不只是去准备武装暴动——我们以前对准备武装暴动是指在斗争上，组织上去准备。现在还要有人力地利以及技术上、武装上的布置，即以布置西安、渭华、蓝田（东接豫鄂）汉南（南通汉水可直达武汉）来配合武汉的取得，尤其是要以陕北成为首先胜利之区，藉以促进全陕的革命高潮，来配合全国的革命胜利。

（三）党的中心任务与全国并无二致，是在反军阀混战、反资本进攻、土革、拥苏、反帝，武装拥护苏联之下，来实现政罢、地暴、士兵的哗变。接到通知后，又以兵暴为中心，直到武装暴动建立西北的苏维埃等。

这一决议书记起草后省委的同学一看说没有什么意见，结果就算通过，“新潮”省委根本也就没有讨论。这些一切的决定当然是跟上中央跑，离开陕西当前的具体事实，革命力量的对比——有组织的群众斗争与领导，以及陕（西）群众斗争经验的缺乏阶级意识政治觉悟不够等，即准备布置陕西的暴动。其实拿什布置呢？不过只是空的决定罢了（团也一样推翻了他们五次扩大会的一切决定重新起草了决议）。

实际工作的执行：（一）西市：西市市委在省委直接指导之下通过了西市的工作决议与工作计划。其决议的内容，分析了西市的政治经济状况与群斗形势，决定了西市党的中心任务（反混战、反资本进攻、反白色恐怖等）与策略路线（政罢、兵暴以至武装暴动等）。在中心与工作方面，要（在）工人中建立修械局、电报、汽车、省印局等的工作；士兵中要动员全体党团员打破同学们以为冯玉祥部队没有办法的观念，利用各种机会、社会关系建立老冯中心部队中的工作；农民要建立西市市郊的工作以便与城市工作取得适当的配合；以及特别注意建立城市贫民的工作等。在组织工作方面不外要健全市委建立支部生活，提拔干部。在宣传工作方面，不外扩大党的政宣工作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除口头宣传外，要办工厂小报、学校墙报与提高同学的政治水平等。在兵士中除找旧线索（因为西市当时警生中有一位旧同学）以建立兵士工作外，其方法亦多如上述。在市郊方面，把市郊划为四个中心区域，用社会关系、旧

同学的线索与派人巡视以谋建立。学校支部概皆改作街道支部，使之与城市贫民、兵士等接近，并以中山大学为中心要在一月内建立起支部。中学也同样大同小异的拟议了另一决议与计划。

当时省委的“九一”“九七”^⑦通告通过了，其中心是在秋收斗争路线之下反帝反混战，组织各地的政治示威，直至政罢、地暴、兵暴等。是动员全党团（团也有同样的通告）由支部直到每个党团员都要动员起来到群众中去。事前由大小政治经〔济〕斗争做起，一直汇合到九七，到九七要举行政治示威，同时经过“九·一六”^⑧直汇合到十月革命、广暴，以建立西北的苏维埃政权。要在九七工作中，必须建立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尤其是反帝大同盟。特别要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因为只有克服右倾才能实现这些决定。当时西市即组织了行委（在九七前二礼拜）根据这一通告执行，首先在行委在支部中讨论这一通告时，一般同学的呼声都是说这是空喊！放大炮！因为我们在西市中大同学不过二十余人，既多不很活动，且三个、两个、一个零星分布于各处，群众组织一个也没有，且白色恐怖异常压迫，一动便要毒杀拘禁。当时我们的答复当然是说这是同学的右倾，花言巧语百般地说服并□□西安过去群斗高涨的事实来证明，极端反对同学把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薄弱对立的观念，用立三的话，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下发动群斗在一日或一礼拜就能使党成为群众的党，就能组织起广大的群众，并加以只有用广大群众斗争的力量，才能打破极残酷的白色恐怖。这时工作的布置上，在工人方面是以省印局为中心，因为该局正在我们同学领导之下酝酿要面吃、要欠薪、反对开除工人的斗争。学校是以市中、一中为中心，该两校内有团员各在三四人之多，先由这几个地方首先发动，由支部决定猛烈的加紧口头的文字的宣传鼓动，组织宣传队，粉笔队，与利用学校的墙报。在省印工中的工厂小报，加紧从事鼓动。

（省委也有九七宣言是号召政治示威的，是鼓动群〔众〕斗争起来、组织起来，但是九七的前三日才发到支部）运用群众的公开的路线加紧鼓动，以群众的立场与力量掩护我们的秘密。先由市中、一中、省印局经过群众产生筹备会、反帝大同盟，然后再藉以发动西市的筹备会以与国民党的筹备会对立，来纪念九七。并决定行委每日开会一次，行委与支书每两日接头一次，支部每日

开会或每日各别接头一次，讨论工作进行方法。（活动分子会议因为环境的不允许，没有开成一次）结果过了九一已近九七。以上这些还未如愿实现，而广仁医院工人为要求〔分〕赈款（浸礼会对该院的赈款被该院办事人私吞）的斗争酝酿，乃活跃起来了，也完全是我们同学领导的，有罢工的可能。我们即转移视线，集中力量来指导广仁医院的罢工，想以广仁医院的罢工为导火线，完成反帝反国民党的九七大示威。因为广仁医院是英帝国主义在陕举办的，内中有工人职员等五六十人之多，当时罢〔工〕的口号是赈款均分，吃饭休息时不作工，驱逐挂羊头卖狗肉的帝义走狗猴〔侯〕祥谦，打倒帝国主义等，同时更加紧发动省印局各学校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与九七联系起来，以与广仁医院的罢工取得适当地配合以完成我们的九七大示威。但这一配合还没有丝毫完成，广仁医院的罢〔工〕乃在行委一位同学指导之下（也是当时工人的情绪已到了非罢工不可）全体宣布罢工了，上自中小职员，下至门夫伙夫无不罢工，罢工的当中，军警临门不许工人自由出入，我们的政治示〔威〕既不能完成，即〔最〕决定的飞行集会决定了时间，由学校工厂……我们的同学每人拉弄〔拢〕三个五个非同学到广仁医院门口去慰问，广仁医院的同学在门口等信以便来人宣讲，以完成我们短时间的飞行集会，且皆留：〔流〕产了，最后广仁医院的罢工以工人内部的分裂与白色恐怖的极端压迫终归失败，结果7人被捕（内中四个同学）两个同学以煽动罢工捣乱后方的罪名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我们当时对这一运动的教训，自省委以至行委直到支部主要的意见：是①准备的太迟。②工人组织的不坚强。③政治宣传鼓动的不足。④同志们的右倾不动。⑤没有更进一步的作反国民党反帝的政治斗争。⑥各种工作没有适当的配合起来。⑦以及行委指导不集中支部生活不健全等。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是最中心的重大原因这一运动的所以失败，还是立三主义之根本错误，因为当时是不顾客观的环境与主观的力量，总的精神是以政治号召，始终是以做到政治示威为〔目〕标的，不能能发能收的以胜利为前提。（这一经过我们详细说来未免太多，以后有暇或可作一篇文字。）这是立三主义在陕西实际的运用与危害之一。

（二）蓝田：……省委在蓝田作讨论会上即一致地认为：

（1）蓝田的政治经济的危机，群众生活的恶化，与群斗形势，同灾区是一

样的是日益加深与开展。而其斗争最大的弱点即为豪绅富农所领导。因此：

(2) 只有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尤其苏维埃的宣传以及苏区工农兵生活的对比，加紧反捐税反豪绅团联系到反混战直到土地革命。

(3) 在斗争中必须加紧反右倾与富农路线，特别提出群众自己切身利益的要求，与建立加强群众自己的组织。但是这些（群众要求与群众组织）因为来人的报告不切实具体，省委仍多是一般的决定，其再具体点的由当地地方党部按其实际情形决定。

(4) 对于豪绅团、红枪会是派人打入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

(5) 当时把蓝田划为三区（中区——党员四五人、团员二三人；南区——团员二人；东区——团员五六人党员一人）以南区为中心，发动游击，同时加紧中东两区以及张子厚部队中的工作（该部队当时有党员一二人）以与南区配合。蓝田外，省委再加紧渭华（党团员共 20 人左右）工作的指导以配〔合〕蓝田，完成省委所谓由此配合武汉的胜利。

(6) 并决定蓝田在西市住学校的学生同学（共三四人）不要来校上课（因为此时是暑假末期）与当地党团自县委^⑨到支部都要动员起来，于必要时省委派人巡视或专员指导。

这一决定即由当地来人带回，并口其更要当地地方党部按照这一决定再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与决议马上动员全党团员执行。

蓝田因为七八月间党团的五次扩大会都在蓝田举行，会后，党团都有一度的巡视，同学的情绪还算渐渐振作起来了，对于蓝田当地的斗争也有点注意，及接到省委这一决定讨论之后，便加紧工作了，但以南区为中心。南区只有两个团员（一是齐振国半地主式的富农，并为当地绅事〔士〕之一，一是白耀清〔庭〕，西安一中的学生）同时南区斗争已在紧张了，地方党部即决定当地团的书记与两个党员（一知识分子，一农民）并协同由西安回去的白耀清〔庭〕，分头部署南区斗争中心的地域去领导组织群众。但是外来品的学生子，他们不埋头到群众中去工作，乃由齐振国的介绍，都去民团中灰色起来，幻想枪杆的夺得与欲利用转变民团或红枪会的力量，作为我们的游击队或赤卫军，空喊群

众斗争起来组织起来，不但来提出群众实际的具体要求与我们的政治宣传联系起来加紧宣传鼓动，实际的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不（还）跟上群众的尾巴跑，被豪绅富农的意识所支配。在决斗中而有什么援助被难之家，赔偿被拉票人之一切财物等的口号，虽然广大的群众（千余人之多）直接行动武装冲突，赶走了行团王老九与土匪唐靖^⑥，并杀死了团丁伙匪至数十人之多，使行团王老九直到现在还不肯率其部队（还有武装团丁百余人）到当地苛派。但群众我们得到的什么？我们的影响如何？群众虽然赶走了行团王老九，仍受其他豪团的剥削。

（三）他如三原，自七八月间游击战争失败后，同学逃跑的逃跑，不跑的多消沉，虽经省委一度的巡视始终没有恢复起来。渭华且巡视过两次，工作始终也没有丝毫进展，巡视员来了讨论、谈话，巡视员走了就完事了，既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领导的斗争，即内部会议也不能按期举行，支部生活可说没有。西路（灾区）因为省委当时集中力量建立东路的工作，以口所谓与武汉配合，因此西路的工作见（简）直可以说完全忽视，虽然在这个阶段曾有过一次西路的巡视与西路来人的工作讨论，实际上也没有丝毫实现。蒲城派了黄平（留莫学生）曹寿趾二人才去整顿，汉南也只是派三十一人（杨子才）去工作，与来人口的一度工作讨论的决定带回。陕北派去了赵伯平与寄去了立三主义的指示信以补五次大会后对陕北工作决定的不足，后不久陕北便直属北方局了。

（四）士兵工作：除陕北军队中当时有士兵同学二百余人，不久已直属北方区（局）外，在（关）中道西市警生中才找到一位旧的同学。三原马鸿宾的部队中有三四个同学成立一军支，蓝田张子厚部队中有一二同志，还没有接上头。西路甄寿珊土匪部队中有五六个同学，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才开始建立了军支。虽然此时各部队的士兵不断自发的哗变开差逃跑，但是我们此刻并没有什么如（任）何的影与领导，只马鸿宾在同州的部队中我们几位同学口准口发兵变，但被敌人侦悉，结果一被捕，其他逃跑。

（五）省委本身工作与各科各委工作。省委的分工：后补执委二人：——焦仲明省委秘书长，——赵伯平派往陕北工作；执委一（二）人——张文华当时在家中活动，不派去陕北工作，——陈征（留莫学生）兼后补常委，负军委与市委宣传，很消极。省常委三人，——杜振庭书记兼组织，——王子云宣传

兼党报，——吉国桢市委书记兼织委。常委下织委三人，军委三人，党报委员会三人，组织部三人，宣传部三人，秘科二人兼交通发行、印刷等，都是以上四五人倒来复去的兼着，没有可能提拔下级干部来参加，只党报委员会中有市委委员张国藩来参与其工作。

在政治上除了发行立三路线的空韵陕西政治任务决议外，有八一、九七通告，九七宣言（二百份），九一六的传单（二百份）。因为人力财力的缺乏，既印的少又发出得很迟（八一通告与九七通告等到八月末才同时发出，到了各地概多过期失了时效）。反混战、苏运也做得很不充分，除空喊外没有什么，即这种空喊不但没有深入群众且没有深入到支部与一般党团中去。最重要的五次大会所决定的工农兵斗争纲领都没有完成。

省委在这一个多月（九十月）是集中力量办党报（西北红旗）共出了四期，主要的内容是：社评，群众斗争的叙述，中心策略的解释，反右倾反机义与富农路线，转载地方通讯等。

这时候冯军的前线不利，后方正在危机的时候，更加以东南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与发现了我们九月间发散的宣言传单等，因以特别提防我们的活动，早给各机关各学校工厂等办事人有秘〔密〕令（我们当时也已探悉）是说长沙苏维埃政府给陕西共党有令，叫在西北组织苏维埃政府捣乱后方，要各方检查……并加派密探三百余人各处侦查，而团的省委书记薛永寿乃为侦探旗〔郗〕清贵在南院门拘获了（十月八日）。薛被捕的时候，省委以及党团任何同学都不知道，未及避开，于薛被捕的两日之后，双十节的晚上十二点钟便多同时被捕了。（党省委吉，市委马、陈等，团省委贾，市委王等）还有几个支部同学，数日之内，西安以至各地便拘捕二十余人之多，且多系各级党团部的负责人，而不断的全陕还到处拘捕，拘捕的二十余人其中幼稚的受了极残酷的毒打后又在东拉西扯，尤其是反动当局特别搜查西市，省委留省者一二人及秘〔书〕科既无钱搬家，又无处寄身，概皆逃跑了。多未经过斗争的陕西的党各级党部受了这点小小的打击，便多裹足不前了，直到一个月之后（十一月末）杨虎城入关，冯军出走（狱中新旧被捕的三十余人此时也多破狱而出）省市委本身才组织起来。

3. 三中全会以后到四中全会（由十一月到今年二月）陕西党工作上的转变

临时省委自十一月到十二月整个一月的工作状况

（1）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杨虎城入关，冯军的主要部队已完全出陕。匪首姚振乾、甄寿珊均被老杨枪决，正在庆祝讨遂胜利，中国统一了，喧喊传播改良欺骗的治陕八大政策。

（2）在我们方面自省委以至各地概由坍台的情况之下才开始（恢）复组织以准备实行工作上的重新布置与转变，而人力财力更不如以前。因为此时北方（局）正开扩大会议，陕西的代表团（常委杜^①、王^②，与团一位同学杨^③）已去北方（局）参加扩大会议，勉强成立了临时省常委，一切的工作皆交给临时省常委三人负责。一吉^④书记，一张^⑤常委兼党报编辑，一张^⑥常委兼市委书记，与前来中央的交通陈^⑦负军委书记，又吸收一人周^⑧并省委书记参加组织了军委，后以陈闹的一塌糊涂，取消了军委与陈的军委书记，由常委兼。财力方面前一时期还有黄由中央带回来的五六百元，除还了一部分帐外还有一点，能以勉强支持，此刻虽陈回来带了二三百元，除四五十元西北银行的票子瞎了不能用之外，余下的钱还一部分债，其余的且不足代表团北上时的路费，代表团走时临时省委一钱无有，完全藉借贷度日，机关只有秘书处的一个，常委、军委、市委的同学既无处寄身，无钱吃饭又无开会之地，今日住旅馆，明日找饭吃寻宿处，一月来完全成了一种游牧生活。更加监狱新旧出来的同学，在西安者十余人，与各地先后来西安的同学（多系以前在冯部队与土匪中作军匪运动的同学）二十余人之多，都向省委要饭吃、要住处、要工作，同时国民党还正在加派新旧侦探通缉拘寻他们所谓破狱而出的暴徒分子与匪犯，（当时被拘者有冯一（异）生、李〇〇，李后由我们活动保出，冯现在还被押着）临时省委在这样情形之下既自顾不暇还要给这些同学想办法，（当然只能给一部分较好的没办法的同学设法）维持其生活与给以政治上工作上的教育。

（3）临时省常委在政治上虽知道三中全会开过了，但未得到中央或国际任何一字的文件与指示，回到陕西的交通陈在报告这一问题时不数分钟就完了，只说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中央过去的策略路线部分的错了，就是不布置暴

动了，以前是以兵士暴动为中心，现在仍以革命兵变为中心，但仍不能取消了兵暴，其他的策略路线还是与以前一样的。我们问中央对陕西有何指示呢？只答说陕西既无群众组织又无游击拿什么布置暴动呢？笑话！不过陈回来还带的有北方局的一件指示信，但其内容中心仍与以前没有如〔何〕分别，只有一点就是说明要加紧发动领〔导〕群众的斗争与建立加强其组织。这就是当时陕西临〔时〕省常委，对于三中全会所了解的一般的笼统的一个概念。

（4）临时省常委就是在以上这样的陕西政治形势与党的坍台无组织无钱少人以及对党的策略路线模糊的概念之下，来开始〔恢〕复组织实行工作上的重新布置与转变，通过了今后一月的工作计划。

代表团回来以后工作上的转变

三次全会。代表团是十二月末回陕的，当时回陕的是社、高（高是北方局新派来的，前去的王他调），二人到陕后我们即马上召集了省委的三次全会，参加者除临时省委三人外有杜、高、秘书长焦^⑩，并中学同学一人。全会的议程：

- （1）三中全会与北方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与精神的报告及讨论（由高报告）。
- （2）代表团与北方局解决陕工的经过和决定的报告及讨论（由杜报告）。
- （3）临时省委一月来的工作报告及批评（由吉报告）。

最后一项的情形，我在上边临时省委一月来的工作回顾上已经说到，此处不提。至上两行〔项〕的报告后，皆没有如何深刻的讨论，尤其是在第一项，高同志的报告是传达三中全会与北方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与决议的报告之后，同志们概多无言发表，虽经代〔表〕团一再声说〔明〕说我们这是省委，陕西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这种精神太不行，但是同志们还是没有整个意见的发表，只说许多文件还没有看，只是提问题，说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到底如何？有些什么事实？中国革命到底怎样转变？……这样已十足证明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更是证明陕西过去工作的虚浮与同学政治理论水平的低微，尤其是不能与实际工作的联系了。经过以上几个问题彼此解答之后，只是讨论到立三路线的责任问题（这时我们已经得到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与国际七月的各种决议^⑪及十一月来信和中央“二五”^⑫的决议），说六月十一日的决议绝不能委之于立三同志个人，这是中央通过的，且四大城市的布置暴动，以及以后的各种决议

都是经过中央发表的，是中央整个的错误云云，但对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中央“二五”的补充决议概无异议（议），当然都一致地接受了“二五”补充决议拥护三中全会的了。在讨论第二项报告的时候，固然同学们还都有相当的发言，但是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否认了一切，说陕西的党过去的工作完全没有，陕西党实等于零，完全只是省委三数人的空喊跟上中央跑，中央错了“草上之风必压”还要更厉害些，也没有什么讨论的，这样的不能深刻地回顾自己过去的一切错误且埋藏了一种消极怠工悲观的危险，虽经当时一二同学指出这错误的危险，但是事实上始终没有克服这一危险，以后的事实更充分地证明了，你不干，我要出关，实际工作中“吊儿浪荡”，这就是当时省委三（次）全会精神！

最后全会通过了年关斗争的工作计划与对今后实际执行的决定和分工，杜仍书记兼党报编辑，高常委兼军委、吉常委兼组织，张^②仍执委兼市委书记，执委张^③协同李艮回渭南建立当地的工作，党报马上转变并改变方式，今后即根据三中全会的各种决议、“二五”补充决议，国际来信，以及河北省委对陕工的决定（当时还未带回以后也始终未寄到）等的精神之下巡视几个中心党部来实现年关斗争的工作计划。

年关斗争的计划是根据河北省委的年关斗争纲领决定的，其内容还不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想只报告这些空的内容没有必要，下边我只简单说明这一计划的实际执行如何，因为以后的工作多根据这一计划去做的。

（一）党报是有转变的，但其缺点还多得很，我已带来的有三份，中央一看便明白，想亦不必多赘。

（二）渭南工作张、李^④二人才去设法建立，也没有什么报告的。

（三）西市在省委直接指导之下，在实际工作中却有相当的转变，因为当时省印局的工人正在酝酿着每月增加工资七元的斗争。厂方不能增加工资七元，已由一元允许到二元，但是工人还是坚持着，工人说局长不允许，工人要罢工。厂方一方威吓，一方厂方又由二元增加到三元，部分的群众已经说算了，这样就算我们胜利了。虽然我们时时向工人说非有组织不行，但还没有引起工人的这一积极行动任何的表现。事后更领导工人在厂内开同车〔间〕大会，庆祝他

们这一斗争的胜利，并在大会上说明我们（指工人）这一次所以没有得到完全胜利，就是因为全体工人没有组织起来。会场上还有提出工人自治会的决定，但是加入者，还不过以排字班为中心的二十人左右，我们当时对这一工人自治会的估计，想把它看成一种赤色工会的作用，因为里边概多积极勇敢的分子，若做到全厂工人都能参加这一自治会，那么这就是工厂委员会了（这一斗争是在十二月与一月之间，正是年关的当〔儿〕）。这是年关斗争中西市我们领导的一种斗争。其经过我带来的《西北红旗》上登载的有。

（四）互济会工作。（略）

（五）巡视工作当时决定我到南路蓝田巡视，高到河北三原、富平、渭南、蒲城巡视。我已出发，高尚未启程，而中央的紧急通告^⑦，反立三路线的讨论大纲，告同志书等接到了，即马上停止了巡视（因为巡视还是根据二五的补充决议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去建立各地的工作的）准备省委的四次全会。

（六）在未开四次全会前省委曾接到全总党团^⑧的决议，并有来人王某到西安，当时省常委对这一决议的态度，认为是一种右倾小组织的活动，其决议内容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其总的精神多完全是一种惩办制度要开除立三以及立三主义的执行者某某数人，且在组织上省常委认〔为〕铁总党团^⑨决不能来同各级省委发生直接上的关系，而来人王某所带来的介绍信又是张金印以个人名义写的，因此便否决了这一决议并拒绝了与来人王某的接洽，但最后又来了河北紧急筹备处的决议，当时决定交到四〔次〕全会上讨论，但在事实上省常委已经接受了筹备处的精神了。

第四次全会

四次全会是在一月开的，到会者除省委五人外，有两个地方党部的书记——蒲城黄^⑩——渭华李^⑪，并团员三人。全会共开了三日三夜，其精〔神〕都算不错。全会主要的议程是：

- （1）接受国际来信与反对立三路线及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
- （2）目前陕西的工作决议。
- （3）对远东局的建议。

在这三项的讨论中都有很剧烈的争论。在第一项主要的争论是立三主义的实质问题，一部分意见说立三主义的实质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理由是如：①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②革命转变问题，③如叫苏联□□直接出兵帮助中国革命，……总之是左的空喊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另一部分意见以为这是不对的，不能说立三主义实质上完全是“托义”因为①立三对中国经济分析与托不同，②革命性质与托不同，③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策略路线等都与托不同。只能说他是含有反马克思反列宁主义的立三主义，最后决议案上还是取了后一种议案这还算对的。在第二项的讨论中更为起劲，一种意见说陕西群众斗争的形势仍是新的高涨的形势，虽然没有以前的斗争事实多，其理由我在第一大项“陕西政治经济状况与群众斗争形势”的报告中已经说过。另一种不同的意见（张文华、李艮）〔认为〕是低落的或者是活跃的，因为灾荒比较减轻了，以及群众的落后意识、黄色倾向、合法观念、大的斗争的事实并不见得多，有之且多系豪绅富农领导的多。最后通过了上一种意见，但是张^②、李是始〔终〕反对的，张子平在实质上也是同意后一种意见，因此认〔为〕陕西四〔次〕全会的议案还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在第三项的争论中是以中央完全破产（是指六月十一到紧急通告这阶段），当时的讨论是以紧急通告为中心，一部分意见（仍是张、李二人）说不能得到这个结论的，因为紧〔急〕通告已经是〔决〕坚决的反对立〔三〕〔主〕义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上一种意见对后一种意见的反驳以为虽然如此，但过去的中央在客观上已不能领导全党，因此就通过了上一种意见，成立了反对中央、参加筹备处、召集紧急会议的对远东局的建议。

最后关于省委的改组问题，你不干，他又不对，我要出关，又争论了个不亦乐乎，结果省常委仍旧，执委另选了黄代替张，张仍执委兼市委书记，并选举了高同学〔为〕参加紧急会议的代表，拟马上北上。

但是以上的这些决定怎样执行呢？省委到了西安后，既无钱吃饭又无钱交房租，要北上参加筹备处紧急会议的人路费也丝毫还没有着落，都正在设法活动中，而扩大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得到了（见《实话》日报第5期），省常委便马上召集会议讨论，当时虽然还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最后总是完全同意拥护四

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了。并决定发一告同志书，指斥四〔次〕全会对东方（远东）局建议的错误，而对于上两种决议还认为一般的是正确的。决定之后，翌日我即起程赴河北省委了（时在二月中旬）。

以上这些许许多多自陕西党去年七月间第五次扩大会经过立三主义在陕西的空喊运用，直到现在□□□这都是陕西党过去半年来的工作考核。

注：①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一文中简称“新潮”。

②即《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一九三〇年六月）（有的本子写为七月或七月二十三日通过。此处根据中宣部党史资料3）。

③即《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一九三〇年十月）（有的本子写为十一月，此处根据中宣部党史资料3）。

④即一九二七年。

⑤即吉国桢。

⑥即梁益堂。

⑦根据本文后面的文字是“八一”、“九七”通告。九一不是纪念日，“九七”是一九年九月七日辛丑条约签约的日子。

⑧按应为九月十七日。冯玉祥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从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于绥远（今内蒙）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战争。

⑨蓝田当时是特别支部。

⑩根据齐振国、林之屏等人的回忆，这次蓝田南区的暴动即蓝桥暴动。当时直接打击的是刘汉三匪营，在消灭了刘匪后，吓跑了团匪王老九。

⑪即杜衡。

⑫即王林。

⑬即杨珊。

⑭⑮即张文华。

⑯即张国藩。

⑰即陈云樵。

⑱待查。

⑲即高维翰。

⑳即焦维炽。

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

㉒即李良（愚痴）。

㉓即一九三〇年九十六号通告。

㉔㉕均系罗章龙派别组织。

㉖即黄平。

*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省委第四次全会派常委吉国桢到中央汇报工作时，吉在四月二十日写得比较详尽的工作报告。原标题是《陕西的政治经济情况与群众斗争。陕西党过去工作的考核和目前现象的报告》，全文约四万多字，本文节录其中第二部分。

吉国桢，陕西华县人，曾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省委临时常委会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二年七月在郑州被捕，八月二十日英勇就义。

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节录）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陕西省委：

中央检阅了你们寄来的文件，并同你们派来的吉、黄两同志^①详细讨论之后，对于你们那里的争论与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一、中央认为你们四次全会的决议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们这决议是根据于不正确的三中全会的调和决议而成立的。你们那决议，同三中全会的决议一样，对立三主义同样的采取了调和态度，同样的没有给立三主义以严重打击。只是因为你们没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解释你们对于四中全会及非常委员会动摇不定的态度。你们的六次全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还是不正确的。这种严重的政治上的动摇，决不能单拿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错误的组织观念来解释，这种动摇只能拿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来解释，才能合于事实真相。对于你们过去所犯的严重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希望你们有深刻的了解。

二、同时中央必须指出李艮、张子萍^②、刘映胜三同志所提出决议案，也是不正确的。这决议案很明确地表示出这些同志对于陕西革命的形势有了右倾的估计。这些同志太夸大了陕西灾荒的略略减轻的作用，太相信了杨虎城的改良欺骗作用，以至自己上了他的大当，说革命形势低落，反对尽量发展罢工运动，反对在群众斗争中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骚动围绕中心城市，主张总任务是注意群众的落后意识，利用群众的合法观念等等。无疑的，这决议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同志结果还是接受了右派的政纲，对目前陕西的革命工作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陕西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中央认为你们根据于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成立的六次全会的决议，一般的是正确的，但中央必须指出你们对于陕省委四次全会决议的错误估计。同时，

中央还要指出，你们在六次全会的决议上，没有抓着你们工作的重心。陕西党目前的工作重心，不是在空谈革命高涨的程度，而是在加紧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党的群众基础。李艮、张子萍等的错误，并不在他们主张加紧对于日常斗争的领导以走向政治罢工与暴动，而是在他们根本否认党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去走向政治罢工与暴动的可能，于是根本对于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拒绝领导。他们虽是嘴上也说到领导日常斗争联系到最后的出路等等，但是他们的消极怠工，完全表示出他们实际上是不愿领导这种斗争的。在陕西党中工人成分少到极度，工会工作完全放弃，他们虽也主张注重工会工作与吸收工人入党，但他们同时却提出加紧知识分子中的工作以取消苏区的任务。在农运中，他们以贫农团为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而放弃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提，这是将苏维埃区域的中心任务错放在非苏区的农运中间。在兵运上，提出绝对不要无前途的兵暴，这会在实际上放弃目前北方广大兵变潮流的发动和领导。这些人如若不能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必然走向罗章龙等一样的反革命路上。

四、陕西党在坚决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必须要坚决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口头上服从决议，而实际上违反决议的可耻的两面派行动。但是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陕西党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旧的工作方式，用活的领导来代替死的文字上的纸头上的领导，用经过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来代替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必须打入生产作坊农村和兵营中去，必须采纳新的工作经验，并且必须发展群众的创造能力。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空洞的不兑现的工作计划，计划必须是具体的切合于实际的。对于这种计划的执行程度，你们必须有经常的检阅。

五、你们在四全会的修正决议中说：“党的基础建筑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富农身上，无产阶级成分几等于零。指导机关完全在知识分子手中”。这的确是陕西党内最严重的现象。你们的动摇，你们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派别观念，特别是对中央领导机关引进新的成分的错误了解和反对，以及一切清谈倾向，都是同党的成分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你们在党员成分的转变上，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尽量吸收工人与雇农到党内来，并把他们的干部引进

到指导机关中来。中央认为陕西党部过去却有借口陕西落后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固然陕西没有很大的现代产业，但是，作坊工人（如西安等）和乡村无产阶级都是广大的群众，陕西党今后在几个较大的城市和主要的农业区域，必须有计划地征收这些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坚固的支部。

六、陕西是中国一个最大的灾区，加之统治阶级极残酷地剥削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们都处在奄奄待毙的地位，陕西党必须认识这种情形，坚决地组织灾民斗争，同时发动广大的农民运动，以西安为中心，开始在渭南、同州、蒲城等附近的地方组织农民委员会（以乡村为单位）与农民协会，进一步建立整个陕南工作。至于陕北工作，因地理上的关系，中央以为必须组织中心县委与山西党联在一起，关于这种变更，我们不久即将派人去实行。

七、陕西同时是一个小军阀割据的地方，士兵群众，不但受欠饷的痛苦，而且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陕西党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士兵工作的决议尽量组织士兵运动，这一工作在目前红军发展军阀战争又将爆发的时候，特别重要，最近你们必须派人打进陕西主要的部队内（如杨虎城等），同时经过种种群众的组织和线索来加紧这一工作。

八、关于各种实际工作转变（如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的方针，中央已有各种个别的决议，你们必须切实地执行。党报出两种，在现在陕西党的力量上实办不到，最好极精悍地出一种党报，主要的是真能传布到群众中去。省代表大会定在五卅前，也太仓促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有了真正的转变后再开代表会较为合适。同时中央将委托巡视员与你们当面解决一切问题，订立各种工作发展的计划，因此，现在不一一叙述了。

中 央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①即吉国桢，黄平。

②即张质平（张子平、张国藩）。

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及中心工作决议案*（节录）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

省委听了中央巡视员的报告与讨论了中央来信以后，认为六次全会的决议虽然一般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革命高涨的客观条件的分析上，还有与右倾机会主义调和的错误，对于工作的决定，也未能抓住中心；尤其是最近一切事变的发展，以前的估计更加不够，所以一致的有以下的决议：

（一）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的发展，已经转入了部分的政治危机。

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加强，使中国经济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全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工商业的衰落，使整个社会，感受着极度的不安。中国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英日美三帝国主义者在华冲突更加尖锐化的形势之下，更加分崩离析起来。广东政府的成立，已经把名义上统一全国的南京政府的招牌，打得粉碎；各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的割据局面，更是四分五裂，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固然因为最近苏维埃运动迅速的发展与红军伟大的胜利，不能爆发，但在还没有受着直接威胁的地方，部分的爆发，依然是继续不断地发生。在反动统治区域内的工人罢工运动的扩大与深入，士兵群众的革命化，不断的兵变潮流，北方到处农民自发地斗争和红枪会等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红军已经冲破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两次围剿，使苏区更加发展与巩固。这些事变的发展，使中国革命高涨的形势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在两次围剿红军，遭受严重的失败后，重新动员了大部分的军事政治力量，亲自出马，下了决一死战的决心，来进行第三次围剿计划。所以动员广大

群众反对进攻苏区与红军，拥护与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苏维埃运动是全国党目前第一等的紧急政治任务。

(二)

陕西连年灾荒，使整个社会经济呈出空前破产的形势，手工业的衰落，商业凋敝，金融紊乱，百物昂贵，生活程度奇高，尤其是农业危机的高度加深，更为严重。目前的灾荒形势，不但未曾因为麦收而减轻，反而日趋严重了。因为在灾荒中：

第一、土地极剧的集中，豪绅地主、商业资本家富农等尽量收买土地，用各种剥削方式，使土地渐次集中到了这些人手里，而广大的灾民贫农、中农失掉土地、失掉生产工具——农作器具、牲畜、种子、甚至房屋拆毁，这样使农村的阶级分化日益显明，阶级对抗的形势，日益尖锐起来。

第二、豪绅地主商业资本家富农各种方式的剥削，特别加重，尤其是高利贷的剥削更为残酷，（大加一、支麦、支秋、吃加麦、〈支秋〉、驴打滚、印子钱等）使贫农中农变成高利贷的奴隶，农民多以土地或其他不动产作抵押品换得高利贷的借贷，因为高利贷的剥削，是陕西灾荒中土地集中的另一方式。

第三、帝国主义乘着灾荒，假借慈善名义，加紧侵略，华洋义赈会、基督教、各慈善团体，在灾荒中大量收买土地，并且更进一步的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合力开办水利；以操纵农村的经济的命脉。

第四、国民党军阀为了维持其反动的统治，苛捐杂税、摊派剥削，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更要加重，最近的事实如支麦借款、水利公债，银行借款及粮赋上各种附加，设立兵站，实行征饷征草的摊派等等更加重了劳动群众的担负。

第五、农村人口的骤减，全陕人口饿死的在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农民占最大多数，现在的广大灾民依然只有饿死的前途，这样使农村生产者剧烈的减少，广大的土地荒芜起来！没有人耕种，现在各地尤其是西路各县，仍然是一片荒土，秋种依然是无人去下。

第六、今年夏季收成，只是部分的区域，广大的灾区（三原、蒲富西路等）

还是没有收成，就是有些收成的地方，也不过是更便于国民党政府豪绅地主富农的各种方式剥削，所以收成好，实际上是政府军阀豪绅地主富农的，灾荒问题对于广大的贫农中农尤其是灾民，仍然是日趋严重。

这些事实，说明陕西灾荒的严重危机，只有继续向前发展，成为陕西政治经济危机的主要推动力。凡是一切企图解释陕西灾荒因夏收已经减轻与缓和，就是说部分的减轻，也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见解，党必须要与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陕西是各小军阀的割据局面，（陕北井岳秀、汉南张飞生、张丹屏、关中苏雨生等）在这一割据的形势之下，各个军阀间的相互冲突日益加深。数月来杨虎臣（城）为要巩固自己的地盘，在西路汉南先后爆发了局部的混战，直到现在，汉南完（尚）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为要进攻红军与苏区及对付各派军阀，极力用分化的手段，分化杨的嫡系部队，收买各小军阀，使杨内部的冲突日益紧张，与各个军阀间对抗的形势更是尖锐。最近杨虎城与各个军阀在全国各派军阀的矛盾的形势之下，都在招兵买马，极力扩充实力，准备抢夺地盘的军阀混战（如最近黄河沿岸建筑工事，防备冯玉祥抢夺陕西）。这样形势在灾荒严重的陕西，财政紊乱，穷困极点，各派军阀，只有拼命搜刮压榨，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使陕西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更加恶劣，经济的恐慌，日趋严重，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日益显明起来。这一根本矛盾，杨虎臣（城）及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有丝毫的解救，只有深入剧烈。可是我们必须认识，陕西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统治阶级的改良欺骗，更是拼命加紧，最近他们在农村中组织农具借贷所，农民信用合作社及廉价收回土地的提议等等，都是企图来缓和群众革命斗争的恶毒办法。这些改良欺骗，目前在落后的群众意识中，仍保留有相当的幻想，因此，改良欺骗，还是在革命斗争中的严重敌人。

陕西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形势之下，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生活，尤其成千累万的灾民，已到极端恶劣与饥饿死亡的地步，除过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样群众的革命情绪，必然继续高涨，群众斗争只有日益发展。第一、……。第二、斗争凌（零）乱散漫没有组织。第三、斗争的方式是和平合法，（向国民党政府告状）以至最落后的土匪抢掠方式。因此党

必须领导农民群众从减租减税抗租抗税抗捐抗债分粮分赈款要饭吃等等以至武装斗争，走到开发实行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士兵的革命斗争数月来，由统治阶级的中心城市西安以至到县各部队，要饷分伙食、反官长的自发斗争以至零星逃亡与自发哗变，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但这些斗争还没有得到很好领导，哗变后的士兵，都投入土匪中去了。所以党必须领导士兵群众的分伙食要饷，反对官长等日常斗争一直到组织革命兵变与农民斗争配合，以开发革命的游击战争。工人斗争在西市部分的工人中（印刷工人）因为在阴历年关斗争中，没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没有中心领导的群众组织，没有巩固下屋统一战线，使工厂方面的改良欺骗，在工人群众中起了一时的作用。使工人斗争的形势，是没有阳历年关前后活跃了，但一般的工人群众生活还是非常恶劣，加工资、反工头、反对罚工、改良待遇的零碎斗争，还是时常发生，这一形势，使党必须要加紧建立和加强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基础与群众组织，在日常斗争的基础上，领导罢工运动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

综合以上一切现象，陕西革命运动的开展形势，已成铁一般的事实，只有站到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才能否认了这些显著的事实，曲解陕西革命运动是低落的，以实现其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但因时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陕西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群众斗争工人部分还没有冲破落盾意识与合法观念的束缚，这恰证明中央指出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是：加紧发动与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党的群众基础是完全正确的了。目前陕西党只有这样的去争取群众以执行反对进攻苏区与红军，拥护与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全国党目前党的第一等的紧急政治任务。

（三）

省委完全同意中央来信的指示，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因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所以从四次全会到六次全会的过程中，作出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四次全会虽然企图“根据”国际路线，反对立三主义与检查三中全会的错误；但在实际上不独是空谈国际路线以空谈反对立三主义，就是对于全会中

一部分已经否认陕西革命运动高涨的右倾分子，也不过是以空谈高涨与他们稍有争论。所以结果仍然是被右倾叛徒所利用，决定参加河北筹备处的活动，成了右派叛徒的俘虏。在这种精神之下，便举行了实行分裂党的五次全会，一方面赞助右派叛徒反国际反党的活动，一方面对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可耻的调和让步。这样一来，更促进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形成了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同时把一切实际工作放弃不理，更谈不上什么实际工作的转变，离国际路线简直是倒退了十万八千里，所以中央来信说：这种严重的政治上的动摇绝不能单拿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错误的组织观念来解释，这种动摇，只能拿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来解释，才能合于事实的真相是完全正确的。

特别是关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中央的指示是非常正确。张子屏、张文华、李愚痴、杨声等所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案，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影响，消极怠工右倾的知识分子与富农分子还把持着各级指导机关与支部的领导、妨碍着党的工作的进行与转变。这种危险特别在目前群众斗争日益高涨各种工作需要特别加紧的时候，更加严重。党若不能克服这一现象，绝不能谈到任何工作的转变、并且更加成为群众斗争的尾巴。所以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陕西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同时省委必须指出：

一、六次全会以至全会后，省委对于陕西革命高涨的客观条件的估计上，关于灾荒形势对右倾机会主义采用了调和态度，解释陕西灾荒已经是部分的减轻，这种说法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用以解释群众斗争和缓的见解。

二、六次全会对陕西目前最主要的实际工作没有抓紧。工作决议案，不过将四次全会决议在字面上加以修改，依然是抄写国际决议案，空喊口号，很显然的表现出还是不懂得国际路线的实际运用与四中全会的主要精神。

三、六次全会后，三个月内，陕西党的实际转变成绩从各种工作尤其是红五月运动中看来还是非常的微弱。立三路线还是统治着全党工作，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消极悲观实是党目前最严重的危机，尤其是口头上服从决议实际上执行右倾政纲的“两面派”充满党内，处处阻碍党的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在六次全会及三个月的工作过程中，党已经得到了相当的进步。坚决

地与张子屏领导下一部分同志所提出与国际路线相互对立的另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作斗争，号召全党起来反对，同时驱逐不可救药的领袖张子屏出党，省委政治领导的坚定，中心工作开始的建立，党在组织上已有发展，群众组织亦有部分的建立。红色五月运动的领导。这些现象是陕西党在反立三路线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进步。但是，这一转变还是非常微弱的，反立三路线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只是刚刚开始。在目前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之下，党必须更加深入这些斗争来完成实际工作中的真正转变。

(四)

为着上述任务，省委特规定目前中心工作如下：

(一) 加紧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的工作。省委必须领导各地动员所有的力量，执行反对围剿红军，扩大苏维埃运动，拥护苏联的紧急任务。这一任务的执行，首先要使西市蒲富几个中心地方党部配合着群众迫切利益的要求，号召工农兵士劳苦群众，尽可能的召集一村一厂一兵营一学校的群众大会，通过反对围剿红军，拥护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通电宣言决议等，以至用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操的斗争方式，以实际的深入扩大拥护苏维埃的斗争。同时必须充分的加紧宣传鼓动工作。用通俗的文字，编辑解释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的小册子，制定宣言传单标语，经常在群众中散发，在党报上或党所领导下的农村小报工厂小报学校壁报等出拥护苏政府的专号，刊载关于苏维埃运动的各种文字，最主要的党要经过支部的或党团的活动，在革命的群众及各种群众组织中成立宣传鼓动队、标语队、粉笔队，经常执行这一工作，在执行这一工作中必须坚决与藉口陕西群众意识落后只能做宣传工作不应号召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必须给不经过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只是党的命令包办的立三路线、口头服从决议而实际对这一工作消极怠工的两面派以无情的打击，使拥护苏维埃政府，能够成一真正的广大的群众运动。

(二) 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陕西灾荒日益严重的形势之下，农民斗争的发展，必须更为迅速，最主要的是灾民斗争，党必须抓紧这一特点，加强发展

农民运动，巩固党对农民斗争的领导，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为着实现这一任务，首先就要加紧西路渭北灾荒区域的灾民斗争与原富蒲渭南西安附郊几个中心农运区域内农民反抗各种方式剥削的斗争，开始在这几个地方建立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名称不拘）使其成为农民斗争的中心领导。现在蒲富已经成立了穷人会组织，在最近期内必须尽量扩大，吸收广大的贫农、雇农来参加，以建立广大的群众基础。为要加强灾民斗争的领导，省委应当集中力量在最短期内恢复和建立灾荒区的党的组织，建立灾民吃大户团等组织。对于这些工作，省委要督促三原蒲城富平西路西安渭南几个中心地方党部，规定自己的具体工作计划，定期考察工作的执行成绩。

（三）加强士兵工作，党必须加紧发动士兵群众的日常斗争，组织士兵群众的辅助组织，（如弟兄团）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积极准备和组织革命兵变，对于自发的兵变更要一刻不放松地去领导，以开发游击战争。要充分执行这一工作必须①有计划地派人打入杨虎城的骨干部队。②转变目前党在军队中的成分，士兵同志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③C. Y. 要把青年士兵工作看成主要任务之一，经常讨论青年士兵工作与派团员到敌人部队中去。④动员全党每个同志，必须作士兵工作，都要有士兵朋友，同时党动员所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如穷人会）来作士兵工作。⑤建立各级党部下士兵工作委员会的工作。⑥扩大士兵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士兵的话”必须继续出版，同时编辑通俗的宣传小册子等。

（四）加紧职工运动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西市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基础，首先在西市建立修械局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洋车夫等的辅助组织，如饭堂体育会、互助会、识字班、算术班等以至一厂一业的赤色工会。加紧蒲城盐滩工人中的工作，省委须派得力同志利用社会关系或打进工厂，开发现在还没有工作的华阴兵工厂，为明了全陕工人生活及斗争形势委托组织部制定各种调查统计表，有计划的将陕西主要工厂调查完竣，使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更能实际起来。

（五）准备八一、九七、与少共国际的工作：党准备这些纪念日工作时，必须运用红色五月的工作经验与教训，克服立三路线下不发动群众只为纪念而

纪念的工作方式，在准备工作上，必须联系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群众斗争，尽可能地成立群众性质的各种纪念日委员会，招集各厂各村的群众纪念大会以至飞行集会，示威运动，但必须反对等待群众斗争而不坚决发动群众和领导这一运动。

（六）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党的基础建立在消极悲观的右倾分子与富农身上，党的领导机关，也是操纵在这些人的手中，党根本失掉了与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因此中央特指出陕西党在党员成分的转变上，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尽量吸收工人与雇农到党内来，并把他们的干部引进到指导机关来，同时为了要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转变，先决的条件必须肃清右倾消极怠工的富农分子出党。最近省委就应派得力同志将各地党的指导机关，与支部组织重新审查，积极培养新的工农干部，引进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工作。这些工作的执行，只有加紧各地的巡视工作，转变过去的指导方式，代以活的领导，实际帮助各地在工作上转交。

（七）建立宣传鼓动工作。（1）充实党报内容，加强它在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建立发行与通信工作。（2）积极准备各纪念日的宣传品。（3）编辑各种通俗小册子。（4）经常检查各级党部，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供给各地宣传鼓动经验和方法。（5）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共产主义的教育。

（八）省委应加强对 C. Y. 的政治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帮助 C. Y. 建立各地工作，转变 C. Y. 的成分，使 C. Y. 走上青年化的道路。

（九）立即开始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工作，尤其是反托陈取消派等在群众中的欺骗活动。

（十）陕西党在坚决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决地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口头上服从决议而实际上违反决议的可耻的两面派行动。党要克服一切错误的倾向，必须在实际工作中转变旧的工作方式，建立党的具体指导，精密分工与正确的自我批评，集中火力反对目前最危险的消极不动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

（十一）省委必须根据这些工作上的决定，制出发展各种工作的具体计划，

按期检查工作执行的程度，以加紧整个工作的推动。

*本文成文时间有写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的，也有写一九三一年七月十日的：根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省委决议，应为一九三一年八月十日。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中央：

省委接到中央决议^①后，即召集省委常委，详细讨论中央决议，并根据这一决议，成立陕西工作的决议。但对于这个决议是引起了严重的争论。当时出席常委杰夫^②、励君^③、C.Y.代表一人，西市工作同志一人。决议草案是由励君起草，即根据草案讨论。除各种补充修正外，对农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估计，是发生了两个严重不同的争论。杰夫同志认为决议案中对三原、富平、蒲城、西路几个区域内农民武装斗争的政治经济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和陕西士兵中革命兵变条件已经成熟（见决议案中）的估计，是夸大的立三路线；目前的正确形势是以上几个区域内的农民武装斗争客观条件，士兵中革命兵变的客观条件都是正在酝酿成熟。但其他三个同志（厉君、C.Y.代表、西市工作同志）一致认为杰夫同志这样估计，是对于目前农民斗争与士兵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估计不足，使党对农民斗争士兵斗争的领导有束缚于日常斗争，放松以致放弃了在政治上与某几个主要部队的革命兵变^④。省委自中央巡视员走后，几个（次）对农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领导，就是铁一般的，尤其是杰夫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军委和兵委的工作，在士兵日常斗争和开拔斗争中不能革命兵变，认为革命兵变条件今天还没有成熟，还不是举行的时候，结果是形成目前到处兵士的自发哗变，零星逃亡，上山当土匪，反抗官长，算伙食帐的日常斗争，党的领导是对这一斗争形势的发展还差十万八千里的现象。这个问题共争论了两天，结果，除杰夫同志外，一致通过励君同志草案中的估计，对草案加以修正。杰夫同志根据他的估计形成具体条文，特将他的意（见）写出交中央审查。昨天（四号）正式讨论修正好的决议，出席有杰夫、励君、C.Y.市委代表二人，常委巡视员一人，结果一致通过励君修正好的决议，杰夫仍保留他的意见，但对决议其他部分是同

意的。

省委最近在这个中心的政治争论之下，发生了很严重的困难问题。因为省委只有杰夫、励君二人，而二人对主要的政治估计发生了严重的不同，必然要影响到省委的政治领导与工作进行。一时再要提拔干部补充，事实上不可能，马上无法实现。快近年关斗争，群众斗争到了吃紧关头，这样情形，无疑的影响了这些群众斗争的领导。因此，常委特别慎重提出，中央应即派得力巡视员来陕西，在中央的巡视制度之下，直接帮助常委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加强组织主要工作的领导。

请中央审查杰夫同志改正的条文与常委决议。

陕西省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注：①指中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圈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②即高维翰。

③即杜衡。

④原文如此。

*原标题为《陕省委来信》（陕1号中1号）——关于政治决议及党内斗争。

中共陕西省常委会关于目前陕西 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节录）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省委讨论了中央决议之后，完全同意。

为着要争取陕西革命运动的胜利，在中央所规定的紧急任务之下，陕西党必须立刻执行下列的中心工作：

（1）加紧扩大苏维埃运动，把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胜利的消息，尽量地散布到工农兵劳苦群众中去。关于苏维埃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群众生活，经常地用口头的或文字的深入到群众中去。在党和团领导和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如农民联合会，同心会，穷人会，同意录，学术研究会，浪涛社，学生生活社，学友会）经常招集群众会议，讨论苏维埃问题，报告苏区的一切状况，特别注意吸收由红军解散回来的陕西士兵群众与下级军官参加报告，以扩大其影响。在党报上有系统的记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消息及论文，在〔党〕领导下的群众刊物和壁报上，经常登载这些文字，引导群众热烈地来讨论苏维埃问题。把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印刷单行小本尽量发散。

省委为更有力加紧扩大这一运动，特决定在广州暴动纪念日起举行拥护苏维埃临时政府运动周。在这周的工作是和广暴纪念完全合在一起。省委和各地党部必须集中力量领导这个运动。党应联系到反日和反帝运动，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的一切斗争，经过一切群众组织号召群众大会，成立决议，发通电，写信给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如最近已有两个士兵群众组织，通过庆祝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信）。发起募捐运动，选举参观团等以深入扩大拥护苏维埃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

（2）加紧领导反帝尤其是反日运动。党要坚决反对过去放弃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脱离群众，空喊打倒反日救国会，成立反帝大同盟的立三路线。党要

在中央指出的策略与工作之下，积极参加现在已经成立的教育界反日救国会，全省学生反日救国会内，利用在托洛茨基派、国民党、反动教职员和学生反日救国会中的一切黑幕（如私吞经费，官僚腐化），一切反革命的行动（如拥护国民党，只反对日本，不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出卖学生切身利益斗争等），在群众大会中公开宣布，号召群众起来改组，把反日救国会抓取在我们党所领导之下，建立反帝运动的下层统一战线，建立工人城市贫民小商人农民兵士中的反日救国会组织，在这一公开活动路线之下，建立反帝日报或周报及各种刊物，扩大反帝宣传鼓动，在武装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心政治口号之下，加强义勇军的领导，加强群众的武装斗争。同时应加强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宣传鼓动中，亲（紧）密的联系到反国民党的斗争，反托洛茨基派及一切反革命的斗争与武装维护苏维埃的宣传鼓动。

（3）在三原，富平，蒲城，西路这些区域内的农民武装斗争已经成熟，党要特别努力集中力量领导这几个地方的农民斗争，因反抗捐税，反豪绅，反高利贷，抗粮，减租减息，日常斗争，以至分配豪绅粮食，吃大户，捣毁乡村统治（如区公所，联头等）的农民骚动。领导西路灾荒区域内灾民要饭吃，以至抢粮吃大户，武装夺回豪绅霸占的地土，房屋，财产等的群众骚动，在这些斗争与骚动中，加强农民和灾民群众的组织（三原农民联合会；蒲城穷人会，同心会，伙伴会三水抗租团，抗债团，穷人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群众的武装组织（名义不拘，只要群众喜欢叫他什么就叫什么）加紧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的宣传鼓动口号，以团结广泛的灾民与贫农，雇农，苦力，以及中农群众，在这些口号的周围。在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同时我们党更加艰苦的耐心地在日常斗争中、宣传鼓动中，运用农民的政治经验，给农民群众解释：靠共产党来干是不够的，靠红军苏维埃政府打到这里来是不够的；必须自动的有决心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学习湘、鄂、贡（赣）等省农民群众的榜样，推翻了豪绅地主以及国民党军阀杨虎城的统治后，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后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直至开发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部分苏区的道路，特别重要的是省委应在最近派一得力同志到陕北游击队去，使他们的游击区域更能扩大到关中道交界与三水，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

使苏维埃运动在陕西更能很迅速地扩大和发展起来。同时党员青年团员和农民的先进分子组织赤色先锋队，在群众武装起核心领导作用，现在群众武装组织尚未成立时，即可首先成立赤色先锋队推动群众武装组织的建立。

(4) 特别要加紧组织革命兵变的工作，首先要加紧西路军队中的工作，使这部队中的兵士，举行革命的哗变，与西路农民和灾民斗争配合起来，开发游击战争。加强西安同州等地的士兵工作，以与蒲城同州一带的农民斗争配合。同时要加紧农民运动成熟区域内的豪绅武装组织民团和原始式的武装组织，红枪会，土匪中的工作，以与这些区域农民斗争配合。自然，党进行这个工作，绝对不能丝毫忽略士兵日常斗争的领导。只有加强日常斗争的领导，加紧扩大工农红军与革命兵变的宣传鼓动，使士兵群众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同时特别要注意建立党在士兵群众中的基础，转变军官路线，建立和加强革命士兵委员会组织，加紧扩大工农红军，才能执行这个迫切而且严重的工作。

(5) 加紧建立中心产业工人中的工作。目前首先分配积极干部在西安修械局，华阴潼关兵工厂，用各种关系打入工人群众中去（如小贩，当工人等），建立产业工人中的党的支部，以及兄弟会，读书班等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同时对印刷工人中的旧有的组织，绝对不能放弃，重新吸收积极的新份子，到党内来，以巩固党在印刷工人中的基础。

(6) 要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加强和巩固党的组织，目前最严重的是各种指导机关的动摇，尤其是地方党部干部的恐慌到了极点，没有一个健全的支部，党在工人群众中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支部。因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更是党目前最主要的死敌。根据这些现象，党必须首先要巩固中心地方党部的领导。三原、富平、蒲城，建立巡视制度，开办训练班，提拔和培养新干部，建立中心产业支部，以加强党的无产阶级领导基础。只有尽量发展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自我批评，建立个别负责制，定期检查工作，才能克服右倾机会主义与立三路线的残余，使党才能走到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有整个实际的转变。

(7) 积极帮助青年团的转变。青年团在数月以来青年运动虽有相当的进步，但这些进步是非常微弱，青年团与广大的青年群众还是隔绝起来。团的基础还

是在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身上；在工人、店员、学徒中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进行；组织上的发展也很缓慢，所以党目前必须特别注意帮助青年团市委在西安的工作，建立几个地方团部的工作和领导，而最主要的是要经常指导青年运动的策略，使青年团能够有真正的青年群众工作，以加强团的转变。

省委十二月七日

*这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省委常委会根据中央《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所作的决议。原标题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

中共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节录）

——关于陕西游击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

中央：

现在陕西有我们领导下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现在名义是反帝同盟军，党预备转变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将经过情形及省委的指示与计划详细报告：

这个部队的中心力量，是过去山西的游击队，当红军二十四军行动向陕西发展时，山西即令这个游击队到陕西来，开发游击战争，帮助二十四军，但陕西省委当时并没有给他们在政治上以丝毫的指示，只是令他们到陕北去，这时游击队的军事负责同志^①绕到西安与陕西省委接头，他们的实际力量都已到陕北，人数一百余，枪五六十枝，在陕北单纯的军事上与井岳秀部大小十五战，解决井部军队1连，枪枝上即有些补充，最后被井部军队压迫，开到陕甘边境保安一带。省委指示他们向陕西关中道移动，首先在三水（旬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当这个同志到部队中时，已受甘肃小军阀陈珪璋收编，和其他土匪混合，共编入两团，人数六百余人，枪二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支，党的组织已成立团委。派同志向省委报告。当时即派军委负责同志^②去工作，不久，他们就将陈珪璋一连人解决，缴枪一百余支，名义改称反帝同盟军，成立总指挥部，编为两个支部〔队〕，设支队司令二人，执行省委指示，向陕甘边境一三水正宁开发时，途中抢掠烧杀无所不为。即将我们同志最多、枪支战斗力最好的一中心大队改为警卫队（即执法队）直属军事委员会，镇压土匪，抢掠行动完全没有了，变为公买公卖的好军队，游击战争纲领还是根本没有执行，这即（是）他们的经过情形。

二、该部队的客观条件。

目前该部队在陕甘边境的三水正宁，各种条件都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发展：

a. 群众方面，这一带的农村阶级分化非常显（鲜）明尖锐，佃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全县土地几乎完全握在两三个大豪绅手里，豪绅对农民生死予夺无所不为，苛捐杂税高利贷，各种方式的剥削，都是特别严重。因此农民对豪绅对抗形成极尖锐的形势，有些地方（三原、富平等）去年收成还是不好，冬荒时，大多数群众没有饭吃，春荒到来，更是没有办法，因此在群众方面，只有（要）这个部队能够坚决地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分配食粮，烧杀（毁）一切契约，摧毁豪绅统治，分配土地等等，无疑的是获得成千成万农民群众热烈的拥护。

b. 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这些区域内（三水、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固关^③）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内容一反抗捐税、反抗豪绅、抗债抗租，接二连三的起来。富平一县，一月内农民有三次广泛起来抗捐的事件，包围县城火烧城门。三原方面除过反捐税反抗豪绅斗争外，农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普遍反日运动已经起来，并且武装了大多数的中农贫农，赶走了区长（关于这些内容另报告）。经过这些斗争后，农民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春荒斗争必然更要剧烈。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比较深入，红军与苏维埃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影响也很普遍的，三水在一九二八年在党领导下成立过苏维埃，固然这次完全是盲动主义干起来的，但到现在还是有相当影响。因此在群众斗争形势与政治影响方面，也是有利于游击战争条件的开展。

c. 地方方面，更是有利的，政治区域是陕甘边境，在陕西甘肃小军阀的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形势下面，容易给他们各个击破，为保我们的优势发展，军事地形崎岖大山接连着平原，予军事发展条件更有利。

d. 党的领导，在这几个区域内，比较是要健全的，自去年秋收斗争后，党在群众中的领导、组织和数量上的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党的成分改造上是有绝大的进步，新党员成分完全是雇农贫农苦力中农。

在以上四个条件下，我们认为这部队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是非常充分的。

三、省委的计划与指示。

在以上条件下，省委坚决指示他们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开发革命的游击

战争，开辟陕西的苏维埃区域。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实际工作布置如下：

（一）省委调大批军事的政治的干部到部队中去，建立党的领导骨干，已经计划派二十个干部去充任下级官长、政治员，同时派军委书记杰夫同志作省委巡视员，实际去领导布置一切军事的政治的工作。

（二）关于内部的改造，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关于组织，在军事计划上有组织系统表，政治工作有详细条例，这次不能〔带〕来，下次可带来请审查。

（三）名义现在暂是陕西游击队，经过改造与整理后，即改为“中国红军陕西游击队”^④，正式发宣言、通电、决议、宣誓和阅兵等仪式。

（四）党的组织方面，成立游击指〔队〕委为最高指导机关，队委书记省委已指定由杰夫同志去担任，其余的吸收士兵同志政治工作同志担任，队委下，以中队为中心，组织支部，暂时可成立一两个支部。

（五）对地方党部工作，省委已派一个比较得力同志^⑤负责地方党部书记，加强当地群众工作，以与这游击队的任务配合。

以上是大概情形，关于最近情形如何？执行程度如何？还未得到详细报告。省委要求中央审查，并望给予关于游击战争的军事的政治的材料。

陕西省委（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

注：①指阎红彦。

②指李杰夫。

③疑为同官。

④反帝同盟军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已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里的提法是省委原来的打算。

⑤指第伍伯昌。

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节录）

（一九三二年三月八日）

（一）游击战争的任务与行动

⑦扩大红军与苏维埃的影响，建立部分的苏维埃政权，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法令。

⑧执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中农和贫农。

⑨没收豪绅的粮食和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和苦力。

⑩摧毁豪绅在乡村一切政权机关。

⑪宣布一切高利贷无效，焚毁一切奴役和剥削农民的契约。

⑫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的税收，加重负担与〔予〕富农身上（或临时征收也照同样原则）。

⑬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此准备建苏〔维埃〕政府。

⑭解决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各地的农民，组织赤卫队、少先队。

⑮接助农民暴动或士兵哗变，帮助贫农雇农反对富农的一切斗争，不损及中农的利益。

⑯陷城市之后，首先拘押豪绅，以便制止其他豪绅武装力量之进攻，然后交给群众大会审判。

⑰游击队努力建立自己政治上的力量与军事上的根据地。

⑱游击队有计划地经常扰乱敌人的交通网，后方宿营粮秣军械储藏等等。

⑲游击队本身须有铁的纪律，严密地组织政治教育工作，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及无意识的烧杀等等，组织宣传队扩大自己政治影响。

⑳尽量吸收贫农雇农苦力成分参加。

㉑对农民的原始组织如红枪会等，（一）在政治上号召他（们）争取他们的同情，分化他们，揭破首领的罪恶；（二）派去作工作；（三）尽量避免军事上的冲突。

②对附近各地士兵应有计划地派人工作去。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信

——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央：

中国红军陕甘游击队已于一月前在陕甘境旬邑（即三水^①）奉行宣誓授旗典礼，发表宣言通电指令等，共编制三个大队，设立总指挥部，人数共四百余人，枪三百余支，都是好枪，二月初在旬邑职田镇击溃白军一营，得到手提机枪二十余支，盒子炮七支，长枪一百余支，俘虏白军士兵四十余人，连长亦被俘，赤色战士的勇气立即提高，同时把旬邑豪绅完全逮捕，粮食分配农民。最近在耀州^②两县又大大击溃民团、白军井岳秀，缴短枪数十支，据昨天来信，已回到陕甘边壤，不久又到旬邑，人数已达千余人，枪一千余支。

红军游击队继续不断地胜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民兵士群众中去，大大的提高农民士兵的决心与勇气，各部队的革命兵变是迅速地可以组织起来，尤其是省委根据这新的形势，昨天（二十日）会议立即决定以适应目前新形势，省委认为：

（1）杨虎城和各小军阀的统治是非常动摇的，因为财政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中心部队士兵亦是吃不饱的，其他部队更谈不到。所以最近各部队的士兵斗争非常普遍，哗变逃亡更其加速。

（2）正在春荒，农民大多数没饭吃，政府摊派还特别利〔厉〕害。

（3）游击队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影响，特别地剧烈扩大起来。

（4）党的政治口号，尤其是苏维埃的法令政纲等已在几个中心部队中与地方农民中深入和扩大了。

（5）在党的领导之下，渭北已经武装了三千余农民，白军部队中革命兵委领导为骨干已经建立起来。

(6) 杨虎城在陕西的军队，大部分集中甘肃，渭北西路各县驻军非常之少，而且完全没有战斗力。

(7) 群众斗争继续剧烈的向前开展。

根据以上，省委认为：

1. 汇合农民士兵的斗争，游击队的行动，建立陕西新苏区，创造红军为陕西党的最迫切任务。

2. 集中力量，组织几个城市的兵暴，最近这些城市中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已经成熟了，党已坚决去领导。

3. 红军游击队迅速四（向）三原发展（很近的一天可到）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的，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很快地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在这数县内都没有驻军，而且是灾区，党的工作最有历史的几个区域），开辟西北上一大片苏维埃区域，省委估计了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是〔有〕极充分的可能，只要党能坚决的正确的去领导。

4. 组织西路以凤翔为中心的革命兵变，配合西路大灾荒的灾民，已经有三个部队〔可能〕人数将有两营，以与河北^③汇合，这样就可能将三原、蒲城、富平、咸阳、礼泉、乾州^④、邠州^⑤、武功、麟游、岐山、兴平、耀县、淳化、旬邑十余县成为游击区域，并可立几个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争取三原为这些区域的中心。

5. 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⑥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同志任书记。省委认为这样的准备和布置，无疑在全国革命运动上是有极大的影响，是给目前国民党军阀在正进行中的第四次大围剿以最大的打击，〈因〉为了要能很完满的实现这一任务，省委特别请中央：

①令鄂西北房县等地的红军第二集团军迅速向陕西南部安康（很近）三陶（山阳）商州、洛南等鄂豫陕边境发展，和陕西的苏维埃运动汇合起来，取得联络，对河南为中心的围剿鄂豫皖苏区的蒋介石政府取大包围形势，给以最大的危迫，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以开展一个新的形势，西北与东南即可联络汇

合，彼此呼应。

②无论如何，速派两个最得力的同志，一负政治，一负军事，帮助省委执行这个伟大而且紧急的任务，省委特别郑重声明，并不是省委依赖中央等待中央，而是为取得各方面与联络配合，在军事上、战略上、政治行动上，必须要中央派来，不然，我们对全国的发展形势与联络的具体办法是无法解决的。同时正确地领导这样大的运动，省委觉得自己的经验实在不够，如果因为策略上战略上的错误，万一受到一个打击，那是中国革命的大损失，请中央郑重考虑。

③因为各方面的配合，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么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来人必须于二十天到西安，绝勿有误，十万火急，并先盼复！

注：①今旬邑。

②今耀县。

③即渭河以北各县。

④今乾县。

⑤今彬县。

⑥这里提出组织渭北特委，实际并未成立，渭北特委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十月。

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 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一、在空前的灾荒与农民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陕甘边的赤色游击队在
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英勇战斗中，得到了许多新胜利，而且日益壮大起来。
他正走向与三原的农民武装队伍汇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陕甘边农
民游击队的英勇的战斗与胜利，粉碎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北方落后论”给了
“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的机会主义的胡说
以致命的打击。证明了党提出的“要在这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
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
展的区域，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
域”的任务（中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二、估计到目前陕西的农民反抗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国民党统治，争
取土地，灾民分粮抢粮的斗争普遍与紧张，估计到陕西士兵的哗变的潮流的增
涨，估计陕甘游击队及三原农民武装的力量，及该区敌人武力的薄弱，最后估
计到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应该清楚地提出：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
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的任务。

三、为着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
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建立完
全有战斗力而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
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这在今天陕西的经
济与政治的环境中是更加明显与迫切的。“红军的社会成分应当是工农的，主
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靠得住
的指挥的〔员〕，要有铁的纪律。”因之，在组织陕甘边的经常的红军时应该
注意到：

A. 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的成分，最大限度地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B. 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C. 立即开始建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与党中〔央〕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等与军事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的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应该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之下工作。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选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D. 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翻（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E. 红军的军械军需及给养的补充的来源，只能把军阀的军队作目标；为着这个目的，可以而且应该实行游击敌人后方的辎重队和交通队。

四、在目前游击队行动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地执行下列的任务，以便将这个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是：①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分〔份〕劳动的土地，土地应该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念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念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及租税应立即废除。②彻底的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努力与夺取武装革命。革命委员会必须宣布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

法来组织乡村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③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这些队伍的任务是与苏区内部的反革命作斗争，保护苏区边界，参加一般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他们同时应该是补充红军的后备军。迅速地彻底的实行上面的任务，才能创立真正的巩固地。——目前游击队的行动的区域三水正宁三原这一带，有着建立这样根据地的优点。农民斗争的紧张，与和三原长安等中心城市等等^①。应该首先巩固这一带区域作为我们陕甘边苏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

五、经常的红军部队与巩固的根据地的创立，绝对不是说要来取消或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应地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及其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要记得，如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之，在三原同官^②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与（是）迫切的任务。游击队的主要任务，要在敌人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中的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游击队应该是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应该吸收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红军的指挥员应该努力指导游击队的动作并将他与红军的作战任务联系起来。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立较大的根据地。

六、红军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军队之外，还要用红军全部

人员与政治机关去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等，去夺取白色的士兵群众，并应该派遣（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任（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城及其他军阀的中心部队中的我们的工作。

七、在苏区及红军中建立坚固的党的委员会与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的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区域内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的领导。中央责成（使）陕西省委及中央组织局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加强陕甘特委的领导，现在的渭北特委应该移到苏区中去。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区域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及优秀的中农分子入党，严格的防止富农反（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最大限度地加强党员群众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必须即刻在这区域建立群众的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的组织发展他们工作上最火限度的积极性，中央责成团中央及陕西省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创立这区域中的团的组织。并改换与加强团西安市委的领导，应该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团的陕西省委的问题，党及一切群众组织应该在深入土地革命，创立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及扩大红军及游击队上发展其极大的积极性。应该引用其他苏区的经验来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的运动（慰劳，收集粮食，打草鞋，动员到红军中去等等）。

八、陕西省委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来开展西安等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的罢工运动与反帝运动，及蒲城富平渭南凤翔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动，组织士兵的革命兵变，以及灾民分粮枪粮的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的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但是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的一步，而且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然十倍的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对于目前情势的估计不足，认为陕西没有发动游击战争与革命兵变的可能，认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政权及土地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忽视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等，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能够顺利地克服这

些部分的动摇游〔犹〕疑，而在坚决的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造成新的广大的强固的陕甘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

中央

一九三二.四.二十

注：①原文如此。

②今铜川。

*这是中央根据省委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一日报告和请示作出的决议。文中提出创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以及应遵循的原则。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央：

最近在渭北一带的农民，已由普遍的抗粮抗租过渡到分配粮食和武装冲突，在三原武字区有五六十人发动，以至很快发展到一千五百人之多，整个的继续的分配五六天之久，分配了武字区二十余家所存的粮食与财产。后来军队去将三个人抓去，党又很快地发动百余农民去追。富平农民自动起来攻下美原镇抗捐，捣毁区公所，分配了区公所积的粮食。蒲城农民抗粮以后，又有三四次农民抗款缴农，捣毁区公所分配粮食。正宁农民的围攻山合（正宁县城），旬邑农民配合着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杀戮了当地的豪绅地主和分配了当地反动阶级的食粮和财产，攻下旬邑县城，组织起部分的赤色保卫队。……在兵士的斗争中，更是普遍的发生，冯钦哉部队每连都有过兵士算伙食帐。……而这些斗争因为红军苏维埃尤其是游击队发展的影响，已经冲破了日常经济斗争的范围，公开地讨论和投入红军的问题（这自然还是部分的）。……在这一形势之下，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第一抓紧渭北群众斗争高涨的情绪，发展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配合游击队的发展与几个部分的革命兵变，积极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以旬邑、三原武字区的〔为〕中心的苏维埃临时根据地，在这一发展的基础上夺取中心城市扩大苏维埃区域。第二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临时政府，建立坚强而有战斗力的红军，作为建立与开发苏维埃的支柱。第三发动各地群众斗争，使这些斗争普遍起来，并积极转变这些斗争，由抗捐税抗租以至分配食粮，开发游击战争。……第八为要顺利地执行这一严重的政治任务，特组织渭北特委来去领导渭北工作。

*这个报告反映了省委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决议之后，创建以三原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的斗争。原标题为陕委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四·二六惨案 经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中央：

兹将四·二六惨案报告于下：

国民党狗委员戴季陶^①来西安闹他们筹备西京与视察西北的勾当，在西安大肆讲演，谓“外交顺利”，“东北与东南毫无问题”来欺骗群众，更无耻地说“东北失了不要紧，现在极力迁都西安开发西北，抵抗西北最危险的敌人苏联”的反动宣传。因西安反日反帝怒潮的澎湃，尤其小资产阶级学生的左倾化，（国民党的卖国行为）惹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感与痛恨。我们在这时，即用最大力量去揭破（其）卖国与进攻苏联的反动宣传。

四月二十五日教育厅召集西安各中学校学生扩大纪念周欢迎戴季陶，于是我们在二十四日下午召集各校活动分子会讨论第二日工作，结果决议以“打倒狗委员戴季陶”、“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几个口号号召群众，并通过行动纲领，于二十五日纪念周上爆发了这一斗争。爆发的经过情形是：正在戴季陶讲话时，初则会场不绝掌声，继以军乐哄乱会场，这时群众把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高呼，把戴季陶吓得马上跑到后场去，群众出外集合包围各门，用石、砖、木棍向内射击，教育厅长出来，为砖瓦打伤，又跑回去。宪兵营出来，有人用戴季陶穿的衣服跑出来，群众大呼卖国贼，你们情愿当卖（亡）国奴等口号，把宪兵推回去。后又来军队向群众一面冲锋，于是群众烧坏而且打碎戴季陶的汽车，整队而回。当时下午又召集了西安学生抗日会各校联席会，决议第二日（二十六日）罢课游行，扩大这一斗争与宣传。当时统治阶级已经发觉，立即封闭学生抗日总会，二十六（日）即派军警包围学校。中中学生七百余整队出发，军警见形势紧张未敢阻止，至教育厅门口与女师汇合时，突来军警开枪，群众即木棍砖瓦抵抗，结果打伤四人。一中出校时因军警阻止致起激战，

伤学生四五人。高中冲到开会地址，被大批军警驱散，捕去数人。一师未冲出，一职伤数人。计共捕学生一百余人。当时我们又召集了一次活动分子会，决议继续罢课，号召大会提出具体要求：①抚恤被难和负伤学生及其家属；②马上开释被捕学生；③凶手交群众惩办；④严格惩办主持屠杀的祸首；⑤政府向群众道歉；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⑦以后不准逮捕革命学生及革命群众；⑧启封学生抗日总会。但〇〇〇军阀认为这样屠杀与逮捕还不够，调派宪兵武装警察严密的戒备，并包围各学校四五天，继续逮捕学生。另一方面拿上课作条件，开释被捕学生，来欺骗群众。这时群众情绪都非常高涨，但是各校党团负责同志跑的跑了，未跑的不敢出来领导，或采取右倾路线形成了群众的尾巴。于是经过了这几天，群众情绪和缓了，一方面政府强迫上课，另一方面当局的走狗及一切反动分子把广大群众领导上了课了。负伤的由政府治疗，被捕的还有三人未开释（一个是同志）。我们这几天彻底地改造了各支部，给负责同志与右倾路线〔者〕以相当的处分。现在我们正在各校〔开〕代表会，组织二次罢课，高中已实行三天了，其他各校因学生战线不统一与受了反动教职员的影响还未实行。我们决定再开活动分子会，讨论这一工作。此后我们决定号召西安各革命团体组织四·二六惨案代表会，这一会议马上可召集起来，影响学生，扩大四·二六斗争。中央接到这一封信后，应马上通知上海民众援助与扩大这一斗争，以与四·二六代表会建立关系。更详细的情形，这里有派来的代表（法学院翟文凤）请去接洽。

这是四·二六斗争经过大概情形，至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与策略，另报告。

陕西省委（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注：①戴季陶（一八九〇—一九四九）早年参加国民党，曾和蒋介石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后，即从事反共的煽惑工作，为国民党反动分子叛变革命制造理论根据。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长。一九四九年二月，看到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在广州自杀。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

——省常委会通过——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

(一) 在陕西革命运动急剧的发展，群众斗争怒潮般的澎湃，工人反对裁工减薪形势的高涨，农村阶级对立的尖锐，农民武装斗争的普遍与发展，兵变的潮流化，红军游击队的胜利与发展，尤其是对于劳苦群众的影响与普遍深刻等等的形势之下，党的领导成为严重的问题。工人运动的取消；四十三县农民的缴农围城，党不但不去领导，连一次讨论过都没有，就是三原、富原〔平〕、蒲城几个地方党部的参加，仅仅是参加，甚或是同志个别的作用，不是有组织的领导。疯狂般的兵变我们只领导过两次，对于各地的农民运动，各中心城市，各重要工厂（尤其是华阴兵工厂、潼关的铁道工人等）的工作，除过写过几个不兑现的支票式的决议外，没有任何实际的布置，没有积极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与大量的创造新苏区，对于游击队的领导采取了可耻的流寇式的办法，对于“四二六”领导的尾巴主义，对于各级党部领导的薄弱，对于 C. Y. 领导的取消路线与政治上许多错误，以及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一切等人的错误，我们只有用对于客观形势估计不足，认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与土地革命而奋斗的男气和决心”，没有了解目前反帝反国民党的高涨形势，最主要的是没有了解目前工人生活状况与斗争形势来解释。这些是形成目前陕西党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唯一原因，绝不能用省委组织不健全，工作忙碌顾此失彼等来藉口掩饰，虽然省委组织不健全也是原因之一。

(二) 在这个整个错误路线之下，对于各个工作也同样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再作一详细的检查：

1. 放弃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的党不作工人运动、没有工人同志，这是非常严重的危机，陕西党始终没有过一次对于职工运动的单独决议与具体工作计划，

在职工运动中没有工会来号召，而只是用党去活动，没有过对于职工运动一次实际的布置，没有用任何相当注意吸收工人入党，更谈不到建立工人领导，最中心的西安没有一个工人同志，就是中央给我们介绍来的同志，接到信后一月多不和他接头，接头后又没有决定他的具体工作，这样使党把他握在小资产阶级手里，党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正确路线的执行成为不可能，这是十足的立三路线。党必须和这种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对于工人斗争形势估计不足，认为用赤色纲领与赤色工会还不能争取工人大多数的右倾观念，同时必须深刻打击没有深刻地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认为现在在客观上工人斗争的形势高涨，便认为主观上都有争取大多数工人的可能，否认党的改造得紧迫的错误。正确的估计应当是现在客观环境与工人斗争的形势，赤色纲领一定可以争取到工人的大多数以至于全厂的工人，争取大多数工人在赤色工会的号召之下。但是，因为党过去对职工运动长期的放弃，如果党不能很快地获得工人运动中两条战线斗争的胜利，这一客观形势，一万可能也不会变为事实。所以在开展职工运动中，必须加紧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打击一切左右倾观念，积极领导工人的各种经济政治斗争，发动并领导工人的政治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加紧赤色工会的号召与组织，尤其是武装组织的建立。省委成立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专门计划这一工作，并责成各级党应当把职工运动列为第一等任务，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具体去布置这一工作（如三原的挑水夫、蒲城的盐滩工人、韩城的炭井工人以及各地的手工业工人等）。

2. 对于兵变的错误——过去兵运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去积极开展士兵工作，尤其是杨虎城的中心部队，广大的兵变潮流我们不但没有领导，以至还不知兵变那里去了，另一方面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发狂，没有了解革命兵变的主要条件，不估计当时兵变的士兵情绪与为什么要变，我们的政治影响领导力量怎样，当地群众的运动如何，而只是只要有同志的地方，便去提出拨到红军中去，结果组织的五次兵变中，两次惨败两次被人发觉，一次没有举行，这完全是立三路线的军事阴谋与军事冒险，一方面放弃敌人军中工作，一方面口有一点微弱的力量也被摧毁净尽，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我们必须开展军队中的工作，抓紧这一形势发动各种斗争，积极准备和

组织革命兵变，在革命紧要关头来举行。

3. 对于 C. Y. 的领导，犯了一贯的取消路线和政治工作上的许多错误，没有经常的加紧对于团市委的领导，只是对团的一个工作检查就迁延了数月之久，没有积极的发动各地党部对于团的工作的领导，没有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去注意团的工作，不使广大的青年团结在团的周围，这是党在革命运动中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团市委同志认为党提拔团的干部便是取消团的错误。我们认为团供给党的干部是无条件的一个任务，我们必须加紧对团的领导，使团大量的青年化，到青年中去，尤其是加紧青年学徒的工作，团结广大的青年在团的周围。

4. 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曾经作了不少的正确的决议，对于游击队的任务的决定与几次指示，对于创造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对于红色五月工作的决议，对于夏收斗争工作的决议，对于“四二六”惨案的领导，对于渭北与韩城农民斗争的决定，还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再反过来检查这些决议的执行，对游击队任务是没有很好执行，创造新苏区的决议与夏收斗争的决议，现在还没有完全发出。夏收斗争的决议，到夏收已开始好久，才开始讨论，“四二六”惨案是尾巴主义，红五月的决议，四月二十六日才发出，五一的宣言，五二才发出，五三的宣言，当时起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更是不动声色的过去，五月二十九日才讨论五卅工作，又因为会议地点成问题，只仓卒〔猝〕的决定了个“分头活动”的拼命办法，以上主要还是宣传方面的问题，至于实际布置更谈不上。伟大的红色五月和平地过去了，检查到省委的五月决议，没有一条圆满的按照着预定的计划执行了。□有一千正确的决议有什么用处？

5. 对于群众团体的工作也没积极去领导。对于前卫社好久没有一个整个的决定，放弃了领导；对互济会也只有个别同志的领导，而决没有积〔集〕体的领导；对于青年学生的读书会，根本没有去理，更谈不上设法建立〔许多群众〕。教导队的兵变，曾经几次找我们去领导，但是最后仅仅决定了派三个同志去，到现在还没有执行。杨万青部队也只是讲了几次要去做下层工作，直至现在下层还没有去一个同志。这种左倾关门主义的实际工作中的怠工是不能容许的错

误。

6. 干部问题，这是省委一贯的错误，不相信下层干部，不积极提拔干部作指导工作，使党长期把持在小资产阶级“老干部”手里，经常地不能计划开展工作，一遇到工作吃紧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包办不来，又感觉干部的需要，但同时却不相信新干部能担负某项工作，以至又是自己拼命。另一方面只知道向储蓄部（中央）讨要，这是使党的工作不能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7. 没有经常工作的检查，即或有也是口头上的。这一次检查的错误，下次可以再犯，没有经常的党内的自我批评。下层党员的意识反映不到党里的指导机关来，没有经常地即时检查各级党部的工作，与〔予〕以经常的即时地指示，没有计划的集体的指导工作，省委工作经常是个人的很紊乱的包办，以至工作紧张的时候形成包而不办的现象，这是在开展陕西工作中非常严重的问题。

8. 组织与宣传鼓动工作更是一塌糊涂，直至现在组织部宣传部还没建立起来，直至现在连一个组织统计还没有，更谈不上怎样计划，怎样组织，党的各级组织怎样，发展组织怎样，组织各种群众组织，不能根据各种文件作经常即时的宣传鼓动，即党报不能出版，对于党内同志政治教育是没有积极去做，尤其训练部那更是谈不到的事情，没有抓紧许多斗争的经验（胜利的或失败的）给全党同志以很好的教育。

9. 技术交通工作，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有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还可以几天不印出来，有许多重要决议案到机关里，好久传达不到下级去，各地的交通网是没有建立，这样使党的决议不能即时领导下级工作，阻碍着党的路线的执行。

10. 最后我们认为省委这些错误，各地党部也都还同样地保存着，而且在各地党部的错误，比省委的错误还要更重。韩城县委认为分配粮食的斗争是不可能，开发游击战争是不可能，但是因为群众分粮食斗争的发展也只得去参加，而另一方面却是立三路线空洞的决定爆发的日期，阴谋式的准备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蒲城党部一方面执行富农路线，一方面认为“暂时不要斗争，待力量大了再说”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富平区委张○○同志认为“天下雨了，人心安些了”，以至认为“虽然麦收后就有大批的群众马上没饭吃，但是究竟麦

收了，人心总安定些，如果还要鼓动号召群众分粮就不好说”。三原区委对于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没有了解目前开发游击战争的形势，不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武装斗争以至游击战争。一般的地方党部对于斗争的主要口号还是抗粮抗款，尤以蒲富为尤甚。虽然有些地方党部还领导了群众的分粮斗争，建立了群众的武装（三原）但是做得还是非常不够，土地革命在各地党部更没有引起丝毫注意，即有部分的也还是宣传口号，而不是号召群〔众〕争取土地。对于工人运动与城市工作完全放弃，汉南特委还只是领导了些学生斗争与抗款运动，还企图领导大商人罢市，把大商人在罢市中的分化，认为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对于土地革命连口上都没有提到，因此我们认为这是陕西全党目前一个严重问题，必须用最大限度力量去和这些一切的错误去斗争，务期斩草除根，以保障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三）这些错误的来源：

1. 否认中央的领导，经常不讨论中央文件，不单一般的文件，就是各种重要决议也很少注意。最近以来，只讨论过关于创造新苏区的决议。这样便不能了解中央正确的路线，更不能根据中央的路线决定自己的路线。

2. 对于客观的形势估计不足，没有清楚地了解目前的经济状况政治形势、群众生活状况和斗争形势。

3. 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省委完全把持在小资产阶级富农及富农意识的分子手里，全党只有三个工人同志（一个产业工人，二个盐滩工人）在这样的支配之下，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成为不可能的事实。

4. 省委组织的不健全，也是省委工作麻〔忙〕乱之一。

（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改造陕西全党首先是改造省委召集扩大会，所以省委成立这一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把这一决议寄中央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陕西工作，最低限度派人参加扩大会议，帮助陕西党解决这问题，并责成各级党部根据这一决议站在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检查省委的错误和自己的错误，作成决议。根据这一精神与各地同志在群众斗争中实际工作的意见与执行来改造各级党部。要开这一扩大会，必须是各级党部有了相当的改造，就是最低限度参加扩大会的分子一定要是能够担负改造省委任

务的同志，就是在政治上正确工作上积极的同志。

各级党部接到这一决议后马上讨论并成立自己的决议，迅速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省委并出版一“反左右倾”专门检讨这一错误，把这一斗争要深入到全党，尤其是各级党部应当把自己领导的错误，详细地检查出来，送到省委并发到下层去，把省委这一决议要在各支部会上讨论，并检查各支部的工作。

关于扩大会议的人选、地址、时间，另行通知。

省委〔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 苏区的决议*（节录）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本通过——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闭塞的陕甘边苏区的创造中，我们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的教训。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的拥护之下，由于赤色战斗员的英勇与坚决，陕西党一般领导的正确，由陕甘边游击队生长的红二十六军正在为开展陕甘边苏区而斗争。它教训了我们不仅在南方，同样的也在北方，只要在坚定的阶级路线与正确的群众工作之下，游击队能迅速地生长成为红军，只要毫不延缓地开展群众日常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广大劳苦群众为自己政权而斗争，游击区域是能够巩固的奠定新苏区的基础；同时昭示我们只有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百折不挠性，经过不断地斗争，残酷战胜一切困难，克服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方能顺利地实现新苏区的创造。”

北方党的基本任务：

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新苏区：

1. 在边区首先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的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摧毁与肃清边区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劳苦民众，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大的建立与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宣布苏维埃中央政权一切法令（土地法、劳动法等）与最大限度地实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劳动女青年一切组织与活动。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2. 在已开始生长成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队中，应该毫不迟延地征调大批工人与吸收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进去，坚决淘汰土匪流氓分子，以彻底改造它的成分，必须依照红军的编制改编它的队伍，与立即切实开展红军政治工作，以绝对保证党的领导。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泛利用进攻袭击的战术，但同时须逐渐学习阵地战平原战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在边区周围，特别是在陕西渭北及西路群众斗争剧烈发展与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三原等县）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对于白军，尤其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应特别加紧我们的士兵工作。

3. 为保障无产阶级领导，须百倍的发展雇农工作，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特别是中心城市（如西安）；大批征调工人到苏区中去，在红军中，在苏维埃机关中，切须有一定的工人数目，以保障工人骨骼的领导作用。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要求北方各省委立即组织红军，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陕西省委代表杜衡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节录）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陕西省委：

根据北方会议及你们最近的决议^①，中央认为对于你们的工作，有特别指示的必要。

现时世界政治形势之最中心问题，是两个世界一即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极度尖锐的对立。

在中国，则两个政权，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之尖锐的对立。

这一政治的特点，在陕西绝不是例外的。陕西工人斗争之活跃，农民斗争之汹涌澎湃，白军士兵的不断地哗变，尤其是陕甘边游击区域的建立，红二十六军的胜利的发展，这一切更加推动了陕西革命危机的前进，推动了反帝反国民党的怒潮（四·二六惨案及其发展）开阔了创造北方新苏区的有利的大道。

但是，在这里必须严重指示〔出〕的，是陕西党过去对于这一形势的估计是完全不足的。对于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极不坚决的，因此阻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障碍了群众斗争之更高的前进，躲藏在“北方落后论”或“陕西特殊论”之中，不去领导并组织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不去组织并领导反日反国民党的罢工，甚至完全取消了城市工作。对于农民灾民的汹涌澎湃的斗争潮流，更是犯了富农路线之错误，作了自发斗争的尾巴。在士兵工作中，犯了完全官长路线之错误，使几次计划的兵变，遭到悲惨的失败。对于扩大深入的反日反帝运动，起初则采取小资产阶级的关门主义，不去争取反帝斗争的领导权，继则完全依赖学生的反日斗争，没有能够积极地深入到工人阶级之中，深入到农民群众以掀起更伟大更持久的斗争。对于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之胜利与

苏区之伟大的发展与巩固，不晓得动员与组织群众来举行庆祝和拥护，以开展并提高群众的斗争决心，以扩大陕甘边境之游击区域。对于建立游击区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是完全动摇不定，放弃了巩固根据地的任务，采取了可耻的逃跑主义（维汉〔翰〕同志领导下的时期）及截断渭河交通，攻取三原等的“左”的计划。

但同时中央还须着重地指出，陕西党在四中全会后，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是有了一些不可否认的进步。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创造了红军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域、部分的领导。并组织了农民的分粮反帝斗争（三原、富平）组织了农民的反日救国会、反日义勇军的武装组织（三原），建立了农民的群众组织（三原、富平和蒲城）组织和布置了几个部队的革命兵变，反对了杰夫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开始了陕西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实现了西安的总罢课，党的组织也有了部分的改造（三原等）。虽然这一些进步与成绩是极其微小，远远地落在革命斗争的后面，但这些成绩是不能否认的。因此认为陕西党的路线完全在于“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陕西省委最近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路〔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认为陕西党是“在这个整个路线之下”（同上）是过火的是自杀的自我批评。这种估计，是不会认识正确路线及过去的错误与教训，来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彻底的转变，来实现北方会议所赋予的创造北方新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之严重的历史任务。清楚地认识陕西党的错误与缺点，深刻地接受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央和北方会议正确的决议之下，努力去转变并开展党的工作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与红军和巩固并扩大陕甘边游击区域为中心，积极地去领导并组织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士兵斗争以及广大劳动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坚决地执行中央路线，反对一切“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特别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陕西党目前在创造新苏区中最迫切的中心工作。

陕西党必须在这一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中，去坚决地执行下列的基本任务：

（1）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新苏区。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地加紧这一工作。首先第一必须坚决地没收地主阶级与祠堂庙宇及土豪劣绅的土地，按照劳动力与人口，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以及中农。在分配土地过程中，不许动摇中农的

利益，富农的土地亦必须没收，在他们不反革命的条件之下，把坏的劳动份地给他们，同时要尽可能地做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以彻底肃清封建的残余。但这必须使基本的农民群众了解并在自愿之下来执行的。第二，为巩固这一革命起见，必须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使之成为拥护并支持土地革命的基本队伍，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实现真正的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第三，立刻成立红军一团，进行广大的征收红军战士运动，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士兵的成分。红军士兵必须分给土地，按照红军优待条例，给予特别的待遇，绝不能借口特殊情形而忽略这一真正改造的实施。同时必须成立赤卫队、政治保卫队等以武装当地农民。第四，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地游击运动，以旬邑、淳化、邠州及正宁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域，以与三原、富平为中心的农民斗争相配合。第五，加强边区党的工作，吸收并提拔新的大批干部，特别要对广大的工人、雇农及贫农开门，吸收新的坚决的分子入党。红军士兵之中，必须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根本的改造过去的土匪成分。第六，要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运动，扩大红军胜利的宣传以提高广大群众斗争的情绪，以开展边区的工作。第七，为实现这一任务，边区的党必须严重地打击过去逃跑主义的残余，肃清放弃根据地的倾向，坚决地执行在巩固并扩大边区工作中创立新苏区的路线。（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在目前继续有效）

（二）创造产业支部开展工人斗争。

（三）肃清富农路线，开展农民斗争。陕西五年来的灾荒，使农民群众死亡流离，愤恨国民党军阀统治到了极点，汹涌澎湃的农民灾民斗争，是土地革命成熟的主要标帜〔志〕，陕西党对于这一形势的估计，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仅没有提高农民斗争的决心，反而障碍了斗争的发展。因此，为要彻底的开展农民斗争，党必须把把持领导机关的富农分子清除出去，肃清富农路线的残余，积极并大胆地领导农民抢粮、分粮一直到分土地的斗争，去开展游击战争与边区配合起来。在汉南方面，要迅速派得力干部去组织斗争。

（四）肃清长官路线，保障士兵工作的发展。省委必须清楚地认识，在士兵工作中的长官路线是陕西党严重的错误，他不仅障碍了士兵斗争，而且断送

了几次三番的兵变，造成了可耻的投降记录。在士兵运动中，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打击这种官长路线的倾向，要严密保存我们组织的秘密，绝对排除与官长的勾结，禁止横的与不必要的关系。积极地去组织兵变与领导自发地斗争，以与游击队相配合。省委必须严重的注意瓦解敌人的部队与组织革命的兵变，是冲破敌人围剿与发展新的游击区与苏区之一个主要力量。对于兵变条件已经成熟的部队，如警备师第四团要坚决去领导，配合汉南的农民斗争，去建立川陕甘边的新苏区，迅速地向鄂北发展，以便与豫鄂边苏区取得联络。

（五）扩大并深入反帝斗争。

中央坚决地要求陕西省委立刻讨论北方会议的一切决议案与中央这一指示，最坚决的揭发陕西党在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党的中央的正确路线能够真正传达到县委区委与支部中去。在斗争中彻底改造党的组织，撤销那些无可救药的老机会主义者，提拔新的积极的分子来担任指导工作。中央对于陕西省委过去对于中央一切重要决议与文件的那种忽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一刻也不能容忍的。不研究不讨论中央的一切决议的省委，当然绝不能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

中央认为陕西省委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领导群众的斗争中，彻底转变省委的领导方式，改造省委的组织。一切省委的指示必须最迅速地传达到支部，而且必须经常检查这些决议执行的程度，并监督这些决议的执行。省委必须拿很大的力量去了解下级党部的情形，进行下级党部的改造运动，必须开展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地自我批评，启发下层同志的积极性，尽量引进工人、雇农、贫农的积极分子到领导工作中来。同留恋旧干部不信任新干部的现象做最严重的斗争。必须坚决反对党员同志同一切反革命派别发生社会关系，一直到开除党籍。而且省委对于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必须十二万分的加紧。

中央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像陕西党现在这样稀少的党员数量是不可能的。陕西党在开展群众斗争中，必须尽量吸收新党员，尤其是工人、雇农与贫农分子入党，把陕西的党变成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陕西党必须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提出增加一倍以上的党员的口号，同时应该特别注意加紧对新党员的教育训练的工作。对于 C. Y. 的领导，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必须使团中央的冲锋季也

能够在陕西实现出来。

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严重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委的工作。过去把甘肃的工作限制在士兵中的倾向，中央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加强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中央同意○○^②同志为陕甘边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中央决定○○^③同志，○同志在几天之后即可出发前来。

中 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注：①指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省委作的《关于省委工作检查与两条战线斗争彻底改造的决议草案》。

②指杜衡。

③指孟坚，又名曹长青、孟用潜。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节录）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在两个世界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大战的迫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极端紧张的形势下面，“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专政、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尖锐的对立，这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标志。”

（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全国革命危机的生长，最近更显明地表现在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中，在全中国所有的战线上，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又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胜利。这一胜利，要更加速地主资产阶级的死亡崩溃，使全国的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地增长起来。“在全中国的民众中间，苏维埃与红军的权威、民众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信仰是大大地提高了。”（中央四次围剿决议）同时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清楚地指出“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北方各省亦是突飞猛进地发展着”，“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的成立^①，创造了北方新苏区的最初根基”，指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已经放在北方各省工作议事日程之上。”（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决议）

二、在陕甘边区内，游击队在这里领导了农民的斗争，摧毁了豪绅地主的统治，开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工作，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创造了农民的武装，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土地法令是得到了农民群众极高度的热烈拥护。回民选举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打破回汉民族的界限，使回民问题在苏维埃的旗帜下面，是得到了相当解决，使少数民族更热烈地兴奋起来

拥护红军游击队与苏维埃政权。这样，造成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一切条件与最初根基，清楚地指出，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是放在陕西工作的议事日程上。

三、帝国主义指示着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积极开发西北，建立西安陪都，巩固西北边防，开辟上海至新疆的航空线，公开的宣言，布置从西北上进攻苏联的战线。然而苏维埃运动在西北上的猛烈开展，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进攻苏联大战中的致命死敌。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了进攻苏联，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使中国数万万劳苦民众继续地遭到压迫剥削与屠杀，为了要使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中国民众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与顺民，为了要造成全中国更大的经济浩劫与水旱灾荒，以至于为了造成进攻苏联的后防，自然不能不更疯狂般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进行新的进攻。”（中央关于四次围剿决议）

在这个形势下面，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正式开始，陕西国民党是毫无例外的，与全国同时（陕西国民党）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向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作新的进攻，十七师孙蔚如部开到陇东，委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坐镇宁州为总指挥，杨部最精锐的九十七、九十八两团已至边区，在早胜、山合一带，在边区的有李贵清一旅，何高侯一旅，井岳秀部张子英一团，向边区进展，警卫团在邠长旬邑，井岳秀部左协忠团在耀州同官间，围绕着陕甘边区的约有四千余人。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为了与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作决死斗争，还在继续地动员中心部队作四次的“围剿”。

四、在陕西同样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与过去是有很显著的不同”，（中央四次围剿决议）参加这次围剿的部队，除过杨虎城的最中心部队外，其他杂色军队都参加（如李贵清、何高侯），由于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杨虎城正在疯狂似的扩充军队，最近又要新编十个特务团，企图在最后的挣扎中，维持其垂死统治，国民党更是要更残酷的凶暴地向着陕甘边区与红军进攻。

但是最主要的不同是中央所指出，“四次‘围剿’的最大，困难，是在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大大削弱与工农民众力量的大大增加。”“地

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首先表现在他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武断宣传范围的缩小”，（中央）自九一八事变后，经过西安的“四二六”大屠杀，国民党的出卖中国民族利益，镇压反帝斗争，投降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完全揭破，杨虎城的“陕人治陕”、“振兴陕西的十大政纲”、“振兴水利”、“救济陕西灾荒”、“豁免灾区田赋”、“以工代赈”等欺骗，完全被铁的事实所粉碎。广大的工农劳苦民众，已经完全清楚地了解到，造成陕西甘肃的连年灾荒，死亡流难的浩劫，完全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绝不是地主资产阶级认为的“共匪”。经过了半年来的斗争，工农劳苦民众完全清楚地了解到，只有“共匪”来了，才能逃出饥饿死亡的地狱。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其次表现在他的财政的深刻破产”，（中央）陕甘经过几年灾荒，直到今年灾荒更加严重，国民经济是更加极高度破碎，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垂死统治，一切费用更加浩大，杨虎城就用了一千二百万的巨款向帝国主义购买一批枪械子弹，这些费用的来源，只有加紧拼命地剥削工农劳苦民众，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在边区内更是繁重惊人，剿赤费，支差费，粮秣捐，柴草捐。游击队离开的地方，（如韩城）豪绅地主国民党一切捐税加倍征收，至于全国赈款，更是完全吞没，一文钱都到不了灾民的手里。放种鸦片、鸦片公卖，就是这样都不能维持。还举行大裁员减薪，以“节流开源”，这样更加深工农劳苦民众的苦痛，引起他们反抗的烈火。

“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第三表现在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动摇崩溃”，（中央）因为国民党财政的破产，费用的浩大，加深对士兵的压榨，使士兵生活恶劣到极点，许多部队兵士吃不饱饭，饷是一个铜板都见不到，每月的伙食费还要七折八扣，结果一文没有，加以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影响扩大和深入，使士兵的反对官长，算伙食，要鞋袜等日常斗争，兵士自动哗变弥漫了陕甘各地，接近边区最近已有两连的哗变投到游击队中，（石子俊部）八一运动中士兵给红军募子弹铜板，拥护红军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士兵群众对打红军的消极动摇投降红军情绪的普遍，因此游击队每次作战，把敌人的军队很容易击溃和瓦解。“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是正在增长着，更大规模的兵变潮流还在前面”。（中央）

“最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削弱，还表现在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散涣与冲突”，（中央）这个形势，陕西国民党的统治毫无例外地发展着，虽然他们对围剿边区是一致的，共同向游击队进攻，但是他们的冲突矛盾，是不能有丝毫解决的。最近蒋介石系和杨虎城的冲突非常剧烈，在各小军阀割据形势下面，为了争取地盘，明争暗斗，更是剧烈，杨虎城与马青宛的冲突，邓宝珊与孙蔚如的冲突，（孙部离开兰州）最近杨部的新旧系斗争更为剧烈。这些都是使他们内部的指挥不能统一的。革命危机的成熟，使这些冲突矛盾更加深起来。

五、但是最主要的不同，还是工农劳苦民众革命力量的增长〔壮〕大，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影响的深入和扩大，游击队经过相当改造，边区已经开始执行了土地革命，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

“全中国反帝运动的大风暴，扩大到十八省的水灾饥荒，空前的国民经济浩劫，工农兵以及灾民难民斗争的伟大发展，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一切这些，不能不使这一围剿比较第三次也更为困难了”。（中央四次围剿决议）

在这个形势下面，陕西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经过今年的水旱冰雹各种灾荒之后，更加深刻。成千上万的工农劳苦民众，生活的苦痛达到了顶点，饥饿死亡流离，造成一副最残酷的图画。而豪绅地主国民党苛捐杂税田租高利贷各种方式的剥削，更加残酷繁浩。田地荒芜，工业的破产，商业的停滞，百物昂贵，经过上海和天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攫取热河进攻平津的形势下面，更加尖锐化起来。为了进攻红军，使工人的生活已到非常恶化的地步。兵工厂工人每天要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还要加夜工，工资不发，裁员减薪，公路局修理班工人不发薪，印刷工人的大裁减（西安日报社一次开除三十余人），士兵的生活，已经到了饭吃不饱，没有鞋抹，会客不自由，没有一个铜板的地步。至于边区内，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烧毁粮食房屋，全家屠杀，用尽一切残酷的手段，进行他们的清乡。这种形势在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形势下，是更加尖锐起来。

工人的斗争与罢工形势正在开展，在兵工厂工人、电政工人、汽车工人、

印刷工人的斗争，怠工罢工相继爆发，汽车修理工人的罢工，支撑一月余，直到现在还是继续，经过八一运动，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到红军中去，给一个铜板的募捐，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工会，都是显著的特征；农民的抗捐税、反豪绅、分粮抢粮、分地的斗争，已经进到与豪绅地主的武装、国民党军警的剧烈冲突，韩城、渭北、旬邑等地的农民游击战争已经开始，士兵的斗争和哗变都在猛烈地普遍开展，这些一切斗争形势，恰如中央指出“这些斗争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发展到游击战争与新的苏区的创造”。（中央）

陕西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已经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工人反日救国会的成立，士兵反日联合会的迅速发展，情绪的增高，农民反日救国会的发展，已经与农民的日常斗争，分粮抢粮斗争联系成一气（如三原、户县），形势的发展，无疑得很迅速的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已经不简单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罢课与示威。

因为革命运动的猛烈发展，共产党在工农劳苦民众中的威信是大大的提高了，工农劳苦民众已经了解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要求共产党去领导他们，组织他们是到处有的（韩城农民士兵派代表，要求党去领导）甚至富平澄县农民自动的起来，用共产党的名义与豪绅地主国民党作斗争，党在群众中的政治鼓动，组织力量，经过一月来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北方会议的正确决议之下，是大大地扩大深入与提高了。虽然党的全部工作还正在开始转变，成绩已经是显著的可以看到。

这些，完全证明了“革命危机在全中国是存在着。在这一革命危机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是大大地增加了。”（中央）

六、分析了以上的形势与阶级力量对比之后，很清楚地可以指出我们不仅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在艰苦的斗争中争取得新的胜利，在新胜利中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成立英勇的红军第二十六军，以燃烧起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这一任务的彻底实现，“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面前表示张皇失措的那些无气节的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中央）

因此，必须彻底揭发过去省委和几个同志对边区游击队领导的一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危害到党，放弃或延缓了创造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任务，使党的工作在过去这一时期还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北方会议前，省委对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估计是完全不足，认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因此，“对于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之胜利与苏区之伟大的发展与巩固，不去动员并组织群众来举行庆祝和拥护，以开展并提高群众斗争决心，以扩大陕甘边境之游击区域。对于建立游击区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是完全动摇不定，放弃了巩固根据地的任务，采取了可耻的逃跑主义，及“截断渭河交通，攻取三原的‘左’的计划。”（中央指示信）因为省委本身就犯了这些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所以“过去虽也曾经反对了杰夫同志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给了他以相当打击”，（中央指示信）然而杰夫同志路线还是长期的统治着游击队，直到现在，游击队中的党还是继续着杰夫同志的路线。

杰夫同志根本不了解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中国革命危机尖锐的增长，在“九一八”事变后，即由个别的观念，“满洲事件是日美冲突，陕西反帝斗争暂时低落，农民武装斗争，革命兵变条件还没成熟”，“边区游击队只能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逮捕最大豪绅，先改造好再去游击”等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到游击队后，联系起来，形成与省委完全相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之下，认为“执行土地革命、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投降豪绅地主国民党军队（如警卫团的妥协，山合民团改编为赤卫队），放弃了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的建立，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树立，否认了省委的领导（封锁省委的指示文件与决议）对反帝国主义、拥护苏联的运动，是根本忘掉，领导游击队执行了最可耻的上山逃避主义，过了半年流寇生活，使游击队遭遇到几次几乎完全瓦解的危险，根本阻止了创造北方新苏区的任务。执行杰夫同志的路线，是党最严重的死敌。

省委为了反对杰夫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派厉君同志到陕甘边区巡视，边区工作是有了相当的转变，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法令

和决议，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有相当的建立，提高了党在游击队中的威信，党的工作也有初步的建立，当时在群众中是打击了杰夫同志的右倾路线，然而在省委“对于建立游击区域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是完全动摇不定”的路线之下，厉君同志的领导，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在：（1）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开始分配土地。（2）没有巩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彻底进行肃反工作，深入反富农斗争。（3）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树立。（4）不了解边区中反帝斗争与拥护苏联的意义。（5）对游击队的改造还是没有，直到三原，根本忘记了这一工作。（6）没有决心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犯了上山逃跑主义（五支队的离三原，游击队的离边区）。（7）党的改造完全没有。（8）青年团工作没有去建立。这些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是阻止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最后，省委接受了“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之后，根据省委的决议案，很显明，省委对于目前政治形势还是完全估计不足，认为陕西革命危机并不存在，公开地在“北方落后论”“陕西特殊论”的掩蔽之下，对于中央的正确的路线，还是动摇不定，不能坚决地去执行，因此对于省委以及厉君同志过去的领导还不能有清楚的估计，只是算帐式的忏悔录，对于土地革命，临时革命政权，无产阶级领导权，不深入〔反〕富农斗争等最中心工作中的错误，不提一字，对于省委反对杰夫右倾机会主义中得相当进步完全取消，真如中央指出，“不会认识正确的路线及过去的错误与教训，来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彻底的转变”，这样毫无疑问地在最后的任务中，就对于执行土地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彻底执行肃反工作，开展边区中的反帝斗争，拥护苏联任务，是完全没有提到。省委认为这个决议^⑨是阻止工作的彻底转变、创立新苏区任务的彻底执行，立即宣布无效。

北方会议后，省委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区与游击队的工作，以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派愚痴同志去传达省委的决议，执行以上的任务。在北方会议与省委的正确路线之下，使边区工作是有了更显著的进步，已经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农民的游击队（清水原）开始边区的游击运动，游击队政治工作也有相当的整理，

反杰夫右倾的路线斗争，更深入到群众中去。这些成绩是不能否认的。然而愚痴同志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估计的不足，由于“在这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的无气节的对于革命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仍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在攻击省委正确路线为“左倾”立三路线的荫庇之下，以掩护和执行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延缓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任务的执行，这些错误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在，（1）不能广泛的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分配土地中完全执行了富农路线（富农和贫农平分土地），侵犯了中农利益，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动摇，不给游击队战斗员分土地。（2）革命委员会只是狭隘地建立了三个农村，不是广大的群众运动。（3）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4）对党的领导力量以及游击队过去在边区的一切成绩（如包括有七十四（二）村的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政府各种法令，农民代表大会的召集，赤卫队的相当改造与建立等等）是采取了取消的观点，因而（5）游击队中和地方的肃反工作没有执行，对于游击队中的反革命阴谋采取了容忍包庇的策略，不能积极地动员群众去彻底肃清，使这些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负重要的责任，公开地反对党的路线，反对党的领导，进行它们反革命的活动。（6）游击队中的成分改造，根本忘记动员广大的雇农贫农苦力参加游击队，没有开始这一工作。（7）反帝运动，拥护苏联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是口头上讲到，实际工作还没有开始。（8）健全党的领导，大批地吸收新的成分加入党，提拔新的党的干部与群众干部，在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中驱逐一切不可救药〔的〕土匪流氓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以巩固党的领导，提高党在部队中的绝对威信，这一最严重的工作是放弃了。这就是愚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内容。愚痴同志拿着这条路线敌视省委的路线为“左倾”的立三路线，这是最阴险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使游击队在今天还是继续着逃跑主义，党必须集中火力最严厉地打击这条路线。

七、为了要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为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西北上进攻苏联的战线，陕西党必须执行以下的战斗任务：

（一）“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择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迫切任务”。的确，“这在今天陕西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中是更显明与急切的。”（中央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决议）因此，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番号即用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一团）执行这一任务，必须彻底改造现在的游击队成分“红军的社会成分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骨干应该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者，要有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动员广大的雇农、苦力、贫农，以及最可靠的中农，参加到红军中去，红军的优待条例，必须广泛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以提高加入到红军中去的积极性。省委丝毫不能迟延的经过互济会，C.Y.，各种群众组织，在西安工人群众中，扩大征调到红军中去的运动，动员大批工人去建立工人的指挥骨干。目前红军的指挥员，必须是最可靠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坚决地立刻撤换现在游击队中的土匪流氓，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指挥员，对于现在游击队中的土匪成分，应该毫不迟疑淘汰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了红军的基础，红军的干部必须立即择游击队中可靠的份子，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以及随营学校，提拔这些新干部去担任红军中的工作，绝对要打击过去只靠省委派人去，放弃了这一工作的机会主义的等待观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立刻按照中央所颁布的红军中政治工作条例去建立。

“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大利用袭击进攻的战术，但同时即须学习阵地战与平原战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苏区”，（北方会议决议）“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目前对于敌人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中央决议）红军要根据这个原则，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一方面，以击破敌人的“围剿”，必须坚决执行省委的军事计划，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红军的作战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中领导，无论是袭击和进攻，绝对纠正过去各自为战、完全没有指挥的零乱散漫的现象，还是拘泥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失掉集中指挥的逃避战略。但同时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成为军事冒险，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二）“土地问题的正确地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应该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中央决议）“中国富农的特性是兼半地主和高利贷者，其土地亦须同样没收与分配”，“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在他不反革命的条件下，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土地法令）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是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唯一前提。因此，第一，必须坚决执行以上的原则，坚决反对杰夫同志领导时藉调查统计以延缓土地革命的任务，以至根本认为土地革命边区还不可能的可耻胡言。打击愚痴同志领导下的富农路线，不没收富农土地，并且与贫农雇农平分，侵犯中农利益，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动摇。第二，苦力、雇农分配土地要占优先权，成立贫农团、雇农工会，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自然，对中农的利益也必须顾及，对中农土地一般的是以不动为原则。第三，对红军兵士与游击队战斗员也必须分配土地，并执行对红军的优待条例。坚决反对不给红军和游击队战斗员分配土地的错误观念，借口土地少，放弃了这一工作的执行，是不能提高他们的战斗勇气。第四，分配土地必须是在党领导之下的广大群众运动，宣传鼓动广大群众自动起来分配土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反对狭隘的只从三个两个农民入手，同时把土地革命束缚在游击队中党的支部以及少数党员的活动，动员群众起来去参加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建立和巩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红军政治部、士兵代表，以及选择当地最可靠的苦力雇农贫农分子，立刻成立边区革命委员会，集中对红军群众组织和当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彻底摧毁消灭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彻底肃清，颁布和实现苏维埃政府各种法令和决议，革命委员会一定要健全起来，设立各种委员会以加强其领导。过去游击队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游击队下的一个部门，听游击队的指挥，不了解它是一个群众的政权机关，以致革命委员会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形成强有力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必须吸收当地的苦力、雇农、贫农参加，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去转变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才能彻底地肃清富农分子。过去的革命委员会，因为不能执行一切革命政权的任务，有些富农混到革命委员会中，以进

行反革命的活动，阻止土地革命的执行。“在边区广大的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四）坚决执行肃反工作，肃清一切反革命阴谋，再没有比现在这样紧张与迫切了。谁要忽视和延缓了这个任务的执行，就是有意地把现在的游击队送给敌人去摧残，以至消灭，根本断送了党所指出创造新苏区（的）严重任务。因此，必须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动员群众，团结一部分可靠的干部，立刻破坏反革命阴谋，逮捕一切主要分子，公开地在群众中审判。以教育群众，更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这是各苏区的宝贵经验，绝不能有丝毫的忽略。至于地方上的肃反工作，必须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成立健全的肃反委员会，坚决的肃清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反革命的活动，才能创造和巩固了边区。

（五）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彻底执行以上一切任务的先决问题，必须最严厉地打击过去省委以及游击队对无产阶级工作的取消，直至最近愚痴同志对游击队和边区工作的领导，还是放弃了这一工作的最严重错误。第一，边区内的阶级工会立刻成立，不论工人数量的多少，把苦力店员雇农都组织在工会中去。第二，立刻实施劳动法令。第三，从西安动员产业工人到边区去。第四，党的组织中大量的吸收苦力、雇农加入，以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第五，立刻把游击队中的工人、苦力、雇农分子提拔起来作红军干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必须是苦力雇农。

（六）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为了创造和巩固边区根据地，粉碎四次围剿，必须尽量地开展边区周围的农民游击运动，组织大小的武装队伍，到处扰乱敌人的后防，袭击敌人的辎重，使敌人不能集中力量进攻。同时，开展游击区域，摧毁豪绅地主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目前主要的游击区域是旬邑、正宁、淳化，向渭北发展，以与渭北的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互相呼应，这样去巩固根据地，粉碎四次围剿。在边区内的农民武装的组织，必须特别加紧，毫不放松地去进行，建立农民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以保证苏维埃政权，进行与反革命派的斗争，同时，也就是红军的后备队伍。进行这些工作，必须最

严厉地打击杰夫同志以及游击队中其他同志不信任群众力量，认为农民只能摇旗呐喊，因而放弃了武装农民的一切工作，投降豪绅地主，把民团改编赤卫队，领导双手送给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

（七）在边区内应该抓紧日本帝国主义进占热河平津及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进攻苏联的一切事实，进行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在一切宣传鼓动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来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维持他的反革命统治。“应该在这种宣传与鼓动的基础上，动员组织领导工农红军与成千成万的劳苦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创造和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十倍的加紧扩大红军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每个劳苦群众及红色战斗员了解，只有在土地革命产生起来的得着千百万劳苦群众热烈拥护的工农红军，是唯一能够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及保障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又是四次围剿苏区的主要的组织者与指挥者，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力进攻苏联的危险。使他们了解，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如组织反日会与反帝大同盟等反帝组织，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反日义勇军，组织检查日货队，彻底检查日货，把没收来的日货充失业工人生活费和各种群众反日团体的经费，积极加紧民众反日会的筹备与组织，以集中反日反帝的运动。

（八）用红军和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瓦解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用各种方式、标语、口号、宣传品以动摇士兵，最主要的是在游击队和当地农民群众中，选派一部分积极分子，打进围剿的部队中当兵，组织这些部队中的革命兵变，以瓦解敌人的军队。

（九）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最主要的中心，现在那样稀少的党员是担负不起这个任务的。因此游击队中必须很快地吸收大批的新党员，成分主要的是工农。巩固支部组织，建立支部生活，把现在党内存留的土匪和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中彻底肃清出去，以巩固

党的组织。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与指示，支部中必须详细讨论，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使每个党员都能了解党的路线和策略，为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给过去杰夫同志领导时，否认中央与省委的领导、不要省委的政治领导，只是和省委要人要子弹的错误观点以致命打击。坚决地与脱离党的路线、单纯军事行动作最坚决的斗争。边区地方党的组织，必须很快地建立起来，开始即（选）择当地积极的苦力雇农贫农，无条件地吸收他们入党，反对一切关门主义，或者认为地方党是省委的事情，这是最有害的观点。为了加强边区工作，省委认为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去领导。边特委由〇〇〇^③同志等组织，边特书记由〇^④同志担任。青年团的工作，必须很快地建立起来。

（十）积极开展妇女运动，“在白区内，根据劳动妇女特殊地位与痛苦，尽量发动她们为本身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加紧领导她们一切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用各种适当的方法和方式吸收她们参加整个的工农的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在苏区内应加紧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尽量发展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利用洗衣队、做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方式）改良自己的生活，同时必须站在两条战线的战线上坚决地消灭一切对于劳动妇女工作的忽视与错误。”可急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各级党部与群众组织必须建立妇女部、妇委会和妇女组织员等组织。

（十一）开展青年运动，建立青年团工作，过去陕西党根本不了解陕甘边新苏区的创造，没有广大青年群众起来热烈拥护，是不能够得到彻底胜利，所以对青年团工作完全取消，直到今天，游击队还是没有丝毫的转变，省委认为这只能从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出发。开展青年运动，建立青年团的组织，是边区内不能有丝毫的迟延。首先，党必须帮助青年团建立红军中以及当地工农劳苦青年群众中青年团的组织，帮助青年团广泛地组织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青年群众的组织，在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中，以开展青年运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边区中的肃反工作，保卫边区，参加一切群众政治和组织工作，同时就是红军的后备军。

（十二）建立回民工作是边区内丝毫不能放松的工作，根据苏维埃政府的

少数民族决议，深入回民中的土地革命阶级斗争，肃清回民中豪绅地主分子，建立回民的武装组织，过去游击队对回民工作是有相坐成绩，但对回民中的阶级斗争根本没有去执行，还是和回民中的豪绅地主去妥协。

（十三）在非边区内首先必须加紧扩大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运动，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动员成千上万的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反对国民党进攻陕甘边苏区，扩大募捐运动，征调大批工人到陕甘边区去，组织慰劳队代表团到边区去鼓励边区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斗争勇气。提高非边区内的斗争情绪。

（十四）建立城市工作，开展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和罢工，党必须加强西安几个中心工厂中的工作，尤其是西安华阴兵工厂，运输工人中的工作，在增加工资，反对加工，减少工作时间，发清欠薪反对罚工等日常斗争基础上，号召工人反对进攻苏区，拥护红军的罢工示威，号召兵工厂工人不造一枪一弹去进攻红军，运输工人不运一兵一卒去进攻红军的斗争。号召大批工人到红军中去。

（十五）加强农民与灾民斗争的领导，开展渭北、东府、西路的游击运动，省委必须集中领导这几个区域内的工作，建立农民的武装，发展群众组织，领导农民反捐税、抗租、抗债、分粮、抢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分给苦力、雇农、贫农、中农的斗争，摧毁豪绅地主统治，建立这些区域内的苏维埃政权，以创造这几个区域内的新苏区，以与陕甘边区互相呼应，打成一片，为创造一大块苏区而斗争。

（十六）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工作，更要特别加强，尤其是围剿边区部队中的工作省委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十七师，四十二师，特务团工作的领导，派些得力干部到这些部队中去，组织革命兵变，投到红军中去，对现在士兵中已经开始的拥护红军运动，募捐一个子弹给红军，十倍百倍地扩大起来，以瓦解敌人的部队，以提高士兵斗争情绪。

（十七）反日反帝拥护苏联斗争，必须开展起来，加强工人反日救国会、农民反日救国会、士兵反日救国会、城市贫民反日救国会、学生反日救国会中的工作，建立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号召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进攻华北，帝

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进攻苏联大战的示威，以与反对围剿陕甘边区的斗争联系起来。

（十八）为着实现上面所指出的任务，必须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一斗争不应停留在上级机关而应深入支部、深入群众。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对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躲藏在“北方落后论”“陕西特殊论”“革命发展不平衡”“农民没有土地政权要求”等等理论之下，不去组织并领导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执行十足的富农路线，忽视甚至公开阻止农民抢粮分粮分土地的斗争，不积极组织革命兵变，以官长路线代替士兵工作，忽视创造陕甘边苏区和扩大红军的任务，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可耻的上山逃跑主义，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也不能一点放松，只有对这些倾向，尤其是右倾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注：①当时红二十六军尚未正式成立。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下达后，有些文件把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同时并提。

②即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

③根据习仲勋一九四三年《关中党简史》：“一九三三年三月在照金建立了根据地，这时陕甘边特委由金理科、习仲勋、师克寿等组成。金任书记。”

④指金理科。

*这是孟坚到省、李艮巡视陕甘边游击队返省后召开的省委会议的决议，决议根据中央北方会议和中央八月一日指示，检查了省委在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派厉君主持边区和游击队的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 新苏区决议（节录）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

一、在两界〔个〕世界与中国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下，由于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急进，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的统治，全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加深，特别是苏维埃红军新的伟大的胜利，全国罢工浪潮有力的高涨，反帝怒潮的澎湃与东北千百万劳苦群众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扩大与深入，全国灾民农民与士兵斗争广泛的润涌高涨，中国革命危机在全国范围内极尖锐的增长起来，显然的不仅革命危机在南方存在着，而且也在北方（北方会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决议）。

国民党豪绅地主阶级反动的统治，连年继续不断的水旱灾荒，风雹黑霜虎疫虫祸不断的军阀混战争，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捐税高利贷各种残酷方式的剥削，压榨与奴役，造成陕西空前未有的经济浩劫，农村经济破产，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陷于饥饿的绝境，全陕千百万劳苦群众被经济浩劫驱逐到失业失地，流离逃荒，饥饿死亡的道路。

渭北遭受了春荒与夏荒的严重打击，眼前秋收又是绝望，在农村经济破产更加深入下，广大农民被剥夺，耕种工具和土地从农业生产中驱逐出来，一般贫民以致〔至〕中农都是没有牲口耕地，没有种籽种麦，成千成万的农民根本失掉了农村生产的一切根据以至土地，广大地从农村里向北逃荒。（富平、三原、蒲城、耀州等地）一切豪绅地主富农把所有的粮食与动产从农村运往城市，使农村粮食缺乏与金融恐慌达于极点，另一方面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抓着秋收时机，更加拼命地向着已经完全破产了的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吸吮最后一滴血，来维持他们垂死的命运。

苏联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与中国苏维埃红军新的不断的光荣的胜利，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渭北群众中政治影响的深入与扩大，以致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十倍百倍地提高，在世界两种制度与中国两个政权下面群众生活完全不同的对照，使渭北广大群众了解到经济浩劫中，只有苏维埃是脱离饥饿死亡之生活唯一的光明大道，广大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是有极热烈的同情与坚决的信念，帝国主义更猛烈的新的分割中国的炮火，更加提高了广大群众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斗争的勇气与决心，渭北群众斗争是在如火如荼地暴发起来，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与抗捐抗债抗租税的斗争，弥漫着所有的渭北乡村，目前渭北群众斗争的特点，斗争的区域与参加斗争的群众大大地增加与扩大了，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是大大地增高了，群众每一个斗争都是和地主豪绅民团军臀极尖锐的武装冲突的形势，三原武字区完全摧毁了豪绅地主国民党的统治，斗争的顽强性与组织性坚持性是大大的加强与改变了，最主要的土地革命的斗争的深入，在原富耀边已开始了分土地的斗争，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苏维埃与国民党两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渭北这一形势的开展粉碎了“落后论”、“特殊论”、“陕西农民没有为苏维埃土地革命而斗争的决心与勇气”一切机会主义的胡说，说明了北方会议创造北方苏区是完全适应目前形势的党的战斗任务，显然的渭北群众斗争剧烈开展是把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提到了渭北党的面前。

二、明白地指出渭北新苏区创造顺利地首先决定于党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坚强领导作用，检查渭北党对于群众斗争与游击运动的领导一般的虽然是加强了（三原领导分粮斗争，富平、蒲城领导了抗捐税斗争，与蒲城领导了游击战争运动等）但还有着最大的严重弱点，存在着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首先表现在对目前形势完全估计不足，离开北方会议的正确路线，土地革命只能在三原武字区实行，党内好些同志主要的是负责同志，认为群众不敢要，不能要，以至不须〔需〕要土地革命。（三原县委同志们）其他地方只能作宣传口号。“陕西革命不平衡发展是特殊的”（一成同志），土地革命以至群众斗争，都要在弄到枪杆以后（蒲城县委同志），土地革命现在谈不到，现在群众斗争中心走抗捐税和分粮（富平县委同志），在这样一条

“特殊落后”，以至群众没有为苏维埃土地革命斗争勇气决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便不去领导广大群众的分土地与创造苏维埃的斗争，把群众今天最中心的战斗任务推迟到远〔遥〕远无期，把群众斗争束缚在分粮（三原），算帐（蒲城），抗捐税（富平）斗争中，阻止土地革命的深入与发展。从这一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右倾机会主义出发，另一方面就造成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与关门主义，不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空喊游击战争（富平），脱离群众与群众斗争，专门作土匪民团首领的勾结运动（蒲城、富平），实行共产党少数英雄军事阴谋的军事冒险（蒲城），在富农路线下，不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与开展党的工作（富平等地），在党的组织上采取关门主义的策略以至下命令停止群众分粮斗争，在敌人进攻中准备逃跑与不抵抗（三原）。这种左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恶果，党的领导不但远远落后在渭北广大群众斗争发展的后面，而且成了群众斗争前进的阻碍，使许多游击运动得到了可耻的惨败，使党的组织与工作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北方党对于有准备有组织地发动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表现着忽视与消极或拘束在日常斗争中的范围内，不去抓紧群众剧烈斗争形势，有计划地发展游击运动而只停流〔留〕在所谓准备中。甚至借口“暴动条件尚未成熟”，无法发动游击战争，在游击运动已经开展的区域，则又不能开展广大群众的斗争，执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所有这些都是充分地暴露着富农路线对于北方革命〔的〕危害的实质（北方会议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决议）。这完全是说明了渭北党的富农路线对于游击运动、土地革命、创造苏区危害的实质。蒲城游击战争根本脱离群众光杆党员的阴谋与冒险行动，富平党勾结土匪民团的游击战争路线与三原党把游击队埋藏起来不能坚决地开展广大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都是阻止着渭北新苏区的创造。

党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意义的了解，党对工人雇农苦力工作的完全忽视与取消，在广大士兵积极革命化与兵变潮流高涨之下，党在渭北几个中心城市白区中没有任何工作，党取消了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斗争。党不去找着广大群众对苏维埃红军热烈的拥护的情绪，以开展群众拥护苏维埃红军的运动，党对青年团与妇女工作的忽视与取消，党在组织上的关门主义拒绝了成千成万积极

勇敢的劳动群众加入到党内来，所有这些都是左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领导的结果。

为了完成创造渭北新苏区的任务，党必须最无情的最尖锐地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粉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立三路线，在北方会议正确路线与领导之下，实行党的转变，立刻进行下列各种工作，为创造渭北新苏区而斗争。

三、创造原富耀新苏区是渭北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党必须立刻加紧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保证雇农苦力与党在革委中绝对领导的作用，千百倍的加强领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雇农苦力的斗争，目前最中心的是秋收斗争的领导，在广大的开展群众斗争的当中，立刻实现扩大革委的工作吸引后区，许（肃）字区、武字区、耀州、富平、高陵的斗争的群众参加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立刻领导并实行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令及一切法令，依照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没收豪绅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与游击队队员，一切官田庙产口必须分配给群众，把不好的劳动份土地，分给未反动的富农。党应进行广大解释工作，在农民自愿条件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肃清武字区及周围一切反动势力，广大的武装群众，立刻把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有系统建立起来，加紧阶级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领导他们为保卫土地政权而斗争。

游击队必须立刻彻底的改造与扩大起来，肃清游击队中一切地主、富农、土匪、流氓、阶级异己分子，征调广大的雇农苦力贫农与中农加入游击队，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目前必须把游击队扩大编成三个中队的大队，加紧游击队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游击队员完全脱离生产，从隐密埋藏的状态中，公开行动起来（自然不是向敌人公开去）积极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依据群众力量运用游击战术，积极的解决后区、淡村、庄上（里）等地敌入的武装，扩大游击运动，发展群众斗争，以巩固于发展原富耀新苏区的创造，游击队在群众斗争剧烈的开展与敌人不断的斗争当中应该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

在原富耀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原富耀苏维埃政府。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必须百倍加强在雇农中的工作，立刻组织与

扩大雇农工会，定〔订〕出雇农工会斗争的纲领，领导雇农反富农的斗争。立刻用最〔大〕力量建立中心城市工人中的工作，特别是蒲城盐滩工人，耀州炭井工人，三原挑水工人中的工作，大批的征调他们到游击队与苏区中来，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骨干与领导，在苏维埃机关、红军游击队中，须〔需〕有一定的工人数量。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猛烈地扩大党的政治与主张在广大劳苦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千百倍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广大的工人雇农苦力贫农及中农入党，改造与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开展党的工作，渭北特委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加紧领导这一工作，发动全党开始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关于原富耀新苏区的运动。

原富耀新苏区的创造必须与陕甘边苏区劳苦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结，互相呼应地去打击敌人的进攻与袭击，为争取联系（成）一片的苏区而斗争。

四、百倍地加强领导广大农民日常斗争，开展渭北各地的游击运动。

党应找（抓）紧目前秋收时期群众斗争的特点，百倍地加强领导贫苦农民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秋麦的斗争，坚决地扩大渭北各地的分粮斗争，领导广大农民抗粮抗捐税（烟苗捐驻军区团费）抗租抗债的斗争，领导广大灾民贫农包围赈济机关，没收赈粮赈款的斗争，在这一斗争基础上用各种方式去组织农民群众，组织分粮委员会，灾民自救会，分粮纠察队及抗租、抗粮会等，积极扩大与加强渭北原有的穷人会、同心会与农民联合会，广泛地运用农民委员会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团结广大农民在党的周围，为保护农民日常利益而斗争，谁忽视广大农民日常利益斗争的领导，谁就是空喊游击运动，谁就是阻止土地革命斗争深入与游击运动的开展。

在农民群众一切自发的斗争，党必须积极的深入进去，建立党的独立政治领导，把豪绅富农影响之下的群众夺取到党的方面来，目前特别抓住蒲城富平在国民党豪绅地主催粮收款讨债急如星火的形势下，抓着蒲城富平群众酝酿哄堂缴农的形势，党应坚决的去领导广大农民包围县政府区公所抗粮抗捐要饭吃的斗争与示威，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分配豪绅地主赈灾机关大商店粮食，一直到捣毁县政府、区公所、赈灾机关夺取军警民团的武装，来武装群众发动游击战争。

立刻加紧雇农反富农斗争的领导，广大的建立雇农工会，定出雇农一般的与个别的斗争纲领，党应坚决为看（着）这些纲领而斗争，党应根据国际雇农委员会秘书处关于中国雇农工会决议，配合着当地实际情况为着雇农一切要求而斗争，使雇农工会能够形成农民斗争的领导者，应充分估计到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条件下，许多极小极小的斗争往往异常迅速地发展到武装冲突与骚动暴动，因此，在准备斗争及斗争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巩固与发展广大农民组织与武装工作，必须在群众斗争剧烈的发展情势下，立即发动游击运动（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决议）。党必须清醒地估计到目前渭北农民斗争武装冲突形势的尖锐与广大农民要求武装得迫切，在领导农民日常斗争中积极的准备与发动群众的游击运动，在蒲城东乡与东北乡富平美源区，党必须在广大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积极的坚决的去开发游击运动，创造小的游击部队，在广大群众掩护下，在群众斗争当中解决敌人小的部队，扩大游击区域，发展与深入群众斗争。

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当中，党必须坚决打击一切企图把农民斗争束缚在日常斗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应在群众分粮与抗捐税斗争中，积极开发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把原富耀苏区与陕甘边苏区的创造在群众中作广泛的宣传运动，领导广大群众分土地的斗争，广大的进行武装群众的工作，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解决一切反动武装，摧毁一切反动统治，在广大群众斗争深入与扩大的基础上，组织革命委员会，扩大游击区域创造新苏区。

五、加紧领导士兵日常斗争积极准备组织与发动革命兵变。

渭北党对士兵工作的忽视是一分钟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党在创造渭北新苏区斗争中，如果不能把广大的士兵群众夺取到革命方面来，创造渭北新苏区，将要受到绝大的障碍与不可能。因此，党必须以最大力量，去建立渭北中心城市中白军（士）兵中的工作，首先是三原、富平和蒲城特别是冯钦哉部队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进行白军中工作，目前应征调一批同志与可（靠）的赤色群众经过适当训练，打入几个中心城市的白军中去，加紧营内活动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

目前士兵生活的恶化达到无以复加状况，几个月不发一文饷，入秋近冬没

有衣服鞋袜穿，吃黑面包谷，常常是吃不饱，加多上操站岗时间，官长任意打骂，没有丝毫自由等，党必须抓紧广大士兵对长官的不满与苏维埃红军热烈的同情与拥护的情绪，坚决地去领导士兵日常斗争，发欠饷要衣服穿，改良伙食帐，不准打骂，减少上操时间等，组织士兵的委员会与士兵各种附属组织（兄弟会、俱乐部、□□会、红军之友等）。

在士兵中进行广泛的有系统的士兵运动，组织兵营小报，经常印发一切小册子、传单到士兵中去，告诉他们近来苏维埃红军胜利的消息，告诉他们摆脱恶劣生活的出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到党的周围，吸收积极勇敢的士兵群众到党内来创造兵营中党的支部。

党在士兵群众日常斗争领导的基础上，依据着党有力的政治煽动有准备有组织地发动士兵的革命哗变，领导士兵杀大反动长官叛变到红军游击队与农村方面来汇合农民斗争与游击运动，党必须立刻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渭北各县的革命兵变对各县民团公安局武装团体中的工作，亦必须加紧夺取其下层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以瓦解敌人的力量。

六、开展党的职工运动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

创造渭北苏区一个主要的前提是树立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渭北党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是不能容忍的错误和罪恶，党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开展党的职工运动，首先必须加紧几个集体的工人区域去建立党的工作，蒲城盐滩工人造纸工人，富平耀县炭井工人，三原挑水工人以及各城市中各种手工业工人店员学徒，党应清楚的了解他（们）的生活与要求，提出他们适当的斗争纲领。领导他们为这些纲领而斗争，建立赤色小组与组织工会，广大地开展工会运动，团结广大的工人在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组织俱乐部，读书班、兄弟会等附属组织，团结落后的工人，党为了开辟工人中的工作，应该立刻专门派一批同志到这些工人中去建立工作。

党在一般的以至职工运动中，一个中心工作是创造与巩固党在工人（中）的支部，蒲城县委必须用最大努力加强对盐滩工人支部的领导，告诉他们具体工作的办法，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抓紧每一个小的事情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在斗争中增强支部的领导作用，积极发展同志吸引斗争中广大的

积极的群众到党内来，加强与巩固党在盐滩工人中的堡垒，在中心工人中，党必须用一切方法去建立党的支部，加紧城市工作的创造与扩大城市工人支部。

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党必须最广泛的进行征调运动，征调广大工人到游击区域与游击队中加强无产阶级骨干与领导。

党必须立刻讨论北方会议职工运动决议与国际雇农委员会〈，〉关于中国雇农工会决议，定出自己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来。

七、加强反帝运动领导，进行广大的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

帝国主义疯狂般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更加提高了渭北广大群众反帝斗争的积极性与热情，党必须立刻纠正对于反帝运动的消极与取消态度，抓紧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对于热河华北与上海新的进攻，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建立在城市和乡村中群众的反日会与反帝同盟，召集反帝大会与反帝代表会，进行系统的口头与文字的宣传，鼓动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进行给义勇军的募捐运动，动员群众到东北义勇军中去，组织义勇军与日货检查队，实际进行检查日货，没收日货，分配给灾民、贫民与失业工人，组织广大群众的反帝示威运动，

把我党的反帝纲领深入群众中去，号召广大群众进行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国民党，明白地指出只有广大的进行与深入民族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给群众指出苏联五年计划伟大成功，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西北反苏联战争的布置，给群众指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反帝国主义唯一领导者与力量，帝国主义国民党组织了百万兵力，如何残酷地进行四次“围剿”，杨虎城如何动员了四千兵进攻陕甘红军游击队，给群众指出只有拥护苏维埃与红军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才能打倒国民党取得中国独立与解放。在鼓动广大群众最热烈的同情上，进行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红军运动，给红军募捐衣物，征集赠品赠送红旗，组织苏联之友，红军之友社，组织苏联与苏区参观团，召集群众大会与示威发通电与宣言，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拥护陕甘红二十六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反对四次“围剿”，红军反对杨虎城进攻陕甘红二十六军，必须把拥护苏维埃红军，形成最广泛的

群众运动号召群众创造自己的红军与苏区。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纪念日，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运动，在武字区必须召集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

八、加紧妇女与青年工作：

渭北党部一般的完全忽视甚至〔至〕取消了妇女与青年工作，党完全没有看到广大妇女与青年在斗争中的积极，在三原党竟拒绝了广大妇女与青年参加分粮斗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错误，党应组织和领导广大妇女青年参加一切斗争与组织，组织妇女协会与少年先锋队，领导他们特殊利益的斗争，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妇女与青年到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阵线上来。

因为渭北党部对广大青年运动的忽视，所以对于青年团领导形成了拒绝与消极的路线，党应与一切对青年团忽视与取消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加紧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与实际的帮助，党应经过青年团把广大的劳苦青年争取团结在党的路线的周围，目前，渭北党必须用最大力量领导与帮助团冲锋季工作实现。

九、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与组织工作：

只有布尔什维克群众的党，才能保证创造北方苏区光荣的任务顺利地执行（同上），因此渭北党必须积极地去开展群众斗争，与群众工作，在广大群众斗争中，为创造真正布尔什维克群众的党而斗争，首先在群众斗争中，吸收最广大的工人雇农贫农苦力入党，加强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基础，保障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不断的改造党的组织，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富农分子、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坚决地从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中赶出去，在无情地与一切反革命派别斗争中，在无情的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中，扩大巩固与改造党，为了适应目前斗争形势，必须特别加紧秘密工作，严密党的组织。

省委估计渭北群众斗争剧烈的开展与渭北苏区的创造，决定组织渭北特委，集中领导渭北各地党部为这一任务而斗争，特委所辖区域为三原、富平、蒲城、耀州、白水等地，党应特别加强地方党部，首先是支部工作的领导与改造，团结一切新的积极勇敢的工农干部到地方党部中加强地方党部的政治领导，提高

支部在全党组织系统上的地位，一切工作面向支部，健全与充实支部生活，使支部能真正形成群众斗争的核心与领导者。

党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坚决反对一切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与命令主义，党的领导与活动应该形成有计划地有组织的有中心的集体灵活的领导，一切工作都必须有最大的实际性与具体性反对一切空谈与形式主义，最大限度地提高一般同志积极性与创造性，为增加工作速度而斗争。

加紧一般同志的教育与训练工作，提高一般同志政治水平，经过群众斗争与健全支部生活，经过定期的训练班活动，训练班有计划地训练与培养党的新干部来。

十、深入党内两条战线斗争，集中火力打击富农路线：

党要保证党的正确路线顺利的执行，首先必须无情地打击党内一切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立三路线，特别是集中火力打击党的富农路线，只有粉碎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党才能实现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光荣任务，在两条战线与反富（农）路线深入中更要坚决反对一切自由主义与调和态度，为党的坚定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道路而斗争。

陕西省委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信*（节录）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中央：

最近省军委连遭破获，军委秘书刘林圃同志曾参加警三旅兵变，日前在路上遇见这队营兵，〔被〕逮捕带到军法处，当日即行枪决。兵委书记以〔及〕兵委组织负责同志，现兵委完全解体。省委只有书记一人，军委书记王烈同志^①因兵变关系，在西安完全不能立足，已决定派到渭北参加特委常委□□□□军委工作。省委要中央考虑这一形势的严重，在任何条件下派一军委来。

渭北特委成立，八九两日曾召集三原、富平、蒲城、耀州二十余同志，举行渭北各县联席会议，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是另文，杰夫^②同志在最近实际工作中有很大进步，省委决定他担任渭北书记，子文^③同志亦相当转变，也参加特委。

陕西省委（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注：①即汪锋。
②即高维翰。
③即黄子文。

*原标题为：陕西省委来信（中二号）。

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中央：

兹将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胜利进攻中，一般形势及党的工作概略报告如下：

红四方面军由湖北进攻陕西，真是长驱直入所向无敌，他们经过商南商县蓝田，几日前直抵西安城外十余里，现又折向西路，昨天到达户县，周至，据报告，他们〔在〕南山里发表宣言，谓将取宁夏，按目前的形势是向甘肃方面推进的，或由武功凤翔北上与边区汇合，他们行军迅速，日行百余里，省委派代表前往没有追及，现在又在别路相迎去了。

省委根据这一形势，布置全省工作，在西安组织总同盟罢工，组织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欢迎红四方面军的政治罢工。当然在组织罢工中，仍然要以群众日常和经济要求作基础，中心企业是机器局汽车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人力车夫（在这几种主要企业中都有同志或群众关系，固然还很微弱），同时加紧领导失业工人向赈务会议赈会及政府要工作要救济，领导挤兑等等。

在农村中加紧领导抗捐抗税反对派款拉夫缴农分粮等斗争，开展游击运动。由三原派代表团欢迎二十六军回渭北，动员广大雇农贫农群众参加红二十六军，在扩大巩固的路线下，彻底改造红二十六军，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红二十六军应立即成立一团，在一个月中扩大成为一师，省委派宏光同志做渭北特派员撤换杰夫子文工作，提拔新的积极贫农成立特委，同时派厉君同志到红二十六军（厉君始终没有找到部队，不久以前折回省委）。

当然在开展游击战争中，不但要扩大巩固红二十六军，同时应广泛成立游击队，并征调同志和群众到几个主要的土匪部队中去，争取下层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对要求党领导的土匪部队，可公开派人去领导，与争取下层群众的工作同时进行，现已派人者，仅杨万青部队。

在士兵工作中，加深领导革命兵变，在红四方〔面〕军未到陕西前曾组织了几个革命兵变，但因官长路线及机会主义反右倾的英雄主义的领导，都得到残酷的失败。加以西〔安〕你兵委的破坏，使我们在士兵中的组织反成削弱的形势。最近又派遣将近二十个同志到几个中心部〔队〕中去，公开派了一批宣传员到前线进行围剿部队的工作，同时用新的群众路线在几个新的队伍中工作。

整个西北形势是在急剧开展中，省委对全盘工作布置大概如此：东府韩城合阳澄县一带调同志回省，与省委共同讨论工作。东路派杰夫到临潼渭南巡视，并到华阴潼关开辟工作。西路除派同志到杨万青部队中工作，并由渭北组织突击队开辟西路工作。蓝田、户县当省委派代表到红四方面军时，在蓝田群众中做了一些欢迎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现又由该地调同志来讨论该地工作之进行。汉南最近又派两同志前往，团最近可派突击队去，甘宁青工作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省委现仅派一回民同志到兰州，在当时〔地〕成立特委，建立青海与宁夏工作。关于回民问题，省委曾有一单独决议，下次交通来时方能带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红四方面军挺进陕西，出现新的革命形势。这个报告反映了省委的相应部署。本文原标题为：陕委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四方面军对 陕西新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节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中国工农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在全国战线上都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使这一运动在全中国普遍地开展着，提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的决心与勇气，疯狂的起来拥护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与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运动。

（六）

省委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展开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指出省委在这一时期主要的政治错误，省委对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胜利进攻中的形势，在红军进占蓝田，逼近西安的时候，一方面过分估计统治阶级的动摇，认为已经动摇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另一方面特别着重在红军军事上的胜利，忽视敌人的围剿。因此，在工作中着重于拥护红四方面军，反而放松了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围剿的任务，同时还提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六军会师西安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虽然认为后一口号是宣传口号，但实质上是布置全省总暴动的“左倾”空谈。所谓三原地方暴动也是这一错误路线之下的冒险政策。省委这一时期的领导是以“左倾”立三主义的空喊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

(七)

为了积极拥护红军向陕西的进攻，广泛开展工农群众的斗争，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创造两北新苏区，争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必须执行下列的战斗任务。

①必须立即开始拥护红军的新胜利，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广泛群众运动。

②加紧扩大反日反帝的运动。

③加紧武装保卫苏联的工作。

④开展工人的罢工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执行目前严重任务的主要前提。

⑤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苏区。连年的灾荒，久已将广大工农群众陷于饥寒交迫流离死亡的境地，而国民党的进攻红军仍然向着这些劳苦群众残酷的加紧剥削，派捐派款号粮号草，派车拉夫，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必须最坚决最广泛地领导农民反捐税分粮抢粮的斗争。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加强群众组织，积极武装农民，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摧毁豪绅地主统治，建立民众政权。特别要注意在渭北陕甘边区在西府红军经过的蓝田、户县、周至和陕南的汉中、城固、洋县几个中心区域，在红军作战的周围，在敌人的后方和交通要道，要组织游击队，经常给敌人扰乱袭击，抢劫辎重，破坏交通，这样来实际拥护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工作的开展必须极广泛地运用群众路线。组织群众的突击队，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建立开辟这些中心区域工作。

创造渭北和陕甘边新苏区，首先〇〇^①必须最坚决地领导这些区域内最广泛的分粮抢粮杀豪绅反捐税的农民日常斗争。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加强群众的组织，加强群众的武装工作，把这些斗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以开展游击运动。估计到渭北农民斗争，目前开展的形势，每个斗争都可能的发展到武装斗

争，以至农民的骚动和暴动上来。因此我们的党，必须万倍地加强这些斗争的领导。第二，斗争的开展，使我们的党必须最迫切的领导这些斗争，开展到土地革命与苏维埃的道路上来，应该特别抓紧武字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与群众对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自己政权的积极情绪，以提高群众斗争的程度，这样去广泛地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和陕甘新苏区，在这些必须最严厉的打击束缚在日常斗争不去开展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用命令空喊开展游击运动的左倾立三路线。第三，组织反攻武字区的运动，在反攻武字区的政治号召之下，开展武字区周围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组织各种游击队，巩固武字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继续彻底地分配武字区土地，深入肃反工作，彻底肃清该区内的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建立和巩固雇农工会，苦力工会等工作，实施工人斗争纲领与劳动法，吸收大批在土地革命中产生出的坚决勇敢的雇农和苦力工人参加革命委员会与一切群众组织（农联妇联）和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先队、政治保卫队）中的领导。这样去提高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定无产阶级领导，是反攻武字区彻底胜利的必要前提。三原县委在政治上必须作有计划的动员和斗争。才能实现了这个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地反对只以原则和路线的领导代替真正布尔什维克群众工作的实际领导，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执行党最严重任务中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第四，加紧三水工作的领导，开展陕甘边的群众斗争，开发群众的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与红二十六军配合起来，创造和巩固陕甘边新苏区。

⑥扩大巩固和改造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陕北游击第九支队的工作，是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最有力的回答，红二十六军在长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下，没有执行党政治任务，遭受到莫大的损失，力量是大大削弱了，渭北游击队陕北游击队虽然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对于游击队的任务仍不能很好（好）的执行，所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的领导是最迫切地提到了党的面前。必须动员大批的工农

群众到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去，渭北的党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动员三千工农群众到红二十六军与建立红军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按照红军组织条例正式改组红二十六军，加强红军和游击队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的骨干，有组织有计划地深入肃反工作，这样去使红军游击队变成真正的英勇的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和渭北游击队在边区与渭北应采取一致积极行动，响应红四方面军与红三军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进攻。

注：①指李奎，又名金理科。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后不久，又南越秦岭进入陕南汉中地区。省委在这个决议中检查了原先的部署，提出新的紧急任务。

关于陕西省委在政治 领导和实际工作中所犯的 错误的检讨与改组省委的请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央：

关于红四方面军来陕后一段形势的开展，前次报告已约略述及，今天省常委会检查最近期间的工作，认为省委，特别是曹同志在政治领导和实际工作中，犯了严重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对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胜利进攻中的新形势，在红军进占蓝田逼近西安的时候，一方面过分估计统治阶级的动摇，认为已经动摇到不可维持的地步；另一方面特别看重红四方面军军事上的胜利而忽视敌人的围剿，因此在工作中着重以拥护红四方面军，反而放松了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围剿的任务，同时还提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六军会师西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但实质上是布置全省暴动的企图，在三原提出准备占领县城的“地方暴动”，当然也是错误的。当时提出西安总同盟罢工，虽然是必要的和通（适）时的，但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的动员，省委对当前一切紧急任务，采取了不可容许的消极，拥护红四方面军和反对敌人围剿的决议，一直迟延到今天才由省委通过，同样关于广暴工作也完全忽视了，省委没有成立关于广暴工作的决议，除了几个宣言以外，一无所有，在西安的动员是在广暴前一星期才开始的，省委在这一期间是在做立三主义的空谈与官僚主义的领导，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

因此，省常委今天会议决定改组现在的省委，开展深入这一倾向斗争，于最近期间准备召集省委扩大会议，立即提拔渭北新的特委书记^①参加省委，巩固

省会（委）的领导，同时请求中央立即派巡视员前来帮助省委在新形势下彻底转变党的工作。

注：①指金理科。

天花同志叙述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经过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省委：

在这一报告内，我打算把我这一次在二十六军所见到的关于最近的情形，作简单的叙述。

（1）最近在庙湾^①和夏老么^②作战的经过——在军事会议上决定收夏老么的民团枪支，半月以前一个拂晓，二十六军全部和所有的各游击队一齐前去，当时因为骑兵到得早些，使敌人知觉，马上作了准备，向我们射击，为了地理的关系（他们占着三角式的小香山堡），我们骑兵吃了很大的损失，（骑兵连长曾世荣阵亡，政治指导员张秀山带伤，六七个战斗员也带伤，遗失战马两匹，子弹消耗许多）当时将该团包围半天，因恐援兵到来，只好暂时退下，回到老爷岭和前后两区一带驻扎，在这口开会检讨这次行动中许多严重错误。

（3）会议后的情形——夏老么最近很残酷的屠杀香山^③一带的群众，死者五六十，会议后第二天和敌人又接火，（胡三^④、夏老么民团、小丘〔报〕^⑤白军特务三团）当时骑兵已走，（到柳林^⑥、庙湾）敌人向我进攻，作战三小时，我兵退走，将三水、渭北各游击队退到西坡一带，二十六军退到石门关^⑦一带，骑兵和夏老么接火，作战数小时，骑兵步行边杀，随后来了敌兵，将战马二十几匹夺去，当时连夜奔回衣食村^⑧驻扎，第二天早被特务三团及民团包围，当时我们被敌人冲散回到高山槐一带，隐约听到北边炮火连天，杀声大噪，整整一夜，未知后事如何？以后据下来群众谈称，特务团有兵变一营投我们，我们大队会合把民团又形包围，（但不知确否）渭北游击队一队在新〔心〕字区行动，

二队在高山槐西原一带行动。

天花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注：①、③、⑤、⑥、⑦、⑧、⑨皆在耀县境内。

②即夏玉山，庙湾民团团长。

④即胡景铨，富平庄里民团团长。

*天花即金天华，时任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政委。在庙湾战斗中该部配合红二十六军二团，牵制了国民党骑兵团、特务团，使红二团冲出夏玉山民团包围。

中共陕西省委给 红二十六军的信*（节录）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

励君同志：

一月十五号和九号的报告先后收到，朱同志^①并未到省，庙湾战事经过不得其详〔详〕。最近由三原得到消息，知道损失是很大的。在这封信里，省委不是对你们提出一般工作意见，现在特别讲到的是战术问题。

在今天红二十六军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还不是有根据地坚大强固的与南方红军所能比拟的，因此他还不能与敌人作对垒战，主要的应当采用游击战术。红二十六军生长成为正式的有力的队伍，还须要一个过程，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

庙湾军事受挫的教训也就在这里，以红二十六军今天的实力解决一二百条枪而丑“防备很严”的民团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虽然认为，“单纯军事行动没有胜利的把握”，却又企图“把敌人一鼓作气完全消灭，使根据地的盾方巩固起来”。这是非常矛盾而且十分冒险的，现在事实上也证明了确实是军事冒险。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认识与民团作战和与白军作战，是不同的。因为民团是地方反动武装，他们地理熟悉。因与民团作战就更须要借重于当地的工农游击队。我们这次作战，在战口方面，虽〔显〕然不是在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还向民团探问地理，还遭受到民团的袭击。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省委认为红二十六军今天还不应当用“撑架子”的办法，免〔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因为支队过渡〔度〕的扩大起来，不易迅速移动，粮秣供给困难，移动难于隐蔽，容易使敌人识破其企图，也就不容易完成其游击任务；并且在敌人大包围之下，容易被敌人击溃。因此省委的意见，红二十六军今天应当配合当地群众，编成许多小的游击支队，这种小支

队人少的缺点是可以有神速的动作，突然的袭击诡计等等方法来补救的。采取的战术应当是游击，所谓“阵地战”还不是红二十六军今天所能胜利（任）。游击应当很有计划地进行，这就是说应当注意侦察、设埋伏、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运输队、征发队，解决敌人部分武装。要很好地运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办法，各支队彼此要有很密切的联络。每支队都应当有一个至几个秘密的隐蔽地。要这样很有计划地进行游击，就需要一个指挥部，统一这些支队的行动。我们特别着重这些小游击队的编成，必须配合当地工农群众这一点。应当将现在红二十六军里面久经战斗，政治上非常坚定的战斗员，分别与当地斗争中的群众编成小游击队，这才能更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骑兵游击队还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骑兵于战斗时则往敌人侧后动作，于追击时压迫敌人后尾，扰乱其侧方或后方，同时骑兵还是游击队主要的通讯工具和侦察工具。

我们这里的意见绝不是取消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名义固然要保持），相反的，这正是（在）积极开展游击运动中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广泛开展当地群众的斗争。摧残〔毁〕乡村中反动政权，创造许多新的苏区，粉碎敌人对我们“围剿”。

省委要求你们详细讨论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中国游击运动问题两本小册子，并且要详细地研究红二十六军长期作战的经验和教训。

注：①待查。

*原标题为：《陕委给红二十六军的信》。

中共陕西省委给汉南 特委的指示信（节录）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省委审查了先后收到你们十二月二十九〔日〕来信与几种决议和宣传品之后，对于汉南工作，有如下的指示：

红四方面军向陕西胜利的进攻，直接推动汉南劳苦群众革命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红四方面军直接帮助汉南劳苦群众建立了城固升仙村游击队，创造了西乡红二十九军，开展了游击运动（城固、西乡、勉县），深入了土地革命（西乡红二十九军所在地），并且开辟了创造汉南新苏区初步的基础（西乡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正因为红二十九军的创造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政治影响在汉南千百万工农群众中间的扩大与深入，更有力地推动汉南各劳苦群众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杀差人、杀委员的斗争，如火如荼的爆发起来（你们决议议与 C. Y. 突击队报告），这一形势的展开是把创造汉南备苏区的任务提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汉南党必须清醒地估计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在广大群众日常斗争的基础上最迅速最坚决地去动员汉南千千万万劳苦群众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党为着创造汉南新苏区而斗争，首先把党所有的力量用到巩固与发展红二十九军的工作上面。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目前最主要的弱点是因他从农民原始迷信的武装团体（神团）转变过来，农民一切落后意识与迷信观念在群众中还起很大的作用，这一方面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旧的神团领袖还在中间有决（绝）大的作用”（对西乡工作决议），省委要求你们清醒地注意到，如果我们不能隔绝这神团领袖与群众中间联系而使他孤立起来，那我们党的领导是没有丝毫保障的，这个问题与“党在里面的组织非常薄弱，党的政治路线还不深入”（同

上)是联结的。为了加强与保证党在这红二十九军游击队中领导作用,党必须以最大努力,在党的政治路线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克服这一困难,必须把神团领袖与群众完全隔绝与对立起来,把党的路线与主张公开地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用党的路线与实际经验去教育群众,加强党的领导与在其中的堡垒,这还非常不够的。省委给你们一个紧急任务,要党实际到一切工厂作坊、农村、兵营,以至一切劳苦群众当中,去进行广大的动员,号召四千劳苦群众,首先是工厂工人、手工工人、雇农、苦力,大批大批到红二十九军游击队去,扩大、巩固与加强红二十九军无产阶级的领导骨干,这一伟大的进行与改造红二十九军的工作的必须是在有力地开展群众日常斗争基础上面。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目前应当采取坚决地对敌人进攻的战略,省委同意你们对红二十九军目前采取游击战术一般的决定,党必须清醒地估计敌人进攻的形势与我们的力量,灵活地运用我们的游击战术,去袭击与进攻敌人,应该打击一切离开阶级力量对比的军事阴谋与冒险,同时集中我们的火力,反对一切逃跑上山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里省委要求你们仔细研究中央关于创造陕甘边苏区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与研究红二十六军一年来的实际经验,这对于你们正确领导与转变红二十九军有伟大的实际意义。省委同意你〔们〕“红二十九军的创造是群众斗争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认识,“严厉打击潜^①同志意见是脱离群众斗争企图用收编形式创造红军”更是必要的。省委要你们使此种精神成为实际斗争的内容与方针,而不是清谈。必须在汉南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配比〔合〕上,红二十九军才能有决定的胜利。立刻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运动是党目前中心的战斗任务之一。

你们对西乡工作决议中,在路线上省委认为有严重的右倾右〔机〕会主义观点,在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你们创造红二十九军与汉南新苏区最利害的敌人。你们把树立党的组织放在一切任务的前面,你们用这样的右倾观点来阻止与放弃对广大群众斗争的领导,来掩盖对群众斗争领导的消极,决议中完全没有着重地指出党应当怎样去领导群众各种日常斗争,怎样去开展游击运动,怎样去巩固扩大革命委员会,怎样深入土地革命,而只是简略附带的提到,甚至仅是一句话。你们对这些党的中心工作与中心任务的忽视,绝不是偶然的,正是你们以上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树立与加强党的组织是目前党重要的

战斗任务，不然党不能保证实现对群众的领导。但这必须是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实际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正确的了解只有坚决执行党的任务与工作才能加强与巩固党的组织。省委要你们深刻了解你们这一观点错误的实质，发动全党同志，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作残酷斗争。应该积极地去领导群众一切日常斗争（抗粮、抗债、抗租、抗款、分粮、吃大户、打委员、杀差人等），坚决地积极地去开展红二十九军游击队根据地周围的游击运动，在群众斗争基础上组织各种小的游击队。……你们必须了解，创造西乡、城固新苏区，一定是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你们对于深入土地革命，巩固革委与创造苏区的工作，还没有引起更大的应有的注意，我们必须抓住钟家沟、罗（骆）家坝、张家沟等地分土地的经验与影响，在开展群众斗争、游击运动的基础上，积极的深入扩大土地革命斗争，汉南土地剧烈的集中化，是说明执行土地革命（是）党更迫切的任务，基于群众对分土地的迫切要求，党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巩固西乡革命委员会并在开展群众斗争上积极扩大起来，使革委能包括与领导更多的斗争群众，为创造与开辟新苏区而斗争，这需要红军游击队积极的行动，必须尽量吸收一切工人、雇农都到革委中来，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与一切法令在群众中作广泛地宣传与解释，革委应马上颁布苏维埃一切法令，并号召群众为这些法令的实现而斗争。

省委（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注：①指陈浅伦。

中共陕西省委给汉南特委信（节录）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汉南特委：

与刘○○同志^①谈话，省委更能深切了解汉南党数月来工作的实际情形，省委觉得除前次省委巡视员^②带给你们的指示信外，还有更具体指示你们的必要。

许多实际材料还〔完〕全可以说明，汉南党由于对目前形势没有明确的布尔什维克估计，与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的估计不足，造成了党在工作路线上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与“左倾”立三路线的空喊，这完全阻止了汉南广大劳苦群众斗争的开展深入与党的彻底转变。

在总的方面，你们是脱离群众和离开群众日常斗争的，你们是在“左倾”立三主义空喊下面掩盖你们实际机会主义的消极，你们是用上层路线代替了党的下层群众路线，今天来说：汉南党还没有真正到群众中去，这不得不使你们在政治路线上，处于“左”右摇摆之中。

在农村中，党没有真正实际地抓紧广大农民一切日常利益斗争去领导组织他们，真正地从群众利益日常斗争上，开发与开展游击运动，而是离开广大群众与他们目前迫切要求的斗争，完全用上层路线的勾结，代替了党真正的开发游击运动的群众路线。红二十九军游击队是由民团与神团转变过来的，我们党没有努力去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完全作了上层的首领的活动与勾结，我们的政治委员用一批委任状，委任民团神团首领为红军营长或团长，红二十九军这样就成立了，党的领导建筑在上层首领中间，而没有深入下层群众中去。因此红二十九军游击队，虽已有四队，但未能执行他的任务。你们划定四个游击区域，主要出发点是看那里有枪，那里有民团神团或猎户团，其中有一点上层关系，那么这就是一个游击区域，这里便可以创造苏区，完全没有从群众斗争上出发，

这只有能使游击战争变成为空喊或走上失败的道路。

在士兵中间你们也同样是走的上层官长路线，而不去深入下层士兵中领导他们一切日常斗争。

对于职工运动，你们是在空喊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下不去实际的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建立党的工会运动。

创造汉南新苏区是党的中心战争〔斗〕任务，但你们必须了解，他还不是今天党的具体行动，你们必须对群众中斗争实际形势，有明确的布尔什维克估计，你们必须了解胜利的创造汉南新苏区还必须经过群众斗争的过程，群众今天最迫切的要求，还是抗粮抗款，分粮等实际斗争，党只有在组织与领导群众当前这些迫切要求斗争基础上去扩大与深入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游击运动，才能实现创造汉南新苏区的任务，你们企图马上号召群众起来创造苏区无疑的是幻想，一切离开群众实际要求与日常斗争的企图他如何〔用〕“左”的激烈的言辞来掩盖都是党创造新苏区最严重的敌人。

因此在党的路线上，省委要求你们彻底的转变，把前次与此次指示信配合你们实际工作情形，从特委一直到支部中作广大彻底的讨论用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精神，彻底检查过去在路线上与实际工作中一切错误，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党的正确路线与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作无情地不停止的斗争，只有在这样布尔什维克两条战线斗争基础上，才能克服党的一切错误，才能彻底转变党与胜利的创造汉南新苏区。

省委在这里不重复前次指示信，省委针对你们目前的工作路线与实际工作，坚决要求你们到广大群众中去，应该最清晰地知道，群众今天最迫切的要求，些要求的实际获得而斗争，为反对资本进攻与国民党一切剥削而斗争，为保护群众利益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经过党的教育与领导，组织一切先进的以至落后的群众，并把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组织罢工与开展游击战争，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兵士的革命哗变，汇合这三种革命力量，走上反帝反国民党创造新苏区的大道。

对于升仙村受打击后的游击队，红二十九军游击队，以及你们所注意到的武装部队，自然党不能丝毫放松，应该立刻加强党的领导，派得力干部去领导

他们在斗争中肃清部队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巩固无产阶级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定出他们游击纲领，教育每个战斗员都了解他们为什么当游击队和游击队的纲领与任务，游击队目前主要任务还是尽量发动与领导群众一切抗粮抗款分粮反豪绅斗争在斗争中组织与武装群众，扩大与巩固游击队组织，开展群众的游击运动，依靠群众的热烈的斗争，去实行土地革命与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目前是日本帝国主义总攻热河、平津，震动各帝国主义一致热烈地瓜分中国的时候，帝国主义战争的风云，是弥漫全中国，国民党更彻底的投降，是使帝国主义瓜分行动加速度地进展起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红军积极的行动，最近红四方面军胜利地向陕甘进攻，无疑的更要有有力地引起汉南劳苦群众狂热的斗争，汉南党必须抓紧这一形势，去开展广大群众反日反帝运动，首先省委要求你们把反日反帝运动的中心从学生转移到工农兵及士兵群众中，用一切公开活动，进行扩大的反日宣传鼓动，在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组织与扩大各种群众的反日救国会反帝同盟义勇军后援会，要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明显的提到群众面前，组织义勇军与义勇军后备队。针对国民党航空运动领导群众自己进行给义勇军募捐一架飞机的运动，加紧五·七将要召集的全国救国会议在群众中的运动，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同时抓住你们过去拥护红军的工作成绩，迎着红四方面军的进攻，更有力地开展群众拥护红军运动，扩大红军之友社，组织给红军募捐组织各种交通队、破坏队、慰劳队、洗衣队、游击队，直接帮助红军，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在群众中作广大的解释与运动，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上，把这拥护红军，形成一种巨大的政治运动，这是对红四方面直接最有力的帮助。

省委明确指出，造成汉南党政治上动摇的主要来源是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汉南党在今天来说，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省委更着重重复的给你们指示出来，加强与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任务，这不仅是党在组织上目前中心战斗任务，而且是党的政治任务之一，你们必须在这一任务下，彻底改造党的组织，最大限度有计划地吸收成千成万工人雇农苦力与贫农

加入党，以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省委（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注：①即刘宗沛，城固县人，当时是西安师范学生，寒假期间，被团省委派回陕南巡视。

②即杜润滋。

中共陕西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节录）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英勇的红二十六军同志们：

省委听了厉君同志报告了团委与各连政治指导员联席会议的决议后，省委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检查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指示，的确是中央和北方会议及过去省委对红二十六军的决定，在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省委是犯了最严重的取消主义的错误，是对红二十六军悲观失望。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气节的动摇，是最有害于红二十六军的发展，是有害于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省委认为二十六军团委与各连政治指导员联席会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厉君同志拒绝了省委违犯国际与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省委认为是适当的。省委在你们监督之下，已经彻底改造了省委机关，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英勇的同志们：省委要指出你们发动的这次党内斗争，彻底改造省委的领导机关，是使陕西党彻底转变中含有最严重的光荣历史意义。是证明了同志们在艰苦的执行国际与中央路线中，得到了进步和成绩，是证明了同志们一定能在艰苦的斗争中，克服一切“左”右倾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完成光荣的红二十六军的历史任务。

针对着红二十六军的过去错误与缺点，二十六军必须迅速地执行以下的具体工作：

（一）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进攻华北，已经占领热河，平津危急，整个华北将成为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强有力的根据地。因此红二十六军必须更英勇地担负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

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前线任务。

（二）为了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红二十六军必须更要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必须一分钟不迟延地执行中央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

（三）用千百倍的力量扩大并巩固红二十六军。在这方面，省委提出红二十六军与渭北各地党部有计划地征调工人雇农苦力贫农大批到红二十六军去。同时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必须千百倍地加强起来。

（四）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只有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及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才能保障根据地的巩固和创造。你们在这方面是已有相当的成绩，但还必须更广泛地组织农民〔游击〕队，积极地向耀州、同官、小抵、淳化、旬邑等地行动，以与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消灭国民党的军队和民团及一切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行动，并且为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更密切的配合起来，二十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省委决定○○同志^①负其责。你们现在成立的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应该取消。你们应立即组织边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红军和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的领导。

厉君同志不能前来，省委另派○○同志^②来做代理政委，昨日（三月十四日）已经出发了。

注：①指李平，又名刘捷三、刘玉琨。

②指汪锋，又名王烈、王均智。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信遭到杜衡等的反对，杜衡并以部队代表身份回到省委，省委作了检查和改组，并向红二十六军写了这封信。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改造省委与红二十六军军政干部问题的报告 与请求（节录）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央：

省委前次给二十六军指示信，要他们编为很多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是违背了中央北方会议的路线，二十六〔军〕团委及各连政治指导员会议反对省委这个取消二十六军的指示并派厉君回来与省委讨论，省委用自我批评精神接受了二十六军同志们的批评，并检查了省委三个月全党工作，在目前形势下，在党的中心任务与实际工作上，是表现了省委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能坚定执行中央北方会议后正确路线，以至于发展到与中央北方会议原则上违反的取消二十六军的路线，这主要是省委领导机关缺乏资产阶级成分与小资产阶级把持的结果，因此省委同意二十六军同志们改造省委的提议，认为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省委在开展这一两条战线斗争中，改造了省委，停止省委常委三人工作（曹、拓夫、杨声）^①提拔政治上坚定与无产阶级成分的同志到省委领导机关来，决定省委由小章（C.Y. 书记）、厉君、曹〔组成〕，小章^②作省委书记，C.Y. 另提拔人，拓夫担任秘书长，杨声派渭北工作，详细情形省委有决议不久送来，新省委名单请中央批准。

陕委（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①即曹长青、贾拓夫、刘映胜。

②即袁岳栋（小章、笑章、小张）

中共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中央：

关于省委改组，前次已有简单报告，现将最近工作情形报告希详细指示！

①关于群众反日反帝的斗争，虽然严格地指出过去对于反帝工作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行坚决的转变，但是到现在这一个月来的转变，大部分还是在领导机关中与文件上的，实际工作还没有做下可观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已在开始实际工作的转变了，在西安经过青年团的支部，群众的反日会已公开的成立起来，但是反日会还是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的基础上，虽然这些反日会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反对国民党压迫反帝运动，反对法西斯蒂教育，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成立起来的，但还缺乏公开的实际的行动，这我们是要指出来的。现在正在进行必要的办法，艰苦的彻底的转变，关于这一工作我们在这里不作详细的叙述，请中央审查我们的文件与西北真报。关于这一工作的动员，我们在开展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基础上，最近决定要实现组织北上抗日团及募捐一架飞机——“西安民众救国号”来动员群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创造与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救国会议及军事委员会宣言，现在才开始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②最近红二十六军在边区一带得到更进一步的开展，人数增加到五百多人，枪械也增加了，成分得到很大的改造，发展了队伍周围的农民斗争与游击运动，游击队除渭北的不算外，已成立十八个游击队，人数九百多人，成分完全是破产的农民，分配土地已开始，使渭北游击队与边区红二十六军政治的军事的动作的联系，更有计划地在实际工作中争取边区与渭北新苏区的胜利，决定成立渭北红二十六军直辖游击队总指挥部。现在正式成立来统一渭北游击战争，

开展渭北群众斗争与游击运动，把边区与渭北群众斗争配合起来，我们在红五月过程中，动员全党的力量与群众的斗争坚决地执行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完成红二十六军一师人的号召。彻底执行与完成中央去年四月二十日“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的指示。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已开始成立，边区与红二十六军虽然是突飞的发展，但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省委最近给他们的指示的，还有很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详情以后报告），省委为着加强对于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坚决执行彻底的转变，因此决定派常委组织部厉君同志到红二十六军去负政治委员工作，关于汉南红二十九军游击队的情形，以后专门报告，现在我们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积极地布置在几个新的区域开始游击战争。

③过去对职工运动的放弃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转变过来的，这是目前陕西党一个基本严重问题，我们决定转变陕西党对职工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必须要有全党坚决的动员，首先在西安，现已决定从现在起直到五一节准备工作的时间，在反对国民党资本家的进攻，领导组织工人失业工人的斗争基础上，加紧职工运动，创造产业支部，各地也有具体的指示，这一详细计划以后详细报告。

④客观形势的开展，过去组织基础与组织成分的恶劣，组织的流动性，老干部的动摇，形成目前干部的极度困难，这是转变与发展中间的困难，是有一切条件可以保证转变的，我们现在决定加紧对于同志的教育工作，定出支部训练大纲，在三个月内锻炼出二十个专门训练员。关于执行教育工作有系统的坚决转变，同时决定开办训练班在三个月内训练三十个新的积极勇敢的工农干部分期派赴各地负担工作，详细计划以后送来中央。

⑤省委本身问题是必须报告中央的，现在由军委书记（新提拔的）^①与省委书记组织常委，宣传、组织、职工各部都没有，在常委之下设立组织委员会与宣传委员会，政治秘书与组织秘书参加常委办公，这样虽然不会使常委形成不集体解决问题，但这是十分不健全的，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目前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军委也非常不健全，青年团也因为差不多所有主要的干部都到党工作也是很不健全的，各部的工作都在一个大转换的情形，在目前常委政治理

论与工作能力的薄弱，是在一个极大困难的状态中，所以我们要求中央考虑到目前西北工作的重要加派几个得力干部来，特别是负担军委书记与政治上水平较高的负担省委书记来。

⑥关于长青同志个人问题，我们认为也有在这里报告的必要，关于长青同志开除省委委员，是自从省委改组后经过一个过程，一由撤销省委书记工作，因他还表现不坚决转变，撤销省委，后来他两次提出要离开陕西，撤销省委，给他口头警告，并造决议公布全党，现在分配他负责训练班教务主任的工作，但是他个人还是要离开陕西，他自己也承认这是无原则的，他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到万分，现在还是提出个人的工作兴趣问题，来与党员（特别是重要工作的干部）的政治任务对立起来，所以将他的情形报告中央，是否同意他离开陕西，请中央考虑，但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坚决与他作无情的斗争。

⑦新的省委名单请中央批准。

这个报告是个别的问题，请中央根据省委改组的决议及最近的各种文件，给我们详细的指示。

陕西省委（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注：①即李世英。

拓夫关于陕西党破坏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这个报告，只述及陕西党破坏的经过与我自己对于陕西党今后工作的意见。关于陕西政治经济与党的工作，我想待老孟^①同志来后，我们合力给中央作一个有系统的详细报告，研究陕西党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与藉以做为今后陕西党工作的指针。为报告便利起见，我分出几个主要纲目来：

（一）破坏的前夜——冲锋月的总结：

我觉得陕西党的破坏，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它是在陕西群众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由于党在组织上一切弱点所得到的必然结果。因此，我首先要指出党在破坏前几件主要的政治事件。

红色五月以后，党提出了从七月一号到八月一号的冲锋月。冲锋月的主要任务是要党抓住当时陕西群众斗争的发展与红五月群众反帝拥红积极的形势，用非常工作方式与最大速度，去扩大反帝运动与完成二十六军一师人的号召，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党并提出在渭、韩、蓝、户及西路几个地方具体的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在冲锋月运动的基础上，组织群众八一的示威。经过半个多月的布置，冲锋月进行的结果，收获了一点成绩，主要的是：（1）在反帝运动方面，党组织了王泰吉骑兵团近一千士兵的兵变，与二十六军签订反日作战协定，高树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在耀县相当地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帮助群众发展了反豪绅、分粮、组织游击队多种斗争，这一事变给了陕西群众极大的兴奋；（2）在扩大红军方面，当二十六〔军〕渡河时也有了相当发展，那时二十六〔军〕有相〔将〕近五百人与三百多好枪，渭北游击队成立了二十六军第四团（一百余人七八十枪），在王泰吉骑兵团发动后，帮助耀县建立了二个小游击队，三原武字区还能发展几个小游击队（数人的小组），因为这些事件的影响，曾使韩城土匪梁占魁也树起红旗，进攻了一次县城，以及各地土

匪都积极找党要举事等；（3）党在西安进行拥护红军运动周，动员了很多的士兵、工人、学生在兵营、工厂、学校、马路上插红旗散传单，拥护二十六（军）二团南征，团成立反对五次围剿，统计插出去红旗（都是纸作的）有五六百面之多，给红军募得钱、子弹、衣物亦不少，那几天正是二十六（军）（二）团过河、王泰吉事变之际，陕西统治阶级曾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恐慌。特别在士兵中有很好的发展。在那一时期，党在西安各兵营差不多创造了近十个兵士支部（包含五六十个士兵同志），并找得很多士兵线索；（4）在职工运动方面，党与团找到机器局三十个以上群众，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人支部；（5）在农运斗争方面，有渭华群众抢洋面的斗争，户县、三原群众的分粮斗争。自然这些工作成绩，在冲锋月意义上说起来，还是没有完成冲锋月的任务，特别是二十六（军）二团在叛徒励君们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完全失败了，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损失。八一的示威，由于党的组织的破坏是没有组织起来，只在汉南党领导之下组织了百余群众的飞行集会。

由于这些政治□□的发展，使陕西国民党统治政权表现了极度的恐慌，因此不得不采取一切□□□□□□破坏党的组织，□□以能使国民党破坏党的企图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的主要□，还是党在组织上弱点所致。在红色五月以后，党已遭过两次的破坏。第一次是组织部负责人程建文的被捕，被捕的原因是被他的情敌侦探捕去，程平素是最不注意秘密工作的，而且在西安又非常红，这是他被捕的重大原因，程被捕后没有供出党的组织，因而损失尚不大。第二次是交通处与妇委机关的破坏，捕去三男一女（秘长刘○○^②与李小兰^③在内）。破坏原因是侦探认识秘处一个负责同志，跟踪破坏的，而最痛心的是这个同志已经发现侦探跟，他还往机关里走，这完全是帮助了敌人，秘长是到交通处被捕去的，当时这几个同志捕去，除小兰立时叛变外，余皆无问题，同时党的机关也都即时迁移，所以再来牵连到党组织的破坏。经过这二次的破坏，党还没有了解到敌人进攻愈趋愈烈，党还没有提高秘密工作，用一切有效方法来巩固党的组织，去回答国民党的疯狂进攻。党在接到中央注意秘密工作的指示后，虽曾有讨论，但并未严重地注意与具体的实践，这就造成第三次更大的破坏。

（二）此次破坏的经过：

关于此次破坏经过，以前给中央报告上也曾简略说到了，现在我再详细地叙述一下，并补充以后的破坏情形。二十六（军）过河后励君回到西安，省委派我到二十六（军）去巡视，并解决二十六（军）问题。这时励君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成严重问题，也完全动摇，违背了省委意见，执行了二十六（军）北上南下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决定待我从二十六（军）回来，根据一切具体材料再：解决励君问题，但我走后，岳栋即始而分配励君军委帮助工作，继而又派赴渭北给王泰吉部传达省委意见。我追二十六（军）没有追上，原拟回来绕道追去，但我回来二十六（军）被打散的消息已经传来。我回来几日又去三原考察王泰吉部问题，并巡视三原冲锋月工作。我到三原，王部已发动，我将省委意见传到后又回西安。第三天励君即随高麻子^④回来，回来原因是要与省委讨论王部今后工作问题，当时省委经过两次破坏，机关都没有健全起来，一时找不到可以开会地方，秘书处与我的地方都不能开会，最后决定到旅馆去开。开会时岳栋、励君、高麻子连我四人，当我们进饭馆去，高麻子即发现有一人进来旋即出去，也不注意，亦未对我们说。继而经半点多钟，先前进来那人与另一人又进来，在我们前面经过，在另一桌坐下，没有三分钟即出去，而且特别注意励君。当时我们已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但没有即时离开，仍继续报告。不多时彼两人又进来，我们才断定是侦探，于是决定马上离开到另一地方去。决定他们三人先走，我开帐，岳栋与励君先出去，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我走到前门开帐时，发现街上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方向，且听到哨子声与汽车很杂乱的声音，我到门口一看，那两人正抓着岳栋与励君，我立刻乘他们捕人慌乱之际跑出来，这时高麻子也跑出来了。我们俩幸逃脱，我立刻跑到技术科去通知他们马上离开，把文件搬出来寄在荷芳^⑤手里的一个地方，我自己带出一包较重要的出来。此外，秘书处是新建立的一个地方，秘长决定调三原○○同志还未来，只一个女同志住着，省委一切组织关系都放在那里，这个地方只有岳栋一人知道，我无法去通知。结果我打发一个女同志在她常去的一个社会关系地方去拼（碰）她。军委、市委、C.Y. 这些关系，因为我这一时期在外边跑的时间多，所以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岳栋与军委每天接头地方与时间，第二天我即在他们接头地方遇见军委负责的^⑥，我马上通知他，并经过

他的关系找到 C. Y. 关系，经过 C. Y. 关系又通知市委。这天晚上，我即与 C. Y. 书记^⑦接头，才知在这天中央交通大冯^⑧与边特委书记李道奎^⑨同时被捕。这两人住的地方只有岳栋一人知道，那么这两人被捕毫无问题是岳栋供出来的了。所以马上经过 C. Y. 关系一方通知中央，一方通知各地，第三天拼〔碰〕到秘书处女的，才知岳栋于被捕那天（七月二十八日）晚上带领侦探，把秘书处所存省委与中央与下级一切关系统统拿去，并给那一女的指侦探说“这就是与你一块住的负秘书工作之〇〇，你把他认下”。这个女同志是旧式女子，据她以后对我说，她还没有看出来，在与我见面前的二三天内还每天与这个侦探接头。经我解释后，她始表现恍然大悟，但她与我说的和与我派去那女同志说的有很多不同，同时她与省党部人有关系，所以我怀疑她，再未去见，通知她回家去。在这天荷芳（技术科负责的）与我规定接头时间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已经被捕，并经过他〔她〕把技术科两位女同志捕去一个（女知识分子），另一个是旧式女人未被捕，一大箱重要文件也由他〔她〕送到国民党手里去了。这几天我们又发现岳栋已经在街上行动起来盯梢捕人。当时我与军委负责的，C. Y. 三人办公解决一切问题。白天我们已经不能在街上行动，只能利用夜间，一切关系我们用新从汉南回来的一个同志^⑩负责联络（岳栋不认的）。本来军委负责同志也为岳栋认识，西安不能站了，但他马上一走，许多士兵支部就要失掉关系，所以我们决定暂待几天，待把三原〇〇同志调来关系交清后，再离西安。但这个同志在八一后也被国民党捕去，捕的原因是侦探到他住的机关去，他已走了，侦探收买房主人在街上拼〔碰〕他，结果被拼〔碰〕去了。捕去是在南院门市场，我们曾告他过，行动上的〔得〕注意，每天早上晚间行动，中心地方不去，但他竟到南院门去，所以被捕。在党团省委活动分子会后，C. Y. 接着又遭到破坏，捕去秘长朱循市委负责者〇〇^⑪及从汉南同来之刘平（去年团中央派去的四川人）。朱循被捕是被侦探在街上捕去，市委〇〇是由岳栋捕去，刘平大约也是为岳栋遇见在机关捕去。在岳栋捕去后，我们即决定刘平到三原去，但他不去，坐待敌人来捕的。当我们派人到三原时，党的通讯关系与交通关系的人已被捕和跑了，团的也没有找见，二次又未找见。渭华我们已通知，但通讯处人也被捕去，这完全因为他们没有布尔什维克警觉性所致，也是陕西党历史上忽

视秘密工作的传统性。

（三）大破坏后我们对于工作与组织上的布置：

关于西市工作，我们决定一切占（站）不住足的同志完全派到各地去，一方避免敌人的破坏，一方加强各地工作领导。西市抓住新创造的工人支部与近郊农支及士兵支部开展工作，反对叛徒的斗争。市委决定○○^⑫同志负责（岳、厉都不认识）。各地工作，三原、边区我们通知杨声就近负责，代表省委解决一切工作问题，C.Y. 并派人前去（杨声那时负二十六〔军〕四团政委）西路派马○^⑬同志去通知特委及二个军队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蓝田派○○^⑭去，除通知组织上警备处，并立刻利用二十六〔军〕丢下的枪发动游击战争。咸阳打发来人回去。这时澄县、蒲城都来人，澄县县委四人完全来了，我们讨论了澄县工作以后，即留下二人，一个负党的工作（即张兴〔新〕发），一个负团的工作，因他俩都不为岳栋认得，其余二个回去工作，并决定派市委书记○○^⑮去澄县作韩澄特派员（因在西安站不住）。蒲城决定派陈○○^⑯与惠○○^⑰直与来人回去工作（他们都在西安站不住）。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志〕丹、子文、世泰们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人在渭华藏着），派子〔志〕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在与王泰吉同样策略下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之下。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关于省委组织问题，当时情形是这样，经过这次破坏后，只丢我与杨声二人了，本来省委除C.Y. 书记外八人，孟坚同志在四月省委改组后，撤销省委工作离开陕西了，后来负责军委书记之小李^⑱因骗钱偷跑开除了，李子进〔靖〕（即中央派去陕西去又来的）也为省委之一，省委派他二十六〔军〕去，他跟二十六〔军〕过河后即跑回来，原因是吃不下苦，回省盾，表示非常羞愧，要求党开除他，实际原因是因为他家庭与工作艰苦在政治上阶级上的动摇。当时他不承认动摇，我们因为他过去很好，所以尽量挽救他，要他做一个普通党员，让他找事，省委分配他工作，因为他自己说不能到红军中去，又不能到外县工作，但他表示始终是忠实于党的。后来他要到外省去，我们也允许了，但要他到目的地后给省委来信，省委再好给

中央介绍，他的意思是要省委给他把介绍信写的带上，当时省委未允许他。接着就是省委的破坏，我也再未看他，他就自己离开陕西了。因为他现与中央有关系，所以我写得较详细一点，以供中央解决他问题的参考。岳栋、励君、李奎都被捕了。杨声二十六〔军〕四团离不开，而且也不能回西安来。我在西安更无法站足，被捕十余人我都最熟，而且西安及各地认识我的人最多，西安认识我的侦探及有侦探嫌疑的至少有一打。此外我在关中工作三年多期间，被捕一次（十九年），三次捕而未获，凡是知道我的人认识我，所以也不能立足下去。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在党团活动分子会上才决定派我来中央，要求中央解决省委组织问题。关于省委问题，当时决定暂由张心〔新〕发负责，建立与各地关系，并决定他不多跑，再一切关系由另一同志充任干事，比较重要问题由他与组织干事、市委负责人三人解决，形成一个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最机密地方以备我们回来接头及与中央通讯（这个地方即我女人母亲家里，只他一人知道），我并且详细和他谈到工作与组织上的许多问题后，我们便于八月十五日出发到河北找中央关系。

（四）我们走后党继续的破坏：

我们到河北后曾写过两次信给陕西，但未见回信，后来我们看到励君在陕西报上发表的一封公开信，才知励君也叛变了。接着我便接到我女人信，张心〔新〕发等三人被捕，被捕原因是岳栋们把张宏博捕去连带到的，张某我走时曾告诉过张心〔新〕发，要他酌量情形决定他的工作，如不能继续西安站足则可派赴渭北游击队去，后来不知怎样，就把他们捕去了。张捕去后，我女人那个地方也破坏了，那里所有省委仅有的我在技术科带出来的一包文件也被搜去了，我女人因未在家中住，所以幸免，同时团的负责人^⑩也被捕了。这样一来，我们与陕西关系失掉了，接着我们又见到西安跑到北平〔的〕同志讲励君叛变后跑到三原城内乡外，捕去一百多同志与赤色群众，在大公报上我们又见汉南也有同志被捕的消息，三原捕去四人已自首的消息。据我们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走后杨声从二十六〔军〕四团回来和张心〔新〕发们组织了临时省委，和张心〔新〕发一块被捕，三人中除张心〔新〕发与张宏博外，大约就是杨声了。又接来信谓了凡（省委派赴汉南传达冲锋月工作的同志）经汉南回来

也被捕，以及从张家口回去之翟文风，也为励君捕去，还有姓高的一个同志也被捕，这些材料都是我在北平陕西报上、来人口中以及来信上得到的。

（五）叛徒们在陕西活动的情形：

我们又听到有岳栋、励君等十人联名脱党宣言，据说这个宣言内有程建文、李奎、大冯等的署名，但我未看见原文，国民党把这宣言在陕西各县各乡广大的发散，借叛徒们的口对党作政治上的进攻，作国民党刹赤宣传的材料，叛徒们又招待新闻记者，利用新闻政策来进行对党的进攻。励君那个公开信更卑鄙到万分，把陕西党所有他知道的负责同志与组织情形，统统公布了出来，比如关于我，连我党内代名及原来的真名字都在那上面写着。其他被捕的听西安来人讲，完全都叛变，但我没有具体事实来说明。这样看来，陕西叛徒差不多有两打了！在国民党与叛徒们如（此）疯狂的进攻下，我恐怕韩、澄各地也发生破坏的事实。我们在北平时，曾听说陕西给河北军分会有电通缉我。总之，叛徒们是用一切办法来破坏党的组织，陕西国民党得了这般叛徒们的帮助，在政治上是有了收获，因此，他们也用《告陕西青年书》这些东西来欺骗陕西青年与一切劳苦群众。

（六）现时二十六（军）四团与王泰吉部的情形：

在我们走了以后，二十六（军）四团与王泰吉部的情形，我们只能根据报纸上的记载。当我们走时，四团是在三原新（心）、武二区及照金一带行动着，王泰吉部是经耀县退出后在边区一带与边区游击队（即报上李妙斋部）配合行动，这时还有耀县二个游击队在耀西一带行动，国民党数团人的围剿没有办法，以后看报上的消息这些部队好像汇合起来了。国民党天天鼓吹总攻谢（薛）家寨的消息，但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的部队还在那一带经常行动着，后来报上登载刘子（志）丹也回到部队了，而三水又有民团哗变的消息，最后消息是敌人用大炮把谢（薛）家寨（边区游击队根据地）攻开了，王泰吉、刘子（志）丹等及部队向宜君一带北去了。这个消息大概真确的，部队的数量现在说不清，王泰吉部在退出耀县后受到了些损失，因王当时还不十分坚决，在这部（队）内我们当时只有不上十个同志，而部队在编制上旧的系统还未打破，所以容易受敌人的袭击，至于我们部队缺乏中心领导，受到敌人一点打击也不是偶然的

事情。我估计他们的北去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北去他们是企图与陕北游击队配合。在北平我见陕北来的负责同志讲，他们已派人到二十六（军）去接洽了，也许他们彼此见面也说不定。还有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是梁占魁与王泰吉携手了，并向西黄龙山白水一带进去，这个方向也正针对着二十六（军）的北上。假如这是事实，那么，就是子文去后活动的结果。这些是我离开陕西后听到的一些材料。

（七）我对于陕西今后工作的意见：

首先我要讲到，我是不能回陕西去了，我从一九二七年起即在陕西工作到现在。以前在陕北工作被捕一次，后来又遭通缉，并且跑得太熟，所以十九年才调到西安。在西安又被捕，出狱后到渭华工作。后来因站不住又到西安，在西安又遭抓没被抓住，到蒲城去，没有二月又被国民党赶跑（抓我来抓住）。到西安因站不住又到汉南，在汉南半年，团省委又调回来，去年省团委即决定要求中央调换我的工作未蒙允许，而陕西又离不开，所以又负责下去。去年孟同志去，调我到党省委来，到三原巡视工作一月多。今年又连遭这些破坏的影响，陕西党与团在一年以前的同志不认识我的很少，因为我做的巡视工作较多，渭北、东府各地我都去过。我已经估计，现在我就是回去也不起什么作用了，第一我不能站足。第二就是找陕西组织关系，因了我走后的迭次破坏，连我也无法可想了。因此我在其他地方工作，我觉得作用大而且好一点，所以我要求中央另行分配我的工作。那么，关于陕西工作，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

（1）恢复陕西组织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估计过。汉南我们已找见从汉南来的一个团的同志，他可以回去整理各种关系，他是汉南人，在西安还有几个汉南来的同志可以和他一块回去。关中道呢？我想现在还要找李子靖与姓陈的两个同志，这两个同志按过去及现在各种情形看来，我想没有绝对的问题，而且据李说，陈是工作委员会的，那么也许他们收拾起了一些组织关系也是有的，最低限度他俩是可以把蓝田（陈蓝田人）渭华（李渭华人）关系找到，经过这个关系，即可设法恢复其他地方组织关系了。总之，这两个同志我一定要见，因为他们知道以后的情形。他俩人回西安自然有些问题，但蓝田、渭华回去是可以的，他们目标当然比我小一点。

(2) 关于陕西工作区域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把汉南划归川陕省委（据汉南来信说川陕省委已成立，并派大舜来找他们关系，汉南负责同志也曾去找过四方面军，可不知道他们是否联系起来）。这在政治上与领导便利上都是必要的。把陕北从河北方面划到陕西这一工作区域去，这在政治上与工作发展上也都便当的。那么就是关中、陕北、甘肃、宁夏划为一个西北工作区域。假如绥远有可能时也可列入，形成一个西北工作区域，中心或者放到西安，或者放到陕北（陕北不易站足，在现在疯狂白色恐怖下，环境又非常简单）。

(3)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当我们走时，会议提出的意见，至少要求中央派二个以上最得力的干部到陕西去。在目前西北形势的发展上都要求中央用最大的注意加强西北工作的，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意见，要求中央选择二个得力同志到西北去。这两个人一个负总的责任，一个负军事工作的指导，再配合当地一二个好的同志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来领导西北工作，这样在工作恢复的过程中再恢复与健全省委组织与领导。我想李、程（陈）二同志如果没问题，他们把关中关系恢复好后可以分派到兰州、宁夏去工作。二十六军的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派浩如与鸿雁（红彦）回去，鸿雁（红彦）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鸿雁（红彦）在军事上最健全的，在二十六（军）是有威信的，过去虽有很多政治上错误，然而不是根本问题。他今年出来后经过中央训练与华北的实际工作，我和他在北平谈话，的确是有进步的，所以我觉得鸿雁（红彦）回二十六（军）最合适。浩如在陕北部队与一般的社会影响都很好，号召力大，他回陕北去最适当，而河北方面也准备派他俩人回去，同时还有陕西的几个同志也准备回去。这样一来，二十六（军）与陕北的游击队也相当的加强了，二十六（军）可以组织一个军委指导二十六（军）及其他陕西的游击队，同时还可指导这一区域白军的工作。比如鸿雁（红彦）们回去不在陕北可以组织兵变，而且对孙殿英部工作也有办法，因为鸿雁（红彦）在那里工作过一时期。这是我关于陕西工作今后路线与方式上的问题，我想等我们把关于陕西一年来整个工作的报告做出后，再针对着详细讨论，现

在中央首先应当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来准备。

注：①即孟用潜。

②待查。

③即黎晓岚。

④即高岗，时任省委巡视员。

⑤即薛和防。

⑥即窦文德。

⑦即刘宗沛。

⑧指冯光波。

⑨应为李奎（即金理科）。

⑩、⑪、⑫、⑬、⑭、⑰待查。

⑮指宁耀峰（宁慎言）。

⑯⑰指陈子敬。即李世英，省委破坏前与杜衡为省委常委，

⑱指雷振东。

⑳指樊德印。即刘瑞龙。

*这是省委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遭破坏后，贾拓夫到中央后给中央写的报告。

贾拓夫（一九一二——一九六七），陕西神木人，原名贾恒，曾化名宏光、红光、虹光、关锋。历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团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后，曾任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长，关中特委书记。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委书记。建国后任国家计委、经委副主任等。

陕西恢复工作委员会恢复陕西 工作报告*（节录）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中央：

陕西工作在“左”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之下，断送了红二十六军二团，使南下得到了悲惨的失败，跟着省委组织之连续四次的大破坏，外部工作之整个陷于最严重的地步，使全西北（甘肃也在内）走上了不可忽视的危险状态中。在这时候，中央把陕西工作，划到了特务〔殊〕任务之一，所以派了专员去陕恢复。这里我们要研究出在这大破坏中的经验与怎样形成了这次大破坏，应该立刻分出以下几条特别述之（因时间不许，若有遗漏面谈）。

二十六军南下：（1）右倾逃跑之政治领导。因为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区日常斗争之深入，所以整天在敌人包围下生长着，负责领导人如军政委杜励君（杜衡）在这时期中先后动摇，感到边区生活之辛苦，要想跑到所谓安乐地带，所以放弃“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任务，跑到渭〔南〕华〔县〕去。（2）“左”倾的军事冒险。在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以前后，没得到省委的同意，只是几个机会主义者拿部队在冒险，及至跑到渭华以后，那里没有群众基础和反动势力的浓厚与战斗员的地理不熟（华县、渭南、蓝田、商县交界之秦岭），敌人对我们的压迫，使部队全部解散。

普遍群众斗争的开展：特别是渭北边区一带。（1）红四团的成立。红二十六军二团失败后，渭北游击队与当地群众不但不因失败而减低斗争力量，反而更努力地领导与配合广大群众，广泛地进行分粮杀豪绅反帝反国民党斗争，袭击与扰乱渭北赤区（即渭北新苏区）周围之民团白军，很快地完成了“红二十六军四二师独立之第四团”之任务。（2）王泰吉政变。在当时王泰吉（杨虎城

嫡系十七路骑兵团)受工农红军的政治军事伟大的胜利影响之下哗变了,组织成“西北人民义勇军”^①。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配合渭北(耀县)群众分粮杀豪绅,并帮助当地群众组织耀县游击队,开展耀县周围之工作,及联络渭北与边北工作。但因军事上之失败,因义勇军下了耀县以后,与渭北新苏区红四团配合谋下三原,被杨虎城军阀以六个团以上的兵力,由新苏区迫退回边区去,在边区配合四团与边区游击队创造陕甘边新苏区。(3)其次就是各地如临潼、渭南、周至、户县、蓝田、陕南等地的群众工作都很高涨,临潼马额镇、渭华交界之高塘原以及周户蓝田都着手成立游击队。

在革命高涨情势之下,造成了统治者政治经济的破产,普遍士兵的动摇哗变,他们——统治者若要维持其最后的命运,用着最残酷的手段向革命势力进攻。(1)用二十团以上的反动武装,围剿红二十九军与红四方面军。(2)用八团以上反动兵力及三原、富平、耀县、淳化、旬邑(三水)、宜君等县豪绅地主的反动民团围剿渭北及陕甘边苏区。就在三原新(心)字、武字两区来说,捕了赤色群众五百以上,惨杀了很多的革命战士。

省委组织的破坏:首先要说陕西党团风潮。固然过去口省委如曹长青等有着许多严重错误,要把红二十六军化为游击队,官僚式的领导工作,可是改组省委要经过中央允许以后,谁知自行改组了,而且对于人选上过于马虎(如陈见(建)文在渭北做中心县委是被撤销以后,省委又把他拉到省委组织去了)。这时的前前后后,在省委的负责人选得马虎,政治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在敌人白色恐怖高压下都先后动摇,而同时感到生活之痛苦(自然是比大资本家与剥削家要苦点的),连闹着所谓老婆问题(杜励君嫌不经常与爱人同居)。小章(即团中央特派,后党省委书记兼秘书,)被捕二十余日叛变^②,连陈见(建)文等被捕后,即公开诬蔑党的名誉,造谣中伤,到处捕人。张短人(矮人)^③都同时叛变。破坏的组织,省、西市、汉南、甘肃、渭北至(省)东北三原、富平、高陵、韩城、大荔、合阳、渭南、华阴等,差不多都受到最严重的损失。其他在军队中的组织(警备师、警卫团、十七路、绥靖署^④及甘省军队里边),都破坏得非常悲惨。捕去的同志,有的被判处徒刑,有的被枪决的(渭南县委张我公),余十之八九都叛变了,发表了所谓“自首宣言”(有

的是被迫叛变，发表宣言，他本人还不知道；有的为要保全一条狗命；有的为要跟国民党老裱去升官发财。我们现在不管他是自愿或被迫叛变，我们一律开除党籍）。这一次要算陕西空前的最厉害的大破坏了，阻挡了一个时期陕西工作之不能前进，受到了不可忽视的大损失。在另一方面，正在工作的同志，更使他们认识了当前任务之重大而百倍的努力。这里我们认为叛徒最〔再〕厉害是阻止不了中国革命之向前发展，相反的这些王八蛋滚出去更使我们的分子纯洁，组织巩固，我们从这中间学得了金钱买不来的知识，虽然目前是很重大的损失。事实回答了我们的，破坏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想办法。以上是第一次破坏的详细情形。

二次临时省委之组织与破坏：二次临时省委之组织成功，是由边区二十六军派之杨声（刘养〔映〕胜）、史克寿和第一次没有捕去之李杰夫、汪锋、韩城县委书记之张兴〔新〕发、西市之小李（卢志远）、李冲霄（老汉）等组织。本来这些人中间，有些简直不能在西市工作，如杨声、克寿、汪锋等，因为拓夫与刘^⑤〔走〕时没有通知你们，急于恢复陕西工作，结果是被捕了，被捕后叛变了。李杰夫是被派到陕〔省〕西〔东〕，汪锋是被派到汉南，没有被捕，所以也没叛变。这次破坏，损失很小。第一，因为没有什么可破坏；第二，因为这次捕去的，比较的是强些，可是他总是发表过叛党的宣言，我们还是一律开除其党籍者。二次临时省委是被三原三中支部书记潘子〔士〕杰破坏的^⑥。事情是这样，潘子〔士〕杰自动发到一个东西，拿到国民党省党部去，说他自己如何愿意破坏组织等情。组织二次省委时到省，找不到关系，遇潘子〔士〕杰后他便给这一组织说，你先住个地方，给那〔他〕一块钱先住个地方，临到开会时，他叫来警察捉人，就是现在也是只有潘子〔士〕杰最坏。

三次临时省委之组织与破坏：这次临时省委之组织很简单，只有几个人与西市一点关系，外地是没有的，仅于〔余〕海峰〔丰〕（前省委发行）、孙作宾（前省委甘肃兵委）、王好勤（西市党市委）、郑福平（团市委）等。后来不几日，因为技术工作的不讲究，于〔余〕海峰〔丰〕被捕了。……

四次省委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到现在（这一节最重要，而且是我们要谈的中心）：

（一）四次省委与工作委员会：

A、四次临时省委与陈子敬（陈善）的中央关系：四次临时省委仅三次（临时省委）没〔被〕破坏，剩下的几个人如孙作宾（书记）、洋人（白毛）^⑦、王好勤等，陈子敬^⑧也是其中的一个，和高中一个市委严某。这次其所以组织四次口的原因有种种，大多数是抱着人道主义者的态度，见到陕西的迭次破坏，有的是不忍坐看组织之坍台，有的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趁没有关系，先做着，将来一定是中央要来找，就可以到达中央的不正确的观念。

B、四次临时省委的工作关系：首先四次临时省委只几个人，后来在西市中有两三个学生支部。后来因为有个满头都是洋白毛的人，一般都叫他做洋人，他因为在省委没破坏以前，在省西巡视过几回，所以后来四次省委又叫他到省西去，到现在还不知道西路的（省西）关系是否接上头。其次曾派王好勤（学生）到临潼，临潼没加入，又因蓝田是王好勤的家乡，派他去弄关系，结果蓝田地方也没加入，其他还有（不详）。

C、四次省委的后来：后来因为团中央派我回去之后，到西安找关系，找到了王好勤（因为我回去时，中央告诉说叫我帮助党，或与党〔发生〕工作关系成立共同工作委员会）。王好勤与我有密切关系，洋人也曾来解决过问题，孙作宾也来讨论过整个工作，订有密切的通信关系，孙与我的关系是通过李杰夫、王好勤介绍的。最近二十天以前，我们曾以信召集孙作宾来开会，连去数函，均未见动静。

（二）工作委员会到现在：

A、工作委员会产生的陕西政治情势：那时候正是叛徒在捉人，在报纸上差不多天天可以看见叛徒诬蔑党的造谣中伤，叛徒们的组织肃反委员会整天在计划：怎样破坏蓝田组织，怎样捉省委（陕西）破坏后的三个人——王烈（汪锋）、李杰夫、王成义。在这时候省肃反会给各县国民党县党部都指〔派〕有肃反负责人，此等人物多以县委任之，在主要地方，如临潼派有专员，陕南也有专员，渭北等各地也有专员。总之，敌人在这时期，尽量地用钱收买了党的败类，破坏党的组织，毁坏党的名誉，甚至说中国工农红军是土匪，马克思主义是骗人。同时敌人用七八团的兵力向着西北劳苦群众拿心血染红了的陕甘边苏区，威胁

着红二十六军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敌人不时地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的组织到这时候削弱到最严重的地步，在这个当儿，我负任务回陕恢复工作（连党也在内）。

B、工作委员会之产生与组织情况，我回去后，用个人的私人关系去酌情恢复。这时候我特别小心，因为自己虽然负有使命，可是有什么能证明我的东西（证明我不是叛徒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仅利用个人半感情的去和他们一气做，得空便考问考问他们些陕西党的破坏与他们的意思，这时候我不说是中央来的，而且他们也在考察我。这时候最难应付。遇到叛变的话，他会拉你吃官司，自己要说是没关系（因为我被捕，陕西有口决的同志是知道的），他们若认为有破绽会拿手枪或什（么）的东西叛徒一样地被杀的，所以这时候，很多危险地方都得自己去做，用种种方法，使他们相信。第五、六天以后，他们认我或者还是正确关系，但所有的关系都是他们知道我不（要）知道。首先我回去先找到一个社会关系的朋友家里，我在他口中探得了许多情形，使我接近了前渭北中心县委书记^⑧魏忠慎，化名苏华^⑩，经他再到西市，找到西安市委——郑福平、四次临时省委王好勤、临潼县委刘宏儒（化名高岳峰）。及至苏华由西安回来，以后找到渭华县委，与二次省委之陕东特派员李杰夫。不几日又由苏华找到陕甘边区党特委书记秦武山，他是代表边区来省委解决问题的。他听说省委健全了，哪知到省以后，找不到关系，在街上走遇到已经发表自首宣言之史克寿，克寿即告诉秦武山说，现在叛徒是怎样的利害，其中以某某为最坏，并叮咛武山，不要在街上走。这时候苏华到省，经过许多社会关系的朋友在一个大药房里保险与史克寿见了面，史克寿即介绍了秦武山，叫给秦武山找关系。当时彼此都害怕，结果秦武山找到了宏儒（因过去系同学，又在渭北游击队时，武山与宏儒熟悉），证明之后，即召集秦武山、党省西巡视樊德印、党前渭北武区秘书孙宗继、同志王见红、西市郑福平、临潼刘宏儒、四次省委王好勤与渭华县委王成义、陕东特派员李杰夫。结果，因许多人对我怀疑，所以这次参加陕西第一次活动分子会的，仅我、苏华、樊德印、孙宗继、王见红、秦武山等，余均未到。这天就决定开会（这会的日期，在我回去后十余日，即十一月十八九日也），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成立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决定派人赴边

区，决定恢复工作的中心路线。首先由我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我这次回陕的任务”，后即成立工作委员会，决定我做书记，苏做组织，樊做宣传。同时并决定叫王见红同志赴边区，第一，叫军队里派人由工委会转中央解决问题；第二，调查秦武山来省的前前后后。次日开第一次常委（会）即决定接洽陕东特派员李杰夫、四次临时省委王好勤、蓝田特支关系等。后三日（十一月二十三日），西市市委郑福平与临潼县委刘宏儒，当时很快地把临潼与西市工作作了个大概的决定，该会名义为“工委常委第二次西临工作讨论会”，从此很顺利地进行着。后一个礼拜，李杰夫来谈过了一切情形，发生了□□的关系，使中央有了确切证明之后，再作道理。从此，工作一天天前进，问题也就多了。因中央给我们来信的地方（是我在沪留的），人去省医病，一个多月没转信来，同时我因技术差池，我写的信，使中央简直看不出来，所以寄信不到。在常委第三次会议席上，决定派苏华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解决陕西的问题（本来这时候本应我来比较好得多，人熟地熟，但因我无确实证明，同志都疑惑，才决定苏华来）。

自从苏华同志走了以后，我与许多关系都是继续着。谁知苏同志来的信一连五封都被遗失着，误了二十多天。同时因中央通讯处一个破坏了，失遗了我给中央的几封信，后来我给中央的信是收到了，但因技术工作不好，使看不清以致耽延到最近，使我们实在不能忍了，于是我们把零乱的组织，得到了各方面的同意（如临时省委陕东特派员李杰夫与陕东组织与工作委员会）于今年一月（月）五（月）号的那天，我与李杰夫、孙作宾商量汇合陕西组织。商量结果，需要约大洋若干，方能召集，〈时有饭吃与〉决定后马上分派工作。同时还要想叫李杰夫找郑州交通站（因交通站之同志，于十九年杰夫任陕委书记时曾做过交通的）。后来因我没有信到而停止，彼此约了通讯地方就此算了。不久，去边区之人，又因不能进去而回来了。

迄至一月二十日的那天，我们接到了中央的来信与指示，又着手召集扩大会议，准备成立全陕统一领导机关，以工作委员会与中央的关系为正确关系。这时即旧历初十前后，渭南委已开始破坏，我们见到渭南找地方有问题，所以就乡下召集了。我、李杰夫、秦武山、白耀庭（蓝田特支书记）一次得来，

在一月二十四那天晚上在一个同志家里开会。这会名扩大会筹备会，讨论了这会的议事日程，并决定由各人分别担任起草这一会议的决议案与重要宣言、告同志书，并决定应召集的人。

除我代表工作委员会及中央关系外，李杰夫代表陕东特委，秦武山代表边区及红二十六军，并召集渭华县委宋子田及另一农民同志（王成文〔义〕没被捕前正式决定召集的），蓝田特支书记白耀庭，西市郑福平，四次省委洋人、王好勤，因洋人有西路关系，临潼刘宏儒、渭南河北孙宋之，决定于（阴历腊月十八日，阳历二月初一日）在渭开会。事已决定，谁知次晨未明，即有我家中人跑来说：“昨晚有民团四处，人数八十余人，环绕村庄，在我家到处索人，说是南京政府有电报，渭南共党县委书记也供出我是怎样重要……。”说完象人即回去，我们又移了地方（该两处地方离我家约在十里以后〔上〕，故得安全度过）。这时候因为吃饭没办法，年关又将近，召集扩大会之决议遂因经济无着，环境恶劣，各留通讯地址，无结果而散。

去月二十九号那天，我给临潼、西市、蓝田各地关系去了信，略述今后工作暂时办法。三号由社会关系处得大洋四十元，以供川资，以七号那天抵沪。来时前曾寄函给中央，没收到，本来随便来去是不对的，可是可以速解决陕西严重问题的。

事实上有许多人，陕西站不住的同志，因为第一没有钱；第二，关系太零乱，干部调动是很困难。

C、我回陕以来到现在的经济决算（从略）。

今后陕西工作的布置：

（一）政治问题：（连甘肃在内）长久与中央断绝关系，因此在政治路线上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以致整个工作陷于不可忽视的状态中。现在要恢复陕西工作，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治领导问题，应由党中央派得力干部领导陕西党工作。

第二，红二十六军领导问题应由党中央派一军政委，领导红二十六军完成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之任务。

第三，关于团，团中央应派一负责人领导干部。

第四，中央与陕西关系应长期指定来往交通，以联络中央与陕西之密切关系，使文件与中央指定〔示〕信，不致中途断绝。

第五，今后陕西工作的政治路线问题。

A、巩固与严密党团组织——肃清一切在敌人大破坏面前的一切动摇分子，实行清党运动，吸收工农苦力分子到组织里来，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严密党团组织，不让一个来历不明与没有工作成绩的分子到领导机关来，实行党一切铁的纪律。

B、反叛徒斗争，建立在教育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各种形式的训练班、讨论会，说明革命过程中必然性，研究出经验与教训来。并要组织：（1）在白区组织特务队；（2）赤区组织政治保卫团队，进行肃反工作，并经常散发我们的一切东西，揭破叛徒无耻狂咬。

C、领导群众斗争，普遍开发游击战争——领导群众抗粮抗债，反日反帝，反法西斯蒂与白色恐怖、杀豪绅高利贷者，分粮分地斗争，斗争深入后，领导群众组织游击队，创造新苏区。

D、创造新的农村作坊产业支部——抓紧陇海铁路工人、兵工厂、报社、炭井、农村等日常斗争，建立新的支部。

E、扩大部队——特别是红二十六军，（改编义勇军为第六团，陕北游击队编为骑兵团）。

F、加紧政治教育工作——组织流动训练班、讨论会等，提高同志群众的政治水平。

G、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向一切不正确倾向与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

组织问题：

A、关于统一领导机关问题——召集各地方党部团部代表成立正式省委。

B、领导问题——在红二十六军中的政委可由党中央派人充任，党省委书记、秘书，当由党中央派定或指定之，团省委书记由团中央派干部充任。

C、机关问题——首先在陕应建立三个机关（党省委一个，团省委一个，党团秘书处一个）。

D、调动干部——陕西不能站的或在中口不能站的调他到另一地去，这样才不致把许多很好的同志送给敌人惨杀。

E、各地关系问题与给边区、汉南设交通部问题与中央给陕境设交通站问题。

(三) 军事：

A、扩大二十六军，恢复二十九军。

B、恢复渭北游击队。

C、加紧白军士兵民团工作。

D、在西市组织特务队。

(四) 经济预算与来源——待续报告提出，其他如“开除杜衡、小章”与“通缉叛徒林〔杜〕、小、潘”^⑫……待续。

声明——这里特别声明的这东西与党中央共同讨论解决，因小〇同志回去恢复时，中央指定叫成立“党团共同工作委员会”，而且这告所说的是党、团的共同情形。

陕西恢复工作委员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

注：①应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

②根据贾拓夫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报告，小章被捕后当天叛变。

③张短人（矮人）是张培述。

④党在十七路军中的地下组织未遭破坏。

⑤据刘映胜回忆：这届临时省委由刘映胜（书记）、张新发、李冲霄、樊德音、雷振东组成。雷振东、史克寿、刑崇道组成临时团省委。

⑥这届临时省委是被驻机关的内奸王治国破坏的。潘士杰破坏的是胡明伦等组织的临时组织。

⑦即咎玉祥。

⑧此时陈已赴中央。

⑨指严克伦。

⑩应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⑪即魏光波。

⑫指杜衡、小章（袁岳栋）、潘士杰。

*这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团中央派回陕西的韩学亚与后来派往上海与中央联系的魏光波（魏忠慎）给中央写的关于他们恢复陕西党、团组织的报告。

陕西来人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交抄)

关于陕西今后工作，我们的意见简略如下：

一、在○○同志^①这次离陕来沪之后，西安又遭一次破坏，这是第七次，并且继续有叛变的，因此西安还仅剩下的几个支部是否依然存在，实已大成问题。在叛徒中有不少对外县工作十分熟悉的，所以外县的组织现状如此（何）也殊难断定。但这一时期不管国民党和叛徒们如何集中一切力量向我们进攻，而红二十六军和抗日义勇军却有了新的更猛烈的发展。据○○同志报告，红二十六军现有四百余人，三百支枪，抗日军有六百余人，武器精良，同时计划进行的十二个游击队实现了六个。许多忠实的无产阶级战斗员在城市和农村立足不住，都自动投往红军，这当然也促进了边区游击运动的开展。自然这并不是说红二十六军等已经没有问题了，据我们所了解的，在这些部队的领导干部中间，仍然有许多不坚定的分子，甚至有过去已经开除了（的）地主“同志”，现在又混到队伍里当了什么队长，那里还十分缺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强有力的干部主持工作。倘若红二十六军和抗日军能得到坚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我们相信在那农村经济已经破碎到无以复加的西北灾荒区域里，苏维埃运动必然可以迅速地如火燎原地开展起来。估计到西北问题的重要和红二十六（军）及抗日军因政治领导的严重，我们要求中央立即派遣两个以上非常得力的干部，到那里主持工作。这是第一。

二、估计到今天的形势，我们认为省委应暂时设在边区，派去的两个同志，一个做政委，一个主持省委。在省委成立后，从红军游击队、抗日军以及当地的同志和群众中，有计划地派遣工作人员，分别到各县以及西安、华阴和白军部队中，根据具体情形去恢复开辟和开展那些区域的工作。

三、汉南情形，○○同志所报告的还是两月以前的消息，在这大变化的过程中，目前形势如何，实在难以具体估计。但○○同志对汉南较为熟悉，中央应派一得力同志随同○○同志到汉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具体检查那里的工作，并予以切实领导。陕省委改设于边区，汉南最好应划归川陕省委领导。

四、在陕北则应划归陕省委，因双方关系较为密切，陕北游击队在陕省委积极领导和红二十六军等实际援助之下，可有更迅速地发展，较之划归河北而又鞭长莫及的办法要实际得多。

五、估计到西北问题的严重，此后中央对甘肃、宁夏的工作亦不应长期置诸不闻不问。宁夏自立三时期以后，便无人过问，那时省城及几个县份是有工作的，固然主要是在学生中间。甘肃去年夏季在陕省委领导之下组织兵变，在靖远一带发展成三百余人的游击队，但发动以后从未〔得〕到陕省〔委〕领导以至完全失败。现兰州尚有二、三十同志，大都〔是〕军队和机关中上层分子，去年底省委曾派一回民同志前去，无成绩，同时交通阻隔（往返一次须百数十元），与省委关系非常之坏。此次省委发生问题之后，兰州怕派人来省，现已两月，仍在等待解决甘肃问题。我们现在仅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中央及即将派往陕省工作同志的注意，特别是关于国内少数民族的回民问题。

六、估计到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开展白区工作的重要，我们认为苏区中央和红四方面〔军〕应抽调得力的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特别是在游击运动这方面的，到白区工作开展白区□□。尤其是这不平衡的北方的苏维埃运动，近年以来白区干部是受到非常严重摧残，却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充，这一主观上的弱点必须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克服，而苏区的丰富经验和苏区的干部在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帮助的。

七、我们要求中央以后对西北工作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与切实领导，陕北本来是陕西工作最开展的区域，但与上级领导机关断绝关系几近两年。陕省委自北方会议以后没有接到中央一封工作指示信，不管这时期的报告是怎样源源而来，这在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和工作更广泛地开展上是有妨碍的。

应即在西安建立一交通站，以打通中央和边区以及汉南的关系。我们以为交通站的建立以及交通员的选派，在目前形势之下应完全由中央负责。在陕西

那闭塞的农村，要找几个适于往来大都市的交通员的的确有些困难，本来在工人、士兵和学生中间还可勉强找出几个，但这因为叛徒关系，在今天恐怕愈发困难了。目前中央最好从河南、山西或河北抽调几个交通，另外在西安设一小本经营的生意（最好做洋货）做交通机关，至本省交通网可由陕省委负责。

注：①本文中○○同志皆指刘顺元派赴中央报告的杜启安。

*据内容看是陕西特委（刘顺元向中央报告的代号）派人赴中央的报告。刘顺元回忆中说他曾派杜启安向中央汇报。

贾拓夫关于陕西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

洛甫^①同志：

省委已移至三原云阳办公，因三原地方很小，熟人很多，做秘密工作很困难，故暂且依靠云阳办事处掩护我们的工作，故三原已设立交通处及接洽处，各地关系均建立在三原，趁明日有人来延安之便，将我们最近工作给你谈谈。

(详细报告还须等几天)

一、西安在我们离开之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我们已建立了市委，市委下组织有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学生工作委员会等，分别领导工人支部学生支部及群众团体的党团工作，并决定心余^②同志暂留西安帮助市委工作一时期，在我们到西安之后，在以下的各个单位建立了党的组织或关系：工人方面在文化报馆建立了一个支部，汽车工人方面建立了一个小组，学生方面有高中、女师、一中、二中、女中、西师六个学校。高中、西师、女师均已建立支部，其他三校或有一个党员，或有二个党员（最近还有发展均可望成立支部）。此外省立医院、助产学校、民族解放先锋队均建立了支部。除以上各个单位外，在省府、民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及其他各机关报馆，均有零星同志。西救及学联会均组成了党团，西安各救亡团体大部可受我们领导。最近因西安环境的变动，组织情况有了一些变动，现还无法统计。在一月底我们统计西安共有党员六十多人，现在恐要减少三分之一。不过以后一时期还有新的发展，上述这些支部同志，大部分是双一二以后发展的新同志，小部分是老的同志或从前失掉组织关系，在双一二以后恢复了的。

二、渭北以前在交口（临潼地）武字区（三原地）蒲城等地有五个支部，三十多党员，最近发展有二倍以上，不仅扩火了组织，而且在新的地区建立了

党的基础，如高陵、泾阳、富平、三原城内、许（肃）字区及西阳镇等地，我们决定由以前渭北工委的基础成立渭北特委，三原成立临时县委，其他泾阳、高陵、富平、蒲城、临潼均以县为单位成立工作委员会或特支。现统计上述六县党员约一百人，大半为农民，小半为学生。

三、西路扶风有七个支部，四五十个党员，咸阳建立一个支部，岐山、凤翔、乾县、武功均有一些同志，我们已派巡视员去整理上述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并委派他再提拔当地干部成立西府（西安以西称西府）工作委员会，以扶风为中心，管理上述各县工作。

四、临潼城内找到以前两个党员工作，很快的可成立特支，蓝田、商县一带派了特派员去恢复与建立党的组织，尚未接到报告。韩城、澄县也派了人去恢复组织，这都是我们没有离开西安之前的情形。

五、甘肃平凉建立了一个特支，三个党员。平凉的各救亡团体及运动是他们领导的。兰州已找好一人，但因交通关系，还没有去。

六、西救工作。我们决定分区活动。西安留一部分可以继续活动的人员，其余分散到各地去。渭北建立一办事处，党团同志及主要人员均留此。邠州设立一办事处，管理西府十几县民众运动。平凉设立一办事处，管理陇东各县农民运动，这样去实际的加强各县群众的救国运动。

七、东北军工作因理治^③有病，所以我们决定调心余去代理冶工作，机关驻邠州十七路工作，因十七路军队大部分在渭北，所以我们要欧阳^④也来三原靠近省委，并便于领导十七路工作。东北军工作较十七路开展，详情要他们也做报告给中央来。

八、我们一个多月的工作，成绩不多，只是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党的组织（以前党的基础过于薄弱，老的活动的党员干部大部分在一九三三年大破坏时自首了的，现在我们所管理的地方党的组织都是开始建立，大约共有党员二百多不到三百人的样子。这是地方上的。连东北军及十七路队（军）内党员约有六百至七百的样子）。在各救亡团体及抗日运动方面建立了党的领导，并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等。但缺点是非常之多的。最主要的是关门主义的“左”的倾向十分严重，这是一切工作开展的最大阻碍，（详细的情形，我们准备把所有的材

料整理起来写一个材料出来)所有党内老的同志也好,新的同志也好,都对统一战线策略了解和运用得很差,甚至有不少的同志还不懂的统一战线,因此关于党内同志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但我们自从到了西安之后,简直没有看到中央的什么文件,所有的同志都要求看党的文件,但是我们拿不出来。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很快地改善省委与中央的关系。中央的文件,我们要求把双一二以后的每种发我一二份来,以后的文件,每种发我们二十份,由我们转到各地组织去。里边有重要的材料,我们抽出翻印,对新党员的基本教育的材料,也请发我们一些来。我们自己也准备抓住一些实际的问题写些材料,以帮助各地组织对同志的教育,并且我们还准备开办短期的训练班,分期训练。渭北、西安、西府及其他各地支部的负责同志,现在看来,这个工作是必要并且是可能的。总之希望中央以后多帮助我们一些教育材料。

我们以后将按期做报告来,并将各地工作的材料也经常发来,希中央多多给我们以指示至盼!致以

布礼

拓夫

二、十二于三原

注:①即张闻天。
②即张德生。
③即朱理治。
④即欧阳钦。

*原标题为:黄拓夫关于陕西党的组织工作给洛甫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给孟和同志转耀县 工委指示（节录）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

孟和同志转耀县工委：

孟和同志十五日及工委十三日的简单报告均收到，虽然全部情况尚不能了解，但可看出耀县工作已有初步的基础，并且正在开展之中。希望你们抓住现有的这一基础把工作大的向前推进。

目前工作的中心，应该是放在统一战线上面。望你们根据我们所发的《统一战线问题》刊物在党内外做充分的解释。使党员与群众都能了解这一问题，并执行到实际工作中去。根据你们的报告中有下列问题，望加注意。

（一）群众组织：你们各种救国组织的形式已经建立，倘〔尚〕缺乏工作充实的内容及上层还不统一，在上层组织方面，我们意见仍如西救会民运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可以合并起来（名义可即用耀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或其他均可）成为一个最高的统一的群众组织领导机关，而在这一组织之下，成立各地方各界的分会，这样可以指挥统一领导集中起来。

这些组织必须完全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而加入这些组织的也必须采取说服自愿的原则，不能如你们说的简单的到商店机关找人签名的办法。同时有了这些组织，还须去进行经常抗日救国的教育与实际工作。

（二）你们所说的发动群众斗争问题，自然是须要的。但是每次斗争必须特别慎重与考虑，口号不能提得太左，要求不能提得太高，行动不能过激，不能依靠在当地的军事力量上面。总之要以能改良群众一些生活而不妨碍统一战线为原则。因此党必须很正确去领导这些斗争。

（三）党的组织问题：在三月份你们发展党员一倍的计划是必要的，望努

力促其实现。将来要在每个重要乡村每个学校每个机关每个职业内部都建立起支部组织，并能有支部生活（能经常开会与缴纳党费等），并应特别注意秘密工作。每个支部人数不过多，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与当地驻军（独立旅与红军）可以发生工作上的关系，但不要发生党的组织上的关系。他们发展的组织交给你们管理后，这些组织就不要再与他们发生关系了。因此你们在发展党的计划中每人扩大一个红色战士的计划是不必要的。

省 委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日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领导区域划分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央：

省委自得中央电告增加领导区域后，现一方面依照地域便利，一方面依照工作基础，将现有区域作下列划分：

(一) 西安——管理西安市工作，原有市委现取消，改西安工委，在省委未整个移西安时，由心余^①同志负责（他现已去西安）。

(二) 渭华区——以渭南作中心，领导沿陇海路由潼关至临潼（包括潼、华、华、渭、临五个县）中心是铁路及中央军工作，现在党的基础当〔尚〕未普遍，其着手首先还是在各县建立党的组织（由心余经过西安负责）。

(三) 蒲白区——蒲城白水二县，以蒲城为中心县委。

(四) 韩合区——包括韩城、合阳、大荔、朝邑、平民、澄城（黄河以西，洛河以东）那方面详情还不十分知道，现已派李〇〇同志去找地方党关系，作一时期的整埴工作。

(五) 三原区——以三原中心县委领导富平、高陵二县，富平高陵党员不多，三原现有五十以上，已正式成立县委。

(六) 北路区——由洛川至耀县之汽车路线，包括洛、中^②、宜、同、耀五个县，因〇〇同志在陕甘省委取消时，未正式交关系，我们只自己找得耀县的，现宜君亦正在发生关系，将来拟五个县独立存在，而以一省委特派员在北路代表省委负领导责任。

(七) 关中区——苏区照旧。

(八) 邠（彬）长区——邠（彬）县、长武，以邠（彬）县为中心县委。

(九) 平泾区——平凉、泾川，以平凉为中心县委，主要向西发展，此路将来或许交与陕甘宁省委。

（十）泾阳区——以泾阳为中心县委，领导咸阳淳化二县工作，惟县委因乏人，一时尚未能成立。

（十一）乾县区——以乾县为中心县委，领导武功、礼泉、永寿、麟游、兴平五县工作，工作状况前已有报告来，现又接受十五人在礼泉之二个支部，及武功、麟游单个关系，工作在开展中。

（十二）扶风区——以扶风为中心，领导岐山、凤翔、宝鸡工作，前已有报告了。

省委之作目前除陇海路之潼（关）西（安）段外，尚限制在渭河以北，惟另^③。

（十四）在蓝田有少数工作基础，现求向商县、洛南、柞水发展而已，在渭河以南，长安以西，则全无工作。

另依上表附图，并以数字说明各该地区之党员大概数字（因详确统计未全得到）。

以后关于省委向中央之报告，拟作分区报告。因交通关系，〈困〉难按期同时接到各处报告，以为综合，只能得到一处报告后或巡视检查一处工作后，即将该区工作报告来，省委自当于可能范围，比较长时期内亦作整个报告，作为一般的工作估计及工作意见。

省委自移云阳后，曾先后寄回有（一）乾县、扶风，（二）平凉，（三）蓝田，（四）西安，（五）三原，（六）同耀，（七）西北军，（八）渭华（现付来）的八处报告，未审一一收到否，如有那种未收到的，请告。

此致

敬礼！

红中社^④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①即张德生。

②指中部县即今黄陵。

③原文如此。

④即陕西省委。

*原标题为红中社——陕西省委陕西领导区域之划分。

中共陕西省委给渭华诸同志信

——党的组织问题，群众工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渭华诸同志：

王××同志来省委关于你们四月份工作有以下简单的指示：

一、现在成立的特支干事会可以扩大为渭北工作委员会，仍由现在的三个同志负责领导各支部和小组的工作。

二、现在的支部及小组，要大大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群众中新的积极分子到党里来，在四月底至少扩大到三十人以上，成为三个健全有力的支部。另外必须努力在高塘和赤水街上利用现在的关系各创造一个支部，每个支部至少要有五个同志，这是省委给你们在四月内必须做到（的）工作，希望你们努力完成。

三、党的组织要绝对的严密，同志和同志、小组和小组以及支部和支部之间，绝对禁止发生横的关系，发展组织除了对那些失掉组织关系而政治上不动摇的老同志可以恢复组织外，应大大的向那些新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开门，吸收他们到党里来，自首分子是政治上已经变节的分子，如果有比较好的只能利用他们做一般的统一战线工作，而不能把他们再介绍到党里来，这些事情必须严格遵守。

四、党内要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把省委发给你们的文件，发给识字同志看，并在支部小组中讨论，工委同志多和支部小组同志谈话，使一般同志都了解目前新的形势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懂得在新的策略下怎样做工作。

五、群众工作你们现在主要的应发动党员和利用各种关系及方法在群众中

进行抗日救国和统一战线的宣传，扩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与提高群众抗日救国的情绪，在这一工作开展的基础上，经过种种办法去建立公开的各种群众的救国会的组织，同时在一切旧的组织中，如保甲民团青年等都要去进行救国的工作，不论他们的上层分子或下层群众，都要设法把他们争取到抗日救国的阵线上来。

六、至于群众斗争的问题，不要像过去一样提出过左的或过高的口号，（如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这〔因〕为这些口号会妨害统一战线工作，但我们党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代表和保护群众利益的，所以为了统一战线而完全取消群众斗争也是错误的。我们并应当进行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和统一战线联系起来，如要求赈灾减租减债以至要求取消某一种苛捐杂税等，尽可能采取一些合法的和平的方法来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

七、最后你们必须用最大力量在渭华一带的中央军及铁路工人及陇海路沿线五个县（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的城市农村及各小学校中开辟工作，在这些方面，努力创造党的基础和开展群众的救国运动。

其他工作问题由○○同志面谈。

希望你们以后经常派人来向省委报告你们的工作，并经省委得到指示及文件。

致以

布礼

陕西省委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三月份工作计划*

(一九三七年三月)

一、发展四百个新党员：

1. 各县分配数目：

三原 100	泾阳 50	高陵 20	临潼 30
富平 20	蒲城 30	白水 10	西安 80
平凉 20	西路 40	蓝商 10	同耀 20
陕东 20			

2. 发展对象：

A. 主要的吸收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革命的知识分子中、下级军官兵士积极分子与群众领袖（地主富农大资产阶级子弟不得介绍入党）。

B. 次要的吸收失掉了组织关系仍一贯积极独立工作的老党员（自首分子和永远开除了党籍的一般的不得恢复党籍）。

3. 新党员的批准：

A. 一般的支干会批准。

B. 失掉关系的老党员支部以上领导机关批准。

4. 展开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首先克服个别干部的关门观点，深入支部小组反对关门主义的教育，严厉（厉）和“一村有两个党员就够起核心作用了”、“妇女没有一点用处”等关门主义的思想作斗争，同时反对不经选择拉夫式的办法。

5. 定期检查发展的程度：

A. 小组三日检查一次。

B. 支部七日检查一次。

C. 工委或县委十日检查一次。

D. 省委十五日检查一次。

二、开办流动训练班：

1. 省委派训练员分去各县帮助各工委进行训练各个支部。

2. 首先训练支部书记和干事，每个支部三天。

3. 训练材料：

A. 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

B. 统一战线问题。

C. 党的工作。

（根据不同性质的支部对象的程度由训练员自拟训练大纲）。

三、提拔一批新干部：

1. 提拔二十个区级干部：

由流动训练班中提拔，原来担任的支部工作，由小组中提拔人接替。

2. 提拔十个县委级干部：

A. 选择最好的支部书记，部分工委干部再给以训练。

B. 省委开办三天至五天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各县干部各单〔位〕决定后编小组分别训练）。

四、建立县区级党的领导机关：

1. 建立三原、蒲城、泾阳、扶风等中心县委。

2. 建立武字区、许〔肃〕字区、新〔心〕字区、交口区、云阳区、口子头区等区委，白水、富平、高陵、咸阳等特区委。

五、巩固党的组织：

1. 严格建立秘密工作：

A. 各个工委各个支部专门讨论一次秘密工作。

B. 各支部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各工委于三月二十四日以前检查一次秘密工作，检查结果于三日内报告省委作一次总检查。

2. 清查每个支部每个小组的组织状况，和每个党员的政治面目，保证没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混在党内。清查结果支部于三月五日前报告各工委，各工委于

三月十五日前报告省委。

六、加强党对各救亡团体的领导：

1. 建立已有党的组织的地区和机关团体救亡组织中的党团。
2. 支部经常讨论救国会工作，具体领导党员在救国会中的工作。
3. 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改变工作方式，争取公开活动。

七、本计划执行状况各支部给工委（市委特支）各工委（市委特支）给省委经常作报告，省委于三月三十日作总结。

陕西省委组织部

*原标题为：省委三月份组织工作计划。

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节录）

——关锋同志在陕西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

一、目前西北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我们要研究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除了了解整个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以外，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也要有具体的估计，目前西北政治形势的特点是：

（一）西北是国防前线。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依靠着满洲的军事根据地，一方面配合着政治经济的活动，夺取我们的华北；另一方面正要进一步地侵略西北，顺着长城向绥远宁夏陕西甘肃等省进攻。因此西北在国防上已经处于极重要的地位，成为未来中日战争中战略要地。

（二）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总指挥部——我们的党中央，苏区与红军都集中在西北，造成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条件，苏区与红军的每一实施都直接影响着西北政治经济群众生活及其斗争，西北是中国革命的堡垒！

（三）因为上面两个因素，西北统治阶级受到影响而特别动摇起来，天天趋向抗日，比如山西阎锡山的守土抗日，主张和绥远傅作义的抗战等等情形。双一二事变^①也可以证明，甚至一些地方割据的小军阀，也趋向抗日而停止剿共的战争。

（四）陕甘两省地方情形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不仅有红军也有中央军、陕军冯钦哉部，甘肃有邓宝珊、鲁太昌及回军，（如马步青马步芳等）各部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是不一致的。

（五）西北的少数民族很多，有蒙古人、回人等。这些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有着极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也一天天增长起来。

（六）陕西及西北一般民众的抗日情绪是在显著地增长着，特别在双一二后，陕西救亡运动有了很大的开展，这种运动正在向着西北各地及各社会阶层发展着。

以上这些情形给了我们的工作以很顺利的条件，我们就要把握这些条件开展党的工作。

二、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初步检查

双一二事变以前西北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中。陕西党经过一九三三年大破坏的打击，同时在国民党严重地压迫之下，党的组织非常薄弱。那时只有渭北还保留了少数支部，西安组织也没有系统的建立，只有个别党员在群众中活动。因为没有领导的核心，所以工作也不能有大的开展。双一二事变以后，陕西的环境有了大的变化，使我党得以恢复与发展，并能加强自己在群众中活动，这个时期党的工作获得了如下的成绩。

（一）党中央曾经清楚地指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或者是和平解决，消灭一切内战；或者是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以便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陕西党在中央和平方针之下，反对托派，说服左派领导广大群众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而斗争，最后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的胜利。

（二）双一二事变以后的救亡运动，党积极地参加与领导，经过许多党员干部的努力，建立与加强了党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作用，并大大地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

（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获得了许多成绩。党经过许多报纸、刊物、戏剧、集会、示威演说宣传，以及各个救亡团体的宣传工作，扩大和深入了党在广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开始成为广大群众的口号和呼声。

（四）在学生、工人、农民、军队中，均加强了党的活动，工人里面也开始了党的工作，一般说来，我们已恢复了一九二七年以来党在群众中最好时期的阵容。

（五）党的组织的恢复、扩大与巩固，获得不少成绩。双一二以前的情形

和现在比较起来，我们工作的区域扩大了有六倍，党员发展到十倍以上。

（六）在执行党的任务上，开始转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这里应该赞扬我们西安和三原的党，他们能够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改善自己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中创造了一些新的方式如公开合法方式与环境的利用，参加种种社会团体的活动，利用旧的形式进行工作，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的配合等等。

以上这些成绩完全依靠于：①党中央布尔什维克正确的直接的领导；②陕西政治环境的优越条件以及③陕西全党同志能够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与艰苦工作的结果。

三、今后党与群众工作的方针

（一）我们党在群众中工作的方针与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准备群众的力量，以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而斗争。我们的群众工作就是要使党成为伟大的群众的政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准备进行保卫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党的策略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都是为着这个任务。

在新的环境里面，党与群众工作需要一个彻底的转变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和新的任务。应当明显指出这个转变是含有两重性的：（一）因为目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比重上的新的变化，产生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和方式方法。（二）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倾向。须知这些倾向在我们党内是有历史根源的。在为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斗争中，若不彻底肃清这些倾向是不能成功的。只有从这两方面去坚决执行工作的彻底转变，才能使我党成为广大群众的政党，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才能从“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顺利地转变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才能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并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政府机关中、群众团体中进行党的工作，争取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原则上我们现在是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民主的斗争方式，来代替过去对

立的暴烈的和武装的斗争方式。但我们绝不能忽略与抹杀群众的斗争。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之下，党总是代表和保护群众利益的，并且也只有我们党坚决为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对于那些汉奸亲日派及民族的投降叛变分子，我们仍然要发动群众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以暴烈的手段对待他们的！

（二）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应当怎样做呢？

甲、目前救亡运动就是统一战线的运动，同时也是争取民主的运动。第一要在日常工作中争取完全的合法化与公开活动。第二扩大救亡运动争取广大群众各阶层分子到救亡运动中来。第三深入工厂农村兵营街道，并把群众组织起来。第四争取群众生活的改善。第五最（大）限度发挥民主精神，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反对一切少数分子包办救亡运动的倾向。第六彻底转变群众工作的方式与方法，不应把党内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运用到群众工作中去。

乙、其次必须灵活地运用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到各个地方各种人群各个具体环境中去，不要把工作只限于救国会一方面。除了救国（会）以外，还应该采取种种不同的过渡的旧的形式，去开展统一战线运动，以争取广大群众。

丙、同时我们估计到：在统一战线内部，仍然有矛盾，有斗争，我们决不用强力来消灭这些矛盾；但我们也不能随声附和，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我们要保持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取得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这就需要：①参加统一战线的每个党员，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②领导群众参加统一战线并执行这个纲领；③经常提出我们对于统一战线的意见建议与批评；④对统一战线内部各派的错误，我们应保持批评的自由与坚决主张并始终拥护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

丁、对左派问题（在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先进分子），有人主张建立左派的组织，以与右派对抗，这种意见是不妥当的。我们的群众工作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之下组织起来，使这个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包括左派，而是包括广大群众的东 西，是民族性的。因此不应当把左派单独组织，致使左派与中派脱离。但我们应该依靠左派发展群众工作，不必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只要与左派取得

密切关系，帮助领导与团结他们去开展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且以教育说服的方式克服左派的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

戊、我们对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的态度，是承认三民主义有它历史的变化，我们愿意赞助并帮助国民党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并且应当领导抗日派与人民加入他们的队伍去改造他们，帮助与扩大抗日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并排斥亲日派，使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复活，把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改变成为抗日救国的旗帜（详见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中毛斯^②谈话的解释。）

己、我们在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目前民主运动应该成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需要我们全党同志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以发展民主运动。加紧进行国民大会的选举工作，各种的立法运动，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的工作（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等等，把民主运动与群众一切切身利益与要求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

庚、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路线中，要注意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的配合。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要下层不要上层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关门主义，另一种是只要上层不要下层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尾巴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有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发展。

（三）建立党与群众的正确联系，过去没有很好地注意，使得我们有些组织受到破坏，受到损失，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教训，注意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的联系。了解群众工作与党的工作的不同。群众工作应该采取公开路线，而党的工作则需保持绝对的秘密。党员在群众中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应该注意下列各点：1. 进行艰苦的宣传说服与教育的工作，使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体验到我们真正代表了群众的利益。2. 耐心地去争取群众，说服群众，即使在群众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不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也不能向群众“斗争”，不能对群众采取强迫命令的态度。3. 我们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最大限度发挥群众的民主精神，与群众密切地联系成为一片。我们必须注意无论在什么时候不能与群众脱离，不能以党的决定与群众对立。4. 党员要以群众一分子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要以自己英勇斗争的模范，远大的见识，坚强的工作能力，特别是拥护群众利益的忠心，去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戴。5.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反对包

办方式，官僚主义。6. 在群众工作中不要害怕与其他派别合作，不要与其他派别对立，而是要接近他们，争取与联合他们抗日，争取他们接受我们抗日的主张。对于动摇分子，应当接近他们去克服他们的动摇。对其他派别的错误，也应当积极地去批评他们。7. 如果群众中发生严重的错误，违反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利益，我们也应当耐心地去说服他们，而不能成为群众的尾巴。我们对于群众基本问题是教育与说服的问题，而不是强迫和命令，是代表群众利益而不是与之对立。

群众工作与党的工作的联系，应估计具体环境来决定，什么应当公开，什么应当秘密，都要适合于客观的情况。以后我们公开工作的条件增加，对这个问题更要特别注意。改善我们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群众工作必须尽可能利用合法的地位，但也要正确估计到我们可能公开的程度，超过环境允许的限度是不好的。争取公开必须依靠于广大群众的力量。仅仅由少数先进分子去争取公开是不妥当的。在争取公开的活动中，党员要完全以群众的面目出现。在公开工作中的同志，不应该再兼党的工作，党的工作同志也不应该兼群众工作。不要轻易暴露党的面目，即使环境暂时允许我党公开，我们仍然也要保持秘密工作的原则，以便在任何情况之下也能活动。

四、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1)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把群众斗争与提高他们的觉悟性组织力密切联系起来。

(2) 在斗争中我们要清楚地估计敌我力量，环境情况，斗争的发展与变化，以决定我们具体的斗争策略。

(3) 群众已经愿意斗争，而且要求起来斗争，我们就要毫不迟疑地去领导这个斗争。但必须选择良好的时机……倘若时机不到，我们可以等待，等待新的有利的时机去发动。

(4) 斗争发动之后，须使斗争能够坚持，能够扩大，这就必须依靠大多数群众的力量，顽强地抵抗敌人进攻，击退敌人与进攻敌人，不应盲目地无目的坚持与扩大斗争。这一定要具体的情况来适宜地结束斗争，使斗争能够在不利的时候，从攻势转到坚固的防御，使斗争在有利的时候从防御转到优势的进

攻。

(5) 在旧的斗争终止，新的斗争尚未爆发的过渡时期，我们要利用时机积聚群众力量，加强群众组织准备新的战斗。

(6) 在每一个斗争结束之后，群众中必然发生两种倾向，或者因斗争的胜利而骄傲起来，或者是因斗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我们应该克服这两种倾向。

(7) 在斗争中，要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

(8) 在斗争中要设法争取同盟者，扩大斗争力量，使敌人陷于孤立。

(9) 斗争要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我们目前主要的是采用合法斗争的方式，但也不完全拒绝其他的斗争方式。

(10) 在群众斗争中，发展民主的精神，斗争的纲领要经过群众的讨论与赞成，要适当地分配斗争力量，吸收广大群众参加。

(11) 在各种纪念节日，进行斗争，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不能机械地每个纪念节都要进行群众斗争，那样是有害的公式主义的办法。

(12) 群众的自发斗争，党应当进行领导。

(13) 在群众斗争中应争取党的领导权，但不拒绝在必要时和其他派别合作。

(14) 对于一些资产阶级派别的上层分子，如果他们愿意悔过，愿意参加斗争并真正拥护民众的利益，我们应该和他们取得很好的关系，以争取他们到统一战线中来。

(15) 在群众斗争中，现在我们不提出打倒地主资本家的口号。但必须进行改善群众生活的事业。

(16) 群众斗争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明确、具体、通俗。

五、工人运动

职工运动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我们要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首先就要争取本阶级的大多数在党的周围，以加厚领导的力量。一切轻视职工运动的倾向，都应该受到严厉的反对。

目前的职工运动应注意以下的三个中心去做。（1）领导工人群众的经济斗

争，定出工人阶级共同的与个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纲领，以动员广大群众。

(2) 发展民主运动，争取工人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这一民主运动要和改善工人生活、争取工人切身利益的斗争联系起来。

(3) 动员广大工人参加救亡运动，以加强无产阶级在救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工人中的党的组织，是我们党进行职工运动的中心力量，党必须大量吸收觉悟的工人入党，建立重要产业部门中的党的阵地，原有的党的组织，应该加紧扩大巩固。

培养党内职工运动的干部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一方面要提拔工人党员担负工运工作，另一方面要加紧训练职工运动的干部，特别重要的是在工人群众的斗争中，找寻积极分子，大胆提拔他们到领导机关来，并且帮助他们工作。

六、农民运动

1. 我们党的农民运动的工作方针，现在和过去的完全不同，以前我们的农民运动是动员广大农民武装暴动起来，开发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现在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和国民党合作，因此就要放弃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针，而以合法的方式争取农民的利益。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一）进行合法的民主运动，民选保甲长与反对封建压迫等。（二）改善农民生活。（三）组织农民在我党的周围，在农民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以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

七、青年运动

（一）陕西学生运动在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成为西北救亡运动中有力的支柱，这是不可否认的成绩。但我们应该检阅过去青年学生运动中的经验与教训，纠正运动中的缺点与弱点，才能使青年运动获得广大的开展。第一要克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及一切“左”的倾向。这一倾向表现于对国民党对三民主义对中央军的对立态度，表现于宣传工作中的“左”倾空谈，表现于忽视争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工作，而只在一些急进的左倾学生中兜圈子，表现于学生工作中与学校当局及教师的对立，如反对读书救国之类一些空喊，表现于教会学校的歧视等等。这些“左”的倾向妨碍了青年群众工作的真正开展。第二要克服那些不注意青年切身利益，空谈救国的倾向。如许多刊物上千篇一律

的抗日救国，没有具体地解决青年切身的痛苦与烦闷等。第三要克服青年运动中的包办倾向，最大限度发挥青年运动中的民主精神，不仅吸收先进的而且吸收一切落后的青年都加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第四要克服形式主义的倾向。形式主义者不了解青年运动的特点，把一般群众工作方式搬到青年运动中来，使青年运动不能青年化，妨害了青年工作的开展。第五要克服组织工作的落后。目前的组织工作只限于一部分青年学生，没有普遍，也没有深入，这些都是青年运动中应该努力克服的。

（二）在学生运动方面特别要注意于保护学生群众的本身利益，注意学生群众本身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如：（1）争取学生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2）改善课程，加紧学生的国难教育与国防教育；（3）改善考试制度；（4）保障学生毕业后有职业；（5）争取学生的经济利益，如津贴、免费、奖学金等等，提出具体的纲领到学生会去讨论，动员大多数群众的力量以争取这些纲领的实现，经过这些斗争组织学生群众的救亡运动，并且从学生运动中扩大到各阶级的青年群众中去。

八、妇女运动（略）

九、军队工作

（一）我们党的军队工作，现在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和工作方式都和以前不同。过去我们采用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办法，现在就应该完全抛弃这种办法（只有在溥仪、殷汝耕、李守信等队伍中还要继续运用这种办法）而要加紧去争取西北各武装部队参加抗日。过去我们组织士兵与长官对立，以达到拖枪暴动哗变的目的，现在不仅要争取士兵，还要去争取官长到统一战线中来，与士兵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合作。防止一切拖枪哗变暴动的现象，以保全国防力量。过去我们的士兵工作完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现在应该以抗日救国的口号与群众路线，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法去进行，（但军人中的党应该绝对秘密）我们的同志必须把军人工作作为主要的工作之一，因为这在抗战彻底胜利以及将来革命转变中间都有极大的作用。

十、党的工作

（一）一切工作都要从党的工作开始，在目前党的工作要从发展与巩固两

方面进行。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在目前是迫切的任务。在目前公开工作环境较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影响比从前更易浸入党内，反动分子混入我党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为要防止这种危险，保持党的纯洁与巩固的发展，就要求全党同志以最大的警觉性进行下述的工作：（1）提高新党员入党条件，入党必须依照党章规定新党员后补期，在后补期进行教育训练工作（工人入党没有后补期）；（2）加紧党员政治理论的教育；经过小组生活，文件，支部训练班等，使全党取得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3）提高党的纪律和扩大党内生活的民主，使每个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为党的工作；（4）选择干部要慎重地考查并且适当的分配工作；（5）加强反机会主义斗争，反对改良主义在〔对〕我们的影响，同时反对一切左的倾向；（6）要依靠基本党员去发展党员，不要拉夫式，入党要经过选择与一定期间的考查。

（二）建立与充实支部生活。

（三）注意秘密工作，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

（四）在秘密工作的情况下，要在可能范围之内，发挥党的民主，进行工作要征求下级同志的意思〔见〕和遵〔尊〕重下级同志的意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一切自高自大、命令强迫、惩办打击的现象都要根本消灭。在领导机关内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制度，使党内生活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五）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没有思想斗争就不能保证党内的一致，一切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右倾尾巴主义、投降主义以及各种不良倾向都要肃清。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式，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态度。只有顽强〔固〕的机会主义者，经过无数次说服教育而不改变自己错误的分子，才能在组织上制裁。一切打击的办法不但不能纠正同志的错误，有时反而使得错误更加发展。思想斗争不应当牵涉到非原则的问题，不应有感情、成见、报复的倾向，这些倾向只能妨害思想斗争的正确地开展。

（六）“干部决定一切”，这是斯大林同志给我们正确地指示。没有干部，我们一切工作都无从进行。在新的环境之下，我们党要有几百以至几千个好的干部去领导群众斗争。过去陕西党对干部政策是有许多错误的，今后对干部政

策应该（1）选择优秀的干部，如季米特洛夫同志所指示的，我们的干部须以下列的条件为标准，第一我们的干部应当是对工人阶级事业抱无限的忠心，对于党抱无限的忠心，并且已经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在与阶级敌人作斗争时，证明自己实在抱有这种忠心的。第二，我们的干部应当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每时每刻注意群众的利益，深知群众的感情，情绪和需要，使群众觉得他们是自己的领袖和接受他们的意见，服从他们的领导。第三，我们的干部应当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并不怕负责解决问题，在失败的时候不张皇失措，在胜利的时候不骄傲自夸，在实行决议的时候，表现百折不回的精神。第四我们的干部应当有遵守纪律的精神，能够在一切斗争中执行党的纪律。（2）正确的提拔干部，第一要了解干部，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考察干部的特点，政治觉悟程度及其工作能力，第二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提拔干部，只有在特别的情形下才能越级提拔干部。（3）利用干部要能够用其所长。（4）正确地分配干部，使他担负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5）帮助干部。（6）保存干部。（7）教育干部。

（七）党团在群众团体中应当负责实现党的领导，但这种领导是经过党团同志以个人的资格而去执行的，不是以共产党的资格去强迫群众的，党团可以讨论一切，而不能决定一切，更不能命令一切，过去有些团体里面党团包办群众工作的倾向，应该加以纠正，改善我们党团的工作方式，是整个群众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八）党的宣传工作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口号与行动不要混淆不清，宣传品要明确、具体、通俗，制作适合于群众接受的、采用活泼的群众化的方式，反对宣传党八股倾向。

（九）党的领导方式需要大大转变，在新的环境下，要坚决抛弃那些陈腐的领导方式，而学习与创造新的领导方式。（1）研究与明了具体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情况。（2）正确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3）根据主观客观情况制定完善的计划。（4）适当地分配党的力量。（5）对执行工作的干部帮助，督促，检查。（6）能够把握住工作的中心的一环，集中力量解决最主要的任务。（7）汇集工作经验，表扬好的例子和批评坏的例子。（8）总结工作研究工作胜利与

失败的原因，以实际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教育同志。（9）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细心地去了解群众。（10）学习马列斯主义，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克服一切轻视理论的倾向。

同志们！我的报告就此完了，关于目前党的任务与工作，就是要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的政党，就是要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的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和平民主与抗战而斗争。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

注：①即西安事变。

②即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泾阳县云阳镇省委召开了陕西党代表大会，贾拓夫（关锋）这个报告是二十五日作的。

关锋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结论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

同志们：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经过两天讨论，除了个别问题还有些争论外，对于我的报告是一致同意的，所以我的结论，就针对这些问题，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补充。

第一、中日矛盾与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以后五年来中国政治形势的最大的变动即是中日矛盾成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基本矛盾，而使其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国际矛盾与国内各种矛盾，成为次要的与服从的地位，这是我们一切工作转变的基点，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就无法了解现在我们党所正在进行着的各种重大的工作的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进攻下，摆在中国面前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是如何保卫中国的生存。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是如此，对于中国其他阶级是如此，对于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是如此，自然汉奸亲日派是例外的。

谁都能够明白要保卫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抗日，抗日才能救国。这是全国各阶级人民大众一致的要求与呼声。

要抗日救国就必须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因为只有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战胜日本，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

所以党所主张的统一战线第一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第二是民族的，而不是法国与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形式，是比法国、西班牙人民阵线更宽广的民族阵线，是对外的，第三是以民主共和国做它的旗帜的而不是苏维埃。

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停止武装暴动

与没收地主土地，并在苏区改工农民主专政为民主共和制度。这就是党给三中全会电报^①中四项保证的由来。

要实现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区党的工作也就必须抛弃过去在两个政权对立之下那些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就必须来一个转变，转变到适合于目前形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许多工作转变的由来。

托洛茨基派和另一些人们，说我们这样做是“投降”和“出卖无产阶级利益”，他们主张还要照旧干下去，那就是国内的阶级对立，分裂与内战。但这种对立、分裂与内战，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因为在中国继续的对立分裂与内战中才能更好地来一举灭亡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为中华民族为了抗日救国，现在完全不需要这种对立分裂与内战。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和平与统一。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华民族利益最坚决的代表者，托派企图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是不会成功的。明眼人都能看到托派现在已经完全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陕西在西北的任务，就是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把全陕全西北各种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的广大人民下层的、上层的、武装的、在野的、城市的或乡村的统统团结起来，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并准备参加神圣的抗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主（要）努力的总的任务。

第二、争取民主权利与改善人民生活

在今天这个阶段中，我们工作的中心一环是争取民主呢？

还是改善人民生活？我的答复是争取民主。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这样提出问题：“争取民主当然重要，但是改善人民生活更加重要”，这样来今天我们工作的中心一环，应当是改善人民生活了，这样说法是不妥当的。

我以为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比争取民主更重要的这个同志，是没有把群众今天的切身要求和明天的群众基本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群众经济的要求和政治的任务联系起来，他只反映了群众生活需要改善的这一方面，而没有去在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发展的现阶段的特点上去设想问题。

在现阶段中当然我们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中心，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其他问题就能比较容易地连带地解决了，这个中心不是人民生活的问题而是争取民主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只有实现民主，才能对目前许多国内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也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容易解决并有了保障。同样要准备伟大的抗战，没有民主的实现是不成功的。试问，改善人民生活能像争取民主起这样承前启后贯通一切的所谓中心一环的作用吗？显然是不能够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争取民主作为我们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自然对于民主这样重要的意义，我们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群众就不然了。他们感到目前最大的问题也许还是生活问题。这就是需要我們向群众耐心地说服教育，并且必须把改善他们生活与争取民主互相联系起来。也只有如此，才能把民主变成群众的口号，并在这个口号之下行动起来。

我们这样强调民主，是不是就否定了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呢？绝对不能的，改善人民生活，在今天同样是很主要的工作，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切什么好听的民主也罢，抗日也罢都将困难实现，我们必须把改善人民生活与我们争取民主以及争取群众进入抗日阵地的的工作密切联系。

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应当提出各种群众的要求纲领，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士兵的、妇女儿童的以及其他各界人民的，拿这些要求纲领去团结他们起来斗争。

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除了满足他们某些要求外，并须经过这些斗争，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所以我们今天的斗争手段，应当以合法的民主的手段为中心，而其他的斗争手段只能成为次要的辅助的。

许多同志严重地提出领导灾荒斗争的问题，这是非常对的。在灾荒中成千成万的灾民饥饿逃亡，我们的党必须把这些灾民团结起来，去向政府当局及地方士绅要求救济，同时配合到上层的活动与社会的动员来造成一个救灾运动。

一切“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去发动灾民分粮吃大户或进行“特务工作”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样对于统一战线是没有利益而反有害的，但当群众自动分

粮吃大户斗争起来或要求救济完全绝望之后，我们则应当以别的适当的斗争方式来代替或辅助合法的斗争方式，但斗争的目的还不改变，只是斗争方式的改变而已。

第三、关于农村组织问题

组织农民群众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任务，我们不能死守一种形式，而必须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特别是通过许多旧的形式才能达到目的。

农民救国会，这只是在环境相当好的条件下才能比较无阻碍地采用，比如在红军驻防区域或那里统治者特别倾向抗日的条件之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还是比较困难的。同时不叫农民救国会而叫某某乡或区救国会，里面不仅包括农民，而且包括某些地主富农和小学教师，这种形式也可采用，但我们要将工作重心放到农民身上去。

如果环境不〔允〕许立即成立救国会，那我们即应用旁的方法和形式来组织农民，这种形式应当是最广泛的不受任何形式限制的，只要适合于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就很好了。有同志主张成立半公开或秘密的救国会是不妥当的。因为既不能公开就不能组织广大的群众，而我们组织广大农民，不一定非用救国会名义不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名义和形式。问题是只要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

对农村的雇农与手工业者，有同志主张不单独把他们组织起来而附属于农村的一般组织之内，我想雇农与手工业者，原则上还是应当建立他们的单独组织的，同时他们也应参加到一般的农民组织之内，当然还要看具体情形来决定，如果那里的雇农手工业者很少，当然不一定马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使他们加入农村一般的组织之中。

第四、党的组织问题

严密与巩固党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地方发展与恢复党的组织，完全追逐数目字，而不管质量好坏是不对的。其结果就将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形成简单的“通知”或“强迫”的办法。有的是拉夫式的形式，有的把自首分子也拉进党内，使党内生活建立不起来，有些介绍了的党员不到会不交党费，甚至否认他们是党员，要求退出党，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们原来就不晓得

党是什么东西，不是自觉地加入党的，这种现象必须严格地纠正过来。今后必须在严肃的基础上去发展党的组织。

支部生活的重要，许多同志也提出来了，这是非常之对的。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支部生活，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内容还很差，今后地方党的组织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与充实支部生活。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党的许多工作是无法实现到群众中去的。

有同志提出做公开工作的同志可以兼负党的工作，他的理由是如此更方便一点。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使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混在一起，结果不仅对党的秘密工作不利，而且也妨碍公开工作。自然在党员很少而工作开始的地方不能机械地来化〔划〕分，同时所谓公开工作是指做群众工作，而不是指社会职业，我们许多地方的负责干部，应当有社会职业的，但他如果负了党内秘密工作，即不应再担任党外公开的群众工作。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正确地划分与联系，是必要遵守的。

干部问题是党的组织工作中一个中心问题，必须从现有的新旧干部做起，爱惜他们培养他们，发扬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扬他们的长处，而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能希望我们的干部一下子都变得很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一定要艰苦地耐心地去训练与培养我们的干部，同时必须在支部与实际工作中大量的勇敢地提拔对党忠实对工作努力并且有希望有进步的同志起来做党的负责工作。只有经过各种艰苦的工作，正确的干部政策，才能在党内涌现出大批的能执行党的路线的好干部出来。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是我们一切转变与前进的枢纽。

最后我还要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员都必须职业化，都必须取得一切合法的地位，使我们党内专门靠党生活的同志减少到最小限度，这样才能有力地开展群众工作。

第五、工作方式之彻底的转变

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然而是一切工作转变与进展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引起同志们的极大的注意。我想简单地再提到以下几个问题：

A. 要注意内容不要强调形式。但我们许多同志却与此相反，他们甚至可以

不大注意内容而光看表面，在这种形式主义下面，不知葬送了多少工作。举例来说，比如出一个刊物，刊名一定要表现浓厚的色彩，并且一定要将出刊团体在上面署名，否则宁肯不出，群众组织一定要加上“抗日”字样，如果没有“抗日”字样在他们以为那就不算什么群众组织了，进行民团工作，一定要先将民团改为“抗日游击队”或“义勇队”好像认为不改名字，民团就不能抗日，诸如此类。

B. 要克服关门主义的清高，到一切合法团体和群众中去，我们同志常常总是表现自己是十足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什么人都看不起，但这实际上只是脱离群众，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譬如有的地方举我们的同志当救国会委员，这个同志不干，原因是因为其他委员在他看来都不是些好家伙，他说不能与他“同流合污”的，我们同志在群众团体中的提议没有通过，于是大发脾气，马上要提出辞职；还有地方举我们同志为区长，但这个同志死都不干，因为在他看来，区长是地主豪绅中的，我们是共产党员何能干这个事情。如此等等。试问这样清高下去，我们还能争取群众吗？还能实现统一战线吗？

C. 要取得一切合法地位做公开合法的活动，我们现在可以把社会上不论新的旧的所有的组织机关地位名义统统可以拿到我们手里来。经过这样各种不同的普通的甚至是陈旧的形式来进行统一战线运动，如果不如此，那有时我们会连一步也不能前进的，那个不当区长的同志，我们说他不是什么清高，而是太“蠢笨”了。

D. 要善于把原则具体化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行动，我们同志常常把党的原则和口号机械地搬到环境不同的各地，生活不同的各种人群中去做空洞的喊叫，结果喊叫虽然喊叫得很高，很响亮，但群众不跟你来，或者只是很少一部分先进分子。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会把原则具体化，不会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因此就不能领导群众起来。

E. 对群众只能说服教育，而不能强迫命令。这是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领导群众不变的原则，但竟还有同志对群众用威胁甚至“打的办法”或者随便没根据的加他一个“汉奸”的名字对付。那些比较落后的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办法。即使群众落后顽固，甚至反对我们，我们也只能是说服教育的办法，如不

行，还要说服教育，再不行，更要说服教育。除此而外，不能采取其他的办法。

F. 从小的部分的可能做到的那些工作做起。我们许多工作从哪里做起呢？有同志这样提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着环境不估计力量，什么工作都想去做，那就什么工作也做不好，必须找到下手处，这就是要看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那里的环境如何？今天我们能做些什么工作，并且如何开始去做这件工作，就从这样的清楚估计之下执行那些今天可能做到的工作开始去做，如果环境和能力不允许我们同时把几件工作都做得好，那我们就应做好了这件工作再做那件工作。

其他我在报告中已经讲到的问题不再重复了，同志们，有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目前形势发展的特点与我们许多工作为什么要转变，我们必须到下面去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同志，并且要向广大群众做不断的耐心地解释，全党同志应当团结在中央正确路线的周围，拿起我们新的武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一切城市、农村、工厂、兵营、学校千百万西北人民大众中去，唤醒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向着神圣的伟大的抗战之途迈进，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转自《党的生活》第六期，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出版）

注：①即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关锋即贾拓夫。

贾拓夫关于陕西省代表会议、党的组织及工作情形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

洛甫、博古同志：

陕西省代表会议，于上月二十二日下午开幕，二十三日报告政治问题，二十四日讨论了一天，二十五日报告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讨论两天，二十七日下午做了结论。

此次到会代表计有西安五人，三原五人，蒲城一人，韩城二人，高陵一人，渭南一人，蓝田二人，泾阳二人，耀县一人，同官一人，宜君一人，乾县二人，扶风二人，永寿一人，军队中五人，共三十多人，连省委人员在内共四十三人。

会议经过一般情形还好，各地代表大都可以发言，情绪很高，周^①、彭^②、任^③、杨^④等均出席致词，给他们极大的兴奋。

会议后分别讨论了各地工作的问题，现送上会议第二个议程的报告及结论（《党的生活》第六期）及由组织部同志搜集的五月份各地组织及工作状况的报告，请审阅。

五月内各地党的组织均有发展，现各地党员总数在九百以上，连军队中四百五十人计算在内，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五月内党的组织生活也向进步方面走，在组织的整顿、支部生活的建立及党员教育方面，均做了一些工作。在群众运动方面比较好的还是西安和三原，其次耀县、蒲城、乾县、扶风各地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他各地工作无大进展，主要原因是干部的问题。此次会后，我估计对工作会上会发生一种推动的力量。

甘肃方面在邓宝山〔珊〕部中找到了一个党的关系，这是保存了好几年的一个老的组织关系，现有三十多党员，大部为老干部。我们已送了一批文件去，

他们看到不知如何地高兴，因为他们有三年多没有看见党的文件了。我们准备派一个干部去住兰州，一面领导这部工作，一面开展地方工作。甘肃地方工作得从新开辟，旧的关系无从找起，因过去党的组织根本就很弱，最多时候也不多（过）三四十人，大部是在军队及学校中的，地方上没有生下根。此外澄县组织关系我们也找到了，已去信要他们来人解决问题。

陕南汉中一带组织，始终没有找到线索去恢复，现在我们准备经过西安学生关系去从新建立汉南组织。

我们现在准备在暑期办两个训练班，一个是知识分子党员的，一个是工人与农民同志的各十至十五人，时间二十天到一月。

我们现在还准备同总政治部共同办一个公开的刊物名叫《西北》三日刊或周刊，在三原拿铅印印，并在三原公开发行，这几天内即要出刊了，由一氓、定一主编。

我们党的刊物现改名为“党的生活”，准备经常出，十天一次，大约是有可能的，由我编。

此外我们同各地关系还相当密切，许多问题都可当面解决或派人去口头传达。

现在我们的环境很好，大家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每天看报看杂志研究哲学和辩证法，并能在一起有计划地研究，请你们将红大或党校各种研究的材料，凡是由延安印的，每一种都寄我们三四份，此外要求：

①《解放》二期我们还没有收到，三期只二十来份，四期听说已出来并已寄至三原，但我们连一份也不曾看见，除要求把发行工作大加改善外，并请将发我们的解放报份数增加，我们党内送发至少要一百份，党外发售随你们发来，五百份也可，一千份也可。

②我在延安时，省委即送到中央好些报告材料，但我不曾听到说，恐路上遗失亦未可知。所以我们建议中央与陕委专门设一交通，从我们这里带报告给中央，从中央带文件回来，每周一次，乘交通部车，这样许多文件报告之传达始有保证。如果要办事处转，既耽误时间，且没有保证，就是遗失了也无从查它，我们许多报告材料都是秘密性的，丢了就会成问题。因此请中央速决定一

个交通，以后文件即交他送来，我们报告及文件也由他带回。

上述二事请速决定并复我们，至盼，最后请给我们多加指示！

致以

布礼

拓夫

（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于云阳

注：①即周恩来。

②即彭德怀。

③即任弼时。

④即杨尚昆。

我在陕西省委的工作*

耿炳光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在陕西冯玉祥没有马上反共，冯玉祥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以后，才开始反共。冯玉祥把刘伯坚等共产党员用火车送到武胜关，没有杀共产党员。我们曾给冯暗示过在冯军中不发展组织，因此，他知道他的军队中没有问题，只要把这些人赶走就行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陕西省委成立时，冯玉祥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陕西陷入反动局面，省委逐渐转入地下。省委为加强组织，以李子健为宣传，刘继曾为秘书处负责人，魏野畴在西安不能立足，派往陕北作特派员，在那里仍不能立足，乃自动去皖北，后来牺牲在那里。当时中央曾令我们团结国民党左派，拉拢于右任及其副总司令邓宝珊，反冯反蒋，我们没有做下结果。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发动土地革命，挽救革命，陈独秀被打倒。陕西省委曾派李子洲^①去参加，会后李子洲回西安，未及带回正式文件，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口头传达。那时我们水平低，不知道怎样发动土地革命。十月间，省委地下工作布置就绪，即派刘志丹去中央请示，并领经费和文件。刘去上海时，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国各地党组织普遍发动地方起义。刘志丹带回中央指示和文件，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末^②开会讨论，参加会议的除我以外，还有李子洲、李子健、亢维恪、刘继曾、张金印六人。在讨论中，我认为发动“地方起义”是必要的，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组织力量削弱，发动起义的条件不够，主张经过一个准备过程。那时，我在理论上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没有什么修养，在重要关头的决策或政策运用上更觉茫然；并不认识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政策是后来才知道的“盲动主义”，而且情绪上还十分拥护。不过我的地位使我不能不比别人多加思虑，西北的客观情势和主观力量总使我自觉

地感到无法立即发动暴动。所以我主张先在工作上准备暴动的条件而反对下通告勉强直接行动。

当时团中央对团省委有指示，令团省委积极发动起义，如党省委不积极，团省委要批评；批评无效，团省委可以单独行动。所以团省委书记^③在讨论中十分积极，批评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形成我和他的争论。讨论结果多数同意团省委书记的意见，撤销了我的省委书记职务，由李子洲代理^④。我当时虽已离开省委工作，但还是省委委员^⑤住在原地，等待省委给我安排工作。后来我提议去陕南工作，省委同意，送来路费二十元与文件一束。我看了文件，知道已通知各地组织暴动，而且要求在旧历年节举行暴动，我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干要垮台，并表示我不去陕南执行这个政策，把文件与路费退回去，请另派工作，省委未答复。这时我爱人病逝，留下一个两岁的女孩，只好送回老家。回西安后，省委秘书处遭破坏，好几个同志被捕，我想省委一定搬家了，不能去找。那时在西安无眷不能租房，又难与组织取得联络，只好再回老家。

一九二八年夏，我找到澄县县委张国藩，他告诉我省委说我失踪了，我托他转告省委，我一直隐藏在乡间，今后应如何恢复关系？秋，李畅英来找我谈话，那时渭华暴动失败，许权中一旅军队损失了，农民被宋哲元杀了许多，党团员脱离组织的更多。我对这种暴动仍表示怀疑，谈话后，他对我的结论是“机会主义观点未变”。次晨他就走了，一月后仍无消息。接着冯玉祥军队到澄县，我在家不能立足。十月我到北平，遇见肖明，他告诉我陕西省委开除了我的党籍。当时他还说可在北平设法恢复我的党籍，我同意。不久他来说要写报告到中央解决，此后再没见面。后来听说河北省委书记张慕陶从中阻挠。我也再没有想恢复党籍的事。

注：①根据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在反冯的军事运动中，我们准备造出一部分左倾的武力。……这个左倾的领袖，我们心目中是在邓宝珊……，我们特为此派李同志赴汉与中央商酌办法。”李同志即李子洲。李子洲到武汉后，向中央汇报陕西情况。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对陕西工作作了指示，并向李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

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先后召开了省委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里指的应是第一次全会后十二月四日省委常委会。

③指张金印（张慕陶）。

④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省委第三次全会上，撤销耿炳光书记，一月五日推选潘自力代理省委书记。

⑤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省委第 29 号通告说，一月四日省委第三次全会撤销耿炳光书记，并开除省委。但潘自力在同年三月十六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取消耿的书记，开除常委。

*根据耿炳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自传，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第一次谈话记录、四月二十七日及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访问记录整理，题目是编者加的。

陕西省委早期的工作*

潘自力

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回到陕西，当时陕西省委^①书记是耿炳光，宣传魏野畴，组织李子洲。我们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派到陕西的十五人，原来决定都搞军事工作，但因冯玉祥右倾，只有先到陕西的三人（其中有邓小平）分配到军队工作。我们后到的十二人，分配了其他工作。我被派到长安县，担任农协宣传部长，党内任县委第一部委宣传。搞了一个月，陕甘区委调我代理陕西团省委书记约一个多月。冯玉祥公开反共后，刘天章、白超然被捕送往河南。这时省委派我担任陕东特派员，接替吕佑乾的工作并兼任渭南县委书记。后来肖明接任县委书记，我专住特派员。

“九·二五”会议^②是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而召开的。谁传达已记不清。出席会议的有十几个人，除耿炳光省委委员外，还有李子健、蒲克敏、张秉仁、肖明和我等。会议重新选举了省委会，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任组织，李子健任宣传，亢维恪（在狱）任农运，张金印（团省书），刘继曾任秘书长。以上六人为正式委员，我和张含辉为候补委员。会后我担任西安市委书记。

耿炳光离陕问题，耿炳光有个中心思想是“西北农民落后论”，对于发动农民斗争态度消极。省委同志批评他，他还坚持错误观点。一九二七年省委会撤销了耿的书记职务^④，派他去汉南工作，他不去，回家。会议推选我为省委书记。^⑤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中央准备在上海召开六大，陕西省委二次扩大会议选我、张金印（同时为团的代表）和王松年（农民）为代表去上海参加会议。同去的还有一个团的代表薛应麟（农民），因为团中央也决定召开团的代表大会，所以陕西团内也选派了两个代表出席。我们到上海后，因为环境不好，中央决定六大不在上海召开，并推迟召开时间。在上海停留期间，我给中央写了一个

书面报告，并在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等接见陕西代表时，把陕西党的组织和工作等情况向中央口头汇报。当时中央对陕西党的指示精神是：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我回陕西时除带回上述指示精神外，并带回中央给朱德的一封指示信，这是中央抄转许权中旅的党组织（军委）的。这封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要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农民群众，配合农民的武装起义。不要参加、而且要脱离军阀军队，自己单独搞武装。

我回陕后，向省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省委进行了讨论，并将中央给朱德的信转给许权中旅军委，要许旅党组织讨论并具体执行中央指示。省委还派我到渭南、华县、固市、蒲城一带，去了解陕东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组织各地县委讨论发动群众斗争的问题。

当时陕西的形势是：河南地方军阀樊锺秀、陈文皋等反冯，陕西地方军阀也酝酿反冯，陕东渭华一带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已开始了反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如打死收粮款差役等，宣化事件也已经发生。华县有一个民团由党掌握，更重要的是党领导着许权中旅。因此在军阀内部矛盾斗争以至公开混战，农民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党掌握部分武装的有利形势下，发动农民武装，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展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必要的，取得胜利也是可能的。

我去陕东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即向各地党布置了发动农民斗争的任务。到我回西安时，渭华高塘原农民已经开始搞起了武装斗争（向许权中旅要了部分枪）。省委即时给许旅写了一封指示信，要许旅（时驻三要司）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当时李虎臣要许旅开往潼关阻挡冯玉祥西进，省委意见是不去潼关。我回省委后，本来要马上再去陕西东部，去组织许旅配合农民搞武装起义，因丁增华部队包围西安冯系的宋哲元，未能即时出城。待三几天丁部撤围，我出西安到陕东时，军队起义已搞起来了。

原来许旅军委在讨论军队行动方向时，有过争论：一部分同志主张不去潼关，而去渭华；但许权中主张去潼关。结果按许的意见行动，队伍开赴潼关。只派雷天祥带了八十多人，去渭华与高塘原配合农民的斗争。许旅开往潼关，与冯玉祥军队打了几天后，军委决定许旅起义，把军队撤下来，西去渭华。

因怕许权中不同意撤军，军委的决定事先未通知许权中，只由杨晓初临时（等队伍撤走后）通知他。许权中旅共有二千多人，（两个团，一个教导营，还有直属队）只撤出七、八百人，当杨晓初通知许权中时，许表示服从军委决定，带着随从他的十几个马弁离开潼关，赶到渭华。

许旅起义后，在回渭华的路上，召开了会议，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打起了红旗，选举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卢少亭（廉益民）为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为参谋主任，杨晓初负责经理部工作。军队下分几个大队。许权中因为在军事行动问题上有错误，未分配重要工作，把他带出的十几个马弁编成一个骑兵分队，由他当分队长。军委还决定永远开除许的党籍（省委认为这样处理不妥，没有批准，中央也未同意军委对许的处分决定）。

许旅起义后，军队党的工作主要是刘志丹和吴天长同志负责。起义后，为了加强地方党的工作，成立了陕东特委，由省委派去的委员刘继曾任书记，委员有省委派去的团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渭南县委书记肖明等，特委不领导军队，军队由省委直接领导。

起义军队到达渭华高塘原，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农村成立乡、村苏维埃，军队中成立了士兵代表会议；并筹备渭华苏维埃。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粮食，烧地主地契和高利贷借据文约，捉了一批豪绅地主，杀了其中几个最反动的。组织了赤卫队。

我二次去陕东时，许旅起义军队已开到高塘原，并与陕东特委开展上述革命运动。我在渭华起义地区只住了几天，就带了一批经费，回到省委机关。

渭华起义后，敌人甚为惊慌，冯玉祥把这个起义当做他的心腹之患。因为渭华地处冯统治的豫、陕、甘等省的交通要道，对他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因此，起义以后，敌人就开始并陆续派兵攻打起义的军队与农民，包围起义地区。敌人围攻起义部队的武装力量最后增至三师。起义军和赤卫队在农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奋勇抗击敌军，从五月到六月下旬，在高塘原坚持一个多月，后因寡不敌众，六月下旬撤离高塘原。撤退时卢少亭（政治部主任）牺牲，撤入箭峪口，退到洛南山区后，部队分驻两岔河和保安镇。赵雅生的一大队被洛南反动地方武装和丁增华四个旅的敌军包围，唐澍带所部前往救援，陷入重围，赵雅

生部趁机撤出重围，但唐澍所部被全歼，唐澍牺牲。这时渭华起义的主力已归于失败，渭华起义已算失败。赵雅生的一大队突围出去回到渭华，已无立脚之地，这部分人也散失了。许权中逃出后，到商洛驻军刘文伯师，刘给许编了一个旅，渭华起义失败后留下的指战员或逃出的地方干部，编了一个团。后来刘文伯师开到河南邓县一带，被当地红枪会武装缴枪。渭华起义的军事力量也最后失败了。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它虽然失败，但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地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西北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起义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渭华起义的失败，客观上固然是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的力量弱小，但主要的还应该是检讨主观原因。

首先，省委对这次起义的形势缺乏全面的估计，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对起义本身没有全面地长远的计划和总的战略部署，起义后也缺乏坚强的具体领导。

其次，在政治上，充分发动群众不够。把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还不明确。打了土豪，政治上打掉了他的威风，当然对发动群众有好的影响，但没有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的很少，主要作了军队的粮饷。这样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就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因此有些人对参加斗争积极性不很高，有些人有顾虑。对反动土劣坚决镇压显得不够，捉了一些，杀的很少，有些跑掉，这也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和群众的发动。

第三，在军事上，更是没有经验，只知打硬仗，不懂打游击，起义后一直没打过胜仗。

第四，根据地思想是有了渭华起义就是以海陆丰苏区（依靠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榜样，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但对根据地应建在什么地区，当时还没有解决。于是死守渭华，结果失败。渭华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基础好，发动起义是可以的，但起义后却不能待在那里（离敌人统治的心脏西安和交通线太近，又是平原），如果当时认识到这一点，起义后把队伍撤入洛南山区，建立与发展革命根据地，是有可能坚持下来的。

第五，渭华起义没有得到陕西关中其他地方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孤军作战，这也是起义失败原因之一。省委本来有布置：要固市、蒲城、三原及西路一带地方党发动群众，搞小型的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配合渭华起义，但各地或行动迟缓，或没有去做，在渭华起义期间，都没有实际行动。

注：①应是陕甘区委。

②应是陕甘区团委书记。

③即“九.二六”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晚召开的，二十七日晚结束的。由于对夜间“零点”前后计算上的不一，有“九.二五”和“九.二六”开会及“九.二七”和“九.二八”闭会时间的不同记述。

④撤销耿炳光书记职务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省委三次全会上，不是一九一七年。

⑤应为代理书记。

*根据潘自力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

潘自力，又名自励、自立、志励，陕西华县人。建国后曾任我国驻苏联大使等职，一九七二年去世。

回忆陕西省委和渭华起义*

刘继曾

一九二七年蒋、冯徐州会议之前，在纪念李大钊时，冯玉祥看到革命力量有希望了，就蓄谋独占革命果实，要求他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去作地方工作，当县长。当时，同志们都不愿作地方工作，主张继续搞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有的同志就被冯玉祥扣押了。这是冯玉祥叛变革命的信号。冯当时公开说：“好狗咬人不露齿”，意思是要共产党离开他的部队。我们看到风声不对，就召开党员大会，提醒大家警惕冯玉祥的叛变活动。当时唐生智在武汉一带打不过张作霖，唐曾通过冯玉祥部苏联顾问要求冯玉祥出师河南助战。冯部苏联顾问一人，从商南经老河口到武汉和唐生智研究，决定唐生智从武汉向北打，冯从洛阳向东打，提出的口号是“中原会师”。本来这时冯的尾巴已经暴露党应该对冯采取新的策略，但耿炳光却提出要工人、农民全力支持国民军会师中原的主张，似乎我们不该培养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而要全部投入国民军怀抱，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军身上。当时，我和李子洲研究就认为这个口号不对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事实上，那时长安、户县一带农民已经起来，搞减租减息，反对土豪劣绅，革命运动已在农村发展起来。按理党应支持农民运动，但耿炳光怕影响国民军会师中原，不准备也没有打算领导发动农民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党内也有分歧意见，但没有在会议上争论。

冯玉祥和唐生智中原会师后，蒋介石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了会议，取消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样，冯玉祥的革命假面具就公开暴露了。此时也正是蒋、汪妥协，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和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当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被武汉政府驱逐出境，从武胜关到西安时，冯玉祥还派人招待，我去和鲍罗廷等见了面，他们避开我商量决定所有顾问全部回国。冯玉祥遂给专家送了些礼物，并派人送行。我留在陕西省委工作。几天以后，我就到桃胡巷省

委秘书处去住。当时省委负责人除我和李子健外，耿炳光是书记，李子洲是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我们几个人组成省委常委。团省委的负责人是张慕陶。“八七”会议时，省委没有派人参加。一直到冬天，我们才先后接到中央秘密寄来的八七会议决议案和八一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两个文件。

省委和团省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两个文件。当时，正值瞿秋白“左”倾盲动路线的尾声^①，全国许多地方打起了红旗，党也初步掌握了一些军事力量，在盲动主义的影响下，中央和团中央指示各地组织暴动。团中央和各地团组织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们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主张立即举行暴动，因此有“先锋主义”之称。在讨论中央指示时，张慕陶在常委会上指出了团中央关于立即组织暴动成立苏维埃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理论。省委一部分常委，包括李子洲和我在内，认为西北冯玉祥统治的豫、陕、甘三省，暂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农业适逢大丰收，人民生活趋于好转，农村斗争又没有开展起来，马上举行暴动条件并不具备，应该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时机到来之后组织起义。但耿炳光主张却不同。他虽然也承认当时起义的条件不具备，却不采取积极准备起义的态度，而是要把在时机到来之后的武装暴动推到遥远的将来。这就是省委和耿炳光的分歧所在。

省委最后讨论的结论是：既不同意张慕陶的“左”的主张，也不同意耿炳光的右倾主张，决定立即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委托李子洲起草有关组织起义的文件。同时，省委对起草起义的文件作了几条原则决定：第一，要根据中央关于八一起义的经验教训一文的精神起草。中央文件指出：军队起义要在党和群众有基础的地方发动。省委即决定在渭南和华阴两地准备起义（渭南党员很多，差不多整个教育系统都掌握在党的手里）。同时以蒲城、富平、临潼等地为外围。第二，我们自己要有军事力量。当时确定以许权中旅为基础，抽调渭南、华阴一带优秀党员去许旅当兵；并调唐澍、刘志丹等同志到许旅搞军委工作，积极准备起义。省委还确定通过许权中在陕军中的关系搞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军二军冲突。第三，起义的时机要适时。当时冯玉祥与甄全秀（甄寿珊）作战失败，国民二军也想反冯，省委认为要在军阀力量削弱的时候起义。第四，在渭华一带积极进行准备。组织宣传队，在党、团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发

动。根据这个原则起草了《关于发动渭华暴动的决议案》^②。就在这时，耿炳光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表示不愿再干革命工作了，接着他就离开了陕西。

正在准备渭华起义的时期，省委秘书处被敌人破坏。被破坏的那天晚上，我在东羊市李子洲那里开会来回，次日黎明我到莲花池街秘书处，发现大门被封（当时敌人很幼稚，假若不封门的话，我也会被捕的）。我即到交通处，命景瑞卿迅速给李子洲送信，要他立即转移。同时由于省委一部分文件被搜去，文件中有渭南、长安、三原等县委的通讯处，所以当夜就派人去有关县送信。省委当夜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我不能继续在西安工作，决定我到渭南任陕东特委书记，李大章（当时叫黎庶，是团省委派去的）和肖明为特委成员。在秘书处破坏的第三天早晨，我在省委一个姓张的常委掩护下，化装成买菜的，到渭南和肖明见了面。几天后，李大章也到了渭南，正式成立了特委，我是书记，肖明是组织，李大章是宣传。特委加强了党的组织力量，在塔山一带组织赤卫队，从许权中部队拿了二十余支枪，供赤卫队使用。赤卫队长姓李，队员都是党员，赤卫队向农民进行武装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劣绅。

为了向许权中旅传达省委组织暴动的决定，我化装成医生，经两岔河到洛南后，向许旅讲了国内形势，传达了省委决议，要他们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义。

我们回到渭南不几天，反冯战争就爆发起来。当时，冯玉祥派主力宋哲元部到洛阳打樊钟秀部未回，李虎臣乘冯后方兵力不足的机会发起反冯战争。李虎臣的部署是：派驻户县的何经纬旅围西安，李带四个旅赴潼关阻击冯的主力。在这种形势下，渭南高塘一带的群众斗争也猛烈发展起来，起义的时机成熟了。许旅中军委开会研究，唐澍等主张根据省委决议，不参加军阀战争，将部队开到华县，立即举行起义，并以武装力量支援当地的农民斗争。但许权中不同意，他认为打倒冯玉祥以后，部队还可以发展，所以主张随李虎臣到潼关。到潼关后，李将许旅布置在正面战场，经过几天战斗，部队受了一些损失。这时军委开会又认为，这样替军阀作无谓的牺牲不行，决定立即组织哗变。唐澍等没有征求许权中的意见，只给许留了一个条子就带着五六百人的队伍沿南山西进。到华阴后，将许部下的反动副官杀了，将国民党旗扯了，继续向西进至渭南^③高

塘原。许权中在得知队伍被带走后，也带了随从十余人赶到高塘。这时我正在高塘，和部队见了面，群众高兴极了，就大干起来：将地主的契约烧掉，将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一九二八年四月的情况。

许旅到渭南^④后，我代表特委给许旅授旗，于是这支队伍就打起了“陕西工农革命军”^⑤的红旗。

这时，李虎臣垮了台，冯主力部队回师关中，当许旅到高塘时，冯部已开至赤水，准备解西安之围。

五月初，我到西安汇报工作。在我到西安以前，特委开会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大会，成立苏维埃，并确定我任县苏维埃主席，李大章、肖明都是苏维埃成员。当地群众正忙着搭台子，准备开会庆祝的时候，冯玉祥调了三个师的兵力，向渭华一带进攻。工农革命军战斗了几天之后，撤至南山两岔河，将李虎臣一个连全部消灭，部队就在那里休整。冯部也回到西安。当战斗正进行时，我从西安回到临潼。战斗刚一结束，我就带一个交通到两岔河，随部队一起工作。当时，唐澍牺牲，刘志丹任军委书记，我去后由我兼任团委书记。由于对于军事斗争没有经验，特委开会决定：（1）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2）将许旅中的一百余名共产党员都暂时隐蔽起来，进行秘密活动。（3）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搞统一战线。时刘文伯以师长名义有两个旅，我们认为刘和冯有矛盾，可以和他拉关系。许权中即写信给刘文伯，希望将部队编为刘的一个旅，刘复信表示同意，并给许权中拨了约四五百人的一个团的军队（这个团是刘收编的土匪，刘认为难领导，才拨给许权中的）。于是我们住到洛南，训练军队，重整旗鼓，在时机到来时再打起红旗。当我们准备去打金（荆）紫关的土匪时，冯玉祥企图消灭国民二军，和刘文伯打了起来。刘力量小，支持不住，打算退到南阳一带投靠岳西峰，叫我们准备退到老河口一带。我们这支部队行至邓县，当地的红枪会以为我们是国民二军，就和我们打起来。我们撤退时，被红枪会包围；我们且战且走，走了几十里路，子弹打光了，只好缴了械。许权中负伤，到上海治疗，我回到西安。

关于渭华起义的看法问题，以现在的看法和当时盲动主义在全国范围的影响来看，是不应该。但在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的决定，同时在当时陕西的具体

条件下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当时党在部队中的党员，在省委秘书处被破坏后已经全部暴露；许权中部被开到潼关替军阀作无谓的牺牲，在那种情况下不起义是不行的，起义是正确的。但起义部队在军事路线上有错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应该打正规战，应该将部队开到柞水一带打游击战，以便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在冯玉祥的追击下，部队不应该走交通要道，应该向山区转移。可在当时并不懂得这样做，渭华起义就不免于失败了。

对渭华起义，许权中始终抱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他到苏联学习时，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过。至于具体情况我就知道了。

渭华起义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主要是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干部，扩大了革命影响，也取得一些经验。这对推动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有巨大作用。

注：①当时是瞿秋白“左”倾盲动路线开始贯彻。

②这个“决议案”迄今未见。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中提到：

“根据省委目前行动纲领特制定工作计划大纲”，省委目前行动纲领也没见到。这个“纲领”是不是这个“决议案”，待查。

③、④应为华县。

⑤有人回忆是“西北工农革命军”。

*根据刘继曾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谈话记录整理。

刘继曾，四川金堂人。建国后，曾在西北民族学院、宁夏师范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已故。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 陕西省委的活动*

王 林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西安举行了反蒋活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西安还是革命高涨的局面。冯玉祥到河南以前还表现左倾，五月五日在西安宣誓出师东征，六月初打到河南郑州，冯玉祥原对武汉政府希望很大，到河南后失望了，感到武汉北伐力量小，武汉政府又是分裂状态，因此在郑州会议时态度就向右转了。冯玉祥借口一致反对奉系军阀去找蒋介石谈，在徐州和蒋介石开了徐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走向完全右倾。武汉政府叛变后，冯玉祥也走上了反动。但和蒋介石、汪精卫还有不同处：没有实行屠杀政策，采取送客主义，把共产党人用火车送到武胜关，中途有些人下车走了。七月西安局面就开始变了，禁止群众运动，农协被停止，学生会已不能公开活动了。八月^①反动的省政府成立，开始捕人，同时成立反动的国民党省党部，于振瀛上台了，各县县党部也改组了。九月西安完全成了反动局面，开学后学校校长都换成反动分子。

西安局面开始转变时，党的政策是把色彩重的同志调离西安，分散到各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在政府和国民党部工作的党员都自动地退出来了。魏野畴、李子洲、赵葆华都从国民党党部退出来，杨明轩辞了教育厅长。七月不少党员就离开了西安，八月大部分人都走了，留在西安的人也转入秘密活动，李子洲留在西安。

对冯玉祥在七、八月没有提出过进行反对或批评。耿炳光认为冯玉祥是士兵出身，去过苏联，左倾，西以跟上我们走。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还说冯不是反动的主要人物，蒋介石是右派，冯玉祥是中派，于右任是左派，想和冯玉祥继续保持联系，不叫提反冯的过左口号。冯玉祥说，蒋介石固然不对，你

们的工农政策也太过火了。我们也没有进行过批评。

八七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陕西后，才公开提出反对冯玉祥。在省委会议上，大多数人主张反冯，批评了耿炳光，耿炳光不接受，说：“我们羽毛尚未丰满，反冯尚非时机”、“南昌没力量，我们没有力量反冯”；认为陈独秀路线是对的，很崇拜陈独秀，“老头子的话都是对的”。年底耿炳光自动离开工作，回澄县去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党派我回华县工作，担任县委书记，给的任务是：在农村学校和武装中发展党的力量打下基础，抗粮、抗捐、清算豪绅账目。我到华县后，召开了扩大会部署工作。首先把华县分为几个地区，建立党和团的四个据点：高塘、孤堆小学、大明寺、县城内（主要是咸中、教育局和县高小）。到九月华县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人左右，支部增加到二十多个，成立四个区委：高塘、孤堆、县城、郑村。一九二七年底，党员发展到三百七十人，团员六百多人。高塘一带的村庄小学教员大部分是党员。再是抓农协。反动逆流来后，农协停止活动，我们在各村又恢复和发展农协。高塘一带农村都有农协，不挂牌子，各村小学是农协活动的中心地方。这些小学白天上课，晚上办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教育。

一九二七年十、十一月间，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陕西组织起义，东路以渭南、陕北以洛川、西路以凤翔为中心，计划是秘密的，口头传达到下边，叫成立起义筹备委员会，除县委负责人外，抽一个专人负责。华县确定陈嘉惠负责。我和陈嘉惠跑到渭南和彭明（肖明）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积极准备。十二月省委派李子健来，在李氏村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起义准备问题。宣化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封闭了高塘小学，解散了自卫团。为了进行起义，省委决定成立陕东特委，负责人刘继曾、李大章、彭明指挥陕东三县工作。起义前，县委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赤卫队，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战争。一九二八年五月起义开始，省委书记潘自力来开过一次会，研究起义和反对敌人进攻等问题。

渭南起义失败后，我离开华县到西安，省委决定把渭南、华县、固市三个县合并成立统一的渭南县委，派我担任渭南县委书记，地址在渭北辛市，参加县委工作的有徐振化、张雨生^②。县委活动是整顿渭河南党的组织，联系起义失

败后流落在各地的同志，安排解决由渭河南逃到渭河北来的同志。当时我们还有十多枝枪，进行秘密的武装斗争。以后省委又指示我们整理潼关、华阴、大荔、蒲城等地工作。

一九二九年二月党、团陕西省委被敌破坏后，三月一日晚在渭南县龙背乡白家庄白思堂的家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林、张国藩、薛永寿、李凌云、徐振化（固市县委书记）、张玉森、任树森（渭南县委农委）、王勉之（蒲城县委书记）^③、冯养浩、闵继騫等人。会议决定成立党的渭南中心县委^④，代行党的临时省委工作，选举张国藩、王林、李凌云、徐振化、张玉森、薛永寿、王勉之为委员，王林任书记，张玉森任组织兼军事，徐振化任宣传，李凌云为秘书。会后，我即前去大荔、富平、三原等地巡视工作。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的紧急会议后，原党的省委委员杜衡和团陕北特委的负责人焦维炽从陕北来到关中。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在白思堂的家里再次开会。参加会的有：王林、杜衡、焦维炽，薛永寿、李凌云、徐振化、张玉森等。中央交通马子敬在会上说，中央要陕西派代表团去上海汇报工作。会议决定，由王林、杜衡、薛永寿三人组成陕西代表团，王林、杜衡代表陕西党的组织，薛永寿代表陕西团的组织。代表团由马子敬领着去上海，同行的还有张秉仁（张性初）的爱人彭淑贞（张秉仁当时在上海住“机关”，需彭去作掩护）。我们到上海后，中央领导人和代表团谈了几次。杜衡对陕西党组织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主要汇报了组织方面的情况，王林原来是搞群众运动的，主要汇报了陕西群众运动方面的情况，薛永寿汇报了陕西团的情况。中央布置的任务是：恢复城市工作，发展农民运动，组织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形势还在发展，要组织武装夺取政权，陕东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要切实去那里做工作。中央决定由杜衡担任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代表团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端午节时还在上海。暑假时代表团分路回到陕西。

代表团从上海回来后，在渭南县辛市田木匠家的墩楼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杜衡、王林、薛永寿、张玉森、徐振化、李凌云、焦维炽等。会议在传达了中央对陕西的指示后，研究布置了工作，调整了人事。会议确定：（1）很快恢复西安组织，把省委机关迁到西安；（2）整顿陕东组织；（3）开展陕

北工作，派人去陕北，（4）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派人到三原去成立游击队。

会后临时省委派人到各地恢复西安的组织和整顿各县的组织。半年中间，我曾在大荔、蒲城跑过六、七次。各县组织先后得到了恢复。一九三〇年四月，党的省委机关从渭南迁回西安。

一九三〇年五月，省委在我家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薛永寿、陈云樵、王林等。会议听取了陈云樵关于西府武装斗争情况，并决定派陈云樵去三原找黄子文，一同开发渭北游击战争。七月我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去三原视察渭北游击战争情况。到三原后，县委派了一个姓王的农民党员和我们同去武字区。到武字区方知游击队已撤向大程，赶赴途中在瓦窑头遇上游击队，便召集陈云樵、李秉荣、田裕国等七、八个人开会。会刚开始，张遂儿即叛变，开枪打死王笃，我们从此分散。

一九三〇年七月的巩村会议，是在蓝田县的巩村学校里开的。赵伯平就是巩村人。参加会议的可能有十来个人，其中有王林、杜衡、赵伯平、薛永寿、焦维炽、史值（后任国民党临潼县长，脱党后出卖了黄子文）。会上没有传达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是这次会后才传到陕西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北方局开会，我和杜衡去参加，去时会已开毕，把我派到陕北去了，离开了省委。以后，省委就陷入了杜衡错误路线。

注：①冯系的省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成立。

②即张雨森、张玉森、张蔚森。

③王勉之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待查。

④根据省委文件，当时成立的是临时省委。

*根据王林一九五九年四月、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
王林，又名王芾南，建国后曾任民主建国会西安分会秘书长，已故。

成立陕西省委片断*

李子健

冯玉祥从五原率师入陕，解西安之围，西北局势展开，我被派回国，到冯军中作政治工作。同行者有肖明、邓希贤（小平）、潘自力、李畅英等十五人。归途经库伦、定远营、宁夏至西安。一路交通不便，费时半年之久，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始到西安。

不久，冯玉祥“漾电”发出，公开反共。我即转入地下，参加党的工作。初以特派员在渭北各县工作，后参加省委，负责宣传工作，与耿炳光（省委书记）、李子洲（组织部）共组省委常委会，时在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这时经“八七”会议后，党内有机会主义的斗争，省委当日派人到各地视察。我被派赴渭南、高塘、赤水、华县等地后，转赴三原、富平。当到达三原我的家中，未半日即被捕。

*根据李子健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访问谈话记录摘录整理。

李子健原名秉乾，陕西三原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林业厅厅长，已故。

在陕西渭南的一段工作*

李大章

一九二六年底，我从苏联动身回国，记得同行的有邓小平、潘自力、肖明等同志。到宁夏后，我因身体闹病，就和肖明等几位同志留宁夏，其中有陕西一个姓吴的同志，湖北一个同志，其他记不得了。当时宁夏驻防的军队是宋哲元，我们就留在宋部搞政治工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消息很闭塞，当时的武汉政变，我们就全然不知。有一天，宋哲元召集我们讲，武汉调你们这些搞政治工作的人员去开会，我们几位同志即起程准备到武汉，临走时，宋还给我们派了一位军官陪同。到西安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才知道了宋的企图。接着冯玉祥部的一个处长名叫石敬亭，召集了所有在西安搞政治工作的同志开会，石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土壤气候，并骂了我们一顿。第二天我们借着到临潼洗澡的机会，偷偷地都开了小差，记得就是没有通知朝鲜的金秋山（当时也是搞政治工作，因为他是从北京派来的，同时也是外国的同志，估计敌人可能不加猜疑，后来听说他去了武汉）。

我们许多同志从临潼向北过渭河到白文藩家中住了一夜，又到了渭南，最后又秘密回到西安。党组织决定我在团省委工作，团省委书记是张金印。党的省委书记是耿炳光，耿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党的暴动起义、土地革命等指示，不愿执行，后消极回家。至于当时如何与耿进行斗争，一句话，那时很幼稚，也说不来怎样斗争。耿离开后，继任的省委书记是潘自力。

我是一九二八年^①被捕的。经过是：我被捕的前一天，马子敬给我在西安找旅馆住，后来遇程思诚，叫我到他家去住，他宿于另一菜铺内。天明时，敌人逮捕了他，供出了我，又供出了团省委书记马云藩，马又供出党省委书记曹趾仁（潘自力被捕后继任的），前后还逮捕了刘继曾、徐梦周、李子健、朱茂青等。从此，党、团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西安省主席是宋哲元，被捕人员中唯

李子健出来最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来后即在宋部中办报纸。我们是杨虎城到西安后才出狱的。

渭华起义前，我是代表团省委去渭南的，起义后，我即回到西安，现在记不起组织陕东特委，只记得肖明是渭南县委书记。渭华起义的军队是从潼关到渭南，当时发动了群众，组织了赤卫军，打了土豪劣绅，但没有进行分田地。

对渭华起义的看法：

1. 党对起义的计划事前作得不够周到，当军队从李虎臣部队拉出来后，地方上还没有准备，实际地方上的力量也弱，所以这次起义还是以军队为主。

2. 起义后，在战略上错误地采取了和敌人拼消耗的正规战，不知道保存自己的实力。渭南、华县有些地形还可以利用来作游击战，但没有利用。

注：①指阴历，阳历应是一九二九年一月。

*根据李大章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谈话记录整理。

李大章，又名李畅英、黎庶，四川人。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兼省长，已故。

陕西省委早期活动

曹 趾 麟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影响尚未延及映西。到了六月，冯玉祥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蒋冯合流，背叛革命，陕西开始了突如其来的“清党”活动。许多同志出走，党团组织转入地下。不久，张金印参加八七会议^①回到陕西，以“左”的姿态批右，耿炳光被批判。记得有一次约定晚间在李子洲住处开会，大家都到齐了，唯独不见耿炳光，他的住所别人不知道，无法去找，后来才知道他已不告而去。当冯玉祥“清党”时，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这一支武装力量，按照党的指示撤离西安，得以保留下来，许多同志投身到这支部队中去，后来参加了渭华暴动。

耿炳光就当时来说，对革命还是积极的，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许多事情他都亲自抓。在大革命时期，陕甘区委以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为核心的领导是比较强有力的。我记得当国民党开始“清党”后，耿炳光曾以陕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个宣言，让我找人刻印。张金印却把耿炳光说得一无是处。耿炳光走后，潘自力接任省委书记。西安市委并入省委。潘任职到一九二八年秋，有一次去长安县委开会被捕，即由李子洲代理书记职务。

渭华暴动失败后，敌人进一步地对革命力量进行压迫和残害，出现了一个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潘自力被捕后，多数同志纷纷逃亡，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血腥镇压之下，同志中被逮捕的、被杀害活埋的不计其数。党和团的组织，陷入瓦解状态，工作瘫痪，处于一个极端艰苦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党省委和团省委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阳历一九二九年一月）间分别在富平县美原镇和蒲城县荆尧镇两地举行党、团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党省委负责人刘继曾、李子洲等同志进行严厉的批评，改组了党和团的省委。党的扩大会议上推选我担任省委书记，李子洲任组织，蒲克敏担

任宣传，徐梦周任秘书长。团的扩大会议推选马云藩^②担任省委书记。扩大会议闭会后，分途陆续返回西安。不久，大约不到十多天的时间，省委还没有来得及开年式会议，我们就被敌人逮捕了。一九二八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③深夜二时左右，敌人进入房内，把我捆绑起来，非刑拷打。当时，我经受不住严峻的考验，对党人民是有罪的，至今思之，深感内疚。我愿在有生之年，竭尽自己的力量，在四化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中，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以赎前愆。

注：①张金印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②即马步云。

③即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根据曹趾麟一九五九年写的自传和一九八〇年《我所知道的陕西党早期建党活动》整理。
曹趾麟，原名趾仁，建国后曾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已故。

一九二八年陕西党、团省委机关 和遭破坏情况*

任 青 云

一九二九年二月陕西党、团省委被破坏时党、团省委机关分布情况：

1. 党省委机关：先在东羊市，后迁鼓楼化觉巷。在东羊市时住机关人员：李子洲、社振庭（杜衡一九二七年十月派去陕北工作）、武云绮、任青云；在化觉巷住机关人员：李子洲、刘继曾、任青云。

2. 党省委交通处：在梁府街；住机关人员：景云（景瑞卿）、王爱玉、李建兴。

3. 党省委秘书处：在莲寿坊，一九二八年三月被破坏。当时住机关人员：刘继曾（当晚去省委机关开会未遭捕）、方鉴昭、徐九龄、李加谟、任醴、校明济。后敌人从秘书处档案中发现王德安是党打入敌伪党部的常委，也同时被捕活埋。莲寿坊机关破坏后，新的秘书处工作人员：徐梦周、崔文玉；住址忘了。

4. 党省委备用机关：在南大街；住机关人员：潘自力、徐琬兰、蒲克敏、高明惠。

5. 党省委联络站：东铺在东大街，西铺在莲花池街，客栈在涝巷；工作人员东日曙等。

6. 团省委机关：先在开通巷，后迁红埠街；住机关人员：马云藩（马步云）、高玉兰、李畅英（李大章）、卫志一。

7. 团省委备用机关：在枣茨〔早慈〕巷；住机关人员：曹趾仁、王启珍。

8. 另外团省委工作人员王友章和程思诚的住址忘了。

当时省委成员是：潘自力（书记）、李子洲（组织）、刘继曾（常委）、蒲克敏（宣传）、徐梦周（秘书）。省委开会时有时通知团省委书记曹趾仁参

加。潘自力一九二八年十月份被捕后，刘继曾是代理省委书记^①。

根据继曾同志的手稿和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一九二九年一月陕西党、团省委大破坏的经过是：由于在妇女协进会的团员肖桂藩（女）登报自首，出卖团员刘秀英，刘供出团省委成员程思诚，程在街上被捕后叛变，供出团省委红埠街机关。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夜（腊月二十二日），团省委李大章（李畅英）、马云藩、高玉兰三人被捕，押入西安伪军事裁判处看守所。马云藩在敌人威吓利诱下叛变，招供了团省委书记曹趾仁住的机关枣茨〔早慈〕巷。二日夜，马云藩引导敌人逮捕了曹趾仁、王启珍。曹当即叛变，供出省委机关鼓楼化觉巷的地址，并给敌人带路。当晚深夜敌人越墙闯入，我们发现叛徒马云藩身穿军装，佩武装带、匣子枪混在敌人当中。在万分紧急的时候，为了党的机密和保护外县党团组织，我把整天带在身上的中央“六大”文件和省委美原扩大会议文件及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县党的负责人名单，带到女厕所撕掉，销毁在粪坑内。（已埋藏的文件，解放后挖出）刘继曾、李子洲和我被捕。押出大门时，又发现曹趾仁站在大门口。三日上午，蒲克敏、徐梦周先后到省委机关接头，又被敌人逮捕。我们押入军事裁判处，看见他们被敌人押来。同日，王友章到曹趾仁住处接头也被捕。至此，党团省委主要成员全部被捕入狱，我们未暴露省委南大街机关和新的秘书处机关。潘自力是早两个多月去长安县委开会时，与县委书记李艮同时被捕的。

注：①从宁夏大学存刘继曾的简历表看，刘继曾没有担任过省委代理书记。

*任青云，陕西高陵人，当时驻省委机关，作交通，现任宁夏自治区政协委员。

一九二八年陕西省委被破坏经过*

王爱玉

一九二五年，我在三原东关私立女子中学上学。暑假，经徐九龄、康效英介绍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转党。

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我调到团省委工作。一个月后，又调到长安县委。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我到省委交通处（当时在劳武巷），和景云、张生荣一块工作。三月二十几号，省委秘书处（住址离我们很近）被敌人破坏。省委怕发生意外，就叫我们迁移。我们搬到东厅门，并在东大街找了间房子做交通点，让张生荣住在里面。后来，张生荣被敌人收买，出卖同志。景云经常找不见他，我们只好又搬到二府街，并调来一个李建兴。因李建兴做不了秘书工作，被调走，又调来一个张荣举。省委秘书处被敌破坏后，一直没有恢复。十月，省委将交通处改为秘书处，因二府街不安全，就搬到了红埠街。大概十一月的一天夜里，我们正油印东西，外面有人叫门，景云去开门，被进来的敌人拿枪逼住，不准他动。我在里面急忙把印好的东西塞进被子里，装着睡着了。敌人跑到我的房间，翻箱倒柜，把怀表等能拿的东西都拿走，并叫我起来跟着走。我没办法，只好说：“你们先出去，我穿衣服。”我把文件装进裤腿，拿两条带子把腿绑上，被敌人带了出去。那天抓了很多人，都给上了脚镣，押往新城。我和张荣举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里面有二、三十人都是晚上抓来的，搞交通工作的居多，虽然许多人都认识，但不敢说话。景云是交通处长，被单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夜里，趁着巡哨的敌人不注意，我把文件塞进炉子里烧了。后来又装着拉肚子，去了几次厕所，把剩余的文件都处理了，这才觉得轻松了一些。

天不亮，敌人叫集合，把我们押到西华门军事裁判所，男女分监。我被掀

进一间又黑又冷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张铁板床，天冷，坐都不敢坐，就在里面打转转。后来任青云也被押了进来，我问：“你怎么也来了？”她恨恨地说：“曹趾仁把我出卖了”。后来我才知道，先是抓了程思诚，后来又抓了马子静（马云藩）、曹趾仁，接着抓了李子洲，党、团省委的领导人几乎被抓完了。

一九二九年秋季，我和任青云、高玉兰、王启珍几个人被转到第一监狱。一九三〇年五月，敌人把我们放了出来。我因找不到党、团组织，就回了三原。

（刘玉平整理）

*根据王爱玉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五日两次谈话记录整理。
王爱玉，陕西三原人，建国后曾在陕西省妇联工作。

一九二九年陕西省委工作*

徐振化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渭华起义失败后，省委派王芾南、张蔚森二人来渭南建立了渭南县委，王芾南任书记，我和张蔚森为常委。当时渭南县委负责渭南和华县党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底，陕西党、团省委遭敌破坏，党、团省委委员几乎全部被捕，省委工作陷于瘫痪。到了一九二九年春，我们以渭南县委为基础，召集了一次党的临时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薛毅、吉国桢以及渭南县委成员。这次会议成立了临时省委，我也参加临时省委工作，渭南县委工作交王勉之负责。

临时省委建立后，派杜衡、王芾南、薛永寿为代表团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陕西党、团工作。当时中央书记是向忠发，代表团去后在中央受了一个月训练，回来后成立了正式省委^①，杜衡为书记，王芾南组织，我为宣传兼西安市委书记，李凌云为秘书。在代表团离开陕西期间，党的省委机关只留下我一人负责，团省委由焦维炽负责，主要任务是收拾残局。正式省委建立后，主要任务也是收拾残局，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的组织。当时除渭南县委外，各县组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于是省委就派人到各地去进行整顿和恢复。我被派往蓝田，恢复了蓝田组织。不久各地党组织逐渐恢复了活动。

一九二九年后，我因身份暴露，组织派我到中央工作。

注：①一九二九年七月代表团回陕后，调整了临时省委成员，未改为正式省委，改为正式省委是在一九三〇年七月省委第五次扩会议上。

*根据徐振化自述和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谈话记录整理。

徐振华，陕西华县人，建国后曾任华县咸林中学、华阴县华山中学等校校长，一九七六年已故。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 陕西省委的工作*

张资平

一九二五年我在天津经张保全介绍入党（张保全当时是南开学生，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去过苏联，回国后在中央交通部工作，在上海被杀）。一九二七年暑假后，我回陕西搞长安农协工作，当时党的关系在西安高中，党领导办的中山学院在此。陕西省委书记是耿炳光，组织是李子洲，宣传是李子健，青年部长是张金印，农民部长张含辉。^①

一九二八年省委派我去澄县、大荔等地搞红枪会，同去的有罗成运，地方上由吴波廷（卜亭）和我们联系。这次活动，我们所起的作用不大，基本上是群众自发地在那里搞。

一九二八年冬我回省委搞职工运动，任省委执委。以后我便在西安东大街、钟楼、北广济街等地以拉洋车、卖纸烟为掩护，做拉洋车工人的工作。当时西安有洋车夫一百多人，组织上给的任务就是反对过重的剥削（拉洋车工人自己没有车子，需要租车，但租金太贵），开展经济斗争，争取拉洋车工人以便随时转入政治斗争。

一九二八年底，我到三原、蒲城、渭南等地送信，回来后从报纸上看到省委被破坏的消息。我马上将此情况告诉拉洋车的薛永寿，他还不相信，我也怀疑自己看错了，于是又到钟楼边去看报纸，结果证实党、团省委领导人大部被敌人逮捕。我们两人商量决定一块离开西安，将省委遭到破坏的消息告诉各县，让加小心。

一九二九年正月初一，我同薛永寿奔走于三原、富平等地，通知地下党同志赶快转移。初二我们赶到渭北陈家滩与渭南中心县委书记王芾南接上关系，

然后在白思堂家里开会，研究布置今后的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芾南、张蔚森、徐振化、李凌云、薛永寿和我等，会议决定建立党、团临时省委，并立即派人去中央汇报省委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同时要求其他同志暂时分散隐蔽。不久我便到大荔我哥哥处暂住，后到蒲城教了半年小学。

一九三〇年二月，我被组织调到中央受训。八月回到陕西，任西安特委委员。一九三一年四月在特委工作期间，因反立三左倾路线问题与杜衡决裂，被开除党籍，我便去北平向河北省委告状。经过研究，河北省委认为杜衡开除我的党籍是没有理由的，于是介绍我去陕北和赵伯平做陕北特委工作。

注：①张含辉时为省委候补委员，农民部长是亢维格。

*根据张资平自传和一九五九年谈话记录整理。

张资平，又名张国藩、张质平、张子屏，陕西澄城县人。建国后曾任大荔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一九七八年已故。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陕西 党、团省委的活动*

薛永寿

一九二八年七月，团省委调我担任长安、蓝田、户县和咸阳团中心县委组织，住在西安东大街一个楼上。省委决定我拉洋车，一为做洋车夫运动，二为便于护送同志携带文件、武器出入西安城，三为挣钱维持同志生活。

一九二八年农历腊月间，团省委通知我到渭南开会。我一人冒着大雪赶到蒲城荆尧小学，会议已经开过了，这样我又从蒲城经三原回到西安。

我回到西安，团省委的一位同志通知我：团省委在荆尧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选你参加团省委工作，你不要拉洋车了。我就把洋车向车主交了，但等了几日团省委未来人谈工作。到了腊月三十，我就到街上闲走，看能不能碰上省委的同志。说也巧，我到东大街端履门时看见了张国藩。我跟他到革命公园，他小声对我说：今天的报上登有消息，说新当选的党、团省委委员全体被捕。他还说，我也被选为党的省委委员，在西安的党省委委员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了。街上行人多说话不方便，我们就出东门在野外研究，决定即速将这个情况通知外县的组织。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出西安北门，先跑到三原找王鸿俊他不在，我们又赶到富平，找到张国藩认识的一个同志，通知他新省委被破坏了。翌日赶到渭南渭北陈家滩，见了渭南中心县委书记王林（王芾南），说了情况。后在白思堂家开会，参加的人有王林、渭南中心县委组织张玉森（张生才）、宣传徐振化、秘书李惠民、军事任树森、张国藩和我。我们坐在炕上开会，李凌云拿个歪把盒子枪玩，走了火，好在没伤着人。张国藩在会上说，中央交通马子敬尚在西安，新省委还未向中央写报告就遭到了破坏，他提议写个东西由马子敬交给中央。我们即写了报告交马子敬送去中央。这次紧急会议成立了临时党、

团省委，到会的七人都当选为党的临时省委委员。不久，马从中央带回了文件，写在一盒白手帕上，用碘酒洗刷后一看，不是专为陕西发的指示，说明中央还不知道陕西党团组织当前的情况。马还口头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陕西派代表团去中央汇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又在白思堂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上次参加的人全部参加外，增加了杜衡和张文华。会议决定派王林、杜衡、薛永寿三人组成陕西党、团代表团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决定徐振化去西安组织机关，做通讯联络工作。

去上海我们都很困难，凑的钱不多，马子敬带的钱也不多。和我们同去上海的彭淑贞借钱帮助我们到了上海。马子敬安排我们住在法大马路豫园宫，周恩来先后几次听过我们汇报，还送来不少文件让学习，印象最深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我们在上海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在静安寺召开的陕西工作专题会议。中央参加的有向忠发、周恩来、恽代英、项英等，我们向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的情况，中央作了陕西问题决议案，并决定杜衡任陕西党的临时省委书记，我任团省委书记。

一九三〇年七月，代表团从上海回陕，在渭南开会。参加的有王林、杜衡、薛永寿、张玉森、徐振化、李凌云等。会议确定：杜衡任党的临时省委书记，王林任组织，徐振化任宣传，李惠民任秘书。以薛永寿、贾红光（贾拓夫）^①、焦仲明（焦维炽）、吕毓（吕剑人）、张文华、张养诚（张志超）、李玉章（李衡哲）等组成团陕西临时省委。

中央在陕西问题决议案中指出，陕西党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发动灾民斗争，解决灾民吃粮问题。省委派我和吴密到省西发动灾民斗争。我俩到礼泉与当地的史守约带了四十多名武装人员，到周至渭河南岸一带发动灾民，把豪绅地主的粮食分了，并烧毁地契文约，很快发动起一千多群众。后经调查，秦岭山麓有个大寺院存粮很多，决定把这些革命群众带到那里，一可解决吃粮，二可倚山开发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但史守约的部队临阵不动，又遭到当地豪绅的攻击，这次活动不了了之。

一九三〇年秋，在蓝田孟家塬巩村学校召开省委第四^②次扩大会议，参加的有杜衡、王芾南、薛永寿、赵伯平、张文华、李惠民、吉国桢、陈征等，传达

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了省委。接着团省委在蓝田草坪杨珊任教的学校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团省委，我任书记。

在蓝田开会时，发现特务祁清贵侦探我们的情况，我曾严肃地向杜衡提出解决祁清贵，把他所认识的人调离西安，但杜衡不采纳我的意见，还擅自给我“严重警告”的处分。一天我在南院门换戒指，被祁清贵诱捕，押到西华门军事裁判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冯阎大战结束，冯军失败退出西安，杨虎城进西安，我才出狱。

（姚文琦整理）

注：①贾拓夫是一九三〇年调来团省委的。

②应为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根据薛永寿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回忆录和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访问记录整理。

薛永寿，陕西华县人。建国后任华县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

一九三〇年陕西党、团省委的破坏*

王 曙

我是富平人，我们村子离美原镇五里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在美原镇高小上学。一九二七年到三原渭北中学上学，在那里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三原县委书记是张性初，党、团组织指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史可轩部队去当兵，我就离开渭北中学到了史可轩部队，以后跟随许权中参加了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九月我辗转回到富平，在美原镇小学帮助整理文书档案。

渭华暴动失败后，渭华一带已经暴露了的一些同志转移到富平一带隐蔽活动。冯异生、杨殷征、闵纪骞、方仲明等就在这一带，有的在美原镇高小教书。同时，这个学校原来就有共产党员，如张庆祥（又名张祝三，一九三二年叛变）、石仲伟就是该校的教师。教员穆彩宾也是共产党员，校长是赵林尧。美原镇高小的政治环境比较好，我们党的力量比较强。

一九二九年快过春节的时候，记得是冯异生还是张庆祥告诉我，党、团省委要在美原镇高小召开扩大会议，要我做接待和保卫工作。我那时十九岁，还没有转党。省委来的人大都穿长袍，我们叫他们“大衫子客”。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别人叫他“蒲瞎子”，以后知道他就是蒲克敏。我认识的只有冯异生、石仲伟、张文华、薛永寿、闵纪骞。我只做接待保卫工作，没有参加会议，因此对会议内容不了解。

美原镇虽也是平原，但靠北山，离西安较远，敌人又不大注意，学校党员又多，省委来这里开会比较安全。

美原会议后，我不能在美原镇高小再待了，党组织要我自己找职业。我年轻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就到西安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在书院门。我名

义上是学生，实际上是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搞学运。同我发生组织关系的是薛永寿、贾宏光（贾拓夫）、焦维炽。因为我领导学生闹学潮，学校一次给我记了两大过。

一九三〇年暑假，焦维炽通知我，党、团省委在蓝田县召开扩大会议，要我去参加，接头地点在蓝田县南关杨荫川的家。我到杨荫川家时，杨仲凯（杨森）也在那里。原来说在南关小学开会，在这里我碰见祁清贵。祁在大革命时期从许权中旅开了小差，以后在蓝田民团做事，实际上是陕西反动当局的密探。我把祁的行动告诉杨荫川。晚上，杨说扩大会改到另一个学校召开。我就去了白耀亭家，白是省立一中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来参加扩大会议的。当我们到了开会的学校，会已散了，我们又一起回到西安。贾拓夫和焦维炽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并说会开得很好。

祁清贵一直追踪着薛永寿。一九三〇年十月上旬薛永寿被祁逮捕，西安的白色恐怖又严重了。焦维炽要我坚持工作，提高警惕。双十节后的第一天，我在西安被冯玉祥部的武装特务逮捕。反动的西师校长米俊生同武装特务把我送到西华门军事裁判所。敌人第一次审讯我，主审的是军法官石玉瑞，我不供，他就把薛永寿叫来对质，薛说我是西师共青团的支部书记，叫王作宾，把我出卖了。还有一个雷长庚，在监狱里做事，地下党员，和薛一样供认。我一直不认账，因而受刑很重，石玉瑞还宣布要枪毙我。接着薛又供出了贾拓夫、杨荫川、杨森等，均遭逮捕，我们关在一起。杨虎城部队快到西安时，我们才出了狱。

文化大革命中，雷长庚说我是叛徒，出卖了贾拓夫、薛永寿和他，为此整了我十二年。粉碎“四人帮”后，在咸阳找到石玉瑞才澄清了问题。

*根据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访问王曙谈话记录整理。王曙，又名王作宾，陕西富平人。建国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我在陕西党、团省委的六年*

刘映胜

我原来多在渭南赤水一带活动，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暴动失败后，逃回渭河北家中，与渭河北县委接上关系。经省委同意，渭河南北两个县委合并义渭南县委。在衙上（又名青龙镇），我见到张文华、王林（即后来的王芾南）、徐振化等人，决定由我当团县委书记，张文华、罗承运两人为委员，郭壁（后改名郭西茵）任秘书。这时，党县委书记是王林，委员有徐振化，干部有尹长林、任树森等，分散在孝义，信义一带农村居住和活动。秋末，团省委派马云藩（又名马步云，后改名马子静）曾来渭南视察团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快到年终，省委通知在蒲城荆姚小学召开党、团省委扩大会议，叫我和张文华同去参加团的会议。在寒假一个大雪天我们赶到时，党省委扩大会议先一天晚上已开过，得知党省委已改组，曹趾仁提为书记。第二天晚上我们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有曹趾仁，李畅英、马云藩等，还有蒲城等县团的负责人共八九人。会开了一夜，讨论了形势，改组了团省委，书记马云藩，组织委员李畅英，宣传委员是我。会后，回到渭南，我把团县委工作交给张文华，于腊月中旬到西安。

在西安我先住在南大街粉巷口一个杂粮铺里（同学王志杰在这个杂粮铺里当店员）。几天后找到团省委，便搬到西九府街西头路北马云藩家所在的团省委机关里。住了两天，一天深夜，马云藩夫妇和我同时被捕，当晚被押送到宋哲元设在西华门街的军事裁判处看守所里。我和马云藩同押在一个小房子内，不时听见看守兵在院子内进出走动，像是有人被押进来。第二天早晨，看守兵开了门，叫出来“放风”，看见大院内押着三四十人，其中有党、团省委负责人李子洲、刘继曾、曹趾仁、李畅英、程思诚等，都戴着脚镣。到中午又看见

徐梦周、蒲克敏也先后被捕押进来。

过了约有四、五天，宋哲元和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来到看守所，被押的人都集合到看守所门口。宋哲元看见李子洲，开口便问：“李先生，你信仰列宁，列宁有什么好处？”李子洲不慌不忙地说：列宁要实行共产主义，一生为人民，不为私利，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大意）义正词严，使宋哲元无以回答。又面向刘继曾，用讽刺的口吻说：刘先生，你也来了？去年到莲寿坊去（指省委秘书处被破坏），你没有在，现在来了，也好！刘继曾怒目视之。宋哲元又到李畅英住的房子看了看，出来就走了。国共合作时，李畅英在宋哲元部做过政治工作，有人便问李畅英：你和宋哲元认识，为什么不叫他给你把脚镣卸了？李畅英只是付之一笑。后来听说，党、团省委被破坏后，肖振瀛给宋哲元夸功报告，说共产党省委的要人都抓来了，宋哲元就来了。

在看守所听李子洲等人说，省委破坏的经过是：先是程思诚被捕供出马云藩，马被捕供出曹趾仁，曹被捕又供出李子洲、刘继曾。徐梦周、蒲克敏二人则是不知省委机关破坏，第二天去省委机关时，被留在机关里的敌人逮捕。因为蒲克敏没有暴露他是省委委员，徐梦周住的机关也没有破坏，所以这次党、团省委大破坏，没有牵连到下层组织和外地组织，他们仍能继续活动。

在狱中李子洲得了重病，大家要求保外治病不准，也不送到外面医院去治疗，最后只准外边友人请医生到狱中来看病。直到病情发生危险，脚镣还不准取掉，其残忍之状可想而知。李子洲终于病死狱中，许多人为之落泪。大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把李子洲烈士的尸体抬到后院的场地上，由某友人买棺收殓，搬运回陕北原籍绥德安葬。

一九三〇年秋天，宋哲元失败逃跑，西安城由“和平会”维持，军事裁判处的人也都跑了，在押的人全被释放。一个老学究来训话说：你们是军事裁判处羁押的，和平会叫释放你们，你们都很年轻，回去要安分守己，不要胡来。说了几句便叫我们出狱了。我出狱后暂住同监相好的卫斌辉家，不几日我祖母叫我三叔把我领回渭南老家。

我虽然过了近两年的监狱生活，仍时时想找党的关系继续革命。一次去赤水姚明辉家，遇见省委贾拓夫到赤水视察工作，我谈了找组织、要求继续工作

的愿望，贾拓夫表示欢迎，叫我到西安见党省委再决定工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由渭南家乡来到西安。见到党的省委书记杜衡，他说：“我以为你坐了两年监狱，一定消极悲观不会再革命了。你愿意干，团省委还没有负责人，你入狱前就是团省委委员，现在仍做团的工作，先把团省委健全起来。”这时，党省委书记是杜衡，委员有中央派来的高维翰（长安人）和宋哲元失败时从监狱出来的李艮（长安人），秘书是焦维炽，中央交通是马子敬（马思恭）。

团省委由我当书记，贾拓夫（神木人，原名贾虹光）和杨珊（蓝田人，又名杨荫川）二人当委员。杨珊又兼团省委秘书，和他爱人贾玉秀住在东县门街一个破产财主家的破旧花园里，作为团省委的机关。我和贾拓夫都没有正式机关住地。

团省委遭到大破坏后，工作受到损失。一九三一年初期，党、团在西安的组织、范围都不大，工作也不多。除陕北有刘志丹组织的游击队，在陕甘边一带进行活动外，外地只有少数县有党组织，西安只有零散的党员，还无支部，工人中也没有党员。军事工作由党省委直接管理，没有专做军事工作的干部。在杨虎城部队中的正式党员，我知道只有杨虎城警卫团里当兵的王君治（蓝田人，即后来的汪锋），因和杨珊是同乡，常到杨珊住的地方，其他军队中也有个别单线关系，但不清楚。党省委出有《真理报》油印一张，不定期，多登全国各地红军的消息。《真理报》和党的公开文件，通过党组织，分发给各地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团在外县的组织，都由当地党组织领导，在西安只有中山中学和西安高中有支部，陕西省印刷局原有几个排字工人是团员，我曾联系恢复，不久，又多离开组织。

立三路线在陕西的余毒，在一九三一年春^①广仁医院的护士罢工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广仁医院是英帝国主义在西安办的一个教会医院，里面有一个党员邢培珍（渭南三张人）当护士。党省委通过在省委工作的贺鸿斌（渭南人）的关系，由邢培珍在护士中联络发动群众，提出改善生活、增加工资的要求，医院不答应，省委便直接领导发动和组织护士罢工。因发动起来的群众不多，罢工失败。邢培珍离开广仁医院，贺鸿斌在西安不能立足，被介绍到豫鄂皖苏区

去了。

原在陕甘边一带活动的刘志丹游击队，一九三一年春到了旬邑职田镇五顷园子，党省委先后派李艮、高维翰去视察、指导工作，想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分配土地。因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游击队未久停也走了。李艮、高维翰先后回到省委。

在讨论陕西目前革命形势的时候，在省委内发生了“左”、右倾之争。杜衡、高维翰为一方，说陕西遭遇大灾荒之后，人民痛苦，生活不下去，武装暴动要求迫切，陕西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是高涨的，应该提出号召和动员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行动纲领。另一方，以李艮为主，我和团省委的几个委员都同意李艮的意见，认为陕西人民痛苦，生活不下去，客观形势是很好的，但目前党的主观力量太薄弱，群众还发动不起来，主要先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宣传鼓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发动抗捐、抗税、抗粮斗争，进而再发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杜衡以中央指示为依据，李艮从陕西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双方各据一面，争论不休。先是在省委会议上争论，后来扩大到党、团省委和干部中。并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开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党、团省委干部联席会议，还是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报告中央，后来中央来了指示，才以杜衡的观点取胜而暂告结束。

不久，中央派刘少文来陕西视察工作。陕西党内“左”、右倾之争已过，刘少文只是了解左右倾之争的经过和各方面的工作情况便回中央。从这以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杜衡为首，长期统治着陕西党组织，并在各项工作中实际贯彻。

一九三一年六月间，我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团中央派人到旅馆和我谈了几次话，指出我认为陕西革命形势不是高涨的看法，是右倾思想，我接受了。团中央派陈浅伦回陕西做团的工作。我和陈浅伦先后回到西安，党省委因团组织的范围不大，团员不多，决定把团省委改为团市委。外地团的组织都由当地党组织领导。约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团西安市委组成，由陈浅伦当书记，我当组织委员，贾拓夫当宣传委员，杨珊当委员兼秘书。

团市委组成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西安也开展了反日运动，群众组

织一时活跃起来。党省委派程建文（即后来的陈建中）负责“中华革命互济会”工作，吸收政府职员中同情党的一些群众参加，进行抵制日货、募集捐款的活动。又组织“反帝大同盟”，以各中学团组织为骨干。党、团组织发动各校学生成立反日会，出版刊物，印发传单，扩大反对日本侵占东北，反对不抵抗主义宣传。又由各校反日会选出代表，组成“西安学生反日总会”，以团员作骨干，掀起了西安学生的反日运动高潮，也扩大了团在各校学生中的组织。在各校团组织主持领导下，各中等学校普遍建立了“前卫社”，“读书会”等进步学生组织，进行反日和革命宣传。

陈浅伦还利用陕南同乡关系，在乐育中学（今市七中）办了一个“现代补习学校”。陈自兼校长，联络一些进步人士当教员，以学习文艺为名，由各校团员带动进步学生参加，成为团组织公开活动的阵地。由于反日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到一九三二年初，团组织在各中学里，有了大的发展。各中学都有了团支部，电报局还建立了党支部。

一九三二年初，省委增设了管理军事工作的专职干部曾楚川，跑中央的交通员换为王仲语。由于陕南工作有开展，需要负责人，党省委决定陈浅伦为陕南特委书记。团市委扩大为团省委，我又当团省委书记，贾拓夫是宣传委员，杨珊是组织委员兼秘书。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西安。四月二十五日，陕西省教育厅在民乐园礼堂举行纪念周，召集西安各中学学生近千人参加。我当天也到民乐园礼堂外边去看。教育厅长李寿亭主持会议，戴季陶讲开发西北问题，企图欺骗学生缓和反日高潮。学生递条子质问：为什么日本侵占东北政府不抵抗，反而要开发西北，要戴季陶答复。李寿亭说那是国家大政，自有政府办理。学生要求戴当场答复。这时学生群情激愤，秩序大乱。戴一看情况不好便退入后台。学生以为戴跑了，一哄出了礼堂大门把民乐园包围，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要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要戴院长当面答复等口号，一面把戴的汽车烧了。学生坚持好久，不见戴出来，只好回校。

当晚西安学生反日总会开会，决定第二天九时在北大街公共体育场举行驱戴大会并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第二天未明就派军警把守各校大门，不准学

生出外。只有中山中学和西安高中学生冲出学校大门，边呼口号边向体育场进发。走到北大街遭军警殴打，伤数人被捕多人，关到二府街警察分局。群众称之为“四·二六惨案”。学生反日总会当晚再举行会议，决议各校一律罢课，散发宣言、快电代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殴打学生的祸首，驱逐戴季陶出境。被捕学生第二天被释，但罢课仍坚持，把反日运动推进一步。

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党省委决定在西安高中建立党支部，把一批入团早年龄大的团员转为党员，焦新录和胡明伦分别任党、团支部书记。

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校学生转入反法西斯教育、反对反动校长的斗争。国民党政府便采取长期停课的办法，用高压手段开除和逮捕活跃的学生。暑假期间，三原武字区农民斗争达到高潮，已经组织起一支小的游击队，还有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开展了武装斗争。党、团组织动员一些不能在学校立足的团员去到农村，党省委派负责互济会工作的程建文带领一些男、女团员到三原武字区去慰问革命群众，有的后来就留在三原县城活动。大多数仍回西安。

一九三二年暑假，党、团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杜衡和我先后前往参加。我到上海时，团中央会议已开过，只在旅馆和团中央负责人谈了一次话，介绍团中央会议内容，主要是全国革命形势和团的任务。并派刘英（刘明达）到陕西作团的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团省委委员贾拓夫调党省委当宣传委员。不久，党省委秘书焦维炽被派往蒲城，团省委委员杨珊也调到党省委当秘书，团省委重新组织，我仍当书记，刘英当宣传委员兼士兵工作，史克寿当组织委员。

杜衡暑假在中央开会时，因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在陕甘边一带活动，日渐扩大，中央决定改编刘志丹的游击队，成立红二十六军，杜衡当政治委员，中央派孟用潜（化名曹长青）接替杜衡当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立红二十六军。杜衡以省委委员兼政委，王世泰为军长^②，暂编一个团（第二团），王世泰兼二团团长，刘志丹任参谋长^③，在陕北一带活动。不久，杜衡又叫高维翰去红二十六军当随营学校校长。党省委只有孟用潜、李良、贾拓夫三人。

一九三二年，我在党影响下的夏家什字小学当教员，以教书为掩护。农历

八月，渭南老家来人叫我回去结婚。正值“八一”纪念准备之时，回家时未报经党省委批准，一月后返回，孟用潜以我回家不经党省委批准，违犯纪律，报告团中央给我以撤职检查处分，并要求另派团省委书记。不久，团中央派来袁岳栋（化名笑章，广东人）当团省委书记，另行组织团省委。我接受处分，离职检查。

一九三二年冬，陕南工作有发展，准备成立红二十九军，要省委派人。省委决定派李艮去陕南。我在检查认识错误后，调到党省委任组织委员。书记孟用潜，宣传委员贾拓夫，秘书樊德音，军事干部杜润滋，宣传干部薛和昉和王子宜，中央交通员王万程（即后来的王克平），增加了省委巡视员高岗。

一九三三年初，孟用潜离开陕西，袁岳栋接任省委书记职务。袁当书记后，因在团省委工作过一段时期，对团在各中学的组织情况了解，便把各校入团较早、年龄较大的团员转为党员，在各中学建立党支部，并派干部到外地开展工作。王尹治（汪锋）被派往红二十六军当政治部主任，团省委委员史克寿被派往红二十六军担任团省委特派员，负责团的工作。不久，我以省委委员的身份派往三原当中心县委书记。

三原本是陕西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三原中心县委兼管富平、高陵、耀县等地党组织。一九三二年秋、冬，由于敌人的进攻、压迫和三原负责人曾楚川的私自离开，使三原武字区游击队停止活动，工作停顿。寒假期间，省委曾派我去三原巡视工作，了解情况。不久，即派赵伯平前往中心县委，负责收拾整顿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到三原见到赵伯平。县委只有我和赵伯平二人，和外县组织还多未来往。三原武字区群众运动较有基础，党、团员不少，但因一九三二年秋冬敌人的打击压迫，原来的游击队被前政治委员张培述（外号张半截）解散，枪支隐蔽起来，停止了活动，地方工作一时塌台。我感到三原工作要搞起来，必须恢复武字区游击队，进行武装活动，才能带动其他工作。我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后，省委决定留赵伯平在三原负责中心县委，调我到武字区游击队当政委。我到三原不久，便赴武字区，和在当地群众中较有威信的党员黄子祥一起，把原来的游击队恢复起来，改名为“渭北游击队”。省委又派

干部数人，以黄子祥为队长，我当政委，下辖三个分队。杨森（杨伯楷，蓝田人）为第一分队长，王伯栋（商洛人）为第二分队长，马志舟为第三分队长，参谋是张秀山，经济管理员杨玉亭（富平人），政治宣传员是赵宝珊、屈伸志，还有一个当地的小鬼当通讯员，全队共有人枪约四十，多数是党、团员。武字区地方上是一个区委，有脱产专职干部李俊藻，当地农民干部有赵应奎、姚万忠等。游击队以武字区为根据地，周围多是豪绅地主的民团，有的就住在武字区内边（如长坳民团）。敌人正规军很少来“进剿”。游击队白天住在深沟农民家中隐蔽休息，夜晚到周围农村游击。武字区的豪绅地主，在过去的群众运动中多被打倒，剩下的都迁到县城或别的地方去了。游击队只能到武字区附近活动或打豪绅民团。我在游击队的几个月里，曾到南原打豪绅地主三次，到富平南原一次。都是晚上去捉豪绅地主，发动群众分粮食，赶天明回到武字区根据地。

渭北游击队三个月的活动，人枪都有发展。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前后我去耀县，杜衡在武字区主持授旗仪式，把渭北游击队改为红二十六军四团，黄子祥为团长，我当政委，原来的分队长改为连长，每连增设政治指导员，没有干部就由连长兼任。这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已南下秦岭。红四团仍在武字区一带活动。

还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向省委提出说陕北地方贫苦，居民分散，建立不起巩固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部队已扩大，在陕北不好活动，建议把部队开到一九二八年渭华暴动的高原地区去，那里群众有基础，红军有很好的影响，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比陕北有利。省委书记袁岳栋约杜衡到三原开会，我也参加。袁岳栋初不同意南下，我没有到过陕北，对陕北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不了解，提不出肯定意见。杜衡一再坚持，说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都赞成南下，并说了南下的路线和有利条件，说得袁岳栋也同意了。六月下旬，杜衡便同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带红二十六军南下。到三原附近时，我和黄子祥带渭北游击队到嵯峨山下去迎接，并商定当天下午到武字区时，配合渭北游击队打武字区根据地内的长坳民团。红二十六军傍晚到武字区，配合渭北游击队攻打长坳民团没有消灭了全部人马，当夜从武字区出发，通过高陵

附近，渡过渭河。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把政委交给汪锋代理，自己跑回西安。红二十六军第二天通过灞桥，截了几辆军用汽车，一时西安传说刘志丹大队人马到了灞桥，全城震动。杨虎城调派几个团的兵力追击，豪绅民团沿途阻挡。红二十六军边行军边战斗，进入秦岭山区骑兵失去活动威力，地方上又没有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粮食弹药发生困难，损失很大。未到目的地——渭华高原地区，就被敌人打散。不少干部失掉组织，有的跑到西安找省委。刘志丹等少数干部在秦岭山区隐蔽，坚持好久，找到过去的旧相识，才设法由渭华出秦岭，回到陕北。经过几年武装斗争锻炼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红二十六军二团还在秦岭山区进行战斗，渭北游击队正在三原武字区活动。杜衡由西安来到武字区，对我说：杨虎城的骑兵团长王泰吉通过三原县教育局长周芝轩的关系找省委，要起义抗日，要求派人指导。省委前几天已派余海丰、何寓础亲自去和王泰吉联系，大体商谈好起义计划。现在要派负责干部去。省委还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又说省委决定先叫我去耀县见王泰吉发动起义，他在武字区改编渭北游击队，成立第四团。等骑兵团起义了，他去负责，换我回来。

第二天，我带了省委介绍信，由武字区一个农民党员作交通，把我送到耀县。我先找到骑兵团里的党员王英（王泰吉的侄子，这时当班长），由他领我去见王泰吉。王对我谈了他起义的全部计划。他自负自信、勇气很大。我只感到骑兵团里党的力量太薄弱，全团只有王英和他介绍的两个士兵党员。其他大小军官，全是王泰吉以私人关系拉拢来的。虽然省委说等起义发动了，立即派干部，但全部官兵没有经过革命的宣传教育，起义后如何能听党的话？如何能和敌人战斗？但又考虑到这是统一战线的抗日军队，只要扩大抗日力量，何尝不可以。于是就和王泰吉一起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晨，骑兵团王泰吉宣布起义，树起“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旗帜，贴布告，发通电，集合全体官兵讲抗日形势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任务。王泰吉自任总司令，下设三处，我当政治处长。总司令部下辖支队，把原来的四个连、排、班，都改编为支队、分队、小队。支队长都是原

来的连长，王英升为分队长。王泰吉部名为骑兵团，但全是步兵，只有原来的通讯排，有三、四十匹马，起义后编为特务队，由谈国帆当队长。起义时，还收缴了驻耀县城内的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部的全部枪支，两门迫击炮；又收缴了耀县民团雷天一的枪支。由于雷天一花言巧语，说得王泰吉又把枪支发还，把雷天一的民团收编为义勇军一个支队，由雷当队长。雷以到城外防守为名，离开县城，义勇军开离耀县，雷天一没有跟随，仍在耀县当民团团长。

我到耀县和王泰吉准备起义期间，就和耀县党特支负责人张仲良联系上。我叫耀县党特支调查开出耀县城里的大豪绅地主名单，准备起义时由义勇军逮捕；并准备在乡村发动群众斗争。起义当天，义勇军就根据耀县党特支开的名单，逮捕了一些大豪绅地主，强迫拿出现款，作义勇军军费，并没收他们的粮食、衣物，发给城市贫民。

耀县特支在王泰吉起义后，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发动群众向豪绅地主作斗争，又动员群众到县城慰问抗日义勇军。耀县特支要组织游击队，通过我向王泰吉要枪，王急于扩大义勇军，只给少量步枪。耀县党特支就组织起一支不大的游击队，在农村发动群众，捕捉豪绅。

王泰吉估计起义后，杨虎城会马上派军队打他；也会有相约起义的。但在耀县城里住了好几天，不见动静，乃决定撤离耀县县城，开到三原武字区。一则大张声势，争取别的部队响应，再则和红二十六军四团联欢，以影响义勇军的官兵，然后再去打淳化，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当义勇军到武字区和红四团联欢后，开赴淳化途中时，在三原心字区辘辘把遭到孙苍浪特务团的袭击，义勇军被冲散。我和王泰吉便带少数人马向小坵撤退，并向红二十六军后方游击队驻地薛家寨退却。收点余部，仅百多人。特务队长谈国帆和分队长王英等跟来，别的支队长、分队长都不见了。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退到薛家寨的第三、四天，省委巡视员高岗突然由西安跑来，告诉我：他们几个人在骡马市口福盛楼饭馆开省委会，讨论义勇军问题，准备派他到义勇军负责，被敌特发现，袁岳栋、杜衡被捕，他和贾拓夫跑脱。贾拓夫不知去向，他一人跑来找义勇军。我和李妙斋、习仲勋、高岗几个负责人商议，决定我回西安收拾、整顿省委，高岗留薛家寨负责整顿西北民众

抗日义勇军余部。过了一夜我便离开薛家寨，由一个农民党员作交通，背上作木工的工具来掩护，从小路通过耀县西原到三原武字区红四团驻地，见到黄子祥等，得知红四团在配合义勇军打孙友仁时，不但没有损失，还收留了好几名失散后带枪归来的义勇军士兵，增加了人枪。在这里我还给红四团战士讲了一次话。次日到三原，见到赵伯平，告诉了西安的情况。因当时秋雨连绵，渭河涨水不能徒涉，只好等了几天才回到西安。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我还在三原的时候，就听说省委负责互济会工作的程建文被捕，继之中山中学学生、团干部赵希禹，教员梁益堂，学生高昌年等先后被捕。赵、梁、高等被押送南京，程建文一直没有消息。到杜衡叛党后，才知道他也被捕叛变，成为陕西特务头子宋志先的助手。同时，敌人还把原来押在西安监狱的政治犯先后送往开封“河南反省院”，用诱骗、强制的手段，进行所谓感化教育。在这种情况下，特务活动十分猖狂，而我们党内则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使各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旬我回到西安后，好久找不到原省委的人，后来与原省委秘书樊德音接上了头，才知杜衡、袁岳栋均已叛变投敌，供出了省委组织和各地党的关系，使原来省委工作的干部有的被捕，未被捕的亦逃躲他方。贾拓夫亲往上海向中央请示汇报，还无消息，省委被破坏后，至今还无人负责。于是我同樊商量，应该首先恢复省委组织，才好进行工作；可先组织一个临时省委，收拾、整顿各地党的组织，等贾拓夫回来以后，或中央有了指示再成立正式省委。因樊德音久住西安，对党组织的情况比较熟悉，我便叫他找党员进行联系，特别是找干部关系。不久樊与团省委取得了联系，又与澄城县委负责人张新发、蒲城县党的负责人李鼎新（又名李冲霄）取得了联系，他们都是不久前来到西安的。我们于八月底商定，由联系上的几个干部先组织临时省委，因我是原省委委员，就焰书记，张新发任组织委员，李冲霄任宣传委员，樊德音任秘书，再加上团省委负责人雷致远（后改名雷振东），由我们五人组成临时省委。

这期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杜衡写的《自首反共宣言》，他还写了《陕西共党沿革》^⑤，出卖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关系。杜衡一贯恶劣的

作风和政治品质，干部多有所闻，我更是清楚的。杜衡还收买和拉拢了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秘密打入党内，披上共产党员的外衣，进行破坏活动，使陕西党组织遭到很大损失。例如他们收买了三原三中一个叫潘士杰的团员，伪装省委交通，先后诱捕了史克寿、邢崇道等许多党、团员。这家伙还跑到三原，破坏了三原地下党组织，使赵伯平、李俊藻等同志遭敌逮捕。

不久樊德音找来一个蓝田的党员王治国和他的乡下女人，叫他夫妇为我们住机关，住在城西北角，作为临时省委碰头和开会的地方。又联系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来到西安的杨文谟，叫他组织西安市委，联系党员，恢复组织。当时省委和市委下面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充实起来。一天，张新发从王治国住的机关出来，走到巷口便被敌人逮捕。当时虽觉情况严重，但还没有怀疑到我们内部出了内奸，继续叫王治国和他女人搬到大差市十道巷，租了一家民房作为省委机关。

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⑥（阴历中秋节前不几天），临时省委决定在东十道巷王治国住的机关开会，主要是针对张新发被捕后的险恶形势，研究一下对策。开会的时间、地点是我和樊德音商定的。同时也告诉王治国，说他们来了也告诉他们（指李鼎新、雷致远）一声。开会约在上午，我于九时左右到王治国家，其他人还没有来，我在王房子里看报等人。王治国住的是一个民房，坐北向南，离城墙不远，有上房、厦房、门房，王治国住在门房，厦房和上房还空着。当时十道巷没有几家人，很僻静。我正看报时，听到有人叫门，我以为是开会的人来了，王治国门开后突然发现是三四个特务提着手枪走进房子，特务先搜了我的身，看有无短枪。然后将我关进西厦房，手持短枪站在门外看守。不一会，听到有人叫门，我知道是开会的人来了，只听开门后，樊德音喊了一声，就被关进小房子。过了几分钟，又有人叫门，记不清雷致远和李鼎新是一同捕的还是分开捕的。过了好久，特务将我和樊德音从房子叫出来，将我们四人用绳背绑了，押在事前准备好的轿车上，送到省党部。当时王治国家里，没有文件、枪枝，王治国也不知道其他几个临时省委人员的住址。但知道我们开会的几个

人都是临时省委的委员。直到这时，始知王治国早已是被收买了的内奸。至此，我们这一届临时省委便被敌人彻底破坏。

（刘守琦 刘玉平整理）

注：①应为一九三〇年秋。广仁医院（今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罢工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开始，九月七日即复工。

②王世泰未任军长。

③红二团成立时，参谋长是郑彦青（郑毅）。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庙湾战斗后，郑被调作一连连长，刘志丹为参谋长。

④张邦英回忆是耀县县委。

⑤杜衡的《陕西共党沿革》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

⑥应为九月中旬。

*根据刘映胜一九七二年写的《四十年前见闻录——有关陕西省党组织的一些历史回忆》节录整理。刘映胜化名杨声、杨申，陕西渭南人。建国后任西安铁路中学校长，已故。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 地下斗争回忆*

梁 益 堂

一九二五年冬，我在渭南赤水农校由王璋峰、郑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由于大革命运动的推进，党指派我在华县以西、渭南以东的赤水镇一带，领导农民协会和红枪会。

一九二七年秋，局势突然变化。冯玉祥宣布停止农民运动，解散农民协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不少党员如杨明轩、亢心裁等被逮捕，有的逃亡，有的隐藏起来。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决定组织渭华起义，赤水为据点之一。到了冬天，赤水一带展开了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斗争中组织农民教育农民。

一九二八年春我离开了赤水农校，被调到渭南县委担任宣传部长（书记肖明，当时叫彭明，组织部长何寓础）。县委由城内转移到城南酒河川一个农民共产党员家里。三四月间，起义军许权中部自商洛到潼关，转折回到高塘，高举“陕东工农革命军^①”红旗，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起义，为了领导起义，组织了“陕东特别（派）委员会”，我也被派到特委会工作。起义后，在渭华一带开展游击战。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渭华起义终于在农历端午节前两三天失败。

记得是端午节后的第二天^②，我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作了简单的报告（在东大街骡马市北口交通处，向潘自力书记口头报告）。省委即派我到岐山县委工作，并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到省立第八师范教书，九、十月间学校迁到凤翔。不久甄寿珊来学校说，省政府有密令通缉渭华起义之后潜逃来西路的共产党员。我即易名为廉益堂，但风声日紧，不得已又离开凤翔回西安。到西安后，省委宣传部长蒲克敏通知我到米脂、佳县视察工作。

一九二九年暑期，杜衡（省委破坏后的省委书记）自西安来信召我回西安。到西安后，杜即嘱我共同组织省委，由我负秘书长之职。为了组织秘书处，调来李凌云、闵希孝^⑤（即闵季骞）、王淑琴（女，闵之爱人）、王丽君（女）等同志工作。我在省委工作期间，没有开过省委会议。据杜衡说，省委正在整顿组织，人事尚不足额。大约在十一月间，杜衡和王丽君闹问题，我表示不满；并对外县来的同志谈过。杜很恼恨说我“泄露省委秘密”。不久即撤除我的秘书长职务，派我到蒲城特支担任书记。我在蒲城的公开职务是在蒲城简师和槐小教书，更名杨子材。由于色彩浓厚，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兼之我的假名被人发觉，遂于暑假期满前回到西安。

一九三〇年暑假，省委又派我到汉中建立党的组织（那时候城固、南郑仅有党员四五人，并无组织）。经田伯荫介绍，到汉中省立五师教书兼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训育主任；同去的雷五斋任第五师范教务主任。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我和雷五斋、学生党员杨韶秀、黄懋昭，以及其他进步师生，大量翻印本命理论书籍，如瞿秋白同志的《社会科学概论》、《革命的人生观》、《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石印），行销各校。

我到汉中之前，对汉中地区党的活动情况，不仅我不了解，即使省委书记杜衡给我交代任务时也不完全了解。他只交代汉中的黄懋昭、杨韶秀、赵德茂、何士林、陈文华等五、六人，要我通过他们去“寻找”了解汉中所属各县党的组织情况，在条件成熟时，建立党的领导机关——汉中特委。

在汉中我除和上述几人接头外，还和常汉三、段仲荪、谢佐民、杨杏生、郑月枝、王燮、张振哲等接上关系，首先成立了五师支部，同时积极开展汉中工作，了解各县情况，恢复、整顿组织。城固由周彬如负责，宁强由何士林或陈锦章负责。一九三〇年秋，由于薛永寿被捕叛变，我也被捕。不久，杨虎城入关，经汉南二女师校长常汉三和雷五斋等具保我才出狱。

出狱后，经过一段紧张工作，汉南各县各级党组织先后建立健全起来，恢复了正常活动。经请示省委同意，十一月召开汉中特委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选举我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兼秘书周彬如。参加特委工作的有十多人。特委曾出版机关刊物《前驱》，以五师自治会的名义发行。

一九三一年春，省委给我寄来一份文件，叫把安康工作整理一下。我派王燮去找闵纪骞，通过他开展安康活动，闵表示空气很沉闷，结果王燮回来。

不久，省委来信，说我的领导工作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决定撤除我的职务，并给我开除党籍的处分。我们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宣读省委来信后，认为省委既没有经常的指导，又没有检查；况且我们的工作是根据省委的指示（通告）办事的，即使犯了错误，省委领导应先检查。决定要求省委派人来作实际检查，工作暂由我代理。报告到省委后，省委只指示我暑假回西安，共同研究解决。

暑假回西安，我和杜衡谈了两次，我态度强硬，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杜衡又扯到给我处分的另一个原因，即在秘书处工作时账目不清。我要求彻底细查，杜亲自参加，查的结果认为我没有问题。最后发出一个“恢复杨子材同志党籍”的通告，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

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我在西安市夏家什字第二女小任教务主任。省委以这个学校作交通机关，并由我负责，主要是和红二十六军联系，刘志丹曾来过一次。这年冬^④陈浅伦从上海回来，省委决定由我和陈主办“现代补习学校”（校址在现在西安市七中），做党的宣传工作。陈浅伦负责校务，我负责教务，后因被国民党特务宋志先觉察，办了一月即停。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我在西安省立中山中学教书，兼任训育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雷五斋）。党指派我做教师工作，组织“左翼教职员联盟”，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是反对法西斯教育。四月下旬，戴季陶来陕，教育厅召集西安各中等学校师生，在革命公园大礼堂听戴讲话。戴在讲话中再三诬蔑共产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我和雷五斋首先递纸条提出质问：“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请戴院长答复”。戴不作答，接着质问的纸条纷飞至主席台，戴仍不答。激起群众愤怒，喊声四起，戴被迫退入后台企图逃走，群众包围了会场，喊打声不绝，石子乱飞，烧毁了戴的座车。各校学生激于义愤，在党的领导下，于二十六日罢课举行示威游行，驱逐戴季陶。政府当局大打出手，学生受伤者数人，被逮捕的师生十余人。这就是西安学生运动中的“四·二六”事件。

一九三三年教育厅长易人，国民党 C. C. 头子周学昌继任，陕西教育界反动

势力抬头，不少进步教师失业，进步学生被开除。这时逮捕我的风声日紧，省委决定派我到红二十六军担任政治工作和军中通讯。正拟动身，三月十六日被捕押在省党部，后转押南京，在狱中我们进行学习、斗争，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经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负责同志营救，才获出狱。

注：①许权中参加渭华起义，成立的是“西北工农革命军”，还有一说是“陕西工农革命军”

②即阳历六月二十三日。

③即闵继騫（闵纪騫、闵季騫）。

④根据刘映胜回忆，陈浅伦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回陕的。

*根据梁益堂《我的经历》及一九五九年的几次谈话记录整理。梁益堂，陕西三原人。建国后曾任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中学校长等职务，已故。

回忆一九三〇年陕西省委秘书处和 张蔚森烈士*

闵继骞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在西安承德中学经王菊人、曹授趾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五月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我被派回渭南家乡以小学教师为掩护，担任共青团渭南县东南区区委书记。一九二八年我参加了渭华起义，担任东南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起义失败以后，敌人到处捕杀党、团员，我在家乡无法立足，被组织派到蒲城县荆姚小学教书，王勉之也在该校教书。当时蒲城县的教育局长是共产党员李祥生，这个人很会工作，善于应付，善于隐蔽，多年都没有暴露身份。由于有这个关系，县内各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中有很多人都是党员。冯养浩在离荆姚小学二十多里的富平县美原镇小学教书，他也是渭华起义失败后派到这里工作的。在党内冯养浩担任富平县委书记，王勉之担任蒲城县委书记，我担任共青团蒲城县委书记。我记得当时到省委联系工作时经常到贺鸿真处接头，有时就住在他那里。他是渭南西原贺家村人，在西安市东羊市小学当教师，可能在团省委工作。王文彬也在团省委工作，我有时也和他接头。

我们那时工作非常辛苦，要时时事事留心，有时看见谁的车子拉不动了就主动上去帮助推，看见老人行动不方便就上去搀扶，谁家有什么事就主动上门帮助，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必要时就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开展党的工作。

潘自力被捕以后，一九二八年年底省委在富平县美原镇召开了扩大会议，我和曹趾仁是一路去的，参加了这次会议。接着团省委又在荆姚小学召开了团省委扩大会议，马云藩被选为团省委书记，刘映胜、王友章等都是团省委委员，我被选为团省委候补委员。记得开会时雪下得很大，大家都穿得很单薄，我们

把一个教师的房子挤得满满的。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王慕堂也是党员，其他教员不是党员便是进步分子；学生中的团员也不少。开会时紧关学校大门，并布置了一些学生中的党、团员注意周围敌人的动向。这两次会议不久，就听说省委和团省委机关在西安被敌人破坏，又在渭南河滩召开紧急会议。我们接到通知后即赶去参加，王勉之原来也说要去，但临时又变了。开会中间李凌云的手枪走了火，把大家吓了一跳。会后，我与冯养浩一同去王勉之家，看来他有些害怕，以后就逐渐和组织不来往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的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回到西安，调梁益堂来省委担任秘书长，李凌云也在省委秘书处工作，主要负责刻蜡版、印刷文件等工作。焦维炽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西安一师附小的文牍（搞一些文书处理一类的工作），也是省委成员。当时杜衡只有二十出头，而梁益堂资格比较老，杜嫌不好领导将梁派到汉中工作，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将我调到陕西省委，后接替梁益堂的工作，我爱人王淑琴和她的妹妹王淑君也一同来省委住机关。

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有：

对上和党中央联系。当时党中央在上海，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汇报，有时是杜衡亲自起草，有时是我起草，写好后经杜衡审阅。然后由我用米汤写在一本国民党区域公开发行的书的行距里。中央给省委的指示，也都是用密写写在书的行距里，由我处理显影后，送给杜衡批阅，由我照办。中央和省委的来往公函，都经过秘书处收发。文件有时简单，有时也有长达五、六千字的，一本厚厚的书行距间都写满了。文件办完后，由我送到王超北家保存。王超北是地下党员，他家院子大，后面是上房，有幢小楼，省委的文件（实际就是许多本有密写显影的书）放在这幢楼上的一口大箱子里，箱子钥匙由我保管，取放都由我一人办理。

对下和各县委联系（当时没有地委一级建制）。当时有蓝田、临潼、富平、渭南、蒲城、乾县等县委。和县委联系，一是公函来往，同样用密写。如果内容少，不太机密，就在几张信纸上写些私人来往问候的话，实际内容密写在字的行距间，通过邮局发。互相的收信人都是可靠的和我们有密切关系的非党员，而转给我们又都是假名。如果内容重要机密又较长，就用书密写，通过秘书处

发。二是县委直接派干部来请示汇报工作。来的人先到秘书处报到，由秘书处与我联系约定时间地点，再和县委同志见面。记得一九三〇年三月，临潼县委李玉秀（男）来秘书处找我，秘书处通知我后，我们约好在南大街一个商号见面，在商号一间小房子里，李汇报临潼县委的工作，我认真记录，然后向杜衡汇报。

处理政务和安排机关生活。省委开会都由秘书处通知安排，记得一九三〇年五一劳动节杜衡让我通知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到省委开会。会前杜衡起草了一份宣言，大家讨论后，分头发动群众和敌人开展斗争。我们也经常和组织部、宣传部联系，布置他们写材料。

机关生活是很艰苦的，省委的经费由上海中央给的，一般都是托认识我们的商人，从上海带给省委，经费少，而且常常接济不上。一九二九年陕西遭了大旱，群众也很困难，经费别无来源，所以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餐小米饭。我爱人王淑琴和另一个同志王素如负责做饭。

联系党员，了解敌情，开展工作。省委的党员都分工和西安市的党员联系。我联系的党员有吕剑人，他和我是中学同班同学，当时住在南院门，表面上是给国民党一个机关看门。还有王超北、何寓础（西安师范学校校长）、郭西吟（小学校长）等。交谈内容大都是了解当时敌人活动情况，向他们布置任务。回机关后都及时向杜衡汇报。

我在省委只工作了五个月，就被敌人逮捕了。那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的一天，敌人在街上发现了王观政，当时她因为失恋，精神有些失常。她是王超北从上海带到西安的，她是陕西已故著名党员王授金的女儿。王观政被捕后，在敌人追问下，供出是王超北带来的和王超北住在药王洞的地址。王超北立即隐蔽起来，并由王的爱人李冬如告诉我敌人随时都可能来搜捕，让我第二天一早去取文件。第二天拂晓我到了药王洞，刚一敲门，李冬如跑出来还没来得及开门说话，敌人也从她家跑了出来，李忙抗住门不开，连声说：“不好！不好！不好！”我转头便跑。敌人一把拉开李飞也似的跑来追我，那时我才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一口气跑到糖坊街，刚回头一看，几个全副武装的敌人一齐向我扑来，就这样我被捕送到西华门国民党军事裁判处关押。

到了裁判处我才发现被关押的还有潘自力、蒲克敏、景云等四五十个同志，有的已关押两、三年，潘自力、曹趾仁都先后任过省委书记。被关押的许多同志表现坚强，宁死不屈。敌人对我多次刑讯逼供，我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员。但也有意志薄弱者，敌人一上刑就招供了。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党的工作，不仅条件艰苦，而且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杀害的危险。同我关在一起的张蔚森就是被人出卖后惨遭枪杀的。

我和蔚森是一九二九年春节期间，在渭南辛市的一次会议上相识的。当时，他是中共渭南中心县委常委，我是共青团蒲城县委书记。这次会上，蔚森被选为陕西临时省委常委兼渭南中心县委书记。这年冬天，他由渭南移住西安。我也被调任省委秘书，长住省委机关（三学街一所民房，后门在柏树林）。当时机关住有省委书记杜衡、秘书长梁益堂。组织部长王芾南和宣传（兼军事）部长张蔚森都住在别的地方。蔚森化名陈才，与杜衡、王芾南三人为临时省委常委，张、王每周都来机关开会，我们经常接触，熟悉得很。

蔚森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脸，眉清目秀，神采奕奕，经常身穿制服或长袍，作知识分子装束，有时又象个商人。他对革命忠诚、勇敢、原则性强。记得一九三〇年四月在省委讨论“‘五一’告劳动人民书”的会上，他说话最多，理论性强，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对同志热情，平易近人，总是那样乐观、开朗。在省委，谁都知道蔚森最能联系群众，最关心同志，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长安三桥（现西安市未央区）人，家庭较为富裕，与城里一些商人有来往，社会关系较广。所以省委同志们的住房、生活以及经费的一些困难，都靠他协助解决。他曾在甄寿珊的第三师做过政治工作，并悉心学习过军事，练得一手好枪法。在省委创办的油印刊物——《红旗》上，常有他写的宣传党的纲领、方针、政策等文章，称得上是党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好干部。

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旬，我被敌人逮捕不到一周时间，省委交通王立人（王重语）被捕，同我押在一个房间。大约十天左右，蔚森也不幸被捕，同我俩关在一起（敌人不了解我们的关系），我们三人睡在一个大铺上。那是一幢大房子，关了十多个人，其中只有我们三个共产党员。

蔚森入狱，我们都十分惊讶。他告诉我：根据省委关于趁蒋、冯、阎混战

之机开展军事工作的决定，他与郑鹏飞（共产党员，在甄寿珊部当营长），由吴新吾（他的同乡和同学，当时在刘郁芬总部任上尉参谋，表面进步，表示有反冯情绪）介绍与某人晤面，商谈军事联系及购买枪支等事，并相约某日在桥梓口天锡楼吃饭。这天，他与郑、吴到饭馆不久，敌人的执法队闯入，声言“你们不是好人！”遂将三人一起逮捕。他说：“我观察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吴新吾设的圈套，捕吴不是真的。”起初，我们互相鼓励和安慰，认为敌人没有抓住真凭实据，是不要紧的。他心地坦然，无所畏惧，准备迎接一切危难。

第一次提审，敌人就对他动了大刑，戴着沉重的脚镣被拖回牢房。接着，敌人迫不及待地天天晚上提审，每次都动刑——压杠子、抽鞭子、背火香。他的腿上、背上一道道的血口子，一块块的烧灼伤，一直就没好过，使人目不忍睹。每次受审后，我和立人就赶紧帮他整理衣服，擦洗伤口，安慰鼓励。他虽受刑很重，但心犹坚强，对于受审情况都一一告诉我。

一开始，敌人就说他是“蓄谋暴乱的共党分子”，他只说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在一起欢聚叙旧。几次以后，敌人说“吴新吾招供：你是甄寿珊的政治处长，是共产党，托他购买枪支”。后来还让吴新吾出庭作证，吴以“老同学，好朋友”的姿态诱劝他。蔚森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我是怎样的共产党？”吴新吾支支吾吾，无言以对。当蔚森斥责他“倒卖枪支，图谋发财，反而嫁祸于人”时，吴新吾则只是发出几声冷笑，审讯人员则吼道：他是军人，有军法制裁，你供你的……至此，他完全明白了。后来他对我说：“吴新吾叮得厉害，我上了他的当，把敌人当作老同学、好朋友，被他出卖了”。言谈之间，非常悔恨，要大家今后引为鉴戒。

敌人的严刑审讯持续了十天左右，威逼他交代共产党的组织。蔚森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肉体的折磨，始终只是一句话：“我不是共产党，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最后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毒刑制服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反而激发了革命者对同志的爱和对敌人的恨。蔚森不叫苦，不流泪，只是责备自己太相信“朋友”，痛骂吴新吾是“不仁不义、狗盗鼠窃之辈”。我劝他时，他反而安慰我，鼓励我，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连累朋友，要学古来的圣贤豪杰从容慷慨，叫朋友夸咱是条

好汉！”我心里明白他的意思，既然没有暴露，我们都避免以共产党员的口气说话。

后来，敌人的审讯减少了，蔚森强忍着伤痛，恢复了乎时的乐观、开朗，高高兴兴地与难友们说说笑笑。看到他没事的样子，有人就问：“你的案子结了？”他回答：“由它去吧！自我安慰罢了！”有时，他和大家谈论一些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互相鼓励；有时，独自默默地写东西。我看见他在一本书上写了厚厚一本子，交给王立人保存，并托付立人一定要设法送到他亲戚处。我俩都安慰他“不要紧的！”那知刘郁芬正与甄寿珊的讨逆军在西府对峙，敌人指控他是“共党分子、甄寿珊的密探”。

七月初的一天早晨，我们都还没有起床，敌人就来提蔚森，我们都愣了，很多人都赶紧穿衣起床。大家都知道，晚上提人是审讯，早上提人是杀害，蔚森心里也明白了。他冷静地穿好衣服，沉着地做着临行的准备。最后，他看看我和立人，扫视着整个牢房。这时，我发现他穿着单衣，虽然已到七月，可早晨还有些冷，其实这也是我的心理作用，觉得不能让同志这样上路，就把曹授趾（难友、共产党员）送给我的棉褂子给他穿在身上。这时，他亲切地握了我的手，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着我，微微点头示意，然后怒目冷对敌人。我的眼睛模糊了，不敢再看他了，把头扭向另一边。蔚森一转身，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出牢房，出门后又停住脚步，看了看对门牢里的难友，然后挺胸昂首，拖着与地面撞击发出声响的脚镣走了，走了……牢房里很多人都哭了。杨仁天等老先生伤心得很，惋惜得很！潘自力等共产党员都默默地哀悼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后来，王立人按蔚森嘱咐托人把他的遗书交给莲花池街他姑母家。

郑鹏飞与蔚森是同时就义的。他俩被害后，听说吴新吾由上尉晋升为少校，还领得了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监狱被押人员和看守敌兵都骂吴新吾是卖友求荣、寡廉鲜耻之徒。后来，这一事件和评说在长安社会上广为流传。

我在监狱关了五个多月，敌人没有审讯出什么。一九三〇年的十一月，杨虎城将军从河南到陕西，我和潘自力、蒲克敏、景云、王立人、李醒吾、王作宾等四、五十人被释放出狱。

由于在西安知道我是党员的人很多，不能久留，组织便派我到安康地区绥靖司令部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到安康绥靖司令部，先任少校宣传队长，后任少校秘书。一九三一年六月，汉中特委书记梁益堂派人来和我联系，要我设法组织兵变起义。我说我来此不久，人地生疏，一时恐难举行。梁益堂认为我“右倾”，从此，不和我联系。这样我便脱离了党的关系。以后虽多次申诉，始终没有解决。

（王素园、王少民整理）

*根据一九八九年一月和一九九〇年五月几次谈话记录整理。闵继骞，陕西渭南人，现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从宣化事件到陕西省委四次全会*

张文华

一九二八年阴历正月上旬，共青团渭南县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地下交通送来团省委的通告，指示很快造成全陕西的骚动局面。在这个精神指示下，发生了二月二十八日的“宣化事件”。

“宣化事件”的情况是这样，反动派办的乐育完小，非常妒忌我们党、团办的宣化学校，公然捣毁了宣化学校的教具、教室等物。这时适逢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去上海参加党的六大途经渭南。他发现此事，立即与渭南团县委书记张宗适商量，让渭南中学的学生支援宣化。二张的这一决定，党县委书记肖明是不同意的。这些学生一去，反动分子更是蛮横，破口大骂不已，激怒了渭中学生，双方动起手脚。一个农民党员手提二顺子马刀，砍了教师、有名的瞎绅士王武轩、田宝丰，并把他们推到井里。教师刘子俊骂声不绝，也被打死。同时，固市团市委在团省委所谓骚动的口号下，烧了巴邑镇省议会贾玉夫的房子。这两件事，暴露了党、团的力量，敌人封闭了渭阳中学，捕去党员、团员刘仲哲、王希燕等人。从此，党团县委只好由城镇转入乡下。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团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黎庶、李畅英）到杨相儒小学，为渭华起义做准备工作。这时，党的陕东特委已成立，李以陕东特委名义召集了一次固市团县委常委会议，地点在秦桥寺，出席会议的有党的县委书记苏士杰，团县委书记王文彬、藏守正、苏武和我。会上李大章说：许权中旅不起义就存在不下去，许权中是地下党，已经暴露了。要起义，放在哪里呢，省委决定放在渭南华县一带。并说要召开陕东特委扩大会议，研究起义问题。五月初省委书记潘自力来固市巡视工作，召开会议强调共青团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光靠一些政治上盲目的青年人不行；今后杀人必须通过群众。

一九二九年元月（阴历腊月十五前后），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富平县的美原镇召开。扩大会议前，蒲克敏到中央领取党的“六大”文件。蒲回陕后，即翻印六大文件发给各地党的干部阅读。

我和渭华县委书记王芾南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俩动身稍迟，加上雪大，步行九十里，赶到美原时，先一晚会已开完，有的人已经走了，我见到的有刘继曾、蒲克敏、曹志麟、马云藩、冯异生（富平县委书记）、张资平（澄县县委书记）、刘铁三（三原县委常委），还有王曙、张祝三等。省委扩大会议基本接受了“六大”精神，但认识不足。

接着到蒲城荆姚召开团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团省委书记曹志麟主持，刘继曾讲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会议讨论并接受了党中央和省委决议。对论中，对工农革命军投降刘文伯有所指责。对此，刘继曾批评说：团省委把党省委从机会主义路线上拉出来，可又把党省委送到盲动的路线上去了。

会议选举新的团省委。因曹志麟已被选为党的省委书记，选马云藩为团省委书记。委员有李大章、吕剑人、刘映胜、闵继騫和我。会上原决定我到团省委工作，我不同意，遂决定我去富平任团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腊月二十九日我起程到富平任职。

腊月二十三日，党、团省委组织在西安遭到破坏，我是一九二九年正月初七才知道。以后，省委派杜衡、王林、薛永寿三人去上海中央请示。这时各地组织相继垮台，阴历正月二十日，富平县教育局开始把各校的党员校长、教员撤职，党的县委书记冯异生怕站不住脚，和常委石仲伟一起去了上海。

一九二九年七月社、王、薛回陕西，带回中央的指示。我接到通知后，和车养田、张祝三到渭南慢牛程家小学开会。会上薛永寿讲了如何执行中央关于整顿组织的指示，讲了军阀内部不统一的问题。同时，党的临时省委派吉国桢为党的陕北特委书记，苏士杰为特委军委书记，团省委派我担任团的陕北特委书记接替贾拓夫。

一九三〇年夏季，省委扩大会议在蓝田县巩村高小召开，当时学校正放假。

参加会议的人有王芾南、杜衡、赵伯平、周志学（当时在甄寿珊部队工作）、薛永寿、焦仲明（焦维炽）、陈征（莫斯科留学生，当时在汉中国民党部工作）、张振合（时在黄子文、陈云樵等组织的三原的灾民自救军中工作）、我。会议由杜衡主持。传达中央通告^①说，首先要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根据中央通告讨论了全省工作，决定在全省武装起义，大家一致通过。这次会议还改组了省委，省委由杜衡、王芾南、吉国桢、焦维炽、陈征、赵伯平、黄子文和我等人组成。

巩村会议后，我又在蓝田草坪小学参加了团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接受了党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团省委书记是薛永寿。

草坪会议后，由于薛永寿被捕，省委遭到了很大破坏，不能继续在西安立足。杜衡、王芾南相继到我家。杜衡通知我，陕北不要去了（巩村扩大会上决定我任陕北特委书记），于是我就参加省委的工作。不久，杨虎城进关，监狱的党员破狱而出，给党增加了干部。

一九三〇年十月北方局通知陕西省委派代表团去天津开会。十一月省委派杜衡、王林、杨荫川去天津开会。在杜、王去天津开会期间，省委由吉国桢、张国藩和我三人组时临时常委会主持工作。

天津会议后，北方局派王林为特派员去陕北，派李杰夫（高维翰）和杜衡一同回陕，任省委军委书记。李艮因政治环境不能回家，省委决定李艮到渭南任县委书记，我帮助他工作。

这时接到三中全会文件，开始批判立三路线，因受国际十月来信的影响，又反对三中全会决议。这次会是在马坊门东南客栈召开的，杜衡、李杰夫、吉国桢、张资平、我等参加。会上通过了不同意三中全会的决议案，指出三中全会决议和国际十月来信是对立的，三中全会说立三路线不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等意见。除此以外，杜衡对三中全会还有更多的意见，如认为三中全会中提出“进攻长沙是进兵时的一战”，也是左倾路线的估计等。

由反立三路线又反到三中全会。这时罗章龙在天津成立（紧急会议）北方筹备处，派黄子文^②回来活动，陕西省委常委同意了参加北方筹备处，杜衡已答应，只等组织手续。为此省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

一九三一年正月八日，张国藩、贺鸿真到我家，准备召开省委全体会议。省委全体会议在渭南辛市木匠田家村一个叫平娃的家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杜衡、李杰夫、张国藩、贺鸿真、吉国桢、黄平、李艮、我，共8人。会议根据斯大林对世界经济危机形势的政治报告，分析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是杜衡拿出罗章龙派关于“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处”文件，提出陕西省委参加筹备处。对此，李艮、张资平和我根本不同意，因为不符合组织原则。因为党的六大党章规定，下次党代会必须由上届中央委员会负责召开。其次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筹备处认为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李艮、张质平认为立三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我在会上对杜衡提出尖锐的批评。我说杜衡是立三路线疯狂的执行者，巩村会议后，杜衡写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把榆林的同志往敌人的刀下送。这次会上破坏组织原则，要参加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因此我提出不参加筹备处，撤销杜衡书记职务。表决情况是：贺鸿真、张国藩、李艮同意我的提议，黄平、吉国桢弃权，李杰夫赞成杜衡。接着推选李杰夫为省委书记^③，杜衡保留常委。

一九三一年过了正月，我和李艮到西安，参加讨论省委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参加讨论的有李艮、李杰夫、杜衡和我。杜衡根据中央关于在灾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文件，主张在陕西立即开展游击战争，认为这是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李杰夫赞成杜衡的意见。李艮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的组织状况都不大成熟，应当先做发动群众、恢复组织的工作；然后再开展游击战争。我和李艮意见一致。双方相持不下，我提出把我们的争论意见上报北方局。上级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接着我请假回到渭南。

一九三一年农历四月，中央派刘少文来解决陕西问题。刘少文来陕西召开省委全会时，杜衡未通知我参加。后来，我在一个《真理》的油印刊物上看到

省委对张国藩、李艮、贺鸿真、张鹤鸣和我的决议，意思是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搞派别活动。以后刘少文说要在开展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开展游击战争，从而结束了双方的争论，统一在中央四中全会的路线之下。

注：①即中央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

②黄子文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来陕的。

③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省委六次全会上选举李杰夫为省委书记，不是在省委四次全会上。

*根据张文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谈话记录和《一九二九年冬至一九三〇年夏陕北党团的革命活动片断》整理。

张文华，陕西渭南人。建国后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

陕西省委五次扩大会议前后*

赵伯平

（一）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和我去陕北的旅程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西被迫转入地下，一九二八年成立了陕西临时省委^①，代理书记杜衡，另一负责人是王芾南（化名王林），宣传部长徐振化，秘书长焦维炽。省委机关最初设在渭河以北临潼县属的辛市镇，一九二九年夏初迁至西安。当时我在西安做地下工作，在国民党一个机关内担任地下党的特支书记，经常向省委负责人直接汇报工作。

一九三〇年二月，临时省委要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②，杜衡与我商量会议的地址，我提议地点可选择在我的家乡——蓝田县的农村，这里有利于隐蔽和保证安全，杜同意了我的意见。麦收时节，我偕杜衡回蓝田县南原上的巩村，这里有一个区立高小。我于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后，在这里做过三年教员，人地俱熟。因逢麦收，该校放假，只留一个门夫牛师，是开会的理想地址。我向门夫和创设这所学校的村中士绅们说：“西安城里一些教员，要来农村度夏，准备在这里住上几天”，这些人满口答应，会议地点就这样决定了。

不久，陕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王芾南、焦维炽、陕北特委书记吉国桢、特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张文华，还有我和黄子文共七、八个人。会开了五、六天。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杜在会上有个发言，向大家介绍南方红军的斗争以及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会上还做了一个决议，内容已记不清了。组织上也有一些调动和任命。原陕北特委书记吉国桢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到省委工作。黄子文和我补选为临时省委候补委员。会后返回西安，研究分工问题。这时决

定我接替吉国桢的陕北特委书记职务，张养成（未参加会）接替陕北特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张文华的职务，黄子文到渭北开展工作。会后焦维炽交给我一些党内文件，计有古田会议决议，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些有关政策法规性文件以及省委刊物《斗争》（64开本），内有《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的重要选段。这时我便积极做去陕北就职的准备。

首先，我与当时不在西安的张养成联系，约他在潼关某旅馆会面，然后同去陕北。

其次，是考虑怎样才能安全的把文件带到陕北，这是我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那时，去陕北一般的是绕道山西，但由于蒋、冯、阎新军阀的大战刚刚开始，冯部势力被赶出陕西，秦晋统治者相互交恶，对过往两省的旅客盘查很严，革命者因被搜出携带文件，而遭逮捕和杀害者，时有所闻。为了保证安全我买了两盒饼干，吃了一些后把文件放在饼干中间。七月初，我手提饼干盒，携带皮箱和毯子，搭乘从西安开往潼关的汽车。我把饼干盒放在汽车后舱的座位底下，军警在车门张望时没有发现，只检查了行李和皮箱，闯过了第一关。第二天，便从潼关出发过黄河到达山西的风陵渡，出示了市政府的护照，摆脱了敌人的纠缠。以后我又经汾阳到柳林县境过黄河到绥德，前后历时将近十多天。

到绥德后，我住在一个名叫“三保太”的小客店里。省委让我和绥德四师的教员苏士杰（又名苏醒民）接洽并写有介绍信，他是陕北特委负责人之一，苏把信又交给刘澜涛（刘当时是特委常委兼特委秘书，刘看了介绍信后，才知道我是特委书记，他到客店见我时，发现带来了许多秘密文件，非常吃惊，他问我为什么不交给交通亲自带这些文件，我说：“这是省委给的，要我亲自带来。”

（二）立三路线在陕北的传达与纠正

一九三〇年八月上旬，到达陕北不久，我就为“左”倾路线和陕北特委的隶属关系弄得很伤脑筋。从刘澜涛和苏醒民的口中得知，在我到绥德的一周前，北方局已派了两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一个叫孔祥祯，一个叫高维翰（后名李杰夫），来传达立三路线。同时还说北方局已决定陕北特委划归北方局直接领导，不再归属陕西省委，这样，省委任命我的特委书记是否有效就成了问题，

因此我没有参加孔祥祯和李杰夫的传达，也没有马上就职，给省委连忙写了一个报告，就去义合镇检查工作。义合镇有个高小，党的支部负责人是范子文，还有党员刘汉武、刘成武、马化林等人。我听了他们的汇报，住了些时日，又回到绥德，这时省委回信已到，指示说照样传达省委二次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关系仍由省委领导。于是我就准备任职并做传达会议精神的准备，但时隔一周，临时省委又来第二次指示，同意传达立三路线，陕北特委划归北方局领导（当时陕西省委亦属北方局领导）。

农历八月中旬，陕北特委在绥德城西合龙山的一个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外，还有孔祥祯、高维翰、刘澜涛、苏士杰、张心余（张德生）、白明善（乐亭）、李文芳、常应黎等，共计二十余人，当时，刘志丹到了绥德，被县国民党部的人发现，开会的前两天离开了绥德城，是否参加会议已记不清了。

会上，刘澜涛首先宣读了立三路线的文件，高维翰做了一个发言，介绍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后会议决定陕北要搞武装暴动，在组织上取消党、团和工会的日常工作，合并成一个准备暴动的行动委员会。

会后，我仍住三保太客店。一天武养善突然来到客店，见我仍未起床，催我赶紧起来。不让我梳洗，就一同到城内杨重远的家里，吃早饭时，白乐亭来说：“有人传说从南路来了两个共产党，一个姓赵、一个姓张，敌人正在捉拿这两个人，已去过义合镇的高小”。我知道这是指我和张葬成两个人，张虽没有来，但省委原来决定他也来陕北。当时我化名康和煦，陕北的同志称我老康，尚不知道我的真名字，肯定是西安有叛徒出卖了我们。吃过饭后，杨重远送我到农村避风，到城门口一看，敌人已增哨加岗，盘查极严，见到学生装束的人更不轻易放过，此路危险，改走东门，这里只一个哨兵，在太阳照耀下，正闭目养神，我大摇大摆地出了城门，然后坐船过了无定河，直奔义合镇霍维德的家中，在这里我住了半个多月。

在我避居义合镇时，曾召开了行动委员会会议。研究委员分工，确定行动任务。我担任书记，李文芳任常委兼秘书长，常立德（榆林一手工工人）、常应黎（常黎夫）任常委，孔祥祯任常委兼军委书记，任命刘志丹、谢子长为陕北

暴动的正副总指挥。会议还决定：印制反抗国民党、进行暴动的革命口号，制造舆论，发动神木高志清部的一个连（内有党员近十人）起义，由横山拉下，交由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往榆林等。会后，大家分别行动。

高志清部的骑兵连^③，在几个党员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后由神木拉向安定。由于路途较远，起义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行军中途大部散失了，最后失败了。制定的标语口号，分别张贴各处，但因无实力，不仅未起什么作用，反而暴露了自己，引起了敌人的警惕。

特委迁往榆林，也出了问题。刘澜涛和张心余（张德生）去榆林时，骑骡子一路走。这时敌人已非常警觉，他们刚刚出绥德城，敌人就怀疑起来，敌人追上盘问，一个姓刘，一个姓张，姓氏虽不十分对，但与追捕的人长相类似。再一搜查，发现刘澜涛带有会议开支的收据，张心余带有一本进步小说，于是被当做嫌疑犯加以扣押。以后我和常应黎多方营救，通过杜斌丞（杜是常的舅父）的关系，才将他二人释放。

就这样，立三路线还在酝酿阶段，就遭到了破产。

（三）立三路线的纠正和陕北特委工作重心的转变

一九三一年一月，陕北特委迁到榆林。这时，王芾南从北方局回来。途经陕北，向特委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纠正立三路线。王先向特委传达，因为立三路线不切陕北实际，大家一致拥护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后王又到米脂、绥德等地向各县传达；至此，立三路线得到了纠正。同时又把党、团、工会分开，恢复了这些组织的正常工作。

立三路线的破产和纠正，使我们重新考虑党如何在陕北活动的问题。这时我和特委的同志常常下乡，接触实际，调查研究，对陕北地理和历史，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党的力量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我觉得当时陕北有这样一些特点：

1. 经济落后，土地集中，人民贫困。陕北工商业极不发达，农业落后，工农业产品不能自给，工业仅有榆林的一个织毯厂，其他县几乎无工业和手工作坊；商店很少，只有一些客栈和饭馆，农业除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水平较低以外，与关中大不相同的一点是土地集中，大地主较多，封建剥削严重，佃农租种土地，当地叫“按伙子”，肥料、农具、牲畜完全依赖于地主，因此收获时，时

常倒三七开或二八开。因为地瘠民贫，粮食收获无几，无定河两岸大量种植罌粟以维持生计，加重了农业经济的落后性，农民生活非常贫困。

2. 统治力量相当薄弱，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武装斗争，陕北的太上皇当时是割据陕北的小军阀井岳秀，井当过陕北镇守使，属下有两个旅，一是刘润民旅，一是高双城旅，高旅是井的嫡系。两个旅分住在神府、榆林、绥德一带，兵力相对分散。井是入驻陕北的外乡人，对当地地主豪绅掌握武装心存疑惧，加以限制，因此地方反动民团为数较少，加以陕北地形复杂，广大地区处于丘陵地带，村与村之间，峁沟交错，北依长城，西临子午岭，东靠大河，有广大的腹地可以迂回，便于隐蔽，适宜开展武装斗争。

3. 党的组织建立较早，与人民群众有良好的联系。远自新文化运动时，李大钊就派李子洲回陕北工作，他们在陕北建立了冬学制度。农闲时，组织农民到冬学学习，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这一制度以后一直坚持，成为党领导群众的重要纽带。教育机关的党员很多，农村也发展了一批党员，有开展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根据以上的认识和分析，我们自觉地进行了工作重点的转变。确定党在农村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革命力量；在城镇是隐蔽力量，保存骨干，发动群众，等待时机。为此，我们进行了以下几项革命斗争。

1. 建立革命武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后，延川党员高朗亭到榆林向特委请示工作。高向常应黎汇报说：延川折家坪有个反动民团，他想夺取民团的枪，建立革命武装。常说要高朗亭等些日子，见到刘志丹、谢子长后再决定行动。常并向我汇报了这一情况，我说应当找高朗亭详细了解一下，再做决定。常再去找高时，谁知高竟负气走了。特委觉得这是件大事，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研究，后通过延川县委派刘善忠帮助高计划此事。正月十五日那天^④，他们派了几个人携带香烟等礼品到民团驻地伪装慰问。凑巧，民团团总不在，团丁十分大意，就在他们抽烟谈笑之时，埋伏在外的人一拥而上，把枪下了。从此建立了陕北第二支革命武装（习惯上把失败的骑兵连起义作为第一支武装）。他们打土豪，分财物，搞得敌人十分惊慌。后来他们要向特委汇报工作，我们派人与高接头，以特委名义命名这支部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同时指示他们再向杜甫川一带活动，以

打土豪、分财物为主要任务。他们接受了特委的指示，还给了特委一些钢洋做活动经费。第九支队后来不仅保存下来，而且成长壮大，最后加入红军的主力部队。

一九三二年六月，我外出巡视工作，到达神木沙峁头高小。这个学校的党员王兆卿（后牺牲）、王兆相、杨文谟向我汇报说，他们已从山西弄来了八条枪，准备拉起队伍，搞武装斗争。我考虑他们的枪支太少，时机也不成熟，要他们物色可靠人员，先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等枪支再多些时，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做了必要的训练和充分的准备，选择有利时机，成立了革命武装。这些同志以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的骨干。

2. 大力开展军运。这是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先是派杨重远去高培五旅，因为该旅陕北人多，还有地下党员，有一定基础；后来刘志丹去王子元旅搞军运工作。他们给特委写有报告，经常请示工作。记得刘志丹派与特委的联系人是马云泽。高培五派在山西平定驻防，一个名叫万启贤的党员，在山西省委刘天章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后命名为红二十四军。万启贤任军长，山西省委常委小顾（化名）任政委。该部以后一直打到河北阜平，沿途消灭不少地方武装。后来敌人一个旅长伪装进步，以要求起义请万军长给官兵讲话为名，把万启贤和一些干部诱骗到该部。万在给敌官兵讲话时被敌人打死，小顾被俘，同行五十余人大部分牺牲，这支部队后经山西，过黄河回到陕北，特委曾派常学恭到神木、府谷去迎接。但是这支饥疲交困、弹尽粮绝的部队，还未见到特委派去的同志，就被井部缴械。参谋长蒲志华被处决。团营干部被遣散，士兵则散编在井岳秀的部队里。常学恭闻讯半途返回。这时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也由山西过河来到榆林，准备整顿这支部队。闻讯后又回山西。我未见到刘天章，但曾在客店内见到遣散的一个姓靳的团长，他告诉我这支部队的情况，因此，我才知道这些事。

3. 晋西游击队在陕北的活动。山西省委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开始在吕梁山区活动，后因敌军“围剿”，部队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份西渡黄河，进入陕北。闻听说：这支部队当时只剩下三、四十人，四十二条枪，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过河前，山西省委曾给陕北特委通知，游击队过河后接受陕北特委的领

导，当时我住在下盐湾张宏治的家里（张任特委秘书）。晋西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找到我的住处，向我汇报工作，要求特委给予指示。经过考虑我当时谈了几点：（1）晋西游击队因在陕北活动改称陕北游击队^⑤。（2）部队活动地区在井岳秀和杨虎城部交界地区，这里兵力薄弱，必要时可在子午岭山上活动。子午岭早在宋朝范仲淹防御西夏时，就被削平，岭上从耀县至宁夏可并行三辆马车，便于部队行动。（3）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情况，部队不要攻打县城，以减少伤亡。（4）陕北特委将发动陕北党员和群众积极参军，帮助游击队发展壮大。这几点指示原拟由黄子文回队传达，但这时，北方局通知，黄的爱人李盛云在北平被捕坐监后，行将分娩，准备假释，要黄回去照顾。黄便回北方局去了。以后这支部队横跨陕北腹地，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

4. 在县城不搞公开活动，减少会议次数，以巡视指导代替一些会议。当时我住下盐湾，常立德、常应黎住在另一个农村，特委开会事先通知，这些措施既防止暴露自己，又防止了敌人的破坏。

5. 建立秘密赤色村，秘密赤色村是锻炼群众、积蓄力量，准备公开斗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一期间，特委开展建立秘密赤色村的活动。秘密赤色村的条件是：本村没有地主，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秘密赤色村除有党团组织外，还建立秘密的地下武装。拥有梭标、枪矛等武器，平时任务是防御土匪和消灭兽害，必要时可协助游击队作战。另外，选举村长（一般由可靠群众担任）藉以应付敌人。当时绥德的铁茄坪有崔田夫、崔正冉、崔田民等党员，他们在那里建立的秘密赤色村，就是较好的一个。

（四）在三原中心县委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省委在西安东劳巷一家姓韩的鞋铺楼上开会，会议由省委书记孟用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杜润滋、汪锋以及陕北特委代表团的鲁学曾、崔逢运和我。会上省委决定调汪锋同志到陕北任特委书记，调我到三原中心县委接替汪锋同志的工作，任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农历二月初二），我和省委与三原中心县委的交通李子余一起到了三原。当时三原中心县委的机关设在三原城内，书记是刘林生（武字区人，雇农）、常委兼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委员余海丰分

管宣传。领导着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耀县五个县的党组织。

同年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刘林生离开中心县委。省委派刘映胜（化名杨声）任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此时，余海丰被省委调回西安，提拔武字区委负责人之一李俊藻任中心县委委员兼秘书，姚万忠为委员，委员中还有周芝轩（社会职业是三原县教育局局长），兼管城内各学校中的党员。马云泽在中心县委停的时间不长也调回西安了。我到三原后化名“周中”，与中心县委工作人员全直轩（化名周全），以兄弟名义住在三原东关。

当时，三原地区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有力，革命力量也在不断发展，各县均有党的领导机构，除中心县委外，高陵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是韩学理，韩调到三原心字区工作后，由张策负责；富平党的负责人是姚万忠、习伯勋（兼）；耀县党的负责人是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泾阳党的负责人是武云绮，地址在泾阳高小。此外，各县均有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三原第三中学有党的组织，教职员中的党员有孙玉如、张维新；学生中有郭炳坤、杨新成、邢子舟、白文鳌、潘士杰（后叛变，被我党以汉奸镇压）等。三原民教馆有一个党员；驻三原的杨竹荪团军械处处长也是共产党员，我和他联系过，亦通过他给游击队搞过一些子弹，埋在城西一个大坟附近，让姚万忠取出送到游击队。一九三三年初王泰吉骑兵团内也有党员，一个是王泰吉的侄子王振民（王英）；一个是王部卫生员秦仲民（河南人），我和他们也联系过，并指导过他们的工作。

我到三原时，三原武字区、心字区和耀县等地都有游击队等武装组织。泾阳有苗家祥领导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我未到三原前，就听说他们以嵯峨山为游击根据地，经常活动在泾阳、三原一带。当时，杨虎城曾派一个外国的水利专家去泾阳勘察水利，被游击队扣押起来，并以此为条件，要杨虎城用钱和武器赎回。事后，杨虎城一方面派人送武器；一方面派部队围击，曾使游击队遭受一定损失。这些游击队统称渭北游击队，并设总指挥部，总指挥是李平（刘捷三），政委张培述。除游击队外，还有一些用少数步枪和多数梭镖、大刀武装起来的赤卫队。这些武装都归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但游击队领导干部的任免，要由中心县委和省委协商，由省委任命。游击队成立后，打击了一些欺压群众的反动民团，提高了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游击队在斗争中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队政委张半截子（张培述）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作风上有严重问题的人，他和总指挥李平经常吵架，不能通力合作共同战斗。李平为此很苦恼，曾向我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和鼓励。不久，张半截子勾结游击队一个管财物姓李的山西人，携带打土豪得来的鹿角和其它一些财物逃跑了。省委派刘映胜担任渭北游击队政委，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职务由我担任。后来，省委派李平去别地工作，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由黄子祥担任。驻耀县杨虎城部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计划起义，省委派刘映胜去协助起义，游击队又没有了政委，时张秀山经三原去苏区照金根据地，我便将张秀山暂时留下任游击队政委。这支革命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活跃在三原、富平、耀县、淳化边境一带。

渭北游击队战士来自武字区、心字区、富平淡村一带，他们出身贫苦，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因此，军民关系十分密切。晚上，群众能根据狗咬的声音，断定过村的队伍是来是去。当时特别感人的是，有不少是弟兄、叔侄轮换到游击队当战士，哥哥当一段，弟弟就去换；叔叔有了事，侄子去顶替。这对稳定游击队人数，安定战士之心，提高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一遇和敌人战斗就会全民皆兵。游击队就是这样在群众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游击队的指战员们，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还学到了不少有关天文、气象方面的知识。例如在夜间行军，天晴时就凭北极星辨别方向；天阴时就用手摸树皮，涩的一面是南，光的一面是北。我每到游击队去时，都能听到这样一些生动事例。

现在看来，渭北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既无精良武器和足够的弹药的艰苦条件下，又在离敌人统治中心三原城仅三十里左右的平原地带建立和发展，主要是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在三原中心县委任职期间，曾亲自参加了以下几个重大的斗争：

1. 参加省委召开的三原民教馆会议，批判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的错误。

杜衡到红二十六军后，就极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以反对“梢山主义”，“富农路线”为名，提出了红二团南下的错误主张。^⑥一九三三年六月间，省委书记笑章（袁岳栋），亲自到三原找我，决定在三原召开会议，批

判杜衡的错误。会议在三原民教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笑章、杜衡、刘映胜、黄子文和我共五人，会议由笑章主持，会议开始时，杜衡态度不好，经过斗争，他才勉强承认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会议决定：红二团停止南下，仍回照金根据地，由黄子文赶赴红二团传达这一决定，同时通知高陵特支在渭河畔阻挡，但为时已晚，红二团已过了渭河，黄子文最后虽追上部队，但红二团已失败，因而未能挽救杜衡给红军带来的损失。

2. 接应红二团失败后回来的干部，并护送他们回照金根据地。

红二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渭南、渭北党的组织和游击队均曾派人前往接应。党依靠与群众的密切关系，派一些妇女，手中抱着孩子，腰中暗藏枪支，将刘志丹、王世泰、杨琪、杨重远等同志先后护送到渭北。以后，渭北游击队派人将刘志丹、杨琪、黄子文、杨重远等同志护送回照金根据地。

3. 建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敌人大肆吹嘘他们的胜利，扬言红二十六军已被他们“一举消灭”。为了弥补红二团南下失败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振奋革命队伍的斗志，我和县委几个同志商量后，向省委提出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建议。不久，省委批准了我的建议。一九三三年七月，在武字区召开了红四团的成立大会，会上宣布了省委的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李天赦为参谋长，下编四个连，一连连长马志舟，指导员王柏栋，还有个连长叫王安民，成立大会后又举行了授旗典礼，杜衡代表省委给红四团授了旗，我参加了成立大会和授旗仪式。从此，在三原地区树起了红四团这面旗帜，后成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4. 影响和帮助王泰吉骑兵团起义。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奉命由西安开往三原。在三原驻防期间，三原中心县委曾通过王部地下党员王振民（王英）同志，了解王泰吉的动态，并做他的工作，同年四、五月间，王泰吉部又奉命调往耀县。在耀县驻防期间，王泰吉准备起义，曾到西安找何寓础，想通过何找陕西省委，没有接上关系，只得返回，途经三原时见到了周芝轩，又通过周找三原中心县委，

一是想通过三原中心县委和省委接上关系，争取党的领导；二是请中心县委通知渭北游击队不要再进攻他的部队。我当时问周芝轩，王的态度怎样，决心如何？周回答：“王泰吉的态度很诚恳，为表示他的决心，还送给我一支驳壳枪”。当时我同周芝轩商定第二天清晨约见王泰吉。王泰吉在第二天拂晓前已到耀县去了，他的起义计划经周芝轩向我汇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立即向省委作了汇报。不几天，省委派杜衡、何寓础来到三原，杜衡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决定派刘映胜、何寓础、周芝轩、孙烈一起去耀县协助王泰吉起义。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在耀县举行了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司令，刘映胜任政委。起义不久，义勇军即开到三原武字区，接应原计划一同起义的杨竹荪的一个营，后因杨虎城加强了防范未遂，部队便于当晚在三原陵前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王泰吉、刘映胜在大会上讲话，我以武字区群众代表身份参加了这一大会，大会气氛热烈，人心振奋。会后，我向刘映胜要求给三原武字区一些枪支弹药，经王泰吉同意后，给了十支单穿枪。另外，义勇军还给了省委一些财物作为活动经费，杜衡当时给了三原中心县委一些，其余委托红四团卖掉，将钱带回西安。

王泰吉的起义，使杨虎城感到震惊，他任命刘文伯为渭北“剿匪”总司令，司令部设在三原第三中学，并派其嫡系赵雨晴、孙友仁围攻王部，起义部队在召开联欢大会的第二天，行军到三原心字区轳轳把，与孙友仁团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红四团在侧翼配合，牵制孙部，使其不能倾全力向起义部队进攻。这一仗起义部队损伤不少。但基本力量保存了下来。后进入照金根据地，被编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在我王泰吉部战斗失利后，敌孙友仁部便在心武两区大肆捕人，把一些在地里干活的群众和王泰吉部的散兵也抓起来押往三原。韩学理也在这次被捕。因在韩身上搜出了他带的一把折腰枪而被关押起来。这次被捕一二百人，都在看守所外的一个空场上。在这次大搜捕之前我已被捕。其经过是：王泰吉在耀县起义时，耀县国民党党部有两个三原人，从耀县逃跑经过陵前，被游击队拘留在团部，当时我们正举行红四团授旗典礼大会，大会结束后，吃中午饭时，我去大厅，见杜衡正在审问那两个人，一个姓田的承认是耀县县党部的，另一

个不承认，杜衡没有同我和黄子祥商量，私自决定叫人把姓田的杀掉了，把另一个交群众押到地窖子里，并让我回城后了解一下这个人的情况，但不知以后这个人怎么又跑到三原。我回县后，约在八月十六日或十七日，在三原东关一个饭馆吃饭时，被这个家伙看见，即向敌告密，说我是红军，我因此被逮捕带到杨竹荪团部，由团副审问后关押看守所。后来，敌人把我以政治嫌疑犯的身份转送西安杨虎城的军法处关押，由于杜衡的出卖，敌人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我被判处了十年徒刑，直到西安事变后，释放政治犯我才出狱。

5. 在监狱的斗争。

在监狱里，我们这些政治犯和红军战士被送到杨虎城特务营宋文梅处。在那里不知哪个单位派人拿点心、肥皂、毛巾来慰问我们。周恩来副主席还派人来给我们做了一次报告，内容是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我们还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宋文梅营有个勤务员叫刘炳奎（王立，亦叫刘向清）是地下党员，胡达明向刘谈过我的关系，刘便找我谈话，并向组织作了汇报。经过省委恢复了我的关系。接上关系后，贾拓夫给我写了介绍信，让我找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潘自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我没有找到潘自力，见了指导委员会干部王炳南，他让我做蓝田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到蓝田后，县长和公安局长都跑了，张子厚代理县长和公安局长，我从张处弄了一笔钱，在蓝田办了两期抗日民众训练班。

在中央代表团的直接帮助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重建了陕西省委。我和胡达明、屈光回到省委任省委委员兼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党员训练班班主任。民众运动委员会下有几个干部，分别负责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学运等工作，张秀岩负责妇运，青运先后董学源、陈煦等负责，胡达明、惠子俊负责工运。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在云阳负责举办第一期党员训练班。冬举办第二期，以后连续办了几期。

注：①陕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二月六日党团两省委遭破坏，三月一日在渭南幸存的委员和渭南、华县、蒲城、富平等县党、团负责同志十人的紧急会议上成立临时省委。临时省委一九三〇年四月迁回西安。

- ②当时省委准备召开的是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的第七十号通告。五次扩大会议是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到七月八日召开的，九日，省委召开全体会议，通过《陕北秋收斗争决议案》。六届二中全会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的。按应不是传达六届二中全会决议。这是立三路线已传达到全国党的地方组织，陕北特委传达了立三路线。
- ③应为手枪连。
- ④经考核应是阳历三月十二日（农历二月六日），由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等四人缴了清涧县属淮宁湾子民团的枪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
- ⑤晋西游击队在陕北未改名。
- ⑥根据刘映胜《四十年前见闻录》所述，红二十六军南下前，杜衡在一次省委会上提出红二十六军南下问题，且反复要求，取得省委书记笑章的同意。红二十六军南下前是否征得省委同意，待进一步核查。

*根据赵伯平《回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陕北特委的斗争》（载《榆林党史通讯》一九九〇年第三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载《渭北革命根据地》）》，及一九八七年五月赵伯平在一九三六九四九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赵伯平，陕西蓝田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 陕北党的工作*

冯文江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郑州会议，和七月十五日武汉事变后，陕西局势恶化：冯玉祥赶走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开始逮捕、杀害共产党人。为了在新的形势下，便于指导党的工作，省委将全省划分为六路，各路都有特派员。陕北为第六路，特派员是魏野畴。省委还将大批原来公开活动的党员派赴各地，当时派我担任绥德县委书记。

我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离开西安前往绥德的。途中遇到刘含初，不久他就被军阀井岳秀部下杀害。在宜君还遇见魏野畴、唐澍、白乐亭三人，我们一起到延安，召开了地委会议，当时延安地委是田伯英，青年团书记焦维炽。延安县委书记省委已决定徐梦周来。会上魏野畴根据形势的变化，作了新的安排。之后我们又一起到了清涧，召开了有李象九等人参加的党内会议。会上经魏野畴介绍，唐澍到了石旅。会后我到了绥德。后来魏野畴也到了绥德，由于形势恶化，不好停足，工作安排后，取道山西出关了。在绥德我见到蔡南轩、关中哲，不久井岳秀派刘润民武装封闭四师后，蔡、关就走了。

在绥德我隐蔽在县城高小。由于地委没有了，绥德地处中心，所以根据省委指示，半年中我们派赵通儒到横山、榆林、神府等地，李维清（上海大学学生）到三边，我到米脂、西川一带，搞整顿工作。我们还印发了一批党的基本知识和小组、支部工作的有关文件，由各地党组织分别学习，以帮助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整顿。在此期间，省委给我们来过两次指示信（省委代号曾克文，县委代号许得禄），一次是由常汉山转来的，一封是由李子洲的弟弟转来的。

快到年底，我们在县城高小领导了一次学生斗争，赶走了新任校长周某。

这次斗争是因前任校长李波涛借口有病去汾阳医疗，敌人趁李去汾阳的机会，另换了柳彦琛的亲信、思想反动的周某。让周长期担任校长，势必对我们的工作不利。所以一经发动，他就被赶掉了。但刚赶走周，政府就命令提前放寒假。寒假我去西川视察工作。

清涧举义前，曾给绥德县委有信，要我们派遣一批青年到部队中去。县委接到信后，因时紧事急，熬煎没有人去。后来赵通儒（根据赵的回忆）说他去，于是由他带了五、六人去了。走到石嘴驿时，说部队已到延川，他们又返回来。李旅因单纯的军事行动，最后在宜川失败。

一九二八年旧历正月初，我到绥德在李维清客店（李祖父开的），遇见杜衡。杜是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巡视陕北工作，带来许多文件，在一封信内省委决定召开陕北党代表会，成立陕北特委和对当前工作的指示，信的末尾指定杜衡为陕北特委书记，我为农委。这封信是我亲自看的。不久，我们就在叶毓荣家召开了县委会。会上杜衡提出六条，现在能记起的有两条：1. 坚持贯彻“九·二五”会议精神，2. 提拔暴徒分子。就是在这个精神下，会上提拔叶毓荣到县委工作。叶家庭贫寒，做事鲁莽（后叛党）。会上还进行了组织改造，书记可能是白明善，但白没有任职（估计白站不住足），后为赵通儒。

一九二八年三、四月，在整顿各地组织的基础上，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大庙）召开了中共陕北代表大会，到会代表记不清。我因准备文件到的较晚。会议主要由杜衡传达了中央“八七”和省委“九·二五”会议精神。杜衡带来不少这两个会议的文件，如《告党员书》等。会上我们也发了《告党员书》。文件是在绥德写好一部分，拿在我家刻印的。记得我将文件用卷捆的办法按地区分好，用毛驴驮到苗家坪。杜衡看后批评我技术不高明，这种打包容易被敌查获。会上经过充分的讨论后，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当前任务、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等原则决议（会上来不及写了），会后写成文件，发至各地。会上成立了特委，选举书记杜衡，杨国栋、白明善、焦维炽（赵仪三）、常立德、我等为委员，分工：白为组织、杨为军事，开始要我搞农运，实际我搞了宣传，青委焦维炽。其他人的工作我记不清了。会后我写了宣传和农运决议。

一九二八年特委成立后，机关设在米脂城内，因为当时绥德反革命势力集中，不便活动，而米脂城有群众基础，交通和绥德一样都方便。

特委机关刊物“工农先锋”是一个公开性的刊物，有政治时事、有消息报导、有理论、有短评，刊物的封面始工农高举着一面镰刀斧头红旗迈步前进。当时读这个刊物的人很不少，在陕北的影响较大。

*摘自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冯文江谈话记录。

冯文江，陕西子洲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档案局局长，已故。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 陕北特委一些情况*

常黎夫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我由米脂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工作，主管共青团特委工作（社会职业绥师职员）。我从李文芳手中接收了特委的文件和缮写油印工具，紧接着就参与“红五月”的活动。此时贾拓夫已回神木探家，将去西安工作。

特委机关设在绥德师范。吉国桢（在绥师任教时，改名纪凤洲）、苏醒民（绥师教员）、刘澜涛（绥师职员）和我在绥德。张文华、李文芳在榆林。

七月间，吉国桢、张文华调陕西省委，去了西安。特委工作由苏醒民主持。

绥师放暑假期间，苏醒民和我留绥德，处理特委日常工作，接待听取各地来人的工作汇报，刘澜涛去各县巡视工作一个月。

回顾一九二九年夏至一九三〇年夏这一段时间内，陕北特委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一九二九年二月绥德张家岔会议和四月榆林红石峡会议相继贯彻“六大”精神，提出了纠正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一些办法。群众工作比较扎实，白军内的兵运工作成绩较为明显，特委直属军支有十多个。井岳秀直属部队、榆林兵工厂、神木高志清部以及陕甘宁边的王子元、石子俊部党员不少，工作基础不错。两次会上还批判撤销了思想作风坏的杨国栋特委书记的职务，刘志丹主持了短时期的特委工作。一九二九年秋季吉国桢、苏醒民、张文华先后来陕北，特委的工作作风大有改变。据我了解，这段期间，工作中没有搞“左”的冒险蛮干，表面上不是轰轰烈烈，实际工作隐蔽发展。在当时陕北党组织处在幼年时期，陕北的统治者井岳秀骄庸倨安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正确的。杜衡一

一九三〇年春到陕北，以及他回到省委先后形成的报告、指示，对陕北工作的估价都是从“左”的观点出发，先说不好，右倾；他巡视了一趟，很快就说好起来了，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为给他个人表功。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北方局派高维翰、孔叔东（孔祥桢）和杨璞由天津到绥德，接着赵伯平由西安来绥德。

九月下旬（古历八月中旬），在绥德城南合龙山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传达执行立三路线。

大概十二月，王林由北方局来到绥德，住了几天，即去榆林特委，他的任务是传达党中央三中全会精神，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根据常黎夫一九八二年九月的一次谈话和一九八四年二月谈话记录整理。
常黎夫，陕西米脂人，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回忆蓝桥农民武装暴动*

林之屏

一九三〇年冯玉祥留守关中的刘郁芬给蓝田籍军官张子厚一张师长的委任状，张子厚又给地痞刘汉三一个营长的头衔。刘汉三匪团进驻蓝桥镇，招兵买马，派粮派款，每村每户多少苞米，多少鞋袜都有定数，若不缴，就要家破人亡。蓝桥镇举镇上下，提起刘汉三，无不切齿。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一天，蓝桥附近的两个共产党员齐振国和白耀庭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并说南山有一种迷信的自卫组织“红枪会”可以利用。特支书记杨珊听了这个情况，非常感兴趣。我们立即入山会见“红枪会”首领曾老三。曾老三愿意打刘汉三，但又怕事情弄大把县长惹恼了，派来部队镇压，打狗反被狗咬。我们给他分析形势说：蒋、冯、阎大战，前方吃紧，陕西的冯军大部分调到关外，谁还顾得上你蓝桥这个小地方，你起兵占住山，县长只有那几个警察，他一不敢打你，二不敢告你，人家还会说他官逼民反，扰乱后方，只怕还要问他的罪哩。曾老三想了半天觉得在理，就答应和其他几乡神团联系准备暴动。

我们又到蓝桥一带发动农民。农民诉苦说：刘汉三派的款‘争’的很，比王老九（附近一民团头目）还厉害，王老九是一季派一回款，刘汉三一月就派一回，我们就是把皮剥下来，也应付不了呀！根据这些情况，特支会议决定派白耀庭、齐振国、赵启民等利用同乡关系到南山和曾老三交朋友，相机鼓动暴动。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除野竹坪的神团外，窄峪、白石河、南界牌等地的农民武装一千多人也都联络起来。同时，省委也批准了特支的暴动计划。

一九三〇年农历八月初五^①在县南关小学召开了特支党员大会，决定由曾老三任总指挥，兵分三路向刘汉三匪部发起攻击：野竹坪和黄沙峪的农民队伍从西，白石河和窄峪、南界牌的农民从东，白石河部分武装和其他农民从北，鸣

炮为号，举行起义。初六夜晚，我和杨珊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曾老三指挥部。只见曾老三家的人进进出出，人声鼎沸，他们点起了平时舍不得点的漆油灯，人们打着绑腿，背着明晃晃的大刀、土枪、长矛，威风凛凛。四更时，齐振国和曾老三到了前线，我和杨珊到紧傍蓝桥镇山崖上的一个小草棚纵观战况。

一九三〇年农历七月七日东方发白时，一声土炮响，随着满山的号子声、枪炮声连成一片，三面山坡上刀光闪闪，人流滚滚而下，喊杀声震动山谷。敌兵像遭火攻的蚂蚁一样，左冲右突，除一部分逃往县城，刘汉三携枪逃到山外，其余一百多人全被包围消灭，农民无一伤亡。蓝桥暴动的胜利，迫使反动县不仅不敢上报，反而派两名绅士前来调解：起义队伍不攻打县城，县长答应不追究被杀的敌兵，双方相安无事。这时，杨珊还极力说服神团头目，合力攻打盘踞五凤山的王老九部。王老九闻讯连夜撤走。神团扑空，加之正值农忙，农民无心再战，起义队伍纷纷四散。

这次暴动事先没有完备的计划。起义以后干什么，起义成果如何巩固，大家都心中无数，给人的印象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但是，这次暴动打击了反动武装，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举妄动，为以后南山游击战争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应该说蓝桥暴动是蓝田革命史上一件很值得纪念的大事。

注：①应为农历七月初五，阳历八月二十八日。

*根据林之屏所写《蓝桥暴动中的杨荫川》和一九八一年八月回忆材料整理。题目系编者所加。林之屏，陕西蓝田人，现任蓝田政协常委。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 陕西省委的曲折斗争*

贾拓夫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陕西党、团省委分别派特派员杜衡和焦维炽^①到陕北整顿党团组织。一九二八年春成立陕北特委，杜衡任特委书记，焦维炽任团特委书记。省委破坏，杜、焦调省委，特委改为杨国栋任书记。杨走后刘志丹任过一个短时期特委书记（原任军委书记）。此后是吉国桢担任特委书记，张文华任团特委书记。

一九三〇年八月，我到陕西省委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杜衡，委员有吉国桢（兼任西安市书记）、张文华、李艮、黄子文、黄平、陈徽^②。团省委书记薛永寿，委员有杨声^③、刘公亭、杨珊、贾拓夫等。一九三〇年的双十节，正是立三路线在陕西贯彻执行的时候，在西安市搞示威游行，发动游击战争。吉国桢、马子明和我等被捕。原因是薛永寿被捕后叛变告密。不到半年，杨虎城入关，冯玉祥的刘郁芬部逃离西安，我们出狱后，团省委书记是杨声。

立三路线后，杨虎城入陕，陕西省委曾有一次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当时形势的估计。张文华、张资平、黄子文^④、李艮等四人认为：陕西地区经过几年灾荒，经济已经恢复，杨虎城的改良政策欺骗作用很大，因此革命处于低潮。省委其他同志则认为西北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存在着敌人统治的危机，革命处于高潮；并认为陕西敌人统治薄弱，有大革命的影响，有党的工作基础。这都是革命的有利条件。争论的结果，因为张文华、张资平、黄子文不服从省委多数同志的意见，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开除出党，李艮因为承认错误而没有被开除。在这一斗争中，杜衡基本上是对的。吉国桢等参加了这一斗争。当时革命形势确实是很好的，群众遭受灾荒的危害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

强烈的要求革命，党在农村、军队、民团中都有相当的工作基础。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这种革命形势，没有很好的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公开的进行斗争，把一批力量浪费了。

一九三二年的北方会议（讨论与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苏区）以后，上海中央派曹长青（即孟用潜）来陕西省委担任书记，笑章（岳栋）任团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杜衡派去红二十六军任政委。当时红二十六军已经创造了照金根据地，党的工作已有相当的发展。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关中地区有三原、富平、蒲城、韩城、澄城、同州、渭南等县。陕南的汉中，我在一九三一年夏天去工作了半年多，西乡等县的中等学校已有党的组织，农村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共有党、团员一百多人。

北方会议后，省委进一步加强了党在军事方面的工作，把一些重要干部派出去搞兵运，搞了不少兵变，规模有整连、排以至整团。如西安城楼上有一排人曾经哗变出来，王泰吉的骑兵团全部哗变。兵变对敌人是很大的打击，但是成功的不多。焦维炽在蒲城搞民团兵变时，因事先走漏消息，被敌人惨杀（挖了眼睛），他牺牲得很勇敢。我后来到中央苏区，写过一篇文章《粉碎第五次围剿与瓦解敌军的工作》就是说陕西兵变问题的（还写过一篇通讯：西北燃烧着的苏维埃烽火）。

一九三二年，省委根据中央的三个条件和杨虎城谈判过停战抗日问题，因为杨不承认红二十六军是红军，企图要我们帮助他使红四方面军离开陕西，好集中力量打红二十六军，结果没有谈判成功。

这个时期，我们和杜衡发生过一次争论。省委根据当时敌人派军队和五县民团“围剿”红二十六军，形势比较严重；而群众搞分粮、吃大户等的斗争又很激烈的情况，指示红二十六军化整为零，分散为若干个工作队，进行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这个指示本来是正确的，但杜衡就抓住这个关于红二十六军分散活动的指示，说省委是“右倾取消主义”，回省委斗争。我们大家都说不过他。他提出改组省委：派曹长青去陕南工作（长青不去，回北京了），

岳栋任省委书记，杨声任团省委书记。后来我们一些同志和岳栋意见取得一致后，要杜再去红二十六军工作，杜无法解辩，只好去了。杜去后，要打通什么“国际关系”，要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结果把队伍搞垮。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回西安；高岗在作了王泰吉骑兵团哗变的准备工作后也回到省委。一天，笑章（岳栋）、高岗、杜衡和我去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酒楼，借吃饭机会开省委会议准备讨论义勇军（王泰吉部兵变后准备成立义勇军）和杜衡的工作问题。会议刚开了一半，敌人就来逮捕（因陈建文叛变告密，敌人发现了我们），结果笑章和杜衡被捕，我和高岗逃出。

我在逃出后，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义勇军和红二十六军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红二十六军；我把西安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中央接关系（因省委交通被捕，省委与中央关系断绝）。我通知了各地省委被破坏的情况，调几个同志来省委接替工作，并召开了一次由留下的省、市党、团委委员和外县党、团干部十几人参加的会议，安排了以后的工作，确定由张新发、雷振东暂时分别负责党、团省委的工作。以后，我和一个团省委的干部去上海找中央。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在省委工作的几年中，我认为党内在军事上是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杜衡左倾空谈，实际是右倾；刘志丹代表正确的方面。曹长青我认为还是比较稳重的，他参加过“六大”，有地下斗争经验，肯用脑想问题，注意和大家商量问题。曹任省委书记时，对于红二十六军的指示（分散活动）是较为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当时省委缺乏经验，不懂怎样搞军事斗争，不懂游击战争。三原武字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些机构的规定是照抄“六大”决议上的，如成立肃反委员会等许多委员会。后来组织三原武字区群众到原下游行示威，是一种“左”的行动。

陕西党领导的兵变很多，但成功的不多。清涧兵变，单纯军事行动，到宜川失败。渭华暴动，军队与农民结合起来了，但当时盲动情绪严重，选择的地区又不适当，所以也失败了。

陕西党在领导武装斗争方面，红二十六军是成功的。军事活动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移，发展到陕甘边和陕北，这也符合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因为在上述地区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

在二次内战时期，陕西省委没有领导经验，没有形成领导核心。省委对于中央的几次“左”倾路线都接受和执行了。

注：①焦维炽，即焦维之、焦仲敏。

②陈徵即陈范。

③杨声即刘映胜。

④这时黄子文已不在陕西，一九三〇年十月到北方局去了。这个争论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底省委四次全会上发生的。和张文华、张资平观点相词的还有杨声。

*根据贾拓夫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在陕西省委的一段工作*

孟用潜

一九三二年秋季，上海党中央派我去陕西省委工作，担任书记（改名曹长青）。参加省委工作的还有贾拓夫（宣传）、李艮（军委）、杜衡、杜润滋、笑章（团省委书记）、杨声、汪锋、高岗（未担什么正式职务）等。

那时关中的周至、三原、富平、蒲城、韩城、蓝田、商洛地区，西安市的修械厂、电报局、二中、西师等，均有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工作。陕北党组织属省委领导^①。

当时形势是很好的，对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客观上是有利的。陕西灾荒很严重（西安城隍庙里灾民住得满满的，省委同志还亲自去作过灾民工作）；红二十六军已建立起来，并有新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已到陕南；王泰吉骑兵团内也有党的工作。大家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但实际上，红四方面军再未向北发展，红二十六军虽有发展，但并不顺利，自谢子长等同志调走后也有不少问题；而且敌人进攻很紧，兵力悬殊，党的组织力量还相当薄弱。就是说也有不利的一方面。

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内部产生了争论，即关于大搞，还是搞游击战争的争论。我是争论的一方，主张化整为零，搞游击战。根据是一九三三年初收到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文件（名字忘了），提到作战要灵活，“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等等。我认为陕西红军力量并不大（红二十六军实际只有一团，几百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搞游击战争比较合适。这一意见被解释为取消红二十六军。杜衡、笑章等为争论的另一方，唱高调要大搞，反对我最为激烈。贾拓夫倾向于我这一方面，但态度不够明朗。在争论中我当时感到是孤立的。对这一工作领导不了，也领导不下去，遂提出调换工作问题，以后便离开陕西省

委，回到上海。现在回头来看，我以为当时还是搞游击战争为好。

第三次左倾路线，当时对陕西党的工作的影响，我感觉是不十分明显的。我去陕西时，中央张闻天找我谈了一次话，没有什么具体指示，只说是去陕西工作。我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少或没有接到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专门的具体指示。当时陕西党的工作中心，除城市一部分职工和学生工作外，主要是在农村，特别是陕北红军工作。省委讨论农村情况和红二十六军的工作较多。一九三二年秋，我还亲自去三原黄子文家乡开过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会议。那里俨然已成红色区域。

注：①陕北特委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已属北方局领导。

*孟用潜，河北深县人。建国后曾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一九八五年已故。

一九三二年西安四·二六事件*

苏 执 中

九·一八事变后，在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陕西特别是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相继建立，各中等学校都建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抗日救国会，全省建立了抗日救国总会。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准备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并派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于一九三二年四月来到西安，进行反革命活动，宣扬不抵抗主义，借以镇压日益高涨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省教育厅通知四月二十五日，在西安市民乐园大礼堂召集各校学生举行“扩大纪念周”，戴亲自到会演讲。陕西省委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戴必然要讲蒋介石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不抵抗”的反动政策，要学生“读书救国”，大谈“开发西北”的反动谬论，以欺骗群众、蒙蔽青年学生，妄图把大西北作为反共基地。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将计就计、组织学生参加；二、当戴发表反动谬论时，相机当场提出质问，批驳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政策；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把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当即于二十四日下午由省委负责人李艮在党、团员人数最多的西安高中，召集西安、中山中学、女师、西师、省立一中、省立职业中学等学校党、团支部负责人进行布置。

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各校师生五千多人到民乐园礼堂。戴所讲的内容果不出所料，当戴讲到带有侮辱性的“西北落后”、“陕西没有开化”（后来传说戴还说应把“陕”字的“阜字”旁改为“反犬”旁）时，一下激怒了学生，纷

纷递纸条质问：“日本侵占东北大片国土，为什么不抵抗……”等等，弄得戴季陶尴尬难堪，支支吾吾胡言乱语。省教育厅厅长李寿亭一看事情不妙，出来给戴季陶解脱困境说：“对日问题，是国家大事，事关国策，政策自有权宜之计，戴院长怎么能随便给你们答复呢？”戴季陶接过李寿亭的话，又喋喋不休地大讲“安心读书”和“读书救国”的亡国谬论。有人打断他的话说：“不是我们不安心读书，东三省的大片土地沦陷了，几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我们怎能安心？！”有的高声喊：“反对不抵抗主义！”“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雄壮的口号声震动了礼堂内外，质问声、口号声、谩骂声，汇集成了一团愤怒的烈火。一时会场秩序大乱，石块、瓦片直向戴、李打去，连戴的衣服也被扯烂了，狼狈不堪，连滚带爬地跑到后台去。激怒的群众以为戴要逃跑，便一拥而上冲出大门，呼喊：“要戴季陶答复问题！”“不抵抗就是投降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紧紧包围了礼堂，并向后门冲去，反动政府的宪兵、警察把住后门，不让学生逼近。龟缩在宪兵、警察保护下的戴季陶，不敢露面。积怒在胸的学生中有人喊道：砸烂这乌龟的汽车，看他出来不出来。”停放在大礼堂旁边的小轿车，便被推到广场，有的学生登上车顶发表声讨演说，接着用砖石、瓦片砸毁并烧了汽车。把守的宪、警持枪阻拦，戴、李乘机逃跑，当场学生三人被捕。

当晚，按照省委指示，西安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召开各校代表联席紧急会议，决定发表宣言，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快邮代电，公布事件真相，“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并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同学，严惩殴打学生的凶手，坚决驱逐戴季陶滚出陕西，自即日起，全市各校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不罢休。还决定从二十六日起全市学生罢课列队上街游行示威，在北大街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要求驱逐戴季陶。陕西省政府闻讯，连夜调遣军警把守各校大门，不许学生出外，对西安市各大城门也增加岗哨，不准城外学生进城。

二十六日清晨，各校学生列队上街游行，展开一场驱逐与反驱逐，抗日救

亡与卖国投降的大搏斗。“驱逐戴季陶！”“打倒投降派！”“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等口号响彻西安各校校园和大街小巷。西安高中、中山中学的学生队伍，首先冲破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的包围和阻拦，冲出校门浩浩荡荡向北大街公共体育场进发。中山中学的游行队伍听说附近女师学生仍被反动军警阻拦在校内，便前往增援，行进至北大街王家巷一带，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殴打、鸣枪恫吓，当场不少学生被打伤，有的被捕。

为了揭露反动当局镇压爱国学生的罪行，加强对这次驱戴运动的领导，二十六日省委又召集了一次活动分子会，决议继续罢课，号召提出：抚恤被难和负伤学生及其家属；马上开释被捕学生；严惩主持屠杀的祸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等八项具体要求。同日，省委和共青团西安市委联合发出《为反对刮国民党屠杀革命学生宣言》，号召“一切劳苦群众动员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岗、抗租、抗款债；反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反日反帝运动、屠杀革命群众。”四月二十八日，省委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信，通报“四·二六事件”真相，指出“这次运动开辟了陕西学生斗争的新纪元，已由部分的日常斗争，进到总的政治斗争。”要求各地党部“马上号召当地学生总罢课和各种斗争”；“召开群众反对国民党屠杀革命青年大会，在大会上提出和通过群众的要求条件，游行示威，号召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纠察队，包围地方政府，勒令答复，由大会通电和慰问被难同学，誓作西安学生后援。”为了扩大影响，省委还于四月二十八日派出代表奔赴北京、天津、上海、洛阳、南京、武汉等地和我省有中等学校的三原、凤翔、汉中等地，准备把爱国学生运动推向全国。

四月二十八日以后，西安各校仍被反动军警包围，学生要经过与反动军警激烈搏斗才能冲出校门，去省公共体育场举行集会。天天都有不少学生被打伤，先后被捕学生达四五十人。经过斗争，有的在一、二日或三、五日后被释放。斗争一直到五月中旬以后。在“四·二六”事件中，我和党员朱成意于五月十二

日凌晨，在西安高中校园被敌特逮捕（朱成意光荣地牺牲在西安监狱），国民党反动当局把我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五年。

（张培林整理）

*本文据《西安党史资料》第四辑、《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陕西日报》苏执中回忆文章整理。

苏执中，原名苏自敬，建国后曾在西安市交通局工作，已故。

我在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的工作*

汪 锋

(一)

我去三原之前，曾在陕西省军委工作。当时军委书记李杰夫，我任组织部长、曾楚川任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初，由我任军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冬，陕西省军委派郑群英（广东人，从上海派来西安工作）到三原武字区，了解当地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郑群英在三原武字区和富平淡村住了一段时间，因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生活，即回到西安，给我谈了武字区的一些情况。他说，武字区有个小游击队，共有一二十人枪。他们人数虽少，但基础很好，都是当地人，其中有金理科^①、康尚武、孙帝国^②等人。一九三二年春，省委派贾拓夫到渭北，做宣传建立苏维埃工作。贾到渭北后巡视了一段时间，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说武字区群众基础很好，可以建立苏维埃，于是省委决定派我去三原工作。

一九三二年阴历八月，我由西安到三原，在城内察院巷接上关系。后到武字区，住在上河堡张五家里。阴历九月，省委决定成立渭北特委，由我兼任渭北特委书记（因我是省军委书记），余海丰负责宣传，周芝轩当时没有明确分工，但有时也参加会议。金天华、薛宝含任渭北特委和陕甘边联系的交通员。李子余、阎润平负责和陕西省委联系。渭北特委管辖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同官^③，另外，还有淳化特支。

为了加强渭北的武装力量，省委还派刘玉琨^④任渭北游击队队长，郑彦青任游击队参谋长。以后还派刘庚、赵启民、王杰等人到游击队去帮助游击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作战技能。游击队很快发展到有七、八十人枪，活跃在渭北的

武字区、心字区、马额以及富平淡村、耀县让牛村一带。

我到三原后，省委不断派人到渭北，先后来的有贾拓夫、程建文、师克寿、周凤鸣、于世庄等人。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十五周年，省委指示渭北根据地召开庆祝大会。渭北特委决定庆祝活动三天，组织群众游行到西阳镇，游行后的第二天，敌人驻三原的部队孙立功营和六县民团纠集在一起，对武字区进行了全面的“围剿”。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月^⑤，省委决定把渭北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提拔了一个农民同志刘林生任中心县委书记，我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当时因执行“左”的一套，提拔农民上来当县委书记，名为培养工农干部，实际上是拔苗助长，不相信知识分子，其实一切工作还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说了算。

接着，省委通知我去西安开会，会上决定调我去陕北特委接替赵伯平的特委书记职务。赵伯平由陕北特委调三原中心县委接替我的工作。原因是省委要在陕北建立武装，我曾学过军事，因而派我去陕北。会后，省委派我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去同鄂豫皖边区突围经过西安附近的红四方面军联系。我到周至灵丹庙，被土匪王海山抓住打了一顿，未能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上，又回到省委。不久即由西安到三原。过了阴历年渭北游击队派人送我同李杰夫、李秉荣等到红二十六军。在照金的杨柳坪找到了部队，见到了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

一九三三年春，我随红二十六军到三原，配合渭北游击队作战。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在武字区朱家疙瘩与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一个连作战，这一仗打得特别好，把敌人这个连基本上消灭了。这时杜衡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部队，兼任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由红二十六军的代政委改任红二团随营学校的政委。

杜衡来部队不久，就在尖坪^⑥召开会议，提出要红二团南下，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红二十六军在陕甘一带活动了月余，便向武字区活动，准备同渭北游击队会合。部队到心字区以西，嵯峨山以北的二台子^⑦，杜衡又召开了讨论红二十六军南下的第三次会议。会上，大家对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有三种意见：

一种是以李杰夫为代表，主张部队去内蒙古活动，然后可以打开国际路线，这种意见很快被否决了；第二种意见是以刘志丹为代表，主张原地活动或向陕北发展，这种意见大家认为没有发展前途，也被否决了；第三种就是杜衡代表省委传达南下决定。杜衡在会上发言，说明南下的有利条件是：（1）南下活动地区有党的地下组织，可以配合接应；（2）南下活动地区受渭华暴动的影响，有群众基础；（3）南下地区有小游击队在活动，可以配合作战，（4）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5）南下地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部队可以发展。我在会上表示支持省委的这个意见。这样，经过讨论就通过了杜衡传达省委的意见。后来证明杜衡所说的有些条件是不存在的，我的支持也是不对的。

阴历五月下旬，部队开到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配合打了一次长坳，没有攻下来。这时杜衡集合部队，在甘涝池北边的大场里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南下指挥部，决定王世泰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参谋长，我任政委。会后，杜衡借故离开部队，还宣布说南下部队一到渭南县东原地方，当地党就会主动地连系部队，省委亦会派人来。

我们从武字区出发，经高陵县城外，拂晓到达渭河畔之贺家窑，歼灭守渭河的民团十余人，团头被捕，拉到长安豁口东五里外的地方枪毙了。稍加休息即上骊山，敌军唐嗣桐旅便接近了我军，接上火后，我军边打边退到金山镇，当晚进到车贺岭一带宿营。

次晨向渭华起义地区前进，早七时进到渭南黄沟峪口，同渭河川民团打起来，敌人大部分被歼灭，一部分溃逃。中午到达华县高塘镇渭南箭峪口住宿，即找当地党组织，等候省委来人，均未获结果。为同地方党联系，等候省委来人，部队只好在箭峪口及附近山区游击共约一礼拜，毫无消息。跟随我军之敌，已迫近箭峪口宿营。由于我军遇敌军追击，即向山内行动至青岗坪。第二天拂晓敌人进攻，将我军冲成三部分。王世泰率主力向中国寺方向退去（西北方向），刘志丹率部分向韩家坪退去（向东方向），我同赵启民之随营学校及少先队等五十余人爬上张家坪南山退走。我们在南边山腰抗击，我右腿负伤，退到山顶，

直到天晚与王、刘联络不上，即向后山退去，晚宿距张家坪约五十里之山庄。夜里，约一点钟，被葛牌镇民团郑效仁袭击，部队冲出山庄散入山林，我仅找到少先队两个小战士，三人向南走了约二十里，到草坪丁宪斌、丁宪勋家，在丁家秘密住了两三天，我们又到了蓝田西区焦岱镇高家堡（汤浴镇）王力教书的学校住了二十多天。之后，我们又搬到蓝田西区郝德仁教书的南水磨小学住了几天到西安，正遇杜衡叛变，省委遭到破坏，见到贾拓夫，由贾拓夫、刘映胜决定我以临时省委特派员身份到汉中地区开展秘密工作。

（二）

一九三一年暑假期间，陈浅伦从上海回到西安。团省委改组为团的西安市委代行团省委的职权时，陈浅伦参加了团市委的领导工作。当时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同陈浅伦等在同汉中人有关系的西安乐育中学，讨论过在陕南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陈浅伦对组建红军游击队的兴趣很浓。这年冬天，陈浅伦调回陕南工作，听说他回到陕南后就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

我记得，红二十九军的番号和红二十六军的番号一样，是中央一九三二年六月召开的北方会议前后分给陕西的。省委将组建红二十九军的任务交给了陕南特委，还先后派了一批重要干部加强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的领导工作，其中有李艮、孟芳洲、杜润滋等。红二十九军建起后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治委员。以后发生了马儿岩反革命事变，陈浅伦、李艮、孟芳洲等许多领导同志牺牲，红二十九军遭到了失败。

我是一九三三年秋季，因南下负伤回到陕西省委后，才到陕南的，直接到了勉县。因为那时十七路军警卫团驻在勉县，团部驻诸葛庙。我是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陕南特委的。当时的特委书记杨荫川被派往四川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只有一个小杨（即杨右章，陕西韩城县人，以后叛变了）。我兼任特委书记。

到汉中以后是联系当地党组织，将组织分散开，保存力量，打入国民党部队内搞兵变，整顿巩固组织，搞农民运动。

汉中的组织分散在以下这些地方：汉中的共中、汉师、女师、汉师附小有党员同志，高台寺、杜家湾有党的组织，城固的文川和勉县的黄沙有农民支部，洋县、城固党的组织由王燮领导。我去后，恢复组织就搞了几个月。以后张德生、刘顺元等同志来汉中，我便任陕南军委书记，专搞十七路军的党的工作了。在马儿岩事变以后，在天台山搞了一个游击队，在南褒西南区搞了一个南区秋收斗争，这个工作是白耀亭领导的，在当时我还去过一次，当时还有一个勉略游击队，主要是黄沙镇的同志，才开始有三四十人，以后发展到五六十人，主要在黄沙一带活动，以后这个游击队去川北苏区途中在元墩子被民团击溃而失败了，孙蔚如警卫团在军队方面主要是张汉民部队党的力量雄厚，有两三百名党员，还有孙蔚如的教导营。韩剥皮部队里亦有几个党员的工作。汉中的组织当时大概就是这些。

一九三四^⑧年底，上海中央局派来陕西工作的刘顺元与陈子敬一起到了汉中。刘顺元到汉中后，对陕南特委成员进行了调整：由顺元任特委书记，我改任特委的军委，专门作十七路军中的兵运工作，有时就住在张汉民的警卫团里。

在我未到汉中之前，安康就有一个军特支，归陕南特委领导。

具体时间说不准了，记得安康军特支给陕南特委写来一个报告，说他们准备在安康张飞生的绥靖军中搞兵变，并说搞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特委分析了陕南特别是安康的形势，认为在安康搞兵变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时机还不成熟，决定由我去安康，通知军特支暂时不要行动，待条件成熟后再说。那时陕南交通很不方便，待我赶到石泉县时，听到韩子芳团（石泉驻军）的同志说，王泰诚已起义，向四川方向去了，情况不明。当我赶到安康时，王泰诚、袁作舟、王建英等同志带领出去的几个连的起义已经失败了。王泰诚光荣牺牲，王建英被俘后英勇就义，袁作舟下落不明。

安康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陕西省委一九三三年七月遭到大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遇到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是很有影响的。

我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左右离开汉中的。

注：①金理科（李奎），陕西三原人，曾任陕甘边特委书记，一九三五年被误杀。

②即孙铭章。

③即今铜川市。

④即刘捷三（又名李平）。

⑤应为一九三三年元月中旬。

⑥在耀县照金附近。

⑦在今三原嵯峨乡。

⑧应为一九三三年。

*根据汪锋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谈陕西党史》、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谈话记录整理。

汪锋，又名王烈，陕西蓝田人，现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二年陕南之行*

刘明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向陕南进军，党、团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加强陕南的工作。肖章（当时任团省委书记）向我说：党、团省委决定派你到汉南去，其任务：一是同红四方面军接头，商讨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的配合问题；一是代表团省委视察汉中附近各县的工作，主要是健全团县委的领导和团县委的组织；组织农民开展斗争。去的时间定为一个月，到后即来报告。又说：省委正在抽调大批的人去汉南，已经有几个起程了。他们走的北面大道，比你快些，你到汉中时，他们要和你见面的。你来往时间一个月，赶不及的话希望少超出点时间，必须早些回来。

去时，我是同十几个放寒假回家的学生一道（城固、洋县的居多），我认识的只有刘宗沛一个人（表面上装作不认识）。因山路过于狭小，早晚被积雪掩盖，只有中午才能行走，还有一部分年幼的学生行动缓慢，加之沿途关卡渡口都住有反动地方武装设的盘查哨，到达汉中时，已近一月，快到旧历年关。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经过汉中半月之久了，到处还笼罩着战争的气氛，沿途检查森严，行人稀少，集镇上多关门闭户，充满一种萧条景象，汉中城门还是半开。从湖北尾随进攻红四方面军的肖之楚、刘茂恩两部和由宝鸡来的胡宗南（敌第一师）部正向汉中集聚。红四方面军入川势如破竹，驻防在通、南、巴一带的敌军田颂尧部不堪一击。四川敌首刘湘、杨森等与蒋匪介石之间的矛盾加深，表示独立抗拒四方面军，拒绝伪中央军肖、刘、胡各部入川。于是肖之楚部止于石泉、汉阴；刘茂恩部止于西乡、洋县；胡宗南部止于南郑、城固境内，其前哨进驻沿巴山之牟家坝、天明寺一带。伪中央军与西北军（杨虎城部）在各处发生磨擦。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胡匪宗南部调往天水，肖之楚、

刘茂恩两部也调往河南、湖北，在陕南防守的只有三十八军孙蔚如部。由于杨虎城思想上进步，对革命有所认识，加之当时感到蒋介石用他的部队抗拒红四方面军是“以毒攻毒”。为了保存实力，想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张汉民系地下党员，当时任伪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团团长，该团驻守巴山前线，对红四方面军和陕南地下党组织是“明剿暗保”。当时有一位张含辉，在陕西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常为张汉民办理机要事件。张汉民拿出杨虎城的密令，派他向红四方面军说明建立互不侵犯的心意，张含辉即向汉南特委传达。张汉民对来往于四川、陕西边界有关革命人士负责保护，货物进出边境不加阻挡，这对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巩固起了相当作用。

当时汉中是一座封建堡垒，除反动的军政大员为土皇帝外，各县各乡还有小土皇帝，大小民团首领很多，苛捐杂税也很多。一般劳苦人民都是缺衣少食，有的流离失所，有的为饥饿所迫沦为盗匪。人民对反动的统治都很愤怒，随时随地都在设法斗争。红四方面军经过时，许多青壮年都风起云涌的自觉参军入川，有的追赶不上，有的未被接收还痛哭流涕，人民对红军的好感非常之大。

陕西党、团省委为加强汉南工作的开展和领导，先后抽调去的干部据我所知的（有的我未见面）有孟芳洲（化名老侯）、杨珊（绰号山羊）、李良、老马（陕北人，闻本姓杜）、杨维三（即杨大个子）、王保（本名不详）、杨有智、李楷、老吕、小张（河北人）以及张明远（张黑子）等。

当红四方面军进驻城固上元观时，城固县委书记刘善长派他的妹妹刘蕙长前往接上了头。同时向红四方面军派了三个农民党员充当向导，派人向汉中特委作了报告。当时汉南党、团特委形式上是分开，实质上还是混合的，陕南特委书记是陈浅伦。当红四方面军逼近汉中时，伪绥靖主任赵寿山即将共中周彬如、五中校长易厚安逮捕，对陈浅伦亦在搜捕中。陈处此环境，以离开汉中为宜。并且，他知道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边移动，西乡为必经之地，陈浅伦为西乡人，他去西乡最为适合。就苦于特委书记无人接替，适逢党省委派往汉中的特派员老侯（孟芳洲）首先到达。陈浅伦一见他是上海大学的同学时，即发生过组织关系，是亲密的战友，便给孟芳洲交接了陕南特委书记的职务，去西乡组织武装和发动农民开展斗争，以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我到汉中首先见了陈文华^①。陈文华当时公开的职务是女师附小的教导主任，校长是陈锦章，系陈文华的胞兄。陈文华是上海艺专毕业，系地下党员。我将我的任务和红四方面军的指示要点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将汉中的情况和得到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第二天陈文华引我到东关外一个乡村，陈浅伦的爱人和团特委秘书李泽生（女）的住所会见丁老侯。我们四人（陈、李、老侯和我）就汉中的形势和目前中心的工作谈了三个小时，主要决定：（一）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讨论党、团组织划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及纪律问题；（二）首先建立城洋西边区政府；（三）收容红四方面军失散了的战斗员和建立游击队；（四）发动农民抗捐税，分粮食，加强敌后工作等。根据这次谈话，过了两天，陈文华（团特委书记）召开团特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泽生、陈海云、黄勉初、何士林^②、余定周^③、谢晋之、杨素芬等。我和老侯也参加了，地点在汉台女师附小内的高楼上，时间已将近黄昏。主要讨论特委组织和分配工作，以及派员去城固、洋县通知两个党、团县委准备参加党、团扩大会议的问题。当场决定陈文华仍任团特委书记，陈海云^④任组织、何士林任宣传、李泽生仍任秘书，杨素芬仍任妇联，余定周任交通，黄勉初任视察，谢晋之负责左联筹备工作，还决定刘××为工运，并研究建立秘密机关和经费以及办公时间、地点，决定陈海云、李泽生负责拟定计划等。

自这次团特委第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党、团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分别积极进行准备工作。老侯起草城洋西边区政府的决议案和边区政府组织法、土地法、革命法庭组织法。我起草的是城洋西边区武装组织法、参军优待法等。（以上各项法令的名称记不太清楚）陈文华起草拥护城洋西边区成立告川陕人民书，陈海云、李泽生负责筹备召开扩大会议，发布通知，安排开会时间、地点、联络、交通经费，忙了一个星期。后来老侯、陈文华、陈海云、李泽生和我又在陈浅伦的爱人住所内，将各自起草的各项草案作了讨论和修改。不几日，即在南郑南门外，过汉江河还走六、七里路远的山坡上一座古庙的树林内（大约是正月十五日），利用香客来往很多，人们不注意，召开了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一）边区建立党和团的特委；（二）边区机关对政府机关、各种团体的领导；（三）向白区各县特别是对城洋西的白区扩大宣传，并动员群众到边

区参观或参加工作；（四）党、团特委动员大批干部到边区工作；（五）请求党、团省委派人到边区领导工作；（六）请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时还是临时政府即革命委员会，四月党特委才接红四方面军通知已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派指导员，党、团特委派精干同志到川陕边区政府学习，以便取得经验回来领导各项工作等。

扩大会议不久，老侯将各项草案带往城洋西边区，这时杨珊已到汉中接替老侯党特委书记的职务。我去城固，因刘善长到北山去收容红四方面军落伍的战士，我找刘秀珍传达了扩大会议精神。

我到城固住了四天便到了洋县，见了王燮，除问及建立党、团组织工作外，主要讨论了关于在洋县西区建立游击队的问题。在王燮家里住了一夜，见了王新德，所谈仍是建立游击队问题。

我视察城固、洋县回汉中后，即同杨珊讨论了建立城洋游击队的具体计划：（一）首先召集有领导能力的红军战士蔡青等六人（当时已取得联络的红军战士约一百人）；（二）划定城洋两县边的南区、洋县的西区、城固的西北区为三个中心集合点；（三）发动三个中心集合点的农民群众参加游击队；（四）估计在三个点的武器平均各为一百支，配合旧式武器可能为一个战斗连，编制为中队；（五）从战斗胜利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六）本游击队战术的原则，是配合群众斗争来壮大游击队伍；（七）建立游击队指挥部。将以上的计划一面报请省委指示，一面着手进行。当时党省委已派了杨维三^⑤，还有一位退伍的军官，是杨虎城部的一个连长，便决定杨维三、蔡青和那位退伍的军官三个同志担负三个游击区的指挥员。蔡青到上元观××店，西乡县境××坡，洋县一带；杨维三到褒沔边的协税镇、高台寺、阜川附近一带；那位退伍军人到城固西北区文川镇、龙头寺、升仙村一带开展工作。

在扩大会议一月半后，经过各方面的动员，三个游击队便行动起来了，为了避免敌军的进攻，还只限于农民的反捐税（杀催款委员）、反地主、反高利贷，以及城市里的学生运动（驱逐反动校长和教师）、青工运动（改良学徒待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等），城乡之间，互相呼应配合，革命空气非常浓厚。地主、官僚大为惊慌恐惧，他们许多家庭都纷纷迁住城内，反动政府和敌军也

为之惊惶。

对张汉民的关系，表面上为外交关系，实际上是组织关系。我是作为红四方面军代表与他作为杨虎城的代表身份互相来往的，保持每月有一、二次的联系。这时张汉民部由南郑牟家规一带移驻洋县，曾由他派雷茂于夜间送出步枪二十支，子弹二千发，每月还送给党的经费五十一——一百元。不久，张汉民部移居南郑十八里铺，又增送手枪四支，子弹五百发，经费还是经常送的。以后，由老吕代替我与张汉民来往。

注：①陈文华，宁强县人，一九三五年牺牲于川陕边区。

②何士林，又名何蔚然、何玉然，宁强县人。现任宁强县政协委员。

③余定周，又名余召南。现为汉中政协委员。

④陈海云，城固人。当时任陕南特委秘书，一九三三年四月牺牲于西乡。

⑤杨维三，陕西渭南人。曾任第三游击队大队长，一九三四年去川陕边苏区途中牺牲。

*根据刘明达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的回忆录节录整理。

刘明达，又名刘英、川流，四川人。现住成都市。

一九三三年川陕之行*

刘瑞龙

一九三二年十月，党中央调我离开江苏省委。在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后，决定派我前往川陕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我化装成商人，随党中央交通（当时党的陕北特委派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的）崔逢运取道西安，尔后转道去川陕。

临行前，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是：到西安，协同陕西省委研究有关陕北问题后，再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到，接受分配工作。并要我把用药水密印在几部旧小说页背面的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的文件和党中央的其他文件，带给红四方面军总部。还约定我途中化名“王大舜”与中央联系。

当年，陇海铁路刚通到潼关，乘汽车到古都长安。交通员把我领到陕西省委秘密联络处——《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处。又经过当时任杨虎城警卫团副官的省委内部交通史唯然到了省委机关，见到了贾拓夫和省军委负责人汪锋等同志。

我参加了省委的会议，转达了党中央的委托，讨论了陕西的政治、军事情况，陕北游击队运动和工作等问题后就赴陕南。二月十八日，以化名王大舜通过陕西省委，转给中央一份报告：“到了汉中，对红二十九军及那边的军事工作，要帮助陕西省委共同解决”。省委并派巡视员杜润滋和一位交通员带路，以西安一家金店的名义去汉中收账。二月十九日，我们离开西安。到了汉中，向汉南特委书记孟芳洲转达了陕西省委的委托，参加讨论了建设红二十九军的工作问题。耽误了一、两天，我决定随孟芳洲、杜润滋一道到西乡马儿岩红二十九军军部去。

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二年底驻西乡后，指示共产党员陈浅伦的游击队和张正万的“神团”、王国民等人的民团，改编为川陕边区游击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了马儿岩苏维埃政府。汉南特委一九三三年二月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①。随即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政委，军部驻马儿岩。一月陈浅伦带领十余人到川北通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请示正式建军问题。红四方面军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军长兼政委，并补充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回到了马儿岩。

我从汉中出发，骑上驴马店出租的马，直奔城固。在西乡私渡河桥西，离马儿岩军部不远的地方，遇到一位老大娘。她用手向东一指，对我们说：“那边有杨虎的队伍，去不得。”（当地农民称杨虎城为“杨虎”。）另引我们走了一条向南的山沟小路。我们顺这条小路走去，很快便到了马儿岩。我在路上问这位老大娘，为什么叫我们走这条路。她说这条路好走。我问：“你有儿子吗？”她说有儿子。“你的儿子干什么？”她说：“在干红军，这条路就是到我儿子那里去的。”这位老大娘实际上是为我们红军放哨的。

红二十九军军部在马儿岩庙宇里，我同陈浅伦、孟芳洲、李良、杜润滋、程子文等同志，研究了有关红二十九军初建后活动的情况、整顿部队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尔后，由军部派了一个排护送我入川。据说，从这里到川北两河口，道路险峻，上七十，下七十，山上又七十，要走二百一十里山路才能到达。这时，我在红二十九军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我们从马儿岩出发，经过八海坪、天池寺、牌坊洞、大河坝、高洞子、楼房坪，再往前走就到了曲江洞。这个洞，原来是土匪头子王三春的老窝。红军赶走了土匪后，就把洞作为川陕保卫局关押案犯的地方。当时，保卫局副局长丁武选在那里工作。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洞子。洞分两层，一层押犯人，一层住部队。洞子又长又大，吃水也方便。

出了曲江洞再南行，经核桃树，就到了两河口。我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他在清剿曲江洞的王三春土匪时，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带领一

支红军，对盘踞曲江洞的土匪发动政攻攻势，宣传红军的强大和剿匪政策，没有开枪，土匪就投诚了。免除了附近多年来的匪患。

我们又南行两三天，经过泥溪场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到达通江。通江是川陕边界重镇之一，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都驻在这里。在红军解放了的土地上，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不少农民给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抬猪送匾，鸣炮唱歌，都说共产党好，红军好，工农政府好。我们刚入苏区，就看到这样动人的情景，实在令人兴奋。

我到通江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反击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面围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人都在南江县的两河口前线，指挥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反击。于是，我又赶到南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交了党中央要我带来的文件。同时，汇报了我在陕西省委和汉南特委所了解的敌我情况、研究的问题以及陕南红二十九军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为了开辟陕南根据地，在收紧阵地的情况下，正式派我到红二十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让我率领川陕省政治保卫局的一个排（记得是三十七支驳壳枪），连同原来护送入川的一个排，配齐武器，迅速返回陕南红二十九军，开展游击运动，以配合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我担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时化名是王大舜。

当我率领两个排由通江返回马儿岩时，就得到当地群众报告说：混进革命队伍的原“神团”首领张正万已经叛变，红二十九军领导机关遭到他的袭击，主要负责干部陈浅伦、李良、孟芳洲、杜润滋、程子文等四十多人壮烈牺牲，许多战士失散。这是过去特委领导工作中只顾发展，忽视巩固，缺乏必要的安全准备工作的结果。对二十九军初创时收编的“神团”武装，没有进行很好的改造和消化，不少人缺乏警惕，让他们住在军部附近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同时，也将当地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可靠部队派往远处活动，会址附近的群众又发动不充分，以致事变突然发生时，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援救。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了解情况后，立即着手寻找失散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那

时的团政委是杜义德)的配合下,找回了一百二十多人,同我带的两个排的兵力,合编成“陕南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斗争,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到五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大捷中,粉碎了田颂尧的围攻。我即奉命回川陕省委工作,红二十九军余部亦编进了红四方面军。

注:①这个决议的全称是:《陕西汉南特委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签署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

*根据刘瑞龙《我在川陕边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经历》(原载《四川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访问谈话记录,节录整理。文中个别人名地名作了更正。刘瑞龙,江苏南通人。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一九八八年已故。

陕南特委和安康起义*

刘 顺 元

一九三三年七月，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党投敌，陕西省委和关中不少地方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南的地下党组织由上海中央局直接领导。同年十月，上海中央局派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去陕南领导地下革命斗争。年底我和来中央反映陕西情况的陈子敬到了汉中。

我到汉中之前，汪锋任陕南特委书记。我到汉中后，陕南特委进行了改组，我任书记，汪锋改任特委军委，张德生、王克明^①、史唯然、吴宏宾等同志为特委成员。原特委组织改宣传后，组织肯定是王克明。特委军委由史唯然负责。洋县、城固、西乡、勉县都有县委。洋县可能由席中瑶^②负责。听说汪锋去汉中之前，特委书记是杨珊。

我去后住在汉中市东关李玉文家后院，在那里住的还有陈浅伦^③的爱人及傅剑寒^④的爱人。当时陕南地区正处在我红二十九军遭受破坏后，国民党大军云集汉中，对群众压榨更加残酷，群众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一九三三年腊月除夕前后全区杀了二十六个地主、豪绅、委员、差人。特别是西南区的群众很好，大都倾向我们，有小苏区之称。

我到陕南的任务：（一）在汉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二）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三）找红二十六军。当时的陕南特委，不只领导现在汉中地区各县地下组织，也领导现在的安康地区地下党组织。在我到汉中之前，安康就有一个军特支，成员大都是安康绥靖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主要是搞兵运工作。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警卫团住在勉县，里面有张汉民、阎揆要、史

唯然、雷茂等同志。三十八军内有个管电台的同志叫梁布六^⑤，他在地方上工作时间长，了解的情况多一些，后特委送他去中央工作。

我在特委工作期间，曾派吴鸿宾、杜启安到过中央（上海），去时带的报告，回来带有中央指示。另外中央还给汉中寄过许多文件（内容记不清了）。当时汉中地下党的经费，一部分是由上海汇去的，一部分是当地游击队交的。

一九三四年吴鸿宾到上海，带回中央局给红四方面军的信，特委派张德生送去。杨虎城部派了人员、马匹、赠送西药一部分。红四方面军收下了文件、药物，没谈问题，亦无回信。

溥泉是我，张心诚是张德生，这是我们当时向上级写报告时用的名字，汉生可能是特委给上级写报告用的代号。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一月间，安康军特支给陕南特委写来报告，说他们准备在安康绥靖军中搞兵变，要求特委予以批准。特委分析了陕南特别是安康的形势和敌我力量，认为在安康搞武装起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指示安康军特支继续创造条件，暂时不要起义。没多久，安康军特支再次送来报告，表示不同意特委前次对他们的指示精神。正当特委再次起草给他们的指示信时，王辛德^⑥等同志在二月二十二日发动武装起义已经失败的消息传到了汉中。

安康起义前，陕南特委还派张明远^⑦去安康了解过情况。

安康起义虽然因条件不成熟遭致了失败，但它是在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动的，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打击了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安康地区紧临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次起义对于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斗争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安康起义的英烈们，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辛德被俘就义时，沿途高呼口号，并在刑场上向群众讲话，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注：①王克明，陕西洋县人，曾任陕南特委委员，已去世。

- ②席中瑶，陕西洋县人，曾任洋县县委书记、陕南特委委员，一九三五年被害。
- ③陈浅伦，陕西西乡人，曾任陕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九军军长，一九三三年在马儿岩被叛匪杀害。
- ④傅剑寒，曾任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队大队政委，一九三三年在勉县元墩子战斗中光荣牺牲。
- ⑤梁布六，即梁布鲁。
- ⑥王辛德，即王建英，洋县人，当时任安康军特支书记。
- ⑦根据梁布鲁、汪锋回忆，当时陕南特委派汪锋去安康。

*根据刘顺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所校阅的材料整理。

刘顺元，江苏人，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两当、蒿店兵变和西路临时特委*

李特生

大革命时期，我在咸阳、蓝田一带搞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到临潼甄寿珊部教导营军官队学习。因为甄寿珊当时还是比较进步的，把一些革命同志都收容到他的部队中。教导营主要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王泰吉是军士队中队长，刘味冬、张剑影也在那里负主要责任。军官队一百六十多学员，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上，四个分队长都是党员。党的活动是公开的，我们把这支部队作为革命武装来训练。学习结业后，我即任营部指导员，后又调师政治部工作。冯玉祥接收改编该部后，我受省委派遣，参加过周至、户县、兴平地区农民暴动，搞武装斗争。当时关中地区灾情严重，我们党的力量也很薄弱，未能搞出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

一九三〇年冬，我在陕西骑兵第三旅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一九三一年春，骑兵旅旅长苏雨生叛离杨虎城，二营仍留杨部，被编为十七路军警三旅二团一营。该营有三名地下党员：李秉荣、陈策和我，不久陈策脱离。习仲勋来后，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党员发展到三十多名，建立了营党委，我曾任过一段营党委书记，后由习仲勋担任。一九三二年春，省委为了壮大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力量，决定把该营拉出和刘志丹部队会合，并派专人来领导这次兵变。

一营原驻凤县，后奉命转移甘肃徽县，途经两当时，营党委和省委派来的刘林圃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当晚布置了兵变计划，拉出三个连不足二百人。但由于缺乏经验，整整跑了半个月，沿途不断和国民党军队及当地民团打仗。在永寿岳御寺被土匪王结子的队伍打散，兵变失败。

两当兵变失败，我回到西安。省委又派我去兰州，在邓宝珊的干部补习队学习，任军士第九班班长。干部补习队分军官队和军士队，军士队党的基础较

好。一九三二年九、十月间，省委派李良来兰州组织发动干部补习队实行兵变。我们趁去平凉为邓宝珊接运枪支的机会，在平凉西蒿店镇举行兵变，准备把接运的枪支和人员拉到苏区去。由于部分人员不愿参加兵变而逃回兰州，军官队的同志没有执行原定计划任务，结果只拉出五六十人，而且还继续有人逃回。剩下七个可靠的同志，我们怕走漏消息，就把枪埋在一个地坑窑洞等待机会。不料被民团包围，突围时周志学牺牲，任士杰受伤，其余人冲出包围到平凉会合，蒿店兵变失败。

一九三三年夏末初秋，省委派我和李慕愚去千阳县找陈云樵接头，准备建立西路临时特委。我去时为了便于隐蔽，带着老婆。我们到千阳后，向陈云樵传达了省委指示，随即开展活动。七月上旬，在千阳城内秘密成立了西路临时特委（又称西凤临时特委），我任书记，负责党务工作，李慕愚负责军事工作，陈云樵负责对外联络。组织建立后，我们对内加强对我们掌握的千阳县保卫团士兵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陈云樵任团长，李慕愚任区队长），发展党员，扩大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在千阳山区建立根据地；对外积极行动，准备收编千阳各地方武装，并加紧与西府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互相支持。

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杜衡被捕叛变，陈云樵被杨虎城叫回西安，关押在绥靖公署军法处，并派温玉珊接任千阳县保卫团团长。温到后四处派便衣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我和李慕愚遂离开千阳，临时特委也停止了活动。

（文琦整理）

*根据一九八三年四月、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特生回忆整理。

李特生，陕西扶风人。建国后曾任甘肃工业大学马列教研室主任等职。

创业维艰*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
在陕西地下斗争的经历

陈云樵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我曾经担负过省委交通，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书记等工作，两次被捕入狱。现谨回忆记述如下，以供参考。

担负省委交通员

一九二七年七、八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叛变革命，清洗和逮捕共产党人。陕西省委让我离开西安中山学院，去渭南地区搞农民运动和武装工作，同时代理交通员送机密文件。当时我把文件分送给临潼三育小学佐成，渭南县东关小学张犟、渭南固市渭阳中学徐振化。当时徐是渭南县渭阳中学教员，该校还有方仲如、梁益堂等同志。

同年十月间，省委调我回西安。省委书记耿炳光，组织部长李子洲及潘自力、徐梦周对我讲：“魏野畴同志来信说杨虎城部队要干部。省委决定叫你去，去前你先给两个县委送趟文件，回来后再去”。我先将文件送到岐山县，当时县委书记是耿党，还见到了亢维恪、何挺杰。后到三原县，当时县委书记是张秉仁（后改名为张性初），我和他很熟但没见面，只将文件送交三原县西关民智小学周芝轩后，便返回西安去豫东杨虎城部队工作。临行时，省委叫我给河南省委和魏野畴带信和文件。我和吴岱峰一起先到郑州，由杨虎城部第十军办事处处长段象武给我俩以上尉参谋名义。然后转赴开封，住十军办事处处长薛善初处。与河南省委交通处安志翰（即安子文）接了头。河南省委秘书长雷晋

笙和我谈了三次。因杨的部队已由豫东转移皖北，不能直接前往，我在开封住了多天。

一九二八年元月，第十军军部驻皖北太和，杨虎城是军长，魏野畴是政治处长，南汉宸是干部学校校长，蒋听松是军部秘书长，我负责政治处社会科。地下皖北特委由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组成，我任特委组织干事兼直属支部书记，成员有曹力如（孙蔚如师的政治处长）、杜宗美（炮兵连政治指导员）、高锦亮（军政治处宣传科，听说高后改名为高敏夫）。元、二月间党中央送来大批文件，速令转送河南，特委决定又派我担任党中央和豫、陕交通员。我就带上文件，送交河南省委后，回到西安。当时陕西省委交通主任景云，住西安马神曲街东头南某号，全院只有景云和王爱玉居住（以后他俩结婚）。省委潘自力和我曾多次接头。二月下旬我回到皖北太和县时，杨虎城将军出国，孙蔚如代军长，特委的魏、南、蒋都离开太和。当晚，我宿在同乡程靖舟营部（程是特务二营营副）。翌日魏野畴派申明甫来太和把我接到阜阳（特委移至阜阳城内）县城碾盘街和魏野畴住在一个房子，参加准备皖北暴动，搞军运、农运工作。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下旬，党中央又送来大量文件，叫转送豫、陕省委，特委又决定派我去，我对魏野畴说：“我要跟你参加皖北暴动”。魏严肃地说：“你担任这个工作，关系两省党的大事，应顾全大局。我们共产党人不应感情用事，我还不愿把你留在身边吗？”把我批评得落了泪，遂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我把文件装入箱子重底，第一站到亳州，把文件交给县委书记蒋听松。第二站到开封，把文件交给安子文，并见到了南汉宸（南当时代理河南省建设厅长），同时把魏野畴给南的信也当面交给了他。南还给了我五百本《苏俄考察记》（书面系鹿鍾麟署名）让我沿途散发。行至洛阳时因此书被扣了半天。

到了西安，见了潘自力，我要求马上回皖北参加暴动，潘自力、李子洲要我等几天。我以为是照顾我休息，实际上是省委连夜翻印文件，无适当人去送，当时四门查得很严，尤其东、西门都有敌人专门检查所谓“共党”活动人员。潘自力、李子洲对我说：“没有妥善的人送文件，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送完回来，即去皖北”。我即先到临潼三育小学，翌日到渭南东关小学，当时渭南县

委书记是肖明。又到蒲城许维善家里，继到富平县城内县立高小，县委书记是马文彦，最后到三原西关民智小学见到周芝轩。任务完成后，回到西安（北广济街葛家面房）。一天潘自力来到我的住处，对我说：“胡怀玺、申明甫回来了，皖北暴动失败了，魏野畴同志壮烈牺牲”，我抱着潘自力嚎啕大哭，潘亦泣不成声。我喊着：“我要为魏先生报仇”，悲愤不止。最后潘自力对我讲：“你现在不能去皖北，省委决定叫你担任省交通主任，筹设一个小杂货铺，抽调长安县农民党员张生荣作为交通员，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作为杂货铺学徒”。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我在西安东大街路南（现在陕西日报社的东隔壁）租了一间门面，我和男孩住在铺内，由于经费不足只销售一些纸张、纸烟等物。后因被敌人发现，省委决定我回兴平，负责西府工作。

领导西府农民围城

一九二八年夏，关中地区粮食欠收，饥馑已经开始。这时，我回到老家兴平县店张镇南堡了。因为家里穷，又遇荒年，三天两头断粮，只好买油渣，甚至借别人喂牲口的干苜蓿，磨成面充饥。为了生活和开展党的工作，我说服家里卖了几亩好地，换了七斗麦子以卖馍为生。同时走村串乡，联络党、团员，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我恢复了姬封西的党员关系，在岳阜村建立了党支部，由姬封西任支部书记，委员有段成秀、史秉文。通过姬封西我又认识了在马家滩教书的党员姬永安，在那里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是姬永安，在此前后，我还在店张建立了党支部，书记是豆长庚。一九二八年十月间，省委秘书长刘继曾来西府视察，向我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随后，我向各支部分别作了传达。限于当时生计，我只能在兴平及附近的礼泉等地活动，无力于西府其他各县的联系。

一九二九年二月，我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潘自力、李子洲、刘继曾、蒲克敏等先后被捕，省委其他机关和交通也都联系不上。在大街上我碰到了蓝田的赵伯平，他也来找省委。我俩相约谁先找到党组织就及时通知对方。不久，经兴平同乡张遇时介绍，我到国民党省党部政训班当军事教员，借以掩护从事

革命活动。三月，焦维炽找到我，说新省委已经建立，书记杜衡。我向他汇报了这一段的经历，省委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我又恢复了当时在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当干事的赵伯平的组织关系。省委决定我为西府地区负责人，具体任务是：（1）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的组织；（2）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暴动；（3）进行军事武装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我在国民党内活动个公开身份作掩护。我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政训练班主任李尚的关系，活动到一个国民党周至县党部委员的头衔。经省委同意后，于四月初到周至。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周至我们先后建立了几个支部，并建立了许多单线联络网。记得有：周至县城关支部，书记李翬；终南支部，书记李效乾；祖庵支部，书记袁铭山；共青团支部，书记蔺孝儒；岐山县益店镇马尾沟支部，书记周肇岐；扶风县菊村支部，书记冯殿安；宝鸡县城支部，书记杨珊；眉县县城支部，书记石耀章；李特生曾经负责过凤翔县党的支部工作。建立单线联系的有：凤翔县的魏青宣，武功县的李维翰，兴平县的张含辉、李百忍，礼泉县的秋步月，还有渭南县的张××（渭华暴动后，逃到武功滩区某寺院当了和尚，经我了解后恢复了组织关系）。同时，与地下武装的首领，眉县的王老汉（名字忘了），武功县的陈其武、黄彦文，兴平县的朱佐洲进行联系。策动原是甄寿珊部团长的扶风县的杨万青赴西府进行军事活动。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杜衡来周至视察西府工作，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并通知省委决定我任省委军委委员。十月间，特务给国民党报告说我是“共党分子企图军事暴动”。国民党省府主席宋哲元电令周至县长杨曾润：“逮捕共党分子陈云樵就地正法”。幸杨给我透露消息，我即将工作交张养成负责，潜离周至转入马家滩一带进行活动。

一九二九年是陕西历史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吃光了草根树皮，挖尽了泄肚子的“观音土”，甚至父子相食、卖人肉者时有所闻。现在西北农学院校址一带，纵横数十里，当年就是灾民饿毙一空的荒地。城镇卖儿卖女的“人市”上，头插草标的十七、八的大姑娘，只卖几升粮食。许多县挖掘了万人坑，如周至县就有七个掩埋队。每天不断地把死人，甚至饿倒还活着的人（在抬的时候，有的呻吟，有的还喊

“我活着呢”），“为了卫生和观瞻”，都被扔进“万人坑”，真是惨不忍睹。陕西是冯玉祥统治的主要后方。为了参加军阀混战，冯军日夜抓丁索款，抢夺粮食，翻箱倒柜，敲诈勒索。地主豪绅则乘机催租逼债，高利盘剥，兼并土地，鱼肉人民。逼得少壮者不是被拉丁，便是流离失所；老弱者不是上吊跳井，便是饿倒村闾，其状至惨。

天灾人祸，迫使周至、户县、眉县、兴平、武功地区的农民奋起武装暴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时，邻村——周至县属临川寺，警察下乡催款，吊打农民，激起民反。贫农周七率领农民数十人打跑了警察，乘势一举攻进了终南镇，砸烂了乡公所，痛打了作恶多端的乡吏豪绅，激励了长期受压榨的饥饿农民，纷纷参加暴动的农民军。当天就骤增至800多人。第二天拂晓农民军到达周至县城。县长杨曾润异常恐慌，紧闭城门，命令警察登城防守，并召集土豪和官吏商议对策。这时农民军从东、北两城墙架起云梯，奋勇攀登，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县长急率武装警察二十余名，由西门向眉县方向逃窜。到哑柏镇以西地区时，即被我地下武装陈其武部截击捉住（后在管押中贿赂看管人员脱逃），收缴长枪十余支，短枪数支，俘获警察十余人。农民军攻入县城后，打开监狱放出人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深受劳苦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但由于没有党组织的具体领导，缺乏周密的组织和计划，第三天忽然全部撤离周至县城，向东去攻打户县县城。农民军架起云梯，奋勇攻城，守敌一触即溃，狼狈逃窜。农民军攻入县城，即将县党部、政府、法院、税所等全部捣毁，释放人犯，开仓放粮，市民鞭鸣，夹道欢迎。农民暴动的胜利，使西府各县的敌人惊慌万状。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急令开往河南的门治中旅，星夜调往户县，围攻农民武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用梭镖、马刀、木棍武装的农民军，死伤惨重，队伍很快瓦解星散。

农民军暴动消息传到西安，省委令我星夜赶回。我到马家滩时，打散的暴动农民已纷纷逃回家里。我了解了暴动和失败的经过后，通知各县的地下武装和农运负责同志，约定时间，令其率队到渭河北岸的兴平县属之尼空寺镇集合，准备二次攻打周至县城。我带少数干部赶往尼空寺组织布置，同时派人到兴平县城侦察情况。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们又集合了二千人，近二百条枪，制定

了作战计划，成立了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兼政委，副总指挥由牛汉臣担任（河南人，是临川寺一带农民秘密拳会的教师），政治部的成员有张翠、吴焕然、李特生等同志，并分别负责各支部的政治工作。总指挥部下分编五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一支队长周七（临川寺一带农民领袖），二支队长陈六武，三支队长黄彦文，四支队长王老汉，五支队长朱佐洲，独立大队长朱茂森。

入夜各支队接近县城，立即包围四门，按原计划主攻西门，指挥部就设在西门外约一百米远的大土堆后面。首先由一支队架起云梯，农民军争先恐后地登攀，谁知守敌早有准备（我们的情报有误差），到处扔下火把，并向城下的农民军连扔炸弹，排枪齐发，云梯上的农民军纷纷死伤坠下，虽然我们集中火力予以还击，但因我方枪少弹缺，攻势受到挫折。看到农民军死的死、伤的伤，我推开身边同志们的阻拦，提枪冲到城墙下，又发起了冲锋。支队长周七身先士卒，奋勇登上城墙时被敌人击中坠下，负了重伤。其他各城门的进攻亦无进展。眼看天将大明，为了保存实力，我即下令各支队向眉县方向转移。在我们到达眉县横水时，周至之敌尾追而来，还未开火，突又听到西进道路上响起激烈的枪声，我们陷入敌人前后夹击之中。横水地区南靠秦岭，北倚渭河，不利于防守，我们的武器又主要是梭镖马刀，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农民军全被打散：王老汉、陈其武带少数人退入南山；黄彦文撤回武功；我带少数人被迫北渡渭河，到了礼泉的史德镇。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就这样失败了。

暴动失败后，在史德镇我一面派吴焕然赴西安向省委汇报，一面召集秋步月、张翠、张百忍、朱佐洲等开会，研究决定：（一）继续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农运和军运工作，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周至由姬永安、李效乾、袁铭山和非党员王德宣（黄埔学生）负责；兴平由张含辉、张翠、张百忍、姬封西和朱佐洲负责；礼泉由秋步月负责；三原联络由吴焕然负责。（二）成立秋步月支队和张百忍独立大队。

会后我派李特生赴眉县鹦哥嘴和何思源策动当地民团起义。该民团团长的儿子叫刘涛，原是中山学院的学生，在他的协助下起义获得胜利。何思源任支队长，李特生任政委，共五十多人。他们把部队带出来进行了整顿，我们还动员了一些党、团员到该部，留在山区打游击。然后，我和李特生一起化装出山，

准备把陈其武、黄彦文、朱佐洲等部也拉到山里来，后来杨万青派骑兵连把我接去。他带着几千农民武装活动于西府地区，我们讨论了部队今后的出路和前途后，留下李特生、何思源、王维诚（扶风菊村人，上海大学学生）、白怀德在该部工作，我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这一阶段的情况。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省委认为：一是工作偏重上层，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部队；二是西府地区党的力量薄弱，开展工作的主观条件不足。最后省委决定西府地区由吴焕然负责，派我去渭北和黄子文开辟渭北地区游击战争。

开展渭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旬，省委召开渭北工作会议，决定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丁、抗债、抗捐，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分粮、分地、分财产，组织灾民开发游击战争，条件成熟时，建立苏维埃政府。

会后我到三原，向三原县委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县委派当地党员田裕国、张振何协助我，又派人送我到武字区见了黄子文。我和黄子文在孙平章家开会传达省委决议，决定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农运；立即掀起抗粮、抗款和武装暴动，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由黄子文负责武字区一带工作，并联系高陵王学道部（黄、王是同学，早有地下关系，当时王有部分武装）。由我赴陂西村联系王德修、李秉荣（当时王有五十多人，长、短枪三十余支），让他们尽快组织扩大武装；又到富平联系师守命、王志英、王克勤、宋光涛、刘铁山（刘树模）等，让他们在当地活动，恢复支部组织，发动群众斗争。

一九三〇年四月下旬，我由富平回武字区。正碰上三个差人催款打骂群众，我们就集合群众把这三个人杀死，扔到涝池，激发群众起来斗争。接着，我们在武字区开会，黄子文、李秉荣、张振何、田裕国等十多人参加。大家认为发动游击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迅速集中各地武装，建立统一的指挥中心。决定首先在武字区长坳堡和王德修部汇合。当天我去陂西，集合王德修和李秉荣部五六十人，第二天拂晓到达长坳。我又去大寨联系黄子文集合的武装。我们

在长坳活动了几天，打了几家土豪劣绅，筹了些经费，由三原县委转交省委。同时派人到高陵叫王学道部来长坳，我又去陕西将王德修部集合，当时王有病没来，我带李秉荣、张成义（外号刀客遂）和部队到长坳会师。王学道也没来，他叫赵宗甫带部队来。六月上旬三支部队会师，人约二百余，枪一百三十余支。

会师以后，省委派第伍伯昌（旬邑县人，参加过旬邑暴动）来了。根据省委指示，我们成立了地方党组织和部队组织，由黄子文和我分任书记。游击队的名称省委没有明确指示，我们决定先成立渭北游击总指挥部（以后有的写材料叫灾民自救军，当时一些标语口号下而也没有署名“灾民自救军”），由我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下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负责人王德修，政委李秉荣；第二支队负责人王学道（王始终没来），大队长赵乾甫；独立大队长田裕国，副队长张振何；独立二大队长刘铁山（一直在富平活动）。部队组建起来，我们就向大程镇、陕西一带游击。在大程镇处决了一个恶霸。七月耀县组织送来情报说卸任的宜君县长潘恩桐带警察十多名，经武字区去西安。我们在他必经的路上布置人拦截，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子弹若干，当晚将潘处决。接着攻进马牛村砸了区公所，给群众分了粮、物，并书写标语、土地大纲等。

我们的活动日益扩大，马鸿宾的部队和地主豪绅便联合起来“围剿”我们，土匪头子毕梅轩更是企图收缴我们的枪支壮大自己。因为我们枪支少，梭镖多，绝大多数人未受过军事训练，只有从长坳撤向大程镇一带。当我们走到瓦窑头法华洞时，与毕梅轩勾结的第一支队大队长张成义，主动要求安排部队吃饭、住地和警戒等事宜，我们没有注意。这时适逢省委王林前来巡视，我们在一个窑洞正向王林汇报时，张成义突然率众堵在窑门，一枪打死王笃，收缴了其他部队的一些枪，也下了我的枪，并准备打死我。我怕王林受害就说：“一切由我负责，这两位是朋友，让他们先走”。随后战士保护住我，方得脱险，部队却被打散了。我奔赴孙平章家把黄子文找来，安排我回省委汇报，武字区一带工作由黄子文恢复整顿，富平工作由师守命、王志英、刘铁山负责。

艰险的兵运工作

一九三〇年十月底，我回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在西安东九府街路南王林家

里开会，王是省委组织部长，除他以外还有吉国桢、焦维炽和我五、六人。决定派我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到上海第四天中午，中央来了四个人，我就把陕西党的组织和农运、军运、工运、学运、武装斗争等情况作了汇报。这四人，印象中有周恩来、康生。过了几天，又来了周恩来等两人指示了工作，让我去天津北方局联系一次（因陕西归北方局领导），给我一部书中密写有中央指示的《镜花缘》小说和一部分文件。到天津第三天，北方局李运昌和另一位同志来和我谈话，我将陕西的工作作了汇报。李说“中央已对陕西工作作了指示，你们按指示办，我们不再指示了。”只给了一封联络信，就让我回西安。

回到西安，我将文件交给了吉国桢。当时杨虎城的部队已经进关，监狱里的同志都出来了，我见到了潘自力、李艮等人。省委在粮道巷八号吉国桢的一个亲戚家开会，有吉国桢、李艮、焦维炽和我等参加。省委仍叫我负责军事工作，并设法打入十七路军。

我找到了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南汉宸，他要我先去省政府办的一个警察训练班，过渡一下。在南汉宸、米暂沉等人支持下，我在训练班考试时竟获得第一名，遂被委任为凤翔县公安局长。当时，在凤翔的共产党员很多，有孙作宾、吕剑人、杜松寿、刘味冬、徐梦周、史伯桥等人。一九三一年六月间，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教育厅长李范一来凤翔视察，反动县长密告后将我捕押到西安军法处。同在军法处被拘押的还有马济川、周平、王仁轩等人。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我给南汉宸写信后才获救出狱。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从监狱出来，省委仍叫我搞军事工作。因为吃住无着，又经南汉宸委我为陕西省府秘密视察员，月薪二百元。我就在莲寿坊八号租了后半院房子，我住在三间上房，以解决地下同志来往的食宿问题。房主人只有一个老婆和男、女两个孩子，三月上旬我去东府视察时，习仲勋和程建文说他们没有住处，更无法刻印文件，我就叫他住在我的房子里。房东的姑娘叫周凤鸣在女师上学，程就作周的工作，发展成为团员，这下就更利于工作。因为一九二七年省委秘书处就在这里被敌破坏而查封过，凤鸣之哥窥察他们的行动，十分怀疑。一天他们正在上房油印大量文件时，周某从窗外看见，立即抱起一大叠文件向外走，要去公安局报案。周凤鸣急执扎刀子一把，冲上去与其兄拼

命，拦阻他去报案。周母大惊失色，跑上去抱住他的儿子，并叫习、程赶紧外出，遂将文件烧毁了事。我回到西安，一进门老婆很恐慌地对我说：“陈先生，你房子住的那两个人是共产党”。我说：“不会”，老婆就把经过情况给我说了一遍。我说：“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莫名其妙，我和他哥是朋友，介绍来西安找工作的，他们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搪塞过去，不日我就搬往北教场三十二号。

一九三二年三月底或四月初，我代表省委去凤翔视察（公开身份“暗查政治”。当时王德修营扎凤翔，一九三〇年我们渭北打游击时，王是第一支队负责人。他收缴了许多人的枪支，成立了这个营。我召集该营地下支部的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吕剑人、张觉、陈策等同志，以游东湖公园为名开了一次会议。支部书记李特生谈了支部组织，王营官兵等情况。我根据六大精神和省委指示讲了国内外形势，士兵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大力发展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准备军事起义等。我们分析王德修绝不会同意起义，但必须对付好，以免破坏我们的工作；同时分析了王营，有两个连长言行反动，必须防范。会议决定起义成功后，应马上拉向旬邑、淳化以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并与陕北游击队联系。会议还推选习仲勋为支部书记。不久王营开往两当县，在一九三二年四月间，由习仲勋领导了“两当兵变”。

我回到西安后于四月下旬某天，在红埠街西头忽然碰见李特生，他很惊慌地对我说：“起义失败了，今天我同康若（即吕剑人）、许天杰在街上碰见王德修，他叫我们跟他走。我认为暴动时没有伤害他，他不会对我们下毒手的。可是越走情形越不对，我问他去哪里？王说是唐子封公馆（唐原是王的旅长），我就借故买东西逃走了，你赶快设法营救康若、天杰吧！”我立刻将李特生安置在北教场三十二号一个空房子里，即奔赴唐子封家打听情况。在唐家才知吕、许已被送往绥署军法处。

一九三二年五月，南汉宸用杨虎城名义，介绍我去甘肃行署（主任是邓宝珊）工作。经省委同意，到兰州后，即与孙作宾建立组织关系，书记是吴鸿宾，还有常黎夫、马济川、杨嘉瑞、张德生、周凯等。行署主任邓宝珊委派我为随营干部学校军官队区队长。李华峰是军事队队长，李特生、窦文德、苏冠英、

任士杰等同志都是班长，在部队内部秘密进行活动。当时，阎锡山送了一部分枪支弹药，部队于阳历八月十六日去平凉接枪。恰好省委派李艮、周志学来平凉策动部队起义后开往陕北。我们一起研究了起义的时间、地点、路线和部署，认为宜快不宜慢。结果因为情况变化，军士队单独拉出来了。李艮担任起义部队的政委，拉上部队朝东北突进。这样我的身份被暴露了，就辗转又回到西安。

一九三三年夏收前，我在西安会见了杨虎城，他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保卫委员会主任。他对我说：“现在成立民团组织准备叫你到千、陇、麟游去当民团指挥官。现在给你一百多支枪，你先到千阳去组编一个保卫团，你任团长，把千阳社会秩序整顿好。在三个月内你怎么办都可以，就是状子在我这里塞满，我也不管它，但必须在三个月内整顿好。现在你到保卫部找米暂沉（杨虎城办公室主任）具体办理”。

办完手续我去找小章（即袁岳栋，当时省委书记），向他汇报了杨虎城让我去千阳民团的情况，小章说：“千、陇地方很好，你去后要准备在千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我随后给你派干部”。党内又从各方面支持我，给我派了干部，弄了两挺轻机枪和一部分手榴弹。为了很快在千阳建立保卫团，我去兴平，在段成秀、史炳文、赵家璧的协助下组织起一百多人，还有两支短枪。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任致中跟我一块到千阳。李特生、李慕愚、张子敬是以后去的。当时根据人数只成立一个中队，我兼中队长，李慕愚来后由他担任此职，给李特生一个名誉分队长职务，因他是作党内工作的。任致中任书记官，张子敬去的时间不长就走了；同去的党员还有段成秀、史炳文、任士杰、李西平、冯宗周等。

一九三三年七月间建立临时西路特委，特委书记李特生，李慕愚和我任委员。李慕愚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对外联系。特委成立后，对内加强了对士兵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对外收编千阳各派反动武装，维持社会治安，同时准备和西府各县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如麟游的赵伯经等，争取得到支援。特委成立不久。我就带人去千阳县北七八十里的地方看过地形，并派任致中收编了县北张鸿钧的地方武装，编为第二中队。还准备收编李水娃的武装，编为第三中队，因工作没做好，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就举行暴动。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旬，省保卫委员会以杨虎城的名义发电报给我，要我速去西安。到西安在保卫委员会见了米暂沉，他从抽屉拿出特务告我是“共党分子、图谋军事暴动”的材料说：“你既来了，我不能放你走”，即叫通讯员把我送到绥靖公署军法处关押起来。经杨虎城指示，军法处长张依中主持审讯，从中保护，以无口供、证据而获释，但临时西路特委因此停止活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狱后，因省委被破坏接不上关系，遂由杨虎城任命我为西安绥署干部训练班教育副官兼军官补习大队长。九月间王超北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只许我与他发生单线关系。嗣后孙作宾回到西安，我也同孙建立了组织关系，除搞军事情报外，还推荐许多同志进入敌人内部工作。

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杨虎城任命我为黄龙山屯垦大队大队长（编制为两个团）。孙作宾曾来视察地下工作一次。六月间我赴西安公干。七月初，胡宗南的特务党彬乘机在洛川叛乱，幸我当天下午赶回洛川，党的阴谋败露只身潜逃。七月底，省府主席孙蔚如下令撤销屯垦大队待命整编。我即决定必要时将部队拉进陕北根据地，我派闵醒亚持我给中央的信赴延安请示。闵返回后说，张宗逊转达中央指示，因为统战关系，叫我绝对不能动，听候人家改编，然后长期隐蔽待机，争取带兵。屯垦大队遂被改编为三个营分拨出去。我在改编以前，先后送杨永昶、贾宗谦等十七人赴延安学习，参加革命。

（刘守琦、王少民整理）

*根据陈云樵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扶风县第一次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三〇年渭北游击战争的回忆》和一九八五年三月在省原十七路军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小组会上的发言等资料整理。

陈云樵（陈冠英、陈文秀）陕西兴平人，现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艰苦的地下斗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的陕西省地下斗争

陈子敬

一九二八年春陕西省委秘书处破坏，方鉴昭、徐九龄、王德安等同志被捕，省委大量文件落入敌手，情况非常危急。当时我还在蓝田县委负责宣传工作，省委通知要我赶赴西安。到西安劳武巷后见到省委秘书长刘继曾（化名老柳）、交通处主任景云和王爱玉，要我将一包文件带到三原，并参加三原县委的领导工作。那时我家里很穷，身上没有钱，看到刘继曾桌子抽屉里有一百多块银元，便要求拿一块作为盘费。刘很快按住我的手耐心地说，省委秘书处刚刚破坏，经费大部分被敌人搜去，省委建立新的机关还需要钱，我们只能暂时艰苦一下。说完他到伙房给我拿了两个冷馍，我把文件一包就上路了。

到三原县以后，我去民治小学找到周紫轩，把省委的信和文件给了他。经周介绍，我住在北城负复谦家的炮坊。我的老家也在蓝田县。汝清俊家在东渠岸，我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县委的工作。记得给省委写报告时大多使用牛奶或皂矾水密写，用火一烤字迹就显示出来了。我到三原时原县委书记张秉仁已经走了，县委工作主要由我们四人负责，也没有明确谁负责哪一方面的工作。就这样在三原工作了八、九个月。省委通知我回西安，表面在“四三”图书馆工作，实为省委建立一个秘密的联络点。这个图书馆的地址在文庙（即现在的碑林），是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厅长杨明轩创建的。图书馆的馆长叫林应智，也是蓝田人，与我是同学，他虽然不是党员，但政治表现进步。还有一个姓杨的妻兄和一个看门的，加上我共四个人。我以图书管理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记得经常来图书馆的省委负责人有王林（我们是同班同学）、贾拓夫。外县的党组织如派人找省委汇报工作，也是先到这里联系，接上头后我指点他到什么地方去找某人。

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南院门办了一个暑期党义研究班，有好几百人参加学习。主要是各中学的学生、各县小学教师，也还有一些是找工作的年轻人，男的女的都有。这个班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但从事教学的大都是一些进步人士：何寓础主讲社会科学，李敷仁主讲社会进化史，雷五斋主讲政治经济学。为了找到一个适当的社会职业，到外地去发展党组织，省委派我也到这个班学习。学习期满以后，我被派到洛川县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到洛川后我即一病不起，没有实现发展党组织的计划，又回到蓝田老家养病。

一九三一年夏，李廉成在西安办了一个公路人员养成班，地址在南四府街，共分司机、修理、测绘和公路管理人员四个班。戴子美在这里当管理员，他和李廉成等都很进步。省委通知我来西安。白耀庭在西安一中上学，不少来西安的党员都在他那里接头。经白接上关系后我见到李良，他通知我去公路人员养成班学习，借机谋个正式的社会职业，也好在一些交通要道上为省委建立联络点。到养成班后我被分到公路管理人员班学习，这个班主要培养汽车站站长等人员。班内党员不少，记得有王力、陈志正等同志，但互相不发生横的关系，我还发现有些同志秘密传阅党内文件。

学习期间，组织上交给我一项与张子刚接头联系的任务。张子刚是商县人，在上海工作过，后在商县那个学校当过校长，他的组织关系在省委。杨虎城的部队进关时，把盘踞商洛的地方部队编为一个联军，唐景为司令。该部在西安青年会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事处，任命张子刚为办事处主任。这支部队是由一些零散的农民武装改编的，成分非常复杂，里面散兵游勇不少，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矛盾很深。因此省委派人在该部积极开展工作，准备拉出一部分武装成立红军，如果兵暴成功，就让我当该部的政治部主任。我们还积极作上层人物的工作。为此我与张子刚经常研究如何开展兵运等工作。为了限制唐景部队的活动，国民党在商县又收编了一些民团，任命蓝田人张子厚（原冯玉祥部的军官）为团长，魏敬伯为副团长。我就和张子刚给唐景写了密信，告知该团系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弱，建议尽早吃掉该部，免留后患。这一仗打得很利索，张、魏二人翻墙逃跑。为此事国民党省政府将张子刚逮捕，李良很快通知我设法营

救。公路人员养成班有个姓郭的代课老师，是杨虎城部的军需处长，很有魄力，我即请求这位老师说情，并找东大街印字馆的掌柜作保把张子刚营救出来。不料张子刚出来，省政府枪毙张的公文也下来了，具保的印字馆找我要人。张子刚已经转移到外地，我即被抓起来押到粉巷警察局，第二天又转押到军法处。这里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很多，有周士第、陈云樵、马济川、马子明、何寓础、黎民觉等人。在军法处我被打了几百军棍，但坚不承认有组织关系。后来我父亲拿了二百块银元，通过军法处的李介仁给军法主任说情，在关押八个月后被放了出来。黎民觉也在此前后被释放出狱。

一九三二年初我出狱后，曾将黎民觉等同志在狱中的表现向省委作了汇报。这时，安康绥靖军司令张飞生来到西安开会，意在物色军事参谋人才。经人介绍张认为黎民觉是西北的青年将校，军官学校出身，便邀黎去安康为其参赞军事，担任绥靖军参谋长。后因原参谋长系张的老同学，不便向其开口，委黎为副官长兼炮兵营长，掌握一部分军事实权。四月底，我受省委的派遣随黎民觉一起到了安康。因我没有社会职业，就住在黎民觉的炮兵营，由黎掩护。

我到安康时，李茂堂已到安康一个多月。随李到安康的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李启昭（党员，有线电报报务员），一位叫白哲生（团员，在安康上学）。当时，李茂堂还在接安康电报局前任局长李非凡的手续。他要我到石泉去做韩子芳团的工作，还把狗大王的参谋长蒋翔南介绍给我，说蒋是党员。梁布鲁到安康比李茂堂还早一点，他是杨虎城总部派去张飞生部的无线电队的报务员。李、梁二人经常接触，我去后我们自然到了一块。五月初，我们组织了安康特委，李是书记，我负责组织。我去安康时，省委指示：安康军阀割据，不断混战，苛捐杂税严重，老百姓很反感，如果能从军队中拉出一些人，就能给群众带来很大的影响。成立特委后，主要是做军队工作。袁作舟、詹屏藩、王泰诚都是我们去后发展的党员。

一九三二年冬，红三军（贺龙部队）经过安康，我们派李玉田装扮成邮电工人，挂了一盘铁丝，装着修电话线，打算去给贺总送情报。当时张飞生正带部队向旬阳、白河走。李玉田被敌人发现扣押了。我和李茂堂迅速通知黎民觉设法营救后被放回。张飞生回安康，发现有共产党的标语传单，当即搜查了电

报局，逮捕了李茂堂，也经黎民党营救才放出来。李茂堂出狱后，陕南特委派咎玉祥到安康与我们商量陕南特委与安康的联系等问题。我和李茂堂密往汉中，向陕南特委书记杨珊汇报，研究另派同志去安康，将安康地区归陕南特委管辖。

我与李茂堂在汉中分手，他先回西安，我去石泉，后又回西安向省委汇报情况。省委批准撤销安康特委，又派我和张明远（张赫）回石泉韩子芳团做兵运工作。接着省委又派马子明（米脂人）来石泉。敌省特务机关电告韩子芳要他捕押我们解省。韩即通知我们暂时离开石泉。我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又回石泉，同来者还有进步青年胡景铭，他先去安康。腊月十六日，我也到了安康，住在黎民觉家。黎以小船送我去白河，表面上经黎民觉介绍到白河税务局窦自强处谋事。刚落脚，正月初二，收到省委贾拓夫的电报，说：“你父亲去世，请速回！”我即经商洛，步行七天回到省委，见到了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贾拓夫。命我背一匹布（内是秘密文件）去汉中，见到了特委杨珊和秘书咎玉祥，派我去镇巴联络红四方面军，没有过得去。特委又派我去勉县负责接高维翰继任书记。六月从勉县回来后，李茂堂也到汉中。此时，杨珊和我及李茂堂商量，派王辛德去安康工作。

*根据陈子敬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

陈子敬，又名陈靖波，陕西蓝田人，建国后曾任咸阳市政协常委。

两年艰苦斗争的回忆

陈子敬

一九三三年四月，我与李自靖（李茂堂）、张继华、曹受祉等人由汉中东关出发到安康，交代了陕南特委布置的工作后，又与李自靖、张继华、柳纪生等一起回到西安。李自靖家住书院门34号，我在东大街竞芳药房借宿。这个药房是蓝田胡子恒老先生创办的，胡先生医道高明，中西兼长，在社会上很有名望。我们在这里吃住，他都不计较。药房前面理事的是胡明伦的哥哥胡明孝和屈永毅，他们都是蓝田孟村人，我下一级的同学。胡、屈二人当时虽不是党员，但倾向革命，政治上比较进步，因此这个药房实际上成了党的一个活动据点，省委负责同志孟用潜（化名曹长青）、袁岳栋（化名小章）、杜衡、贾拓夫等经常到此与各地党员接头，布置工作任务。

回西安以后，小章、贾拓夫到药房对我说：“蒲城自焦维炽组织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你去设法了解情况，接通关系，如果条件成熟可以组织该县游击队。”我化装成一个老汉，戴顶烂草帽，到蒲城探听消息。在蒲城听一些人讲，焦维炽同志于暴动失败后，被敌人俘虏挖去双眼，仍宁死不屈，光荣牺牲。失散的党员大多逃脱在外，无法接通关系。于是，我又从临潼过河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情况。这时红二十六军南下进入渭华一带，小章、贾拓夫又派我通知蓝田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配合红二十六军南下。我到蓝田东街小学找到该校教员李惠轩，李是县委负责人，向他交代了省委指示和任务后，回到我的家乡焦岱、汤峪一带，准备组织青年参军，迎接红二十六军。不料红二十六军南下后很快被杨虎城的部队和郑孝仁等地方民团打败。我在家时还看到几个被缴械的战士路过焦岱，他们面容憔悴，衣服上子弹袋的印子非常明显。我向他们指了指北上的道路，并叫他们把衣服洗干净，以免

路上发生意外。此时，我听说杜衡和高维翰各带三把短枪曾在汤峪学校停了一两天。这一阶段我们还组织党员，截收过郑孝仁从西安购买的武器弹药。

我从蓝田回到西安，仍住在竞芳药房。该药房设在东大街案板街口，对面是福盛楼饭馆，饭馆一个门朝东大街，一个门朝三意社。过了没几天，一天下午约两、三点钟时，我们在药房听到街上打了几枪，当时也没在意。第二天咎玉祥来药房找我说：小章、杜衡、贾拓夫、高麻子在福盛楼开会被特务发现，小章和杜衡被捕，贾、高顺骡马市向南跑了，敌人没撵上，朝天空开了几枪，并让我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咎玉祥又来告诉我说贾拓夫将一支枪卖了，作为川资，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去了，并问我西安的党组织咋办？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年少气盛，天不怕地不怕，怎能坐看组织垮台呢？我便对咎说：“拓夫去了，我们不能没有组织，我给咱暂时负责，你召集人，咱们把摊子收拾起来继续干。”那时胡明伦在西安高中上学，是个共青团员，我委托他把青年团的工作搞起来。当时我们还有一些文件，有一架油印机交由咎玉祥负责管理。从此以后，我们就分头联络党、团员开展工作。咎玉祥开始把我领到胡振家家里，他家是旗人，上房五间，里而还敬献着皇帝的御棍。胡在陕南赵寿山部工作时，任上尉参谋，我们也有过来往。咎玉祥还把余海丰领来，还将一个叫小王的女同志领来，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后来咎玉祥把我领到雷神庙街，在一个坐西朝东的小门楼门口和孙作宾见了面。我们在胡家开了三、四次会。胡明伦也联系了一些共青团员，开过几次会。这样我们党、团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活动。我们曾计划把东路地区的党组织恢复起来，再设法与陕南党组织取得联系。有一天甘肃来了一个姓刘的同志，因为双方都有戒心，没有多谈就分手了。

我们只活动了两、三个月，一个自称王泰吉派来的人到竞芳药房，说他给新省委带来了一百块钱，有要事找负责同志，不见不说，临走时留话说他住在涝巷一个小店里。我有些怀疑，便与胡明伦商量由他接待，约定如果不能按时回来就说明出了问题。胡走后，我迅速把文件收拾起来，包成药包形状，站在竞芳药房对面的隐蔽处等候。这次联络果然失约，接着就传出胡明伦被捕的消息。这时我的处境更困难了，经常同特务捉迷藏似的打转转。一天下午，我行

至安居巷时，忽然碰到李自靖，李将我领到他家告诉我说：他从安康回来以后，省委派他到红二十六军中工作，他随部队南下至灞桥时，因为不习惯部队生活回了西安，受到省委的批评，后来到了上海。这次中央听说省委被破坏，让他回来找关系进行联络。我将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和恢复组织的活动向他谈后，李提出：“目前环境险恶，你的身份已经暴露，暂时不宜留在西安，可与我一起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动身了。

到上海以后，我们白天不能活动，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偷偷看文件，向中央写自己的简历，写材料汇报陕西地下党的情况。过了一个阶段，我们又与中央交通失去了联系，断绝了经济来源。只好搭车到郑州，找到我中学时期的同学徐宗乐，他当时在郑州电报局工作，经介绍我们住在郑州裴昌庙街三十四号他表哥叶新甫家里。叶原是二军军长岳维俊的马弁，二军失败以后，他在豫南一带自称团长、旅长，占山为王，后来又贩大烟发了财，这个人江湖义气很浓，还听说叶在豫南压了不少枪，可以装备一个团。我们就给叶做工作，促其在豫南拉队伍当红军。叶当时思想很模糊，只想学别廷芳之流划地为牢，称雄一方。时隔不久，我与李自靖写信与中央取得联系，李自靖去上海。大约又停了一月左右，李来信约我去南京，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将各方面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时间不长，我又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因无钱生活又回到郑州。过了一个时期，我们与中央取得联系，中央调我到长江局军委工作，军委书记叫张益三。那时刘顺元也在长江局工作，经常约我接头，叫我背诵法大马路的门牌号数，熟悉地理情况，甚至连某一幢楼房有多少楼梯，几分钟可以跑下来都要准确计算，以便瞅机会枪杀叛徒特务。

一九三三年冬，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和我回陕工作。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可以把重点放在陕南。我们从潼关下火车经蓝田，取道子午镇入山，再经宁陕、石泉、洋县、城固至勉县武侯祠张汉民团，与在该团工作的共产党员汪锋、魏书林、阎揆要、刘光智、史唯然等见了面。刘顺元派我担任了宁陕、勉县两县游击队的指导员，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恶霸的斗争。后因与孙蔚如部高参宋树藩相遇，他向张汉民追究此事，我便再次离开陕南到上海。

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刚出门，看见拓夫在旅客牌下面查名字，我估计他肯定是找我来了，从后面一下扑上去抱住他，他回头一看是我，我们都激动得不得了。虽然分别只有半年时间，但陕西党组织已遭到极大破坏，关中地区几乎完全塌台，多少共产党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更多的党员身陷囹圄。同时也有一些党员甚至省委负责人充当了敌人的爪牙和帮凶。在这个时候能够相遇，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拓夫告诉我，听说我到了上海，他已经找过多次了，前一阶段中央决定叫他到福建去参加闽变，但因这一事变很快被蒋介石镇压下去而未能成行，现在又决定他去中央苏区。不久我接到中央通知，决定派我到豫南利用叶新甫的关系建立鄂豫陕抗日同盟军，同时告诉我将从北京派一个叫段佛摩的同志配合工作。段原来打过游击，他父亲曾担任过段祺瑞部下的旅长，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临走时，中央给了我一瓶密写药水，约定与沪西医院一个护士通信联系。我到郑州以后，在徐宗乐家与段佛摩接上了关系，共同做叶新甫的工作。不料特务褚龙吟（陕西富平人）已经将我从南京跟到郑州，在我与段起身去豫南行至新郑县时被逮捕。叶新甫、徐宗乐等人也被捕，押到开封秘密监狱。李自靖不知在哪里被捕，也于此时解押到开封监狱。在这里，原陕西省委负责人、叛徒高维翰和我对质。该高是长安县人，一九二七年与潘自力等人由苏联回国时是我接待的，一九三四年春我去担任宁勉两县游击队指导员，也是接替他的工作。在叛徒的指证之下，我们被判刑押到南京监狱，又遇见原长江局军委书记张益三、华侨江楚等人，从此我们又开展了更加艰苦的狱中斗争。

（王少民整理）

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被破坏情况*

薛和昉

一九三三年阴历三月我从韩城被调至省委，派我到西安市委任组织部长，宁耀峰任市委书记，这时宁还是私立中学的学生。省委组织部长程建文似乎怕我对工作安排有情绪，对我说：“宁虽然刚从学校出来，他的魄力比你强，因此由他担任书记。”我们临时租下的房间是端履门四十一号，当时市委只有宁和我两个人，实际上只做了些筹备工作，在南城墙上和西大街某一个巷子内召开过活动分子会，还散发过传单，在电线上挂红旗。可是各基层的组织关系仍由省委直接联系，尚未正式转到市委。这时同我们接头最多的就是程建文。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省委调我做省委发行部的工作，住在师范路东的一个巷子内。阴历四月底，省委又调我做技术处工作（即刻印文件和宣传品），机关住在甜水井门牌四十八号，这时我就同外界隔离。同宁耀峰有时也见面，但机会不多。

省委遭到大破坏的起因：省委组织部长程建文一九三三年约在阴历四月间被捕（贾拓夫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时对我讲过）。程建文被捕后被国民党送到南京，陈果夫亲自接见后，程叛变了，带着特务来西安抓人，有时在路上暗处等人。一九三三年阴历六月十四日，袁岳栋（即小章，代理省委书记）、杜衡（红二十六军政委）、高岗（红二十六军负责人之一）、贾拓夫（省委宣传部长）四人在东大街福盛楼饭店开会，一面吃饭，一面开会，忽然听见楼下有吹哨子声，到楼口一看，楼被特务包围了，四人立即下楼朝外冲，高、贾脱险，袁、杜二人被捕。杜衡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党的地下组织凡他所知道的全部向敌人告密。从此省、市地下党的组织遭到大破坏。（以上东大街开会情况是贾拓夫当天下午二时来我住的机关讲的；杜衡叛变，是袁岳栋在狱中对我讲的。）我

的被捕，就是因杜衡叛变。同我一起住机关的两位女同志（周凤鸣，程建文的爱人；任雪琴，刘子毅的爱人），由我按贾拓夫的嘱咐搬到新住址咸宁学巷十一号。阴历六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我去两女同志新住处送生活费时，正碰上敌人在那里等人而被捕的。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根据薛和昉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写的材料节录整理。薛和昉，建国后曾任甘肃省中医学院院长等职，一九八三年已故。

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破坏后简况*

宁耀峰

一九三三年我任西安市委书记。省委破坏后一天晚上，我与贾拓夫、刘宗沛等在大保吉巷（也可能是南四府街一带）一同志家开会，研究他们去中央汇报陕西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确定我在六、七天内向咎玉祥交清关系后，到渭北某县（当时还未给我说是哪一县）工作。当晚我就住在这里，和咎玉祥约定第二天在东大街青年会开会。第二天我坐洋车行至西大街时被敌人逮捕，带至国民党省党部。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根据宁耀峰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写的材料摘录整理。

宁耀峰，又名宁慎言，韩城县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处长，已故。

一九三三年陕西省委点滴*

樊 德 音

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我担任韩城县委书记。后因敌人搜捕，在县上无法立足，遂转移到西安，留在省委搞宣传工作。这期间曾调韩城段绳祖担任省委交通，薛和昉、杨有章等不久也调到西安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省委派我担任蒲城县委书记，因发动群众举行万宝山事件纪念活动，引起敌人注意，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我又逃回西安。一九三三年省委派我去旬邑、石门红二十六军中巡视工作，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不久，又徒步入陕南，至南郑巡视工作，同杨有章接上关系，派杨打入敌王汉谟旅内，相机拉队伍。后因社衡、小章等在西安叛变，省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又回到西安，与杨声、李冲霄等组织新省委。新省委成立不久，因工作不慎，我被敌人逮捕。

（姚文琦、王少民整理）

*根据樊德音一九五九年四月四日的回忆材料摘录整理。

樊德音，韩城县芝川人，建国后曾在蒲城县五中教书，已故。

一九三三年陕西临时省委片断*

雷 振 东

一九三三年农历六月中旬，澄城张鼎安和我及另外两个人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工作。到西安后就听说省委遭到破坏，杜衡等叛变革命。随后张鼎安对我说，省委决定将我和他留在西安工作，他暂时负责联系党省委的工作，让我负责联系团省委的工作。大约在农历六月末七月初，贾拓夫和刘宗沛二人离开了西安，据说是去上海找中央。

农历七月上、中旬，杨声、李冲霄、樊德音等相继回到西安，和张鼎安等人组成党的临时省委，杨声任书记。接着史克寿、邢崇道也回到西安，和我组成了共青团临时省委，我作书记。到农历七月下旬左右，张鼎安被敌逮捕。八月中旬，杨声、李冲霄、樊德音、史克寿、邢崇道和我也被敌逮捕。这样临时省委成立一月就遭破坏。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根据雷振东一九六九年写的材料摘录整理。

雷振东又名雷致远，澄城县人，建国后曾在陕西省农业银行等单位工作，已逝世。

陕西地下党组织的斗争没有中断*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陕西临时省委的回顾

孙作宾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夏季，在陕西省委领导下，成立了甘宁青特委。吴鸿宾任特委书记，常黎夫任秘书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长，马豫章任组织部长。我当时在甘肃搞地下工作，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初，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当时斗争任务的需要，在原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组成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学生运动。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交，甘肃西北抗日义勇军经过筹备正式成立，王儒林任司令，甘宁青特委派李慕愚去担任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引起敌人的重视，曾派三省敌军和马家骑兵围击，形势十分险恶。为了加强领导，我也赶赴靖远县与其联系，经过多次与敌战斗，不幸在红沙峒一战中，不少义勇军战士牺牲，我和李慕愚被俘。由于我们没有承认自己是军事犯，没有暴露身份，经党内外同志营救被释放出来。我便离开甘肃回到西安，向省委贾拓夫、杜衡报告了甘宁青特委工作开展情况，以及自己返回陕西的原因。当时拓夫是陕西省委的代理军委书记，让我也在省委领导下参与负责兵运工作。

七月，省委负责同志在西安召集会议讨论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杜衡等被捕叛变，拓夫等逃出西安。由于杜衡叛变出卖了组织，省委一些文件被敌人抢走，省委其他负责人又相继被捕，省、县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霎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关中。

八月，原省委一位工作人员陈子敬找我，说他要到上海找中央，并说，现在省委被破坏了，你刚从甘肃回来，人们还不知道，你又有孙蔚如（杨虎城部队三十八军军长）的关系，掩护条件好，你可以先搞个临时组织活动，并将省

委的一架油印机和仅有的档案文件交给我保存。当时，我非常谨慎地把省委的文件和油印机隐藏起来，以备省委恢复工作后用。接着我打听到原省委发行部部长余海丰在长安家中，崔廷儒（又名景岳）刚从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回西安联络同志，胡振家也在西安，我便找他们一起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形势多么险恶，都要坚定信心，要共同抱着：收拾残局、联络同志、积蓄力量、盼望中央、配合红军和支援苏区的宗旨，来开展革命活动。崔廷儒向我们介绍了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率部转战到照金。九月底，在西安红埠街胡振家的家中开会，成立了陕西地下临时省委。商定余海丰任书记，崔廷儒任秘书长，胡振家任军事委员，咎玉祥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刘惠芳（刘雪琴）任秘书。我们主要在杨虎城部队及地方民团中活动，任务是发展组织，抓武装，搞兵运。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临时省委秘密组建了一支地下武装——特别工作队（以下简称特工队）。特工队的任务是：采取各种形式，宣传、联络革命群众，发展党组织，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款，捕杀敌特、叛徒，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待条件成熟后，在秦岭山区建立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特工队由崔廷儒、胡振家领导；赵成璧任队长，李鼎九、杨嘉瑞任副队长。一九三三年底，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后，原在该部担任支队长的谈国帆和任第二特务队队长的张忠信等，从陕甘苏区照金根据地秘密返回西安（长安），与特工队的赵成璧、李鼎九接上了关系。特工队的几位负责人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临潼等地建立了一批活动据点，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地下武装力量。崔廷儒等对这支武装力量的组建和武装斗争的开展倾注了全部心血。他还根据斗争的需要，多次与特工队的同志们一道奔赴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兴平、礼泉、乾县等地开展斗争。曾在长安、户县沿终南山一带收缴了子午、甘河乡镇公所的枪枝；摧毁过六、七处伪乡镇政权；一九三六年秋还在户县秦镇策反了一连伪军哗变，收缴长、短枪近百枝。崔廷儒和赵成璧、李鼎九等还带领三十多名特工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到户县大王镇北的吕家庄，以给军队号房为名驻进一家地主庄院，至傍晚顺利地收缴了地主民团武装长、短枪多枝，遂后化整为零，安全撤退。此外，特工队在崔廷儒直接领导下，捕杀了危

害革命的叛特分子李天祥、丁云川，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与此同时，赵伯经在麟游县也组织了民团中的一批党员，建立了一支地下武装，不断寻机活动，在当地颇有影响。旬邑民团中的马志超也组织了一些党员，控制了部分民团力量，在当地不断活动，打击敌人。刘庚一直在临潼一带坚持活动，从未间断。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余海丰到西安北大街中山中学附近的小公园与一名学生接头布置开展学运工作时被捕。得知消息后，胡振家离开西安，隐藏在三原耿志杰的部队里。晷玉祥去别的地方活动。临时省委就剩下我和崔廷儒两人，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们两人只好分别到长安、临潼、三原、渭南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党的基层组织的恢复和建立。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关中各地党组织尚未完全恢复，急需到各地广泛联络，尽快恢复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崔廷儒与我多次商量，决定由崔廷儒先到三原县找周紫轩，再转赴临潼交口镇和谈国帆接头。崔廷儒和谈国帆见面后商定，首先分别在西安二府园三号李焕卿处（这里是十七路军参谋长王一山公馆）、临潼县栎阳镇杨宜汉家、交口镇谈国帆家，建立活动联络据点。其次，由两人共同对渭北还在分散活动的党员逐个进行联络。经过他们二人的艰苦工作，党员间开始有了联系。崔廷儒对渭北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后，又返回西安参加西安中心市委成立会议。

一九三四年春，魏光波来西安与我和崔廷儒接上关系。经研究，在西安盐店街西北转运栈召开了会议，会上由我做了组织工作报告，讨论了陕西的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临时省委成立后虽然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由于遭到敌特破坏，已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西安中心市委，以代行陕西省委的工作，领导全省斗争。魏光波任书记，崔廷儒任军委书记。中心市委还有苗建乎、严克伦。在这之前敌人已对我下了通缉令，到处搜捕，我只好在中心市委组建起后，通过孙蔚如的关系，秘密转赴汉中。

我到汉中后，汉中特委李杰夫（高维翰）对我说，吴鸿宾、汪锋已离开汉中，张德生、白耀卿仍在汉中特委工作。派我负责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嗣后，李杰夫到上海，就由张德生与我接头。这时中心市委在西安活动极端困难，敌人跟踪搜捕崔廷儒扑了空时，便将严克伦以掩护崔的嫌疑分子

逮捕，但查无实据，只好释放。

为了安全起见，一九三四年秋，崔廷儒来汉中与我联系。我和张德生研究，派崔廷儒到十七路军张汉民团负责地下党的工作。张汉民团有党、团员二百多人，团长张汉民是党员；营、连、班的各级干部中不少都是党员。因此，在革命受挫，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不少党员为躲避敌特追捕便来这里隐蔽。这个团当时曾被誉为“党的干部仓库”。不久，特委决定张德生去四方面军联系扩大陕、甘、川苏区工作，我通过孙蔚如三十八军密探队（党员）唐益民把张德生护送到苏区边界四方面军中。汉中特委只留下白耀卿一个人，我仍负责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以后，白耀卿被捕，在未审讯前，他设法逃了出来。我又通过唐益民把他护送到四方面军。白耀卿走时，让我负责汉中特委工作，并介绍了杨永昶、肖佩芳、朱曼青、李裁缝等的关系。

一九三四年冬，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孙蔚如怕共产党在城内搞里应外合，强迫我即刻离开汉中。我离开时，将汉中特委的军队工作交给了成之慎，将地方工作交给了杨永昶。返回西安后，见到姜旭，得知魏光波被捕，刘秀珍去了上海，王好勤等人进了苏区。不久，姜旭给我介绍了王超北、阎揆要、张性初等同志。姜旭与李萍、黄培兰等十多人，后来带上阎揆要亲自送来的一箱弹药、枪枝、药品等进了苏区。

一九三五年春末，十七路军将张汉民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并命令张汉民带领全旅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尾追。张汉民以“尾追”为名，行掩护之实，并曾数次派代表与红二十五军联络。同年初夏，张汉民在“尾追”红二十五军的行军途中，崔廷儒因脚被竹子刺成重伤，行动艰难而掉队。当两军行至柞水县九间房时，张汉民以为要和红二十五军会师了，不料就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却缴了警备第三旅的枪，张汉民和许多共产党员、团员被红二十五军误杀。从而，使陕西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期保护下来的一批党员干部，再次遭到严重损失。“九间房事件”发生后，十七路军总部将张汉民旅的遗留人员，改编为特务第二团，由地下党员阎揆要任团长，崔廷儒返回西安。

崔廷儒从柞水县九间房返回西安不久，即去临潼县交口镇，当他从谈国帆处了解到一年来渭北工作在周紫轩、谈国帆、黄子祥、孙一君等的努力下有了

显著进展后，心情十分愉快。此时周紫轩建议：大革命时期渭北曾建立过渭北工委^①，现在党员间都通了气，有了联系，应当重新建立渭北工委，统一领导党组织的活动，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党的工作。崔廷儒非常赞同这个建议，并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经过磋商研究，一九三五年六月间在临潼交口镇谈国帆的家中正式成立了渭北工作委员会。由周紫轩任书记兼组织部长，黄子祥任军事部长，孙一君任宣传部长，谈国帆任统战部长。渭北工委成立后，很快组建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武装力量，对推动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三五年盛夏，王超北转来了党中央关于反蒋抗日的指示信。不多日子，王超北又给我和崔廷儒介绍了高克林，说高是上海来的。崔廷儒和我以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大有希望，心情颇为愉快！高克林问及崔廷儒和我的组织名义是什么？我们就如实地对高克林说：一九三三年七月陕西省委被敌特破坏后，曾先后组织过临时省委、西安中心市委开展党的工作，均遭到敌人破坏，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继续进行活动，基层组织还以为临时省委存在着。高克林提议说，没有一个正式党的领导机关是不行的，咱们再建立一个临时省委，看怎么样？经商定，高克林任书记，崔廷儒任秘书长，我任组织部长，肖佩芳任秘书，住机关。临时省委就这样又成立起来，领导着各地党的基层组织，继续不断地开展着革命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临时省委得知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苏区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为了早日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接受中央领导，崔廷儒和我商定，派谈国帆尽速赴陕北苏区找党中央联系。与此同时，崔廷儒和我分别到陕西省监狱探望了被押的赵伯平、吕剑人，并转告他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希望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吕剑人说，他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叫张为琨的朋友，其弟张庚良乾县北乡人，有几十条枪，在西路有一定影响。不久，组织就派张涛前往与其联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谈国帆在关中特委武装交通队队长黄罗斌等的护送下，顺利地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汇报了工作情况，参加了党中央正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还亲切地接见了谈国帆。接着，中央将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其他有关抗日的文件，交谈国帆带回西安。临时省委收到中央文件后，如获至宝，认真学习；崔廷儒还派严克伦、聂延玲、龙凤伍等同志将这些文件秘密刻印，并以各种渠道和方式，散发给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手中去。谈国帆也带上这些文件，先后分发给三原、泾阳、临潼、渭南、高陵等县的党组织或党的同情分子手中。使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较为广泛、深入的宣传，进一步扩大了党在白区的政治影响。

与此同时，在崔廷儒的参与领导下，渭北工委经过严密组织，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护送刘少奇等经三原、临潼栌杨镇，在新丰乘火车赴华北去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艰巨任务。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不断扩大和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杨虎城恳望能够和党以及红军建立关系。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杨虎城就指派杜斌丞通过原甘宁青特委组织部长马豫章与临时省委联系。我见了杜斌丞，杜说：“杨先生要找地下党负责人面谈，衷心希望能给共产党中央毛主席传话，说他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我表示欢迎，但又只好说让我们请示后再定。杜又急切地说：“那怎么行？杨先生要快些找地下党负责人亲自面谈他的主张！”临时省委对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认为事关重大，便决定派崔廷儒即速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杨虎城的建议和西安地下党工作的情况，听取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二月，崔廷儒日夜兼程，奔赴苏区，当他进入小关中时，恰好和党中央南下工作代表团成员贾拓夫、鲁贲、张德生等相遇。崔廷儒就向他们谈了自己到苏区的任务。党中央南下代表团表示，此事由他们负责向党中央汇报，叫崔廷儒带上党中央南下代表团给临时省委的密写信件，迅速返回西安。可是由于密写技术不高，字迹十分模糊，一句话也连贯不起来。我便把派人赴苏区请示和密写信件字迹难以辨认等情况，全部告诉杜斌丞，还请他阅读了党中央关于反蒋抗日的指示信，殷切希望杜将指示信的内容转告给杨虎城，希望能够按照我们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多做工作。杜很高兴，但仍坚持让我们去会见杨虎城。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失去了一次同杨见面做工作的良机，这

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憾事。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西安学生中的两名党员被捕，学生中的地下党组织又被敌特破坏。接着，负责西安地下党学生工作，并同临时省委高克林直接发生关系的姚权（姚仁夫，韩城人）也被捕自首，致使各校学生党员与进步学生数十人被捕或被传讯，西安师范的张尚杰、常其亚、李进宽、申道达、靳恒洲被捕，临时省委面临暴露的可能。高克林和我商量，决定我俩立即设法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临时省委的全盘工作，由崔廷儒负责。正好这时杜斌丞又说，孙蔚如也建议要求同红军双方互不侵犯。我就去找孙蔚如面谈，并让他能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封信。孙蔚如说，过去我给张国焘写的信，被张在小报上公布了出来，蒋介石知道了，几乎把我整死，我再不写信了。后来，他还是坚持让我口头捎话给党中央。

此时东北军与红军在陕北前线处于停战状态，并有代表来往。我和高克林通过东北军刘多荃师长的关系，由红军代表刘向三作向导，顺利地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到保安后，我们见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向他汇报了临时省委与基层党组织的情况。罗迈问，你们在西安是什么名义，谁负责？我说是陕西临时省委名义，高克林任书记，崔廷儒任秘书长，我负责组织工作。汇报后，我见到李克农，一见面他就说：“多次捎话让你来中央（陕北苏区），听说你不愿意来？”我立即回答说，这是谎报军情，我们盼党中央都快盼疯了，只是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接替我的工作。在谈话中，我提出要留下到红军大学学习；要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杨虎城、孙蔚如愿与红军互不侵犯的建议，以及下面要求兵变等问题。李克农对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可以见，但谈话时间不能太长。组织工作给罗迈讲，杨虎城、孙蔚如的事给毛主席汇报，兵变等军事工作情况给周副主席汇报。

在保安的石窑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他热情地招待我抽前门烟时说，同志们在西安搞地下工作辛苦了。接着就详细地询问西安各方面的情况，我感到特别亲切温暖，心情十分畅快，像回到家一样。我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切情况。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意写信的原因时，主席说，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并答应他给孙蔚如写回信。谈话

中，毛主席询问杨虎城家庭财产状况时，我回答不清楚；主席又说，你与孙蔚如是同村，又是一家子，孙蔚如的财产状况知道吗？我尴尬地说，我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也说不上来。

第二天，我向周副主席汇报军事情况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取我汇报的一切，并询问得非常仔细。当我汇报阎揆要的特二团干部、士兵要搞兵变，并对阎揆要不让他们唱进步歌曲有意见，说阎揆要胆子小时，周副主席一下子站了起来，严肃地说，绝对不能把白军当成红军搞，要那样搞，阎揆要还怎么当团长呢？搞兵变、抓几条枪、多几个人好呢？还是搭个桥好？我看，还是搭个桥好。周副主席的一席话，解开了我多年搞兵变的疙瘩，自己心里一下子豁亮了。最后，周副主席又问：“电台你们是否掌握？”我回答：“电台在我们手中。”周副主席说：“好，中央马上派机要人员去阎揆要特二团，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

在保安停留的日子里，我直接听了毛主席在红军大学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毛主席的报告通俗易懂，逻辑性强，论证精辟、透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隔五十多年，依然记忆犹新，亲切的话音难以忘却。接着，中央决定我留下在中央担任交通员工作。

一九三六年秋，我携带着《中国共产党告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给孙蔚如的复信等党的文件，返回西安。这时，党中央已提前半个多月派汪锋到西安开展工作。

我回西安不久，崔廷儒派谈国帆到西安东大街西北大旅社接通关系，协助一位同志，乘坐东北军开往洛川的军用汽车，为党中央接待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把在西安采购的一皮箱物资，安全运送到保安。谈国帆到保安后，再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张浩等，汇报了渭北工委的工作开展情况，聆听了周恩来关于要千方百计地建设好陕北苏区通往关中、西安的交通线问题的重要指示。

根据党中央关于牵制蒋介石围攻陕甘苏区、支援反“围剿”中的红军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六月吕剑人出狱，我和崔廷儒研究后即派吕剑人赴乾县、永寿一带活动并与张庚良取得联系。崔廷儒和吕剑人接头后，在一九三六年八月间，

又先后派张涛、刘庚、谈国帆等，到乾县铁佛寺和当时在那里担任保安分队长的张庚良（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争取改造这支武装力量。经过一段艰苦工作，保安分队发展到二百多人，有各种枪枝二百多支。在崔廷儒参与领导之下，该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由张庚良、刘庚等带领，到永寿县城附近宣布武装起义，包围了永寿县政府，击毙县长祁云石等多人，收缴了长短枪数十支和一批弹药等物资，并砸开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和无辜群众。翌日晨，起义部队转战到麟游山区，正式成立了陕甘边抗日联军，张庚良任司令员，刘庚任政委兼参谋长。后来陕甘边抗日联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关中西部高举抗日旗帜举行武装起义，却钳制了国民党对北上抗日红军的“围剿”，用实际行动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这时我以中央交通员的身份，曾几次往返陕北中央和西安之间，并先后将程天鹏、张涛、吕剑人等同志带入陕北边区，又将张文彬、王林、老于和一名机要人员从边区送往西安。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和李克农等组成中央代表团，应邀来西安谈判，中央代表团要贾拓夫、张德生等几位同志来西安配合工作。代表团指派崔廷儒和谈国帆负责解决这些同志到西安的工作据点和吃住问题。崔廷儒和谈国帆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以临时省委等地下党组织长期进行活动的据点西安北大街二府街二府园李焕卿家和余海丰家、纸房巷、青门日报社等作为贾拓夫、张德生等几位负责干部进行工作和吃住的地方。此外，崔廷儒还和十七路军看管蒋介石的特务营长宋文梅接头联系，以迅速了解掌握蒋介石的动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根据中央决定，另行组织建立了陕西省委。由贾拓夫任书记，欧阳钦（杨清）任军事部长，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彭加伦任秘书长，不久彭加伦他调，崔廷儒任省委秘书长。这时临时省委即告结束，我也不再担任中央交通员，而与吕剑人、申敬之等一起在省委军事部工作。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之后，崔廷儒和我根据组织的决定，分别踏上了新的征途。崔廷儒随陕西省委机关，由西安迁到泾阳县云阳镇；我受党中央

指派，赴兰州负责甘肃工委工作。

（姚文琦整理）

注：①大革命时期三原党组织成立过特支、地委，没有成立过渭北工委。

*根据一九八一年《理论探索》第4期和《理论学刊》一九八七年第2期刊载的孙作宾所写《陕西地下党组织的斗争没有中断》和《回忆崔廷儒同志》的两篇文章综合整理。

孙作宾，陕西长安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一九三三年陕西临时省委点滴*

余海丰

我二十五岁办赴法事宜，终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成行，于是在沪除自修外，便给《时事新报》学灯栏写文章。一九三一年后应南郑中学之聘任国文、历史教员。同年春经张继华介绍入党。下学期与贾拓夫在城固教书。一九三二年五月因被搜捕，无法站足，经组织介绍回西安。下学期在三原中心县委工作。一九三三年春被调到省委机关担任发行部工作，至六、七月时，因陈建中、杜衡、小张等被捕叛变，大批同志被捕，所有没有被捕的重要负责同志均离开西安。此时我与孙作宾、胡振家、刘雪琴、王云藻等组织临时省委，慢慢整理残局。不意到九月我又被陈建中、杜衡、小张等碰至西华门逮捕。因为我与刘文伯、丁增华是国民二军时候的同事，温天纬是和我同在北京读书的学生，感情都很好，他们便以全部力量向宋志先（当时西安特务负责人）保我。同年冬我便任刘文伯领导的独一旅书记工作。一九三四年春队伍开至汉中。孙作宾也到了汉中，又经常从他的手中得读文件。同年冬季孙蔚如之三十八军特别党部负责人周燕荪以我思想有问题叫把我停职。一九三五年春季我回家住了几个月，和孙作藩等以反帝为宗旨接办《青门日报》。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时，贾拓夫来西安前往我处，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邀我任宣传股工作，我以经费困难，就把报刊停了，专做宣传工作。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摘自余海丰“文化革命”前写的自传。题目系编者所加。

余海丰，建国后曾任长安县副县长、长安政协副主席，已故。

王泰吉起义和陕西临时省委*

王云藻

一九三二年我在三原三职上学时，省委负责同志给我来信（记不清是贾拓夫还是余海丰），让我到西安端履门同组织接头。当时恰逢我家的一个亲戚李养民任敌清乡局局长，他告诉我母亲说，黑名单上有素琴的名字（我在三原叫王素琴），今后要注意。我就给母亲说，敌人要抓我，让我到西安躲一躲。这样我就雇车来到西安，住到我大娘家里。

不几天，我就同组织接上了关系，先住到乐育中学，后又让我到西仓巷为团省委住机关。团省委负责人有刘宗沛和李凯等，我化名刘玉梅以刘宗沛妹妹的身份住在机关。大约半年后，我又调到省委住机关。不久贾拓夫介绍我与余海丰结婚。那时到机关常去的有小章、杜衡、刘映胜、贾拓夫，还有交通员。海丰那时在省委任发行部长，我常协助他工作，将文件一份份叠好，装在点心盒里进行伪装，通过各种渠道分送出去，近的靠拉洋车、蹬三轮的工人送，远的让一个叫雷哲的押运员乘汽车去送。

那时龚逢春在汉中待不住，来到西安，在街上碰到海丰，说他想到陕北参加红军。海丰让贾拓夫开了介绍信，并向逢春详细介绍了去陕北沿途的情况，让先到三原、耀县找关系落脚，然后再向北去。

那时同海丰往来的还有王泰吉。王泰吉是通过何寓础、师乐天的介绍同海丰相识的。交往了一个时期，海丰觉得泰吉有胆有识，富有正义感，是个刚强汉子。泰吉也认为海丰学识渊博，为人诚实，可交朋友。以后他们几个和许权中等常在三原中学师守命家秘密聚会，谈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谈论很是投机，这对后来王泰吉在耀县举行起义，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

王泰吉把我俩当作知己，主动提出让我俩住在西安西大街梁道巷他的家中。

王泰吉的父亲王新斋早年加入同盟会，为人正直，是一位知名人士，在西安有些威望。我俩商量以后，认为他家比较安全，可利用进行工作，就允诺了。泰吉给他父亲写了亲笔信，说有个好朋友黄先生（海丰当时的化名）和夫人刘玉梅（我当时的化名）在西安找不下房，就住咱家，不可慢待等语。王新斋见信后热情地让我们住进他家厦房。那是一九三二年冬的事。

一九三三年初夏，王部已移驻耀县。有一天傍晚，何寓础来梁道巷找海丰。海丰以目示意，我就去大门口注意街上情况，他们在家密谈。事后听海丰说，何寓础受王泰吉委托来找省委，泰吉想把部队拉过来，要求得到省委的支持和领导，让海丰联系并给省委汇报，尽快作出答复。海丰详细询问了王泰吉在耀县的情况，又问耀县城内外都驻哪些部队和保安团，对何寓础说：“咱们后天晚上在你家见面再说。”第二天海丰外出很晚才回来。后来听海丰说，省委开会认真分析了王泰吉在耀县的言行以及骑兵团的情况，认为王泰吉在耀县起义是有思想基础的。如能率部起义，对陕西的革命斗争，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利的。决定派海丰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去耀县开展工作；仍然通过何寓础从中联系，以防不测。次日，海丰去何寓础家，告诉省委欢迎泰吉起义，决定加以领导，只是事先须和泰吉本人接头，以便具体研究，好作准备。何寓础即答应二人一起去耀县见王泰吉。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海丰和何寓础化装成商人模样，乘坐马车途经三原前往耀县。王泰吉在耀县见到海丰和何寓础，高兴地说：“你们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在团部后院给他们安排了住处。这地方比较偏僻，不为人们所注意。泰吉给勤务员叮咛说：“黄先生是来耀县旅游的，顺便来看看我，是我的好朋友，你们要好好照料。”他俩在小房长谈至深夜。因城内情况复杂，不便商谈军机大事，约定第二天以郊游为名去城外商谈。

他们到了城郊，在一眼水井旁边的葡萄架下泰吉详细汇报了耀县的各种情况；海丰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对泰吉起义表示欢迎。接着他们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的有关问题。据海丰事后对我说，起义后军队改名“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住三天，宣传发动群众，杀一些土豪劣绅，然后把队伍带到白水、澄城一带活动。再请党组织派一批干部来充实干部力量。海丰

给他们拟定标语口号，确定肩章、旗帜的图样，还把起义通电文稿修改了几次。临走时，他一再叮咛泰吉，这次起义事关重大，要注意各方面情况，决不可轻易离开部队，经常联系。他给省委汇报后派人来直接领导，起义时间来人后再定。他和何寓础返回西安向省委作了全面汇报，又谈了他自己对这次起义的设想。以后省委派杨声去耀县主持起义工作。

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了通缉王泰吉令，我俩就从王泰吉家搬走了，并暗地四处打听泰吉的消息。耀县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他的故友出卖，关押在西安军法处，直至英勇就义，都没有供出海丰。

省委被破坏时，交通员将情况通知了我，让立即转移。十点多海丰回到机关，我俩立即将一般文件销毁，重要文件包好带出，将门反锁，先跑到孙生海家里住了几天；后又搬到故新巷温志祯处，因发现有人盯梢，就从温家翻墙跑出顺东城墙进了城，在马场子找到海丰一个当律师的朋友处住了几天。又在三道巷找了个房子住下来。

省委破坏后，他们建立了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有孙作宾、崔廷儒、胡振家、刘雪琴、余海丰等。我常在机关里见这些人，有时也去红阜街胡振家家。我在机关仍搞文件发行，那时上面来的文件纸很薄，是四开一张的。我们翻印后再发出去。

一九三三年十月，海丰在西华门附近被叛徒陈建中、小章、杜衡、朱明及两个特务逮捕，押了两个多月，后经朋友温天纬、崔允升、杜松寿等多方营救始获释放。

一九三五年海丰同孙作藩、樊仰山等接办《青门日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社址先在北大街，后搬到易俗社。“双十二事变”发生后，贾拓夫随我党代表团来到西安，那时他还不是代表团成员，活动需要秘密，便隐蔽在我家。记得贾拓夫经常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情况，他曾风趣地说：“我现在不叫拓天了，经过长征天字出了头成了拓夫。”他还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情况经常有人给陕北汇报，党知道你们表现是好的。你们如果愿意，可以把孩子带上，连同机器一起搬到陕北。”那时我们虽然也想把报社迁到陕北，但报社经济亏损，还有三百元外债无法偿还。便将情况向贾拓夫作了汇报。贾拓夫说党中央目前

经费也非常困难，此事以后再说吧。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张琼芝进来说：“听说贾拓夫到西安来了，你们知道不？”该张是陕北人，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后来表现很坏，当时在报社当编辑。我们看到贾拓夫把帽子向下压了一下，便说：“不知道！”

此后，贾拓夫换了海丰的一套呢子衣服就转移了地方。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根据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访问记录整理。
王云藻，现住长安县。

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和 西安中心市委*

魏光波

韩学亚家住渭南三张镇东韩家村，我家在背坡村，相距不远。一九二六年我们在三张上高小，一九二七年同上渭南中学，一九三〇年又一同在西安省立第一职业学校上学，过从甚密。在校期间我们参加了“九·一八”爱国宣传，结识了一些革命学生。一九三二年西安学生运动高涨，纷纷宣传抗日，反对腐朽的教育制度，并于四月十二日^①在民乐园打了戴季陶。这年我同韩一起去中山中学参加“八·一”纪念会，不料会场被敌人包围，韩学亚等人跑出，我与三十二名学生（其中两个女的）被敌人逮捕，押在西华门军法处，达一个半月。西安各界人士募捐、请愿，大搞后援工作，反动政府慑于社会的压力将我们释放。这次斗争胜利后两三天，由中山中学学生史克寿与韩学亚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史克寿是省西人，在团的西安市委工作。入团后，我和韩学亚、秦耀武组成一个团支部，主要工作是开展学生运动。十月学校形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保校长张实斋，我们则坚决反对，双方争论激烈最后打了起来。第二天，公安局抓走秦耀武等同志，我同韩学亚转移到中山中学继续搞学运，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因而无法继续待在西安。经组织决定，将韩学亚派到上海中央受训，后留在上海工作，我被派到三原武字区工作。

当时三原武字区革命的形势很好。我到武字区后，担任该区团委秘书，书记是李和尚。不久又调到团三原中心县委担任秘书兼宣传，习仲勋是书记，习仲勋走后我接任书记。一九三三年七月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南下时，被特务团和渭北一带民团打败，向北退去，武字区形势顿呈险恶，我们不敢回村，只好

在野地里睡觉。有一天晚上我听到村里狗咬得很厉害，看见有人背着枪来回走动，急忙赶回三原县城原来的住处。刚一进门，老大娘就急忙告诉我说：“你还敢回来，潘士杰领人抓你哩！”潘当时是县委交通，熟悉党、团机关住址，这个人叛变投敌对我们威胁很大。于是我立即去找团的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姓刘，白水人）。刘告诉我党的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也被敌人逮捕了，他准备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三原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并请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虽然不晓得省委已经被破坏，但从形势分析也预感到问题严重。因此约定他必须在三天以内赶回来，若不能回来则给我来信，如果人、信皆无就说明发生了问题，我就不能在三原继续等候。姓刘的同志走后，我又移住县城东街一个社会关系家里，等了几天不见人来，我估计已经出了问题，就从三原回到了渭南老家。这一阶段我在本村和邻村动员了七八个革命青年，一起去渭北参加红军。行至三原县城附近，就听行人说敌人在渭北抓了几百人，有的人家里花了钱已经释放，没钱人还被关押着。他们还说现在北原上驻的民团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去渭北找红军已不可能了。

不几天韩学亚就从上海回来，告诉我说团中央听说陕西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因不了解详细情况，特派他回来工作，如果有可能，就把各地组织尽快恢复起来。我也当即表示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革命。于是商定由我到各地了解情况，找寻关系，联络党、团组织。我到西安前后去过两次，在路上碰见渭华县委书记赵应魁，他的外号叫赵货郎，是三原武字区陵前人，与我在渭北时就认识，首先与他取得了联系。在西安又见到了我入团的介绍人史克寿，他是被捕后自首释放的，史给我简略地谈了西安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又领我到西大街一个药房，找到红二十六军派来找省委联系工作的秦武山。接着又找到临时省委的王好勤，他向我讲了几次组织临时省委和贾拓夫、刘宗沛、陈子敬等人的情况。后又与临潼县委书记刘庚以及孙宗继、樊德音^②、董宗民、李杰夫等人取得联系。这样就与西安、渭华、临潼、临时省委和红二十六军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即召集上述同志在渭南背坡村东边柿树下开会。与会同志各自

介绍本地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形及继续坚持斗争的党、团组织情况，并研究了今后工作任务。决定成立一个全省性党团组织统一的领导机关——陕西党团恢复工作委员会，选举韩学亚为书记，我负责组织，樊德音负责宣传，秦武山负责军事工作。由于当时环境险恶，故决定各地党、团的关系仍由各县委负责。

背坡村会议后，韩学亚向中央写了几封信，汇报陕西情况并请示今后工作，但一直未见回信，因此恢复工作委员会决定派人去上海。因大家对韩学亚在外地的情况不够了解，加之去信多日不见回音，所以就决定派我向中央直接汇报。同时我自己也觉得有责任向革命负责，向同志负责，便在一老同志家借了二十多个硬洋去了上海。到沪后即按韩学亚指定的旅馆住下等候，因中央交通处被敌破坏，加之所发的密写信件因技术问题显示不出来，一时无法接上关系，滞留上海两个多月。这期间我无钱生活只能到韩学亚介绍的陕西同乡阎颜畴处借钱。阎是蓝田人，在复旦附中上学，政治态度比较进步。两个多月后，渭南党组织遭敌破坏，韩学亚也来到上海，我们才找到原交通，与中央取得联系。三四天后，中央来人与我们对上暗号，接通了关系，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中央决定，让韩学亚回陕西继续工作，让我留在上海工作，但因我在上海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工作和生活都有困难，就向中央交通提出还是派我回陕工作为好。一星期后，我再次向交通提出了回陕西的请求。时间不长，中央同意了我的要求，写了介绍，让我找陕西临时省委孙作宾，说孙的关系已交给韩学亚了。

我回渭南后，找到韩学亚，韩说他回来后，怕被敌人发现，没敢出门。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特务暗探密布，跟踪行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捕。因此我也不敢住在家里，白天在野外躲藏，黑夜回家，一听到狗咬就从后墙翻出去。过了五六天，我约韩一块去西安，他推托有病，不想去。我就让他将关系给我，独自去西安，在盐店街路南一家找到孙作宾。接着由孙作宾在盐店街召集活动分子开会^③。参加人员有孙作宾、严克伦、崔廷儒、苗建平和五人。会上我汇报了恢复工作委员会以及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的情况，他们也介绍了临时省委的基本情况。鉴于党的组织严重破坏以及全国其他省陆续将省委改为中心

市委，我建议将临时省委改为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工作，大家表示同意。会议决定我为市委书记，严克伦负责组织及青年工作，苗建平宣传，崔廷儒负责军事工作。孙作宾因身份暴露难以立足，决定去陕南工作。

由于党、团组织屡遭破坏，这一时期我们掌握的党团组织的关系已经不多了。记得陕南特委党、团员比较多，活动也较多，孙作宾去后还给我们来了信。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党的关系我们曾派人两度找寻，一次因敌人封锁未过去，一次派人进去没有回来。这期间，我在街上还见到了原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他是在渭南被捕的，一九三四年夏季释放。秦告诉我他家在合阳，他父亲在县城开了一间小药房，让我有事与他联系。我因对他被捕以后的情况不了解，因此未与其来往。为了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我们采取了单线联系的形式进行工作。记得西安地区有严克伦掌握的一些学生支部，崔廷儒主要搞兵运工作，在杨虎城部队和民团中进行活动，掌握的关系比较多，外县党组织与我们有联系的只有三原、临潼、渭华等县。我曾数次到临潼开展工作，有一次到刘庚家去刘不在，又到房致遥家，房的爱人说他在学校，我又赶到学校，恰好刘庚也在这里。我们几个人正吃午饭时敌人闯了进来，逮捕了房致遥，刘庚翻墙逃走。敌人走后，我仍回西安，留聂建国在临潼协助工作。

那时我们生活非常艰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开始我住在渭南会馆，该馆免费提供住宿，后在一同学家住了几天，还在张景文家住过。每天外出联系同志时，有的设法给我弄一两块钱，有的给几个馍，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大家一心想的是尽快联络同志，恢复组织，开展斗争，因而充满了希望。过了几个月后，在敌三十八军工作的一个同志将刘宗沛的姐姐刘秀珍带到西安，我便同崔廷儒、严克伦研究决定，为中心市委建立一个固定的机关，让刘秀珍担任市委秘书。于是便由团员刘治海在东关找了一个地方，仅住了两三个月，刘治海就被敌人逮捕。有一天下午，敌人到东关找我，刘秀珍见这几个人鬼鬼祟祟，就警惕了起来。我晚上回来后得知此情况，分析此地只有崔廷儒和刘治海知道，肯定出了问题，于是另找了房子趁天黑下雨，从东关搬至中山门。一天，我行

至大差市，碰到了叛徒张生茂（大荔人，和我是同学）和聂建国，张一把抓住我，我恐吓张说：“你不放我没有好下场，小心我们的特务队收拾你。”张还是不放，我们就厮打起来，张喊来警察将我逮捕，时间是一九三四年阴历九月初八（阳历十月十五日）。

到一九三五年阴历二月，敌人内部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加之刘英从中帮忙，我顺利出了监狱。出狱后找到严克伦，交代了一些组织关系，告诉了印刷设备存放的地址，并让他找到关系后通知我，便离开西安回到渭南。

（姚文琦、王少民整理）

注：①应为四月二十五日。

②樊已于九月份和刘映胜等被捕。

③严克伦回忆是在西安八仙庵开会的。

*根据魏光波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

魏光波，又名魏中慎，建国后曾任陕西省森林工业局局长等职。

一九三三年西安市团委恢复和破坏*

胡明伦

一九三三年夏，省委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口饭馆开会时被敌特包围，省委书记小张和杜衡被捕，贾拓夫侥幸逃脱。省委破坏以后，贾拓夫停了一个时期离开了西安。这时陈子敬来找我，说省委把工作托付给他，要我们一起收拾摊子，因为省委破坏后他一直和贾拓夫保持着关系，我估计可能是贾拓夫给他谈的。当时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余海丰等人。不久我又联系上杨文谟、姚选科等。我们在青年会大操场开了几次会，有人来了大家就装着拉闲话。当时决定党的工作由陈子敬负责，团的工作由我负责，组织上没有明确是什么名义，也没有确定谁是书记、谁是委员，只是说收拾摊子开展工作。以后我与杨文谟、姚选科成立了西安团市委，因为当时许多团员都放假回家去了，我们计划等暑假以后再把青年团的工作整顿一下。其间王泰吉还派屈纪军给我们送了一百块钱，购置了油印机、纸张等放在胥玉祥家，由他保管。我们互相联系的地方大多在竞芳药房。我与陈子敬还曾在西仓丁世丰家躲藏过十几天。

恢复组织以后大约两个礼拜，有一天上午，一个不知名的人找到我，说他是三原党组织派来的，要接关系（后来才知道此人是叛徒潘士杰）。我与他简单交谈以后，令其仍回三原，并派杨文谟护送。行至北大街时，该潘假意邀杨到茶馆喝茶，杨即被特务逮捕。同日下午，又有一个人冒雨来到我的住处，仍说是三原来的，还说半路上碰到潘士杰。我令其先住在旅馆，姚选科去旅馆接头又被特务逮捕。这时我还是不知道，第二天这个特务又来找我，简单谈了一阵即离去，当我行至西大街时也被特务逮捕。至此我们团市委的三个人全部被捕。

陈子敬知道这一情况后，离开西安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陕西地下党的情况，外边的情况再知道了。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根据胡明伦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访问谈话记录摘录整理。
胡明伦，西安市人，建国后在西安市政协工作。

一九三五年前后陕西地下工作*

高 克 林

一九三三年秋，河北省负责人柯庆施派我到固原县原抗日同盟军（已被宋哲元改编为第二师）接替王林，领导和整顿党的工作。此部队党的关系很多，营、连长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在此前后，我在北京的蒲城会馆见到谢子长，谢约我回陕北打游击，我向他谈了省委的安排而作罢。为了接通该部组织关系，我首先找到钟师统，并通过钟找到王林，王向我介绍了该部党组织的情况和接头暗号。

农历八月十五，我根据王林的安排，以冯玉祥大儿子冯宏国朋友的身份与一个姓王的同志（杨虎城的干儿子）一起前往，顺便将刚从日本回国的冯妻带往部队。我们当天赶到张家口，在高树勋公馆住了一晚，次日赶到固原。在固原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招待，我被安排在该营一个连里，这个连长同我熟悉，排长张文舟是党的支部书记。我向张文舟传达了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张慕陶的决定和有关指示精神。后因环境不利而复回北京。当时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蒲城会馆的联络点也没人了，与组织联系中断。在这里碰到了我当年的老师王圣域，他告诉我特务在此已监视多日，让我赶快离开。因我的第一联系人王××被捕，我又找到第二联系人雷××，雷将我送上车，互相勉励，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然后我又去陆军医科大学顾舟山等处，均未接上关系。在无法找到组织，又无法立足的情况下，我想起了谢子长叫我回陕北打游击的事，便通过王圣域将我介绍到陕军四十二师一旅三团团团长王静轩处，住在王的副官处。时间长了，王给了我一个副官名义。

不久，部队开到洛川，接着又到清涧围追红军。这时虽接近革命根据地，但因赤白对立，敌人控制很严，仍未与组织接上关系。后来三团将清涧防地交

给高桂滋部，又撤回洛川。在这里，我认识了雷雨天等同志，但不敢贸然接头，还见到了该团参谋长武勉之互相也未联系。适时四十二师开办无线电训练班，我考取后去师部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回到洛川，团长任命我为通讯排长。在陕北无法接通关系，我考虑再去西安找关系，便向团里提出到西安学习无线电修理。有一天，在街上我遇见了张性初，他是我入团介绍人，彼此都很相信。我向他谈了我的情况和革命志向，要求他设法帮我找到组织。过了几天，张告诉我说组织已经找到了，并相约在杨虎城行署西边碰头，这时已是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了。一天晚上，王超北约我谈话，我向他谈了自己两年来的情况，把河北省委开除张慕陶的情况也说了。王表示接收了我的组织关系，叫我在西安做情报工作。因为我的一个教官成作民是电台台长，我想趁机抓这个电台，便答应了王超北。我在找成谈话时流露了这想法，成对我说，马青苑也有个特务系统，符号是锁子，控制极严，恐怕不易成功。既然抓电台不行，我就向王超北提出改作地方工作。王答应将我介绍到省委，与省委代表孙作宾接上关系。

一九三五年八月，在陕西省委已经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孙作宾、崔廷儒和我组织了陕西省党的工作委员会。因我是通过王超北介绍给孙作宾的，他以为我是党从上海才派回来的，所以他和崔廷儒坚持选我做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最后，我们讨论分工的结果是：我负责全盘，兼管西安和东路（西安以东），孙作宾负责组织工作，兼管军事；崔廷儒担任秘书，兼管西路（西安以西）工作。还有一种叫法，说我是临时省委书记，孙作宾是组织部长，崔廷儒是秘书长。这种提法我记不清了。会后，我们各负其责。孙作宾介绍我和西安市党组织负责人姚权接头。我们接头地点在北门外护城河公路西边的一个电线杆旁。他向我介绍了西安党组织情况。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杜斌丞曾经找过我，说杨虎城将军要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想与红军建立联系。当时我对杜说，从一九三三年以来我很长一段时间未找到组织关系，对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甚少，再说我嘴也笨，恐怕不好与杨先生直接谈话。这事以后如何办了我不大清楚。

在去东路巡视指导工作时，孙作宾向我介绍了熟悉东路情况的姚仁夫，我在西安北门外西边公路旁的电杆下与姚会面，他向我介绍了情况。我去东路的

第一站是韩城，与王均取得联系，安排了韩城的工作后，又到华县咸林中学找到刘玉堂，与华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刘玉堂家在赤水三张村，一次我们正在刘家开会，研究布置东路工作时，王均的弟弟由西安赶来说，西安党组织被破坏了，敌人到处抓人。我立即决定会议停止，各自分头转移。刘玉堂从此转入军队。此后，我回到华县程高堡家中，准备先打听西安组织被破坏的情况，然后再作安排。正在这时，张性初捎信让我赶快回来，说中央要研究陕西问题，叫我同孙作宾去陕北汇报工作。我到西安后，在张性初和王圣域家停了一下，便同孙作宾一同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七、八月了。我们在陕北开了个国共合作座谈会，由林伯渠主持，徐特立等同志参加，听取了我同孙作宾的汇报。

原来我准备汇报后再回西安开展地下工作，但有人反映我在北京登报自首，整整冤了我十几年，因此我便留在陕北工作。

（王少民整理）

*根据高克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访问谈话记录和高克林回忆录一书有关内容整理。
高克林，又名高文敏，陕西华县人。现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陕西临时省委一些情况*

王 均

一九三二年五月，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来到韩城。在游击队的支持下，我们公开组织农民协会和赤卫队。赤卫队长高德辉敲锣开会，公开演讲，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游击队走后，敌人疯狂地反扑，到处捉拿共产党员。高德辉等五个同志牺牲，敌人还烧了一些同志的房。樊德音在韩城无法立足跑到西安，留在省委搞宣传工作。张志超、薛和昉、冯光波、余文波等也跑到西安。我当时在校上学，未暴露组织关系，就在韩城继续搞地下工作。

一九三三年正月十三，薛和昉通知我，让我们到省委学习。到西安后，杜衡、小章以及蓝田赵西宇分别给我们讲课。有时在亮宝楼^①讲，有时在街上边走边讲，也去汉中、渭南和韩城会馆里讲。内容主要是要求我们搞农运、学运，分粮、吃大户，抗租抗捐，开展武装斗争等。一块学习的还有蒲城的姚文舟、李小勃以及西安和渭南的几个同志。学习结束，冯光波、薛和昉、高潜云留在西安工作，我回到韩城。

西安回来，按省委程建文指示，我们搞学潮、搞武装、吃大户，一个晚上就分了地主二百多石粮。省委常给我们寄《斗争与学习》、《团员须知》、《党员须知》等文件；每十天半月就来信一次，安排布置工作。但这一次好几个月没有来信，县上派我到西安联系。当我走进东大街镇华旅社联络点时，见茶房朝我使眼色，就急忙向外跑，后面有警察跟着撵，跑到西大街碰见刚从城固回

来的樊德音。他告诉我说，省委破坏了不要紧，他知道上海的联络点，有中央的关系，已用密写信给中央作了汇报，等上海关系接通后，就组织临时省委。让我回韩城，姚文舟回蒲城，将工作安排好后，立即来西安参加临时省委工作。待我安排好县上工作来到西安时，樊德音已经被敌逮捕，并听说樊已叛变。后同乡段跻同通过咸林中学校长王子修的关系，将我介绍到华县咸林中学掩护起来。不久我又回到韩城，向县委书记薛亚杰汇报了情况，薛告诉我合阳有一连兵哗变，让配合严文炳、吉炳耀前去争取这一支部队。后因这支队伍攻城失败，我们又都跑到咸林中学。大荔、西安等地的一些进步学生也跑到这里，并在咸林继续发展组织。一九三四年四月咸林中学建立了支部，我任书记，杨万新（杨春茂）任组织，申宗海（申力生）任宣传，党员有严祐民（澄县）、雍进炳（华县）、吉更顺、刘玉堂、李廷弼等十三四名。

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收麦时，杨森带领红军骑兵团来到韩城，冯玺玉在该团搞政治工作，见了段绳祖、严文炳，让将我找回，开展武装斗争，并让将咸中的党员及进步青年也带到部队。当时上面派人已在咎村建立了特支，姚权任书记，他也叫我回来担任组织工作。当我从咸林中学回来时部队已开走了，我又到咸林将支书交给晁廷芳担任，带领杨万新、李廷弼、刘玉堂、申宗海、雍进炳以及原红二十六军失散人员刘合（在咸中做饭）来到韩城，住在我家，准备通过晁廷芳同王世泰的关系到部队去。但薛和昉让我们留在韩城搞武装，当时韩城已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有十几支枪。不久游击队又失败了，这几个人就自谋出路到别处工作了。

一九三六年姚权同高克林接上了关系后，我和薛和昉等都到了西安，吸收渭惠渠水利监工员何德甫（即霍士廉）加入了组织。当时省委将和昉留在西安，高克林让姚权做西安团的工作，让我同严文炳到东府。我们从西安搭车到华县，在刘玉堂家开会，高克林给我们讲了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下午我弟弟王勋突然从西安来说姚权叛变，在西安到处抓人。我赶紧通知咸林中学同姚权认识的人转移，并同高克林约好在合阳东北区刘嘉霞

家里会面。高来后因姚权知道此地，又转到何树臻家里。

（姚文琦、王少民整理）

注：①亮宝楼，解放前在今西安市委礼堂地址上，有动物供展览，时被人呼为亮宝楼。

*根据王均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题目是编者所加。
王均，陕西韩城人，建国后曾任韩城市政协副主席。

陕西临时省委和兵运工作*

胡振家

一九三三年七月，由于杜衡等叛变革命，致使陕西省委遭到较大的破坏。我奉调由陕南回到西安。和孙作宾秘密接头，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省委被破坏的经过。经过孙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陈子敬和余海丰。八月中旬在孙作宾家里，（也可能是在江苏义园内，记得还提着纸钱，假装祭奠的时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省委会议，参加的有孙作宾、余海丰和我3人。孙作宾说：由余海丰担任书记，孙作宾担任组织委员，我任军委。决定恢复和整顿组织。吸取过去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兵运工作失败的原因，决定今后不再搞三、五人的兵暴，应该以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为主，做更扎实的下层工作，利用矛盾搞较大的兵变。重点转入杨虎城在乾州的十七师补充团。那里有进行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1. 党的力量较强，从团部到排班都有我们党员；2. 当时和孙蔚如关系尚好，可以打入上层（以后孙让我任该团副团长）；3. 该部系杂牌军，有许多矛盾可以利用；4. 地理条件好，随时可以钻进山里去。于是省委派我去补充团工作。

这次临时省委由于余海丰的自首而被破坏。前后共两、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还接到中央的文件，是在一匹布上密写的，内容是继续反对立三路线的残余影响。由于这次临时省委存在的时间很短，所以做的工作不多。

一九三三年十月省委派我去乾州杨虎城的十七师补充团策动哗变。当时补充团的党的力量较大，在团部工作的有文书贺修之、军需梁明祥、骑兵连连长杨嘉瑞、一营连长雷明彦，班长中还有些党员。到补充团后，孙蔚如命我任补充团副团长。

在补充团我首先建立了党委会，由我任书记，委员有贺修之、杨嘉瑞。我传达了中央关于继续反对立三路线残余影响的指示。接着贺修云介绍了补充团

团长黄展云的思想情况，决定首先和黄拉好关系，做好对黄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底的某天晚上十点钟左右，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王根生来电话，要补充团到麟游境内的商宁镇截击红二十六军。这时适逢团长黄展云以治疗眼疾为名，到西安贩大烟去了，团的工作由我负责。我立即召集党委会，研究决定以奉命截击为名，掩护红二十六军安全过境。采取的办法主要是拖时间：由我率领一营驻在距商宁镇不远的监军镇指挥，派怕打仗的三营营长王伯谋带三营去商宁。王在半路上装病不前，等到达商宁后，红二十六军早已过去了。

在此期间，省委还派崔廷儒等同志来此巡视，并参与研究红二十六军过境问题。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杨虎城嫌黄展云带兵不力，就把补充团调往西安，分编到其他部队。将我调到绥靖公署任参谋。

一九三五年春，我随杨虎城去陕南视察防务，回到蓝田时，杨命令张汉民团和曹伯祯团堵截红二十五军，并让我带一部电话，监督这两个团作战。当时阎揆要在张汉民团三营任营长，和我同行。当部队行至蓝田九间房时，突然遭到红二十五军的包围，张汉民等同志被俘，我们失散人员跑回蓝田后成立了一个行营，由参谋长张涛安负责。在蓝田住了几天，我就回到西安，与崔廷儒取得了联系。当时在绥靖公署的匪情通报上，看到张汉民被俘后，被带到引驾回，后不知在哪里牺牲了。

（王少民 姚文琦整理）

*根据胡振家《谈恢复陕西省委和在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情况》及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二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

胡振家，西安市人。建国后曾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已故。

陕西临时省委和乾县武装斗争*

吕剑人

一九三二年我因参加组织“两当兵变”被敌人逮捕判刑，关押在国民党陕西第一监狱。在狱中，我们利用放风、扫地、送饭等机会同政治犯赵伯平、胡达明等同志建立了联系。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五月，国民党司法部对军事犯、刑事犯发布假释令，在组织的帮助下，我通过王菊人等同学、朋友的关系获释。出狱前，狱中党组织告诉我，出去后可找已保外养病的工人党员胡达明，就可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出狱后，我很快找到了胡达明，不日即与临时省委取得联系。

一九三六年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临时寄居的东家巷吴云亭的家门被轻轻地推开，一位身材瘦高，眉清目秀的青年人走了进来。按照预定的接头暗号，和我互通姓名之后，这位名叫崔廷儒的同志迅即跨前一步，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深情地说：“老伙计，受苦了，你们‘两当兵变’的情况，以及你在监狱里坚持斗争和出狱经过，组织全部了解。省委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几句话像春风、像暖流，使我这个在敌人监狱中蹲了近五年的党员无比感动、兴奋和欣慰！接着崔廷儒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以及任务。他说，在你们被捕这几年中，陕西地下党的活动更加艰险，省委机关几次被破坏。一九三五年夏天成立了临时省委。中央到达陕北后，打了几个大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几次“围剿”。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对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尤其对我们陕西抗日形势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们要加强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把老蒋逼到抗日战线上来！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振奋人心的话语，

想尽快走上工作岗位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当我提出希望组织尽早给我分配工作任务时，他笑了笑回答说：“关于你的工作，组织已有考虑，你长期从事兵运活动，当前抗日运动正处在迅速发展时期，最好还是去搞武装工作，在组织抗日革命武装方面，争取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再考虑考虑，以后详谈”。

从此以后，崔廷儒常来找我，有时同来的还有其他同志。我们几次在一起研究如何搞地下武装的事宜。当时，我得悉一个叫李芝园的人，即将去乾县任县保安大队副，但他与乾县的地方武装力量素无联系，正在寻找一个有这种联系的人。经过韩忠林、许权中、刘文伯等介绍，我认识了李芝园。他们向李芝园介绍，我不仅是乾县人，还同乾县地方武装中的几个头目如铁佛寺的张科科、张熬娃，临平镇的保安队长王定一，乾县保安队中队长张志杰等熟悉，可以帮助他搞好关系。李芝园便很乐意邀我同去乾县给他帮忙。崔廷儒对我认识李芝园的情况和我在乾县地方武装中的关系仔细分析后，对我说：“老伙计，你还是回乾州吧！尽管乾州有不少人知道你两次被捕，但已时过几年了。现在只要你抓住李芝园这张虎皮，有科科、熬娃、张志杰等握有枪杆的实力人物作后盾，就没人敢对你怎么样，并能很快立住脚开展活动。你先随李前去，随后我派人来帮你工作。”在崔廷儒的鼓励和周详安排下，不久我便随李芝园等人去了乾县，从事地下武装活动。

大革命时期，乾县农民运动一度发展很快。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转入地下，但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经过西北民军的活动及杨虎城剿灭收编民军等事件，流散的合法、半合法、非法的武装较多，形成小割据状态。因此，在乾县搞地下武装，相机建立抗日武装力量，是具备条件的。占据铁佛寺一带以张科科、张熬娃为首的一支农民武装，就是西北民军张西昆部遗留下来的力量（我因同张西昆在狱中相处较好而得知他们的情况）。他们当中成分复杂，既骚扰百姓，也打富济贫，而且反对国民党统治，有一、二百条长短枪枝，其中还有一挺机关枪，历任的县保安大队长对他们都难控制，处于半合法地位。

我们去后，认为这支武装可以争取改造。便向李芝园推荐党员张庚良出任铁佛寺保安分队队长，随之又派了几个党员进去，这样就基本掌握了这支武装。另外，保安大队有两个直属中队，一个是张志杰中队，一个是李蕴山中队。我

与张志杰曾是较好的同学，他出身贫苦，为人耿直，思想较进步（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发展为党员）。李蕴山中队是李芝园去乾县后成立的，李曾是许权中的老部下，政治上中立，我和李也建立了较好的朋友关系，可以为我们帮忙。

我到乾县三个多月，崔廷儒两次代表省委来乾县指导工作。第一次我和他在我临时住宿的东街陈五铺子里谈话，崔廷儒肯定了我这一段的工作，指示我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既要抓重点作基础，又要着眼于控制全县的武装，尽力同掌握枪杆子的人交朋友，以便时机成熟时在西兰路上拉起一支抗日队伍。

崔廷儒第二次到乾县时，正值李芝园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我组织一个保安分队，并担任分队长，驻在乾县北区关头镇（距县城六十里）。这件事，对于我们发展和掌握武装自然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崔廷儒凭着多年来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认为我最好不要做这个保安分队长。他说，你若去了关头，就将你手脚捆住了，只能常住关头，而关头远离县城，不利于掌握全县情况，更不利于对全县地方武装进行统战活动。他让我推荐一位既可以由我们完全控制，又能被李芝园接受的人去做关头保安分队长。随后我即向李芝园力荐雷伯里去任此职，李接受我的建议后就正式作了任命。雷伯里是上官克勤同志介绍给我的一位青年党员，他任职后，我就按照崔廷儒的意见，帮助他很快建立起关头分队。

一九三六年九月，张庚良、刘庚等同志领导张科科这支武装举行起义，打开永寿县城，打死县长，收缴了该县的全部枪支，扩大了队伍。起义武装进入麟游山区后，编成了陕甘边抗日联军，张庚良任司令，刘庚任政治委员兼参谋长。这支部队成为西兰公路要道上一支抗日武装，在围攻陕甘边红军的敌人背后扎了一刀。铁佛寺起义是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武装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号。事件发生时，我还在乾县城内，得知李芝园气急败坏地正在追查那些人和张庚良等有关系，此时，我已暴露了身份，便秘密离开乾县，去西安找省委汇报情况。

我到西安向省委崔廷儒汇报了我的工作及铁佛寺起义后乾县的情况，并要求去陕北学习。省委同意了我的要求，崔廷儒帮我作了具体安排，把我介绍给临时省委的孙作宾（我和孙过去就在一起工作过），由他负责把我送往陕北。

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我们到达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城。在那里，我在中央组织部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组织派我到肤施（今延安）对沿线十七路军做兵运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又被派回西安。新建立的省委仍分配我到国民党十七路军中工作。到该部队后，我被分派到驻洛川的骑兵团任政训员。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七路军中的政治机关被迫撤销，人员遣散，省委又调我到省委军委当联络员，联系十七路军中地下党的部分组织。

（姚文琦整理）

*根据吕剑人《缅怀先烈忆当年》一文和一九八七年谈话记录综合整理。

吕剑人，陕西乾县人，建国后曾任新疆区党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主席等职。

陕西临时省委和乾县铁佛寺起义*

严克伦

一九三三年夏，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小章、杜衡等被捕叛变，当晚就有二、三十个共产党员被捕，敌人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时我还在西安高中上学，在党内担任西安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与我直接联系的是团省委的冯玺玉，他是韩城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都叫他小冯。省委破坏后，他的哥哥冯光波被敌人逮捕，小冯逃脱后跑到北平，后进入苏区担任了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的负责人。他仓促出走使我的组织关系断了线，无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那时报纸上经常刊登党员被捕自首的消息，连篇累牍地发出反共叫嚣，街市上经常有叛徒特务跟踪盯梢，分不清谁是好人坏人，因而也不敢轻易与他人接头联系，仅以自然联系的方法，依靠互相之间的信任，只与我所掌握的反帝大同盟的一些人保持着联系。

几个月以后，冯玺玉从苏区将我的组织关系介绍给西安地下党的孙作宾。一九三三年底我才与组织接上关系。第二年油菜开花的时节，团中央派魏光波回到西安，孙作宾约我和崔廷儒、魏光波到八贤庵开会^①，成立了西安中心市委，负责联络和领导全省各地党组织，并推举魏光波担任书记，我担任组织委员，崔廷儒负责军委工作。由于八贤庵这里游人很多，容易隐蔽，我们商量决定把路口刘自海的弹棉花铺子，作为联络和接头的地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情况，我们仍然各自掌握着自己手里的组织关系，除特殊情况以外，不发生横的联系。不久，陕南胡哲的爱人刘秀珍来到西安，与魏光波扮作假夫妻，为中心市委建立了一个机关。崔廷儒当时没有社会职业，没有经济来源和固定的住处，常常睡庙台、吃不上饭，病了无钱医治。我是个穷学生，只好在每次接头时，想法

弄几个馍给他充饥。一九三三年秋末，魏光波突然与我们中断了联系。我与崔廷儒分析，一是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外边生活苦待不下去回了家，但是他家住哪里及其真实姓名，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工作上更加小心谨慎。不久崔廷儒找我说，他到二府街找关系被特务盯上了，便从一个熟人的前门进去后门跑出甩脱敌人。并说他准备离开西安到陕南去找一个老乡，我将仅有的两块钱给他做了川资，后来才知道他去陕南找了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蒙定军。当时张汉民团在陕南，那里党员很多，便于活动和隐蔽，崔廷儒即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崔廷儒走后，有一天下午我刚进校门，门夫就出来说：“校长找你呢！”两个特务也跟着出来了，我只得随他们一起到校长唐德元的办公室，训育主任白则元也在。他们声色俱厉地说：“省党部派人叫你来了，说你有共产党的关系，如果你如实说了可以不去，否则你就跟我们到省党部去。”就这样我被押到省肃反会看守所，戴上了脚镣。我们对面房子押的是一些重犯和死囚，戴着双镣，放风也不许出来。第二天敌人开庭传讯，直接审讯我的是刘英，他原来也是共产党员，后来被捕自首参加了肃反会。他再三追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姓崔的老乡，我矢口否认。刘英第二次单独审讯我时，态度有了变化，说他自首以后也没有自由，爱人在别人家当佣人，暗示他并非诚心给敌人办事。不久，刘自海也被抓了进来，告诉我凡是与崔廷儒有关系的人都抓了，这时我才明白了抓我的原因。第三次审讯时叛徒聂建国出来作证，说崔廷儒告诉过他西安高中有个姓严的老乡，要我招供和崔的关系。根据聂建国谈的情况，我断定他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于是抓住我没有姓崔的老乡这点让他们调查，把敌人问得哑口无言。

有一天刘英查号子时，我发现魏光波跟在他的身后，没戴脚镣自由行动，使我大吃一惊，心想如果魏光波出了问题就坏了。没想到魏走到我跟前以后，趁人不注意小声说：“你不说我，我不说你。”这一下越发把我弄糊涂了，想不出其中有什么蹊跷。等了好几天没见有什么动静，敌人也因没有证据把我释

放了。十几天后魏光波也释放了，他告诉我说刘英对他帮助很大，掩护他安全过关，他什么也没有向敌人说，并表示对我非常信任，把他手中的关系都交给了我，说他准备回家去，叮嘱我找到组织关系后给他来信。

一九三五年我高中毕业，崔廷儒对我说能在西安找到社会职业更好，如找不到可以回永寿工作。因此我先在西安孤儿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永寿县担任了小学教员。孙作宾还将长武县汽车站一个党员张鸿秀的关系转给我。从此以后，我就在西路地区活动，经常与孙作宾、崔廷儒联系。年底，崔廷儒把我叫到西安，说他们又一次成立了临时省委，他担任秘书长，要我担任临时省委秘书。不久，地下党的同志带回了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崔让我赶快把这个文件翻印出来。我首先找到聂彦林，他在高中时比我高一级，后在一个小学教书，原来想去苏区，听说陕北肃反杀的人很多而打消了这个念头。通过聂又找到龙凤五，她家比较富有，住的是独院，环境比较有利。我们三人每天晚上都在龙家翻印文件，前后大约近一个月时间，才将翻印好的文件交给崔廷儒。

一九三六年五月，临时省委派我和谈国帆去麟游县找赵伯经。他原来在三原上学时加入了党组织，后来跟着甄寿珊搞西北民军，担任骑兵营长。杨虎城进关后打垮了西北民军，赵伯经部被改编为地方民团，驻扎麟游崔木镇。过去，省委也曾派袁鸿化等前去进行过联系。对这次行动，我们作了好的和坏的两手准备。到崔木镇后，赵伯经的政治态度十分明朗，积极支持我们开展工作，很快在其部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党支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像这样一个能按时过组织生活的完整党支部，在西路地区还是唯一的。

在乾县铁佛寺镇，也有一支原是西北民军的地方武装，其首领是张科科、张熬娃。为了争取这支武装力量，省委派二张的同族兄弟张庚良前去工作，担任了这支武装的头目，并指定我与张庚良单线联系。有一次我在一个药铺与张接头，还见到张涛，但都不知道彼此担负的任务。这一时期，敌人大规模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周围调兵“围剿”，为了牵制敌人，地下党领导群众积极在敌占

区发动武装起义，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配合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敌人一军官路过铁佛寺被部队杀死投入井中，利用这个机会党组织鼓动部队，发动了武装起义。成立了陕甘边抗日联军，张庚良担任司令，刘庚任政委。一鼓打下了永寿县城，缴枪一百多支，处决了该县反动县长，然后将部队撤到与麟游交界岳御寺一带。后来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攻之下，部队粮弹消耗殆尽，不得不分散转移。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牵制了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敌人，使东北军一个旅的军队在这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在这期间，渭北游击队在三原民团围攻之下难以立足，游击队负责人汤玉怀、李露天带七、八个人由谈国帆介绍到我处，我将其带到崔木镇与赵伯经取得联系后，安置在镇东一个党员家里。游击队昼伏夜出，经常利用有利时机在西兰公路上拦截敌人车辆，破坏敌人交通设施。有一天晚上土匪来该家抢东西，游击队意外地与之打了一场遭遇战，受了些损失后又返回渭北。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东北军部队纷纷南撤，有些还在我们学校里歇息。通过他们，我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过程，便立即去麟游通告了赵伯经。我们决定乘机动作，占领了县城，搜查了县党部，逮捕了反动分子甄寿安等。在麟游住了几天我便动身到西安，与崔廷儒取得联系。他对我说，自“西安事变”以来，何应钦出动几十个师威逼潼关，准备打内战，为了巩固部队，积极备战，党决定成立西北军工委，指定他负责。并要我通过社会关系到十七路军工作。我有个同学叫习孔昭，是我介绍的互济会员，他和西安城防同令孔从周是同乡，通过他的关系，我去警备二旅六团工作，担任上尉政治协理员。这个团原来是杨虎城收编张飞生的土匪部队，住在西安城外，我去后他们表面上非常热情，派了勤务员，集合部队让我讲话，但不让到下边去和部队接触，还暗中监视我们的活动。停战协议达成后，决定警二旅开往三原。但六团却被敌人收买，反而向西开到户县秦渡镇，我也随之失去了自由。第二天早晨乘人不注意，我跑回西安，向孔从周作了汇报，孔说旅部已到了泾阳，要我随部队行动。

当时八路军总指挥部设在泾阳云阳镇，我找到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后，奉命回到西安。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已经成立，崔廷儒奉命去关中特委传达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的指示。根据省委指示，我仍然回西路开展党的工作。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注：①根据魏光波回忆是党中央派他回陕的，他们是在渭南背坡村开会成立西安中心市委的。

*根据严克伦一九八五年四月访问谈话记录整理。

严克伦，陕西永寿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人大主任等职，已故。

临潼地下斗争和乾县铁佛寺起义*

刘 庚

一九三二年冬，陕西高级中学被国民党省政府武装解散以后，我们被迫离开了学校。省委先派我到渭北游击队工作，后又调到红二十六军二团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红二十六军党委派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部队行动计划。任务完成后，于同年八月被省委派到临潼县做地下党的工作。

当时县委书记是刘克，我任副书记。约在一九三三年冬季，刘克调走了，我接任书记，兼作共青团的工作。县委委员有房致遥（曾任县委组织部长）、岳万钧（也曾参加一段县委工作，职务记不清）两同志领导着临潼渭河以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共有党员 10 余人，分布在县城附近的上朱村、沙河及斜口、马额等地，其中上朱村和斜口还都建立了党支部。

那时，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地下武装，与敌特、叛徒及向敌人告密者作斗争，还有筹集活动经费等。曾一度联络了火蝎子等十余人，在龙寺庙开会，举起了地下武装斗争的红旗。约在一九三三年秋，发现地下党员遭敌逮捕是有人告密，就很快查到这个告密人，据说他家里有马拐枪和大烟土。组织上立即决定打击这个人。一天晚上，火蝎子等人秘密包围了他的家，抓住了这个人，要他交代罪行，交出枪和烟土，他硬不交。时间长了我们怕暴露目标，招来敌人。原拟把他拉到野外，蒙上眼睛，绑到树上，以便我们脱身。不料正走时，火蝎子猛不防给了他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

大约也是一九三三年秋季，叛徒张培述带着特务到西安粉巷一个裁缝家捕我未逞，又追到临潼来。我得知消息后，即与地下党员冯克征、雷振东一起研究布置，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新丰镇豆腐沟一个群众家里，把张培述从睡梦

中抓起来，当即用折腰子枪把他毙了。叛徒张培述曾任渭北游击队中队长，我在该队任指导员。张是一九三三年叛变的。

一九三四年秋，西安的叛徒特务带着保安队到临潼捕房致遥，正遇我和房致遥、魏光波等同志在下朱村小学开会商量工作。敌人进门时，我们正做午饭，房致遥在烧火。这伙敌人不认识房致遥，就狡猾地说他们是省上来的，要在陇海铁道两旁植树。叛徒还说：房致遥保正（房曾任敌基层政权的保正）热心于公益事业，我们特来找他。当时房不知是计，一边烧火，一边不耐烦地说：我不当保正了，请到仓头找新任联保主任张二明去。这样一来，房致遥同志自己暴露了，话音一落，敌人狗娃老八立即上来，一手抓住房致遥的领口，一手拿着手枪威胁，要将房致遥往外拉。房致遥还若无其事地问：“啥事情吗？”狗娃老八张生鑫说：“你做的事你知道。”房致遥琢磨，反正自己暴露了，刘、魏等还没有暴露，他为给我们留下逃出的机会，也就再没有和敌人多纠缠，跟着敌人向门外走去。敌人刚一跨出门外，我和魏光波立即飞奔后院，翻墙后从野地里向西逃跑。后来听说，我们逃出不久，敌人又返回来抓我们，当然只能扑个空。但半路上不知怎么又遇到没和我俩一起跑的聂俊臣，结果他被敌人抓走了。（据魏光波说，聂俊臣是西安市委派来临潼的，魏是市委书记，是前来检查工作的。）

一九三五年夏，敌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地下党活动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原在汉中搞兵运工作的杨信、毕彦昌、吴云昌、王立天、张涛等，因敌人搜捕很紧，就开小差跑了。王、张跑往西安，杨等三人跑到临潼，相约分途设法找党的关系。吴云昌先接上了头，后杨、毕二人也经吴介绍找到了我。我们就在一起开展地下工作。不久，王立天在西安被敌人抓住叛变了。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就是这个叛徒带着敌特由西安到临潼抓人。他们先到斜口柳树村毕彦昌家。一进门谎称已找到省委，是省委派他们到临潼来检查工作的。毕彦昌、杨信信以为真，就将临潼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如实告诉了王立天等人。敌掌握了情况后就开始抓人。此时王立天的良心也没有丧尽，还不是死心塌地背叛革命，为敌人效劳。正在敌人开始抓人的时候，王立天中途跳火车逃跑了。他跑到毕彦昌家，将自己叛变投敌等情况告诉了毕、杨二人。得到这意外消息，毕、杨二同

志一方面马上隐蔽起来，一方面派毕彦昌的哥哥给我通消息。不过这时，我因为有我村的刘克勋从铁路警察闲谈中得知火车上跑了个共产党，他已向我透了消息，我立即隐蔽逃脱了。这次由于王立天的叛变，敌人抓走了吴云昌、魏宗宇等同志。

一九三五年十月，临潼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在县政府和家庭的双重迫害下，我在家实在待不下去了，流落到西安，在杨虎城部队宪兵营新兵排当兵。在这里，我常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谈心，做兵运工作。新兵排有一位姓赵的排长，对我的工作也曾暗中给予帮助和支持，但彼此未公开身份；我孤军奋战，苦于没有上级领导，万分焦急地盼望着尽快找到上级党的组织。一天清晨，新兵排正在新城广场上早操，一个穿长衫的人匆匆走过队前。我仔细一看，是崔廷儒！我的心情霎时变得异常紧张，多么想跑上去和他谈谈！但又怕暴露了身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远。下完操，正往宿舍走，猛听得赵排长在背后叫我，回头一看，他身边还有一个人，正是崔廷儒！看到我不顾一切地跑近了，他低声说：“我以为你死了，原来你还在啊！”声音饱含感慨和激动。望着他和赵排长，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我日夜寻找的战友和组织！我不是孤独的，我又找到了党，找到了同志。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我也明白了，廷儒一直通过赵排长在暗中考验我，支持我。从此，我就在廷儒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在士兵中开展革命工作了。

当时，西安有两个宪兵部队，一个是中央宪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比较好；另一个是杨虎城的宪兵营，属于西北军的地方势力，装备比较差。这两个部队的矛盾很尖锐。而宪兵营里又有很多同情革命的青年学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分析了以上情况，廷儒指示我们，要利用地方势力和伪中央的矛盾，利用青年学生易于接受新思想的特点和广大士兵反对官长压迫、要求民主平等的心理，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士兵运动。

一九三六年夏，日本不断向华北蚕食侵略，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积极向苏区红军进攻。为了发展抗日运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蒋的围剿部队，省委决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崔廷儒指示我设法离开宪兵营，和夏飞等人去乾县铁佛寺伪保安中队组织兵变。铁佛寺保安中队成分复杂，组织性、纪律性很

差，素有“山大王”之称。但他们大多出身贫苦，不满现状，而且，他们对乾县保安大队的压迫威胁，早已心怀怨气。我们就利用这个矛盾，通过保安中队长、共产党员张庚良和一些队员、头目的同乡关系，广泛结朋交友，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率领这个保安中队成功地发动了起义，攻破了设在监军镇的永寿县政府。以后中队经过改编，宣布成立“陕甘边抗日联军”，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共二百多人，张庚良任总指挥，我任政委兼参谋长。抗日联军在麟游山区活动，广泛宣传抗日，严惩恶霸，救济贫民，声威大振。后来，敌人调集了大批正规部队，配备大炮、机枪，“围剿”我们。正在战斗激烈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一挺机枪出了故障，战斗力大大减弱。最后，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撤退了。我们的特务队长、共产党员朱永德壮烈牺牲。我在一位同志的掩护下，躲过敌人的搜捕，辗转回到了西安，在灞桥小学见到了崔廷儒。出乎意料的是，在这里，我还见到了“陕甘边抗日联军”幸存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原来他们也都和崔廷儒有联系。这时，我才明白廷儒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他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指挥着、部署着全局，对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王少民、姚文琦整理）

*根据刘庚《崔廷德领导我们搞兵运》（载《革命英烈》一九八三年第2期）节录整理。
刘庚，陕西临潼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等职。

陕西临时省委特工队*

杨嘉瑞

一九三三年春，党组织为我在孙蔚如部队的补训第二团，活动了一个骑兵连长的位子。当时，我们党在这个部队的力量比较强，记得在我们到达时，在全团就有二十七名党员，后来陆续发展到约五十多名党员，陕西临时省委军委胡振家（西安市红埠街人，解放后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处长、中共中央某局局长，一九八二年五月病故）还搞到了副团长的身份，有些党员当上了书记官（贺修之）、军需官和文书等职务。

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这个团由乾县调到西安。到西安后，就以营为单位分编到其他各部队去了。我所在的那个骑兵连，缩编为一个排，把马交到了警备师师部（师长刘文彬，解放后曾在省政协工作）。

陕西临时省委在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间成立后，即决定在西北军和地方保安部队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抓武装。因此，在临时省委直接领导下，还组织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搞地下武装，开展游击活动，打土豪，筹款，清除敌特、叛徒等。

陕西临时省委特工队的负责人，除了我以外，还有：赵成璧（长安县郭杜镇郭北村人，解放后曾先后在长安县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省粮食厅等单位担任处长、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李鼎九（西安市西郊三桥南何家村人，一九四二年牺牲）。

这个特工队，实际上是一支地下游击队。主要活动于西安城郊、长安县、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有时也到武功、永寿、彬县等地。人数虽不多，但较精干，活动地区相当广泛。主要是宣传发动群众，进行秘密联络，打算搞到几百人，编为一个支队，再在秦岭山区搞一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开展

游击活动。人员来源：一是发动受剥削、受压迫最重，反抗精神较强，觉悟较高的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另外，也在旧军队里活动，有机会就连人带枪拉他一部分出来。武器来源：一是从旧军队里搞，如临时省委负责人孙作宾同志，就曾通过杨虎城的特务二团团团长、地下党员阎揆要同志的关系，搞到了两支短枪交赵成璧、李鼎九，再是到地方官吏、土豪恶霸家里搞他们看家护院的枪枝。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极为嚣张，广大工农群众和下层小资产阶级（贫寒知识分子），甚至地方杂牌军队里的士兵，下级军官，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都极为不满，有的已自发起来反抗。在这种形势下，赵成璧、李鼎九和我几个党员，按照临时省委的布置，秘密地分散活动，在群众中个别进行工作，先是攀亲戚、交朋友，从拉家常谈到杀富济贫，申冤报仇，以适应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待比较熟悉，有些基础后，再进一步讲述革命道理。

在这段时间里，斗争环境虽然复杂，条件非常困难，但有利因素也不少，工作进展还是顺利的。

首先，铺开了许多点，也联系了不少人。当时，我主要负责西路的工作，在兴平县经常有两个活动的据点：一是东马村，主要在牛兆麟家，经常在这里活动的除牛兆麟外，还有杨生枝（牛的表兄）、曾有寿等，他们除联系周围的人外，还到周至县、户县等地活动；另一个点是石张铺，多在牛体坤家，他是小学教师，人称“牛先生”，这里还有解马龙、木匠王（名字记不起了）、杨志谦等；在礼泉县（靠北山）有张麻子；武功县有贺延录；户县有张志祥；乾县有梁发荣；在兴平县保安队里还有肖海山（班长）。另外，李纪刚在各点上负责跑联系，此人过去在国民党干过，并曾参加过我们党在湖北省沙市组织的兵变，那时他就知道我是共产党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直接间接之间联系的人已达二百多人。

有了人，还得有武器，方成其为队伍。一九三四年，遵照陕西临时省委指示，趁补二团整编之机，在那里设法搞到了十枝步枪、两挺冲锋枪和几把短枪（确数记不准了），还有一千多发子弹。将这些枪枝弹药用被褥包裹起来，打成行李卷，装上马拉轿车，由我妻王莲芳押送，连夜运回我老家——兴平县落

庄村。

有一次，在西安南院门（这里在当时是西安最繁华的商业区）东边的一个小巷子，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的公馆，里面住着一个刚卸任下来的县长。我同解华亭（长安县人，现在四川省政协工作）、沈振刚、张志祥……等五同志，趁天刚黑，突袭进去，留下沈振刚一人守住大门，他用铁丝从里面把门拴住，防止有人出入。我们四人直奔厅房，通道的侧室住着那个县长的太太，她一发现我们突然进来，吓得面色苍白，战战兢兢地说：“你们……要什么？”接着要将手上戴着的金戒指往下卸，我说：“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不要你的东西，枪放在什么地方？”她一听是共产党来了，害怕得更厉害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吞吞吐吐地说：“枪……他们……带出去了，子弹在那里！”用手指了指墙上。我说：“不许你喊叫！”并用手枪对准着她。其实我们几个人，只有我手里拿着的这一把匣子枪，别人都是空手。我们把挂在墙上装得饱饱的两袋子子弹取下，便迅速离开，出门叫了“洋车”坐上，飞快地走了。前后约莫过了半小时，听到开来不少宪兵，大声呼啸着要抓“共产党的红军游击队！”而我们早已安全转移了。这次，我们临时省委特工队的行动虽然不算大，但在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在敌人反动统治的“心脏”——西安闹市区的省党部部长公馆里，出现这类事件，对各方面的影响和震动还是不小的。尽管敌人绞尽脑汁，残酷镇压，但共产党是杀不完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

打土豪、筹款，是另一项任务。我们陕西临时省委特工队的赵成璧、李鼎九和我，曾带领队员先后在西安郊区、长安县、户县等地，袭击了敌伪六个乡公所，其中四处搞成功了。牛兆麟等还曾到武功县去打过土豪。有一次在兴平县，将一个外号叫“猴子”（诡计多端）的恶霸地主杨汉章，拖到寨门外痛打了一顿，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说：“除过牛三（牛兆麟在其弟兄中排行老三），谁敢动‘猴子’一根毫毛！”在长安县斗门镇街上，夜间，由我特工队负责人赵成璧装病，说要买药治病，叫开药铺店门。药铺隔壁是一家烟土（鸦片）店，我们特工队的几个同志翻墙过去，搞了不少的大烟土，用群众拾麦用的那种扁形竹笼子，装了满满两笼子，约有五六百两。我们特工队的几个人打土豪到了长安县南部解华亭的一个亲戚家，这家伙老奸巨猾，开始胡支吾不肯

给。不知谁喊了一句：“不给，放火烧！”老板这才无可奈何地拿出三百块银洋。

（李德运协助整理）

*原载《陕西地方志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编者有删节，并加标题。
杨嘉瑞，陕西兴平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已故。

王泰吉起义、渭北工委和 两次向中央汇报*

谈国帆

我是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虎城进关第二年我在杨的骑兵团任二连连长，团长是王泰吉。就我了解，王泰吉在麟游就搞过兵变，还参加过渭华暴动，在渭华暴动时他是党员，以后失掉了关系，耀县起义时不是党员，但思想很进步，和党内联系密切。骑兵团里还有不少共产党员，现在能记得起的有刘清合、赵启民、魏志坚、袁宏化、陈守印、王英。起义时王英还在骑兵团，其他党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已先后离开了部队。

骑兵团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驻防西安，王泰吉任城防司令，二连守西门。当时刘志丹在陕北等地领导开展游击战，装备非常困难。党给我们的任务：一个是武装护送弹药和其他军用品（这些物资一部分是由骑兵团送给的，一部分是地下组织购买的）；一个是接送党内来往行人。约在一九三二年后季部队开往户县，后又由三原开往耀县，时王泰吉任渭北“剿匪”总司令。主要是针对我心、武两区，但在这方面王并不积极，而且继续给我们很大帮助。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王泰吉就准备起义，王和省委有联系，也得到了三原县委的支持，党领导了这次兵暴。

记得起义前一天晚上，王泰吉召集连以上干部和积极分子在耀县教育局开会，杜衡代表省委在会上讲了话，对起义作了详细计划。第二天用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收编了雷天一地方民团，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兼第三路指挥，政治部主任是杨声，骑兵团和民团共一千几百人。编了五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郑子明，第二大队长任建民，第三大队长张龙韬（山西人，王泰吉的学生），第四大队长周德民，特务大队由我担任队长。

每个大队都有民团的一个中队。起义后在耀县停了七天，发动群众搜捕豪绅，分粮给贫苦市民，搞了一百多驮子物资。还搞了很多枪和药品，很大一部分供给了耀县地下党张仲良、陈幽栋等领导的游击队。

起义后原计划到三原搞掉杨竹荪团，因事前曾和该团武营长有联系，准备里应外合，然后到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会合。但因天雨，起义部队没有到三原，由耀县开到陵前侯家堡，召开了群众大会，准备过倬玉河到心字区。部队到鲁桥发现有敌人，又开到辘辘把和孙苍狼部队遭遇，后部队分散，计划在小坵会合。我所带的特务大队被敌包围在安社，没有赶上集中。据说他们在小蚯集中后又决定分散活动，但分散开来以后再没集中起来。王泰吉只带几个人到了照金，我在王到照金的第二天带了九十多人也赶到了，到照金的总共有一百多人。政治部主任是高岗。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组织派我到西安搞武器装备。就在这时，王泰吉在淳化通润镇被敌人逮捕，押送西安惨遭杀害。王泰吉的父亲王新斋也因此被迫回了故里。当时，陕西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从十七路军中搞武器装备的任务也无法执行，只得暂返临潼交口家中，等待机会再到陕北去找自己的部队。

一九三四年春，为恢复处于瘫痪状态的地下党组织，临时省委崔廷儒联络在渭北、西安等地分散活动的地下党员，重新开展工作。崔到关中先见到周芝轩，周让崔到交口找我联系。大约在三、四月间，崔来到我家，传达了上级的意图，并要我留在渭北长期搞地下工作。自此，我就协助崔廷儒开展活动。我先后介绍西安二府街三号的李焕卿处和临潼栎杨镇杨宜汉的家，作为他活动的立足点，还有旁的地方，我家也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这以后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就在东自潼关，西到麟游、眉县一带活动。

经过一年时间的联络，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分散在关中各地活动的同志，互相部通了声气，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很需要在渭北成立党的组织机构。经周芝轩提议，崔廷儒同意，酝酿成立渭北工委。因为大革命时就成立过渭北工委，认为现在仍以成立渭北工委为宜。渭北工委成立会就在临潼交口我的家中召开。当时到会的有周芝轩、孙一君和我。决定工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周芝轩，宣传委员孙一君，军事委员黄子祥（未到会），统战委员是我。崔廷儒是上级

派来的联络员，渭北工委成立的情况，由他向上级汇报认可。周芝轩是蒲城尧山中学附小的教员，孙一君是高陵乐花村完小教员，黄子祥人在眉县，常来往于三原武字区一带，我在临潼栎杨、交口一带，这些地方也就成为党的地下工作的活动据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陕西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蒋介石妄图消灭刚刚在陕北会合的各路红军，夜以继日地调兵遣将，以三十万大军围攻我陕甘宁根据地。党中央一到陕北，就着手抓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还在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崔廷儒告诉周芝轩：“中央想把外边情况了解一下，上级叫你们去个人向中央汇报。你们商量，看叫谁去合适。”周芝轩把我叫到蒲城，对我说：“中央刚到陕北，要了解关中白区的情况，叫我们派人去汇报工作。子祥在眉县，一君和我教书离不开，你去跑一趟。你对白区的情况了解，对渭北的人事地理很熟，去也十分相宜。”我听后很高兴，当即决定马上动身。周芝轩叮咛：除作好汇报外，要认真听取中央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指示，并告诉我由三原陵前长坳堡的王瑞祺给我引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农历十月十四日），我和张剑颖（栎杨的民主人士）在王瑞祺的引导下，由陵前动身，经照金、马栏到了甘肃正宁湫头村关中特委所在地，找到了特委书记鲁贲和行政负责人张邦英。在湫头住了一个多星期，阎红彦从苏联回国也由西安来到湫头，特委决定派武装交通队（队长黄罗斌），送我们三人去陕北。

大约在十二月下旬初，我们到了瓦窑堡，住在中央白区工作部，我和张浩部长睡在一个炕上。由于我是从白区来汇报工作的，中央很重视，不几天就领我去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很忙，见面听了介绍，同我握过手，就谦和地问：“有什么事找周副主席谈一下好吗？”我连忙点头，回答说：“好”。随即同工作人员去见周恩来副主席。

周副主席听工作人员报告说白区来了人，亲自走出窑洞，握着我的手，把我让进窑里坐下，亲切地说：“路上辛苦了！你来的很好，是中央到陕北后从白区来的第一个同志，中央很需要了解外面的情况。但是，现在中央正在开会，不能和你多谈，你可以和白区工作部张浩同志详细谈谈。”周副主席浓眉大眼，

一束美髯，气宇轩昂，语音爽朗，几句话就说得人心中热呼呼的。我初见面的那种局促不安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他问了我的名字，哪里人，又问到路上好走不好走？沿途在什么地方停留？在听我回答这些问题时，他还拿起地图查看。当我说到栎杨、交口时，他指着地图说：“啊！在这里。”我当时并不知这些问话的含义，只当是拉家常哩。在我告辞的时候，周副主席关切地说：“你来了多住些日子，这里正在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有机会你也参加参加。”

一九三六年元旦那天，毛主席亲自设宴招待，我也被邀请参加。窑洞里摆了两张桌子，坐了十六个人。毛主席向我们每个人都敬了酒。当时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一切用具都很简单，我们是自带碗筷去参加宴会的。然而，这却使大家都觉得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有一种情如手足的亲切感。

我在瓦窑堡期间，除向中央汇报了关中白区和渭北工委的工作情况外，就是参加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是张浩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安排的。会上，我听了七个报告，有毛主席讲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周副主席作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报告，张浩的白区工作问题的报告等，还学习了文件，参加了小组（当时叫马克思小组）讨论会。我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邓颖超。我虽然入党已经好几年了，但接受如此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策略教育，这是第一次。我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会议的主要精神我都领会了，它使我认识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是一条真理。要完成民族革命的神圣使命，就要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次学习，对我这样一个在白区工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难得啊！多么宝贵啊！今天回想起来，依然充满幸福的情感。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由瓦窑堡动身回关中。回来时，带了很多党的文件，到临潼家里休息了几天，就先后到三原、泾阳、高陵、渭南等地分送党的文件。

一九三六年夏、秋之交，我又去中央一次。这次仍是由临时省委崔廷儒通知我到西安东大街——西北大旅社接通关系的。去时我们一起十几个人坐东北军的汽车到洛川，晚上，东北军派一排骑兵送我和这十几位同志到富县套筒塬。在这里，中央派欧阳钦来接我，休息了一两天，就动身去党中央所在地保安。

这次临时省委交给的任务一是帮助一位叫大刘的同志带一个皮箱，安全送到保安中央机关；二是给许权中和中央接通关系。到保安后我才知道那个皮箱内装的是中央为接待美国作家斯诺，在西安购买的物资。

在保安期间张浩部长曾引我分别去见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和我谈了话，详细询问了临时省委和渭北工委的情况，我向他们一一作了汇报。在给周副主席汇报结束时，他一再指示我转告临时省委和渭北工委的同志，要想尽各种办法把苏区通往关中、西安的交通线搞好，并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最后，我给周副主席谈了许权中的组织关系问题。

这次我在保安住了一个多月。回来后，仍和以往一样，把从中央带回的文件分发给渭北各地的党组织。这次回来不久，就爆发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崔廷儒叫我到西安，要我给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在西安解决吃饭、住宿和开展工作的据点问题。经过和崔廷儒一再商量，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地点要绝对安全可靠，想来想去，还是由李焕卿解决这个问题。李同意将他在二府街二府园的住房腾出，作为贾拓夫、张德生等地下党同志活动和吃住的地方，以秘密配合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李焕卿凭借十七路军参谋长王一山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崔廷儒和我密切配合，完成了这项任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的省委在西安建立，我便在新省委的领导下继续战斗在三秦大地。

（姚文琦整理）

*根据谈国帆政治历史情况一有关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部分和一九八四年八月访问记录整理。
谈国帆，陕西临潼人，建国后曾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等职。已故。

一九三六年陕西省委的组织*

张德生

双“十二”事变后，我们从边区出来，组织陕西省委。当时，省委书记是贾拓夫，组织部长是我，宣传部长李一氓，军委欧阳钦，秘书是彭加伦。

省委成立，首先是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当时，地下党员只是个别的，部队保留了一些。陕西党恢复在双“十二”事变之后，开始在学校，第一个入党的是董学源，同时入党的有七八个人，经过董学源又发展七八个人。在西安师范、西安高中、西安二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此外在西安工人中发展了一些党员，铁路、邮电局、大华纱厂等，不过人数不多，也恢复了一些党员的党籍。

省委当时提出来的第一个任务是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放蒋介石，有些左派想不通，党员也想不通，我们给做了许多工作。再做东北军、西北军工作。西北军委员会欧阳钦搞，东北军委员会朱理治搞。还有民运指导委员会由潘自力、方仲如和方的弟弟方涛搞。最活跃的是学生，学联（大约在一九三七年）由李连璧负责；妇女组织曹冠群负责。当时有些报纸刊物，如《学生呼声》、雀委机关报《西北周刊》。

（刘玉平整理）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关于陕西党史问题的谈话》摘录整理。

张德生，陕西榆林人，建国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一九六六年已故。

一九三七年陕西省委片断*

王 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受北方局派遣，从北京来到西安。和我一块来的是孙志远（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和他的爱人以及妹妹。我原准备去苏区上红军大学，到西安后，北方局西安交通站的刘淮和我接上头，就留我做交通站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我调到陕西省委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是贾拓夫，组织部长张德生，宣传部长李一氓，秘书长彭加伦，崔廷儒是省委委员，好像也做过秘书长。赵伯平、严克伦有时也到机关里来。我在机关主要做保卫工作，还有刻钢板、印刷、抄写、秘书等工作。后来搞过省医院、玫瑰中学两个支部，还有妇教会的一个党团。和我一块做机关保卫工作的还有白茜（贾拓夫的夫人）、王仪（李一氓的夫人）。我兼管伙食账。

省委机关开始在药王洞和二府街，后来相继搬到九府街、纸坊巷、地君庙。

我到省委不久（过了春节），因形势发生变化，省委机关从西安迁到云阳镇。大约三月间我和德生又回到西安。

（刘玉平整理）

*根据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王文谈话记录整理。

王文，黑龙江哈尔滨人，建国后曾在全国政协工作，已离休。

西安事变前后西安学校 党组织和学生运动*

董学源

一九三四年秋，我在榆林时，榆中党组织已在一年前遭破坏。我和杨凌汉、老曹等虽自动组成党小组，但始终未找到党的上级。恰在这时，柳青（刘蕴华）的哥哥刘春圆（刘绍华）来信叫我们到西安上学，并汇来路费。我便和柳青从榆林到了西安，一是求学，二是想在西安找党的关系。柳青是团员，我是党员，我们的党团组织关系一直未转来，可能主要是因组织遭受了破坏的原因。柳的哥哥在西安高中教学，他大革命时期是党员，和杜斌丞关系好，我们到西安就住在他哥处。此时西安师范招收公费学生，每月发五元钱，我因无人按时给学费，即考到西安师范，柳青考了高中。

我和柳青因党团组织关系迟迟无法转来很着急。一九三六年夏秋时，陕北红军中的一个党员申元龙（申广盛）来西安看病，我们过去相互知道是共产党员，他多次来与我商量在西安建党的问题，我几次提出将我在西安学生中所了解的一些够党员条件的学生，在未找到上级组织之前先介绍入党，他表示完全同意。当时的形势对建党的条件很有利，主要情况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很大，特别是对进步青年影响更强烈；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普遍拥护；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对西安青运的开展促进很大，西安学生举行了积极支持的游行宣传。不少先进青年对加入共产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思想觉悟也逐渐增长。总之，革命高潮的形势越来越明显，提高了青年们对共产党的进一步认识。

我先介绍刘南生（刘日修）、柳青、何志诚（一九三八年叛变）、蒙念祖、

邵武轩（邵文修）、王喜得、张芝芳等同志入党。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成立了西安师范临时党支部，我任书记，委员有刘日修、姜辅文。在与省委接上党的关系后，即改为党的正式支部。

临时党支部派刘南生到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工作，决定他任学校救国党团（即党组）书记，并在参加学联会的各校学生中发展党员。苏一乎、蒙念祖、李连璧、何志诚等也都先后在学联会学联党团工作过，都不断地从各校介绍积极分子入党。我当时全力放在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的建设等秘密工作方面，公开活动极少参加。“西安事变”后，各革命党派和群众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大大活跃起来，救国会和宣传队等都发展很快。在党的领导下，以民先队和学生救国会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先后几次组织了一百几十个下乡和回乡（即在暑、寒假时回本县）工作团，在有党员参加的各工作团都成立了党团（即党组织）、临时支部或党的小组来负责领导各团的抗日救国宣传工作。积极促进各县建立民先队、学救会等工作。并在各县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新发展党员候补期半年或三个月那时因党员很少，我们临时规定有些候补党员也可以发展新党员（以后省委认为在那种特殊情况下，那样做是对的）。一个学校只要有三个党员即可成立支部，只设一个支部书记。最初各校没有党组织，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左右，在西安的一些主要学校中，如西师、西高、一中、二中、女中、女师等校，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支部和小组一般不定期开会，而是个别接头交谈。各工作团不仅在各校学生中发展党员，也在下乡的外县发展党员。以后将他们党的关系都交给省委。当时发展民先队在关中地区，几是公开进行的。李连璧、付希亭、朱平（朱怀林）等同志都负责过民先队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很多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参加抗日救亡的组织，照旧上课的极少，天天能听到抗日爱国的歌声。“西安事变”后，敌人在西安的特务机关基本被搞垮，国民党的省党部也由学联会占用办公。

一九三六年底新的省委成立后，我们很快通过申元龙找到白丁，而与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派霍建德来与我们接上了关系。以后省委领导人也找我们谈问题或开会，如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冯文彬、危拱之、惠子俊、李一氓等。我曾到欧阳钦、危拱之在西安的住处去谈过问题，开过会。

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下旬，省委得知蒋介石要派其亲信军阀顾祝同进驻陕西，中央指示省委从西安搬到泾阳县云阳镇继续领导陕西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党的建设。省委在云阳的对外名义是一一五师留守处。省委迁离西安前确定成立西安市委，惠子俊任市委书记，我和胡达明为委员，市委没有集中在一起开过会，都是个别接头联系。

我们党对青运工作的指导思想，当时特别强调团结抗日救国，强调青年工作中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后，进步青年们很兴奋，很高兴，因对蒋介石残害革命的不满和愤恨几乎都要求把蒋介石杀死，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要放走蒋介石很不理解，很多人的怨言不少。经过中央、省委及党员多次反复解释说明不杀蒋介石对抗日全局有利，杀了会发生更大的内战，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群众逐渐懂得这一大局之后，就完全拥护党中央和平解决的伟大方针、政策。

一九三七年二三月间，西安各主要学校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后，省委决定撤销西安市委，成立三个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即：西安市工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惠子俊、胡达明；西安市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董学源、刘日修等；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张秀岩、曹冠群。至一九三八年三月我调离西安之前，学委的委员记得有：刘日修、姜辅文、郭蔚林（罗文治）、杨春荣（杨浩林）、王喜得、萧蓼（肖江洪）、聂景德等。学委的书记先后为：董学源、刘日修、董学源、陈煦（毕于仁）。与学委直接联系工作的是崔建德、张德生。

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省委选派贾拓夫、赵伯平、周芝轩、胡达明、董学源等五位同志去延安参加苏区党代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到延安后，我们曾向刘少奇汇报过一次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是西安地下党组织大发展时期，也是大批青年去革命根据地的时期。我们不断地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民先队、学救会等向延安、云阳青训班送去学习或工作的进步青年。他们绝大部分是步行去的。也有由八路军办事处的车带去。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顽固反共派在去延安的路上设了不少“检查站”，把不少去延安的青年扣押送去他们的“集中营”或

监狱。

一九三七年夏，省委派我到西安二中当训育员，实际是在该校建立了学委的联络点和秘密办事机关。当时二中校长江隆基、训育主任田静沉都是共产党员，教员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这里，为抗日战争中党的斗争培养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贾波、张培林整理）

*根据董学源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几次谈话记录整理。
董学源，陕西延长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回忆西北特支和陕西省委*

徐彬如

一九三四年春，我受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领导，来西安开辟西北的工作。当时福建省政府正在组织闽变。我来西安的主要任务是要杨响应闽变，在西北起义，和我同来西安的有王根僧同志。由于闽变失败，杨虎城在西北起义的“大西北计划”也宣布告吹，我不得不离开西安。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杨虎城非常高兴，要我来西安共同计议。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指示我们这次去要在西安建立起党的组织——“西北特别支部”，并明确西北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

- 一、积极贯彻党的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
- 二、积极开展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掀起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 三、积极支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

当时陕西省委由于杜衡的叛变而遭到破坏。中央明确指示我们不要与陕西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不要发展党员……就这样，谢华、童陆生、李木庵和我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先后来到西安，和在西安坚持工作的金闽生、王根僧、宋绮云等同志成立了西北特别支部（以下简称西北特支）。

西北特支的成员有：谢华、金闽生、王根僧、李木庵、宋绮云和我，还有小杨和郭子化，由谢华任书记。小杨是陕西根据地的代表，郭子化是苏鲁豫皖特委书记，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经请示军委留沪办事处，临时归西北特支领导。王根僧已被杨任命为参谋处长，金闽生是杨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负责西安市内社会治安，宋绮云是《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童陆生是金闽生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关系很好，被安排在宪兵营任副营长，谢华也被安排在宪兵营里工作。

西北特支是在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党中央设在瓦窑堡，这时派交通员来西安与西北特支接上了关系，我们将在西安的工作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党中央又派张文彬来西安负责领导西北特支的工作，并向我们明确交代西北特支的工作直接由周恩来副主席领导，张文彬来西安，就是周恩来副主席派来的。张文彬是毛主席的秘书，一九三六年来西安时才20多岁，年轻精干，他除了带来周副主席的指示外，还带来了许多中央文件。

西北特支是党的工作机构。杜斌丞不便于参加公开活动，不是西北特支的成员，但是作为杨虎城的高参，我们大小事情，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决定，都要和他商量。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在上海以宋庆龄、蔡元培、马相北、沈钧儒为首，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童陆生由上海来西安时，带来了救国会的章程、宣言、传单等有关救国会的文件。西北特支经与杜斌丞相商，并征得杨虎城的同意，组织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西救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西北特支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西救会的工作，谢华负责组织部，童陆生、杨明轩、韩卓如负责总务工作，我和宋绮云负责宣传部。

成立西救会，在西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杨虎城是很支持的，西救会的经费也是杨提供的。他委派杜斌丞作他的全权代表，因杜不便参加公开的群众活动，由韩卓如（韩兆鹗）出面参加了西救会的工作。西救会还出版了《救亡周刊》由《西北文化日报》社代为印刷。宋绮云还选派了几名编辑人员，负责《救亡周刊》的出版工作。在金闽生宪兵营内，连、排以上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负责维持市内社会治安，并借以保护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在宪兵营的保护下，曾发生了驱逐南京派来任教育厅长的李范一；“四·二六”学生殴打了蒋介石派来西安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戴季陶，放火烧了戴的汽车；西安学生三次大闹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捣毁省党部的办公室，砸毁了省党部的牌子，抄出了省党部委员田毅安的大烟具上街游行；一九三六年初，学生为了驱赶西师反动校长田洁生而闹学潮等。

不久，又由宋黎及东北来陕的高崇民、车向忱以及在西救会工作的张兆林

等发起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在西救会和东救会领导之下，西安市的抗日爱国救亡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有组织地搞了多次群众性的活动，如：“九·一八”五周年，西救会、东救会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举行示威游行；十月十日也召开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十月下旬组织了追悼鲁迅大会；十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西安围城纪念大会；十一月末举行援绥抗战大会，并发表宣言。

西救会成立以来，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党内的活动日趋繁忙，地下党的同志需要经常碰头、开会研究指导群众运动、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经常在我们同志家开会的办法，已不适应革命活动的需要。经大家研究，决定在西安市内建一个饭馆，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从寻找地址、筹措经费、人员组织等都由宋绮云负责办理。

饭馆的经营管理由蒋自明负责。蒋是徐州人，工人出身，大革命以后由友人集资，他出手艺，在徐州市设了徐州食品店。他为人正直而可靠，过去一直和地下党员如郭子化、丁毅忱及西北特支成员保持着关系，蒋自明对于菜肴方面确有一手高超的手艺，不管是中餐、西餐，都能做得美味可口。饭馆地址选在风景游览区莲湖公园内，起名为莲湖食堂，经费名义上是私人集股，主要来源还是杨虎城提供的。这些都是由绮云同志一手筹措的。

自从建立莲湖食堂以来，党的秘密会议、党员碰头，都可以借吃饭谈天的形式在这里进行。莲湖食堂设有散座和单间，布置陈设精雅大方，常常座无虚席。莲湖公园内游人甚多，我们来参加秘密活动，穿插自然，颇能搪塞外人耳目。连在西安专门反共的军统特务和国民党省党部也毫无察觉。由于蒋自明经营有方，莲湖食堂生意兴隆，超出意料，很多上层人物也常来这里举办宴会、酒席。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后来还在莲湖食堂设置了电台，及时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地下党通过莲湖食堂巧妙地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传奇一样，还都历历在目。

不久，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又建立了红军联络站，开辟了西安通往陕北的交通线。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工作非常艰苦，党中央的工作、生活条件急需改善，全国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和爱国人士络绎不绝地来到西安，

西安成了党中央通往各地的门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经杨虎城将军同意，我们在西安建立了红军联络站。开辟了西安通往瓦窑堡（党中央的所在地）的交通线，投奔革命的人员，运往根据地的物资，经红军联络站源源不断运往陕北。有些电讯器材、医药用品、文化用品、生活必需品和印刷设备等，西安没有的我们还派人去上海购买。当时，陕北的印刷条件较差，没有铅印机，有关文件和宣传材料都是由中央派人送来西安，由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社翻印后，再通过联络站送往陕北。后来我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宋绮云筹划，将《西北文化日报》社一台对开铅印机，连同铅字、铸字机，经三原运往陕北，同时选派技术工人若干人，有力地支援了党中央的宣传工作。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采取了他惯用的拉拢分化的卑劣手法，平息了两广事变之后，调集了他的精锐部队三十多万人，飞机一百多架，决心对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他自认为是最后一次“围剿”。在他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之后，于十二月四日，杀气腾腾地第二次来到西安，逼迫张、杨“围剿”红军。

借蒋介石来陕之机，西北特支决定在“一二·九”一周年，由东救会、西救会联合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和请愿活动，以掀起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由张文彬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王根僧的家里，由西救会、东救会及学生联合会组织群众两万多人。游行群众先后求见了张、杨及省主席邵力子，由于警察开枪打伤学生，更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声势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商会经动员也参加了游行，商会还组织人为游行群众免费送水、送馒头及其他食品。到下午四、五点钟，王根僧按计划打开了中山门，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开往蒋介石的住地——临潼。张学良闻讯赶到十里铺，劝游行请愿的群众回去。可是游行群众激昂慷慨，痛哭流涕，表示宁愿为抗日而牺牲，也不愿做亡国奴，张学良深受感动。为了避免群众流血牺牲，他保证在一周之内定用实际行动答复大家。

像这样有几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请愿活动，纪律之整齐，情结之高昂，组织得如此严密，都是空前的。

十二月十二日晨，蒋介石及其军政大员全部被活捉。一早，宋绮云就被张、杨派车接进新城，上午十时左右，《西北文化日报》社就印出了《张、杨“兵

谏”经过》及《张、杨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号外在市内散发。

西北特支简要地向周恩来发了急电，汇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请党中央对西安事变作指示。在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之前，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一、在十七路军的支持下，由西救会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李木庵用纸写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几个大字贴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牌子上，挂在大门口。

二、由宋绮云等同志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秦风日报，掌握宣传工具。西安事变后，宋绮云是“三位一体”新成立的宣传委员会的成员。

三、营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关押的“政治犯”。当我们打开监狱时，竟然有不少红军战士还穿着露体的单衣。宋绮云又组织了一次募捐，为他们购买了一百八十件棉大衣，还派记者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四、派人去各工厂、学校、机关协助成立基层救国会组织。如：起卸业救国会、木泥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运粮业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

五、以救国会的名义，请进步学生进工厂、机关，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教唱抗日爱国歌曲。宋绮云还撰写了《抗日救亡宣传大纲》、《一二·一二兵谏之伟大意义》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并组织学生宣传队在街头宣传，以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

六、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游行和集会，支持张、杨对蒋兵谏。十二月十六日在民乐园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庆祝大会，张、杨两位将军都在会上讲了话。

七、经与杜斌丞等人研究，决定对一些重要县的县长职位，安排由爱国分子、救国会成员或地下党员来担任，特别是从西安到陕此的一些重要的县，如由韩卓如任长安县长，常汉三任三原县长，马豫章任延安县县长，其他还有潼关、洛川、渭南等县也都进行了调整。

八、党中央为了支援张、杨“兵谏”，针对何应钦的武装挑衅，在军事上也做了相应的部署。红军主力南下进驻咸阳、渭南一线。十二月十六日西北特支以救国会的名义对红军进行慰问，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接见了我

们。十二月二十日，宋绮云又和杨部米暂沉（受杨的委托）一起对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进行慰问，以消除杨虎城因张汉民事件对徐海东的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代表团来到了西安，当天晚上，我见到了周恩来。那时，他还留着胡子，他一看见我就高兴地说：“他们说西北特支的徐彬如，我想一定是你，果然让我猜对了。”以前周恩来知道我叫徐文雅，徐彬如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来西安才改的。第二天我和西北特支其他同志又见到了周恩来，这时他已刮了胡子，而且已分头和张、杨交换过意见。我们向他汇报了西北特支的工作，特别是成立救国会，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他说：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起来的，张、杨受了群众的推动，加之你们把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得很好。他又说：群众运动是西安事变的基础，群众运动是西安变变的母亲。他对西北特支的工作十分满意，并指示我们利用救国会这一群众组织进一步搞好宣传工作，他还要我们写一个《一二·一二的意义》，并由他亲自授意拟了一个提纲，以后宋绮云又进行了若干修改，印成小册子广泛进行宣传。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们于十二月十八日在西安长安县政府礼堂组织了一次由救国会、救亡团体负责人约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当时县长是救国会的韩卓如。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他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蒋介石叛变，谈到这次西安事变以及中共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办法。他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我们就可以放他回南京，到会者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非常感动，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记前仇，提出放蒋，以促成抗日的新局面，这一政策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是光明磊落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当天，博古在西安谢华家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李一氓等人。博古给我们详细地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也讲了放蒋的理由，记得当时说由张学良的办公室主任米春林送蒋回去，并没有提到张学良送蒋的事。在这次会议上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恢复陕西省委，撤销西北特别支部。原来归西北特支领导的小杨在陕南的武装编入了徐海东的部队。郭子化领导的部

队归属陕西省委领导（一九三七年五月交由中央领导）。东北军中党的组织关系归以叶剑英为首的红军代表团领导。省委书记由贾拓夫担任，欧阳钦是组织部长，李一氓是宣传部长，张德生是西安市委书记。

省委恢复以后抓住有利时机大量地发展新党员，对原来失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杨明轩就是我们请示周恩来以后在我家登记的。但是在这项工作中也还有些曲折，省委一些负责人觉得自己资历较浅，而那些要求重新登记的老党员大多能力强、影响大，行动比较随便，组织纪律性较差，怕不好领导，因此在登记时卡得很严，说这个与张金印有关系，那个与某某有关系。许权中在党籍登记时也被说成与张金印有关系，许非常生气，拍了桌子质问：谁与张金印有关系？我敢对天发誓。这事听说以后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批评了这种做法。

当时，蒋介石说他只承认共产党的中央，不承认陕西省委的合法地位。后经周恩来再三争取，蒋介石才勉强承认陕西省委是中共的一个组织，但不承认是省一级的合法机构，所以陕西省委算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省委还刻有一颗图章（是莲湖食堂蒋自明请陈尧廷刻的），这颗图章一直放在我家，后来交给了欧阳钦。我是省委的公开代表，博古曾领着我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把我介绍给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以后又领我去天水行营程潜处，见了政治部主任任觉吾，博古对他们说：“徐彬如就是陕西省委的代表。”以后，我就以此合法身份公开同他们打交道，并在我的住处——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挂上了“西北周刊社”的牌子，作为省委机关在西安的办公地点，而省委在西安的真正地址，国民党当局当时始终未能找到。

（王少民整理）

*根据徐彬如《西安事变与西北特别支部》及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谈话记录整理。
徐彬如，安徽萧县人，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九〇年已故。

从西北特支到陕西省委*

谢 华

一九三二年秋，党中央派我去西安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党内是特派员。到西安后，通过关系住在杨虎城宪兵营，公开身份是宪兵营长金闽生和副营长童陆生的“客人”。经过一年的工作，在宪兵营发展了三十多个党员，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谢华，委员是金闽生和童陆生，直接与上海中央局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关系。

一九三三年七月，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变投敌，陕西党受到很大的破坏。有人向杨虎城将军和国民党省党部告密，说谢华是共产党，在宪兵营活动得很厉害，杨将军指示金闽生送我离开了西安。

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在上海接到西安地下党组织来电，要我“赶快回家，主持家务”（隐语）。这时，我在上海已得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的文件，会议决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正准备到西北军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接到电报，立即成行。

当时在西安杨部（宪兵营）作兵运工作的党员同志有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金闽生、童陆生、王根僧等。

我到西安后，向王菊人转达了党的十二月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王说：杨先生的枪是不会真向内开的，请放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去。我们谈得很好，他愿意向杨将军转达我的一些看法。从此，他就作为杨将军的代表，经常和我共同研究在杨部如何开展统战工作。我提议要杨的部队在前方与红军建立关系，争取政治上主动。大概是这年五月间，党中央派出的梁明德经过杨部的路线过来。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工作报告，由梁明德带回中央。不久，接到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对我们在

杨部进行的上层工作给予嘉奖，并要我们重建地方党组织，今后要着重开展群众方面的抗日救国活动。党中央与陕西地下党的联系从此开始恢复。

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宪兵营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任书记、组织部长）、徐彬如、李木庵三人为核心。金闽生、宋绮云、王根僧、童陆生等同志虽不是特支委员，但实际上参加领导工作。西北特支管陕甘白军中党的组织和苏北鲁南的地下党（因为共产党员郭子化在苏北鲁南工作，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到西安通过宋绮云与我们接上关系）。西北特支也管地方工作。特支成立后，即从学生工作入手，开始进行西北地区的群众救亡活动。西安高中的学生代表李连璧、曹冠群（女）和西安师范学生代表宋××（名字记不起了）三个青年，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先后成立了该两校的学生抗日救国会，不久，二中、女师、女中、一中和民主中学以及其他公私立学校都相继成立抗日救国会。东北军家属成立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市外的三原三中、女中、汉中的某中学都组织起来了。为统一行动起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杜斌丞、杨明轩、韩兆鹗都是西救的领导人，学生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是李连璧、何承华、曹冠群，教职员救国会的负责人是李敷仁、武伯伦等。李、何、曹由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学生救国会利用假期到工厂、农村宣传抗日救亡，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回民救国会相继成立。对于这些组织的活动，张学良和杨虎城是积极支持和保护的，所以当时西安各界群众抗日救国气氛是相当浓厚的。特别是“一二·九”那天，群众的示威、游行大会，促使张、杨下了发动事变的最大决心，给历史打开了光明的大门。

双一二事变后，中央代表团成员秦邦宪和红军代表团成员罗瑞卿到我的住处，传达中央指示精神，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外，还宣布撤销西北特支，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在会上，我将这支部队的关系交给中央，由罗瑞卿负责接收，这支部队后改编为八路军某部。

*谢华，湖南衡阳人，建国后曾任政协湖南省副主席等职，已故。

附录：

杜衡的“自白书”*（节录）

（一九三三年十月）

六、一九二七年八七紧急会议后的陕西共党

1. 伪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与陕西共党全国政变后，清党运动雷厉风行，伪中央即在第三国际代表监督之下，于武汉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共党新的策略和新的布置。结果，主要决议是布置两湖秋收暴动，对国民党还是拥护“左派”，企图利用左派，还继续阴险的寄生政策，各省准备暴动，还是当时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同时伪中央改组。八七会议中，白面书生瞿秋白风头十足，为国际代表所垂青，任伪中央总书记之职。共党元老陈独秀下台。陕西代表李子洲到武汉后，会议已完，只是伪中央之张太雷谈话数次，传达紧急会议的决定，同时，伪中央的八一暴动的计划亦详细与李谈及。李同出席共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陕西代表张金印、黄平万等先后回陕。在八七会议的精神之下，从新整理停顿中的陕西共党，由此又开始了活动。

2. 陕西共党的“九二五”第一次扩大会议

李子洲等回陕西后，即召集陕西共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西安红埠街九号开幕。参加该会的都是各地负责及共党内的主要人：耿炳光、李子洲、李秉乾（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萧铭、潘自励（莫斯科中央大学生）、王林、杜衡、张秉仁、张含辉、张金印、陈家〔嘉〕惠、曹趾仁、徐孟〔梦〕周、张国藩、庞诚哉等十余人。会议经过五日。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1）李子洲报告八七紧急会议，（2）耿炳光政治报告和讨论；（3）农民问题；（4）组织问题；（5）宣传工作；（6）对 K. M. T. 问题；（7）对共进社问题；（8）学生运动；（9）批评；（10）选举省委。最后，成立了几个决议案：政治任务，农民运动，组织任务，宣传工作，对 K. M. T. 及共进社等五个决议案。会议中选出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李秉乾（宣传）、萧铭、潘自励、张秉

仁、王林、杜衡、陈家〔嘉〕惠等为省委执行委员。一切重要问题在这次扩大会议中都决定了。

3. 扩大会议后的共党组织形式

共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关于共党的组织形式完全改变，为明了起见，特将共党代表大会前与代表大会后的组织系统列表如下：

A、五次代表大会前：

中央——区委——地委——部委——支部。

B、五次代表大会后：

中央——省委——县委——分支部——支部。

共党组织形式转变后，陕西共党扩大会议中，亦根据新的组织原则改组，各地都有变更。省委亦有健全的秘密机关，重要人员的行动都秘密起来。共党已由半公开的形式，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中。

4. 共党省委的组织

扩大会后，省委的组织即健全了，在省委集体领导之下，领导全省工作。政变后陕西共党虽然在陕西形成崩溃之势，但共党的基本实力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扩大会议后，省委很快的组织起来，不几时各地工作都恢复了。共党省委为应付全陕的广大局面，省委的组织亦因之而复杂。今将当时共党陕西省委的组织列表如下：

省委执行委员会	书记——耿炳光
	组织部——部长李子洲
	宣传部——部长李秉乾
	秘书处——秘书长刘继曾
	交通处——主任徐孟〔梦〕周

5. 扩大会议后共党的阴谋计划

（一）陕北石谦旅的哗变

共党在政变后，虽然组织上是暂时停止活动了，但阴谋计划并没有停止，相反地更积极起来。史可轩部的军事阴谋失败后，对陕北井岳秀部的军事阴谋并没有停止进行。陕北井岳秀之石谦旅内是共党有深厚的历史和基础的。政变后，共党一方面使史可轩部向陕北进展，与石谦部汇合，一方面派唐树〔澍〕（字东园，直隶保定人，黄埔第一期学生，军事很好）到陕北去领导石谦旅响

应史可轩，共同夺取陕北，割据陕北。但史部不久失败，石谦旅内共党已积极准备，但没有暴（爆）发起来。自扩大会议后，共党省委即秘密指示唐树（澍），积极发动兵变。

清涧发动后，立即向宜川撤退。谢浩如任先锋，先将延长康子祥营的武装解除，将最能作战的七连连长齐梅清（卿）枪决。延长克复后，毫无阻碍的占领宜川，将所有非共党嫡系部队完全解决，从新将部队改编，计全部约一千余人，长枪一千五百余支，驳壳枪二百余支，骑兵一连的马百余，实力尚不小，但战斗力很弱。

6. 扩大会议后的共党各地组织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地方	负责人	备考
西安	市委	西安全市	C.P. 潘自励（书记）、 杜衡（组织）、 C.Y. 曹趾仁（书记）、 马云藩（组织）	
长安	县委	长安、咸阳、 户县三个县	C.P. 张子〔质〕平（书记）、 庞诚哉（宣传）、 陈麻子（组织）、 C.Y. 杜松寿（书记）、 薛永寿（组织）、 罗承运（宣传）	
三原	县委	富平、蒲城、 耀州、同官、 淳化、旬邑、 三原七个县	C.P. 张冰〔秉〕仁（书记） C.Y. 孟方舟〔洲〕（书记）	其余 不知
渭南	县委	渭南、临潼 两个县	C.P. 萧铭（书记） C.Y. 张仲季〔宗适〕（书记） 刘济川	
故〔固〕市	县委	故〔固〕市全境	C.. P校吉甫	
岐山	县委	岐山、凤翔、扶 风、兴平等县	C.P. 耿觉（书记）	
陕北	C.Y. 特委	十九县	C.P. 焦维志〔焯〕（书记）、 贾拓夫（宣传） C.Y. 冯文江（特派员）	
汉南				停顿
华县	县委	华县全境	C.P. 王林（书记） 陈家〔嘉〕惠（组织）	

7. 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与省委改组

扩大会议后，新省委成立，张金印派抓住耿炳光起草一个通告，说西北农民是落后的，即攻击耿炳光为老右倾机会主义，即于十二月召集省委全体会议，改组省委，耿派失败。结果耿炳光开除省委，其余都受处罚。改组结果，潘自励书记，徐孟〔梦〕周组织，刘继曾宣传，其余没有变更，只将常委三人撤换。最后张金印派更进一步把耿炳光开除党籍，张金印派大获胜利。从此，陕西共党即为张金印所左右。

新省委特派杜衡到陕北，组织陕北特委，陕北共党又开始活动起来。

七、陕西共党的盲动时代（一九二八年二月扩大会议后）

1. 新省委的第一炮

潘自励任省委书记后，放第一大炮，就是有名的省委通告二十八号，指出耿炳光时代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陕西已到暴动时代，命令各地共党于阴历年关节必须举行暴动，造成全陕的骚动局面。从此。陕西共党即日夜暴动了。

2. 二月第二次扩大会议

张金印派的省委，认为各地共产党徒不会暴动，即于二月招集扩大会议，讨论布置全陕暴动。结果，成立全陕暴动决议，组织暴动委员会，以长安县委书记张子〔质〕平任主席。

3. 陕西混战爆发

不久，陕西冯玉祥全部出关，与中央战争爆发，各地军队都开出潼关防务空虚，陕西的李虎臣等陕军，乘机发动在陕西的反冯战争，陕西即成了混战局面，同时又值大灾荒，人心恐慌，各地都先后举行暴动。

4. 渭华暴动

共党的中心武装部队许权中旅，受冯子明改编后，即开到洛南驻防，反冯战争爆发后，许权中旅亦参加反冯，受李虎城〔臣〕指挥，担任攻击潼关。在潼关南原与冯部马鸿宾大战三日，共党在战壕中决议暴动，不参加战争，到华县南〔高〕塘一带，去与当地共党汇合起来，企图割据渭华。省委特派唐树〔澍〕、

刘子〔志〕丹、谢浩如等领导。没有通知旅长许权中，只将共党五连人与学生队带出，由潼关南原西窜华县之高塘，实现共党的军事计划。

到高塘镇后，即正式组织伪工农革命军，唐树〔澍〕任总司令，刘子〔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王太〔泰〕吉任参谋长，卢少卿总政治部主任，人数约四百余人，枪四百余支，战斗力很强。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陕西反冯战争失败，冯玉祥大部军队开回陕西，宋哲元部之三师两旅与伪革命军在高塘大战一月，最后卒克服高塘，伪革命军退入秦岭南之青柯坪一带，被秦军包围于两差〔岔〕河，大部缴械，中心人都战死。

5. 三原泾阳之围城

渭华暴动后，共党省委即令各地暴动，响应渭华。三原共党首先响应，用大刀强迫了两千余农民，勾结土匪马仙舟，包围三原泾阳县城。马仙舟乘机将共党之三十余支快枪缴去，群众星散，共党围县即告失败。

6. 礼泉围城

礼泉共党秋步月，号称陕西暴徒分子，听着各地都暴动起来，于是亦以共党为中心，用鸡毛传贴，强迫许多农民围县城，共围二日，被县长杀了几个共党知识分子，即全部瓦解。秋步月潜逃与土匪勾结，土匪向县政府告密，将秋步月砍头，礼泉围城即失败矣。

7. 旬邑暴动

旬邑共党书记许才升到三原，见县委书记张冰〔秉〕仁，被张大骂右倾机会主义，不举行暴动。许大气愤，回旬邑之第二日，即发鸡毛传贴，领了清水原之数百农民，闯入县城，将县长杀死，宣传成立旬邑苏维埃政府，许自任主席，军事部长陈 xx，秘书吕凤岐，外交吕又谦〔乾〕，财政蒲永升，共委员八人。在旬邑县混闹七日，被农民将共党八委员全部逮捕。送到汾〔邠〕州，中途即被士绅所杀，其他共党党徒死者很多，旬邑暴动亦告结束。

8. 陕北共党之活动

陕北共党在一九二七年停止活动。一九二八年春杜衡奉共党省委命回陕北

后，即开始活动。先后在神木、榆林、绥德、清涧、米脂等地巡视后，即于绥德西川之苗家坪召集扩大会议，成立陕北特委，杜衡任书记，杨国栋任组织，冯文江任宣传。特委成立后，陕北共党的活动又开始了。共党党员虽号称八百余人，但完全是学校的学生，工农中没有丝毫的基础。特委成立一月后，杜衡被调出席伪省委的第三次扩大会议，特委即由杨国栋领导。

9. 伪省委的第三次扩大会议

各地暴动相继失败，伪省委召集第三次扩大会议。六月八日于西安东羊市开幕，各地主要负责人都出席。会议主要是通过李子洲起草的布置全陕暴动决议案。会议中还将省委改组，共党省委潘自励书记、蒲克敏宣传、李子洲组织、杜衡职委书记、曹趾仁 C. Y. 书记五人为常委，张振海（农民）、王松年（农民）、张冰〔秉〕仁、刘继曾、徐孟〔梦〕周（秘书长）、萧铭为执委。

共党扩大会议后，青年团亦于梅家巷召集扩大会议，主要的内容是接受共党扩大会议后，即改选省委。结果，选出曹趾仁书记、马云藩宣传、程思诚组织、王文炳、杜松寿、孟方舟〔洲〕、刘济川等为委员。

八、陕西共党的衰落时期

1. 共党组织的瓦解

共党扩大会议后，各地暴动失败，共党组织亦随之瓦解。扩大会议所决定之布置全陕西暴动，根本是在省委机关内茶余饭后的闲谈而已。伪省委束手无策，即派常委蒲克敏到伪中央请示。

3. 长安县委扩大会议

长安共党因为组织的瓦解，工作无法推动，因此召集扩大会议，于西安城内召集，被共党薛〔祁〕廷贵告密，机关破坏，共党省委书记潘自励、县委书记张新发、组织李艮、宣传亢维恪等七人被捕，长安共党从此即宣告解体，始终没有恢复。

4. 第四次扩大会议与伪省委的全体被捕

蒲克敏由伪中央回来后，带回伪全国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传达伪中

央对陕西的指示。于是即召集第四次扩大会议于蒲城的荆姚镇高小学校开会。会议只一晚，许多问题都未讨论，只是改选了党团省委。共党书记曹趾仁，青年团书记马云藩，其他人员没有很大变更。会议后，共党省委都回西安。回西安的第三日，即全体机关被破坏，省委委员完全被捕。当时被捕的计李子洲、刘继曾、徐孟〔梦〕周、蒲克敏、曹趾仁、黎庶、马云藩、程思诚、刘映胜、王又章、景云、宁自克等二十余人。还有住机关之女共党任育云、王爱玉、王启贞、高玉兰等四人。

经过这次大破坏，各地共党只有渭南尚有，其余各地都瓦解了，陕西共党即告了一个相当结束。

九、渭南紧急会议后的陕西共党

1. 一九二九年二月之渭南紧急会议

共党在西安之全体省委虽被捕，但共党省委执委王林，尚在渭南，常委杜衡陕北被捕后已出狱，与青年团陕北特支书记焦维志〔炽〕同到西安。即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在渭南召集紧急会议，组织临时省委，当时出席的有王林、杜衡、徐振化、张玉〔蔚〕森、薛永寿、李惠民、焦维志〔炽〕、张文华等八人。结果党省委社衡书记，王林宣传，徐振化组织，张玉〔蔚〕森、李惠民等五人。青年团薛永寿书记，焦维志〔炽〕组织，张文华宣传。会议后，即由杜衡、王林、薛永寿三人组织代表团到伪中央解决陕西问题。陕西共党又开始活动了，但力量很微弱，中心组织只是渭南，其它地方根本谈不到的。

2. 会议后共党的开始活动

陕西代表团于七月间由上海回陕西。根据伪中央的指示，开始整理陕西共党的组织，其余活动还是没有的。当时省委机关设渭南，省委委员都在渭南。只有书记杜衡住西安，印刷机关亦设西安。尽量在西安减少机关，以免政府侦缉，保存省委的活动。关中各地都开始巡视和整理。陕北特派吉国桢（莫斯科学生）、张文华到陕北改组特委，吉任党特委书记，张任团特委书记。全陕共党又有了新的布置。

3. 各地共党的组织状况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地方	负责人	备考
渭南	县委	渭南、华县	C.P. 张玉〔蔚〕森书记 李惠民宣传 C.Y. 李玉〔毓〕章书记 姚明辉组织	
三原	特支	武字区内	黄子安〔文〕书记、孙平 章组织、唐玉恒宣传	
富平	特支		张祝三书记	
蒲城	特支		梁益堂书记	
周至	特支		陈文秀书记、张养诚宣 传、张辉组织	都在县 党部内
陕北	特支	十九县的组织	C.P. 吉国楨 C.Y. 张文华	

十、李立三路线与陕西共党（一九三〇年）

1. 伪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到一九三〇年，共党的组织已经恢复，工作已有相当开展，为了应付局面，即召集伪省委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六月六日于蓝田巩村高小学校开会，会议经过了一周，对共党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陕西共党的工人、农民、士兵组织、宣传等都有详细的讨论，结果，都成立决议案。改选省委，党省委杜振清（杜衡）书记、王林组织、吉国楨宣传、张文华、黄子文、陈文秀、赵伯平等七人。团省委薛永寿书记、焦维志〔焮〕组织、贾拓夫宣传，杨应〔荫〕川、杨森、王作宾、张养诚等为委员。

2. 三原的游击战争

扩大会议后，即布置各方面的工作。三原武字区在黄子文领导之下，先成立了灾民自救军，预备开发游击战争，枪六十余支，人一百余人，大部分是当地被诱惑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土匪。经过二十余日，结果被土匪介〔解〕决于瓦窑头，全部消灭，游击战争失败。

3. 李立三路线到陕西

扩大会议决议案尚未公布，李立三之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传到陕西，布置全国暴动，于是共党省委即宣布五次扩大会议无效，根据李立三决议起草布置

陕西暴动决议。

4. 伪中央三中全会后的北方局扩大会议

伪中央的三中全会亦于这时开过，指出李立三路线布置全国暴动之错误，在共党的政策和路线方面，有了新的变化。三中全会后，北方局管辖范围扩大，陕西亦划归。北方局召集扩大会议，陕西共党即派杜衡、王林、杨应（荫）川组织代表团，到天津时会期已过，只单独讨论了些陕西问题，但是很模糊的，并没有很具体和详细的讨论和决定。在组织上将陕北划归北方局直接管理，派王林去巡视。同时派高维汉（翰）（长安人，俄国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毕业）到陕西任军委书记，参加省委。杜衡等回陕不久，全国共党反李立三派的斗争弥漫，陕西与伪中央及北方局都断绝关系。

十二、九一八事变与陕西共党的复兴

1. 九一八事变与共党的阴谋

九一八事变，全国震动，陕西共党亦乘着这个机会，组织民众抗日会，打党部，煽动民众，反对党国，组织工人抗日救国会，煽动工人的罢工；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抗日义勇军，开发游击战争；组织士兵抗日会，煽惑兵变；组织学生抗日会，煽动罢课，在共党的活动方面，特别集中力量于中心区域。省委决定后，即派人到各地执行。西安举行了示威运动和市民大会，捣毁省党部。蒲城捣毁县党部，三原方面省委特派焦维志（炽）去领导，在武字区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反日义勇队，有一千余人，到县城示威，武字区共党的活动，即肆无忌惮地公开起来。当时只是在这几个地方有了显著的活动，其他地方还是没有的，没有基础和力量的。

3. 四·二六之打中委戴季陶

共党抓取了西安市的学生抗日会，即以中山中学校之抗日会为中心，利用学生抗日会，实现其破坏党国的阴谋。中委戴季陶氏来西安，于四月二十五日，在民乐园召集各校学生讲演，共党即乘机煽动学生殴打戴季陶氏，并将所乘之汽车烧毁，后于四二六号召示威罢课，学生与弹压军警冲突，学生负伤十余人。共党又乘机煽动总罢课，从此，西安各校的学潮无有宁时。

4. 两当警备第二旅之哗变

共党在军事方面，积极执行哗变阴谋，首先集中力量在警备第二旅唐嗣桐部之第二团第一营内，煽惑兵变，因该营内共党历史很长，有三连被共党完全操纵。驻扎甘肃之两当县后，共党即派刘景文到两当县去领导哗变。共党当时计划是预备在宝鸡举行与驻凤翔之刘天×部之特务营汇合，袭取凤翔城，退到岐山、邠州、陇县一带，用游击战争的战略，和伪红军游击队驻陕甘边遥相呼应。但这个计划，因军队已开到两当县，无法实现。即于两当举行，企图经过邠州到陕北边与伪红军游击队汇合。但变后，连窜十日夜，到乾州境后，被西路巨匪王结子完全缴械，这个阴谋失败。

4. 甘肃海元〔原〕县之兵变

共党在甘肃王子远〔元〕旅内还有不小力量，因王部官佐大部分是陕北共党分子，与谢浩如勾结甚深。共党即派谢浩如、焦维志〔炽〕二人到靖远活动王部哗变。谢等去后，煽动了两营，在海元〔原〕举行哗变预备到陕甘边。结果，不二日，即被政府军队完全解决，全部缴械，共党军事领袖张东皎被杀，谢浩如潜逃。

5. 共党的组织状况

共党在组织上亦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军队中亦建立共党的基础，陕西、甘肃各部队中都有共党的组织和活动，尤其是在警卫团的部队，共党分子即占了全体三分之二。兹将其组织情形分述如下：

（一）伪省委的组织：伪省委在这时因各地紧张，都分配到各地去了，经常在西安的有愚痴一人。当时共党省委是杜衡书记，愚痴组织，曾楚川军委书记，王立市兵委书记，高维汉〔翰〕、杨声市委书记等为委员。青年团没有省委的组织，只有市委杨声书记，贾拓夫宣传，陈浅伦组织。

（二）C. P. 与 C. Y. 的组织状况列表如下：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区域	负责人	备考
西安	C.P.省党兼 C.Y.市委	C.Y.兼管 外县	C.Y.杨声、拓夫、 陈浅伦〔伦〕	
三原	特支	全县	孙林章书记（农民）	

蒲城	县委	全县	C.P. 雷鸣夏 C.Y. 马玉林
富平	特支	全县	张祝三书记 刘万海组织
韩城	县委	全县	C.P. 樊起云书记 薛何方(和昉)组织
户县	特支		张××书记
蓝田	特支		
汉南	特委	城固、洋县、 南郑、西乡	
旬邑	县委	淳化、旬邑	崔维峻书记

十三、北方六省会议后的陕西共党

1. 北方会议的召集及对陕西决定

共党伪中央认为北方各省共党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开发游击战争与创造新苏区，于是召集满洲、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六省会议于上海。会议六月十日于上海法界蒲石路开会。出席人为中央委员：秦邦宪、张闻天、赵容、大云、李楚筠、吴福近、唐纯（C.Y. 中央代表）。各省代表：满洲任 xx（四川人）、河北华少峰即华岗、山东陈××（农民，莫斯科中山大学）、河南吉国桢（省委书记陕西人）、陕西杜衡（省委书记）、山西未出席。会议共五日，成立三个决议：A. 北方共党政治任务决议；B. 职工运动决议；C. 创造北方新苏区决议。对陕西决定将伪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伪红军二十六军，特派杜衡任军政委，负责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会议后，杜衡匆匆返西安传达北方会议与伪中央的决议。

2. 八一运动

杜衡于七月回陕西后，即布置西安市的八一运动，由学生抗日会、西安互济会、前卫社等共党取用组织，派代表组织八一筹备委员会，指挥八一运动，预备举行飞行集会，开大会演新剧。结果中山中学于八一早开纪念大会，演新剧，内有庆祝会一幕，是拓夫所编之庆祝伪军胜利，以煽惑市民与青年，同时

有各代表讲演，会未完，即被军警将会场包围，捕获学生三十余人。

3. 伪省委改组

八一后，共党中央派曹长清〔青〕来陕西任省委书记，调换杜衡到伪二十六军去。曹到后，伪省委组织即变更，C.P.省委曹长清〔青〕书记，愚痴组织，王松年市委书记等。改组后杜衡即离西安到伪二十六军去。陕西问题日渐复杂，曹某忙于应付，于十一月即到伪中央请示，派人来陕西。结果，伪中央只派杜润滋回陕西，青年团中央即派袁岳栋（小章）来陕西。十二月间，共党省委亦变更为：曹长清〔青〕书记，贾拓夫宣传，杨声组织，杨玉章职委，李子靖（电报支部书记），金理科（渭北特派员）杜润滋军委书记，杜衡二十六军政委，袁小章 C.Y. 书记等九人，共党省委比过去扩大了。

4. 伪渭北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失败

省委曹长清〔青〕、贾拓夫十月间到三原武字区巡视，召集活动分子会，决定组织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成立渭北革命委员会，这时武字区有枪三十余枝。会议后，组织渭北特委，党省委派高维汉〔翰〕为书记，李冲霄组织，黄子文宣传，王立军委书记，陈建文 C.Y. 书记等为特委委员。以渭北特委领导渭北游击战争。管辖蒲城、富平、高陵、泾阳等县共党工作。特委成立后不久，武字区即成立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武装组织，宣布成立渭北革命委员会，实际只是武字前区。兹命委员会以黄子文任主席，土地委员会金理科，军事委员会郑燕〔彦〕青，肃反委员会马尊〔宗〕德兼政治保卫队长，雇农工会主席雇〔顾〕现成。农民联合会，雇农工会，妇女联合会都成立起来。示威游行，分配土地，当时共党阴谋即以该区为中心赤化整个渭北，实现其渭北新苏区的迷梦。只横行二十余日，被政府军队与民团举行大包围，完全扑灭……。最后以武字区为中心，又组织渭北游击队，枪二十余枝，人二十余名，在南原太和堡一带，昼伏夜出，在富平边境扰乱无已。

6. 这个时期中的陕西共党组织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区域	负责人	备考
西安	C.P. 省委兼 C.Y. 市委		C.Y. 市委: 李继善书记 郭伯雄组织 王伯勤宣传	
三原	县委	三原、高陵、泾阳	C.P. 刘林生书记王立组织 赵伯平宣传陶润平军 委、锦天花 C.Y. 陈建文书记, 薛仲雄 组织、冯树立宣传、 李盛弟	
富平	县委			
蒲城	县委		C.Y. 王维竣书记	
白水	县委			
渭华	特支	华阴特支	C.P. 张克勤 C.Y. 姜炳泰	
临潼	C.Y. 特支		安耀华书记	

十四、伪省委改组与陕西共党

1. 伪省委改组经过

伪省委指示，伪二十六军应改为许多小游击队，杜衡认省委为右倾机会主义，停止执行，领导伪红军中之共党党徒反对省委，号召改组省委。杜衡回西安即攻击省委，召集省委会议，一致接受杜衡改组省委之意见。结果，省委改组，党省委：袁小章书记，杜衡组织，曹长清〔青〕宣传，李世英军委，李子靖职工，金理科边特书记，杨声，拓夫秘书长，刘宗沛 C.Y. 书记等九人，当时杨声与拓夫撤销常委，最后长清〔青〕根本政治动摇，即开除省委委员，杜润滋亦受同样处分。青年团：刘宗倍〔沛〕书记，李圣〔盛〕弟组织，杨玉章宣传，李继善市委书记，刘英汉南特委书记，史克寿边特书记，李××南厂工人经斗部等为委员。伪省委改组与陕西共党是有很大影响。

2. 伪省委的军事阴谋

伪省委改组后，首先注意到军事问题，以军事力量创造所谓“陕甘边及渭北新苏区”，“西北新苏区”。于是在军事方面即：

（一）建立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渭北游击队的指挥，在武字区、新〔心〕字区、富平创造小游击队。当时即派李萍（河北人）任总指挥，锦天花任政治委员，指挥部即成立，共编三个支队，经常向照金一带与陕甘边区联络，枪六十余支，人八十余人。后因政府军队围剿凶〔凶〕猛，即将枪枝埋藏。后共党派杨声任政委，又组织起来，黄子祥任总指挥，李天保任参谋长，又以兴〔心〕、武两区为中心活动，后改为伪二十六军第四团，以该部为中心，创造渭北新苏区。

（二）成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三水、淳化、耀西等游击队，以谢家寨为中心，向四方游击。总指挥李妙哉，后改为黄子文，政治委员秦舞三〔武山〕，后改为薛〔习〕仲勋，名义有二十一个支队，实际能听共党指挥的只有三水（即旬邑）游击队，枪二十余枝，人四十余，队长齐振清，指导员焦润林。淳化游击队人二十余，枪两支，其余都是土枪，队长罗从，指导员聂俊成，以这些游击队与伪二十六军之第二团创造陕北新苏区。

（三）在西路，临潼、渭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各方面都已有潜伏势力，枪枝都有，共党派军事和政治干部发动，西路之周至，临潼之马额镇一带都公开行动起来。

（四）加紧政府军队中的活动，煽动兵变。特别注意到骑兵团，甘肃之中央第一师，西安之宪兵营。这些部队中，共党都是有相当基础。卒与骑兵团团长王太〔泰〕吉勾结，于七月二十一日在耀州全部哗变，改为西北民众反日义勇军，共党因为内部力量还是薄弱，不能完全把握。因此，令向白水一带扰乱，将来准备改为二十六军之四十一师，特派高硕卿任师政委。但计划尚未实现，该部在三原兴〔心〕字区战役，即全部瓦解。

1. 加强西路共党的活动

陕西西路数县，经过几年灾荒，土地荒芜，人民颠沛流离，过去共党在西路是没有集中力量活动的。共党省委改组后，认为过去是错误的，即用很大的力量，在西路各县，培植潜伏势力。派陕西共党分子，在西路活动有年的李特生负责领导。先后将咸阳、周至、千阳、岐山、凤翔等地共党建立起来，并活动了不少枪枝，企图用军事阴谋的活动，实现土匪的游击战争，以扰乱西路社

会治安，创造西路新苏区，以与陕甘边遥相呼应，牵制政府的力量。共党为了实现这个阴谋，计划召集各县联席会议，成立西路特委，以统一共党在西路的领导。西路共党这种积极的活动，是陕西共党从来没有的现象，同时也是陕西共党改组后的最中心的目标之一。

2. 五月底之各县共党活动分子联席会议

共党省委认为一切阴谋必须加速度地实行，即决定于五月底召集各县共党活动分子联席会，报告和讨论共党省委的阴谋与计划。同时因为二十六军的活动，政府当局有决心地围剿与消灭伪军，共党省委认为伪二十六军在政府八团兵力围剿之下，是到了生死关头，必须全陕共党拼命挣扎，方能使伪军不至于溃退消灭。于五月底于黑虎巷小学校内开会，时间经过一夜。出席人，伪省委方面：袁小章（省委代表），陈建文（省委组织部秘书），樊懋（小章翻译员），高凤文，李特生（军委干事），李冲霄（巡视员）。各县共党：韩城魏益三，富平郑柱（农民），耀州张仲良，渭南二人（姓名不知），临潼二人樊德荫（音），蓝田袁国藩，户县一人（姓名不知），蒲城屈伸志，还有特许参加之苏学宾，白耀卿。青年团五人未到会。共计这次到会人数二十二。会议选举主席团五人：李冲霄，白耀卿，高凤文，张仲良，樊德荫（音），李冲霄为总主席。会议主要内容是：小章详细报告政治形势，伪二十六军之被围剿及冲破围剿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之阴谋，各地共党应有之阴谋行动。各党徒讨论，最后决定成立一决议案。各县共党举行反革命的阴谋竞赛，各县共党经过伪省委的煽动后，都疯狂似地签订合同。天明后即宣告闭会。

5. 三原学生的五卅示威

共党三原县委，利用三原学生于“五卅”惨案纪念日，召集市民大会，举行示威运动。为了实现这个阴谋，利用三原学生反日救国会，以第三中学校共党为中心，于“五卅”在城皇（隍）庙内召集了大会，在城内举行示威运动，共党煽动学生将县党部封闭，并捣毁之。后又在城皇（隍）庙内演戏三日。

6. 鼓惑工潮欺骗蒙蔽工人

共党在陕西历来是在工人中很少活动的，伪省委改组后，对于西市的工人亦相当注意到了，用很大力量在西安几种工人中建立共党组织和活动。先后在

西安之皮匠、省府印刷局、电话局、时报馆、凿井工人训练班内都有了共党的活动。共党即乘机利用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等口号，鼓惑这几个工厂中都发生了工潮，大部分都失败了，使工人失业，更增加了工人苦痛，利用工人的阴谋，是同样的遭了失败。

7. 西安之救国代表会议

共党更巧妙的利用救国名义，在西安召集代表会议，于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在西安大学习巷回民反日救国会内开会，西安各校学生都派代表参加，共党还调动军队中的共党分子参加，以特务团、宪兵营为中心，而宪兵营之共党分子持枪保护会议。

8. 所谓冲锋月的活动

伪省委为强有力地鼓动下层党徒，决定所谓冲锋月运动，由七月至八月为冲锋月，伪省委派了许多比较活动的党团干部，到各地传达伪省委的决定，甚至省委中之小章、拓夫都亲自出马。

9. 西安之插红旗运动

在妙想天开的冲锋月鼓惑下，西安复发动所谓插红旗运动。共党估计本身力量的薄弱，于是即主要的利用驭用的组织，西安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前卫社中之被蒙蔽的青年，造小的红色旗帜，在西安遍插，以扰乱社会治安，扩大阴谋计划的声势。

10. 汉南共党之活动

汉南方面，过去共党是很忽视的，自伪徐向前部经过汉南，窜据四川后，汉南与四川接壤，汉南即形成共党的中心区域。伪省委未改组前，即派孟芳舟〔洲〕、杨应〔荫〕川、李愚痴、杜润滋与伪共党中央特派到伪四方面军去之王大舜，青年团方面亦派刘英，一时派了大批干部到汉南去，成立汉南特委，加强汉南共党之领导。在共党领导之下，得到伪四方面军之援助，在西乡等地成立了游击队及空洞名义的伪二十九军，名为一军，实际只有三百余人，而且都是当地的神团改编，共党成立特委后，派李愚痴负伪二十九军政委，同时又派大批共党到伪二十九军去。到后不久，在马尔岩开会觉悟自新的张万正包

围于庙内，将所有的共党干部都捕而杀之。伪二十九军瓦解，汉南共军受了空前未有的打击。伪省委改组后，对汉南共党，同样注意，先后派张赫、李楷、吕雪影、邢崇道、李继善、杨玉章、樊德音等六七人到汉南去，整理伪二十九军及游击队，并传达冲锋月意见。汉南共党在这种情形下面，还是较为活动，最后更计划与伪四方面军合并，组织共党川陕甘边省委，使汉南共党即归三省边省委指挥，脱离陕西共党省委，则汉南共党即成为肃反工作中最主要之区域矣。

8. 共党的组织状况

这个时期内（改组后）因为共党各方面之拼命，在组织方面有了相当的扩大，并列表如下：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区域	负责人	取用组织	备考
西安	市委	城市附郊	C.P. 宁慎言、薛何芳 〔和昉〕、杜文德、张仲良、李〔寰〕×× C.Y. 余继宽、刘芳云、屈伸志、朱××、李××	互济会反帝同盟前卫社	
三原	县委	三原、高陵、泾阳	C.P. 赵伯平、李俊藻、赵宝珊、姚万中、王金炎 C.Y. 魏宗盛〔中慎〕	学生反日会互济会前卫社	
富平	县委		郑柱书记、石红山组织、孙玉信宣传	穷人会	C.Y. 是区委负责人不知
蒲城	县委		C.P. 曹春生书记、张树堂、万史娃 C.Y. 李树娃书记刘托	农联会造纸工人工会兄弟会血花社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区域	负责人	取用组织	备考
白水	县委		C.P. 杨彦奎书记、杨祥林、吴子健、索玉华 C.Y. 杨毅书记、董德芝、赵××	农联会	
韩城	县委				
澄城	县委		张兴〔新〕发书记、雷致远组织、刘振发宣传		C.Y. 无组织
渭南	区委	华县			
华阴	特支				
临潼	县委				
蓝田	特支		马云芝书记、方益民、薛致和、齐一礼	少先队儿童团、雇农工会、互济会、抗债会、农联会	
户县	区委	周至			
西路	临时特委	宝鸡、咸阳、千阳、凤翔、兴平、武功、扶风、岐山、礼泉、陇县	李特生书记 李孟余〔慕愚〕军委		
边区	特委	耀州、旬邑、淳化	C.P. 秦舞三〔武山〕书记、高麻子 C.Y. 史克寿		

地名	组织别	管辖区域	负责人	取用组织	备注
汉南	特委	西乡、南郑、城固、勉县、宁强、洋县、安康	C.P. 杨应〔荫〕川书记、吕雪影军委、刘英 C.Y. 杨玉章、李楷、李继善		
兰州	特支		吴××书记（回回）		

（王少民、贾波摘录）

*此文节自杜衡一九三三年十月所写《陕西共党沿革》一文。杜衡，陕西佳县人，一九二四年冬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曾任西安市委第二部委书记、陕甘区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等职。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了《陕西共党沿革》一文，供出他所知道的陕西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全文共十六章，近六万字。文中政治观点反动，充满仇视、诬蔑党和人民的词句，史实也多有不准确之处。考虑到杜衡在省委任职时间较长，是许多重要活动的当事者，《陕西共党沿革》成文时间距所述史事较近，故将此文第六到第十四章加以删节后，作为附录刊出，供研究分析使用。

编 后

本辑丛书的编纂工作，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历时近十年。其间经历三个阶段。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为第一阶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委党史委”）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九八三年三月两次发出征集提纲，分专题征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的资料，一九八四年四月确定编印内部发行的资料专辑。省委党史委领导人常黎夫、白瑞生、孙启蒙主持了这项工作；贾自新、郃持文、梁兴、刘守琦、刘西建、王少民、姚文琦、张新生等，参加了资料征集、整理工作。主要工作成果曾在《陕西党史资料通讯》和《内部研究资料》上发表，共一百五十余篇，三十五万多字。为本书的资料工作，打下了基础。

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为第二阶段。省委党史委决定公开出版中共陕西省委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丛书，罗文治、孙平、白玉洁同志主持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由高中哲、刘守琦、王少民、姚文琦、刘玉平等同志参加的征编组，扩大范围继续征集、整理、核实资料。

一九九〇年三月省委党史研究室成立后，为第三阶段。将本辑丛书列为重点书目，在李鸿义主持下，由高中哲、刘守琦、王少民、姚文琦、刘玉平、张培林、贾波组成本书编辑组，对全部资料进行整理、补充、订正和选编，完成了全书的总纂工作。全书由李鸿义、高中哲统稿。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

(陕)新登字 001 号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中共陕西省委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x1168 毫米 1/32 开本 28.75 印张 4 插页 645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224—02215—2/K.317

定价: 14.40 元